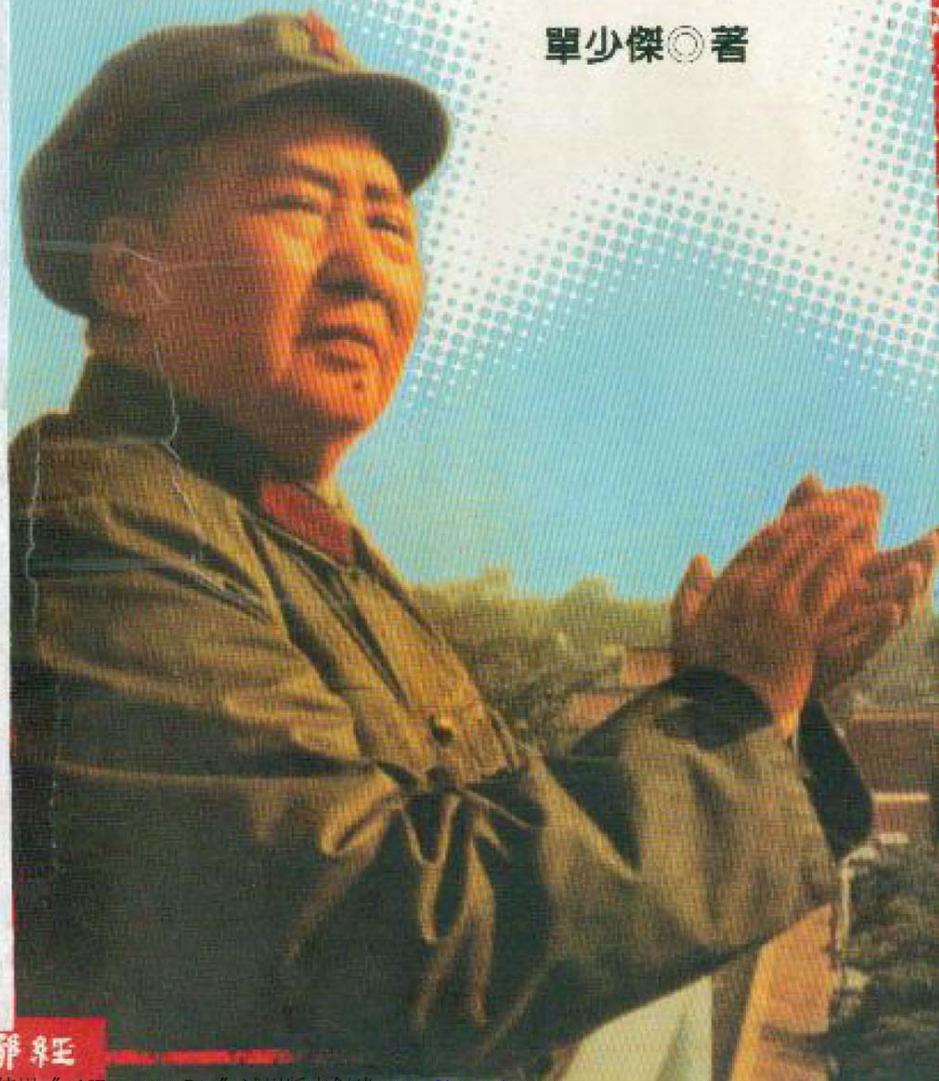


文化叢刊

# 毛澤東執政春秋

單少傑◎著



聯經

文化丛刊

# 毛泽东执政春秋

单少杰 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1年12月

# 目次

序一（李锐）

序二（余英时）

第一篇 导论：暴力与政权

第二篇 建设：大跃进与庐山会议

第三篇 转折：七千人大会与八届十中全会

第四篇 革命：四清运动反帝反修文艺批判

第五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上）

第六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下）

尾声

附录 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

后记

## 序一

在〈毛泽东晚年「左」的一思想初探〉一文中，我曾谈到，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毛泽东研究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错误）。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给我们的教益。」这是十年前说的话，没有听到不同意见。

以前，人们常说，中国自 1949 年后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种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却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经过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他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争朝夕，追求大同之境，左右了国家的一切，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真正做到了「系天下安危于一身」或者谁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我们过去的成就和失败都同毛泽东分不开，研究他的晚年错误，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谈到「文革」十年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而且一直在发生影响。当年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说过：「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

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是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果然，这种人旧习不改，尤其 1989 年后又大大出现了这种翻腾，于是，1992 年初，邓小平不得不「打招呼」，作南巡讲话，告诫全党上下，「左」的错误是根深蒂固的。所谓「根深蒂固」，当然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分不开。

1997 年列席十五大时，我在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中谈到，在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左」，从马恩列斯的理论与实践到中国自古以来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分析了「左」及其难改的根源，并建议总结改革开放廿年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最近，在全国学习「三个代表」高潮中，邓小平指责过的那种「左」的翻腾又出现了。「左」爷们的「左」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死抱住教条，无视历史事实，唯我独革，还是唱着那些老调子，还是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

因此，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研究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方方面面，理清事实，探讨根源，仍是不可推卸的长期任务，仍同我们当前的建设和未来的走向紧密相关。我一直认为，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问题，不彻底查明前卅年（1949 至 1978）走过的大大小的弯路，不彻底弄清「左」为什么根深蒂固的全部历史，我们就不能轻装前进，就还会犯错误、走弯路。

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是条长腿，政治体制改革是条短腿，致使我们总不能大步前进。原因何在？关键就在我们没有彻底清算过去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同「左」的结合。毛泽东承认自己是搞「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有点个人崇拜」；追求「君师合一」。……于是才有林彪的「四个伟大」（毛本人特别欣赏「伟大导师」），手摇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文革」十年「砸烂一切」，将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所依靠的民主、自由、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致使整个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至今回顾，仍不寒而栗。有鉴于此，1980 年邓小平作了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可惜的是，

报告中讲到的种种措施，二十年来未能得到认真落实。我们还是习惯人治，习惯家长制，习惯个人说了算；还是一个权大于法的权力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乃至执法犯法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这就是腐败难治、民意难申、言路阻塞、党的威信日益下降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是 20 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也是世界有影响的人物。有关他的传记，国内外已出了多种，最近西方又出了两种，据说拿破仑身后的传记有一百多种。相信毛泽东的传记也会越来越多。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我 1950 年代写过早年毛泽东，1980 年代后不断写晚年毛泽东，由此认识了不少这方面的学者专家，老中青三代都有，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执教的单少杰就是其中一位。

1995 年存夏间，单将书稿第一至二篇交予我。在随后几年间，他又将书稿其余部分陆陆续续交予我。2000 年 1 月 26 日，他将修改好的全书第一稿送到我家，嘱我写一篇序言。书稿过去断断续续读过，但毫耄之人随读随忘，日常杂事又多，现在也不可能再通读一遍。因此，序言只能写一点浮面的话。

我从作者写的「成书过程」中知道，年毛泽东百年诞辰时，他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民主观的文章，前一部分题为〈轻诺延安寡信北京〉。这时到处兴起一股「毛泽东热」，并愈演愈烈。作者感到我们这个民族患有严重的「历史健忘症」，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的苦难，于是在 1993 年底至 1994 年春，又写出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政权暴力背景的文章。他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得到过苗力田教授的指教。苗是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主持翻译过《亚里斯多德全集》。苗既介绍作者读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又为作者审阅了这篇文章。在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作者对毛泽东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终于闭五、六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五十余万字的著作。

单少杰是研究哲学与文史的学者，藉鉴亚里斯多德《政治学》来研究毛泽东。亚里斯多德是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古希腊思想家，他研究

了一些希腊城邦因暴力而兴又因暴力而衰的历史。我没有读过西方学者尤其西方古代学者这方面的著作，但我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自有其共同规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道路，既有相异处也有相同处。用亚里斯多德有关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的思想，来对比研究毛泽东的执政成败，会有借鉴启示，可以顺理成章。这种学者思想型的研究，我很是赞成（我自己没有这种基础）。

如关于庐山会议，作者指出，彭德怀上书，既对事又对人，对事涉及所批之事的范围、程度、性质等方面问题，对人则触及所批之人的应负责任、实际能力、工作作风等方面问题。作者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彭德怀批评毛泽东的言论，还是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言论，都有一个前轻后重的不对称结构，先是有条件地肯定对方，继而很严厉地批评对方。不过，毛的言论不仅有谈话结构的不对称，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对称。「他可以负人，人不可以负他，颇有些曹孟德气度。」关于毛泽东批斗彭德怀，作者除了作出政治、思想、历史等方面的考察外，还作出文化方面的阐释，指出毛还承袭了古代君主在整治政敌和驾驭臣民时常采用的一些手段，「不守常规，不讲章法，无巧不取，无所不为。」「太史公笔下的汉高祖，既有旷世雄主之风采，又有肖小徒弟之行色，几分雄才，几分痞气。」「明太祖朱元璋则把谋害大臣的事做到极致处。」「毛泽东虽不好与史上名君相比，但作为能夺得天下者，自是有许多过人之处，自是一个在整治人事方面的长袖善舞者，阴柔之道也是烂熟于肚中的。」

作者根据自己熟读过的经典理论著作，就毛批彭没有理论思想，乃非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世界观，「言辞间多有对彭的轻蔑与嘲讽，以伶牙俐齿刚正，以利齿辱厚重」，指出，「实际上，毛所说出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许多问题，他指责别人不懂许多东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这些东西。」比如他说，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就不准确了。因为，经验主义是一外延较大的概念，不仅包括马赫哲学，而且包括其它哲学，上自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哲学，中有英国经验论，下至本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哲学。」毛还告诫彭，「经验主义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作者认为这一说法也有问题：「按毛屡屡引为权威的那些经典作家的说法，在经验主义哲学中，既有唯心主义派别，也有唯物主义派别，后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他们均被马克思等推崇为现代唯物主义先驱。

过去，人们在谈到毛泽东独断专行时，对其为所欲为方面谈得较多，而对其遭遇抵制方面谈得不够。作者在书中强调：在执政党最高决策层中，除毛外几乎所有成员都曾先后不同程度地作过努力，来阻止毛一意孤行，呈轮番抗争之势，并最终置毛于落孤陷寡之境地。据我所知，事实也是如此，从「土改」开始，尤其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党内高层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有过分歧、有过争论，按旧的说法即有「路线斗争」。对于毛所制定的那些具有「极左」性质的方针政策，党内许多领导人都先后提出过不同意见，作出过劝阻努力，尽管最终都被毛一言九鼎地打压下去。认真研究这些分歧、这些争论，是很有意义的。作者还比较了毛的党外反对者与毛的党内反对者，认为后者的抵制力更大些，骨头更硬些。对付党外民主人士，毛只要搞些「阳谋」，便可打发了事：对付党内异己力量，他就要处心积虑并倾其全力了。彭德怀在被打倒后，总是不服，今大写一封自讨苦吃的申诉信，明天又写一封自讨苦吃的申诉信，直到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时，还要求同毛泽东见一面，把问题谈清楚。

作者是教授、学者，这本书所利用的文献和有关著作，是大量而广泛的，是经过作者认真地梳理和鉴别的，所引材辑比较详实可靠，是经得起推敲的。作者同我谈到，他在处理书中材料方面，花了很多工夫，写得很苦。之所以如此，除要考虑写学术论著所应考虑的那些一搬要求外，还要考虑两个特殊因素：一是，对于书中所写的人和事，我国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有或大或小的发言权，当然说多说少不一。二是，在现今中国文化思想界，不仅「毛泽东余威」犹存，且有「文革」余孽和积习不改的文化酷吏及其走卒活动，其中年纪较大者，过去曾当过「四人帮」的帮凶，如今仍怀有「鸡蛋里挑骨头」这一习惯性心理。作者认为无法不让他们书中捕风捉影，但应尽量不让他们从书中

找出学术硬伤。

翻读原稿时，我对作者的感觉是，他将毛泽东严厉的摆在历史的天平上，很少顾忌，畅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有时还打比方、用典故，有的恰到好处，有的难免使人感到太尖锐了。关于毛泽东性格特征，书中也有所论述。这里举三个例子：用一个多动症患者竟拎着一只装满鸡蛋的大篮子，来比喻「爱折腾」的毛泽东却掌管着新中国所有权威资源这一局面。用袁绍因讨伐曹操失败而恼杀田丰的典故，来解说毛泽东因搞大跃进失败而加罪彭德怀这一史实。毛泽东晚年多病，却不爱吃药，并常同医生闹别扭，这种讳疾忌医的倔劲，不仅表现在医病保健上，而且表现在施政用权上，既不愿吃健体之药，也不愿吃治国之药。

这本书所使用的语言是亦雅亦俗的，既适合专业研究者阅读，也适合普通老百姓阅读，其阐述举重若轻，能把一些颇有深意的问题讲得浅显易懂，其行文简洁流畅，很少有什么生僻的字词和生造的语句，多为熟词和短句，有节奏感，可琅琅上口。

不同的读者对本书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是很自然的事。作为一个毛泽东研究者，由于种种限制，我虽然不可能像作者那样毫无顾忌、畅所欲言，但我赞成出版这样的书，因为毛泽东已走进历史，无法不让人评说。

1992年《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一书出版时，我在「前记」中说到：「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同毛泽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胜利与失败，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后退，欢乐与痛苦，乃至价值取向、思维习惯等等，都是同毛泽东分不开的，真是荣辱相关，生死与共。毛去世已十六年了，他的光辉——毛泽东思想仍照耀着我们，可是他的阴影——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也还笼罩着我们。」这是八年前说的话。难道毛泽东的阴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人们啊，不要忘记刚刚过去的苦难的历史。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时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我相信作者的辛劳是会有收获的，这本书对研究毛泽东尤其鉴戒毛泽东是会有好影响的。

**李锐**

## 序二

单少杰先生费了多年功夫写成这部《毛泽东执政春秋》，而且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毅然刊布，充分体现了孟子所谓「大丈夫」的风骨。仅此一点，已使我钦佩无已。但本书的价值还远不止此，单先生是哲学家，具有思想的深度。我匆匆读过原稿和〈关于本书写作理念〉，才懂得他的用心之苦。他不仅仅是写一部当代的信史，而是要重建价值系统，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作者服膺康德哲学，他所处理的不但是历史知识问题，而且也是道德问题。思辩理性和实践理性，真与善，兼收而并蓄，是本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他所用的「春秋」两字取自孔子的原义。《春秋》是中国史学的大宗，两千年无异辞。清代中叶考证学大兴，褒贬之说渐受冷落，但章学诚仍然大声疾呼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文史通义》卷5〈答客问上〉」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甚大，几乎没有人懂得《春秋》的深刻涵义了。但陈寅恪先生在1964年〈赠蒋秉南序〉中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眨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寒柳堂集》）

陈先生中岁以前，治史也极尽客观实证之能事，但晚经患难，终于回到《春秋》的传说，于欧阳修仿《春秋》而写成的《新五代史》特致推重如此。《春秋》之义在今天仍在史学上表现出生命的跃动，于此可见。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但他又在〈自序〉中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之旨在

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是公羊家口传的孔子「大义」，可以说明《春秋》批判对象并不限于「乱臣贼子」，「无道」的「天子」也同在孔子「口诛笔伐」的范围之内。历代皇帝对于史官的畏惧便是《春秋》确曾为中国人维护正义的显证。所以近代史学大家柳诒征先生也十分重视史官直笔，而径以「史权」两字称之。（见柳诒征《述实录例》，《国史馆馆刊》第2卷第1期，1949年，页1-9）。虽然过去有人怀疑过《春秋》究竟能不能发挥「乱臣贼子惧」的功用，但史实俱在，是无法否认的。让我举一个后世的例子为证。《晋书》卷82〈孙盛传〉云：「《晋阳秋》（按「阳」字即「春」字，因避讳而改）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仿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

可见桓温多么怕《晋阳秋》的「词直而理正」，以至要通过孙盛的儿子，以灭其一门为威胁。这个桓温不是别人，他留下了一句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晋书》卷98桓温传）可见他嘴上虽说「遗臭万载」也足以自豪，心里还是怕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为了维护《春秋》的褒贬传统，曾对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反复质疑。黄先生早年在密西根大学写明代运河的博士论文时，我恰好赶上做他的论文指导人。论文完成后，我又介绍他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继续作研究，写成了《明代的税制》（或称为《16世纪明代财政与税收》）（编按：黄仁宇《16世纪明代财政与税收》（台北：联经，2001年））一书。甚至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也是由我一力推荐的。我和他的关系很深，不能不说几句话。黄先生比我年长十几岁，他是军人出身，卅多岁才在美国上大学，勤奋奋斗，著述不辍，是一位极可敬佩的学人。他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最初坚持以「师礼」待我，但我坚决拒绝，因为在西方担任论文指导的名义只是一形式，即使有所商榷，也是彼此都有进益。我引戴震不肯接受段玉裁、姚鼐为弟子的话，主张不妨「交相师」。他不得已而让步，但仍引傅君剑赠胡适句：「文章风义友兼师」。因此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师友之

间」。他对中国史的看法和我颇有不同。这在西方是十分正常的事，我们之间也并未因之而减少互相间的尊重，一直到他逝世前都是如此。

黄先生是研究经济史出身，他的《明代的税制》引用了《明实录》中大量的统计数字。这他「数目字管理」说的来源。他大概又受到法国《年鉴》派的社会经济史的影响，重视长期性的结构，这样便形成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的观点。所以他的看法是有坚强根据的，绝非兴到乱说。这一点我必须为他辩护。但西方史学早已进入多元化的阶段，不再有统一的史观。多元并存是正常的现象，而且恰恰显出史学界的活力。经济史家与传统派史家的争论更是屡见不鲜。十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经济计量史学家（cliometrician）佛格尔（Robert W. Fogel）和英国专统巨擘厄尔顿（G. R. Elton）的激烈辩论曾经轰动一时。佛格尔引用大量统计数字研究美国南方黑奴，其结论曾引起不断的争议，他并因此而获得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佛氏是反对在史学中表达个人观点和价值判断的，厄氏则持相反的意见。但理性争论的结果则是双方都作出必要的让步，也更理解对方持论的根据。（可看他们两人合著的 *Which Road to the Pas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黄仁宇的论点接近佛格尔，这是由于他们研究的对象相同所致。

最后，我愿意指出，西方虽然没有《春秋》褒贬的史学传统，但西方史学史上所谓「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也足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主流在实证主义、甚至科学主义的笼罩之下，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处理人文现象，各式各样的决定论主导着史学家的思路，不承认个人有真正的「自由」，个人与「物质分子」（molecule）完全相等。在这种认知之下，道德判断自然无从谈起。但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史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想把史学变作自然科学同类的东西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西方史学家，特别是犹太籍的，写到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使用的语言恰恰符合《春秋》笔法。1950年代以来，不少有慧见的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已突破了决定论的牢笼，坦率地指出：在历史寻找所谓「规律」或「因果律」是徒劳无功的。这种努力过去不曾成功，现在没有成功，将来也不会成功。以

萨·伯林(Isaiah Berlin)在1950年代初所写的〈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那篇长文,尤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方史学传统的褒贬(“praise and blame”)语言又在他笔下复活了,由于诠释派人类学进入了史学领域,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所谓「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荒谬划分,许多史学家今天已从追寻「规律」转为追寻「意义」。孔子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话于是又获得了现代的诠释。

1993年哈佛大学俄国史大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刊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俄国》(*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一书,他在书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着这一场空前的灾难,史学家是不是应该还是保持冷静,像科学家面对着自然现象一样,不动一丝感情?他所给予的答案是彻底否定的。他先引一位19世纪德国史学家的话:「我认为写史必须带着愤怒和热情」;再引亚里斯多德《伦理学》上的话:「对于应该愤怒的事情而不发怒的人,我们只能以愚人视之」。派普斯最后更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面论证:拒绝对历史事件下判断其实也是根据一套道德价值的系统。沉默等于承认一切发生过的事情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对的。这是为历史上所以胜利者做辩解的一种说辞。(页509-510)毛泽东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时,有下面这一段有趣的对话: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336。]

斯大林最后一句话是所有共产党人都接受的「公理」。这条「公理」在西方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名言:「凡存在,即合理」(Whatever is is right.);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陈亮(1143A.D.-1194A.D.)的观点也可以与之相印证:「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试

问：如果我们真的拥抱这一「公理」，真、善、美一切价值还能再人间找得到一隙存在的余地？我特别引派普斯《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俄国》和单先生《毛泽东执政春秋》相印证，因为这两部书恰好遥相呼应。无论就政权的性质、历史过程的悲惨，或主要人物的残忍而言，这两部书都是处处相称的。派氏全书终于这段历史的「道德涵义」(moral implications) 正相当于单先生的「春秋」。派氏引康德「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经典之论，又引波普尔 (Karl R. Popper) 的名言：「每一个人只有为自己可选择的志业而牺牲的权利，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鼓励别人为一个理想而牺牲。」康德和波普尔不也是单先生最欣赏的哲人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于此见之。

读了派普斯这些议论，单先生也许会感到「吾道不孤」吧！

**余英时** 序于普林斯顿

# 第一篇 导论：暴力与政权

## 引言

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湘潭韶山。这一年是旧历癸巳年，即「蛇年」。不过，毛似乎不属「蛇」而属「龙」。

五十六年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操着一口湖南土腔宣告一个新国家诞生了。余音续绕之际，隆隆炮队碾压过长安街面，滚滚人潮翻涌在金水桥前。

正是以这一年为界，中共党史被分成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两大阶段。百年中国也就有了「解放前」与「解放后」两个世界。

正是以这一年为界，一些人半生戎马、半生新贵，另一些人半生纵横捭阖民国官场、半生登高山兮望我大陆。

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前者，他从中国最贫瘠的地方，拉起了一支最强悍的队伍，打了一场最难打的战争，走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并最终走进了北京城。后者，他凭借新国家的力量，对抗美国，顶撞苏联，爆了核弹，发了卫星，但也引发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制造了殃及上亿人的大冤狱。

毛泽东做这两件人事功过如何？前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评价道：

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做后一件大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

陆定一有60余年共产党人生涯，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管过全党宣传工作，有阅历，也有跟光。陆还长期在中央工作，受毛直接领导，对他既有就近观察的机会，又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该部长对该主席的

评价，当属知根知底者言。

当然，陆公评说不可能价值中立，而多有政治倾向。他所谓「成就」即于中共有利，所谓「错误」即于中共有害。在他看来，毛做第一件大事之所以有功就在于使中共较快地夺得天下，做第二件大事之所以有过就在于使中共差一点丢了江山。

对于毛所做的两件大事以及陆所作的相关评价，人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毛夺取政权与毛执掌政权有何联系？其「大功」对其「大过」有何影响？

在其夺权业绩与其执政业绩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反相关关系？

这种反相关关系可表述为，暴力革命越成功，和平经营就越有可能遭致失败；或暴力革命胜利得越彻底，就越有可能给由暴力做成的政权带来较难治愈的后遗症。

这些问题均可被提升为一个更一般亦更基本的问题：暴力与政权关系究竟如何？

## 1

谈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似不能不提这两个人：一是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二是亚里斯多德——阐述了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的思想。

很时能在许多人看来，这两个人风马牛不相及，既有着时间与空间上的巨大跨度：一是今人，一是古人，一是中国人，一是外国人；也有着职业与性格上的显著差别：一是政治家，一是学问家；一是不亦乐乎于和天地斗、和人鬼斗，一是不亦乐乎于漫步花园，逍遥讲学。

不过，他们也有相似地方，即都对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有兴趣，并都在这方面有建树。其中一人本身就是一位马背君主，凭借暴力打

出了一个血染的中国。另外一人自己未能亲临疆场，却做过一位马背君主的先生，目睹了这个被称做亚历山大大帝的学生如何暴兴又如何速衰的过程，还研究过许多希腊城邦因暴力而兴因暴力而衰的历史，留下了一部《政治学》。

他们分别从自身角度揭示了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所涵盖的两个显然有别且又密切相关的方面：一个着重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前半部分，即暴力可以打出政权来；另一个则着重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后半部分，即用暴力打出的政权容易衰败。两者着重点不同，但可前后连接，有很强的相关性。当然，这种相关性主要是解释意义上的。

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搞得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在此期间，年青的中共犯了一个毛泽东称之为「书生主观的错误」，即只做民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不重视建立自身武装，结果导致了国共分裂后的严重局面：拿枪杆子的国民党把不拿枪杆子的共产党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惨痛的失败使中共领导人终于明白过来，在中国这块地上，没有共产党的枪杆子，就没有共产党的发言权。于是，他们来到武汉，于1927年8月7日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做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决定。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湖南辣子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义无反顾地表达了他不留中央当「书生」而去下面做「土匪」的决心。（参见国防大学编，〈「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页1-12。）

「八七」会议后，毛说干就干，策划秋收暴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红色政权，一干就是廿二年。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枪杆子与政权间所能有的最直接的联系，既可看到其间质的联系，即有红色武装就有红色政权，也可看到其间量的联系，即有多少杆枪就有多大地盘：

当他有了「红四军」数千杆枪时，便割据绵延数县的湘赣边界：

当他有了「红一方面军」数万人马时，便建起纵横数十县的中央根据地；当他有了数十万「八路军」、「新四军」时，便与老蒋、鬼子三分天下；当他最终有了数百万「解放军」时，便一举夺下中国大陆，并使自己做了紫禁城里的新主子。

与毛泽东不同，亚里斯多德基本上是一个学者型人物，先在阿卡德米学园当柏拉图的学生，后到马其顿王宫任亚历山大王子的先生，再后又开吕克昂学园做逍遥学派的宗师，一生大多数时间都立于静僻之处冷观世界变化。

他在考察希腊城邦政治时，揭示这样一种现象：「许多依仗武功的城邦，仅适合战争生活，一旦实现霸权而停止战斗，就会迅速衰落下去。在和平的年代里，他们就像一把尘封的锈剑。」〔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贝克尔本，1334a，（商务中文本 1965 年），页 392；伦敦英文本（1912 年），页 230。）

他以斯巴达为例，指出其国家目标是十分可疑的：「整个体制都只是为战争服务的，以保证他们能够克敌致胜。因此，只要战争乃在继续，斯巴达人就能保持优势。可是，当他们一旦取得战争胜利，便立刻开始衰落下去。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享用闲暇的时光，不懂得如何处理战争以外的事，除了能征善战外，别无所长。」〔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贝克尔，1271b；商务，页 91；伦敦，页 56。）

他们「在战争中，在辛劳中，显示出很好的质量，但到了和平时，到了闲暇时，就堕落下去，就显示出某些最卑劣的奴隶品质。」〔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贝克尔，1334a；商务，页 394；伦敦，页 231。）

他具体地陈述了斯巴达的种种弊端〔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 2 卷，第 9 章。）：

在外交上，它常常以一种硬梆梆的缺乏弹性的外交姿态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致使「所有邻邦」，如「阿尔卡斯人，麦西尼亚人，阿卡地亚人都与其长期为敌」，致使自己长期处于严峻的国际压力之下。

在经济上，它的财产制度导致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它的赋税政策又致使国库空虚，结果「国家日渐贫困，私家则日趋贪婪。」

在政治上，它仍保留着元老院组织，可是，「智慧犹如身体，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弱的」；并且，「身为元老的人在处理公务时常常是徇私舞弊的」。尽管斯巴达也有监察制度，但监察官员们大都对城邦普通公民「太严厉」而对自身「太放纵」了。

在社会风气上，许多斯巴达人好奢侈，好贪婪，尤其好淫乱——亚里斯多德正是据此得出「一切好战的民族往往好色」的结论，并且好伪善——一面发誓要遵守严格的斯巴达律，一面又「偷偷地违反法律而去寻求感官的快乐。」

亚里斯多德还考察了所谓「第三种僭主政体」（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4卷，第10章。）这也是一种源于暴力的权力体制，其间既有靠着雇佣军力量上台的僭主，也有靠着武装民众力量上台的僭主。后者多曾是平民领袖，故很容易窃用民众的力量。

这些僭主们一旦执掌大权，就实行个人独裁制，任意践踏城邦公民的各种权利。「其统治的目的只服从于他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及他统治下的人民的利益」。亚里斯多德不无厌恶地称这种政体为「暴力的统治」，是「世上一切自由人所不能忍受的暴政」。这种暴政也大多不能长寿。

亚里斯多德对「斯巴达」和「第三种僭主政体」的这些论述，似是言犹未尽的，甚至是含沙射影的，即在明说这两种暴力政权的同时，又影射另一种暴力政权。

就在亚里斯多德主持吕克昂学园期间，亚历山大正率领他的马其顿军团东讨西伐、南征北战，硬是打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军威、打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先生似乎小看重弟子这些赫赫武功，在其著述中不仅不提这个大帝国的事情，反而专拣历史上那些崛起与马其顿相类似而结局均不好的政体来大加阐释。这很像是在藉古讽今：明

说斯巴达，暗指马其顿；明斥僭主，暗讽亚历山大帝。先生似是想以古为鉴地告诫学生，刀剑兴国的事，开场戏好看，收场戏就难说了。

历史似也公平，既给弟子提供了表演盘马弯弓的机会，也给先生提供了显示远见卓识的实例。亚历山大一去世，他用暴力打出的帝国也随之衰落下来，很快分裂为三，即安提哥尼王朝（the Antigonids）、塞琉希德王朝（the Seleucid dynasty）和托勒密王朝（the Ptolemies）。在漫漫历史星空中，亚历山大帝国就像一道闪电，虽耀眼夺目，却转瞬即逝。这恰好印证了亚历山大老师的思想。

尽管先生与弟子有很大差别，一个贬斥暴政，一个推行强权；但师徒二人也有许多联系，一个把暴力与政权的关系说得头头是道，另一个则把弓马打天下的事情做得样样实在。先生说了，弟子做了。先生既可用写出的文字来予以论证，也可藉教出的弟子来加以验证。对于亚里斯多德来说，《政治学》这部书无疑是他的一篇杰作，而亚历山大这个弟子何尝不也是他的一篇杰作。

## 2

若对毛泽东与亚里斯多德作进一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在研究课题与研究时间上是相互错位的：

后人毛泽东做了前半截子文章——暴力可以夺取政权；前人亚里斯多德做了后半截子文章——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

一般说来，后人续做前人文草要好做些。他可以站在前人之上而比前人看到更远更多的东西，既可看到前人已经说过的东西在后来的实践中是怎样验证的，又可看到前人从未说过的东西在后来的现实中是怎样发生的。

反之，若让前人续做后人文章就勉为其难了。亚里斯多德可以一般地推论在其之后的一些戎马帝国将会衰落下去，但无法具体地说明它们究竟是怎样衰落的，比如，无法具体地说明毛泽东的枪杆子政权

究竟是怎样衰落的。他一不知有「红色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事，二不知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也就很难接着毛话往下说了。

显然，要续做毛泽东的那个「前半截子文章」，就不能全靠亚里斯多德的那个「后半截子文章」，还要一靠后面人来加以补做——因为他们看到了亚氏看不到的现代东西，二靠中国人来加以补做——因为他们拥有着对其故土文化的亲身感触。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暴力更替政权的事件，都发生在亚里斯多德视野外，或在其生年之后，或虽在其生年之前但在古希腊之外。其间，有的事件能够为他的学说所解释，从而印证他作为大思想家所具有的那种超越时空的思维能力；有的事件则不能被他的理论所涵盖，从而显示他作为古希腊人所具有的那种无法避免的局限性。比如，依据他的学说来解释中国历史，有些事能够说个大概，有些事就很难说清楚了。

中国人搞政权方面的斗争，讲的是实力，而最重要的实力就是暴力，就是军队力量。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新兴朝代不是依仗暴力而平定天下的，没有哪一个开国皇帝不是靠着军队而黄袍加身的。朝廷里最重要的政事叫军国大事。

后来的毛泽东，也是先获最高军权，后获最高党权乃至最高公职的，并至死都不让出军委主席一职。在毛之后的邓小平，也是极为看重自己的军委主席身分的，迟至八十五岁才让出这一职务。他的属下感恩戴德地颂扬道：这位世纪伟人身体力行地为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这些颂扬者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他们的颂扬对象已经做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龄的军事统帅，创下前无古人并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记录。另外，此公就在辞职前不久，还做了一件能上史册的大事——挥师进军没有敌军只有百姓的自家京城，枪声一片过长街。

人们因此而有理由说，一个国家的军权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与这个国家的文明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呈反相关关系：前者愈高后者愈低。

聪明的帝王有时也会请些儒士来讲王道，讲讲宽厚待民，讲讲仁义之师，似主要是讲给老百姓听的，讲给那些只知孔孟的书呆子听的。他经常提醒自己的是，不忘霸道，不忘严刑峻法，不忘威武之师，不忘军权才是自己安身立命、起家做皇上的根本。

按照亚里斯多德关于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的思想，——可设为大前提；又根据中国的王朝都是刀枪打天下、弓马夺江山的史实，——可设为小前提；那么，依此我们能够推证出什么呢？——可导出结论：中国的王朝均为暴兴速衰，中国的皇帝就像走马灯那样换个不停，中国的王位战争当是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这一结论能不能成立？或者说，这一推论的大前提能不能有效地运用于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很难用「是」或「不」来回答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确有过许多暴兴速衰的短命王朝。第一个建立在诸侯征战上的中央帝国（秦始皇的秦帝国），最后一个建立在农民起义上的北京政权（李自成的大顺国），以及「东晋十六国」、「五代十国」，等等，都是暴兴速衰的，长者不过几十年，短者仅存数十日。

中国历史上也确有过许多暴兴而不速衰的长命王朝。汉、唐、宋、明、清都存在了有两百年以上，其中两汉累计 426 年，两宋累计 320 年。东晋、北魏、西夏、辽、金都存在了一百年以上，连最具暴力性质的元朝也存在了近一百年。可见，若就政权个数而言，中国封建王朝大多是暴兴速衰的，短命朝比长命朝要多得多，故与上述亚里斯多德思想较为接近；若就总体时闻而言，中国封建社会大都处在那些暴兴而不速衰的王朝的统治下，故又与上述亚里斯多德思想相差甚远。

中国史上许多明智的开国君主在用暴力夺得天下后，便立刻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变好战爱斗为沉稳舒缓，变暴力行事为和平经营，遏制武将，重用文臣，薄赋轻徭，尽量不过多地折腾老百姓，以使他们

能够休养生息，进而安居乐业。

在他们诸多开国举措中，最重要者是进行制度方面建设。他们处心积虑的组建各种权力机构，颁发各类法规律令，以使政府举措和百姓行为都能够规范化，以防止统治的随意化和被统治的无序化。

聪明的开国帝王深知自己的子孙生于荣华富贵中，不可能像自己那样具有从逆境中奋起的志向和能力，如果完全随着这些子孙的心意来行事的话，就有对能把朝政大事弄得混乱不堪，就有可能今日这样做、明日那样做，儿皇帝做这一套、孙皇帝做那一套。于是，他们未雨绸缪，为子孙立下种种规矩，以使他们的行为举止有所依循、而不任意妄为、害国害家害己。

他们这样做，实是把自己的过人才智凝结为法规律令留给子孙皇帝，换句话说，实是把自己在才智方面的优势基因以一种外在化形式遗传子孙皇帝。这好比要知道一块木料的长短，若无尺子的话，就只有最灵巧的木匠师傅才能估量出来；若有尺子的话，即便是最愚笨的木工徒弟也能测得准数。聪明的开国君主正如这灵巧的木匠师傅，其不肖子孙也如这愚笨的木工徒弟，而法规律令则如这把尺子——是这师傅做出来留给这徒弟的。

例如明朝，自成祖以降没有出过什么好皇帝，朱家龙椅上坐的多是平庸之辈或荒唐之徒，可朱家天下竟维持了两百多年，成为中国史上少有的几个长命王朝之一。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朝统治体制相当完备，以致于那些碌碌无为的皇帝也能靠着它坐住江山。明神宗十几年不理朝政，昏得可以，但其名下的国家机器竟够运转，尽管不时出些故障。

明朝制度的基本框架多是由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奠定下的。这位明太祖打下江山后，便忙于国家体制建设，先是承接先朝制度，后又对其作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在中央政府中，撤销中书省，抬升六大部，后又添设殿阁大学士制；在地方政府中，撤销行中书省，分权三

司，即布政使司（行政）、按察使司（司法）、都指挥使司（军事）。他坐天下比打天下还忙还累，苦心经营数十年，终于建起一个严密且严酷的国家体系，集数千年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之大成。他终于为朱家王朝做成了一把很管用的尺子，并传了下去。其不肖子孙只要拿着它，就能大致地测度天下。

聪明的开国帝王还深知自己的子孙只是因血统而登基，仅凭他们自身才德观服众，难以使百姓和百官从心里敬畏他们。于是，他们又为子孙皇帝立下许多严酷刑法。

他们这样做，也是在搞他们的体外遗传，即把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斩将翦寇而平定天下的威严，以一种制度化形式遗传子孙皇帝。人们可以不敬畏当朝的庸君，但不能不惧怕先皇立下的王法。满清末年的臣民不会打心眼里去敬仰那位只有三岁的小皇帝，但不能不在乎那个能叫人掉脑袋的「大清律」。这时清王朝尽管已濒临崩溃，但仍能依照其「王法」砍了不知其数的人，并砍的多是英雄好汉、仁人志士，多是敢于反对朝廷的人。

人们常常指责封建君主施行「人治」，即仅凭他们个人意志来进行统治。这种指责有些大而化之。中国史上确有一些皇帝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但大部分皇帝所作所为是受方方面面制约的。他们若是完全由着性子来行事，就会上违祖宗家法、下招大臣非议。明神宗不理朝政十几年，也被大臣们不时参劾了十几年。他曾屡屡想换太子，但均被大臣们以祖制不可违理由予以否决。这桩桩不顺心的事使他后来谈起朝政便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正由于受到许多限制，中国史上一些生性活泼的帝王常常羡慕宫外平常人家的生活。

上述明智的开国君主通过一系列举措尤其是建制方面的举措，较好地完成了由暴力创业向和平守成的转变，从而使其新兴帝国暴兴而不速衰。这就使得上述亚里斯多德思想在他们这里失去了阐释力。

不过，在中国漫长历史上，也还有一些能够创业却难以守成的开

国者。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

其一，打得江山后，不求进取，吃喝玩乐无不享用至极。他们还有一番道理：老子过去打天下流血流汗，现在坐江山自是要多吃多占。这实是一种盗寇心理：抢来的东西，就要尽情地消受。但抢的东西再多也有限量，坐吃也能山空。他们的江山坐不了多久。

其二，打得江山后，不改禀性，过去好勇斗狠，现在仍是爱与人斗、好与人争，过去爱破坏爱折腾，现在仍是逢物必破坏、遇事必折腾。他们是属猴的，猴气十足，屁股坐不住。打江山时坐不住，还有些道理，因为本来就没有属于他们的位子可坐：打下江山后仍是坐不住，就没有道理了，因为有自己的位子不坐而到处跑动，只会给自己添乱。他们的江山也坐不了多久。

这两类开国者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其行为方式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尤其是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建立起那种不论对统治者还是对被统治者均有约束力的制度，从而导致其国运暴兴速衰。这倒也印证了亚里斯多德思想。

### 3

当我们把视角转到离我们最近的开国者身上时，便面临这样的问题：亚里斯多德上述思想对毛泽东所作所为有无阐释力呢？这两位研究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的古今大家且中外大家能否相互印证呢？

若粗线条地看，不难发现两者间有某些联系，发现前人对后人作了某些能被大致验证的预见。若较具体地看，则可看出两者间有巨大差别：年代相隔太久，地域相距太远；并且还是前人续做后人文章，其间的出入也就更多。

毛泽东所执掌的政权，无疑是「暴兴」的，即通过暴力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硬打出来的。那么，它是不是「速衰」的呢？答案似是肯定的，这一政权也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衰落下去的。当老人家

去世时，他的国家也随之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共中央文件语）。

毛泽东就创业来说，可与中国史上一些较成功的开国君主相比；但就守成而言，恐怕要跌入其间较差的等级。他既做成平地高楼，又弄得大厦将倾。

1949年，毛泽东终于走完了千山万水，由西柏坡进驻北京城，并于群英簇拥中登上了天安门，可谓荣耀之至。

据其卫士回忆，当时，像柳亚子、李济琛这些民主革命的老前辈们见到毛泽东，都习惯做一个动作，竖起大母指，轻轻晃动着夸耀毛泽东。那时听到的最多的话是「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我们都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泽东比……。」（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31-132。）

说这些话的老先生们，大多是那个时代的所谓名士，大多有些傲骨，在历史上或有过不买袁世凯账的记录，或有过不听蒋介石话的举动。他们过去不愿攀附权贵，如今也不会一下子变得很世故、很会巴结人。他们赞誉毛公当是发自内心的。

可问题是，他们敬话时所站的位置恰好是毛泽东在事业上的转折点，他们只能看到其创业已经走过的路，而未能看到其守成将要走出的路。若只看到前者，确能使人产生敬畏感。因为，毛赢得的是，中国史上最大规模、最为艰辛的战争。但若再看到后者，再看上一些年，又将会使人产生什么样的感受？还能不能继续保持上述敬畏感？

若再看上七、八年，看到几十万最爱说话的知识分子却被封住了嘴巴，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就会发出此主席真够厉害的感叹。因为，这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位蒋总裁也未曾做到的事，国民党执政时的耳根远不如它的后继者来得清静。当时，人们在大众传媒上还不时能看到鲁迅等痛骂论敌的文章，在大学课堂里也不时能听到李达等讲授马克思学说的声音。

若再看上十来年，看到几千万种粮食的农民却因没有粮食吃而被饿死，他们又会生出此主席确有罪过的想法。因为，这是他们在满清时期、民国时期、甚至日本侵华时期都未曾看到的人为性大饥荒。

若再看上一些年，看到那场殃及数万万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就会觉着此主席做得太过分了。因为，这不正是他们未曾经历的国耻国难，而且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国耻国难。

那么，毛泽东为何在「暴兴」后「速衰」？为何在执掌政权方面如此不成功？对此，亚里斯多德的那个「后半截子文章」似能提供某些解释性思路（就其抽象意义而言）。

亚氏在考察一些像斯巴达那样的尚武城邦的历史时，指出它们大都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即把它们的手段当做它们的目的。（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7卷，第14章；第8卷，第3章。）

「人生包含不同的方面——勤劳与闲暇，战争与和平」，其中，「战争只应是导致和平的手段，勤劳只应是获得闲暇的手段」。人们进行残酷的战争本应是为了获得安定的生活，进行勤劳的工作也只应是为了享用优裕的时光，并最终使人们能在一种恬然自足的环境中从事理性思考即「沉思」（亚里斯多德认为「沉思」能充分体现「智慧」这一人类的最高美德，故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我们一再申明的是享有优裕闲暇的时光是全部生活的目的。」

可是，斯巴达的「立法家们以战争和克敌制胜为其政治制度的目的」，「整个国家制度都是以战争事务为其目的」，从而把本应做为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斯巴达人只重于战争训练，只长于好勇斗狠，结果使他们在战争胜利后不能适应和平的生活，长此以往也就不能保住自己通过暴力而获得的东西。

诚然，亚氏所说的人生内涵与后人所理解的人生内涵不尽相同，古希腊自由民享有闲暇的方式与现代公民享有闲暇的方式也有很大区别；但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后人借鉴的思想：在人生的追求中或

在国家的崛起中，不应把人们所凭借的东西当作人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应把其奋斗的手段当做其奋斗的目的。

亚里斯多德对斯巴达这一批评似也适用于毛泽东。后者崇尚斗争，以致于把它作为人生的一种追求。他曾说过一句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就把斗争当做他人人生的一大快感，一种理想境界。他讲哲学也是大讲斗争性，认为斗争性贯穿于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第5节，页315-321。）世人也因此将他的哲学恰如其分地称作「斗争哲学」。

当处于强大敌人压迫下，当处于在野党地位上，毛强调斗争尚可理解。因为，不斗争则亡，不斗争则不能夺得政权。斗争在这里只是作为维护自己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只是作为实现自己权力目的的一种手段。

可是，当已经打败强大敌人乃至消灭他们人身存在时，当已经获得全国政权并且得到大多数人认可时，他还要斗、还要把斗争看做是高于一切的事业，就没有道理了。这时，他应该做的主要工作不是革命、不是与人相斗，而是建设、而是与自然打交道。

事实上，他执政后所革的命、所斗的人，大多是他不应该革的命、不应该斗的人。因此，这种斗争的实际意义，已不在于斗争什么对象，而在于斗争本身。于是，过程本身已上升为目的，斗争成了「游戏」。一切游戏的特点，就在于目的即过程。

然而，这种「游戏」并不好玩，相反很是残酷。1950年代「反右」，斗了几十万知识分子，后来又给其中99%的人宣布平反，说是搞过火了。1960年代「文革」，又斗了几百万老干部，后来又把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宣布解放，又说是搞过火了。这是反反复复以一种十分严肃的态度做着一些颠三倒四的事情，很像是一种「游戏」、一种幽默，一种全然黑色的幽默。没有几个人能就此笑得出来，即使有笑，也笑得

毛骨悚然。不过，老人家倒有可能从中感到生活的充实，进而达到他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

这一「游戏」本质上是整人的，并且是大规模整人的。由于处在执政者的地位上，毛与人相斗实是强者对弱者的随意处置，即对后者可以采用包括批判、羞辱、关押、刑讯、枪决在内的任何手段。又由于具有被神化的个人权威，毛的任何整人举措都能获得广泛的响应，甚至能搞成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他不斗则已，一斗即整；不整则已，一整便动之于天下。

毛泽东「斗」了一生，也「乐」了一生；只是乐了一人，苦了众生。他前半生斗了许多确想伤害他的人，斗得多少有些情理；后半生则斗了许多不想伤害也无法伤害他的人，甚至斗了许多相信他并支持他的人，斗了许多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斗得就大谬不然了。

亚里斯多德还从正面考察了一些像梭伦那样的执政者的政绩，指出他们突出的贡献，就在于积极制定各项法律制度，并严格依据法律进行统拾。因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是衡量事物是否合乎正义的尺度」，「法律的统治优于个人的统治」。反之，「让某一个人来统治，就会使政治带上兽性的成分，因为他的欲望有时会支配他，他的情感会影响他，即便是最贤达的人也在所难免。而法律恰恰能免除一切情欲的影响。」（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2卷，第12章，1273b-1274a；第3卷，第16章，1287a-b。）

亚里斯多德对梭伦等的这一赞誉，似也能反观出毛泽东的一些问题来。毛执政后未能很好地实现由社会革命者角色向社会建设者角色转变，不注重制度化建设，而总想不停顿地变革。他也曾搞过一些制度化东西，但随后又去破坏它们。他总是在「破」，不只是破前人的规矩，也破自家的规矩，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既要变革旧世界已有过的东西，也要变革新社会刚建立的东西，比如，要砸烂「公检法」，要打破各项规章制度对革命群众的「管卡压」。

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不守规矩。据其卫士回忆，他过的日子常常不是大家都过的一天 24 小时，而是根据其特殊生活习惯安排一天 28 小时，即所谓「毛泽东的一天」。（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页 117。）他散步常常不走现成路，而是踏石踩草想往那儿走就往那儿走。他的身上似有一种天然的反成规反秩序的倾向。

毛泽也这种行为方式，正如他自嘲的那样——「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比较适合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但不适合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 4

关于毛泽东「暴兴」政权何以「速衰」问题，除『可借鉴前人思路来予以阐释外，更应立足于这一政权自身运作过程来加以阐发。

毛泽东政权可以说是一个很少受制约的政权，既很少受外部政治力量制约，又很少受内部政治因素制约，故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想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政权，并因此而做了许多说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的事情。对毛本人来说，似乎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不敢干的事。

一个执政党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外在制约力，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公然要赶其下台的政敌，即体制外的各种反对派组织；二是唠唠叨叨要分享其权力的盟友，即联合政府中的各个小兄弟党团。毛泽东的执政党也有这样的政敌和这样的盟友。不过，这对它来说，两者都构不成重大威胁，都形不成有效制约力。

先就政敌方面情况来看。

其一，在这一政权「暴兴」过程中，其执政党的老政敌即蒋介石国民党被清理得比较干净，已不可能对它形成有效制约力。

由于采取的是暴力革命的手段，凭借的是能够射杀生命的枪杆子，毛泽东在获得政权同时，就不只是把政敌赶下台去，而且把他们中的

大部分人消灭了，从肉体上清除了。剩下者，能跑的被赶出了大陆，或退守在海外孤岛或流落到异国他乡；不能跑的则被打入了社会底层，或在几年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补杀，或长期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接受监管，每逢政治运动都要被拉出来批斗一番，故已不可能再堂而皇之地爬起来制约这个新兴的政权。

其二，在这一政权「暴兴」起来后，其执政党的新政敌即各种新生反对派组织，都夭折于初创时期，没有一个能发展成全国性组织、能达到大政党水平，故都不可能对它形成有效制约力。

毛泽东政权将任何独立于它的政治组织，不论它们是否采取和平表达方式，都视为非法团体或反动组织，都予以严厉惩处，都通常要将其首要者处以极刑。在共和国的严刑峻法中，「反革命组织罪」是一切罪中之最。

这是把国民党曾用以处置自己的方法拿过来再用以处置别人。国民党过去怎样对待共产党，共产党今天也怎样对待它的反对派组织。这似是应了毛常爱说的那句老话：对待反动派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实是「以张三之道还治李四之身」。中共执政前的对手与其执政后的对手是不同的，分属张三李四两类人。前者是世仇，曾杀共产党无数，可谓血债累累。后者是新生反对者，未伤害过执政党，没有历史积怨。如今执政党不分前者后者，一律予以彻底封杀。

事实上，这一政权不仅深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而且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境地。以往国民党只是在共产党发展到相当大规模、几乎与它并驾齐驱时才公然反目，大打出手。如今毛泽东政权就不会等到它的反对派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再动手，而是当其一露萌芽就予以铲除。建国数十年来，没有哪一个反对党组织能够发展到共产党当年与国民党分裂时（1927年）的水平。甚至达不到它最初与国民党合作时（1924年）的水平。换句话说，没有哪一个反对党组织能够发展到使执政党感受到受其制约的水平。

也正因此，人们可以说现代中国大陆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现代中国大陆执政党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讲宽容，讲多党和平竞争，最忌一党专政。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讲尊重对手，承认对手也享有自己所享有的一切权利，故所追求的成功是以公平竞争为前提的成功。比如，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较多的听众，只是因为他们比对手表达得好，而不是因为他们捂住了对手的嘴巴。可是在毛泽东及其继承者那里，还没有人没干过捂别人嘴巴这类丑事。

从这里可看出，毛泽东搞政治的心胸是十分狭隘的。他拥有的就不准别人再拥有，他做过的就不准别人再做一遍。他是搞小组织起家的，先搞小组织，继搞大团体，最后搞成执政党，故深谙政治组织的运作技巧，深知政治组织所可能蕴藏的巨大能量。为此，他很钟爱他的党，并引以为自豪，称之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页133。）但不能容忍别人也来发展组织，也来以组织力量与他分庭抗礼。

先秦时，墨子听说有一个叫骆滑厘的人很「好勇」，便去询问究竟。骆勇士答道：我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有勇士，就一定赶去把他杀了。墨先生听后不禁感叹：天下人莫不是扬其所好、抑其所恶，可骆某如此行事怎么能说是「好勇」呢？只能说是「恶勇」。（《墨子·耕柱》）即是说，这个所谓的「勇士」，并不真正崇尚勇敢，而是十分厌恶勇敢；这种所谓的「勇」建立在对勇的否定上，故是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勇，一种不能容忍勇的勇。

老人家与骆勇士很有些相似。他善于经营组织，但不容忍别人也经营组织，他颇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容忍别人也来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盛赞他的党人能够英勇不屈，但不容忍他的对手也能够威武不屈。国民党的刽子手还允许一些临刑的共产党员高呼革命口号，但毛泽东的执法队决不让那些临刑的不屈者说出一个字来，为此，竟去割其喉管（张志新，辽宁，1974年）、缝其嘴唇（史云峰，长春，1976年）、用竹签穿连其下颚与舌头（李九莲，江西，1977年）。（张书绅，

〈正气歌〉，载《鸭绿江》，1979年第5期；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1998年），页161-172。）在他这里，缺少的是尊重对手的君子气度，缺少的是惺惺相惜勇者情怀。

总之，毛泽东政权不论在其「暴兴」过程中，还是在其「暴兴」起来后，都把其政敌——不论作为「历史反革命」的老国民党，还是作为「现行反革命」的新反对派清理得比较干净，从而使它在几十年里从未受到过来自这方面的有效制约。

## 5

上述情况连带出一个问题：这种缺乏反对党制约的政治统治将有什么样的历史后果呢？若避开民族整体利益视角，仅就执政党自身利益来说，这种政治统治有利也有弊，但最终弊大于利，即促使其由「暴兴」向「速衰」转变。

同事相告：北京街头有位卖冰棍的老太太，闲来无事与路人聊天，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能耐多了，像现在这样的腐败，搁在老蒋身上早就让他跨了，搁在老共身上什么事也没有，江山照样坐，腐败还有着搞啰。」老人家出语不凡，三言两语就把我们的问题给答出了一多半，即揭示了这种政治统治既较稳定又易腐败的两重性质。

人们会问，为什么这样的腐败能让老蒋垮台而奈何老共不得呢？道理似很简单：因为，老蒋身旁有一个强大的虎视眈眈的共产党，所以他不能犯严重错误，否则就会被取而代之，事实发展也正是如此；老共身边则不存在任何能够赶它下台的反对党，不存在任何有分量的独立政治势力，所以它即便犯了很大错误，也很难被逐出统治者的位子。

然而没有强大的反对党，在短时间内确能给执政者带来某种政治稳定，但长此以往就会给政者带来难于克服的腐败倾向。前者可视其利处，如老太太所说的「有能耐」，即腐而不垮。后者则是其弊端，如

老太太所说的「腐败还有得着搞啰」，即腐而不治。两者相比，后者更根本些，因为它是不可遏制的，是最终决定执政党命运的。

这种难于克服的腐败倾向至少有两方面表现：

其一，由于缺乏反对党制约而导致执政党在施政举措上为所欲为。孟德斯鸠曾从权力结构关系角度指出，那种不受其它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的权力。同理，我们也可从政党互动关系角度指出，那种不受其它政党制约的政党，也是一种什么样的错误都能犯的政党。

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为了防止自己妄自尊大、任意妄为，就应该把自己置于某些压力之下，置于某种警钟长鸣而不敢懈怠的氛围之中。这其间最有效的压力，当是来自那些时刻想把执政党拉下来而使自己坐上去的反对党。试想你身边有一个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扑过来的家伙在那儿跃跃欲试，你还敢打盹吗？试想你周围有一些心怀敌意到处寻找你弱点的对手在那儿探头探脑，你还敢随便犯错误吗？尤其是还敢一个劲的犯同样错误吗？

一个政党是如此，一个国家、民族也是如此。亚里斯多德常提到的斯巴达人，四面受敌，却不设城墙，从而把自己置于一种危境、一种稍有不慎便有灭顶之灾的危境。这就迫使他们时时刻刻保持着高度的紧张，保持着临战的状态。警觉的眼睛、出鞘的刀剑是斯巴达人最好的城墙，并使他们一度称雄希腊。尽管斯巴达人崇尚暴力且好于征战的举动不为亚里斯多德肯定，但他们这种置危境而自强的精神倒可以为后人借鉴。

因此，有反对党制约对执政党来说并非是件坏坏事，反倒能迫使后者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必须小心谨慎、克尽厥职，尤其能迫使后者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必须承受那种「一着不赢，全盘即输」的压力。咄咄逼人的政敌不会让你拥有许多次犯错误的机会，只要抓住你的一两个大错误就足以将你赶下台去。再次情势下，执政者们还敢骄矜，还敢

懈怠？还敢像毛泽东那样玩儿似的把偌大个国家拿在手里翻来覆去？

毛泽东政权根本就没有象样的反对党，也就没有上述那样的压力。它的老政敌被解放军消灭了，它的新政敌被公安机关取缔了。它似乎有了一个无人来颠覆的铁打的江山。不过，这种情况对它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没有压力，也就不严格要求自己了；没有监督，也就不必去循规蹈矩了；没有畏惧，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铁打的江山也就有了许多铁打的错误。

由于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能够取代自己，毛泽东也就不在乎屡犯错误，甚至不在乎屡犯大错误。像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人为大饥荒，像导致整个民族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搁在任何民主国家里都会使执政者下台，因为反对党要追究它灭绝人类罪和灭绝文化罪；但在毛的国家里丝毫不影响他的统治地位，因为其治下根本不存在能够藉此发难的政治势力。

令人十分诧异，执政者们把常犯大错误说成是「交学费」，吃一堑长一智，坏事变好事。他们竟能在烟波浩淼的汉语词海中找出这么个好词来。天底下最划算的事情莫过于送孩子上学堂，交一些学费，长许多见识，并因而有了很好前程。依照这词，执政党犯大错误也就被说成是在做最划算的事情。另外，既然是交学费，就不会只交一次，今年交，明年交，只要孩子在学堂就得年年交。换作执政党话，今年犯错误，明年犯错误，只要老子在台上就得年年犯错误。不过，从长远来看，执政党因犯大错误而交出的东西，不是什么学费，而是人心，而是自家政治生命。

其二，由于缺乏党派竞争而导致执政党在运作能力上急剧退化。

在生物发展过程中，当来自环境方面的某种生存压力开始减弱乃至消失时，生物体中原先具有的那种用以应付这种压力的生存能力也会相应发生退化。一个最简早的例子，就是当人的体力劳动逐渐为脑力劳动所替代时，人的体能也在发生变化，如更容易患高血压、心脏

病和肥胖症等。

不过，人并非完全被动地环境方面的变化。比如，面对上述劳动方式的变化，许多人积极从事体育运动，甚至参加体育比赛，有意识地向自己的体能施加压力，要求自身必须具备较大的承负力量和较快的运动速度。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人们通过艰苦锻炼而予以适应，进而维持乃至增进自己的体能。

同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反对党完全消失时，执政党身上原先具有的那种应付政治挑战的生存能力也会随之发生退化。消除政敌与弱化自身抗衡政敌的能力，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那种完全排斥政治异己力量的一党专政体制，表面看是便宜了执政党，实际上是宠坏了执政党，弱化了执政党执掌国家权力的能力。

若要防止政治生存能力退化，执政党就必须把自己放在与反对党持续竞争的位置上，放在后者不断给予的压力。这就像上述为了防止体能退化而把身体投入到体育运动中以承受各种生理压力一样，一个最切近例证，就埴台湾执政党一方面因开放党禁而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也因开放党禁而获得相应的承受能力。国民党已今非昔比。

然而，在毛泽东的国家里，执政党不屑于同反对党进行政治竞争，也根本不允许有这种竞争发生。长此以往，执政党也就渐渐不知什么叫反对意见、什么叫政治压力了，故而变得骄傲自大、我行我素了。可是在中国人的话里，骄傲一词总是与退步一词连在一起的，执政者愈是自以为是，其执政能力愈是退化。

执政者们渐渐变得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起来了。他们说得很好，做得却很一般，甚至很有问题。

由于没有政敌能够有效地督察他们的施政方式，故使得他们喜欢许诺、喜欢讲大话。由于又没有政敌能够有效地诘难他们的施政方案，故又使得他们爱把自己的许诺和大话编成童话般的东西。例如，他们

曾作过这样一些很能打动人的许诺：

大约五十到七十年左右即十个到十五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五十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04。）（1955年毛泽东语）

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05。）（1957年毛泽东语）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这里主要是钢。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页699-700，702。）（1958年毛泽东语）

争取五年内实现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用语）

几乎每一次所谓「继往开来」的大会，总有那么几句老话：过去，缺点是次要的，成绩是主要的；未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诚然，人们不应一概而论地反对许诺、反对用美好的希望来振奋精神，但人们必须反对轻率的许诺、反对许诺者在许诺应该兑现时却装出一副什么也没说过的样子。其实，人的一些许诺真要是没有兑现的话，也不都是什么了不得或过不去的事，因为天底下的事有易也有难，不是样样都能说到做到。问题是许诺者不论做成了还是没做成他所许诺的事，总得给他所许诺的人一个交代、一个认认真真的说法。

志过大、眼过高、也就显得才过疏、手过低了。毛泽东号召亿万农民多产粮食，可自己并不清楚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粮，有意无意地诱发了一颗颗亩产万斤粮的「卫星」。他又号召全国人民大办钢铁，可自己也并不清楚那些土制小平炉小高炉究竟有什么样的技术参数，结果与其口号相伴生的是千百万吨钢渣铁渣。他想搞「大跃进」运动，

却不具备现代生产知识，同时又没有反对党来泼他的冷水，来敲打他、奚落他。这就使他越发自以为是且一意孤行起来了，最终把「大跃进」搞成了大衰退。

改革开放后，第二代执政者也同样由于缺乏制约和竞争而表现出某些志大才疏的品质来。他们关于改革的设想大多属原则性的，口号性的，很少附有较具体、较精当的实施方案。并且，他们的许多改革设想并不是自己原创的，而是取之于他人的，仅是对老百姓已有的改革愿望以及改革实践的一种顺应和认可。例如，作为中国改革第一步的土地承包制，就是由农民自己创设的，而那些领导者们只是在当时没有反对在事后予以肯定而已。

他们被称作「设计师」，其实在许多方面倒像是「拉拉队」加「督战队」。他们先是拄着拐杖，敲着地面，大声吆喝着别人朝前跑、加油跑，至于别人怎样跑、采取什么具体方法，那是他们的事。「拉拉队」管不了这些问题。他们后来发现这些人跑得不如他们的意，跑得或「左」或「右」，便抡起拐杖，抽打在奔跑者的屁股上，责怪他们胡跑一气。「督战队」不能不显示威严。你们跑得好，是因为我督导有方，功劳在我；跑得不好，是因为你们不听话，过失在你们。我是大权独揽且责任不负。

不过，话说回来，要求那些八、九十岁的「设计师」们志也大才也大，要求他们既能把握大方向又能制定具体策略，似是过于严厉了，似是缺乏对耄耋老人的同情心。

因为，年纪很大的人有可能是最有权力的人，这是历史造成的；但不可能是最有能力的人，这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的。傍晚六、七点钟的太阳不会比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更有朝气，也不会比中午十二点钟的太阳更显辉煌。否则的话，就是在对抗自然法则了，就是在嘲笑我们这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如今成了一个只是在天将黑时才显出迷人景色的夕阳民族。

问题是，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这样累着这些老人呢？尤其是我们这个有着尊老传统的民族为什么要这样不照顾这些老人家呢？为什么要让他们东颠西跑指手画脚而不回家安养天年呢？

这原因恐怕还是出在体制上，出在一党专政上，由于没有真正的政治竞争，没有能取代他们的政敌，故使得这些老人们能够顺理成章地占着位子不让。由于又没有真正的制度约束，没有能管着他们的法规，故又使得这些老人们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运作国家机器，并因此而使政权行为蒙上浓厚的老人色彩：言语嘟嘟囔囔，举止哆哆嗦嗦，说不清楚，做不稳当。

没有反对党的威胁，执政者的位子总是好坐的。中国史上那些至高无上的龙椅中，安坐过许许多多老态龙钟的人，以及许许多多由老人们抱上去的无知寡能、呆头呆脑的人。

这种因缺乏党派竞争而导致统治能力退化的情况，突出地表现在执政者的一些经济作为中和一些政治作为中。

例如，在搞大规模经济建设上，常常是虎头蛇尾，形成一种姑且叫做「打摆子」的模式：先是发热，高烧 40 度，大干快上，上速度，上规模，恨不得马上实现共产主义，马上实现现代化；接下来便是发冷，浑身打冷战、大砍骤减，减规模、减速度，项目上了半拉就扔了，房子盖了半截就停了。

1958-1961 年的「大跃进」，开始时说有多热就有多热，什么口号也敢喊，什么指标也敢订；二年后说有多冷就有多冷，人口少了数千万，财产丢了上千亿，整个经济非但没有「大跃进」，反而大跌落，一跌跌到十年前的水平上。

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仍未能完全摆脱这种「打摆子」模式。温差较大的「摆子」至少发作了三次：1984 年发热，1985 年发冷；1988 年躁动，1989 年寒颤；1992 年又膨胀，1993 年再紧缩。

这就像走路不是用眼睛、用脑子来看着走、想着走，而是通过撞在树上、跌到地下觉着疼了再调整方向接着走。这种通过疼痛感来调整方向的走路方式，有些类似软件动物仅根据触摸感而作出蠕动的前行方式，显现了一种不怎么高级的生存能力。

又如，也处理突发性政治事件上，毛的执政党也常常手忙脚乱，缺乏应变能力；常常将小事闹大，将大事闹砸，将动嘴动舌的事闹成动棍动棒的事乃至动枪动弹的事。

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言论开始而以棍棒结束。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便进一层，以畅所欲言开幕，以枪弹横飞收场，老百姓死伤无数，长安街血迹斑斑。前者是在毛活着的时候发生的，是按其旨意予以处理的。后者是在毛故去多年但他所创设的那种不受制约的国家机器仍在运转的情况下发生的，是由与他权力角色相仿的那种说一不二的政治老人拍板敲定的。后者闹得规模更大，其间所显示出的政治应变能自力也更难让人恭维。

若撇开政治倾向不说、仅就应变能力而言，此时执政者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只做了早年许克祥三下五除二就干成的事情。1927年，为镇压以工会农会名义组织起来的并用砍刀梭标半武装起来的长沙工农群众，许克祥只用了一个团的湘军。1989年，为弹压既无组织又无武装的北京市民，掌权者竟调动十个番号的野战军，乘装甲车入城，用自动枪开路。

这是尽用天下雄兵对付一方城市一群百姓，本无足以称道，却被事主说成是威武之师的壮举。说者不觉颜面发烧，听者倒是满脸通红了。俗话说，天底下最怕两种人：一是不要命的；二是不要脸的。「八九风波」同时成全了这两种人。

再说对付老百姓，通常只要动用一般武装力量，便绰绰有余了，可是这次一开始就动用像38军这样的王牌军，似是滥用军力。

此38军的老底子可追溯到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由彭德怀统领的红

二军团，彭军团向以善了硬仗著称。抗日战争时，该部隶属八路军主力师 115 师，是其基干部队。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该部隶属由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是其「第一主力」。朝鲜战争时，该部又因其战场表现而被彭老总呼之为「万岁军」。这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堪称中共武装力量的精华。

一般来说，善用兵者不轻易动用主力部队，如林彪在辽沈战役打锦州时，就将 38 军（时称第一纵队）留置高桥待命，以作战役预备队，打算用在最后关头。又如彭德怀在朝鲜战争转入僵持阶段时，便将 38 军撤到后方休整，以作战略预备队，也打算用在最后关头。

可是，1989 年的主事者一开始就用上了王牌军，并用它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如同打牌一开始就把「大老王」打出去，并打得不守章法。这是在用王牌军打烂仗，打有损军威的仗。处理「八九风波」的领导人主要是部队政治工作者出身，而非军队统帅出身，故多从政治功利情况考虑，而不能像彭德怀、林彪样多从军队自身情况考虑，不能像他们那样慎用军队主力，爱惜王牌军荣誉。

据说那些主事者们善于打牌，可此次牌打得不怎么样，牌技不高，牌风不正，最后连牌桌也掀翻了。人家和你讲道理，你却大打出手。不论人家讲得怎样，只要你一动粗手就输了理。这表明你：或是不敢讲道理，理亏得很，即「德」有问题；或是讲不好道理，理拙的很，即「才」有问题。

执政党曾经是一支很富有献身精神、很富有战斗力的队伍，出过许多英烈、有过许多胜利；如今则变得有些德寡才薄了，其间假公济私者比比皆是、平庸无能者处处可见。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有国民党对它制约，有各种政治势力与它竞争，故使它不得不竭尽全力行事。后来暴力革命替它清除了老的政敌，暴力统治又替它取缔了新的政敌，故使它处于一种既无强敌对之制约又无强敌与之竞争的境地，进而使其生存能力渐趋退化。

这就像那些土豆一样，在气候寒冷的北方长得硕大而多有光泽，移栽到气候温暖的南方反而长得瘦小而多有疤痕，并且一代不如一代。

## 6

毛泽东权既然不能获得政敌方面的有效制约，那么能否获得盟友方面的有效制约呢？政敌不能给予，盟友能否补偿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政敌即所谓各种「反动势力」不能制约它，盟友即所谓各个「民主党派」也不能制约它。

当然其间也有不同：前者一开始就被判为非法存在，被严禁在政治上乱说乱动；后者一开始则被邀请来参与政事，被允许对执政党评头论足。人们从前者境遇中，可看到统治者明正典刑；从后者境遇中，则可看到老朋友言而无信。对于毛泽东来说，让民主党派来监督自己，不过是讲讲而已间或笑笑而已的事。

如果说毛泽东一上台就跟老朋友翻脸，似是冤枉他。据其卫士回忆，毛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对骑过的马使用过的茶缸都有些感情，都不轻易更换。对马对茶缸尚且如此，对人尤其对那些曾冒着「通匪」罪名帮过自己的人就更应如此了。事实上，他刚进北京时是很善待老友的，说了许多不忘旧情青的话，做了许多善解人意的事，与他们缠绵绵绵地过了一段政治蜜月时期。

1950年6月，毛在政协一大二次会议上说了一段颇使老朋友感到舒心的话：「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页416-417。）他是在告诉老朋友，我毛泽东不会不给你们饭吃，也不会不给你们事做。

当时，毛和他的党的确为老朋友们安排了许多重要职务。在中央

政府人选中，民主人士约占 1/3；其中有 3 位民主人士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有 14 位民主人士担任政务院委员和副总理，有 26 位民主人士担任 21 个部的部长和副部长。

然而，毛对老朋友的还情、对民主党派的礼让，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不会允许这些民主党派掌握过多过重的政治权力，以致影响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会容忍这治蜜月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以致压抑自己原本就好争吵政治秉性。

大多数民主人士被安排在政治协商会议中。这个会议在 1940 年代末 1950 年代初，一度具有最高权力机关性质，曾制定出国家临时宪章——《共同纲领》，曾组建起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中央人民政府；但到了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便逐渐退为荣誉性咨议机构，其成员不再拥有政治拍板权，仅享有在国家举行重大礼仪活动时荣坐前排的权利，有时也可对政府举措发一些议论，但这些议论不能发到执政者的心痛处。

至于那些进入政府权力机关的民主人士，多数任副职，如任副主席、副总理、副部长等职；少数任正职，如任教育部长、水利部长、轻工业部长等职。在这个一党专政体制中，每个单位的行政首长都没有「党委书记」大，并且每个单位的下属部门头头也大多是「党员干部」。因此，那些民主人士出身的行政领导在行使职权时，总是要谦恭且小声地与书记商量，总是要客气且轻声地向部属咨询；每逢单位党组织开会决定重大事情时，或只能若有所失地徘徊门外，或只能寡言少语地列席会议。

那么，在这个由共产党最后说了算的国家里，民主党派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团？究竟能做什么样的事情、能有什么样的作为？

这涉及到民主党派的政治定位问题和运作方式问题。对于这些民主党派，人们很难直接肯定它是什么，但可以直接说它不是什么，进而间接确认它是什么。从总体上看，这些民主党派既不完全是体制外

的反对派，也不真正是体制内的实权派，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并兼有两者部分性质的政治派别。

毛泽东一方面说：「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一方面又说：「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279。）

对于执政党来说，民主党派既不是陌生人，也不是家里人，而是远房的亲戚；因而既不能拒之门外，又不愿予以厚待，远不得，近不得，很不好处。如果只是站在门口寒暄，主人倒不反对，但客人就不高兴了，大老远地跑来只在那里空着肚子说空话，总不免有些难看。如果真要迎到屋里给吃给喝，客人倒很满意，可主人就不自在了，辛辛苦苦挣来的或用血用命换来的家当让别人消受总不免有些心疼。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很是热情，隔三差五总要聚一聚，什么好听的话儿都能说出来，什么好看的东西都能端出来，有时还搭送点贵重礼品，如搭送了三顶「国家副主席」帽子和两项「政务院副总理」帽子。

可是，相处时间一长，两者关系就起了变化，有了许多矛盾。大家总不能老是欢坐在那里推杯换盏尽说些相见恨晚的话，总得要站起身来忙着做事过日子；而要过日子就难免有磕锅碰碗、烧咸了煮淡了的是是非非，就难免有干多干少、你肥了我瘦了的恩恩怨怨。客人方面，可能会抱怨主人有些薄气，没有尽做主人的义务，如1953年梁漱溟就曾牢骚满腹地抱怨毛泽东缺少当大家长的「雅量」，听不得不同意见。主人方面，也可能会埋怨客人有些过分，没有守做客人的规矩。如1957年执政党就曾火冒三丈地斥责一些民主党派居然想在别人屋檐下搞什么「轮流坐庄」，不晓得自己站在哪里，同谁在说话。

不过，双方一旦闹起矛盾来，各自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实力的不对称自是导致结局的不对称。客人方面仅仅对主人所做的事表示不满，并仅仅用言辞来表示这种不满，即所谓「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主人方面则不仅对客人所做的事表示不满，如把「向党提意见」看做「向党进攻」；而且对客人在屋里的存在表示不满，即要把他们吆喝出屋、扫地出门，或下放基层、送去「劳改」。

客人只是向主人提提意见、闹闹情绪，主人则是对客人极不耐烦、大加发作、拍桌子摔板凳、抽耳光踢屁股。1953年批梁漱溟，可看做是毛泽东对个别民主人士的不耐烦和大发作。1957年反右派，可看做是毛泽东对整个民主党派的耐烦和大发作。

于是昔日老友、远房亲戚，曾经被热情迎进门，此时又被冷脸送出门，他们本是去看朋友或走亲戚的，小住一下无妨，久住下去就不妥当了，就要讨人家嫌弃了。

当然，事情不是绝对的，真要想久住下去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道些远房的亲戚必须放下客人的架子，脱下袍子，挽上袖子，做起诸如端茶倒水之类的事来。大户人家总得要有一些能够跑前跑后张罗门面的人。问题是人和人不一样。有一些人确有这方面的才能和耐性，干得十分出彩，并一干数十年。每逢主人家举行重大礼仪活动，人们总能看到他们恭恭敬敬地站在最显眼处，打躬作揖，唱喏问安，抬头见笑，低首有礼，一副讨人喜欢的模样。另一些人就没有这做伙计的天赋了，不会打躬作揖，不会道喜问安，说话不分场合，行事不看脸色。大户人家的房前里后厅里堂外容不了这后一种人，自是要请其走人的。

民主党派作为远房亲戚而客居执政党家里这一隐喻，包含两个清晰度不同的层面：一是实质上的利害关系，非常清晰，主客分明，乃至主仆分明；二是表面上的应酬关系，不甚清晰，主客间称兄道弟，互比一家，主人好客地说请把我的府第当做你的家，客人也知趣地说：「人在贵府里犹如身在自家中。」

正因为有了这两个层次，也就有了两者间相互遮掩相互混淆的可能。事实也是如此，第二层次关系常常遮掩了第一层次关系，那些客客气气应酬话常常使人们不能清晰地区分主与客、内与外，从而生出许多困惑。

例如，人们很难理解毛泽东对民主人士怎么能够说翻脸就翻脸，一下子从客客气气变为怒气冲冲。这种不理解实是执迷于第一层次应酬关系，即主人应该善待客人；而没有看破第一层次实质关系，即客人毕竟是客人，住久了而又放不下架子做仆人，致使主人腻了且又忍了许久，于是乎，不发作则已，一发作就不可收拾了。

又如，人们很难理解某些民主人士好心好意给执政者提意见反被泼了一盆凉水，从头泼到脚，从外凉到里。这种不理解也是执迷于第二层关系而失之于第一层关系，只是觉着老弟好意忠告老兄，老兄则应递遇老弟；而没看到老弟虽是老弟，但只是远房的表老弟，来到此家打个下手混碗饭吃就不错了，却还不知足，还要反客为主，就这屋子里的事情指手画脚起来，开始时主人碍于礼面谦让一下，而他居然当真，越说越起劲，说到末了能有他好果子吃？

## 7

总体上看，民主党派的政治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言论运作方式；与此相应，民主党派的人员公务职守，也大都安排存「言官」位置上。大多数进入「政协」的民主人士，主要从事咨询性工作。另一些担任政府行政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也主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参与议论本部门工作。我们已经指出民主党派不是什么，不是政权外的「反对派」，也不是政权内的「实权派」。我们还要指出它是什么，指出它是一种介于「反对派」与「实权派」之间的「言论派」，持言论而立世。那么，民主党派的言论究竟有多大价值、有何种意义？具体地说，有何种预期意义？有何种实际意义？

关于预期意义，可分别从民主党派和执政党两方面看。

民主党派对自己言论参政的预期，往低处说，即从党派私交上说，想通过发议论方式，来帮助老朋友管好这个大国家；往高处说，即从民族大义上说，不管什么人执政，只要造福人民就褒之，只要为害人民就贬之，有错必究，不平则鸣。民主党派很想通过他们的言论来影响新中国的政治。

执政党把民主党派置于言官地位也有所预期，也有低处着眼高处着想两层预期，一为「还情」，二为「纳谏」。

中共打天下时，曾得到过民主党派大力协助，欠了他们许多情分。1920年，毛泽东卖掉大衣买了一张车票来到上海，最初在洗衣店当伙计，洗洗涮涮，收入甚微。就在此人一贫如「洗」之际，前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领衔为湖南青年团体筹到2万块大洋，交由毛转递。这可能是他从记事到此时所看到的最大一笔款子。1938年，八路军前与日军作战而消耗甚多，后有老蒋苛刻而补充甚少。就在该军十分困窘之际，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冒着老蒋要追究的风险，一次性批给八路军一百万发子弹和25万颗手榴弹。这可能是中共自建军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军火。

1945年，中共参加重庆谈判是捏着一把汗的。首先，谈判的实力不如对方。当时在中国发言权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枪杆子的多少，而中共军队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地位。其次，谈判的桌子摆在人家地盘上。对方能够严密监控会议进程，随时都有可能置己方于尴尬境地。窘迫的中共迫切需要其它政治势力支持，以抗衡正处于鼎盛期的国民党。

结果，如愿得到支持。老蒋把老毛看作是想来讨便宜的匪党头子，民主党派则把他当做是前来谈和平的光荣使者，尽管后者已做好种种打的准备。他们倾巢出动地为他迎来送往，使之倍感荣耀。他们还为中共出谋划策，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先生与毛泽东私下商议，以自己名义发表文章来说出后者很想说却不便说的话，使得毛大为感激，赞其「老成谋国」。

民主人士很清楚，好记仇的蒋先生正甩冷冷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做的一切，迟早要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第二年秋冬之际，国军攻占共军在关内所拥有的最后一座城市张家口，国民党旋即召开「国大」，遂将绝大多数民主党派逐出国家议事机关，此后还让特务们不时找这些失业政治家的麻烦。不管后人怎么说，不管中共党史怎么写，民主党派曾在毛泽东很需要帮助时帮助了他，既给了他一些实惠，又给了他很大面子，并为此而付出一定代价。

1949年，中共一坐上执政者位子，就要对老朋友作出回报。蒋先生把这些人逐出「国大」，使他们成了政治盲流；毛先生则把这些人请进「政协」，让他们一有饭可吃，二有话可说、三有荣誉可享，以还他们一些旧情。

不过，毛泽东设置言官的预期还不止于此。他毕竟属政治家，很有功利感，不仅想藉此还上旧有情分，还想藉此获取现实好处，希望言官能够对新生政权有所贡献，提出一些建国良策。毛泽东待客，不只是尽情分，还想从客人身上索取于己有益的东西。做客人掌握好分寸，在身份上不能反客为主，在言辞上不能过于激烈，尤其碰上气度不大的主人就更不能自以为是地说话；那么，做主人的还是愿意听一听客人的意见，尝试一下纳谏的好处。

自唐贞观以降，凡想做一番事业的统治者，总要附庸风雅一下李世民的纳谏之举。毛泽东也不例外，也曾表现出这一雅兴来。他熟读史书，知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古训，知晓太宗皇帝「常保三镜」（「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出于《旧唐书》，卷71。）的故事，不会不明白一个政权若想少犯错误，就需要倾听不同的声音，尤其要倾听批评的声音。为此，他作了这样的承诺：

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94。〕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55。）

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279。）

显然，毛泽东最初是想广开言路以资其政，但他最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既不能用他先前的良好愿望来开脱他后来的实际错误，像现在许多官样文章所说的那样；也不能完全反过来说，说他原本就没有丝毫诚意。

## 8

对于民主党派以言论参政的方式，不论他们自己还是执政党都从各自角度表示了良好的愿望。那么，这种愿望如何进入实际过程、如何获得实际意义呢？

一般说来，言论参政方式有两种，一是参议政府举措前的决策，二是评说政府举措后的得失。就民主党派的政治实践看，前一种方式很难实行，后一种方式很受限制。

执政党做重大决策的一般程序是，先关起门来想、关起门来议，由毛泽东脑袋到常委会、到政治局、再到中央全会；等想好了、议好了，再告知民主党派，做征询意见状。实质上是我说了算，形式上是我与你协商。

1954年前，先由「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后经「全国政协」议论

通过。1954年后，先由「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后经「全国人大」鼓掌通过，再让「全国政协」附议赞成。此时「政协」已由二等表决机构降为三等表决机构，不仅察颜观色于「中共中央」，而且随声附和于「全国人大」。于是乎，这些身着西装革履、长袍大挂的「政协委员」们，也跟着那些身着军装工农服、一身短打扮的「人大代表」们一起，频频举手，阵阵欢呼。

毛泽东执政二十几年，作过这样一些重大决策：

一、1950年决定出兵朝鲜。这是有关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定位的重大决策，即决定新中国武装对抗「美帝国主义」、并坚决倒向苏联阵营。

二、1955年决定加快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是有关新中国在社会制度上如何定性的重大决策，即决定新中国由容忍民族资本主义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迅速过渡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阶段」。

三、决定搞「大跃进」。这是毛泽东在经济实践上所作出的最重大决策，其后果也最严重。

四、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在政治实践上所作出的最重大决策，其影响也最深远。

对于这些重大决策，民主党派是很难参议上的。

关于出兵朝鲜决策，不要说是民主党派人士，就是执政党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未能参议。它先由毛泽东下决心后由十几个政治局委员附议而作出的。

关于加快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决策，毛泽东曾说明：「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

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37。〕

这是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对自家人讲的私房话，道出执政党做此决策的真实意图，即要抽掉民主党派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进而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显然，执政党不会让民主党派预知这一决策，而民主党派也不会真心赞成或积极参议这一极大损害他们自身利益的决策。

至于后两个重大决策，由于都发生在将民主党派发言权剥夺殆尽的「反右运动」后，因而也都不存在让他们来参议的可能性。过去执政党做决策还形式上向民主党派打个招呼，此时连这形式也不需要了。像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连执政党副主席也是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能预知，至于民主党派就更不能说上话了。

关于民主党派言论参政第二个方面，即评说政府举措后的得失，由于是发事后议论，因而与事前参议相比，虽在认识上容易些，但在政治上更有风险些，更不讨人喜欢些。事前参议只是告诫人家将会生病，事后议论则是硬揭人家已有伤疤。执政者们常常不理睬前者，但很想惩罚后者。

1953年9月，梁漱溟先生对执政党在农业方面的举措提出善意且委婉的批评，但不能容于毛泽东，结果被封上了嘴巴，很爱说话的人在二十余年间不能说话。

1954年7月，胡风先生向执政党中央提交一份报告，谈了自己对新中国文艺工作的看法以及自己受排挤的境况。报告既不否定党的根本路线，只对党的某些政策提出异见；也不攻击党的最高领导，只对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表示不满。结果胡风引火烧身，1955年1月，执政党中央将胡风意见定性为反党文艺思想，并发动全国知识界予以批

判；5月，执政党中央又将胡风与其支持者由「文艺上的小集团」升格为「反革命集团」，并将胡风本人捕入狱中；6月，执政党中央抛出由毛泽东作序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胡案遂成铁案。1965年，胡风在坐了十年牢后被假释出狱；1969年，胡风被加判无期徒刑，再次被关押，服刑近十年；1980年，胡风获不彻底平反；1988年，胡去世三年后获彻底平反。

严格说来，胡风不属于民主党派，而是中共老党员、鲁迅先生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因此，执政党惩处胡风也可以说是在杀鸡儆猴，有意无意地告诉民主党派，若冒犯本党威仪，即便自家兄弟也要严惩不贷，至于你们这些远房表兄弟就更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了。

可是，民主党派仍不接受告诫，仍要说出自己想说的话。1957年春夏之际，他们也言辞激烈地批评起执政党来，结果也招致后者强烈反弹。先后有数十万知识广被打成「右派」，另外还有更多知识分子因此而失语。过去，只是个别民主人士因言获罪；如今，则是整个民民主党派在言论上全军覆没。此后，他们就由好说者变为无话者、由善谈者变为讷言者，他们原被允许使用的言论参政手段，虽还能在一些礼仪性场合被提起，但已是名存实亡了。

许多被打成右派的民主人士，事前不是不清楚他们的言论是要捅马蜂窝的，但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要让那些妄自尊大的执政者们不得开心颜。这里体现了一种文化传统，即许多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所遵循的「士志于道」传统。他们积极入世、关心时势，但由于处在最高决策圈外，很难介入到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事前参议中，故只能较多地关注它的实施情况，并不留情面地予以评说。于是，针砭时政、臧否人物成了他们常有的一种作为，同时，被贬谪、被迫害也成了他们常有的一种境遇。

实际上，中共最初也是由知识分子团体发展起来的，中共第一批党员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既有当大学教授的大知识分子，也有当小学教员的小知识分子。他们也都秉承「士志于道」传统，也都敢于仗义

直言，指点江山。

不过，他们也有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的地方，比如：

——不自命清高，不故作高雅，很少有文人身上常有的那种酸腐气，往往能脱下长袍，穿起草鞋，深入社会下层，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进而发起工农运动。

——不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只是用言论批评政敌，还能够用暴力夺取政权。

——不守承诺，不亲同类，夺得政权后就容不得别人批评自己，尤其容不得其它知识分子批评自己，以致完全剥夺后者的发言权。

他们与后者属同一营垒，对后者知跟知底，故而不斗则已，一斗则斗到要害处。他们知道后者靠发言论来吃政治饭，便封势紫巴，叫其无法过政治日子。

知识分子的一个社会角色特征，就是关心社会、针砭时弊。中国知识分子尤为如此，并且是两千年一直如此。毛泽东彻底封杀知识分子言论，实是在施行一条自秦皇以来前所未有的知识分子政策。

这一政策不仅使得知识分子干不了自己很想干的事，而且迫使他们干了自己不想干的事，如强制性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让他们没完没了地学习那些假大空的东西，再三再四地书写那些扭曲灵魂的东西。其中一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处境尤为恶劣，三天一检查，五天一汇报，举手打自己耳光，张口骂自己坏蛋。这样的羞辱恐怕只有历史上满族强迫汉人剃发留辫的羞辱才能与之相比。

执政党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诱迫知识分子背靠背地相互揭发。本来，诋毁思想同仁或出卖政治盟友，最不适合知识分子的性情，也最能折煞知识分子的气节，至少最违逆知识分子好标榜的东西。可是，那些搞运动的「工作组」、「学习班」、「清查办」，最提倡这种打政治小报告的做法。长此以往，极大地败坏了中国知识

分子的士风，同时也使执政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拥有了一支规模空前的告密者队伍。

毛如此做法，实是对中国士文化传统的一种反叛。他最初受教于且受惠于这种传统，最终又竭力贬损这种传统，给了它未曾有过的伤害和羞辱。

毛如此做法，也是对他自己历史的一种反叛。打江山时，他最爱讲「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致把它看作是中共「三大作风」之一；（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 1095。）坐江山时，他最匮乏「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致老虎屁股摸不得。快胜利时，他告诫同志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 1095。）；可胜利后，他对战友，对属下，对朋友，尤其对那些敢于直言的民主人士，既不谦虚谨慎，也不戒骄戒躁，常常是一触即跳。这里仍以梁漱溟案为例。

1953年9月9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邀请梁漱溟发言。9月11日，梁漱溟应邀发言，以比较委婉的方式谈了执政党在农村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发言就事论事。

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府扩大会议上回应梁漱溟发言，以不点名但听众都知说谁的方式谈道，「有人竟班门弄斧」，居然在中共面前谈论农民问题，「笑话」！谈话已就事论人了。

9月13日，梁漱溟与毛泽东短时会面，陈述委曲，说自己本无恶意。毛则咬定梁反对「总路线」，只是不自觉或不承认而已。

9月16日至18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再次发言，继续陈述委曲，并要求毛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于会议期间多次插话，内容近乎破口大骂：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

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人杀人犯。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耻羞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吗？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一大堆吓人的帽子，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人们从这里不难发现，十几年后的「红卫兵」是从哪里学会「大批判」的。

此后，梁先生就不再说什么了，毛先生却不想就此罢休。1955年5月，毛泽东发起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运动，要从屋子里闹到屋子外了。这一次，他不打算给对方发言机会了，尽管他曾许诺对方可以为自己辩护；也不打算由自己来说什么了，只挥了一下手，各路人马群情激昂，都来批判这个孤立无援的老书生了。

此时此境，不知梁先生有没有想起他曾说国民党的一句话：「士有气节必摧之」；如果想起，又不知梁先生还想不想再说点什么……

不过，我们知道梁先生三十年后说的话。（《梁漱溟问答录》（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章。）此时，他已年届九秩，他的那位怒气冲冲的老朋友已故去多年。在回顾那桩公案时，梁先生并没有对曾经善待他的人报以恶语，反而作了自责，说「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言下之意，是由他梁漱溟把事情闹大的。这是高姿态，是生者替故人担责任。不过，这也像是羊给虎担责任，说自己虽是被吃者，但也有引诱吃者张开嘴巴的责任。

从实际效果看，梁先生自责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显示了他的儒雅襟怀；另一方面，也把毛置于一种尴尬境地，既强烈地反衬出后者的偏狭器量，也使后者的生前恃才傲物的强者形象褪色为死后受人宽恕的弱者面目。

批判梁漱溟，毛泽东正值六十岁。孔夫子云：「六十而耳顺」，说他到了六十岁时，就能够听得进任何意见了。毛泽东主席则六十而气盛，批评不得，顶撞不得，声音高，脾气大，把同是六十岁的梁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毛先生在历史上怕是坐不上千秋圣贤的位子了，尽管他很喜欢人们叫他「导师」。（参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北京：三联书店，1971年），页13-14。）

刚坐江山时，毛泽东屡屡表示要倾听各种意见，要学习先人「兼听则明」。可是到头来，他有唐太宗雅兴，却无唐太宗雅量，听不得批评意见，容不得骨鲠之士，致使下属不敢禀实情，友人不敢说实话。老人家在史上怕是也坐不上开国明君的位子了，尽管他还有些看不起「唐宗宋祖」，讥之「稍逊风骚」（毛泽东〈沁园春·雪〉）。

## 9

上述可见，民主党派只是扮演了一种客居他家但住久了就要降为家仆的政治角色，只是运用了一种评头论足但说重了就要受到惩罚的言论手段。接下来问题是，民主党派何以要扮演如此角色？何以要运用如此手段？

进一步追索使我们又回到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上。民主党派之所以有如此境遇，就在于他们所依附着的这一政权是由暴力夺取的。这种夺权方式对夺权后的党派关系造成两方面影响：

其一，造成权力分享上的不平衡。凭借暴力登台的执政党自是享有绝大部分权力，没有暴力业绩的民主党派只能落座在权力舞台的边缘上或角落里。

其二，造成政治心态上的不平衡。执政党因自己有着曾过关斩将履建功勋的经历，而对民主党派表现出较大的优越感；民主党派则因自己有着曾畏枪惧炮常显文弱的记录，而对执政党表现出较多的谦卑感。

关于前一方面影响较容易理解。中国有句老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证权创建也是如此，作出多少努力，也就获得多少权力。如果政权是用暴力做成的，那么，投入多少暴力，也就获取多少权力；或说，流出多少鲜血、损失多少生命，也就握有多大权柄、拥有多大权势。

中共从其建党到其夺权，先后投入四次全国性战争。其中两次与国民党联手出击：一是北伐战争，一是抗日战争。它在前者中仅起偏师作用，只有少量军队；在后者中支撑半壁河山，游击华北华中。另外两次与国民党大打出手：一是土地战争，二是解放战争。前者打成星星之火四起之形式，后者打到数百万军队绝输赢之规模。

在这些战争中，中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损失，流了不知多少血，死了不知多少人。

如「大革命」失败时，「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页 739，740。）余者仅为 1/4。

如「长征」结束时，「红军从八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

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页 739, 740。）余者仅为 1/8。1943 年初冬，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八万人马仅渡三万，余者大部尸横江畔，致使湘水变色，如落晚霞。

中共在上述两个历史时期的损失，除了可从总量上统计外，还可从结构上看，即可看到这些损失给中共日后发展带来结构性失衡。

例如，在大革命失败时，中共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大部被捕杀。

中共最初是一个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有较高素质：

其一，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数人都诵读过孔子孟子，受到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较厚重的人格底蕴；

其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留学过东洋西洋，感受过现代文明的气息，有着较开阔的眼界；

其三，他们都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前后思想解放时期——即中国百年来新闻检查最少故而思想言论最为活跃时期，有着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较敏锐的思想辨别力。

然而’“27 年的屠刀就首先要砍他们的脑袋’并也确实砍了他们中许许多多人的脑袋。

这种人员损失给中共组织带来结构性恶果，使它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缺乏那种老资格的、高质量的知识分子党员，尤其缺乏那种与毛泽东旗鼓相当、既能有效帮助他又能有效制约他的知识分子。

又如，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最优秀的基层干部几乎被打光。

在战争中，下级军官比高级军官更缺少保护、比普通士兵更负有责任，常被要求带领属下士兵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其伤亡率较高。尤其当战争十分惨烈、下级军官又十分勇敢时，其伤亡率就更高了，

红军长征时总是处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中，其头常被打烂，其尾常被截断，因而军中那些勇于举着驳壳枪领着战士向前冲、向后打的连排长们就很难存活下来。

这种人员损失也给中共军队带来结构性恶果，使它在其后来的将官阶梯中出现一个相对薄弱的层次，即在 1955 年授衔为少将者中名将很少。

这个党里能够从 1920 年代活到 1949 年的元勋，大都是幸存者，大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彭德怀闹「平江起义」时的十几位亲密战友，也是红三军团初创时的中坚分子，在不到七年时间里全部牺牲。彭的参谋长邓萍就是其间最后牺牲的一位，殉于 1935 年 2 月遵义城下。彭的两个胞弟全遭杀害，留下一群孤儿。毛泽东兄弟三人，两死一生；其元配夫人所生三子，一死一疯一丢失。

这个党屡屡说，她的党旗、她的军旗、她的国旗，都是用鲜血染红的。这个比喻是恰如其分的。这个党的领袖作诗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七律·到韶山》）这个感叹是发自真情的。

就在共产党浴血奋战时，民主党派有何作为？赞成不赞成使用暴力？流没流血？

不能说民主党派全然反对使用暴力，但可以说他们不热心于使用暴力，至少不热心于由他们自己来使用暴力，这期间有一变化过程。

当国共两党在谈判桌上争执而没有结果时，当国共两军在战场上相持而未分胜负时，民主党派屡屡发表和平宣言，反对战争，反对暴力，既反对国民党动武，也反对共产党用兵：

「民盟是个没有武力的政党，民盟绝对相信无论当权或在野的政党拥有武力，国家不会有和平，更永远不能走上民主的正轨……民盟始终是超然独立的第三者，努力调解国共两党间的武力冲突。」（〈中国

民主同盟代表在南京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决保持第三者地位的声明（1946.11.25），《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 248-249。）

「本同盟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自身从未利用武力，并坚持各政党均应放弃其武力。」（〈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1946.7.2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页 206。〉）

此时中国很是热闹，既有玩命打架的，也有好心劝架的。不过，架是要打下去的，劝是不起作用的。劝者纵有善意，但会劳而无功。这犹如一只羊向两条争拾肉食的老虎念叨素食的好处一样，自是白费口舌，并会危及自身。就近现代中国来看，和平固然好，但不现实。现实是不拿刀枪的政治力量总要受到武装起来的政治势力的压迫与羞辱，一部民主党派史可以说是文人政治不断遭受武人政治欺侮的历史。

当国民党最终撕破脸皮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后，（〈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947.10.27）〉，《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页 360。）当共产党最终强大起来以致把老对手揍得快趴下时，许多民主党派开始改变他们原先想当和事佬的「第三者」立场，明确支持中共进行武装夺权斗争。

他们宣称：中共的奋斗史「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赏，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并高呼：「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1948.1.19）〉，《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页 374-378。）

他们说要「彻底消灭」，即是赞成大动干戈。不过，他们这个口号是在国共双方炮火都打不到的英租界香港喊出来的。他们还只是站在拳击场外喝彩别人的拳头，还没有也不准备亲身下场亮出自己的拳头。

也不能说民主党派从未流过血，但可以说他们只流了很少的血。

民盟常常说他们为中国民主事业付出很大代价：报纸被查封，组

织被破坏，人员被迫害；常常提到他们有「四烈士」：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斌丞。其中陶虽不是被暗杀死的，但也是上了黑名单的，并是为局势忧愁而病逝的。

他们说的这些话都是实话，他们说的这些烈士都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然而，就付出代价而言，他们无法与中共相比。后者仅在二次国共战争中就伤亡了 152 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 年），页 607。）对此他们自己也予以承认：「中国人民得到解放，拿枪杆的战士们，尽力最多。」（〈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在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1949.7.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页 558。）

毛泽东的党正因其出力最大流血最多而能够再新政权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民主党派则因其暴力业绩平平而只能在新政权中据于很次要的位置，即只能被前者任意领导而不能对前者予以有效制约的位置。在这里，权力的分享依据投入与回报相对应的原则，投入多少暴力就获得多大权力，犹如创办公司，投入多少启动金就获得多大控股权。

民主党派只因做了一些辅助性工作就被接纳到新政权中，似应明白，自己只打了半票就上了别人车子，既得着便宜就不好再对这车子说三道四了。

## 10

暴力夺权的方式，不仅能使暴力施行者在权力分享上优先那些曾退避刀剑的盟友，而且能使他们在政治心态上震慑这些盟友。这后一方面影响常常不为人们重视。

暴力绞杀虽然残酷，但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力，激发人的勇猛精神和聪明才智。因为，不勇猛则败、则亡，不聪明则落入圈套，则陷入十面埋伏。中国历史上最有丈夫气魄的君主大都起于疆场，如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中国历史上最为实用的谋略大都出于战例，如从「瞒天过海」到「走为上」的三十六计。

暴力绞杀当属最严峻的生存竞争。能从中获胜者，自然是强者，

尽管未必是善者。暴力绞干净利索地淘汰弱者以选择强者，持续且剧烈的暴力绞杀则能更进一步地淘汰一般强者以选择最强者。无庸置疑，历经长期战争而获取胜利的毛泽东及其战友当属这强中之强者。

对于这类强者，人们常存有一层怯意，特别是那些与这类强者虽属同一营垒却未下场搏击的盟友，除有怯意外，还有愧意，还有谦卑感。在这类强者与这些盟友之间存有一种不平衡的心态关系，即俯临轻慢与仰视臣服的心态关系。

公元前 207 年，秦围赵于巨鹿，楚欲相救。楚卿子冠军宋义奉命率军西援，行至安阳，屯兵避战，裹足不前达四十六日。楚将项羽怒而斩杀宋义，为上将军，旋即引兵西渡，「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接而九战九胜，大破秦军。

楚兵虽是孤军作战，但非孤军临敌。就在战场四周，还有其它十几路诸侯援军。他们先楚军而到，屯于壁寨。当楚秦大战时，他们无一敢出壁助战，只是「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战毕，众诸侯受项羽召见，「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为属焉。」（司马迁《史记》卷 17。）

项羽正是通过这种惊心动魄的暴力绞杀，既击败敌兵，又威震盟友；既使前者溃亡，又使后者臣服。掩卷而思，中共红色暴力似也如此，既使八百万国民党军队灰飞烟灭，也使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心悦诚服。

毛泽东 1949 年进京，也足一身征尘，八面威风。那些赶来晋见的民主人士，虽不是「入辕门」而「膝行」，但多有诚惶诚恐状。在这位有着魁伟身形的古都新君面前，诸公最常做的动作是「竖起大拇指」，最爱用的字眼是「真伟大」。

不过，在一些人那里，这种心悦诚服很快就变成心有余悸了，钦佩之余，惶恐又生。民主人士多为读书之人，虽文弱却有心数，虽安

分却很敏感。他们很快就能通过那张挂得满中国都可见的领袖画像，感受到画上人的那种君临天下、无所不在的威严；很快就能透过那张安宁祥和且少有浓须的银盆大脸，感受到慈面人的那种说一不二，难容异己的霸气。

他们既敬重又畏惧这位比老蒋更强大更有手段的执政者，故采取了一种比以往更小心、更少有作为的政治态度。

在老蒋专政时期，他们多少还能保持一些政治独立性，还能发出一些自己想说而执政党不想听的声音，如在由国民党主持的会议上直接批评政府，如在民办的报纸上公开讥讽权贵。中国民主同盟曾经隔三差五，不是发文告，就是答记者问，发难国民党，奚落委员长，忙得不亦乐乎。

到了毛公当家时，他们就逐渐失去政治独立性。尤其到了 1957 年后，他们已不可能发表独立意见、不可能公开批评执政党及其毛泽东主席，尽管此党此主席可批可评东西越来越多、几成大错误常有小错误不断之势。

他们中虽有一些仍敢直言者，但多遭不测，轻者挨批，重者被抓，并累及三代。其亲属们每每在填写政审表格中的「家庭关系」或「重要社会关系」的栏目时，都久久不能下笔，可又不能不下笔，不能不写上那个会给他们带来恶运的至爱亲人的名字，并注明他所戴政治帽子的称谓，是「右派分子」还是其它什么「分子」。

当然，他们中也不乏有精明乖巧者，这些人识时务，晓利害，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处世方式，言不敢大气，行不敢独为，观风向说话，听号召做事。他们以往多是生性高傲不愿嫁人的政治老处女，如今变得也要委身他人了。

不过，这些出阁者已是旧日黄花，嫁到他人家自是难获宠爱，多数时间被弃之一旁，只是在逢年过节或遇重大礼仪性活动时，才被从布满尘封的后院里呼唤出来，打扮一番，呈花枝招展状，摆设在共和

国礼堂中，供人观瞻，以显示此当家者不是孤家寡人，还有三房四室，并相敬相爱，共享家政。

这些民主人士如此恭敬执政者，执政者又如何看待这些民主人士呢？令恭敬者沮丧的是，受恭敬者仅从高堂之上投下轻蔑的一瞥。

虽然毛公与某些民主人士有些私交，但他对作为整体的民主党派以及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主要成分），是不抱好感且不予高看的。他认为，民主党派是软弱的动摇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既支持革命又害怕革命，在社会主义时期「既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因而需要执政党来对其「既团结又斗争」。他认为，知识分子不过是「皮上的毛」，没有独立性，只有依附性，其中大多数人都有着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因而需要执政党来对其进行「思想改造」。

可毛自己的世界观也需要好好改造，用他自己的党在他死后做决议的话来说，其间有着许多「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页 767。）这种封建性东西比起他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来，要落后得多、卑劣得多。尽管如此，他仍要去改造人家、整肃人家，少则整个几十万，多则整上几百万，即便整过了、整错了，也毫无悔疚之意。老人家拿民主党派拿知识分子很不吃劲，有时完全不当一回事。

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何如此对待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

有一种较流行的解释：毛青年时曾在北京大学谋到一个图书馆小职员差事，每天跑前跑后地为那些名牌教授、正牌学生，登名记号、拿书取报，有时还不免受到一些冷落和歧视，于是在内心深处埋下了嫉恨种子。因此可以说，他晚年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对于他早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回应，是抚平他早年心灵创的一种举动。连境外学者也持此看法：「看来，毛没有忘记 1919 年他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冷遇。这使他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心理欲望，一有机会就把知识分子置于他们

应在的位置。」这位西方学者还多少有些戏虐地称毛是一位「半知识分子」。(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页199-200。)

这就把毛晚年做出的那些不善待知识分子举动,看作缘于他早年萌生的某种阴暗心理,即嫉恨那些有着显赫科班背景的知识分子的心理,从而把他描绘成一个心胸狭窄、得志便猖狂的小人。这显然是文人的说法,是文人爱听爱传的说法。笔者留意到,一些颇有学历者议论毛议到高兴处,常会复述这一说法。这样说或许能使文人较容易地实现自己对毛的精神胜利,尤其能使那些在毛生前备受羞辱的文人较容易地在毛死后慰藉自己、娱悦自己。不过,这种说法终究有些勉强。我们固然不能排除毛曾有嫉妒知识分子的内心情结,但可以说这不是他屡屡整肃知识分子的主要原因。一个简单事实,就是他身上可以骄傲的东西比起一般知识分子来要多得多,故没有许多必要去劳心伤神地琢磨后者、设陷后者,以恢复自己的内心平衡。

古人韩信,早年落魄乡中,受过胯下之辱;后来辅佐刘邦,因功受封楚王。他在荣归故里时,并未报复曾迫他钻裆者,反而称之「壮士」,赏官「中尉」。(司马迁《史记》卷92)赫赫楚王已犯不着与小民斗气,率千军者岂容不下一区区中尉?

古人如此,今人似也如此。1918年时的毛泽东不过尔尔,仅为一个学历不高、阅历不深的小知识分子。数十年后的毛泽东不同凡响了,已是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词坛高手、文苑俊才。昔为寒士,今为豪士。此时他妒谁?还会用上许多心思去倒腾那些小肚鸡肠事?

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毛主动打招呼:黄先生,我们早已见过面了。黄迷惑不解。毛爽言道:「廿多年前的一天,先生发表演讲,高台宏论,就在下面众多听者中有一个叫毛泽东的人。黄先生不认得他,他倒把黄先生记住了。」

1938年,梁漱溟先生访问延安。毛也主动打招呼:「梁先生,我

们是见过面的，不知你还记得不记得？那是民国7年（1918年）的事了。先生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我总是给您开大门。」〔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7。）

毛泽东不善待知识分子，很难说是出于某种嫉恨的情结，相反，倒有可能出于一种轻蔑的心态。一种小处还客气、大处便瞧不起的心态。他对于知识分子，与其说嫉贤妒能，勿宁说恃才傲物。他晚年曾对身边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接着他又解释道：「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口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页85-86。）

老人家说话时行将就木，快走到人生尽头，故说出来的话当属其平生经验。另外，老人家说话对象是其女服务员，一是在地位上与心智上低他许多而不对他造成任何心理压力，二是与他朝夕相处时亲近随和，故使他谈起话来少有顾忌且多显真情。

毛说话不多，三言两语，但已把自己的「秀才」观说出个大概来，其见解其语气都颇合他的那种不同寻常的经历和个性。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政坛上的知识分子，能言善辩者不少，舞文弄墨者不少；但实有成就者很少，改天换地者更少。1919年，一大批慷慨陈词者走上北平市街头；1949年，很少有原「五四运动」参与者因建功立业而登上天安门城楼。究其原因，还正应了老人家说的那几句话。他们中的许多人，说是要唤起民众，却不愿深入工农；说是要反对暴政，却不愿拿起枪杆；结社议政，略有起色，纷争即起；组团参政，稍有进展，内讧又生。

不止是党外有这种情况，就是党内也有这种情况。要说读中国书，谈文化理论，陈独秀先生要比当年毛泽东强得多；要说读外国书，背

马列本本，王明也要比当年毛泽东强得多。可是，两者都是言论有余，实干不足。结果，一个对中共蒙受「一战」失败（四分实力去其三）负主要责任，另一个对中共遭受「二战」失败（八分实力去其七）负重要责任。

「五四运动」七十年后的「八九民运」，似也有着内讧过多的问题，似也应了那位已去世多年的政治老人所说的那番话。当然，毛不会看不起一切「秀才」。他自己就是「秀才」，他的许多同事也是「秀才」。不过，他们这些「秀才」不同于传统的「秀才」，不同于那些造反三年、三十年乃至、百年也不成的「秀才」。

他们说得多，做得也多，既动嘴，也动手，脱去长衫穿草鞋，扔掉斯文进绿林，用毛的话说，为了挽救革命，不惜「担任土匪工作。」尽管毛泽东未必真心喜欢农家生活，曾千方两计要离开韶山冲到大地方去；但他为了革命需要，又心甘情愿地重返农村，并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尽管毛泽东未必真心喜欢玩枪弄炮，曾当了五个月大兵就退出军队；但他为了生存需要，竟兴趣昂然地搞起武装斗争，并颇有心得地写出多篇军事大作。尽管毛泽东的党也有许多私斗与内讧，但他和他的同事们总是尽可能地强调组织纪律性，尽可能地设法将私斗控制在公斗之下，将内讧控制在不致于造成组织破裂的限度之内，并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几十年下来，那些儒雅秀才与这些绿林秀才各有什么结局呢？

1940年代末，国统区里搞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打出非常醒目且琅琅上口的标语：「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标语虽只提到教授，但能反映出大部分民主党派及其知识分子的现况与真实心态：其内容是合乎事实的，他们越要争民主越争不到民主，越想吃饱饭越吃不到饱饭；其语气是不胜悲哀的，他们发出的只是弱者的一种喊疼叫痛的号啕声，只是被捉弄者的一种牢骚满腹的抱怨声。

就在这同时，山那边的秀才们正高唱着他们的军歌：「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正统领着自己的队伍，锐不可挡地从高山峻岭之上冲了来，从穷乡僻壤之中杀出来，越冲越猛，越杀越强，渐成铺天盖地、倒海翻江之势。此刻的毛泽东，正晃悠悠地骑在马上，不无得意地告诉世人，陕北的小米好养人啰。

很难想象，这位马背君主会嫉妒那些于「越教越瘦」中等待他去「解放」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同时不难想象，这位政治老人在谈到「秀才造反三百年不成」时的那副似笑非笑的神态。

## 11

既然毛泽东政权从其外部不能得到有效制约，既不能得到政敌方面的有效制约，也不能得到盟友方面的有效制约。那么，这个政权从其内部能不能得到某种补偿、能不能做到「堤外损失堤内补」？即能不能通过它自己来制约自己？

这一问题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这一政权有没有自我制约力？如果有的话，其二，这一自我制约力能起到何种作用？

纵观新中国史，我们不难发现道一政权的确有过某种自我制约力，这种自我制约力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

一、对执政党中的普通党员的制约；二、对执政党中的领导干部的制约；三、对执政党中的最高领袖的制约。

关于第一层面的制约效果，较为明显。多数党员群众安分守己，是「党的驯服工具」，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前一说法出自国家主席刘少奇，反映的是党对下层成员的要求，后一说法出自普通战士雷锋，反映的是下层党员对党的态度。

关于第二层面的制约效果，也不难看到。许多党员干部官运曲折，既有过发号施令的历史，也有过被「整风」作检讨的记录；既有过前呼后拥的风光，也有过「戴高帽游大街」的耻辱。

关于第三层面的制约效果，则较为复杂。

首先，就毛泽东的个人态度看，是两重的：一方面，他号召全党同志都要自觉接受党的制约；另一方面，他自己却不愿接受这种制约，听不进话，容不得人。1953年，他批评刘少奇、杨尚昆不经过他允许乱发文件；（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80。）1965年，他自己却背着党中央乱发姚文元文章，以至于搞乱了党和国家。

其次，就毛泽东的实际境况看，也是两重的：

一方面，他确实受到了这种制约。他在执政27年里遭遇过各种阻力。其中，最强劲的阻力，不是来自执政党外的民主人士，而是出自执政党内的异己力量。对付前者，老人家只要玩玩「阳谋」即可打发了事；对付后者，老人家就要处心积虑、倾其全力了。搞一场「反右运动」以整肃党外民主人士，用不了一个夏季便铸成铁案；搞一场「文化大革命」以打击党内异己力量，虽历经十个春秋还未决胜负。

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反击乃至摧毁各种制约他的力量。政府总理反对他「冒进」，他就斥其为「右倾」，并责令其在党代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损其威信。国家主席不按他办法行事，他就斥其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为之发起全国性批判运动，最终将其迫害至死。国防部长批评他好大喜功、小资产阶级狂热，他就将其先削去兵权、逐出中央，后打入牢中、关押至死；总参谋长不赞成搞「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不赞成用学《毛选》来代替军事训练，他就允准林彪等围攻此人，逼得此人跳楼摔折了腿……因此可以说，毛执政的历史就是他不断摧毁各种试图制约他的政治力量的历史。他既整文臣，又整武将，以致朝中无人敢犯颜直谏，以致自己无事不为所欲为。

就一个人来说，如果他在其成长过程中，既不让别人来管束自己，也不打算自己来约束自己；那么，他就是一个「浑小子」，为人做事，不守章法，不知节制；并将成为一个「坏小子」或「傻小子」，什么样

的坏事或什么样的傻事都能做得出来；到头来免不了会落得个「倒霉小子」，自吞自咽这些坏事傻事。

就一个党或一个政权来说，如果它既拒绝外部制约力，又失去内部自制力；那么，它就是一个「浑党」或一个「浑政权」，盲人瞎马，胡闯乱撞，什么样的荒唐事都能做出来；最终要弄得天怒人怨，既害百姓，又损自身，国将不国，党将不党。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与其同事在刚建立政权时看得比较清楚。因为，他们刚看到一个缺乏自我约束力的政权（南京政府）是怎样崩溃的；并且，他们还知晓许多得了江山便忘乎所以的政权（如李自成大顺朝）是怎样败亡的。

建国前夕，在中共七届二中会议上，毛泽东不无忧虑地预测道：「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1439-1440。）

针对这些将会出现的情况，毛泽东又未雨绸缪地向其党人提出要求：「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1439-1440。）

会开完了，毛要上路了，要上北京去号令天下了，此时恰逢「春分」节气。他这趟路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老人家毕竟起于逆境，在长期奋斗中养成了遇事多虑的习惯，既会朝最好的方面去谋划，也会从最坏的方面去设想。他在即将夺取全

国政权时，既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总楚在神采飞扬之余牵挂着一个人。这个人有着与他相似的开端，也是出于乡村、起于暴力；但也有着令他发怵的结局，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抵不上数十日的骄奢淫逸，到手的江山得而复失。此人就是李自成，就是毛泽东进京时最爱提起的人。

走之前，他指着正准备行装的贴身卫士的脑袋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走之时，他又告诫正准备上车的周恩来等同行大员：我们此次「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页 123-124。）

这个党的其它领导人也对此有共识。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向在座的「穿黑衣服」或「穿黄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发出告诫：

「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之类人物。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笑声）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陈云，〈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 217。）

关于执政党需要进行自我制约问题，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在建国初不仅发了许多议论，而且做了许多实事。

新政权诞生刚过一个月，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各级党

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其职责是：检查上自中央下至基层各级党组织及其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并给予处分；教育广大党员严格遵守党纪，认真执行党的决议和政府的法令。

新政权诞生刚过半年，1950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鼓励人民群众公开地揭露和纠正执政党的缺点和错误，帮助执政党及其政府克服官僚主义，促进国家民主化。

这是想把大众传媒作为人民监督执政党的一种手段。这种监督手段按现时说法，属于「三权」之外的「第四权」——「新闻权」，即人民可以通过新闻舆论来监督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因此，中共在建国初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很有民主气息的。它坚持的是「言论自由」的主张，是「政治公开化」的主张。人们今天读起来不免感到惊异和惋惜。惊异的是，这个如今大讲「宣传舆论导向」的执政党，竟也说过如此开通的话；惋惜的是，这个屡屡需要「拨乱反正」的执政党，如果能自始至终地实行这个决定，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那么多或「右」或「左」的错误，那么多别人看得清而自己看不清的错误。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整风」三季，即于当年夏、秋、冬三季开展一次「整风运动」。其内容是，整执政党内功臣自居、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歪风，改善执政党同人民群众关系；其重点是「整各级领导机关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其方法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整风」刚停，「整党」又起。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党」三年，即在未来三年中「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党运动，对广大党员进行在执政情况下如何做合格共产党员教育，同时将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运动于1954年基本结束。被开除出党者和被劝退出党者达65万人，占整党前中共党员总数1/8。执政党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次大切除手术。

「整党」未完，「三反」又兴。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12月8日，中共中央再发指示，给运动定性加码，要求全党把「三反」看得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重要，并宣告中央惩治「三反分子」决心，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法办乃至枪毙。运动在1952年1月达到高潮，经过「揭发」、「处理」、「建设」三阶段，于1952年内基本结束。运动共打出「老虎」（贪污1千元以上者）10万余只，其中，逮捕9百余人，处决40余人。在被处决人中，有2位执政党高官，一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一是原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两人都追随中共二十年，出生入死，堪称革命功臣，也都因贪污巨额公款而不容于刚进城的执政党。

因此，说这个执政党从未认识到自我制约的重要性，那是冤枉了人家。因为，他们曾反复念叨过李自成的教训，念叨过糖衣炮弹的害处。同样，说这个执政党从未做出过自我制约的事实来，那也是冤枉了人家。因为，他们也曾该抓的抓了，该判的判了，甚至该杀的也杀了，手起刀落，血溅自家衙门，一点都不含糊。

可是执政党缺乏自我制约问题依然存在着，甚至严重存在着；否则，它就不会做出那许多「浑事」来。那么，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出在执政党中的哪一个层次上？问题的症结不出在对广大基层党员的制约上。因为，他们大都能循规蹈矩，大都能服从管束，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并且，问题的症结也不出在对许多领导干部的制约上。因为，在传统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中，所有居于中间层次的人，虽能管束比他们层次低的人，但自身也受到比他们层次高的人的管束。他们既对下属指手画脚，又对上峰打拱作揖。如脾气很大的王震将军，向下面做报告，时有「胡子」模样，又拍桌子又骂娘，甚至摔坏麦克风；可到了彭德怀元帅面前，到了毛泽东主席面前，就不再「胡子」了，而是循规蹈矩、约束有加。

问题的症结，既不出在低者，也不出在中者，只在高者，出在权力架构的顶层，出在那个能够俯临九州的金字塔塔尖上。

## 12

毛泽东制约他手下所有人，那么，他自身是否也受到制约？

前者陈述的是一个确定事实，后者追问的是这个确定事实的不确定前提。这一追问有些类似罗素的「剃头匠难题」：

在一乡村中，有一剃头匠宣告：

他（A）给此地所有不给自己到头的人（a）剃头（即 A 被 a 所包含）。

人们听后不免发问：你给不给自己剃头？于是，这位剃头匠陷入了一种难以说清的逻辑矛盾，说给也不是，说不给也不是。（如果他给自己剃头（即是 a），那么，根据他的先前宣告，他就应该给自己剃头（因为 a 应该被 A 包含）；反之，如果他给自己剃头（即为非 a），那么，根据他的先前宣告，他就不应该给自己剃头（因为非 a 不被 A 包含）。）同理，如果毛以为他可以剃所有人的头、刮所有人的胡子，那么，人们也可以反问他，您老人家自己的头要不要剃、自己的胡子要不要刮？如果也要剃、也要刮，那么，由谁来剃、由谁来刮？

在罗素那里，有所谓能剃所有人头的人他自己的头剃不剃的问题。我们这里，有所谓能制约所有人的人他自身受不受制约的问题。前者属数理逻辑问题（集合论悖论），后者属现实政治问题。这一现实政治问题既涉及该党理论宣传工作，也涉及该党施政运作情况。

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正式」选为中央主席、同时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此后，毛就被看作是党的旗帜、党的化身，进而又被看作是老百姓的大救星、新中国的红太阳。毛的耳旁响起了一片「万岁」声。

在这一造神运动中，中共一些高级领导人竭尽全力来推波助澜，并因此而获得毛的欣赏和重用。自老人家领衔中央最高决策圈后，圈内凡能从排名较低处一跃而至有排名第二位者，都是在宣传他个人方面有突出贡献者。前有刘少奇，后有林彪。

前者最早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看作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332。)后者则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前者宣称：「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刘少奇，〈论党〉，页336。)后者则宣称：「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国防大学编)，第25册，页123。)

前者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使之成为中共教义。后者则在大力宣传毛泽东同时，也使自己顺势挤进了《党章》，成为法定「接班人」。

前者宣传毛泽东个人还不太离谱，还同时强调：「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纪律的。」(刘少奇，〈论党〉，页319。)后者则把毛宣传得过于神化：「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23。)

即便老成持重的周恩来总理在谈到毛泽东时，也是诚惶诚恐、维护有加。不过，与上述两者不同，周公常常不是通过正面渲染来直接颂扬毛泽东，而是通过检讨自己来间接烘托毛泽东。这样既显得诚恳，又显得不过于奉承。据其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屡屡向同事们谈起他曾在历史上反毛主席的错误，并表露出深深的自责感，结果常常弄得大家心情都不好受。这样谈的次数很多，「不下百次」，致使听者们都听腻了，躲避不及，于是请卫士转告他，为了使大家在一起轻松些，最好小要再反复提那些旧事了。（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重校出版社，1993年），页329-330。）

可见，在这些大员们如此为毛大造声势情况下，再来谈要制约他、要剃他的头、要刮他的胡子，就有些不识时务了。你不憋足了「一万句话」，怎么敢顶撞他一句话？你不准备作「一百次」检讨，又怎么敢反对他一次？

这就在理论宣传上，把毛泽东摆在他可以制约全党而其自身不受制约的位置上，即摆在执政党自我制约之外的位置上，从而使执政党自我制约架构出现了一个漏洞，一个非同寻常的漏洞——漏掉了最不该漏掉的东两。这个架构拦住了许多条较小的鱼，却放走了一条最大的鱼。

因为，毛泽东不是执政党的普通人员，更不是共和国的普通公民，而是这个党、这个国家的特殊人物。他本人是一人专党，他的党又是一党专国，他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党、这个国家。党的安危系于他一身，国家的兴衰系于他一身。因此，在这个党、这个国家中，他最应该谨言慎行，最应该受到制约。

可是，这个最应受制约的人却被认定为最不受制约的人，这就使执政党陷入一种豪赌境地：党将所有赌资都交于他，他却可以无所顾忌地想怎么下注就怎么下注、想怎么出牌就怎么出牌，一人赢，全党皆赢；一人输，全党皆输。赢了，鲜花和颂词都必须献给他；输了，批评与处罚却不能加于他。到末了，他一转身就可走人，而他的同志

们还走不了，还要硬着头皮面对他留下的烂牌残局，还要想方设法偿付他欠下的巨大赌债。

当我们再把目光从这个党的言论宣传层面投向它的施政运作层面时，当我们再在经验事实背景下审视上述「能制约一切人的人他自身受不受制约」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相互矛盾情况：

如果说毛泽东执政不受制约，那么，他为何他每做一个重大抉择都要搞一线斗争？为何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整一次人？

如果说毛泽东执政受到制约，那么，他为何能够制造出那种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为何能够炮制出那种株连亿万人的大冤狱？

毛泽东的确受到过许多制约，故要常常搞起整人运动。毛泽东也的确摧毁了这些制约，故能接连制造巨大灾难。这种制约与反制约冲突，不断出现于老人家执政时期，并将这一时期划分出不同阶段来。

### 13

1976年春，毛泽东已是寿期无多了。正像人们在将要离开某个使其流连忘返的景地时常常要回首身后那蜿蜒小路一样，老人家也在将要离开这个让其牵肠挂肚的世界时禁不住回首自己一生风雨历程，慨然而言：「我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搞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对此持异议者甚少；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此拥护者不多，反对者不少。」（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7日第5版。）

毛所说的这两件事，一是属打江山事，二是属坐江山事。在此，我们对前者不多加评论，对后者倒有些补充。

老人家坐江山27年，办了许多件事，其中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搞经济建设，最终搞出了「大跃进」；二是搞政治运动，最终搞出了「文化大革命」。就实际情况看，前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后者的重要性，以至可以说没有「大跃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不知毛为何只提后者

不提前者。

平心而论，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也想搞好经济建设，改变国家贫穷面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的这一愿望在他建国初的许多讲话中频频表露，意切言真。

毛有如此愿望，是合乎常理的。历史上大多数统治者就其本心来说，都希望治下臣民能够安居乐业。因为，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他们的日子也好过；反之，老百姓的日子十分困苦，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十分舒服，一是因为老百姓能够提供给国家的东西少了，一是因为喊冤叫屈的人乃至聚众闹事的人多了。毛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何况他本人就来自社会基层，能体察老百姓的疾苦和需求。

最初，毛泽东不仅有此良好愿望，而且做出显著成绩，使「新中国」的「新」字落到了实处：迅速完成战后经济恢复工作，使工厂开工，使商店开门，使曾像野马一样狂奔的物价上涨指数得到控制；迅速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打破封建土地关系，使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迅速建立一批大中型企业，形成国民经济骨干产业，使工业品产量成倍上升……可以说，1950年代上半期是历经沧桑的中国人民最感希望的时期。

随着毛的权威越来越膨胀，毛的身上也开始发生变化了：

他的脑袋开始发热了，有些想入非非了，先说要十五年赶上英国、五十年到七十年赶上美国、五十年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后说要「两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钢产）。

他的脾气也开始变坏了，有些容不得人了，容不得不同意见者，容不得敢讲真话者，1957年整了数十万「右派」知识分子，1959年又整了数百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此时毛泽东，权力极大，脑子不好，脾气又坏。他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后果就可想而知了。不久，老人家就把刚从旧的苦难中缓了

一口气的中国老百姓又带入新的苦难中。

1958年，毛领着人民搞「大跃进」，结果饿死几千万人。以河南为例，该省抗日战争时曾有「水旱蝗汤」四害（洪水、旱灾、蝗虫以及扰民将军汤恩伯）之说、但这四害所造成的灾难远远赶不上「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仅信阳一个地区所饿死的人数就达百万人以上，超过该地区历史上任何一次饥荒所饿死的人数，甚至超过1938年6月黄河决口淹没豫皖苏3省40余县所淹死的人数。这时的整个国家经济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衰退，不是什么「十年赶上美国」，而是向后倒退十年。老人家执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彻底失败了。

「大跃进」失败之后，毛的脑袋不发热了，甚至，身体也因省着吃肉而缺少热量了；脾气也不太大了，竟能当众做一些自我批评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并承认，「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1-12。）

在此次大会上，许多人都对中央乃至对毛本人，提出了或直接或间接含蓄的批评，唯独林彪发了一通奇论，说了一番与众不同的话。他说我们虽然在物质上损失了，但在精神上收获了；并说我们之所以会犯错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410-4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45-1046。）

若从事实上看，林的这番言论纯属浑话，人都不在了，还谈什么精神收获？明明是按毛的话做才有这样的惨祸，却反过来说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是因为没听毛的话，一派胡言乱语，似是众人皆醒他独醉。

若就对毛心理揣测来说，林的这番言论相常准确，即把握了多数人均未把握的毛的真实想法，并因而得着多数人均未得着的个人实惠，

似又是众人皆醉他独醒。

对于林的发言，毛当时就予以肯定，并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还是林彪讲话有水平，比你们这些人强，毛事后没有忘记这位讲话有水平的下级，对他宠爱有加，直至把他由党内第六号人物提拔为第二号人物，使他坐上了副统帅位子。

对于其它人的讲话，特别是对于那些隐有批评的讲话，毛当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耿耿于怀，并与数年后翻出这笔账，倒算批评者。刘少奇在 1962 年讲话中伤了毛的自尊心，到了 1966 年「文革」时就上了毛的大字报。后者在其「炮打司令部」中，正式提出「1962 年的右倾」问题，可说是「一报还一报」。不过，两者相报是不对称的，刘只含蓄地说毛也有工作失误，并继续维护其地位；毛则公开地说刘犯了路线错误，并决意要将他打倒。

「大跃进」后，中国权力舞台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毛泽东做了一定程度的退却，即退出国家权力的前台，坐了几年似冷非冷的板凳。

所谓「国家权力的前台」，即国家中心工作的直接领导权，理应由国家主席承担。当时的国家中心工作是由中共「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失败已表明此事是老人家胜任不了的。另外，国家主席帽子也已在二届人大（1959.4）由毛泽东传给了刘少奇。「大跃进」的失败则使这一形式上的「传位」有了许多实际意义。

关于毛泽东作权力退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提及两点：一是缘于客观情势所迫，二是出自主观心理需求。

毛泽东闯了这么大祸，或许能够蒙蔽老百姓，或许能够在某种「舆论导向」下使他们相信这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但无法蒙蔽那些中央大员和封疆大吏。后者都亲眼看到老人家是如何发高烧的，又是如何发脾气的。其中许多人本身就受过他的感染，也发过类似的病，故有同病相识的真切体验。尽管林彪在那里发怪论，胡搅蛮缠地替毛

作掩饰，但多数中央委员是心里明白的，明白前面那句话应反过来说，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此「人祸」的根子正是出自他们的那位既爱发烧又爱发脾气的老上级。刘少奇曾征询晋冀鲁豫四省首长看法，被征询者一致认为造成「大跃进」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023。）显然，像毛这种十分敏感的政治家不会不清楚这些大员们的内心想法，故不得不在他们面前表示一点歉意，作出一些退让，退让到甘愿为他担担子的刘少奇的后面，做了所谓「二线人物」。

老人家自身也需要有一个心理调整时期。首先，需要从繁忙的政务中解脱出来，以松弛一下高度紧张的神经。其次，需要把自己折腾出来的烂摊子扔给别人，而使自己可以不直接面对那种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景象，以减缓一下内心深处的负疚感、羞耻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需要静下心来考虑许许多多问题，为下一轮政治较量积蓄思想能量。

关于毛泽东作权力退却的结果也是多方面的，这里也仅指出两点：一是积聚了新的政治怨气，二是筹划了新的政治举措。

毛由前台退到后台本来就是不得已，是有怨气的。这可以从他对林彪那通怪论的肯定中看出来。他的这种怨气在他退居后台时非但没有消解，反而越积越多。他后来重返权力前台，对「一线」上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都不满意，说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有做一件好事」；（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526。）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毛泽东，〈对《戏剧报》的两次重要指示（1963.1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95。）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1966.3.28-3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405-406。）说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两个「独立王国」；（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604。）说「我们这个国家有 1/3 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533。）说有不

少党政军负责人已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老人家有如此积怨是毫不奇怪的。由于其后任者正是在他跌倒下的地方站起来，正是把被他折腾休克的国民经济复苏过来的，因而会从两个方面触痛他：

其一，后任者所采用的方法不同于前任使用的方法，正像救人于苏醒的方法不同于致人于昏迷的方法一样。两者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对立的，即后者对前者予以拨乱反正。这显然不会容与老人家的胸襟，不会使他感到自在。

其二，后任者所获得的成就反衬出前任者所遭受的失败，反衬出他搞经济建设时那副志大才疏的模样。这显然也会有损老人家的自尊心，也会叫他不得开心颜。

毛泽东在从权力前台退下来的几年中，主要筹划了两件事，两件有助于自己重返权力前台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忙着变更「八大」路线，力图把党的工作重心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转到搞阶级斗争上——1962年9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理论；1963年开展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挖修正主义根子；1964年开展文艺界整风连动，批「封、资、修」；1965年1月发出〈二十三条〉，决定「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

第二件事，就是忙着寻找一种自下而上方式来整治那些党内「走资派」、那些「一线」上不合自己意的党政人员，结果找到了「群众运动」方式，找到了「文化大革命」方式，即通过发动群众来整治他们，通过「大字报、大辩论」来批判他们，以将他们整倒、批臭。

随着时间推移，上述两件事逐渐由小动作变为大举动，由次要方面升至主要方面；毛本人也由退却转为进击，由后台重返前台。

毛泽东是一个很有表现欲的政治家。他虽退居后台，却不甘寂寞，总想跳到前台来表演一番，用演艺界的话说，就是总想「抢戏」，抢其它角色的戏，尤其是抢前台主角的戏。不过，这是一种缺乏「戏德」的演技，一种让其它角色演不下去的演技。老人家正是以此演技而让当时居于国家权力舞台主角位置的刘少奇演不下去了，并最终让他也活不下去了。

毛泽东还是一个很有游击习气的政治家。搞不好经济，便搞政治；在经济上失去发言权，便到政治上大喊大叫；在经济领域走投无路，便到政治领域另辟蹊径。值此，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游击司令的风采：在经济阵地上被打趴下了，便匍匐潜行到政治阵地上再爬起来冲杀回去；你打你的优势，我打我的优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此处玩不转，另处放把火。他 1934 年丢了江西，1935 年再谋陕北；1958 年搞砸了经济建设，1962 年后又搞起一连串政治运动。

写至此处，笔者脑中闪现出一个词，一个曾被国民党军队用「老」了的词，叫「转进」。如抗日战争初期，该军从河北「转进」到河南，从松沪「转进」到华中，最后从华中「转进」到大西南。再如第二次国共战争后期。该军又从东北「转进」到华北，从江北「转进」到江南，最后从大陆「转进」到台湾岛。

这个词用在「国军」那里很「虚」，即只「转」不「进」；但若用到毛泽东身上就有些「实」了，因为他既有「转」又有「进」：在经济上溃败，在政治上「进」击，左手打折了，右手又打出去了。

毛泽东在执政期间办了两件人事，既搞了「大跃进」，又搞了「文化大革命」。可是，他晚年在回顾自己一生做大事时，不提前者，只提后者。后人不知他脑子里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但可就此提出一些设想：

这是不是因为：前者已成败局，自己已不可能再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了；后者最终也成败局，但当时未分胜负，况且自己仍持主动进攻态势；他本人又好大喜功、心高气傲，自是不愿提前者而愿提后

者，愿提那些比较适合自己性情的东西。

这是不是因为：不提前者的溃败，可使后者的动机显得更纯洁些，更理想主义化些。事实上就有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即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结局不好，但动机是好的，是要反对官僚主义的。

我们不否认毛泽东曾是农民的儿子，曾有同情老百姓的感情，但也应看到他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个不断进击的政治家，喜于争斗又好于积怨。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整老百姓所不满的人，更是要整他自己所怨恨的人。

## 14

接下来的问题是，毛泽东办这两件大事的过程又如何呢？简略地说，这些过程均为老人家不断受到制约且又不断打破制约的过程。

尽管在理论宣传上，毛被说成一贯正确并被置于一种能制约全党而自身不受制约的地位；但在执政实践上，他还是受到许多制约的。其中较有分量的制约大都来自他的身边，来自执政党最高层。

由开国元勋组成的中共最高决策圈中，除毛本人外，几乎所有成员都先后作出努力来阻止毛为所欲为。其中，刚正者有之，如彭德怀；敦厚者有之，如朱德；老成者有之，如陈云；忍辱负重者有之，如周恩来……即便是因搞毛个人崇拜有功而先后被提升为「二号人物」的刘少奇和林彪也不例外。

前者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后，一度把他的顶头上司晾于他所主持的「一线」工作之外，常常使这位「二线人物」怨声不迭，愤怒不已。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向毛作出抗争，并为此而丢了性命，丢了那条曾在国民党追捕下九死一生的性命。这是他参加革命之初不曾料想的，更是他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之初不曾料想的。在由他出演的这幕历史剧中，前场是喜剧，后场是悲剧，全场则为黑色幽默剧。

后者林彪则在 1970 年「庐山会议」上，公开与毛唱对台戏，力倡设国家主席职，气得毛斥之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6 卷，页 476。）林此举，于私，可说是「抢班夺权」；于公，也可说是「维护国体」。国家主席职为国之大体，不能由着他老毛一个人想设就设，不想设就不设。会后，这位「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为了逃避可能要降于自己的「今天他是他的坐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571 工程」纪要语）的恶运，准备与毛兵戎相见、性命相拼。所谓「制约」的事到了他这里就成「制命」的事。这位崛起疆场、成就于战火的中共名将，无疑有一股怒起抽刀，情急拼命的果敢精神。

这些中共高干对这位中共主席的制约，或说这些开国元勋对这位开国君主的制约，是一波一波的，呈「潮起潮落潮又起」之势。

就做「第一件大事」即搞经济建设来说，毛泽东至少受到这样一些制约：

其一，邓子恢及中央农村工作部进言「农村合作化运动」不要搞得太快，「不要连滚带爬地往前走」，否则，「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越多。」（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回顾〉上卷，页 342-345。）

其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联袂「反冒进」，声言「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20 日社论。）并表示要把上面的领导者的头脑「用冷水洗洗」。（周恩来，〈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1956.2.8）〉，《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 191。）

其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不约而同地直谏「大跃进」，斥其「浮夸」不实，讥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并以道理释之，以事实证之，谏言鲠骨，披肝沥胆。毛泽东遇上了本党中的人品最正且骨头最硬的一拨人。

再就做「第二件大事」即搞「文化大革命」来说，毛泽东也多次

受阻：

其一，「文革」初期，有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有所谓「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黑干将」打先锋，后有所谓「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黑司令部」压阵脚，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懵懵懂懂的抵制，虽无法扭转它的根本方向，但能够干扰它的预定进程。

其二，「文革」高潮时，有所谓「二月逆流」：既有政府副总理摔皮包、怒吼中南海，又有军委副主席拍桌子、大闹怀仁堂，对这场越来越乱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接受。

其三，「文革」僵持时，有所谓「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即从毛身边的「文革左派阵营」内分出一彪人马倒戈反叛：先在庐山上明唱「天才论」，要的是国家主席的权；后在庐山下暗发「小舰队」，要的是毛泽东的命。

其四，「文革」后期，有所谓「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复出前发誓「永不翻案」，掌权后仍是「死不悔改」。在周恩来总理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在许多老干部和广大老百姓的期望下，再次出山的「邓大人」又来事了，又有些故态复萌了，频频顶撞「文革」左派，屡屡整顿「文革」秩序，竟当着老人家的面去做他非常不喜欢的事，或损他平生最感得意的功业，或揭他老来越发生疼的烂疤。

可见，这些对毛的制约力量不能不说是很强大的，其间包括除老人家外几乎所有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故最终置毛于众叛亲离、落孤陷寡的境地。并且，这些对毛的制约活动也不能不说是很频繁的，其间相隔长者不过五年、相隔短者不足一年，故形成对毛轮番抗争、节节堵击的态势。

然而，制约力及制约活动到头来都失败，都被击破乃至被粉粹。制约者在其制约对象面前，总是处于劣势、反受其制。在毛泽东办「大事」过程中，其主导方面不是他如何受到这一次次制约，而是他如何

打破这一次次制约。这一方节节抵抗，那一方层层突破。

## 第二篇 建设：大跃进与庐山会议

### 引言

毛泽东搞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用中共术语来说是「左倾」的，即他头脑里想要做的事超出了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并且，他还将他头脑里的这些想法见之于行动，硬是要去做那些不可为而为之的事。

由于他身为执政党主席，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故也能将他这不可为而为之的事做出一番景象来。 ^

在此过程中，老人家的头脑一再发热，举措一再「冒进」，以致搞出了「大跃进」，搞出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页 754。）

与此同时，他还拒服退烧药，严惩为他开方送药的人，痛斥彭德怀的「万言书」，整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如此高烧不止且又讳疾忌医，结果只能是烧坏了头脑，搞乱了国家。「大跃进」搞了三年，国民经济倒退了十年，老百姓也饿死了几千万人。

毛泽东亲自执导了这场经济建设运动，以锣鼓喧天开幕，继以饿殍遍地收场。

### 15

毛泽东打江山搞暴力革命是先从农村搞起来的；继而坐江山搞经济冒进也是先从农村搞起来的。他是农民的儿子，与农村有着天然的感情。过去他较多地依靠着农村，如今他又较多地关注着农村。

后者似是对前者的一种补偿，但这种补偿到头来适得其反——他用的心越多，带来的灾难也越多，农民由战争时期出力最大的阶级变成了和平年代吃苦最多的阶级。平心而论，这并非出于他的本意，是其始料不及的。

最初（1953年12月），他赞成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可过了不到两年（1955年6月），他就想加快这个速度，想让农民跑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想使农业合作社数目在半年内（1955年下半年）翻一番，由65万个增加到130万个。

他的新主张一经提出，就受到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抵制。后者提出这样几条反对理由：

其一，合作化速度应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合，不应超越工业化所能提供的技术支持；

其二，已经成立的六十几万个合作社还存在许多问题；

其三，老区与新区发展不平衡，老区需要继续巩固，新区则要认真打基础，布点示范。训练干部；

其四，应吸取苏联和匈牙利搞合作化过急的教训；

因此，「办合作社要发展一段，巩固一段，不要连滚带爬地往前走；连滚带爬往前走，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越多。」（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5章。）

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从事农业方面工作，理应在其专业方面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可是，在这个党里以及在整个国家里，任何发言权都要服从于毛泽东的发言权，甚至事实的客观性也要屈从于老人家的权威性。

1955年7月11日，毛泽东约见邓子恢等人，严厉地批评后者，说要用「大炮」轰其思想。

7月31日，毛泽东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不无嘲讽地斥责那些不同意见者，「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许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7.31）〉，《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68。）

8月26日，毛泽东批示：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电报，应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而不要写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这实是削去了农村工作部本应拥有的承上启下的职权。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为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争论作结论。毛泽东断言：邓子恢同志犯了「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7.31）〉，《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208。）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宣告『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

毛泽东与邓子恢的争论暂时平息下去了，但留下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者，就是执政党主席如何对待党内不同意见、以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如果事情仅仅是毛泽东不采纳邓子恢意见，还不能说他有多大的错。因为，就常理而言，提出某种不同意见与反对这种不同意见，应该是对等的。你可以有此看法，我也可以有彼看法。不能说凡提不同意见就是正确的，就是开口七分理。另外，就权力机构关系而言，毛泽东领衔的党中央本就是邓主管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上级机关，而后者只是前者的咨询部门与执行部门。后者上书前者与前者否决后者都是正常的，都是合乎程序的。

可问题是毛泽东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常常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具有敌对性质的政治主张，如把邓的思想定义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后又通过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把邓的主张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这就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提升为路线上的斗争——一种事关全局且

不可调和的斗争。

数十年后，知情者薄一波为邓抱不平：「不用说子恢同志主要意见是正确的，问便错误，也说不上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不宜提为路线错误。因为按照从苏联接过来的传统习惯，一项错误被宣布为路线错误，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那就毫无分析的余地，一切皆错，全盘否定。」（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5章，页361。）

他还指责邓子恢等人「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地去挫折它」；「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不是什么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而是根本不尊重。」他还把由邓子恢领导的整个农村工作部说成是「促退部」，把该部如实反映斥之为「发谣风」。

并且，他还主持召开七届六中全会，发动全体中央委员来批判邓子恢等人的思想。与会者们先后作了二百多次批判性发言，纷纷声讨「小脚女人」，甚至给邓扣上了这样的帽子：「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等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5章，页361。）

平心而论，毛泽东因言问罪这一执政手法，在处理邓子恢问题时还只是初见端倪，还没有做到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中所做到的那种程度上，至少还没有给邓子恢等人扣上反党集团的罪名。

不过，此事此人在十几年后还是被补批补罚了：此事在1967年11月23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被斥为「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和「砍了二十万个合作社」的滔天罪行；此人则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打成「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在摧毁了邓子恢等人的抵制后，毛泽东便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农业合作化连动。那么，搞的结果如何呢？具体地说，老人家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实农业合作化的？农业合作化究竟给中国农民带来了什么

呢？

当年秋后，毛泽东就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了第二年（1956年）四月，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初级型式合作化（初级社），十月，又有许多省市自治区农村实现了高级形式合作化（高级社），于是，数万万中国农民转眼之间就被老人家领着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是在不到五年的时间（1953-1957年）内，完成了原计划需要十五年的时间（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任务。

速度如此，成效又如何？从全国农村实现合作化到毛泽东本人逝世这二十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获得改善，农民人均粮食没有增加，他们的家庭副业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加以痛割。这期间，他们还经历了一个人为的大饥荒时期，还经历了许多酷烈的政治运动。因此可以说，这一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实为农民的贫闲化和灾难化的过程。

毛泽东过世后，中国农民就起来另搞一套，说是搞所有制不变下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实是搞分田单干，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合作化」以前的状况。

历史似有些残酷：这位原本是农民的儿子竟强使农民原地踏步了二十年，但最终不能阻止他们一等到他离去就开步走，走上了那条他曾千方百计地挡着不让走的路，并把他远远地抛在身后，抛在一个很少有香火供奉的孤寂处。

## 16

据侍从人员回忆，毛泽东晚年经常生病，却不爱吃药，并常与医生闹别扭，有时还搞些恶作剧，作弄那些严格执行保健措施，勤勉为他服务的医生，以致连旁观者都看不过去。（孟晓云口述，郭金荣撰写，《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章。）毛泽东的这种讳疾忌医的偏劲，不仅表现在养生保健上、而且表现在用权上，既不愿吃健体之药，也不愿吃为政之药。而他此时老已将至，体

质和心智都不比以往，尤其他老是坐在那把八面来风的龙椅上，故很容易感冒发烧。易于染病却难于就医，这病也就愈染愈重了。

毛泽东在 1955 年夏天，试图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刚开始还只是发烧，并很快被邓子恢发现病状。但他我行我素，不纳谏，不吃药。结果脑袋越烧越热，以致烧出一个波及整个国家的「冒进」热潮来：一是从生产关系变革方面「烧」到生产力发展速度上，二是从农业「烧」到工业、「烧」到商业、「烧」到其它各行各业。

在此情势下，1956-1967 年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划被完全改写。原计划需要十二年完成的任务如今被要求在三至五年内完成。按改写后的远景规划，到 1967 年时，钢产量为 3,000 万吨，粮产量为 1 亿吨，棉产量为 1 亿担。后来结果是，1967 年的钢为 1,000 万吨，粮为 4,000 万吨，棉为 4,000 万担。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一规划也不可能实现。

1956 年本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也被大加改写。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幅度几乎都在两位数以上，如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增长 70.6%。

当这些计划付诸实践时，很快就出现各种各样问题。例如，资金不足，材料短缺，进而导致开工不足。到了 4 月分，还未开工项目占应开工项目的 1/5。又如，产品质量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甚至生产安全问题也日益严重，大多数煤矿的原煤含矸率都较 1955 年提高，原煤单位成本却超支，同时工伤死亡人数也增长 15%。1956 年始，《人民日报》发元旦社论，喊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数月下来，「多」与「快」，马马虎虎；「好」与「省」，大有问题。

就在毛泽东以及整个国家发烧之际，又有人出来开方送药。此次与先前不同：其一，送药者阵容更大，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领衔，有众多经济部门巨头如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参与；其二，开药者居然让发烧者退烧一年之久，致使中国经济在 1957 年基本达到综合平衡。

直到 1955 年底，周恩来还在为毛泽东喝采，欢欣于社会主义的「建设高潮」，甚至埋怨自己怎么没能早一点发现「新大陆」。可是仅过一个月，他的眉头就开始皱起来。他接到了各种要求追加投资的报告，其追加量远远超过国家财政的承受力，即在国家财政增长 9% 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却要增长 100% 以上。这就好比一大帮饿汉要到一个升斗之家来「吃大户」，当家的能不焦急吗？

周恩来迅即向他所主管的经济部门提出「反冒进」任务，并和他的同事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连地大幅度压缩了三个不切实际的冒进计划：

其一，压缩 1956 年基建投资预算计划。通过所谓「二月促退会议」，把各地各部门报上来的投资计划从 200 亿元压到 147 亿元。后又通过所谓「剃一次平头」，把每一项目投资均减少 5%，故使投资总额再由 147 亿元降至 140 亿元，并报经当年 6 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

其二，压缩第二个五年计划。「二五计划」草案原是在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下编制的，是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的，如他亲自把 1962 年计划钢产由 1,200 万吨改写为 1,500 万吨。显然，压缩这个计划是要冒风险的。国家计委憋了半年时间才勉强强地拿出修订方案。方案最初在一个月內被接连否定两次，最后经多方协调才磕磕碰碰地推出台来。修订者们将那些曾由毛本人钦定的高指标狠砍了几刀，例如，把 1962 年钢产指标由 1,500 万吨砍为 1,050-1,200 万吨，把粮产指标由 6,400 亿斤砍为 5,000 亿斤，把棉产指标由 7,000 万担砍为 4,800 万担，砍的幅度均在 20% 以上。方案由当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批准通过。

其三，压缩 1957 年国民经济预算。1956 年 11 月，中共二中全会再次确认反「冒进」方针，继续采取「退」和「慢」步骤，提出「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策略。为此，国家计划部门将 1957 年预算作了大幅度削减，把各地各部门报上来的基建投资预算从 243 亿元削减为 111 亿元，削减幅度达 54.4%，以致比上一年投资额度 139.9 亿元还要少

20.6%，出现了负增长。1957年也因此成为建国以来少有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年。

周恩来等人紧接在毛泽东「反右倾」后而大搞「反冒进」，即便不能说是针锋相对，至少可以说是另有侧重，换言之，即便不能说是在反对毛泽东，至少可以说是冷落了毛泽东，即把前者晾在一旁而另搞一套。

毛泽东反保守、反右倾的话音刚落，周恩来起而说道：反保守，反右倾，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现在该批「左」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534。）毛泽东仍在欣赏着「多、快、好、省」这一口号，周恩来却把它从由自己主持修订的「二五计划」中划掉，致使人们在一年多时间里不再提到它。

副总理陈云说的话更尖锐。周恩来反「冒进」还要考虑一下各方面平衡问题，讲究一点策略、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反「左」与反「右」连在一起说：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他尽管心里倾向后者而不满前者，但在面子上还要做到各打五十大板。陈云则顾虑少些，直截了当地议论道：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也就是「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555-556。）他这已在说「宁右勿左」的话了。

事后看来，陈云说这些话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执政搞的多为「左」的东西，常常是一而「左」，再而「左」，「左」上加「左」。他在处分人时，也往往是对犯「右倾错误」者予以严厉打击，对犯「左倾错误」者则予以姑息迁就。长此以往，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种「宁左勿右」的风气。陈云反其道而唱出「宁右勿左」的调子，明确表示自己对「右」的偏爱，从而凸显了自己与党主席的分歧。

另外，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人大会议上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反对国家预算制订过程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从而把执政党高层内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歧半明半暗地捅到党外，告知全国。计委主任李富春当着毛泽

东的面，说了「冲昏头脑」这一大不敬话。经委主任薄一波也当着毛泽东的面，痛陈「冒进」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痛陈被后者不无戏谑地称为「薄一波十条」。

对于周恩来等人的这些举动，毛泽东持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当前者在给发热的中国经济服下一副退烧药和浇上一盆冷水时，后者在干什么？

据薄一波记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59，635，641。〕老人家当时对国际上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史达林评价问题倾注了较多的精力，以致于对国内正在进行的「反冒进」采取一种保留态度，用其本人的话说，他那时主要是「防御」，搞了某种「妥协方案」。他虽未直接反击，但心存不快，留下了日后做文章的伏笔。当 1957 年下半年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时，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态度也随之变化，由保留变为批判。

毛泽东批判「反冒进」，从 1957 年 9-10 月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发难，到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做结论，历时八个月。其间还举行「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会会都批「反冒进」。〔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 24 章，第 25 章；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第 3、9、10、11 章。〕

老人家给问题定性很重，将之上升为「政治问题」。他说「反冒进」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泄了六亿人的气，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离右派「大概 50 米远」；甚至说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而他刚把「反冒进」的人封为促退派。他两年前把邓子恢等讥讽为东摇西摆走路的「小脚女人」，现在又把周恩来等说成是慢慢爬行的「蜗牛」。

他对问题处理过严，以致不留情面。在「南宁会议」上，他把周恩来等人的报告同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一起作为反面材料发给大家，指责前者同后者一样，都犯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错误，只

说一个生疮的指头而不谈其它九个健康的指头。他还摇着柯庆施的一篇满纸豪言壮语的文章，当众对周恩来说：你这当总理的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吗？周答写不出来。他又接着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另外，他还责成周恩来等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检讨。显然，作这种检讨是要讲许多违心话的，并且讲的都是自己贬损自己的话。这就使检讨者陷入一种非常窘迫的境况：一是难下笔，对着自己良心，怎么写？二是难开口，对着台下千百双眼睛，怎么说？

曾任周恩来政治秘书的范若愚，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位首长如何写检讨的一幕：（范若愚，〈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人物》，1986年第1期。）周说一句，书记一句，一句一顿；后来停顿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再后便是周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发愣，不说不写，恍恍惚惚，一副苦人儿相。

这的确令人同情，本来就是自己做得很多且又做得不错，至少没有太大的错，现在反要自己做检讨，当众认错，岂不冤枉。周公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但他又是一个极守纪律的人，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无错却强说有错，心中有数却强装无知。这太难为他了。

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痛说自己：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工作上多为「经验主义」，有时为「教条主义」，还有时为「两者的混和」……周自己给自己扣上了许多顶十分难看的大帽子，不免让人想起那句戏词：「老爷息怒，小的该死」。

而陈云、薄一波和李先念也都在大会上作了痛责自己的检讨。

毛泽东指责「反冒进」是「尖锐地针对我」，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使「我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这是在我划线地看待党内意见分歧，把异见看作异己，把不能认同自己的主张看作是蓄意反对自己的主张。

老人家又进一步指责国务院部门搞分散主义，「想把大权揽过去」，对中央实行「封锁」，不让其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这种指责是十分严厉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有着君权至上传统的国家里，说某人封锁中央、揽其大权，也就等于说他欺君罔上、图谋不轨。这可是大大的罪过。

被指责者之一薄一波在几十年后作了一个反驳：「尽管我们这些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或部门有这样那样不周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要进行『一种封锁』，不让中央『参与设计』。凡重大方针政策问题，都是经过政治局或书记处。经济工作的业务量很大，是不可能事事都请毛主席过问的。显然，毛主席的批评是言重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651。）

对于薄一波的反驳，毛泽东已无从回应了。对于其间的非非，笔者也难知详尽。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在老人家的如此指责中，透出了他对权力归属问题极为敏感的心理，透出了他对自己手下握有实权者的猜忌心，以及对自己手中大权是否旁落的警戒心。

从对「反冒进」的批判中，老人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必须采取「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施政方式。

这个结论意味着他将要力排众议而完全按照自己意愿行事，意味着他将要推开众人而率然走上前台直接领导整个国家的经济工作。他对此充满信心，并情不自禁地向人们宣布：「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了，我看是比哪一年都要冒得厉害。」（毛泽东在 1958 年 2 月 18 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653。）

事实果然被他言中。1958 年的确是一个「大冒进」的年分，一个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冒」得厉害年分，或者说是一个「大高烧」的时期、一个往任何时期都要「烧」得厉害的时期。

有病者即有医者，有高烧者即有送药者。可这一次，病生得重，

药也须用得猛。这对两者都是一种考验：

医者有没有勇气开出这付猛药？病者有没有决心服下这付猛药，愿不愿改一改自己身上的那个讳疾忌医的坏脾气？

## 17

毛泽东所预言的「大冒进」，也就是后来的「大跃进」。这是他搞经济建设的代表作，是他坐江山后所办「第一件大事」的高潮部分。

「大跃进」自 1958 年狂飙骤起，到 1961 年不了了之，历时三年。

对于这三年，许多中年以上的大陆中国人至今还存有许多印象。这些印象有的是通过脑子里的某些画面保留下来的，也有的是通过肚子上的某些感受刻储脏腑的。提起这三年，他们一方面会中浮现许多轰轰烈烈的场景：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小高炉林立，大食堂蜂起；另一方面又会在身上激起一种揪心搅腹的感受：一种天天喝稀饭、顿顿灌清汤后的饥饿感，一种五月不知肉味、三月不见油花后的暴饕感。几十年后许多人被问道对当年还有什么印象时，他们答得很干脆：没别的印象，就是饿！那个饿呀……，这时整个国家都处在饥荒中，乡下人饿，城里人也饿，老百姓饿，当官者也饿，连毛泽东女儿也饿，只是大家饿的程度不同而已。

当时人们早上喊着口号去炼钢，晚上空着肚皮来上床，饥肠辘辘，辗转难眠，却又空醒床帟。白天里的热闹劲与夜晚中的困窘感，是一起保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的。此时婴儿出生率急剧跌落下来，整个人口呈负增长势。老人家好不尴尬，一方面在理论上批判马尔萨斯，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上为被批判者提供绝好论据。

「大跃进」者们，最初发誓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结果却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使整个民族陷入一场空前的灾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要唱高调子能唱到何种程度。与此相应，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些唱高调子者的跟斗栽得有多重。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批判「反冒进」，决心加快中国经济建设速度，并要求比苏联老大哥的速度还快些。（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73-474。）

时隔一个月，他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把这个速度具体化了：「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赶上和超过英国。……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页691-692。〕

毛泽东在这里既一吐胸中豪气，又说得十分得体，只是说要赶上英国的钢产量，而没有说也要赶上苏联的速度，没有说我家的老二除了要赶上他家的老二外，还要赶上自家的老大，尽管后者也是他的一个非常真实且非常急切的想法。「十五年赶上英国」，成了「大跃进」初期最响亮的口号，时时可闻其声，处处可见其字。即使许多年后，还能在内地一些老墙断壁上依稀看到这一口号的残迹。这一口号喊的时间不长，就不断被改口。口号前半部的数字被越改越小，以致被改为两年。

1958年初执政党中央在审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还基本上按「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个要求来考虑。尽管已有突破迹象，但还不至于出格。1月南宁会议，还坚持第二个五年计划达到年产钢1,500万吨，其中1958年钢产620万吨。2月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周恩来仍宣称「二五计划」达到年产钢1,500万吨，「三五计划」达到年产钢3,000万吨，「四五计划」达到年产钢4,500万吨。3月成都会议，则提出争取「在比十五年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其中，1958年计划钢产涨至700万吨。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又对一年多前八大一次会议已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作了大幅度修改。仅就1962年即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来看，钢产计划由1,050-1,200万吨涨至2,500-3,000万吨，

增幅一倍以上；粮产计划也由 5,000 亿斤涨至 6,000-7,000 亿斤；棉产计划则由 4,800 万担涨至 6,500-7,500 万担。

冶金部提出钢产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超过美国，年计划钢产 1.2 亿吨。轻工业部提出造纸五年超英国。纺织部提出棉纱、棉布五年超美国。化工部也提出五年超美国。煤炭部则提出两年超英、十年赶美。

毛泽东本人也于欣喜之际说出了这样样的话：「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半年前他在莫斯科所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到此时就显得有些保守、有些小家子气了。

八大二次会议开后不久，共和国经济计划表上又呈热风劲吹、高潮迭起伏。6 月 7 日，冶金部向党中央提出新指标，计划 1962 年钢产 6,000 万吨，比八大二次会议已确认数高出整整一倍。6 月 21 日，冶金部党组再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新计划，预测 1962 年钢产可望达到 8,000-9,000 万吨以上，又比两个星期前上报数高出 2,000 万吨到 3,000 万吨。

在当时国务院各部委中，冶金部可算是最大的一只牛皮篓子，同时也是最为毛泽东主席看重的一个下属部门。该部部长所作的一个大话连天的报告，也被老人家颂之为「一首抒情诗」。

6 月中旬，李富春代表计委、经委以及财政部上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更正式地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其中，1962 年钢产指标为 6,000 万吨，1967 年钢产指标为 1 亿吨以上。毛泽东欣然批道：「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6 月 17 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汇报年度计划，预计 1958 年钢产为 900 万吨，1959 年为 2,000 万吨或 1,000 万吨以上。第二天，薄等又向毛泽东本人汇报，并再度修改指标，预计 1958 年钢产 1,000 万吨，1959 年为 2,500 万吨。6 月 19 日，毛泽东仍不满前一天议定德计划，提议再追加 1958 年计划，于是，钢产指标由 1,000 万吨变为 1,100 万吨（对外宣布为 1,070 万吨）。

6月22日，毛泽东对上述修改计划做出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二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老人家还一时兴起，提笔将所批材料的题目也改了，将原先的「汇报提要」改为「两年超过英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页698-700。）本来老人家已在共和国经济计划书上跑开了6百里快马，但他还嫌这马跑得慢，还要对它用起阵阵响鞭。不知这马还能够跑多快、跑多远？还有没有一个极限处？

仅隔两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8.17-30）又改写了各项计划：

关于1958年计划，毛亲自打电话，又给钢产指标追加50万吨，使之达到1,150万吨，比1957年实际钢产535万吨增长115%左右。

关于1959年计划，钢产指标再增几百万吨，达到2,700-3,000万吨，比1958年指标增长一倍半以上；粮产指标则再增几千万斤，达到8,000亿至1兆斤，比1958年指标增长三成。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62年计划：钢产指标为8,000亿至1兆吨，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前一年1957年实际产量增加13.9至17.7倍；粮产指标为1兆3,000亿万至1兆5,000亿万斤，比1957年增加2.5至3.1倍。

北戴河会后不足3月，郑州会议（1958.11.2-10）又拟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纲要规定第十五年年即1972年钢产指标，不仅要在总量上超过英国，而且要在人均占有量上超过英国。当时预测1972年英国人均产钢量0.5吨，并预测1972年中国人口8亿。依此推算，该年中国钢产要达到4亿吨！

值此，人们终于看到那匹狂奔的快马跑到了它的极限处。

物极必反。年产钢铁4亿吨数字已超过了人的想象。人们望着它不寒而栗，甚至始作俑者本人也开始摇起头来，不禁自己向自己发问：

1972年才搞4亿吨钢，有此可能？有此需要？画中的马画得太理想了，以致画者自己都不敢相信了。于是毛泽东提议，此纲要不公布「只在地下管道流通一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页708-709。）北戴河会议前有一插曲。赫鲁晓夫于7月底至8月初访华。毛泽东兴致冲冲地告诉客人：中国打算今年产钢1,070万吨。客人听完后没有表示出相应的兴致来，只是冷冷地答道：中国同志或许能够做到吧；说完他就不愿再谈下去了，显出一副很是怀疑且又敷衍了事的神情。这无疑使毛感到不是滋味，感到有点被轻视，同时也从反面激励他，激励他非要去做起来不可。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数度强调，要搞好钢的生产，就要有「铁的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对于那些完不成任务者，要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即「六条纪律」）。

毛公扬起秦皇之鞭要抽打他的跃进之马了，要把它从画面上抽打到地面上，从计划书中抽打到实际工作中。令他懊丧不已的是，这匹马在计划书中还跑得四蹄生风，一落到地面上就跑得不如人意了，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以致跑成废马一匹。

必须承认，大跃进之初，上上下下都还能攒着一股子劲，全国各地都还能看到热气腾腾的景象，跃进之马确有些意气风发的劲头。因为，在大跃进的设想中包含了一层良好的愿望，即要尽快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故而很能打动我们这个穷够了苦怕了的民族的心，很能激发起中国老百姓的热情来。

「大办钢铁者」，熬得两眼通红而干劲不减，山上挖矿，风餐露宿；山下炼钢，夜以继日。「大办农业者」，只有农忙而无农闲，种完粮棉修水利，忙完庄稼忙副业，抽空还要烧上几炉铁、几炉钢。然而，大跃进的设想说到底是不切实际的，老百姓一度拼命干的许多事情是违反经济法则的，因而不可能获得预想成果。

1958年钢产量，宣传上说有1,108万吨，事实上只有800万吨可称之为钢，其余均是所谓的「土钢」，即不能当作钢来用的「钢」。1958年铁产量，也因全国各地都生起小高炉而骤增数千万吨，但同时也耗去国家财政补贴40亿元之多（占国家财总收入1/10）。小高炉冶炼本就属落后工艺，再加上由非专业的「广大群众」来操作，效益就可想而知了。平均每炼一吨铁就需补贴100元左右、生产成本是大高炉的3倍。钢铁产量增长很快，但其质量下降更快。生钢的含硫量普遍过高，最高者能超出标准80倍，以致出现有钢铁而不敢造机器的事。冶金工业部报喜，机械工业部发愁。一机部赵尔陆部长摇着破钢铁吼道：我要这东西有什么用？能用它来造机器？赵部长后来带着几箱劣质钢铁上了庐山，打算向党中央毛主席陈述实情，但因老人家拒斥彭德怀谏言、禁谈大跃进过失，而不敢拿出来，隐忍而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与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页138。）

大办钢铁的恶果还波及其它方面。1958年，中国农业风调雨顺，各种作物长势良好，但因大量农村劳力流向城市、流向钢铁工业而造成秋收人手不足，致使许多庄稼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这种情况再加上人民公社刮共产风、吃大锅饭等因素，很快就引发了1959年至1961年间的全国大饥荒。

1976年春，笔者曾去过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看到云岭村前后山上均为茅草漫坡，无一棵象样大树，不免诧异：地处江南深山区，时值阳春花三月，埋应是满山丛林，满目青翠，可眼下是另一番景象。向老乡打听后方知，原来这山上长满了樟树、杉树、栗树等，其中一些树长得有几人合抱那么粗。这就容易理解当年打游击出身的新四军为何要选此地来安置其总部。他们既擅长山林作战，又需要防空屏护，自是要选一林木茂密处以作地形依托。可到了1958年，那些曾经遮荫过叶挺军长的大树都被砍完了，都被砍去烧小高炉了。老乡看四下没人，悄悄地说，「这『大跃进』真是大作孽！」

大跃进之「大」，主要在于声势之大；而声势之「大」，又主要在

于计划指标之大、上报成绩之大。就上面而言，订计划，没有什么指标不敢订的；就下面来说，报成绩，也没有什么数字不敢报的。上上下下都搞出了许多「假大空」的东西。

就其原因看，出自领导，尤其出自毛泽东，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在上面好大喜功，我在下面则胡吹乱拍；你做计划搞指标跑马，我成绩则搞数字爆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就其结果看，遗害社会，造成一种报喜不报忧，说大话吹大牛的风气，以致许多人在弄虚作假上互相攀比、你追我赶、争放「卫星」。

如放小麦亩产「卫星」：

1958年6月8日，河南遂平报2,105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报2,394斤；

6月16日，湖北谷城报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报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报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再报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报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报7,320斤！

如放水稻亩产「卫星」：

6月26日，江西贵溪报2,340斤；

7月22日，福建闽侯报7,275斤；

8月01日，湖北孝感报15,000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报36,900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报43,075斤；

9月18日，广西环江竟报了130,434斤！

〔以上数字均见于同时期的中央以及各省市的大报。〕

亩产13万斤稻谷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意味着这亩地里的每1

平方丈土地都要长出 1 吨稻谷，或每 1 平方公尺土地都要长出 1 百公斤稻谷。这样的「卫星」不仅背离了事实，而且超过了人的想象力。真不知道当时那些人怎么能够把它说出来，且又怎么能够把它堂而皇之地刊于国家大报，公诸天下。如此荒唐事即便与古时「指鹿为马」相比，也难分伯仲，故十之八九要被后人笑它个一百年一千年。

在经济建设领域，毛泽东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战略家。他确有宏观上的想象能力，但缺乏微观上的实际操作能力；长于制作纲要，却疏于订立细则；心高，嘴阔，想大事，说大话，可具体做起来，就显得有些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了。他总爱由着性子干，不讲章法，结果顾此失彼，丢三落四；造了声势，丢了实效；要了数量，丢了质量；办了钢铁，丢了其它。

因此，像他这样雄心有余而耐心不足的执政者，很需要有人替他做具体且繁琐的工作，尤其需要那些遇事多从困难处考虑故而多有补救办法的人，替他收拾遗漏、补短板、打圆场、擦屁股。很难想象，离开了周恩来等人，他毛泽东还能够干什么？还能够那样悠闲地「只管大事小管小事」，还能够那样有时间去翻弄一本本线装书，还能够那样出了纰漏有人兜甚、护着？可他到头来似乎不领这些情，反而常常去责难这些人，奚落这些人，冷嘲周公，热讽陈云。

换句话说，毛泽东比较适合安坐后台就一些方向性问题运筹帷幄，而不太适合跳到前台就一些具体问题指手划脚。他应该尊重和信任他的下属，给他们一定的独立行事权而不横加干涉，可他常常反着来，常常跑到前面把正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挤于一旁而由自己来主持一切。搞农业合作化时，他狠批了直接经管此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然后亲自上阵掀起了所谓「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随后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书时，他又狠批了总理、副总理、计委主任、经委主任和财政部长，接着自己挂帅搞起所谓「大跃进」。可结果如何呢？「社会主义新高潮」搞成了一窝蜂，「大跃进」搞成了大折腾，计划搞成了笑话，可能要贻笑千年的笑话。

显然，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司令官，一个总爱和前线指挥官过不去的司令官。打江山时，他曾嘲笑：「凡是蒋委员长亲自插手的仗总要损兵折将。」轮到他坐江山时，人们也不难发现：「凡是伟大领袖亲自过问的事总要劳民伤财。」

## 18

1958年的中国，在搞「大跃进」的同时，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前者以生产力发展为主要内容，后者则以生产关系变革为主要内容。就后者而言，毛泽东即使不说是始作俑者，至少可说是出力最大的推波助澜者。

早在1955年，毛就有了「办大社」的念头，〔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第41篇，《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拼257-258。〕后因受现实条件限制以及邓子恢等人劝阻而搁置起来。

1958年的春天，毛又提出「小社并大社」问题，并发了相应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1958年4月8日。）是年的七月，陈伯达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毛关于建立「大公社」的构想。（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红旗》，1958年第4期。）

八月上旬，老人家跑马中原，兴致勃勃地巡视了河北徐水、安国、河南新乡、山东历城等地的办大社情况，并于巡视中说了一句大白话：「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数日后，「人民公社好」这五个大字见诸报端，迅即成为惊天动地的口号，响遍全国。当月下旬，北戴河会议作出决议，决定迅速在全国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数万万中国老农民一下子都变成了人民公社新「社员」。

人拔公社既「大」又「公」。平均每个公社的规模相当于原来的28个半农业合作社那么大，拥有4,500多农户。公社以公有制形式占有农村中的一切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并按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方式分配消费资料，如以公共食堂方式向社员提供食物。

有些公社还向非社人员提供食物，把烧好的大米饭抬于路口道旁，免费招待过往行人。这可乐坏了那些肌肠辘辘却又囊中羞涩的赶路人，一个个吃撑得躺在路边不思他往。吃饭不要钱的好事，曾是许多中国农民的梦想，以往只有在造反吃大户时才能做到，如今似乎只要办人民公社就可梦想成真了。当听到安徽舒茶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这位原秋收起义领袖激动不已，并情不自禁地给这美好的图画再添两笔：其一，既然该公社能做到吃饭不要钱，其它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做到；其二，既然现在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可以不要钱。

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最风光的地方，要数老人家曾亲临关照过的河北省徐水县。8月4日，毛泽东视察该地；8月6日，中共中央派专人前去传达指示，要在此地搞共产主义试点；8月22日，中央协同省委、地委帮助县委搞出一个「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规定在1959年完成社会主义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争取在1963年进入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徐水县的人民公社很「大」，大到一县一社，即所谓「县社合一」，县长成了社长；也很「公」，公到对社员大包大揽，从吃饭穿衣到看病送葬统统包起来，即所谓「十五包」。上自县长下至勤杂工都不拿薪金拿津贴。县长或社长月贴8元，普通社员贴2元。于是乎这些新社员们一手攥着1元钱，甩开步子直奔那「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共产主义。

正像「人跃进运动」因违反经济法则而成了一场大折腾一样，「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因超越现实条件而成了一场闹剧。

据当时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提供的报告，10月中旬其治下当阳县跑马乡的党委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一开完，大家就涌上街去拿商店里的东西，拿完了商店就去拿别人家里的东两。张三的鸡李四抓，甲队的菜乙队挖，最后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有一条还保留着，就是老婆还属于自己。不过，那位书记又就此补充道：这一条还

没有最后定下来，还要请示上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页 754-755。）

可以想象，听了书记这番话，村里那帮光棍汉的心中该是怎样一种躁动。跑马乡里真是乱跑马，已经跑过「共产」的坎，快要跑入「共妻」的门。那个由中共中央直接抓的共产主义试点「徐水人民公社」，也是好景不长。县公社翻箱倒柜，东挪两借，好不容易筹到一笔款子来给全县社员发津贴买用品，只维持两个月就维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变成了「空产主义」，吃饭不要钱的事，今天有，过去也有。但情况不同。过去是老百姓造了地主老财的反，吃了他们的陈年粮；如今则是政府干部造了老百姓的孽，挖了他们的穷家底。

中共山东范县（现属河南）第一书记向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作报告，畅谈该县向共产主义过渡规划，保证用三年时间做到：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数日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朗朗上口的规划，颇感兴趣，举笔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 160。）

再让后人来看，老人家的「批示」也「很有意思」，甚至更有意思，偌大把年纪治理偌大个国家竟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一般。不过，这样玩下去的结果不会让人觉着有意思。小孩子玩砸了他的过家家，顶多流两滴他自己的泪；而老人家玩砸了他的过家家，是要闯祸的，是要死人的，是要流许多老百姓的泪的。

## 19

毛泽东搞经济建设，不只是志大才疏，而且脾气也不好，容不得

别人批评自己。大跃进前期，他好高骛远；大跃进后期，他又刚愎自用。不过，在这浮躁与这固执之间还有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即老人家作了一番自我检讨、自我纠正的时期。

毛毕竟是从艰难困境中走出来的，总还不至于完全糊涂。你说他好高骛远，可他也有过认真调查研究的记录；你说他刚愎自用，可他也有过主动纠误的举措。白天里他还兴致勃勃，大话连天；夜深时他又忧心忡忡，辗转难眠，甚至能把许多经管具体事务的下属从被窝中叫出来细细盘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815-816。）

相对缓和时期、自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始，经武昌会议（11月21日至27日）、八届六中全会（11月28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上海会议（3月25日至4月1日）、八届七中全会（4月2日至5日），到庐山会议前半期（7月2日至22日）止，前后八个半月。

在此期间，毛曾经作多次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谈话和批示。他说：「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5亿多农民的年薪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813。）他还在不同场合指出：「我们性子太急了，脑子也太热了，就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而大跃进中存在着『冒险主义的错误』，开了海口，说了大话、作了空想，『务虚名而受质祸』；领导方面是有责任的，不仅下面作假我们相信，而下面的许多假本身就是上面压出来的，即所谓『一吹二压三许愿』」。

他反省道：「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关于客观经济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819。）

「八个月纠左」在具体措施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降低钢铁指标，二是遏制「共产风」。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总理是一个事务主义者，面面俱到，但不会抓住主要矛盾。如今他推开周，自己跑到前台来大抓主要矛盾，提出搞工业应该「以钢为纲」。结果人们很快就看到，紧接着『事务主义者』后，又出现了一个「钢铁强迫症者」。用老人家自己的话说：脑筋里头就是钢了，胡里胡涂、昏昏沉沉而又睡不着，最后不得不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808-815。）

于是，他主持召开的武昌会议把 1959 年钢铁指标，由 2,700-3,000 万吨压缩到 1,800-2,200 万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又将指标压低为 1,800-2,000 万吨，八届七中全会再将指标内降为 1,650 万吨。接着，他又请刚被他批为「右倾」而受到冷落的陈云再度出山，并准其将指标压至 1,300 万吨。

毛泽东承认，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混淆了两个界限：

其一，混淆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界限，具体表现是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对内搞穷富拉平，对外搞任意调拨，即所谓「一平二调」；

其二，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界限，打着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否定按劳分配，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为此，他批评徐水县委书记「急急忙忙往前闯」，批评陈伯达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实际表现得过「左」。毛作批评显然是在解脱自己。「徐水人民公社」的问题，固然有县委书记跑得太快的责任，但也有党中央主席亲临督察并大加鼓励的责任。陈伯达文章固然「左倾」，但文中的主要内容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宣传毛本人关于将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宏伟设想。但在毛对他们的批评中，看不到毛与他们有这些联系。

毛如此对待陈伯达正像他的另一个秘书田家英对他所作的评论：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45。）尽管老人家有点推卸责任，但他还是作了一些纠错的努力。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五个月后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逐步明确人民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承认经济差别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承认商品生产的必要性。这些政策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多多少少遏制了一下正狂吹猛刮着的「共产风」的势头。

当时，对于毛泽东的自我检查和自我纠正，有满意者，也有不满意者。满意者对此大加赞赏，如薄一波说：我们都钦佩毛主席驾驭全局的本领，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深，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比我们醒得早，转得快，抓得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808、817-818、823-824。）

薄说是一个善于把各个方面搞得很平衡的为官之人。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历史事件上，一方面对毛的问题揭得不少，另一方面又不忘颂扬毛的伟大之处。只是前者说得具体些，后者说得抽象些。处理其它一些重要人物关系时，也有类似情况。在其《若下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页 833-835，他称颂陈云同志工作极端细致，关键时刻能够拿出真知灼见。仅隔一页，即在页 837-838，他又称颂邓小平讲话鲜明果断，言简意赅，充满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唯物辩证思想，末了还加一句「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略知中共党史的人都清楚，陈云在大跃进前后所起的正面作用是邓小平难以相比，这也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所起的促进作用是陈云难以相比的一样。两者的上述作为，表现于不同时期。薄公轻轻抹去了这一时间差，而把它们放在相同时期里相提并论，并显得难分仲伯。

另外一些人则对毛所作的上述姿态不以为然，甚至十分不满。在他们看来，8 个月的纠「左」很有局限性，既没有充分认识到错误的

严重性质，也没有深入挖掘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持这种态度的人大都是执政党中的刚正不阿者，以彭德怀将军为其代表。他们敢于犯颜直谏，敢于对毛泽东这艘政治巨舰作出强行拦截。

「大跃进」高潮后的毛泽东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其一，能不能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其二，能不能自己批评自己的错误；其三，能不能容忍别人批评自己的错误。

做到前者，只需要敏锐；做到其次，除有敏锐外，还需要勇气；做到后者，则除有敏锐和勇气外，还需要雅量。对于毛泽东来说，不缺敏锐，有时也不缺勇气，但最缺雅量。执政后的毛泽东成了一个「一触即跳者」，尽管他常常把这顶帽子扣在别人头上。他可以自己来纠自己的「左」，但容不得别人来纠他的「左」。当彭德怀等直言「反左」时，他陡然变色，一改「反左」为「反右」，于是有了庐山政治风向急转、「反右倾」斗争骤起之事。

1950年代中的两场反右斗争有一相似之处，即都是先让畅所欲言、后再因言治罪。1957年夏天，先是示以诚意，鼓励大鸣大放；后又整治大鸣大放者。1959年庐山，先是开「神仙会」，鼓励提意见；后又问罪提意见者。老人家脾气不好，容易恼羞成怒，却又爱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故而害苦了那些城府不深且又好说话的人，使他们接二连三地在他面前栽跟斗，一栽就栽得一辈子或半辈子爬不起来。他还把自己的这种做法称之为「阳谋」，给本来就丰富多彩的中国语言又造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词。

不过，稍作思考就会发现这个词造得文理不通：阳光之下哪来的「谋」，老谋深算又何必示之于「阳」。实际上，「阳谋」这个词，往轻处说，是一种不觉羞愧的自嘲语：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到末了还要自我标榜一下；往重处说，是一种破罐破摔的刁蛮话：没错，我就是耍算计你；并且，我还要堂而皇之地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的，你敢不服气吗？活脱脱一副恶猫戏鼠的模样。〔毛泽东：「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

——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331。）

这不免使人想起作家王朔的那句名言：

「我是流氓，我怕谁！？」

## 20

庐山会议之初，毛泽东等中央常委列出 19 个问题以供讨论，（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26-33。）目的是让那些刚从「大跃进」火线上被召回来的各方大员，从「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沉下心来总结经验教训。与会者对此反应不一：

高烧未退者，只爱说经验不愿谈教训；

不再发烧但看脸色说话者，吞吞吐吐地谈教训；

不再发烧且又不看脸色说话者，则快人快语地谈教训，其中谈得最重者亦是谈得最好者当数彭德怀将军。

彭将军庐山谏言由两部分组成：

其一，他在 7 月 3 日至 7 月 10 日八天中的七次发言和插话；（《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页 588-59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页 855-856；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27-128。）

其二，他于 7 月 14 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即所谓的「万言书」。（全文载于《彭德怀传》，页 595-601。）

彭德怀的这些言论概括起来说，既对事又对人。对事，揭露大跃进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人，指出毛泽东身上所染有的种种毛病。据李锐记载，毛泽东后来在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时说过这样的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96。）他的这一说法实是对彭将军批评的一种响应，只是响应得太过度。

彭德怀「对事」的批评，涉及所批「事」的三个方面，即范围、

程度和性质。就范围说，他指出这一时期出现一系列重大失误，既涉及大跃进问题，如基本建设「过急过快」，大炼钢铁费钱费物，其财政铺贴「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来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又涉及人民公社化问题，如所有制问题「曾有一段混乱」，「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就程度说，他指出所暴露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达到影响各阶级间关系和各阶层间关系的地步，「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并且，这一错误虽盛行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就性质说，彭德怀把面批评的「事」判定为「左倾」错误。这也是他庐山言论的重心所在。

所谓「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超越客观现实而作空想盲动。彭将军的批评紧紧抓住这一点：

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办早了」，没有经过高级社充分发展阶段、没有经过实验，就贸然兴办；大炼钢铁也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没有全面地考虑各种制约关系，就仓促上马；铺张浪费，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任务指针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代替经济法则，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就中共政治运作方式看，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路线」错误。它出自最高领导机关，有关党的大政方针，故能影响全局。

就中共自身发展历史看，最严重的「路线」错误莫过于「左倾路线」错误。如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中共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其中的王明「左倾路线」，几乎造成全军覆没的后果。诚然，陈独秀「右倾路线」也给中共带来严重危害，但比不上王明「左倾路线」。前者导致数万党人牺牲，后者则导致数十万人马损失；前者只是丢了脑袋，后者则不仅丢了脑袋，而且丢了军队、丢了根据地。若再顺着中共历史向后看，就会发现该党执政后仍是「左倾」错误最有危害性。

就中共党内斗争结局看，最声名狼藉的「路线」错误莫过于「左倾路线」错误。它曾被揭得最深，批得最透。中共曾在延安开展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整风」运动，主要批判「左倾路线」，并从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各个方面来整治「左倾」人物，结果搞臭了「左倾路线」以及与「左倾路线」有过关系的人和事。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相持苦熬阶段，毛泽东却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将领，召回中共大后方延安搞「整风」。一整就整了好几年，整去半个抗战时期；一整就整到抗战快结束，整得自己手忙脚乱。那边的「鬼子」投降，这边的「首长」却在开大会。情急之下，诸将领只好仓促赶往抗日前线，率起已脱离自己指挥数年的抗日军队，夺败兵之城，缴降兵之械，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毛泽东在此时此地发动如此大规模整风运动，虽能为一些中共党人理解，但也使许多国人生出疑问：毛泽东似是把党内斗争看得高于民族斗争，把「反左」看得重于「抗日」。

延安整风后期，中共中央形成一个重要文件，即〈关于若下历史问题的决议〉，（全文载于《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 955-1002。）全面总结自建党以来历次路线斗争经验教训。其中，谈「左倾路线」教训部分，占总篇幅 80%以上。

文件概括出「左倾路线」的一些特点，例如，表现为「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

又如，「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 959，994。）

因此，当彭德怀在信中谈到「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时，就已在给毛泽东对号入座了，就已在用一种外人不大熟悉而他和毛都很清楚德语系统来给后者定性了。

再就毛泽东个人荣辱史看，一方面，他在党内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在于受到「左倾路线」排挤，被撤掉了红军总政委，前委总书记等职务，被驱逐于当时至关重要的军权之外；另一方面，他在党内所获得的最人成功也就在于推翻「左倾路线」统治，进而执掌中共中央大权。如今彭竟也把他当做「左倾」来批评，竟也用起他曾经用来批评别人的话来批评他本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据李锐记述，（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35-153。）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刚被印发出来时，与会者们还摸不清人家的反应，还没有把「意见书」当作「反党纲领」，但都能感觉到信中「有刺」，即便是十分赞成彭德怀的人也不例外。黄克诚大将说他粗看了一下，就发现信中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尽管照实际情况，还可说得重些。这「有刺」，指的就是彭德怀信中有一些话很能戳痛正坐镇山上左右会议的毛泽东主席。

彭德怀「对人」的批评，也触及三方面问题，即有关毛泽东个人的责任问题、能力问题以及作风问题。

关于 1958 年失误的责任问题，彭德怀说：「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显然，这是话里有话：每个人都有责任，但每个人的责任并不一样，至少毛泽东的责任和他彭德怀的责任不一样，前者是主动犯错误，后者只是没有能够阻止前者犯错误。若再进一步分析「意见书」所历数的一桩桩错误，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是由毛泽东本人或直接倡导或大力推广的。对此，毛本人也不得不予承认。他在 7 月 23 日的讲话中反复提到，自己是「始作俑者」，「第一个责任是我」。

诚然，彭将军也反复提到，「不要追究责任」。但是，不要追究责

任不等于不要明确责任，不等于不要搞清楚问题。否则，干什么事都较真、都要弄个明由的彭老总，就没有必要去写这惹人生气招人嫌的「意见书」了。

再者，彭德怀说不追究责任，即不追究确有责任者的责任，言辞间显示出一种高姿态来：我老彭是能够原谅你老毛的，不想抓着你不放。可是，对于一贯居高临下、心高气傲的毛泽东来说，受人宽恕原宥比遭人穷追猛打，似乎更难以忍受。他后来在其批彭讲话中，屡屡表露出不想领彭德怀这个情的怨愤来。

在「意见书」中，彭德怀对毛泽东搞经济建设的能力也表示怀疑。他写了这样一句后来引起许多非难的话：「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两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显然彭的话意是说，你老毛搞经济赶不上搞政治。这句话在当时特定背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刺耳。不久前，毛泽东先是数落邓子恢等人「像小脚女人一样走路」，后又嘲讽周恩来、陈云等人「像蜗牛一样爬行」。如今，他亲自跑到前台上来抓经济，结果也不怎么样，还不如他所批评的那些人。

就连毛身边的人也有这种看法。他的几位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在一起议论时，「有一共同观点：1958年由主席自己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他自己也觉得应当如何来转弯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7-18。）

不过，老人家的面子还拉不下来。一次在与谭震林、田家英谈话时，他突然提起此事，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7-18。）如今彭将军又提惹他上火的事，不难想象，这回他要将庐山上的桌子拍得更响了。另外，彭德怀还谈到工作方法上的问题：有任务指针而缺乏具体措施，有冲天干劲而缺乏科学分析，混淆了战略布局与具体策略、长远方针与当前步骤等等关系，脑子热得很，手脚乱得很。

读到彭将军的这些话，很容易使人想起「志大才疏」的这句成语。而彭本人也爱用此话，曾用它来评价胡宗南、评价周盘。后者是他在湘军时的上司。（《彭德怀传》，页 297-298；《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 年），页 59，75。）不过，他如今的上司与他过去的上司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位毛上司虽在搞经济上有些才短，但再搞政治上、在与人相斗上才高八斗，是那位周上司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还对毛泽东的领导作风问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批评后者决策专断，工作浮躁，有时还撒点小谎。

彭在西北组讨论中讲了一段很重的话：「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明白人一听此话就知道他老彭在说谁了。因为，像这种个人专断现象，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但中央最严重。他还谈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他也批评：「由于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显然，这前一句说的是「群众」，后一句说的是「毛主席」，说他偏听偏信。

彭又指出：「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这里所谓「算账派」、「观潮派」，都是毛常爱说的话，都是他常拿在手里随时准备扣出去的帽子。老人家到前台搞经济之初，就多了一个心眼，预先准备了诸如「算账派」、「观潮派」这类帽子，把话抢说在前面，好堵日后批评者的嘴。这尽管没堵住彭将军的嘴，但还是堵了大多数人的嘴。

由于执政党主席好给人扣帽子，故在该党中形成一种很不好的说话风气，即许多人不是先按自己的想法说话，而是先摸领导人的心理再说话。其中摸得最好者，当数「柯老」，即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如薄一波二十年后所言：「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373。）

另据李锐记述，庐山会议期间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员，纷纷向他和周小舟、周惠等能进出「美庐」、能和主席一聊几个小时的人打听情况，揣摩风向，对小道消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显然，这种兴趣不那么高雅，甚至有些格调低下。可这种兴趣后来竟成了许多执政党官吏的一种嗜好，成了他们之所以能够爬上高位或之所以能够安坐高位的一种必备素质。

彭还把堵塞言路问题提高到「路线」上来：「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三言两语，道出了中共党内斗争的重大隐情。不让人讲话，是「左倾路线」的一个重要特点。1920、1930年代的『左』是如此，1950、1960年代的『左』也是如此，1980、1990年代的『左』又是如此。与此相应，不让人讲话，也是「左倾路线」难以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讳疾忌医，怎能够治好病？

实际上，毛本人也曾多次被「左倾路线」剥夺过发言权。对此，他耿耿于怀，几十年间唠唠叨叨、不断重提此事，既向党内人唠叨，又向党外人唠叨，甚至见了外国人也唠叨。1949年底，这位中国「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出国，刚见到那位比他更傲慢的斯大林时，就抱怨说自己曾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页434-437。）

如今，被别人剥夺发言权的人也剥夺别人的发言权，抱怨别人的人也被别人抱怨。因此，对于他不让人讲话这一专断作风的批评，也就有了双重意义：一是现实批评，就事讲事；二是历史嘲讽，嘲讽此人台下被人欺台上亦欺人。尤其当这个批评是由彭德怀这位知根知底的老同事说出来时，就更显得有「刺」了。

彭还谈到工作作风上的问题：「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吹遍各地各部门」，竟使「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也迷惑了许多人，搞乱了许多工作。这里的用词也是相当尖锐的，也是那位耳不顺的六旬老人难以消受的。

在西北组讨论会上，彭还谈了这样一件小事不小或大事不大的事情：他不久前去过毛泽东家乡的社，了解到这个公社在吃国家偏饭、得到政府许多扶助的情况下，只增产 14%，却虚报了比这高得多的数字。毛本人也刚去过这个公社。彭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毛回答说他在那里没谈过这个事。彭不相信他的话，「我看他是谈过的」。这实际上是说：我们的毛主席也在那里撒谎。

今天回过头来看，彭将军也太认真了。像毛这样的「大政治家」撒点小谎又算得了什么，可他非要把这当作一回事给捅出来不可。这或许能说明后者当将军对以，当政治家尤其是当中国政治家就很有问题了：大事小事都爱摸老虎屁股，到头来还能有他的好？

## 21

总的说来，上述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既有准确性一面，也有严厉性一面。人们对于前者异议不大，对于后者则有不同看法。

事隔许多年后，许多人为彭德怀抱不平，说彭总的信除了少数言辞较尖锐外，其它说法都较和缓，并强调彭总还没有把他所知道的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写出来，（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33-134。）因而他写出来的话并不重。供在笔者看来，人们可以认为彭总没有写出或说出他所知道的所有问题，但不能认为彭总对毛的批评不重。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语言有公共语言亦有私人语言，或者说，被一定人所表述出来的一定说法有公共性质亦有私人性质：既有能为一般人所知晓的层面，也有仅为某些人所理解的层面。前者能够唤起多数人的一般认知力，后者仅能激活少数人的特有领悟力。尤其是在那些曾长期密切相处过的人之间，其语言表述意义的特殊性就更加突出了。特殊的生活交往经历产生特殊的语言交流系统，即在内涵上比公共语言更为丰富的私人语言系统。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处几十年，既有患难与共时，也有意见分歧时，

恩恩怨怨，相知颇深。一方说之一二，另一方则悟之八九，其字面上的直陈意义要远远少于其语气中的蕴含意义，彭信中的一些话，在别人看来较一般化，只是描述一些事实而已，但在彭与毛之间则有可能蕴涵着特殊的意义，有可能激活他们内心最深层的东西，或有可能刺到对方身上最敏感的地方。前文提到的那些话，如搞经济不像搞政治那样得心应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容易导致「左」的东西、「左」的一来就不让人讲话等，都是很有「刺」的。很可能，彭信中还有一些常人读来不觉如何而毛公读来一触即跳的话，至今未被人们充分注意到，或许永远不会被人们充分理解了，人去而言空。

不管怎么说，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是相当重的，是其它中共高层领导人所不敢为之的。可以说，毛自坐稳主席位子到睡进纪念堂中这数十年间在党内所受到的最严厉批评，莫过于彭的庐山言论了。

毛泽东曾作一诗称颂战场上的彭德怀，其中两句：

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自述》，页 206-207。）

后人也可套用此话来称颂庐山上的彭老总：

谁敢当朝横骂，又见彭大将军。

亚里斯多德在其《雅典政治》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亚里斯多德，《雅典政治》（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页 17。〕

当野心家珀西斯特勒图斯建立私人卫队以谋求独裁权力时，大立法者梭伦挺身而出，说他比一些人聪明，因为这些人还看不出珀氏的野心，而他梭伦看到了；又说他比另一些人勇敢，因为这些人也看出了珀氏的野心却不敢说出来，而他梭伦看到了就说出来了。

彭德怀在庐山上似也如此。彭德怀比与会者中的一些人聪明，例如比「谭老板」（谭震林）、「贺胡子」（贺龙）等人要聪明得多。因为这些人当时就根本没有看清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深远影响。前者谭副总理，大跃进时数他最卖力，是毛公挂帅搞经济分遣在农业方面的先锋

官；庐山会议时又数他最护短（不过，此公护短与「柯老」护短有所不同），与彭德怀争执，与黄克诚大吵。可事隔数年后（1967年2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上的位置，颇有些近似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的位置。这一次轮到他向毛的错误发难了，结果也像彭将军一样被打倒，并被扣上「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谭老板如此扮演历史角色，让后人看来不像是一个明白人所做的事。

后者贺副总理且贺元帅，竟也坚信大跃进的神话，并积极参与整治彭德怀的活动，甚至把后者与他闲聊时讲的一些话也当做错误言论告发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44。）使之成为彭将军的一条「罪证」。然而，历史也不厚待此公，事过七年后，贺某也跌落到彭将军的地步上，甚至跌落得更惨，被关押两年半就去世了，死在彭之前。后人读到这段历史，除了对毛过河拆桥感到愤愤不平外，对贺的荣辱升降也不免生出些疑问来：你贺老总也多少有些元帅风骨，做事怎能这样小家子气，看问题也怎能看不出这一点：他老毛既然能够把全军战功最大的彭元帅整倒，那么也能够翻过手来把你这个排行老五的贺元帅收拾掉，而且收拾起来要容易得多。贺某这种助毛整人又为毛所整的历史结局，让后人看来也觉着他不怎么明智，至少不比彭明智。

显然，彭德怀比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人要勇敢得多。因为这些人也看出问题，甚至看得更充分些；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像彭德怀那样痛快地说出来，没能够像彭德怀那样敢于扭住毛泽东不放而非要讨个明白说法不可。尤其是当毛泽东决定要整倒彭德怀时，这些共和国大员们不仅没有劝阻他，反而屈服于他的压力，助其为虐，落井下石，置彭大将军于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境地。可悲的，彭将军上书既是替中国的老百姓说话，也是替他们这几位常在老人家面前行走的人说话，说他们想说而不好说或不敢说的话。他本是替这些人说话，结果却代这些人受过，甚至为这些人所毁。

彭德怀官在国防部长任上，主要管的是军事而不济。在出席庐山会议的中共高层官员中，就数他老彭管的事离会议原定内容最远。对

于当时国家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不会比周恩来、刘少奇、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了解更多、更具体。可会议的实际情况是，也就数他这位管军事的将领谈经济问题谈得最来兴致、最为透彻。笔者回头翻看前面的文字，看到文中屡屡出现「彭将军说」的话，可「说」的内容尽是些与军事问题涉及不多、与将军职责关系不大的事情，不禁哑然失笑。

很显然，彭将军于庐山上大谈经济问题，是在为别人担载，替别人着想。据《彭德怀传》记载，「彭德怀曾对人谈过他在写这封信前的一些考虑：他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比较适当。」（《彭德怀传》，页 60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29。）许多年过去了，当我们看到这个「比较适当」的实际结果后，不能不觉出这段话中隐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襟怀。庐山会议开到 7 月 23 日前，彭将军比一些人聪明而说的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比另外一些人勇敢而说的话也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不久，从「美庐」这所整个庐山中最具神秘性、最显幽深感的房子里闪出一个胖大身影，急冲冲而来，要向彭将军索取说聪明话、说勇敢话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共历史上一场最荒唐、最富有戏剧性的批判会揭幕了。

## 22

1959 年 7 月 23 日晨，住在庐山牯岭一带别墅里的「神仙」客们接到通知：上午开大会，主席要讲话。对此，他们既感突然，又不感突然。

说突然嘛，这是临时改变会议议程，连那几大常委都未能预知。（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64。）

说不突然嘛，会开到这个时节，主席也该出来讲话了。早先开的

是「神仙会」(毛泽东语): 会外, 岭上岭下, 游兴大作, 诗风劲吹; 会内, 云里雾中, 闪烁其辞, 不得要领。如此会况, 急坏了那位上山想谈实事不想当神仙的彭将军, 急得他一时性起, 抓起笔来写了一通自己想说的话, 并以信的形式呈递老人家。后者则将此信印发出来, 要大家开会议论。可是, 大多数「神仙」仍是语焉不详。他们很为难, 不说小好, 开会岂能无话; 说也不好, 不知主席用意究竟如何。于是, 诸「神仙」一面指指点点彭总的意见, 一面又不时转过头来张望「美庐」的动静, 回眸中自有几分期待: 虎已啸, 龙岂能不吟?

老人家终于出来讲话了, 并一发而小可收。(李锐, 《庐山会议实录》, 其中, 毛泽东 7 月 23 日大会讲话, 见页 165-176; 毛泽东 7 月 26 日指示, 见页 196; 毛泽东 7 月 26 日〈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见页 196-197; 毛泽东 7 月 29 日会讲话, 见页 207-208; 毛泽东 7 月 30 日召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 见页 209-210; 毛泽东 7 月 31 日常委会讲话, 见页 216-225; 毛泽东 8 月 1 日常委会讲话, 见页 226-259; 毛泽东两次常委会后留列席会议的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 见页 259-260; 毛泽东 8 月 2 日大会讲话, 见页 263-267; 毛泽东 8 月 2 日给张闻天的信, 见页 267-268; 毛泽东于会议期间若干批语, 见页 268-275; 毛泽东 8 月 11 日大会讲话, 见页 326-333; 毛泽东 8 月 16 日大会讲话, 见页 344-351; 《彭德怀传》, 第 33、34 章。) 开场白, 别具风格:

你们讲了那么多, 允许我讲个把钟头, 可不可以? 吃了三次安眠药, 睡不着。

话一出口便带几分情绪: 一个想什么时候开会就什么时候开会、想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的人, 居然也恳请别人听他讲话。说是要「讲个把钟头」, 结果一讲就讲了三个钟头。说是吃了三次安眠药都「睡不着」, 如果睡着了又怎样? 无疑会议将推后, 重大事件日期将改写, 而大多数与会者也不至于如此仓促赴会。可见, 此人给其党史留下的痕迹太个人化, 也太随意。

结束语，风格别具：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

用词不雅，但道出了某种稀真实的情状：从字面上看，道出了一个便秘患者终于能离开马桶时的感觉；从话里含义来说，则道出了一个「与人斗其乐无穷」者在向对手作出打击后的心态。不过，他舒服了，别人就不舒服了。据李锐回忆，他们当时的感受「无异于晴天霹雳，闷头一棒。」（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76。）显然，在此公那种「拉出来就舒服」的感觉中，包含着让对手听进去就大大不舒服的预期。他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是以让对手其苦无比为铺垫的。

结构上看，毛讲话与彭德怀《意见书》相似，都是不对称的，都有前后两个不成比例的部分：前部分有条件地赞成对方，篇幅较小；后部分则严厉地批评对方，篇幅较大，是整个结构的重心所在。从这里也可看出我们民族礼仪文化或面子文化的某种特点：即便马上就要狠狠地打将起来，也不忘礼数、不忘先客气一番，说声「承让」。不过，比起彭信，毛讲话的结构不对称性要更突出些，前部分轻描淡写，后部分浓墨重染、肆无忌惮。

讲话一开始，毛公就批评那些较「左」的人，说他们「一触即跳」，听不得坏话；转而又要他们「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劝他们要养成听得下坏话的「习惯」。这一段言词话里有话，说是批评，实为呵护。不难想象当时台下那些听众的神情，快乐「神仙」成了烦恼罗汉，一脸子迷惑。

接下来，毛公开始批评那些离右派「只差卅公里」的动摇分子。彭德怀的意见开始有了正式答复，并且是没完没了的答复。

毛先说自己，说他现在与年青时有些不同，那时「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听他一两个星期」；不过，有一点自始至终没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

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

毛在实际使用这个原则时，不仅做到人若犯他，他必犯人；而且做到人若犯其一，他必报其十，翻番倒算，加倍返还。彭仅在庐山以个人名义向他提意见，他则在长达十余年间发动整个中央以致全党全军全国来对彭进行声讨，前者只说得他不中听，他却整得人家不能过。在他这里，不仅有文章结构的不对称，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对称。他可以负人，人不可以负他，颇有些曹孟德气度。

彭写信给他个人，他却把这信公诸大会，让众人来评头论足，说长道短。彭为此火冒三丈，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他答道：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彭听后，或因不善辞令，或因气胡涂了，竟一时语塞，答不上话来。（《彭德怀传》，页 612。）

其实，彭很在理上：不错，我没有讲不要印发，但我也没有讲要印发，不印发至少有一半理，故在发不发时你也应该问我一下；何况这事关重大，就更应该左右掂量了；再说咱们同志相识数十年，住所相距数百尺，通个气，打声招呼，不至于太难。

毛泽东的辩解无疑是一种言不由衷且很难站住脚的托词。按照他答复彭的意思：如果你彭德怀在信上注明，此书信仅供我一人阅，请勿外传，那么，我老毛也会遵嘱照办。好像诺大个事只怪老彭少写了几个字。

这种假设本身是不能成不立的。其一，彭德怀不可能加上那么一句话。这不合常理常情，尤不合彭将军那种坦荡性情。何况他给毛泽东写信，既不属暗中密报，也不为私下交易，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加上这么一句故作神秘、不伦不类的话。其二，即使彭将军写上诸如「勿得外传」之类的话，收信者也未必不把它公诸于外。毛何许人？为了「革命需要」，什么做不出来。

彭德怀只是在小组会上批评毛泽东，毛泽东则开大会批判彭德怀。他除了在 7 月 23 日大会上正式批彭外，又在 8 月 2 日、11 日、16 日

召开的全体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继续对彭及其支持者冷嘲热讽，给他们上纲上线。他还于7月31日、8月1日召开常委会，纠合其它中共顶尖人物，联袂整彭，一起来翻彭的历史老账，数落彭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在整彭德怀过程中，尽管有不少人打小报告、吹耳边风、献计献策，但主要导演者还是毛本人。他首先设陷，抛出彭信；继而紧逼，又是讲话又是批文；最后开中央全会做结论，把彭等打为叛臣。

7月16日，毛抛出彭的信，责成会议讨论。在7月23日前，会议讨论彭信的总体情况是：极少数人或完全赞成，或完全反对；大多数人都基本同意，只是对其中一些尖锐的提法有异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35-136；《彭德怀传》，页603。）

到了7月23日，毛亲作批彭讲话，一人扭转整个会议形势，促使多数与会者改变态度，开始批评彭总。在7月26日前，大家的态度还比较冷静，批评的语气较缓和，会议的气氛也较正常。（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80。）

到了7月26日，毛作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96。）于是，会议批判升级，将彭德怀等人的犯颜直谏，指责为有组织的反党活动。这又是一人烧火，大家发热。

其后，毛继续作讲话、批文件，调子越唱越高，口气越说越重，甚至亲自扣帽子。像「猖狂进攻」、「军事俱乐部」这类热得烫人的词，均出自他的口。在整个批彭过程中，每个关键场合都可以看到老人家的身影，每个关键时刻都可以听到老人家的声音。无怪乎当年受害者之一李锐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称此人所作所为「无不直接起着如鼓风机对高炉升温的作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68。）

彭德怀批评毛泽东时，有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谈其事，有失败也有成功；谈其人，有长处也有短处。轮到毛批彭时，则全盘否定：

谈事，一团漆黑；谈人，一无是处。

彭说毛在经济上犯了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毛则反斥彭在政治上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它领导同志」。

彭说毛领导作风专断，听不得反面意见，毛则反斥彭「最不民主，最专制」，对下粗暴、专横，「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并且还「闹独立王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进行宗派主义分裂党的活动」。

毛的这种反弹，何止是「一触即跳」，更像是「跳起来就打」，「打起来便往死里整」。然而，厉害不等于有理。毛对彭的反弹实为霸道，而彭对毛的批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毛泽东被彭德怀所批评的错误，是一种很可能要贻笑千年的错误。如放「亩产 13 万斤稻」的卫星，订「1974 年钢产 4 亿吨」之计划，都将成为历史大笑料。毛泽东在拒绝彭德怀批评后所继续犯下的错误，是一种很可能要留骂千古的错误。如国民经济倒退十年、人口损失数千万，都是我们民族的大悲剧、大惨祸。尤其是在和平时且正常年景下，一次性饿死那么多人的惨况，肯定是前无古人，并很可能后无来者的。

另外在思想上，彭德怀只是批评毛方法不当，毛泽东则反过来斥责彭立场反动。

彭说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则反斥彭挂着马列主义招牌，「实质上一脑子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还有某些封建残余思想」。彭说他有「主观主义」的倾向，他则反斥彭有「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

据李锐记述，在 8 月 1 日常委会上，毛泽东专门批了彭德怀的所谓「经验主义世界观」。（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227-237。）他对彭说：你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你本来就不懂

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经验主义。可问题是，你「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就承认自己结经验主义，岂不知；还不懂得经验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就觉着讲经验主义会「舒服点」；殊不知，这是涉及宇宙观和法论的，是「不好随便承认的」。左一个「你不懂」，右一个「你不懂」，在不到五千字的讲话记录稿中竟出现七次之多。

与此相应，他还摆出一副你不懂我来告诉你的姿态，大谈马克思主义 ABC，并不时引些听讲者未必熟悉的外国人的名字和历史上的故事，言辞间多有对彭的轻蔑与嘲讽，以伶牙欺刚正，以利齿辱厚重。实际上，毛所说出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许多问题。他指责别人不懂许多东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这些东西。

比如，他说经验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还说得过去；但又说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就不准确了。因为，经验主义是一外延较大的概念，不仅包括马赫哲学，而且还包括其它哲学，上自古希腊普鲁泰戈拉哲学，中有英国经验论，下至本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哲学。马赫哲学只是经验主义一种，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故不等于经验主义本身。我们可以说马赫主义是经验主义，但不能说经验主义是马赫主义。这就如同可以说男人是人而不能说人是男人一样。

另外，毛还告诫彭德怀，「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此说法也是有问题。按毛屡屡引为权威的经典作家的说法，在经验主义哲学中，既有唯心主义派别，也有唯物主义派别，后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马克思称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中文版），页 163。）恩格斯则称霍布斯为「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 世纪意义上的）」；（〈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10.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中文版），页 703。）列宁则说，从洛克出发，既可以「走向唯我论」（贝克莱）；也可以「走向唯物主义（狄德罗）」。（列宁，〈唯

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中文版），页 85-86。）因此，把经验主义断然认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颇为勉强。

再者，毛所引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列宁的一部很有局限性的哲学著作，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当时的学术进展。例如，列宁对当时业已出现的相对论、量子论等重大科学突破知之不多，却十分断然地去批判那些与上述科学成就有密切关系的哲学学说，从而使该书成为一本过于政治化、过于党派化的哲学文献。

当然，毛也不完全有失谦虚风度，毕竟还承认，「我也不懂多少理论，不是教授，只是知道一些。教授要读很多书。我书读得少，是什么意思，大体懂一点。」可问题是，他虽然「只是知道一些」，但不妨碍自己好为人师，不妨碍自己在彭将军面前以及众人面前侃侃而谈。

又，他屡屡嘲讽彭德怀不懂马克思主义，尤其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他自己又懂得多少呢？诚然，我们不能说他完全不懂这一学说。他好歹也是上了「马恩列斯毛」排行榜的，是入了「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之列的，是在马氏宗祠中享有一块牌位的。不过，稍加审视，就会发现这位中国导师与那些外籍导师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理解就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解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

在毛看来，阶级斗争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有时两者就是一回事，讲阶级斗争就是讲历史唯物主义。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都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 1491。）这段话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不会很陌生。它曾被收入在那本「小红书」中的显著位置上（《毛主席语录》第 2 篇第 1 条），曾被千百万「革命群众」反反复复诵读过。

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原创者那里，有着与毛不同的说法，马克思曾十分严肃地声明，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发明的，而是资产阶级学者首创的：「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中文版），页509。）

在这一段话中，谈及与谈话者本人有关的阶级斗争一词，只有一处，即谈话者本人所称的第二点「新贡献」；并且，这一「新贡献」的主要之点，仅在于指出阶级斗争最终结果如何，即「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在于揭示阶级斗争本身性状如何。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本究竟如何呢？按一般公认的说法，就是创始者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写的那一段话：「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

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页32-33。）

在马克思这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总结性陈辞中，也没有提到阶级斗争一词，只提到了一下与它有些相近的「社会革命」一词，并且，所谈重心也仅在于揭示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如何，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生对抗性矛盾，而不在于阐述社会革命本身的性质如何。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对于动辄就向人们挥舞「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大旗的毛泽东来说，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

不过，从上述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此公那种我行我素、不落旧套的个性来。他是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来对待马克思这位「全世界无产阶级」最高导师的，不是按照马克思的本义来理解马克思，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乃至塑造马克思。

他自己觉着「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就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这方面的东西：不合其意的，即使连篇累牍，也视而不见；合乎其意的，哪怕只言片语，也要大加发挥，以致搞出了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个不伦不类的马克思学说，一个能把彭将军脑袋侃得发晕的高深理论。

## 23

毛泽东对彭德怀除了上述治批判和思想批判外，还作了许多历史批判。彭批评毛与毛批判彭，都是「对事也对人」。不过，前者的批评只是针对此一时的事和人；后者的批判既针对此一时的事和人，又针对彼一时的事和人，将前前后后31年（1928-1959）间的事和人都翻出来数落一番。

通观庐山批彭言论——毛主席三番五次讲话、众大员七嘴八舌帮腔，其间最有谈论内容且最显谈者品性的话题，莫过于清算彭将军历史旧账了。算账者，翻箱倒柜，东拉西扯，扯出了几十年间的党史；泄愤者，敞其私处，倾其积怨，流落了许多心底的东西。

7月23日，毛在其第一次批彭讲话中就指出：〔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70；以下所引毛泽东在庐山的讲话均见该书有关部分。〕「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不过，他此次只是笼统说说，没有具体说明有哪些个「关键时」，是怎样个「不坚定」。

此后，毛泽东频频讲话，对上述提法详加说明。尤其在两次常委会（7月31日，8月1日）上，毛唱主角，其它几位常委当配角，对彭德怀数十年历史作了全而清算。

毛所谓「关键时」，主要指中共党内重大路线斗争时期。在7月23日讲话中，他说中共党史上有4条错误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二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此为粗算。在7月31日讲话中，他又说中共党史上有8条错误路线：五次右倾路线，即陈独秀路线，罗章龙路线，张国焘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三次左倾路线，即瞿秋白路线，李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此为细算。8月16日，他主持通过八届八中全会有关决议，判定彭德怀等人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此又为新算。

毛所谓「动摇」，是指中共党内一些人在上述错误路线泛滥时或推波助澜或随波逐流。其中，动摇于右倾路线者，或搞阶级妥协或另立山头，易犯投降主义或分裂主义的错误；动摇于左倾路线者，超越客观质际而盲动蛮干，易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毛所历数的这九次错误路线中，有三次与彭牵扯不上。彭1928年春入党，同年夏起义，故与在此之前发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无缘。彭起义后便率军纵横湘赣边区，故又与在白区中发生的「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无缘。其余六次路线斗争均与彭有或多或少联系。

毛总体评价彭：自加盟革命后，大多数「关键时」都「动摇」，大多数路线错误都有分，在六次路线斗争中有五次犯错误，或犯左倾错误或犯右倾错误，或负跟随之责或负领导之责。

即便是彭唯一一次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作为，也很难容于毛，很难为他称道。在这次路线冲突中，彭支持毛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毛承认彭的基本立场没有错误，但认为彭的方式方法很成问题。

据《彭德怀传》记述，（《彭德怀传》，第7章第5节。）当时，张国焘仗仗四方面军枪多人众，企图胁迫疲奔万里且破衣烂衫的一方面军听从他指挥。值此关头，彭主张先扣押四方面军领导，使其失去指挥，再谋脱身；毛则决定先不露声色，稳住对方，再半夜起身，不辞而别。

事隔二十余年后，毛在庐山翻出此事，严辞批道：「四方面军错在张国焘，是阶级异己分子，同他作斗争，应当在党内斗，不能用武力。但长征中彭德怀提议用过武力解决，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8月16日讲话）。

到头来，毛还是把彭在此次路线斗争中所作所为给否定了：虽没犯支持「右倾路线」的错误，却犯了反对「右倾路线」不当的错误；虽不是热心追随「张国焘路线」的人，却成了热衷使用「反动阶级方法」的人。事实上，毛在此次路线斗争中，既靠叶剑英截取电报而获知隐情，也靠彭德怀调动三军团护卫而得以脱身。事过境迁，他只记前者密告之功（竟于庐山会议上数次念叨此事（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10，256。)),不提后者保驾之劳，甚至向其泼脏扬灰。

在毛给彭开出的历史账单中，除记有他在「张国焘右倾路线」发作时有过不轨想法外，还记有他在「李立三左倾路线」发作时动摇过，打过大城市长沙；在「王明左倾路线」以及「王明右倾路线」发作时跟着干过，并且很卖力气；在「高饶右倾反党联盟」中也有一席之地，实为「彭高联盟」；在此次庐山会议上又向党进攻，成为「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首领。

显然，毛的这本旧账单是夹有他的许多个人成见的。

毛泽东盛年时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莫过于王明了。他曾被王的

路线执行者解除兵权而靠边站，并被王本人及其同道广证博引「马恩列斯」原著而反衬得十分土气，以致被讥讽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多少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者。不仅如此，他辛辛苦苦拉起的队伍、打下的地盘，也几乎被王的路线执行者丢失殆尽。

因此，对于「王明路线」，毛泽东不论于公还是于私都是深恶痛绝的。似乎可以这样说：能否坚决反对蒋介石是区分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的标准，能否坚决反对王明则是区分中共党内毛派与非毛派的标准。毛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却另辟天地搞起旷日持久的整风运动来，为的就是要在党内肃清王明的影响，打击非毛派的气焰。八年抗战，竟有四年整风；中共大部分高干都在此运动中痛作检查，自眨自损。

对于王明路线，毛泽东不仅常时狠狠整治，而且事后耿耿于怀，久久不育释然，一有机会就翻出来批一通，既批「王明路线」本身，也批与「王明路线」有牵连的人，其中包括彭德怀。毛指责彭跟随王明路线跟得很紧，先是支持王的「左倾路线」，后又支持王的「右倾路线」。

就实际情况看，毛对彭的批评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可以说过偏概全。彭确实支持过「王明路线」，也确实反对过「王明路线」，并确实很坚决很有效地反对过「王明路线」。可是，毛只说前者，不提后者。

当「第一次王明路线」以「左」的面貌肆虐中央苏区的时候，彭德怀最初支持过它，但是，后来发现它在军事方面有着严重错误，便断然改变态度、指着共产国际审事顾问李德——当时红军「太上皇」——的鼻子，臭骂其无能无耻，「崽卖爷田心不痛」。怒吼之后，他包起衣服，准备坐牢，准备被杀头。（《彭德怀传》，第6章第7节。）此时毛泽东正在苏区南线会昌城外赋诗填词：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毛泽东，〈清平乐·会昌〉，《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3。）

当「第二次王明路线」又以「右」的面貌影响抗日统一战线时，

彭德怀也曾经响应过它，积极指挥所部作战，以策应由国民党主持的正面战场，并与许多国军高级将领如程潜、卫立煌、孙殿英等建立了较为温和的协作关系，但后来发现一些国军恶待共军，不是刁难就是抢夺，便暴跳如雷，坚决回击。在人家国统区里，他竟把国民党特务捆起来问罪其上司。权自家根据地中，他又一下户吃掉磨擦将军朱怀冰部二个师一万余人。彭德怀在做这些事时数度穿行于国统区，屡涉险地；此时毛泽东正安坐后方窑洞，奋笔疾书。

彭德怀晚年谈到自己在历次路线斗争中表现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这里也认识到自己见事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支在手腕处，我要等到五个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彭德怀自述》，页 229。）由此不难看出这位工农将军有其憨朴可爱的一面。他承认自己对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缺乏先见之明，但也有意无意地辩解道，自己毕竟能把一些已暴露出的问题看个明白，还有一些后见之明。

可是，毛只抓住他没有先见之明的方面，不承认他还有后见之明的方面；只强调他前面做错的事，不重视他后面改正的事；只过于渲染他的过失，不充分肯定他的贡献。从这里也可看出毛处世为人的一些特点：对于那些有负于自己的人和事的记忆，比起那些有益于自己的人和事的记忆，要牢固得多、深刻得多。此公是一个得罪不起的人。

再毛给彭算出的一笔笔历史旧账中，较重者，除了上述逢「关键时」便「动摇」外，还有所谓「与我关系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笔账先是在7月31日会议上列出，后又在多次会议上演算，最后公布全党。

毛泽东历来把自己看作是党的正确路线代表，因此，既已认为彭德怀屡屡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就应判定彭屡屡站在他的反面，大多数场合都与他作对。可是，毛这种算法过于精明，以致弄巧成拙，小处显智而大处露愚。

据说，朱德在目睹庐山整坪这一幕丑剧后，说出一句痛心嫉首的话：谁还会相信我们曾在一个碗里吃过饭？

不知这位老将军有没有意识到，面抱怨的恰洽是毛所希望的。毛希望人们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和彭原本就不大在一起吃饭，不大用一个碗，聚餐时短，分餐时长。道理很简单，既然把彭的历史说得大有问题，就应把自己的历史说得与前者分开乃至对立，从而能够在否定前者的同时把自己解脱出来。

然而，就历史事实来看，这种解脱很成问题，表面上是在解脱自己，实质上也在否定自己，即在否定彭的历史的同时，也在或多或少地否定毛的历史。

纵观中共战史，彭德怀战功最大。十大元帅排名一号的朱德将军在彭落难时说过一句公道话：我们最难走的路是他走的，我们最难打的仗是他打的，要讲艰苦卓绝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朱说了实话。

第一次国共战争时期，中共最能打硬仗的部队是他统领的。如 1930 年夏长沙之战，他率红三军团以 8 千之兵击败 3 万之敌，并一鼓作气攻下湖南省城长沙——红军在十年内战期间所攻下的最大城市。

又如 1933 年 3 月江西草台岗之战，他率红三军团担任主攻，夺下霹雳敌主阵地，汇合友邻部队众歼敌第 11 师大部。该师为陈诚起家部队、精锐之旅，其余部后来发展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第 18 军。

再如 1933 年 9 月福建芹山之战，他指挥所部歼灭蔡廷锴的从未打过败仗的、曾和日本人较量过的第 336 团，并且是以一个团兵力歼灭一个团兵力。这同毛泽东和林彪的那种集中优势兵力的打法颇为不同。

抗日战争时，中共所打的最大战役百团大战是他指挥的。此役他调集 105 个团兵力，在敌后数千公里交通线上，同时展开破袭战，接着拔据点，再接着反扫荡，共歼敌数万，从而改变了国人乃至敌人关于「土八路」不能打大仗看法。

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中共敌我兵力最为悬殊的战区即西北战场是由他经略的。战端初开时，彭部仅为 2 万余人，敌方则有 20 余万人。并且，前者重武器根本没有，轻武器缺少弹药，粮食常为吃下去拉不出屎的黑豆；后者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其主力前身是蒋北伐起家的国民革命第一军，号称「天下第一军」，其统帅胡宗南为蒋最得意的黄埔弟子，属「天子门生」，故军中兵员充足，装备精良。两军对阵结果，彭部屡战屡胜，胡部丧师失地。

朝鲜战争时，当代世界武器装备水平差距最大的战争也是由他担当主角的。美军骁将李奇微曾概括志愿军打法为「月光攻势」和「四五天攻势」。（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 年），页 66，88，91，192，104-105，202-203；叶雨蒙，《出兵朝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年，页 323-324。）因为没有制空权，志愿军只能于夜晚活动，故常选择月明之时进攻。又因为缺乏后勤保障，志愿军仅靠人体所能承负的战斗给养发动进攻，故其攻势不超过一星期。即使在这种恶劣装备条件下，彭德怀也能率军先是驱使世界头号强国的军队退走几百里，继又顶住后者发动的陆海空立体式反攻。

此外，还有以往人们不大提起的一点，就是在中共武装力量系统中，几乎所有「山头」的部队都先后被彭直接指挥过。在中共众多高级将领中，彭这一经历是绝无仅有的。

例如，老底子为「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他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黄土高原上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 115 师暨山东军区 and 晋察冀部队，后来分别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

又如，老底子为「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他在太行山上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 129 师暨晋冀鲁豫军区，后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又如，老底子为「红二方面军」的部队，他先后在华北、西北直

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 120 师暨晋绥军区，后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再如，老底子由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的「南方八省游击队」组成的部队，他也在朝鲜战场上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与山东军区一部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后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其中第 20、21、23、24、26、27 军（即华东野战军第 1、2、4、6、8、9 纵队，多为主力纵队）先后入朝作战。

毛泽东虽为中共军委主席，但对各地战事筹划，多是坐镇战场之外，多以电报传令，多为间接指挥，而不像彭德怀那样亲临各军前线，既以电报也以电话乃至喊话传令。更有甚者，彭职务在军师长之上，但其指挥位置常在军师长之前，有时竟跑到团部、营部乃至连部。

以上仅为简述，但已不难看出：彭德怀个人的历史是与中共军队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与其中较为重要且较有光彩的部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一人生涯，半部军史。

因此，如果过分歪曲彭德怀的历史，就会不可避免地殃及中共的军史，就会使后者中许多光彩篇章变得模模糊糊，不明不白，就会使后人在阅读该军军史时，或弄不明白许多重大战役的真相，或突然发现许多光辉业绩竟是由一个不良分子领着做出来的！

例如，自 1959 年后，在记述中共西北解放战争史的文献中，就很少出现彭德怀的名字了，以致给后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仿佛是毛本人直接主持这一战事的。这是弄虚作假的。

曾有西北野战军老战士杜鹏程写了一本小说《保卫延安》，写出许多历史事实。1954 年，该书出版，印数近百万册；1959 年，该书被停印；1963 年，文化部发「〈63〉文出密字第 1394 号通知」：停售和停止借阅此书；1964 年，文化部又发「〈64〉文群密字 216 号补充通知」：就地销毁此书；1966 年，「文革」开始，作者本人「大祸临头了！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杜鹏程，〈《保卫

延安》的写作及其他——重印后记》，《延河》，1979年第3期。）

又如，在中共军史中，1928年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意义重大：其一，振奋了处于革命低潮时的中共党人的精神，其二，诞生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红军队伍——堪称红色「湘军」。然而，庐山批彭竟把此举说成是一次个人投机行动，即彭德怀以此「入股」革命，颇有个人「野心」地想「参加革命做大事」，（《彭德怀自述》，页68，103-106；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37。）这是过河拆桥的。

同样道理，毛泽东如果过分贬损彭德怀的历史，过分否认他与彭的联系，就会不可避免地殃及他自身的历史，就会使有关他自己的那种马背君主生涯的记述显得大有问题：或因过分排斥彭将军，而使自己的一些历史经历显得模模糊糊；或因过分贬低彭将军，而使自己的一些历史作为显得黯然失色。前者可从1959年后中共对有关西北解放战争史文献处理中看到，后者可从下面这样一个事例中看出。

在庐山会议上，毛多次指出彭抗战时大闹独立性：「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意见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洛川会议做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分会另发指示。」「华北军分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8月1日讲话）

抗战时，彭将军在华北主事六年整（1937年9月至1943年9月）。前两年多时间（1937年9月至1940年4月），他与朱德将军共同主持八路军前方抗战大业，并因自己年富力强而做了较多的事。后三年多时间（1940年4月至1943年9月），亦即华北敌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且最为辉煌的三年时间，朱返回延安，彭独挑大梁，当家八路军总部，集党、政、军、民、财五大权于一身。

我们既已知道彭德怀在抗战中的实际地位，即全权主持中共华北抗战大局；也已知道毛泽东批彭将军的主要说法，即「根本违背中央方针」，「自己干自己的」；再将两者连接起来推证，便可获得一个相当

简单的三段论：

前提一：华北抗战大局为彭主持；

前提二：彭有背中央有背毛泽东；

结论是：华北抗战大局与毛泽东的中央没有多大干系。

换句话说，毛的英明决策或光辉思想，对华北抗战至少对彭当家太行山时的华北抗战没有多大影响。

如果再考虑到，在中共整个抗战大业中，华北八路军占七成以上，而华中新四军、东江纵队以及东北抗联加在一起仅为三成；那么，又连带出一个结论：在中共整个抗战大业中，毛泽东的中央不起主导作用。

问题到此还未结束，如果再进一步考虑到，毛泽东还曾报怨过，由项英主事的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1937年12月至1941年1月），也向他领衔的中央大闹独立性，不听延安指挥，自行其事；那么，再连带出一个结论：毛的中央曾一度既不影响华北抗日之大局，也不影响华中抗日之大局。于是，毛本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成了问题，似乎一度游离于中共抗日大业之外。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或多或少地承认：「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连陕西省委都不听话」，于是，「延安成为留守处」。（8月11日、16日讲话）

平心而论，上述逐步退减论证，对毛过于苛刻了。可是，这不能怨怪别人，只能怨怪他自己：搞党内斗争，过于尘曲政敌，过于贬损政敌，结果殃及自身：吵起架来，只求痛快淋漓，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不考虑是否自圆其说。他本是朝政敌泼脏扬灰，结果也连带着把自己弄了个灰头土脸。

毛泽东在倒算彭德怀历史旧账时，还有一个「三国志」说：

「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

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7月31日讲话）

此话较难理解。既要爱国，又要让外国人多占自家国土，世上哪有这样的爱国。这不免使人觉着说此话者本人大有问题：或有气节问题，或有神智问题。可仔细审察，两者都不是：毛泽东真心爱国，不容怀疑；毛泽东头脑正常，也不容怀疑。显然，毛泽东话中藏有隐情。

这个隐情主要藏在「三国志」这一说法里。准确地讲，不是「三国」，而是两国三方：中日两国，国共日三方；中日为敌，国共明为盟暗为敌。每一方都要同时处理与另外两方的关系，从而使三方间关系异常复杂。

就中共方面说，可以向日本人夺地盘，即建立敌后根据地；但不能向国民党夺地盘，否则就是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大业。换句话说，日本人占领区越大，共产党人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范围及其合法性也越大，常有这种情况：日本人在前面驱赶国民党中央军，共产党八路军以及新四军则跟在后面扩大自家根据地。因此，毛所谓「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实为「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党」。

从一党之利来说，共产党希望日本人多打国民党。因为，除了上述可以扩大根据地外，还可既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又削弱国内竞争对手的实力。不过，共产党也不希望日本人彻底打垮国民党。这除了出于中国人的良心外，还由于国民党中央军的存在能够牵制住侵华日军的大部分主力师团。

同理，国民党也希望日本人多打共产党。这也会既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又削弱国内政敌的实力。并且，它也不希望日本人彻底打垮共产党。因为，后者在华北、华中拖住了侵华日军的许多有生力量、以及伪军的绝大部分力量。

从日本人角度看，国共两党都要打击，并且都要彻底打垮。至于哪一个予以先打或后打，哪一个予以重打或轻打，则视情况而定：如

果想夺取更多城市、更多交通枢纽，自然要多打、重打国民党；如果想肃清后方，掠夺占领区资源，则要多打、重打共产党。

然而，若让超越党派利益的老百姓来看，若让没有历史积怨的后辈者来看，既不希望共产党受到日本人重创，也不希望国民党受到日本人重创，更不希望国土让日本人多占；与其让日本人统治，勿宁让中国人统治，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实际上，就中共自身来说，既有这种理论，即所谓「此时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说法；也有这种过践，即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拖住了大量原准备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的日本军队。

基于以上看法，多数中国人不会赞成毛对彭的批评，不会赞成他的「三国志」说法，尤其不会赞成他所谓「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说法；相反，会对彭将军发动「百团大战」这一抗日之举抱有深深的敬意。

读到毛泽东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的话，自然想到蒋介石的「攘外先安内」的话。两者用词不同，但涵义相近，都把党派利益看得过高过重。两人心里都想，要抗外敌，先反内敌。蒋公想的是，要反日本，先剿红军。毛公想的是，要打日本，先赶蒋军。

不过，毛公所做还不止于此。他不仅是，要攘国外之敌，先安国内之争；而且是，要攘党外之敌，先安党内之争，要打日军蒋军，先反左倾右倾。

正当抗日相持阶段，毛公频频调令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抗日将领云集抗日后方，学习文件，总结经验，改造思想，整顿党风，张三挨批，李四反省，人人须检查，个个要过关。到末了，延安城内思想交火还未尽兴，延安城外抗日烽火已将燃尽，整风完了，抗日也快结束了。

中共抗战三件事：整风，拒蒋，打鬼子。毛公费心最多在前事，彭将军用力最多在后举；前者痛责后者，后者岂能心服前者？

阅读毛泽东的庐山言论，体会他对彭将军的嬉笑怒骂，不能不使人感受到其间透出一种强烈的心理个性、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在笔者看来，较多地表现为一种阴柔之气、一种常常能够摧阳折刚之气，既可显现为毛泽东个人的一种行为模式特征，也可折映出我们民族的某些文化传统特征。

从治现象层面上看，毛批彭讲话中的阴柔之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翻箱倒柜揭老底，陈芝麻烂谷子均上台面；其二，东拉西扯乱上纲，帽子棍子皆派用场。

前文提到，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彭德怀所作的诸多批判中，话题最多也是分量最重者，当数这些人对彭的历史批判，说了不少往日旧事，算了许多陈年老账。

首先，这老账算的时间跨度大。迄庐山会议止，彭与毛相识三十一年，庐山上的账也算了三十一年：

近者，算了这三十一年之末的彭「猖狂进攻」总路线的账；远者，算了这三十一年之初的彭「入股」革命的账；更远者，则算了这三十一年之前的许多零零碎碎的账，如追问彭：因何在湘军二师六团中获得上司信任呢？（《彭德怀自述》，页 34-35。）如何在老家湘潭乌石寨盖起 12 间瓦房？（《彭德怀自述》，页 40-41。）为何原名叫「彭德华」，是不是想一人独得中华？

其次，这老账也算得虚虚实实。其间有实账，有虚账，亦有介于虚实之间的账。

实者，确有其事，毛泽东等人则抓住不放，反复念叨。如彭德怀曾一度支持过王明路线的旧事，毛几乎是逢会必说。

虚者，查无实据，毛泽东等人则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如彭德怀

刚访问过东欧国家，毛臆测其可能「从国际取了点经」，「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8月1日讲话）。毛的追随者们后来走得更远，竟非常肯定地追究彭「里通外国」的罪行。如此栽赃，激得将军大吼：我彭德怀一句外国话都不会，怎么个里通外国？我在外面说了什么听了什么全靠翻译，你们为什么不先去问问他就来下结论。（《彭德怀传》，第34章第2节。）

介于虚实之间者，稍有事实，毛泽东等人便加以发挥，上纲上线。如彭德怀在中央苏区肃反「AB团」时曾救过黄克诚的命，毛据此推论彭黄之间大有名堂，甚至当面追问黄克诚本人他是否与彭德怀有不正常的「父子关系」（7月30日讲话）。

如此翻历史老账，使人不禁想起妇人骂大街的情状。张三嫂子，李四媳妇骂起街来多是翻老账、揭老底，揭对方某某日，做过某某事，拿过王二家的东西，偷过刘五家的汉子，……。

翻历史老账、揭个人老底，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策略，虽格调不高，但颇为实用。这是因为，在与政敌进行争执过程中，冷不防揭其老底，常能使其顿时陷于一种不知所措、有口难言的境地。

对于揭出来的老底，被揭者或是非常清楚却不愿回答，或是不甚明了而难以回答。前一种情况较容易理解，心里确有隐私，口中自是啜嚅不语。后一种情况要复杂一些，不是听者心中有愧，而是问题本身恼人。

这固然是由于突然转换话题而使对方措手不及，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转换话题后所提出的问题令对方困惑不已，使他既感到事关自己荣辱必须起而辩解，同时又感到懵懵懂懂不知从何辩起。似曾相识又似曾不相识的往事，常常使他陷入苦苦思索之中：那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然而，岁月流失，往事如烟，苦思者很难得出十分清晰的结论，与此相应，也就很难做出十分确然的反驳。

不过，这种情况也是因人而异的。那些肚肠狭小故阴柔气较重者，

既很兴趣于他人隐私，也很留心于自身锁事；若碰上揭老底这档子事，非但不觉为难，反而极有兴致，乘势参和进去，轻车熟路，大行窥阴揭私之道，并从中为自己谋取政治优势。

相反地，那些心胸坦荡者，既不爱多记他人过失，也不愿常提自己功绩；一旦遇上翻个人历史老账之类的事就会烦恼不堪：既不知如何以牙还牙地反诘他人短处，也不知如何虚张声势地标榜自己长处，故而常陷于一种蒙冤受屈但又欲辩无词的境地。

基于以上理解，当我们读到彭将军的「我一生无笔记」这句话时，（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221。）就不难想象当时这位阳刚汉子在周围一片婆婆妈妈的责难声中是如何不知所措的。

不仅如此，当我们又知道彭将军在其余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被迫回忆往事、被迫梳理那些遥远的且琐琐碎碎的往事以作交代时，就更不难理解落难将军所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屈辱，更不难理解英雄暮年所走过的是一条多么不容易走的路。

无庸讳言，翻老账揭老底，是老人家搞党内斗争的一种传统，他若要整倒一个人，就会默许手下人抛出乃至编织许多不利于这个人的历史材料，以证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坏分子。「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如此，「文化大革命」整刘少奇也如此。

刘公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经历颇具悲剧性。（见本书第 13-14 节。）「庐山会议」时，他也参与揭发彭将军的历史问题，诉说彭在长征途中如何犯自由主义错误，如何乱说有关中央的坏话；后来又如何多出一个心眼，不把自己的真实意见报告中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247-248。）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他也被别人大揭历史问题，并且，揭出的老底更多，定下的罪名更重，被戴上了诸如「叛徒」、「内奸」、「工贼」之类的大帽子，最后，被迫害致死于河南开封。后人读到他的这段历史时，不禁为之叹曰：早知开封，何必庐山。

在中共党内路线斗争中，一个领导人要是不犯「错误」的话，则

有关他的一切都是好的；若是犯了「错误」的话，则有关他的一切都是不好的，都要被东拉西扯地朝最坏的方面说去。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在中共党里、在中共军队中，被公认为忠诚无私的革命家、英与善战的大将军，艰苦朴素的老战士。庐山会议后，他又在这同一个党里、同一个军队中，风光尽失、面目全非。世上最丑的话尽灌其耳，最脏的水尽泼其身。同志战友，说翻脸就翻脸，并一翻脸就翻到底，翻到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的地步。

关于丑话脏水，前文已作过一些叙述，此处再引数言，以观骤然翻脸者之气息。

彭将军用心良苦，上书谏言。毛泽东则勃然大怒，反唇相稽：「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8月1日讲话）

批过彭将军眼下写的信，又揭彭将军过去做的事：「历史上参加过各种分裂组织」，「政治上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主义、上山主义」（毛8月11日讲话），「总之，由来已久」，「总要发作的」。（毛8月16日讲话）

揭了彭将军的历史，又贬彭将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许多学说、政党、阶级斗争、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毛8月1日讲话）。彭德怀的世界观，「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外国流派，马赫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毛8月11日讲话）。毛这一下子给彭扣上了许多顶「大帽子」，还都是「洋帽子」。这种「洋帽子」特别能唬住那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很像今天带有洋文商标的服装特别好销于时髦小青年一样。

数落完了彭将军的思想，又来数落彭将军的品质：其一，革命动机不纯，「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

革命做大事」，「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即出在这里」，「你是个投机分子」（毛 8 月 1 日讲话）。林彪帮腔道：「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人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留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282。）

其二，做人内外不一，「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毛 8 月 1 日讲话），林彪又帮腔道：「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227，242，283。）

上述这种东拉西扯且一概否定的批判法，很有些像黑格尔所说的「抽象法」。黑格尔曾就此「抽象法」举了一个例子：（黑格尔，〈谁在抽象思维〉，《学习译丛》，1957 年第 2 期。）

「喂，老太婆，你卖的是臭蛋呀！」一位女顾客对一个女商贩说。这个女商贩可恼火了：「什么？我的蛋是臭的？！你自己才臭哩！你敢样来说我的货物吗！你？你爸爸吃了虱子，你妈妈跟法国人相好吧？你奶奶死在养老院里了吧？瞧，你把整幅被单都做成了自己的头巾啦！你所有的帽子和漂亮衣裳大概也是用床单做的吧！除了军官们，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拿服装来出风头的！规规矩矩的女人多半是在家照料家务，而像你这样的女人，只配坐监牢！最好你还是补补袜子上的窟窿去吧！」

「她也是抽象地思维的：仅仅因为那位女顾客说了一句她的蛋是臭的，得罪了她，于是她就把女顾客全身上下编派了一番——从帽子到床单，从头到脚，还有爸爸和所有其余的亲属。一切都沾上了这些臭蛋的气味」。

彭德怀庐山上何尝不也是碰上了这样卖蛋的「商贩」。他说了一句大跃进的「蛋」有些臭，结果被卖此「蛋」者骂得一无是处，浑身都是臭蛋味，从言论到行动，从思想到品质，从现实到历史，几乎无处

不臭，无时不臭。

黑格尔只写了那位顾客如何挨骂，而没有继续去写她挨骂后有何感受。哲学家或许不忍心这样做。庐山会议的见证人则不仅记下彭将军挨了什么样的骂，而且记下他挨此泼骂后的真切感受，令后人读之不忍。

在八月二日早上，即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始的那天，他抱着难以名状的心情自言自语地说：

我已经够臭的了，这次还要把我搞臭。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在全军消除我的影响。

说完，就大步出门开会去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263。）即去开那个将要把他正式定罪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反党集团」首会议。

## 25

毛泽东庐山整人之举，除从政治现象层面上作出考察外，还可从文化传统层面加以阐释。庐山会议的阴柔之道，承袭了中国史上许多政治家在整治政敌过程中常常采取的两种策略：

其一，机会主义策略，即手段的选择是不受限制的；其二，伦理主义策略，即人格的攻击是大行其道的。

这些政治家的政治品性，大多如水的品性。

水性柔而能克刚，能锈蚀钢铁、溶穿岩石、冲刷河床、切割大地；水无定状，故变无常形，动无常态；水无定处，故无所不至，无孔不入。

依此水性来搞政治斗争，自然是不守常规、不讲章法、无巧不取，无所不为，或说是机会主义的。

这种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说来不大好听，做起来也不怎么堂堂正正，但常有克敌致胜的效用，故为许多政治家所采用，尤为那种只求成功不问其他的政治家所喜用。

中出史上，许多建有事功的政治家通常都能玩出一些机会主义的东西、甚至能玩出许多下三滥的东两来。换句话说，这些政治家们大都有些狡诈的才能、有些不那么光明正大却能够取胜于人的才能。

更有甚者，其中的一些人把自己的这种狡诈才能，不只用于对付阵营外的宿敌，还用于对待阵营内的盟友，不择手段且又不惜故交。

史上刘邦长于项羽的地方，若仅就人格因素而言，主要不在其富有阳刚之气，而在其多有阴柔之道，正是凭籍后者，这位曾身无一文却敢诋语万钱贺礼而争得宴席上座的洒地小亭长，终于整倒了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

打江山时，他精于诡诈，既来而盟誓，又去而背誓，把与之争雄者整得进退失措而亡。坐江山时，他也工于心计，既分候功臣，又夺其辖地，整了一大帮像韩信那样的开国元勋。太史公笔下的汉高祖，既有旷世雄主之风采，又有肖小徒辈之行色，几分雄才，几分痞气。

不仅汉高祖刘邦如此，几乎所有夺得天下者都有其阴柔诡诈的一面。唐太宗李世明文韬武略，冠盖百帝，但为夺君位，也干出逼父杀兄之事。宋太祖赵匡胤亦为名君，但也有陈桥背主且杯酒驱友之事。

明太祖朱元璋则把谋害大臣的事做到极致处。当他把皇位传给建文帝时，已把朝中几乎所有在资望或能力上强于此帝的重臣干将都给收拾掉了。不过，这位老谋深算的朱皇帝也有疏漏之处，只戒备异姓臣犯上，而未防范同姓王作乱，结果在其死后不久，便有了「壬午之变」（1402年），燕王掀翻了建文帝，四皇儿取代长皇孙，做了朱家第三个皇帝。

毛泽东虽不好与史上名君相比，但作为能夺得天下者，自是有许

多过人之处，自是一个在整治人事方面的长袖善舞者，对于此公来说，阴柔之道也是烂熟于肚中的。

张闻天这位中共党内的大秀才，把毛这方面的看得较透。庐山会议期间，他曾对彭德怀说：毛这个人很英明，似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30。）

彭德怀当时还不能接受张的这一看法，并替毛作了一些辩护。他说，毛主席对于中国历史的熟悉，是党内任何同志远不及的；又说，历代开国之君都英明且厉害，无产阶级领袖也要厉害才行，但同皇帝有本质不同。（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30-131。）不久，这位辩护者就会亲身感受到此「开国之君」的厉害，感受到此人是如何把他从精神到肉体都整得死去活来的。

这里可看出中共党内斗争的一个特点，即党内知识分子出身者先觉，党内工农群众出身者后觉，故党内错误领导总爱整党内知识分子；而党内错误领导自身也多为知识分子，故在党内常有知识分子大整知识分子之事。

例如，张国焘主政鄂豫皖苏区时，杀了包括军长许继慎、政委曾中生在内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以致在整个红四方面军中，很难找到几个文化程度较高的军事指挥员。后来在出自这一山头的中共军队高干中，也是战将尚多，儒将甚少。与此相连带的一个后果是，在 1955 年被授衔的将军中，出自这一山头的上将者很多，而出自这同一山头的大将者和元帅者甚少：在十大将中仅有两个半，即徐海东、王树声、以及半个陈庚（先在鄂豫皖苏区，后转中央苏区）；在十元帅中仅有排名第八的徐向前一人。与此形成反向参照的是，在此时仍幸存的老红军中，又以出身红四方面军者为多。

又如，夏曦主政湘鄂西苏区时，也杀了包括彭德怀入党介绍人段德昌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以致在这一大块苏区中，被承认为党员者

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陆冬生数人。（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43。）再如，毛本人主持中央苏区肃反「AB团」运动，也杀了许多知识分子。此后王明路线统治中央苏区，又搞起反右倾经验主义运动，其间也整了毛这个「山沟沟里」的秀才。

最后，庐山上整出的反党集团，挂名四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实为六人（加周惠和李锐），其中，除首领彭德怀外，余者五人，无不是党中秀才。

一位长者告诉笔者这样一件事：

1936年「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决定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以结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对此，张国焘向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提出异议，说蒋介石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与他打交道是要吃亏的。后者笑而答道，老兄多虑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老蒋有谋，我们老毛更有谋，他老蒋斗法是斗不过我们老毛的，让老毛来对付老蒋横竖吃不了亏。

听了张闻天这番话，张国焘有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此后有何行动，我们倒有些清楚。仅过一年多时间（1938年4月），张国焘就藉祭扫黄陵之际背叛中共而投奔老蒋去了。究其原因，除了他共产主义信仰动摇、革命意志衰退外，恐怕就是此人怕毛公更甚于怕蒋公了。

人们不妨作一设想，假如张继续留在毛的党内，他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可以肯定的是，不久后开展的整风运动就会让他脱一层皮，1949年后的各次政治运动也都会让他不得安宁，并最终会让他死于执政党狱中。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理由很简单，在毛的治下，许多稍有些历史问题甚至没有历史问题的人都不能幸免于难，而像他这种曾另立中央并试图加害毛主席的人就更不能指望会有什么善终的事了。

当然，张投蒋也没有什么好的结局。他在被隆重欢迎后，就被百般询问以提供中共情报，并被多方趋使以设计反共策略；在此期间还

多次受到军统头子戴笠的斥责与羞辱，以致于「摇头叹气」，「无限感伤」；（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文史资料选辑》，第 22 辑（中华书局，1962 年）页 89-90。）1949 年后离开大陆，飘落他乡，在写了许多回忆录后，孤独而死。这也应了「凡叛变者均没有好下场」那句老话。

「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史，果如张闻天所言，老蒋终究斗不过老毛，从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中获利最大者，不是蒋领导的党，而是毛领导的党。

蒋想用统一战线限制共产党，毛则想藉统一战线壮大自己。结果，前者设想破灭，后者预期实现。仅以军队数量为例：抗战前期，共军不及国军的 1/50；抗战后期，共军扩至国军的 1/3 强，相对比率增加近 20 倍。

蒋仗着势大不时搞点摩擦，毛则针锋相对，你摩擦我也摩擦。国军搞摩擦明火执仗，一味蛮打、蛮冲、蛮干，以显国中正统。共军反摩擦先礼后兵，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尽量作哀兵状。国军在先若占些便宜，过后定会被共军讨要回去。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摩擦掉共军的数量要远远少于共军摩擦掉国军的数量；可是，国军背的摩擦罪名却大大重于共军背的摩擦罪名。

蒋介石靠的是枪多、人多，再加中央政府的牌子，结果地盘越打越小。毛泽东靠的是八路军、新四军会作群众工作，会打游击战争，会跟在日军攻蒋师团后面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结果地盘越打越大。

如前所述，毛可以一方面高谈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高喊抗战高于一切；另一方面又从内心希望日本人多占国民党的地盘，以使自己的人能够合法地去经略它。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先是日本人把大片蒋管区变成大片沦陷区，继是八路军、新四军再把大片沦陷区变成大片游击区乃至大片根据地。后者搞的似是一种「曲线发展」的战略。

至于国军方面，一些人则打起「曲线救国」的旗子，实为先降日军，后打共军。据中共方面统计，在由国军哗变的伪军中，90%以上者被用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致使中共抗日根据地周围的伪军数大大多于日军数。于此相应，中共八年抗战消灭的伪单数也远远多于同期消灭的日军数。

以小说《平原游击队》的生活原型郭兴武工队为例。当时，郭兴队长从八路军太行山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那里，接受这样一个战斗任务：一年内消灭100个伪军和5个日本兵。（马月玲，〈「李向阳」的原型——郭兴〉，《纵横》，1991年第6期。）在此，八路军所要消灭的日伪军比率，高达1：20。

上述两个「曲线」，在性质上截然相反：「曲线救国」者，属汉奸之举；而「曲线发展」者，虽有削蒋之意，但总体上属抗日之举。不容否认，出自国军的降日者与出自共军的降日者相比，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前者都远远超过后者。

不过，两者在策略上，都讲一个「曲」字，都想借日军之力削弱对方，进而扩展己方。于是乎「三国志」成了「三角地」，国、共、日各据一角。其间，国共既相互依恃，又相互对峙，既直线相达，又曲线相连，而日本人正居于这曲线的拐角处。

这种「曲」斗之法，显然不属阳刚之举，而为阴柔之术。蒋公长于此术，毛公亦长于此术。两相比较，前者不及后者。前者把玩此术玩得地盘日蹙，后者把玩此术则玩得实力日增。玩到末了，不知蒋公有无「既生瑜，何生亮」之叹。

与史上许多政治家相似，毛的阴柔之术不只是用于对付外部政敌，还用来整治内部盟友。1959年庐山一幕，演的正是以柔克刚的事，整的正是自家党里的人。

他整彭所采用的阴柔之术，除了前文谈到的妇人骂街式的「肆揭老底」之法，「东拉西扯」之法外，还有其它一些机会主义做法。

1959年7月31日，毛在鞍山市委报告上批语：「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68-269。）毛写此话时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话中所提示出来的一点，我们认为是相当准确的，这就是在1959年夏庐山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整治彭德怀，确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因为，彭德怀此时此地上书，不仅犯了毛个人的颜色，而且触到很多人的痛处。庐山会议上的多数人，都曾是「大跃进」的前线指挥官，跑在毛泽东的鞍前马后，甚至比马上主帅跑得更欢、干得更起劲，故而个个程度不一地犯有急躁冒进的错误。二十年后，邓小平承认：大跃进，毛泽东头脑发热，我们也发热；中央犯错误，毛泽东个人要负责，我们大家也要负责。（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96。）问题是，二十年前，彭德怀就要去揭露「大跃进」的错误，就要去弄清「大跃进」的责任，这就在批评毛泽东的同时，也犯了大家的众怒。

对于「大跃进」的错误，与会者中有些人能坦然待之，有些人则十分护短，（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82。）如毛说的「一触即跳」，正是这些人。他们或轻描淡写、或捂着盖子不说，把前期庐山会议开得冷冷清清、不知所云，使得老彭坐卧不安，欲罢不能，故有了他上书谏言之事。

湖南省长周惠在麻将桌上说笑话：1958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滑头），看风使舵；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此话一出，怒声四起，掀起了轩然大波，以致周恩来总理不得不慎重其事，专门开会，批评说笑话者。（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87。）

对彭的批评信，「1958年的三种人」在毛没有发话前，均惧于彭老总的威严而不敢大声嚷嚷；一待毛发话，便磨拳擦掌，喊声阵阵，从四面八方围了上去。毛此时整起彭来，已是帮腔者多，援手者众，

故可说是抓着一个不可失且不再来的大好时机。

另外，在如此重大会议上，毛却反反复复地大谈彭德怀不善处人的问题，屡屡提及在彭德怀与一些人之间所存有的隔阂：十个元帅，除自己外，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十个大将更不在话下（8月1日讲话）；七个政治局常委，谈得来的究竟有几个？十个元帅，九个不合作，大将、上将有几个合作？（8月11日讲话）

自古就有「猛将性烈」之说。彭亦不例外，其性格尤为刚烈，嫉恶如仇，易动肝火。上自毛泽东，下至师团长，挨过他骂的官员不在少数（不过，据杨勇上将说，他就不骂战士〔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90。〕）。因此，相当多的中共高干对他存有积怨，这可从后来批彭会上的种种泄私愤话中看出。彭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常常自嘲：「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

然而，这种事毕竟属于彭的个人性格问题，或只涉及他与其它人的个人关系问题，而不应与庐山会议本要讨论的国家大政方针问题相提并论。后人很难看出彭德怀的暴躁脾气与大跃进的糟糕问题有多少内在联系。

可是，庐山会议主持者偏偏要把这两个不同话题硬扯到一块，大加发挥，甚至在大会上扯出诸如彭德怀当年如何反萧克的教条主义、如何反贺能的军阀主义这类离题很远的话。毛显然是在挑拨，是在煽动反彭情绪、组织反彭队伍，是在用机会主义方式整人。

依笔者所见，毛之所以在庐山与会者面前大揭彭的历史问题，还有他的另一层机会主义考虑。庐山上的人很清楚，彭德怀分管的工作主要是军事而不是经济，而他此次庐山言论所涉及的问题大多不属前者而属后者，即说的多是他本人专业之外的话。

因此，老彭讲得总有不妥，也情有可原，顶多只能否定他的次要方面，而不能否定他的主要方面。正如，人们不能因一个男人在针线活上做得不细巧而否定其男人角色一样，或者说，不能因一个扛大包

者在来往账上记得不清楚而否定其苦力身分一样。同理，毛泽东也不能因管军事的彭将军在经济上说错了话而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可见，要整倒彭德怀这个人，仅凭据他关于「大跃进」的言论还不够，还需要添加其它可资利用的材料。于是，毛泽东把眼睛转向了朦朦胧胧的过去，试图从那布满尘封的旧物堆里翻找眼下用得着的东西，结果还真的找出彭历史上的许许多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思想问题」、「爱发脾气问题」……

而这些问题与庐山上的与会者们都多多少少有些联系，故使得他们也都凑上前来，帮个腔，援个手。

## 26

中国人搞政治斗争喜欢做道德方面的文章，打道德方面的牌。

若要拥护一个人，就会为他描绘出许多伦理的光环，使其骤生许多感人至深的道德力量，结果常常把某些操行不过尔尔之人哄抬为德高望重者。

若要打倒一个人，就会把他从道德上搞臭，使其成为老幼妇孺皆可骂之人，结果常常把某些品行高尚者贬损为大逆不道者。

前者制造伪善，后者进行诬陷。庐山批的是后一手法。

从社会基本行为规范形式上看，传统中国既不是一个以宗教戒条为本位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以普遍法理为本位的国家，而是个以世俗伦理为本位的国家。

儒学与墨学，当数先秦学之显者。两家均以道德学说为本，儒家讲「仁爱」，而怒斥「礼崩乐坏」；墨家讲「兼爱」，而非议「功战糜用」。

宋明儒学，当数秦后学之显者，其间，有程朱与陆王两大宗。两宗都讲道德本心，前者通过缜思推证，把此道德本心推至为万物皆分其义的「天理」；后者则通过参悟直觉，把此道德本心扩展为万物皆容

其内的「良知」。

中国人搞学问爱做道德文章，搞政治则更爱做道德文章。评论政权，先问人心向背；臧否人物，先问口碑如何。此人心和此口碑均属公众道德评价。为其肯定者，则为德政和贤人；为其否定者，则为苟政和无道之人。

道德评价，在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中常被用作打击政敌的有效手段。要抨击一个政权，必说它是腐败的；要抨击一个人物，也必说他是有严重道德问题的。换句话说，要想在政治上打倒一个政权或一个人，就须在道德上搞臭这个政权或这个人。政治批判通常包含道德批判。

中国史上最著名的政治讨伐文章有这样两篇：其一，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伐武则天檄文；其二，陈琳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檄文。两者有一共同点，即都对政敌做了大量道德批判。

骆文痛斥武则天，「性非和顺」，「秽乱春宫」；「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加以魍蜉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骆笔下的女皇帝无德可言，既无妇德，又无妃德，更无君德。

陈琳上骂曹操祖父曹腾无德，「妖孽」宦官，「饕餮放横，伤化虐民」，再骂曹操父亲曹嵩无德，「乞丐携养，因赃假位」；再骂曹操本人无德「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僇狡锋协，好乱乐祸」，「割剥元元，残贤害善」，「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陈笔下的曹操也是无德可言，既无祖德，又无己德，更无臣德。

中共党人承继了这一传统政治斗争手段，无论是打江山还是坐江山，都对政敌作出许多道德批判。

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中共军队内部曾掀起「新式整军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让解放军战士尤其是让那些刚由国军转为共军的新战士「诉苦」，诉家乡的地主老财是怎样榨取他们的血汗、怎样夺走他们的土地、

怎样强奸他们的姐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卷第3章第5节；《彭德怀传》，第17章第5节。）……显然，这种「诉苦」具有强烈的道德批判性质，并因此而具有巨大的政治鼓动效用，即能够促使解放军战士把自己的「苦」转化为对国民党的「恨」，转化为奋勇杀敌的决心，尤其是能够促使那些刚刚缴械投降的国军士兵迅速转变为敢于冲锋陷阵的共军战士。

另外，中共党人还曾打起过反国民党腐败的旗帜：揭露其接收大员搞「五子登科」，即在接收敌产过程中大捞金子、票子、房广、车子、女子；揭露其军政要员及其子女大搞官倒，大发国难财；揭露其领袖人物极度富豪化，有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某至告诉那些饥肠辘辘者，他老蒋夫人宋美龄常用你们喝不上的牛奶来洗澡（笔者1960年代读小学时还听到这样的说法）。显然，这些指责也都具有道德诘难的意义，不管其真实程度有多大，但其政治效用是确然无疑的，即实实在在地激起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与反叛，从而加速了这一统治在大陆的溃败。

中共今日也遭遇着国民党当年所遭遇的那种困境：不仅受到别人的政治批判，而且受到别人的道德批判；不仅被别人指责在政治体制上不民主、大兴一党专政，而且被别人指责在官场活动上不廉洁、大兴腐败之风。

相对说来，中共政权不大怕人们说它不民主，因为中国的许多工人、农民、甚至一些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民主制度并没有真切的体认；但它非常怕人们说其腐败，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若让他们也来「诉苦」时话，他们也会倒出许多苦水来，也会说出许多今日的「黄世仁」、「南霸天」（大陆官方报刊已有此说法（《长江日报》，1994年9月22日。))来，也会揭出许多今日的「四大家族」、「八大家族」。

「文革」搞「忆苦思甜」活动就搞出过这样的事：一些憨厚老农竟在诉苦会上大诉六零年饿死人之苦，说「老蒋时期」，甚至「鬼子时

期」都没有「大跃进时期」饿死人多，结果诉得台下革命群众啼笑皆非，诉得台上左派坐立不安。

执政后，中共党人仍是频频使用道德批判手段来整治政敌。批党外的梁漱溟时，大讲他当年在国共和谈期间如何不讲朋友交情；批党内的高岗时，则大讲他如何结党营私，如何品质败坏；批彭德怀时，就更是肆无忌惮地做这方面的文章了。

在庐山会议给彭德怀开出的许多罪名中，最重者莫过于「面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了。

8月1日，毛在常委会上向彭提出质疑：是否从国际取了点经，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在这同一天会上，毛还指责彭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次日，毛又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开篇即言道：「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末尾又说道，此「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67。）

在毛本人颇有深意地作出这两点提示后，他的追随者们心领神会，很快就追查起来，责令彭德怀交代「里通外国」的具体情节和「军事俱乐部」的纲领、组织、名单。彭对此予以拒绝，并因此而受尽折磨。这两条罪行，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上看，均属大逆不道的罪行，均应受最严厉的道德批判。

所谓「里通外国」罪，在中国人的道德词典里就是「汉奸」罪，十恶不赦。正因此，李锐把这「国际取经」说，称之为「射向彭总的一支恶箭」，「『里通外国』，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罪名。」（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75。）

所谓组建「军事俱乐部」罪，按中国传统政治话语来说，轻则为结党营私，重则为结党谋反，无论轻重，都属乱臣贼子所为。毛泽东本人有一段话，把这一层意思挑得非常明白：「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8月1

日讲话)言下之意,彭是一个终究要犯上作乱的人,故而也是一个现在就应对之作出防范性处理的人。

在庐山批彭问题上,与毛配合最好者当数被他急令调上山的林彪。后者批彭的重点就落在彭的道德问题上。据李锐记录,他仅在8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就数落了彭德怀一大堆个人品质问题,扣出的帽子达数十顶之多:(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48-252。)

讲假话,有野心;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总觉得自己行,自视很高;看风使舵,拿石头打船;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是个不驯服的党员;入党后即独立为王,长期独断专行;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老奸巨滑,老于世故;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记仇;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骂儿子样骂干部,似本能;相处过多少人,总觉得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

林彪这段讲话,在整个庐山批彭言论中显得十分突出:在那样一种高级别的会议上,林将军却在那里大谈很琐屑的问题;在那样一个主要是争论重大路线是非的会议上,林将军却在那里大讲彭个人性格的问题。这很像是一位德育教师在给一个坏学生写操行评语,一写就写了一篇言词激烈且又鸡零狗碎的话。

林这样做,表面看似有些文不对题,实际上颇有打击力度,即颇有效地在中共内部损害了彭将军的道德形象。林彪是一位很懂政治,尤其很懂中国传统政治的将军——事实上他也是中共高层内少有的——一位能把毛泽东摸得很透并予以利用的大员。林非常清楚在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中,伦理问题据于什么样的位置,道德批判又具有什么样的效

用。他的这段讲话，与前面提到的骆宾王和陈琳的两篇檄文一样，都是大搞人格攻击的力作，只是文采风度不及前人罢了。

毛泽东以及林彪所以对彭将军作如此严厉的道德批判，除了可从中国人政治斗争喜打道德牌这一传统模式上作出解释外，还可从暴力打江山这一特定角度来理解。

一般说来，起于暴力反抗的开国元勋们，多为沙场英雄，多有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常常表现为一种伦理精神，一种感人至深的道德情操。

它可能是一种献身精神，一种英勇气概。能够从刀口枪尖上滚过来的人，能够从枪林弹雨中冲出来的人，还畏惧什么？

它可能是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种吃苦耐劳的品质。能够从居无常所、食无常饱、衣无常暖的征途中走过来的人，还有什么样的苦吃不了？

它可能是一种团队精神，一种战友情怀。长期生活在一个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斗群体中的人，最知道什么叫集体主义，什么叫袍泽之情。一个自己把生命托付给别人而别人也把生命托付给他的人，最知道什么叫情深似海，什么叫义重如山。

.....

上述这些以长期战争磨砺为背景的伦理精神，在彭德怀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

彭将军勇冠三军，历经数百战，身先士卒，破关斩将。红军打开于都城时，第一个上城墙者，不是别人，正是军长彭德怀。八路军进攻关家瑙时，抵敌最近的举望远镜者，也不是别人，也正是副总司令（实际行使总司令职权）彭德怀。朝鲜战争时，林彪不敢领兵，彭德怀敢领。庐山会议时，别人不敢摸老虎屁股，又又是彭德怀敢摸。

彭将军的艰苦奋斗精神也表率全党，用朱老总的话说，「谁也比不过他」。在红三军团中，军团长与马夫同吃一锅饭。在八路军总部里，副总司令与战士同食山野菜。即便野菜，他也不准战士在村子附近处挖，而让他们到较远处挖，不与民争食，既克己，又克军。当他被打成坏人的消息传到太行山时，老百姓们死活不相信。（《彭德怀传》，页 290-291。）

打下江山后，他仍然是粗茶淡饭，轻车简从。住进中南海后，他又大骂某些将军干起「选妃子」的臭烂事，（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342。）竟把全军最漂亮的文工团员送进新华门里的跳舞场。

「三陪」是今天的话，可其中的「陪舞」对于这个党的高层来说，就不只是今天才有的事。军中粉黛、党中佳丽陪首长跳舞，就曾是一种由延河水畔延续到中南海里的娱乐传统，或说是一种实行多年的「保健制度」。那位曾骂彭将军是「伪君子」的主席大人，就十分乐于此道。他老人家从陕北舞到北京，从中年舞到老年，一直舞到「快三」、「慢四」舞不动时；兴致最高期间，隔三差五，便于群芳簇拥中左搂右揽，跳到不亦乐乎处。彭将军对此深为轻蔑且厌恶，曾一怒之下把众多陪舞者通通逐出新华门外。可以想像，他的这一举动，不知要得罪多少「党头」、「军头」。

彭将军秉性耿直，不喜交际，常给人以不近人情，不易相处的印象。似事实上，他心肠织热，作战讲风格，待人重情义。长征途中，彭将军直接指挥了遵义之战全过程。仰攻娄山关时，他命自己亲领的三军团破关开路，而让友邻部队跟后前进。夺取遵义城时，他又让三军团去攻有内外两套城墙的老城，而让一军团去打没有城墙的新城。迎战吴奇伟援兵时，他又让三军团正而冲杀，而让一军团侧面出击。三战下来，三军团伤亡过半，每连兵力多者 50、60 人，少者 4、5 个班；4 位团长，2 位负伤；12 位营长，6 位伤亡：「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彭德怀传》，页 132-133。）许多年过去了，谈到遵义之战时，许多当事人只说毛主席如何运筹帷幄，而不说彭将军如何纵

马阵前、如何顾全大局；与此相应，许多后来人也只知毛主席的中央红军大获全胜，而不知彭将军的红三军团损失惨重。

过雪山时，彭发现属下孙毅（后为解放军中将）没有食物，当即把自己的干粮一分为二，一人一半。四十六年后，孙将军回忆道：「这件事我终身难忘，彭总那颗朴实和善良的心，清澈可见。」（《彭德怀传》，页 1373。）

远征新疆时，彭听到部下汇报昔日西路军女战士被杀、被俘、被奸、被卖的遭遇时，不禁泪如雨下，呜呜不能成语。（陈海涵，《在彭总指挥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页 241-246。）将军也是感情中人。

视察西南三线建设途经大渡河时，彭将军触景生情，「两眼含泪，凝视着波涛翻滚的河面」。随行人员找到当年的一位老船工，彭急步上前，代表当年所有乘船红军，向老人家深深地鞠了一躬。（景希珍口述、丁隆炎整理《在彭总身边》（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 126-129。）将军也是知恩知义人。

彭将军无疑是很有道德情操的，故而也是很有人格魅力的，因此，要彻底地打倒他，就必须相应地做这方面的文章，泼其污水，栽其赃物，以抹黑他在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形象。这也正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庐山上大行其道的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斗争中常见的那种阴柔克刚强的事。

## 27

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阴柔之道，还体现于一种姑且叫做「除悍禁暴，摧阳折刚」的执政原则。前述「机会主义」，「伦理主义」等斗争策略主要被用来整治政敌，此一执政原则主要被用来统治臣民。

专制制度对其治下臣民的性格类型是有所选择，即需柔弱而排斥刚强。在专制君主看来，理想的臣民应该是那种怯懦恭顺、畏首畏尾

的人，而不是那种直言骨鲠，敢作敢为之人。他们最敌视那些强悍刚勇、遇有不平则勃然而起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比如，面塑艺人要想随心所欲地揉捏出各种形状的面人，就不能让面团里存有石子砂砾等硬物。同理，专制统治者要想随心所欲地驱使治下臣民，也不能允许他们中存有敢于犯上的硬汉、敢于出头闹事的强悍之徒。

「除悍禁暴，摧阳折刚」这一执政原则从理论上说，可追溯到荀子和韩非子的著述中。荀韩两夫子可说是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的理论奠基者，堪称中国史上的百帝之师。尤其韩非，大讲「法」、「术」、「势」，把许多中国皇帝都给教坏了。颇有讽刺意义，韩夫子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奉献给了专制主义制度，而且把自己的脑袋奉献给了专制主义制度，他本人成了秦国专制者的刀下之鬼。

荀子对于社会中那些敢于争斗的人很不以为然：「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圣王之所不畜也。」（《荀子·荣辱》。）

荀子还主张，要建立「大化至一」的理想社会，就必须做到「暴悍勇力之民为之化而愿」，即要把那些「暴悍勇力」者「化」为拘谨恭顺之辈。（《荀子·议兵》。）荀子还记述了孙卿子对秦国风俗的赞誉，称赞秦国老百姓为「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称赞秦国官吏为「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荀子·强国》。）秦国是当时最专制的国家，其君主最为专断，其臣民最为恭顺。换言之，在其社会内部，暴悍勇力者最为少见。

韩非子则大讲「法」与「私」的对立，力倡兴「法」灭「私」；「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所以治

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立法，则莫得为私矣。」「道私者乱，道法者治。」（〈韩非子·诡使〉。）

其「法」，指的是专制集权之法，即要求国人言论一律、行为一律之法。其「私」，与「法」正相反对，指的是臣民的独立言论和独立行为，故不容于专制集权之法。

在韩非看来，最为反叛性的「私」有两种：其一为「私学」，以儒士为代表，「儒以文乱法」；其二为「私剑」，以游侠为代表，「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

前者是民间社会的文化强者，后者则是民间社会的武力强者。两者都是专制集权制度的对立面，故而都要为这个制度所打压。

荀韩之后、秦国以降，各朝各代的专制主义统治者，都奉行这种除悍禁暴、摧阳折刚的统治原则，并呈越除悍越严厉、越禁暴越彻底之势。到了公元 1959 年，此一除悍除到了庐山会议上，此一禁暴禁到了彭将军身上。

在中共高墙领导人中，彭德怀无疑是最显强悍个性或最有阳刚气度之人。不过，从那位说一不二的主席大人方面来看，彭德怀又无疑是最不听话或最有反骨之人，并因而是最应除掉之人。

彭生性叛逆。9 岁时，他就一脚踢翻祖母的鸦片烟锅，犯了孝道，事后险些被宗族祠堂按家法沉潭。（〈平汉起义〉，《历之研究》（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文学组）1979 年第 2 期。）15 岁遇家乡大旱，他领头反对地主富商囤积居奇，强吃排饭，事后险碰团防局以「聚众闹事，扰乱乡曲」罪名捕获。（《彭德怀传》，第 1 章第 2 节；见《彭德怀自述》，页 4。）18 岁入湘军后，他抱团结社，立志杀富济贫，先是自作主张，秘杀劣绅欧盛钦；后又另树大旗，率部反叛国民政府。

加入中共队伍后，他骨鲠依旧，遇有不平仍是拍案而起，前有臭骂李德，怒斥王明路线之事，后有冷拒刘少奇、热撞毛泽东之举，不

过，两者后果不同：犯上于王明路线没给彭带来多大问题，’仍当他的司令；犯上于毛泽东权威则给彭带来巨大灾难，最终沦为毛的囚徒。

「性格即命运」的格言，虽有些大而化之，但不全无道理。（性格仅是命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它的充分条件。人们可以说，若要成就大业，就须具备坚强性格；但不能反过来说，只要具备坚强性格，就能成就大业。）彭叛逆性格既激使他在群雄并起的战乱世道中打出一片天地，又致使他在一雄独尊的专制体制下蒙受奇耻大辱。他既因好犯上而崛起，又因好犯上而落难。彭的叛逆性格即他的荣辱命运。

彭将军曾给自己下过一个评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91。）他所说的「本性」，自是包括他的「好犯上」的性格。问题是，当此本性未移而江山已改时，就会发生适应性困境。江山未定时，大家都可以争当天下英雄，一些人若「好犯上」，倒有可能成就他们的英雄事业。江山一统后，就只有一个人即最高统治者可以独称天下英雄，至于他人还要「好犯上」、显示他们的英雄气概，就只会自取羞辱、自讨苦吃了。

对于这一点，林彪看得很透，也讲得很白。他在庐山非难彭德怀时说过这样一些话：「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毛主席才是真正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252，282。）这个党、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大英雄，一个大丈夫；而任何想与之争雄者、想与之斗气者，都不能与之并立于党、并立于国，都会被列入除悍禁暴之对象。

具有讽刺意义，在 1970 年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正是这同一个林彪于这同一个地方忘了他十一年前批评彭德怀的话，居然也想在毛泽东面前闹一闹独立性、显一显英雄气。毛泽东说不设国家主席，他林彪硬要设国家主席，并组织起了一支上前吆喝叫阵的队伍，有文有武，蔚为壮观。

可结果正应了他本人早先说过的话：「自古两雄不能并立」。一座庐山容不下两只老虎，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主席：党主席与国家主席。在毛暴然反扑下，林不得不灰溜溜下山，掩旗息鼓；后又急慌慌出逃，「折戟沉沙」。

对于不能向毛泽东挑战这件事，彭将军既认识不到，也做不到，故而不得善终，关押至死；林彪认识到了，开始也做到了，最终却做不到，故而也不得善终，亡命他乡；但有一个人，既认识到了，又自始至终地做到了，故而得以善终，老病而逝。这后者便是曾名满九州的周恩来总理。

据李锐记述，当时在对彭将军围斗中，周恩来表现出的态度不算严厉，但说出的话耐人寻味。他在8月1日常委会上有一段言简意赅的插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49。）

他指责彭：「你的骨头是犯上」；又告诫彭：「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并反问彭：「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

周的上述「指责」，的确抓住了被指责者的真实性格特征。周的上述「告诫」，也的确道出了告诫者本人的真实性格特征。周的上述「反问」，让人觉得似乎就是彭将军曾经指责周的话。

在中共历史上，周的驯服性与彭总的叛逆性形成鲜明对照。周言行如一，真正做到了「驯服」。广义地说，他做了党的驯服工具；狭义地说，他成了毛的驯服工具。

自毛泽东主持中共大局后，周一一直甘当配角，并不遗余力。搞「大跃进」时，他竭力配合过毛；搞「文化大革命」时，他又竭力配合过毛。打倒彭德怀时，他举过手；打倒刘少奇时，他又举过手。

并且，他对毛的支持，既有实干精神，又讲谦让风格。当吃苦事送上来时，他急步抢到毛的身前；当闪光灯亮起来时，他又侧身隐入毛的背影中。当然，他也闹过一些独立性，但几乎每次都以克己服毛

而告终。例如，他曾反对毛的「冒进」，但当听到毛的怒斥声时，便检讨不迭，自己给自己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参见本书第16节）。

在人们对周恩来的赞誉中，最常听到的话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这种说法基本正确，但有些大而化之。人们还可进一步追问：忍谁之辱？负谁之重？顾谁之大局？

这些问题自是要涉及到他的老上级：周公固然有忍「四人帮」之辱的成分，似更多是忍毛泽东个人之辱；固然有负党组织重任的成分，但更多是负毛泽东个人之重任；固然有顾全党和国家大局的成分，但更多的是顾全毛泽东个人之大局。

周公屡屡为毛公拾遗补缺，收拾烂摊子；屡屡为毛公遮羞盖丑，张罗破门面。如果离开周公倾力相助，很难想象毛公还能够搞出那么多名堂，还能够硬撑那么长时间；很难想象毛公在制造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之后居然不倒台，在制造出殃及几万万人的大浩劫之后居然不垮掉。周公所作所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既延长了毛泽东的政治寿命，也延长中国人民的苦难时间。

可见，在如何对待毛泽东问题上，周恩来与彭德怀是迥然不同的。借用周的话说，前者最突出点是「驯服」，后者最突出点则为「犯上」，正因此，前者能够常侍于毛的身旁，后者则不能久留于毛的面前。

不少中共老人在谈到庐山彭毛冲突时，常常流露一种惋惜之情：

如果，怎样怎样；那么，就不会如此如此。

实际上，彭毛不发生冲突是不可能的。一个刚正不阿，一个不容异己，势如冰炭水火。彭不发难于庐山，也会发难于他山。毛公不在此地整彭，也会在彼地整彭。

事情至此，远未结束。毛不仅要打倒彭，而且不准彭翻身，一旦整倒他，就不会再让他站起来。

毛泽东在拒斥彭德怀等人力谏后，一意孤行，硬闯蛮干，你说不可行我偏说行，你说不能干我偏要干，结果把「大跃进」变成了大灾难：

国民经济倒退十年，竟倒退到建国初期水平以下，——三年折腾抵上年年战乱；全国人口损失数千万，竟相当于整个中华民族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伤亡总数，——内忧甚于外患。

毛泽东制造大浩劫、作了这样大的孽之后，有何举措呢？怎样对待自己？怎样对待他人？尤其是怎样对待那些事前曾劝阻过他并且事后被证明为正确的人呢？

此时，他可作这样一些选择：

上者，不胜羞愧；

中者，不觉痛痒；

下者，不思悔改；

下下者，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加害于人。

结果，老人家选择了下下者。

1962年初，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坐在台上，迫于压力，承认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但到了台下，又发自内心，大加赞赏林彪那一通把他老毛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讲话（参见本书第13节），并对那些敢在会上抱怨「大跃进」过失的人耿耿于怀，埋下了日后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予以报复的种子。

同年九月，中共又开八届十中全会，确定执政党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讲话，表明他由大搞经济建设转为大搞政治斗争、从七千人大会以来的守势地位上转到此时的攻势地位上，即又可从另一角度出发来批判人、整治人。

他说到做到，还未等此会结束就一连抓了三个「阶级斗争事件」。其中第一个事件，就是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另外两个事件，分别为批判邓子恢等「刮单干风」和批判习仲勋等「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

本来毛彭庐山之争已由事实作出裁决，谁是谁非已然明了。毛拒不向彭认错，不给彭平反。他告诫手下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彭德怀传》，页 683。）刘少奇也在七千人大会上讲：「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传》，页 678。）

不仅如此，毛及其追随者还对彭打击有加，迫害升级。

例如，庐山会议问彭是不是「从国际取了点经」，是不是「闻了人家的气味」这些质疑性说法，到了此时便被升格为「里通外国」这一确定性罪名。昔日抗日民族英雄如今被说成是投靠苏修的内奸，尽管说者心里很清楚此人连一句外国话都不会说。彭将军为此「心胆俱裂」。（《彭德怀传》，页 678-679。）

又如，庐山会议后，彭只是被调离现职，仍享有政治局委员待遇；只是被迁居京郊，仍享有个人行动自由。到了「大跃进」彻底失败后，亦即彭意见被事实证明为正确后，他反而受到更严厉的对待，参加中央会议权利被取消，驻地被监管，行动被跟踪，交往被限制。彭将军实已被软禁起来，实已「沦为吴家花园里的政治犯」。（《彭德怀传》，页 685。）

毛如此对待彭，使人不禁想起袁绍如何对待田丰之事：（陈寿，《三国志》，卷 6，传第六。）

袁绍欲发兵攻曹。谋士田丰尽陈弊害，竭力劝阻。袁绍听之不悦，将田囚入牢中，遂率大军南征。果不出田丰所料。经白马、延津、官渡数战，袁绍不敌曹操，大败而归。有人向田丰迺贺：先生料事在先，「君必见重」。田不以为然：「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

果又不出田丰所料：袁兵败后，恐为田耻笑，非但不重用他，反而将其诛杀。他这是由败而羞，由羞而恼怒，由恼怒而不容人，尤不容那种已被事实证明为比他袁绍高明的人。史家陈寿评之：「绍外宽雅」，「而内多忌害」。

毛公何尝不也如此，当自己执意导演的「大跃进」彻底失败后，不仅不去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去竭力加害那些曾劝阻过自己不要犯此错误的人。他容不得党中国中有比他毛泽东更正确的人，容不得党中国中有向他毛泽东显示刚勇气概的人。

不过，毛彭之争与袁田之争不尽相同。两者有相似处，亦有不相似处。相似处在于毛堪比袁，不相似处在于彭不及田。

此「不及」指的不是刚正不及，而是算度不及。彭尽管也能发现毛一意孤行错误，并且也能直言相谏，但未能认识毛在铸成大错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迁怒他人的政治品性，相反还对他报有许多良好期望，故就不如田谋士。

当彭亲眼目睹「大跃进」惨重失败后，并看到中共中央为补救这一过失而发布的〈十二条〉、〈八字方针〉、〈农业六十条〉时竟天真地认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因实践而得到解决。」（《彭德怀传》，页 668。）

彭将军不仅有如此天真的想法，而且作出一些天真的举措。

1961年，中国还未从「大跃进」的浩劫中摆脱出来，仍是一片破败景象。彭德怀却于当年九月向毛泽东提出要去农村考察。

彭此举就客观效果来说，无疑是去翻看毛搞经济建设的失败记录，无疑是去端详毛胡乱折腾出来的破疤烂疮，故很难为毛所快。彭似是不明个中隐情而行事，结果屡碰钉子。

下乡调查前，彭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见面。毛答复，现在不见，回来再见。待到返京后，彭又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谈一谈。毛此次连个答

复也不给。（《彭德怀传》，页 668，677。）

彭本想为党再做一点调查工作，再提供一些真实情况；但没想到所获得的回报，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将他的罪名大大加重。他又本想向党提出申诉，请予澄清自己的问题；但又没想到所获得的回应，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他的此举定性为向党发动「新的进攻」。

可见，彭德怀虽能够发现毛在政治举措上的许多弊端，却很难认识毛在内心深处里的一些弱点，如陈寿所说的那种「内多忌害」弱点；故而一方面对其牢骚满腹，另一方面又对其存有希望，仍愿意向其提意见，仍愿意向其作申诉；结果不断遭其打击，不断受其凌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认识不及田丰对袁绍的认识。田一眼就把袁看穿，彭则历经磨难才把毛看透，才碰终前要拒吃「毛泽东的饭」，要拒服「毛泽东的药」。

不过，话又说回来，彭德怀毕竟属于猛将而非谋士，难免刚勇有余而算度不足。

借用前文所引韩非之言，彭将军可被排入「私剑」之列，田谋士则可被排入「私学」之列。前者以刚勇气概直逼专制君主，后者则以独立见识洞察专制统治者。

实际上，在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中，既有「私剑」者，如彭本人；也有「私学」者，如党内大秀才张闻天。后者以见识为长，能够把毛这样的专制者看得很透（参见本书第 25 节）。

1949 年后，在整个中共内，敢于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者，唯彭德怀将军一人。彭无疑是中共高层中最具有刚勇性格的人，故也是毛泽东主席最不能容忍的人。彭要保持自己有话直说的一贯作风，毛要确立自己说一不二的专制权威，于是，两者间的对立乃至冲突成不可避免之势。1959 年庐山会议，则为这种冲突提供了时间、空间、以及人事机缘，于是，有了彭德怀的「意见书」与毛泽东的「反右倾」之争，

有了庐山上的「龙」与「虎」之斗。结果，彭被打倒，毛又一次获得党内斗争的胜利，又一次打破执政党内部力量所给予他的制约。

1934年江西广昌，当最能打恶仗的红三军团都顶不住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时，红一方面军就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

二十五年后江西庐山，当最敢讲真话的彭大将军都挡不住毛泽东主席的蛮干时，中国老百姓就只剩下挨饿这一条路了。

这同时意味，打这以后，中共高层内就再也不会有人敢站出来公开指责毛泽东了；与之相应，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任他折腾，任他折腾完中国经济，再折腾中国政治，干完「第一件大事」，再干「第二件大事」。

## 第三篇 转折：七千人大会与八届十中全会

### 引言

1962年，对于毛泽东治下臣民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别的年分，既不是肚子最饿的年分，「黑色六〇年」刚过去不久；也不是世道最乱的年分，「红色六六年」还得等几年。

这一年，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倒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分，一个在其执政涯中堪称转折点的年分。隆冬一月，北京开「七千人大会」，老人家低下了头，认了错：「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分，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它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4。）

金秋九月，北京又开「八届十中全会」。老人家再次昂起了头，昂得比过去更高，并作出一副高瞻远瞩的模样，向人们郑重地宣布：

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少则几十年多则两百年），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很激烈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1962.9.27）〉，《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此断言口气宏大，言辞激烈，撞钟击鼓般地告诉中国老百姓，他们的毛主席现在要去做比搞经济更重要也更迫切的事了。

### 28

在这一年中，执政者毛泽东先是低头退却，后又昂首进击，从而

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转变：由主要搞经济建设转变为主要搞阶级斗争，由竭力做「第一件大事」转变为竭力做「第二件大事」。

在此之前，面对饥号遍中国的惨况，老人家项上那颗一向是高高耸起的头颅已频频低垂了，那张总显得豪情万般的脸上竟不时透出些愧色来。

在 1961 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反复谈到要恢复实事求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承认自己近几年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从前在江西做的那种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372-373。）

同年 3 月 13 日，他在写给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信中，先是批些人以及各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对于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义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继而捎带批评了自己一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904。）

9 月 29 日，他在写给中央政治局其它常委的批示中承认，在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定于生产队还是定于生产大队这一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 1956 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939-940。）

到了第二年初，老人家把这种自我批评从中央高层内做到「七千人大会」上，正式向全党认错，说出了前文所引述的那段话。

不过，他说出那段认错话的时间，并非会议之初，而是会议开幕后的第 20 天。当时，按原计划接近尾声，但许多与会者反映，他们心中还有些话没有讲完，还有些气没有出尽，希望会议再强调一下发扬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等问题。政治家毛泽东在获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常委们商量，决定延长会期以补议这些问题。

1月29日下午，他宣布会议要接着开下去，开成「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大家满意」。

1月30日下午，他本人作了长篇讲话，讲民主集中制，讲自己也有错误、也应承担责任。他一共谈了6个问题：1、此次会议开法；2、民主集中制；3、现阶段阶级关系；4、认识客观世界；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6、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他谈得较多的是第二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他谈前者谈出了十个问题，谈后者谈出了四十年党史，都力图回答执政党近几年来何以犯错误问题。他谈前者时说，这是因为执政党没有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尤其是没有充分地发挥党内民主。他谈后者时说，这也是因为执政党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缺乏这一方面的经验。

那么，他所谈的这两个问题与他本人有什么关系？他有没有把自己谈进去，承认不承认自己既不讲民主又缺乏经验？通观其讲话，他谈前者只谈别人，谈后者才谈到了一点自己。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1-5。）「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上了我们的宪法，他们就是不实行。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跨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控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

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在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议论纷纷呢？」

毛泽东在谈别人不民主时，也谈到了自己，但主要是作为正面例证来谈的：「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它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他在谈有些人犯了错误自己不说也不许别人说时，再一次谈到了自己：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

随后便讲了那段「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的话。

这里确有承认错误之意，但更有表白自己敢于自我批评且勇于承担责任的意思。

不讲民主，本应是执政者毛泽东难以启口的痼疾，如今倒成了他滔滔不绝的谈资，并获得阵阵掌声。

毛承认自己确有错误，但只把它归结为认识问题：（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5-9；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

回顾》，页 1030-1031。）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又指出这种认识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毛还特别以「民主革命」为例：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 1921 年党的建立直到 1945 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廿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 1942 年春天到 1945 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

在此之前，「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 1927 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 1/10。……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

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的客观世界。」反之，「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在此既讲历史又谈哲学，无非是要向他的党人表明，他们的主席搞社会主义建设犯错误是合乎认识发展规律的，是合乎情理的。而那些无论在历史学识上还是在哲学见识上都远不及他的听讲者们，自然听得确信不疑，感动不已。

其中的一位听讲者薄一波再三十年后回顾此事时，仍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之情：「毛主席这段话讲得多好啊！他的态度如此诚恳，谦虚，当时大家听了，无不深受感动。……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光明磊落的精神。」（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031。）

显然，薄某不是在正视毛泽东，而是在仰视他，带着一种近乎宗教感的领袖情结来看待他，崇敬有余，说理不足。这也是许多老中共党人至今仍弃之不去的心理包袱。与之相反，只要抱着客观态度，稍加分析，就可看出毛所说的这些话有许多漏洞。

例如，他承认周恩来、陈云等比他更懂经济，可他又为什么要强使他们作违心检查，并越过他们抢到前台来独断一切？他承认自己对搞社会主义建设知之不多，可他又为什么要拒绝别人提意见，甚至把提意见者打成机会主义分子？显然，这已超越了认识问题，而涉及到政治问题，涉及到执政者如何运作政治权力问题。

又如，他说人们在做那些从未做过的事情时难免要犯错误。这种说法过于抽象，回避了个重要问题：

犯错误一个程度问题，有犯小错误者，有犯大错误者，甚至有犯特大错误者。人们可以说做事难免要犯错误，但不能说做事难免要犯大错误或特大错误。毛泽东以及由他领导的执政党在这几年中所犯错误正是这后者。

可见，毛用上述话来解释其错误，实是用抽象来混淆具体，用不加限定的一般常理来掩饰其所犯下的特定错误，即那种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错误。又如，他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北伐战争与土地革命战争两度失败，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这位老党人在说此话时，有意无意地漏掉了一个重要史实：

中共在这两度失败后，不仅获得了对革命的认识，而且撤掉了一些领导人的职务，至少把他们排除到最高决策圈外。这期间先后被撤职或被降职的中共领导人有陈独秀、翟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秦邦宪、陈绍禹等。重大的失败必须有重要的人物来承担重大的责任。这种承担责任不能以责任者说几句认错话来了事，而应使其受到严厉惩处，至少被逐出决策圈外，使其不能再贻害本党。

可是，毛泽东在用本党搞民主革命的失败教训来解释自己搞社会主义的失败后果时，只谈失败能够增进认识的一面，不提失败应有负主要责任者为此丢官的一面。这种谈法显然是实用主义的，是唯我所用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的按照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惯例来行事的话，那么，毛在1962年初就不只是认错了，很可能要下台了。这无论对他自己来说，还是对他的党对他的国家来说，都有好处，至少他执政后所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就很可能搞不起来。

再如，他说党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故在行动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干出「许多蠢事」。这一说法也有难以说清的地方：

毛说此话时，新中国已有十二年历史了，其间分为前八年（1949-1957）与后四年（1958-1962）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由周恩来、陈云等人掌管经济工作，后一阶段主要由毛泽东自己挂帅搞「三面红旗」运动。按理说，前八年经验要少些，捅的漏子要大些；后四年盲目性则应小些，干的蠢事也应少些。实况恰恰相反：前八年不仅没有捅大漏子，而且成绩斐然；后四年盲目性则更大，干的蠢事也更多。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很尴尬，不仅有其责任问题，而且与其理论不符：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短反而错误很少，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

长反倒错误很多。显然，这个问题对老人家来说是回避不了的，必须予以解释。

毛泽东承认前八年的建设做得比较好，但又指出：「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那么，后四年的建设又如何呢？他说：「从 1958 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 1958 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国防大学编，《中国共产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4 册，页 8。）

简言之，前八年建设，虽然搞得很好，却是照抄别人的，缺乏创造性；后四年建设，虽然碰钉子，却是自力更生的，故不免缺乏经验。

如此辩解，让人觉着老人家太缺乏风格了，对别人过于苛刻，对自己过于迁就。共产党家中的理，不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让他一个人说了。不幸的是，如此强词夺理的讲话，竟还能赢得满场的喝彩，赢得全党七千名县以上干部的附和，故预示着这个党还要犯大错误，还要栽大跟斗。

话说回来，毛泽东毕竟在「七千人大会」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认自己应对执政党失误负有领导责任，总算低了一下头。这意味着他将从经济战线上退却下来。

## 29

对于毛泽东从经济战线上的退却，他的同志们尤其是他身边的那

些中央大员们，将会作出何种反应呢？

这些大员们表现出一种好意与戒心参半的态度来：一方面，为他遮遮掩掩，好让其走人了事；另一方面，对他旁敲侧击，以劝其好自为之。

出于维护毛泽东威信的好意，他们纷纷出来为其打掩护，使之体面退场。其中，出力较多的几个人：一是于 1940 年代被毛确认为第一副手的刘少奇，二是于 1950 年代被毛提升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评，三是于 1960 年代被毛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先是代表中央向会议提交一分书面报告以供与会者讨论，后又发表讲话以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 349-417, 418-443。）在此报告与此讲话中，刘反复强调，这几年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与此相应，他列举了 12 条成绩与 4 条缺点错误，并说如果大家觉得缺点错误说得不够，还可加上一两条。他还补充道：「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不再犯了，已经改正了，或者正在改正。也就是说，缺点和错误的大部分已经过去了，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

关于这些缺点错误的性质，刘一再强调：「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

另外，刘还特别提到 1959 年庐山会议，继续为毛泽东进行辩护，继续对彭德怀进行诋毁。在书面报告中，他坚持说，彭德怀上书是为了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庐山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彭德怀传》，页 678。这两段引言，在

后来编排的《刘少奇选集》中均被删去。这种大肆删改重要历史文献的现象，在现今出版的已故中共领导人的文集中屡见不鲜。如此做法是不负责任的，既不尊重死去的人，也不尊重活着的人，是在有意识地对读者、对人民进行隐瞒。这一做法也是不聪明的，因为，后人最终能够看到文章的本来面目，同时能够看出这些选编者们是如何在那里裁剪历史的，并对他们嗤之以鼻。)

在大会讲话中，刘又解释道，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右倾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活动有关」。于是，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坐于一旁的毛泽东当即作了一个画龙点睛般的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彭德怀传》，页 678。)

于是乎，彭德怀为民请命之举有了汉奸嫌疑，并且这种嫌疑被言之凿凿地公布于这个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干部会议上。

据《彭德怀传》的记述，当将军在后来读到此话时，脸色突变，拍案而起，心胆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连声喊道：「污蔑！污蔑！」(《彭德怀传》，页 678-679。)

刘少奇在此大会上，之所以要提庐山会议、要讲这些不实之词，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毛泽东主席的。在毛搞「大跃进」推行「左倾路线」的过程中，1959年庐山会议是一关节点：毛的左倾路线在此之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在此之后，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方面。

毛犯错误在此前，还可以说是无意所致；在此之后，就无疑是一意孤行、明知故犯。结果这条左倾路线不仅搞垮了经济，而且打击『忠良、坑害了百姓，致使几百万党员蒙冤、几千万人民被饿死，可谓罪孽深重。

刘少奇要维护毛泽东路线的「基本正确性」，要维护毛泽东本人的「光辉形象」，就不能从庐山会议结论上后退，就不能不朝彭将军那已

到处是伤的身上再踹一脚。

由邓小平领衔的中央书记处曾向中央常委会提出报告，一方面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另一方面表示要由他们来为这几年错误承担责任。邓本人也在大会上谈到：就全国来说，首先由中央负责；就中央来说，则首先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页 355；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4 册，页 14、17、18。）

虽然「七千人大会」被称做「出气会」，即大多数与会者都对这几年来党的工作进行了批评，重点批省委；但对于中共这个很强调精神力量的党来说，不能光「出气」，还得要「打气」。临近大会结束时，总书记邓小平作报告，强调他的党仍有「五好」：一是「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二是「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其它三好分别为「好的骨干」，「好的传统、好的作风」、「好的人民」。（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 298-301。）

至于林彪如何为毛泽东辩护，前文已作论述，指出他大发奇论：一是东拉西扯，说我们虽在物质上损失了，但在精神上收获了；二是颠倒黑白，说我们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毛主席的话去做。对于林这番辩解，毛非但不觉背理，反而大加赞赏，认为比其它人讲得好。

关于林讲这番话的动机，有论者指出他是在故意制造个人崇拜，以实现个人政治野心。（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411-41。）本文以为，林如此说法除藏有他个人心机外，还存有为毛着想之意，他很想帮他的老首长过这道坎。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共高层派系中，林与刘邓都同属毛的班底，都受过毛的大力提携，故而都与毛休戚相关。

毛对林所作辩护的赞赏，就被辩护者方面来说，意味着毛不容异

己的政治品性蒋更趋显化。就辩护者方面来说，意味着刘少奇与林彪的政治仕途将发生变化：前者已走到尽头，后者则继续上升，直至完全占有乃至超过前者曾经达到的位置。

在此番保毛过坎的众多大员中，自然少不了周恩来总理。四人抬的轿子，已有刘、林、邓三方，余下一方便是此公了。在大会最后一天，周登台发言，十分恳切地作出自我批评，承揽责任。另外，在大会分组讨论中，以及在会前会后，周还多次作检讨，说「这几年所犯错误，国务院要负主要责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027-1028；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4 册，页 14，18。）

显然，周恩来这一自责言过其实了。就实际情况看，在「大跃进」之初，他是被毛赶着走的，是在被毛严辞批评而不得不做关于「反冒进」违心检讨后起步的；在「大跃进」之中，他也头脑发热，讲了过头话，做了过头事，甚至写了一本多有虚夸言辞的小册子《伟大的十年》；在「大跃进」之末，他则殚精竭虑，为毛收拾烂摊子，填窟窿、补漏洞。因此，周对「大跃进」失败，纵有责任，也不应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自 1935 年后，就没有直接反对过毛泽东，而总是支持他，至少是顺从他。这种支持和顺从常常采取自我批评的形式（参见本书 12 节）。建国前，「遵义会议」上，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他站起来通过严责自己的方式，为毛重掌军权投了最有分量的一票；在「延安整风」中，他又以中共资深领导人身份作现身说法，以自己的错误来证明毛的正确。建国后，搞了「反冒进」，他便检讨自己犯了保守的错误，以服从毛的领导；搞了「大跃进」，他又检讨自己犯了激进的错误，以维护毛的威信。

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共党内做自我批评做得最多也是做得最好的人，既勇于做自我批评，又善于做自我批评。他做错事能够自我批评，没做错事也能够自我批评。并且，他每次做自我批评，无论做恰如其分的自我批评，还是做夸大其词的自我批评，都不影响他在党内的威

信，甚至能增进他在党内的威信。

尽管他的许多党人都说他严于律己，但历史要说他在严于律己的同时过于姑息毛泽东，过于容忍这位老人家为所欲为。毛无论搞「大跃进」还是搞「文化大革命」，都得到过他的支持。这种支持有时是有所保留的，但多数情况下是倾其心力的。

总之，面对因毛一意孤行而酿成的经济浩劫。国家主席刘少奇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党务干臣邓小平说，他所铃衔的书记处应对此错误负有主要责任。政府首脑周恩来说，他所掌管的国务院应为此错误承担主要责任。军队统帅林彪十分干脆地说，毛主席根本没有责任。

四个轿夫吆喝着不同号子，但都朝着一个方向用力，都要把已陷于泥淖中的老人家抬起来，结果也真的抬起来了。在众大员竭力掩护下，毛泽东终能从「大跃进」惨败中全身而退，中央主席的位子照旧坐着，伟大领袖的形象依然光彩夺目。

### 30

这些中央大员们在力陈上述不实之辞时，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想为毛作些掩护，一方面又对毛存有疑虑：你捅了那么大一个漏子，点一下头就要走人，似乎没那么简单；再说我们好不容易将您抬出一个烂泥坑，不是为了让您再跌进另一个烂泥坑，弄得大家不能安歇。

这种矛盾态度在刘少奇这位政治局大班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他一方面坚持说这几年执政党所犯下的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另一方面又对「三面红旗」持保留态度：「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页 426。）可是，这「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面面都涉及路线问题，都具有路线性质。

在分析三年挫折原因时，他多次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认为主要原因是人为的，并指出这种人为原因突出地表现为一些领导同志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尤其是破坏了党的民主作风。他向「七千人大会」提供的〈报告〉和他在大会上作出的〈讲话〉，都有一一对应三个部分，韵固部分都反复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其中第二部分就直接以此为标题。

据薄一波记述，「少奇同志在修改自己的讲话时，亲自用铅笔重写了几大段话，加进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强调这是几年来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037。）

诚然，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人不在少数，中央有，地方也有，中南海有，各部委也有；但最突出者无疑是那位权力最大者，那位今日吆喝这个部、明日拍板那个委、此次批评张三大员下次训斥李四大员的老人家。

可见，刘少奇此番大谈民主集中制问题，尤其是大谈民主作风问题，不能不触到毛泽东痛处。如薄一波事后所说的，「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046。）结果，还没等到刘少奇要于五年、十年后再来总结经验时，老人家就在四年后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他算起「1962年的右倾」这笔账。

前文提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为维护毛而继续为「庐山会议」辩护，继续向彭德怀泼脏水。如果稍微推敲一下刘说的那些话，就不难发现内中隐有深义。

据《彭德怀传》披露，（《彭德怀传》，页 678。）刘少奇在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

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

不是因为这封信，那又因为什么呢？刘少奇接着列出彭德怀两大罪状：一是长期以来在党内搞小集团，二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前为结党营私，后为里通外国，皆为中国政治之大忌。

按照刘这一说法，彭在庐山上所犯错误，主要不是在那封信上面写了什么东西，而是在那封信背后搞了一些名堂。这实际上是在重新解释庐山会议，是在变相修改庐山会论结论，使之显得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

彭将军在信上写了什么呢？概而言之，既对事又对人（参见本书第 20 节）：对事，是说这几年来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重大错误，已危及到各阶级各阶层关系，错误具有「左倾」性质；对人，是说党主席毛泽东应为此负主要责任，此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很可怀疑，作风浮躁专断。彭的这些批评大都涉及执政党全局性问题。刘却说彭信所言没有大错，甚至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

至于彭在信背后做什么，刘给他罗列了上述两大罪名。可是，这两者严格说来，都不属执政党的全局性问题，仅涉及党中的一小部分人，并限于他们的个人品质问题。

刘少奇这一新解释可谓「明升暗降」：对彭德怀个人的批判明显地升温了，对会议总体意义的评价则暗暗地降低了。

另外，刘的这种舍信而究其它的责难方式，也使得彭案的确信度大为降底。他放着白纸黑字的东两不问，而去追究那些很难找到实据的问题：

说彭「里通外国」，却提不出有关证据、证人。毛泽东等能够予以确定的事情仅仅限于于彭德怀于庐山会议前曾访问过东欧数国。

说彭搞「反党集团」，却查不出有关纲领、名录。庐山会议斗了数

十日，只斗出一个六人「军事俱乐部」，其中四人（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还是非军人。

再者，给彭开罪名开得过重，也会适得其反，使人们很难相信真有此事，并对开罪名者的这种搞法产生怀疑。

如说彭「里通外国」，可将军本人「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每与外人交谈均有翻译在场，并记录在案。真要是有一此事的话，早就会被揭出来了。毛手下那搞「专案」的人，最会干这种翻箱倒柜揭人隐私的事了。

就彭的军事生涯来看，他曾屡屡同外军作殊死之战，同日本人打了八年，同美国人打了三年，打得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即使在自家阵营内也不怯于外人，对红军太上皇德国人李德敢于臭骂，对「苏联老大哥」不卑不亢，并获苏军敬重。

抗日英烈武士敏将军生前对人说，「当了几十年的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议（第二战区东路军将领会议——引者）上听到了彭副总司令的教诲后才认识的，从此，我才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李国庆，〈粉粹日军九路进攻晋东始末〉，《山西文史资料》，1986年第2辑，页27-39；《彭德怀传》，页183。）

一个国军将领，听了彭副总司令一席话就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可是，那些中共大员们，何止是听过彭老总一席话，哪一个不与彭共事数十年并亲眼目睹彭是怎样为国奋战的，结果却把彭说成是一个搞「里通外国」的人。两相比较，足见这后一种人弄虚作假、薄情寡义到何种程度。

又如说彭拉帮结派，可彭在中共高层中属最不喜欢也最不善于拉拉扯扯的人。无论在延安还是在北京，他都不愿在中共大员之间作联络感情式的走动，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不拜，孤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34。）平日里，将军不苟言笑，做事较真，遇有看不惯事，不管牵涉到什么人都说出来，甚至臭骂一顿，人头越熟越不

讲情面，致使许多中共高干望而生畏。

1950年代，中南海一名卫士向一位首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许多中央首长都有些怕彭总，他想知道彭总是不是真的可怕。这位首长告诉他，彭总并不可怕，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说此话的首长，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严词数落彭总品质不良的刘少奇。（石国瑞等，〈在少奇同志周围——警卫人员的回忆〉，《红旗》1980年第20辑（中国青年社，1980年），页243-244。）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新解释庐山会议是意味深长的：

一方面，委婉承认彭的信中所言，认为其间许多内容是符合事实的，从而间接地肯定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事实上，也无法不作此表示，因为彭在「万言书」上所写的话，除了「毛泽东」这三个字外，其它的话包括像「左的倾向」这种很有刺激性的话，都被与会者们以不同方式说到，并被说得更具体更生动）。

另一方面而言，加重责难彭的个人品质，几乎把他说成是一个「乱臣贼子」，结果淡化了庐山会议的路线斗争意义，同时凸显了这一会议的政治倾轧性质。

显然，刘少奇这种解释既不能为那位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的彭将军接受，也不能让那位正坐于一旁而闷头听讲的老人家感到好受，如其夫人江青后来所言：「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廖盖隆，《党史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页140。）

### 31

1962年初，中共中央七大常委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及前述为毛抬轿子四人外，还有两位重臣也就「大跃进」问题发了言。一是排名第四的朱德委员长，二是排名第五的陈云副总理。不过，两人发言都没发

在七千人均出席的全体会议上，而是发在小范围的分省会议上。两人发言都发得更为坦率直露。

2月3日，朱德出席山东组会议并作了讲话。他讲的中心话题就是反「左」，疾言「那一套『左』的歪风要痛改。」他的这一讲话纪要，后来被冠以〈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篇名而收入其选集中。（朱德，〈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387-391。）

他说：执政党反「左」是十分困难的，「『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刹不住。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他说：「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谁搞「左」的东西能够做到「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其谈锋所指已十分明了。朱将军这番批评可以说是在重述他的老战友彭德怀曾于庐山说过的话，也是他的老政委毛泽东当年最感刺痛的话（参见本书第19节），并也是后者此时最感隐痛的话。

他指出：「自己犯了错误，怕人家揭穿，就压制群众，哪个还敢讲话呀？」「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

他还满怀深情地谈到老红军讲团结、讲友爱的传统，谈到：「对群众我们起码要团结90%以上，对干部就不是团结90%，而是要争取团结100%。培养一个干部，要十年、几十年，不容易啊！要使他到老、到死始终是个好干部。」将军所言使人很容易想到他的那位老红军战友，那位曾经被党培养几十年而如今不再被党团结的老干部。

据李锐记述，当年朱将军在庐山会议上，曾为彭德怀说过公道话，即使被裹胁着参与批彭斗争，也是避重就轻，以致被毛泽东讥为「隔靴搔痒」。（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80-181，191-192，204，226，258，283-284。）此次他在山东组会议上大发批评，虽未指名道姓，但肯定不是「隔靴搔痒」。

毛泽东曾请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后都以自己还未摸清问题为由而推辞不讲。可是，就在大会闭幕后第二天，他跑到陕西省全体来京干部会议上，讲了许多多话。（陈云，《怎样使我们认识更正确些》，《陈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页 187-190.）

陈一向被誉为「党内理财能手」，「国家经济总管」，但在此会上不讲他的财政经济问题，而大谈党的思想作风问题：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二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陈云认为这几年党风问题突出表现为不说真话，尤其不说作为反面意见的真话，不是因为人们没有话说，而是因为人们不敢说话，其主要责任在领导身上：

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

陈云这一批评，虽未特指某个人，似是泛指整个干部群体；但肯定涉及毛泽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他说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在一个地区如果在陕西省盛行不讲真话风气，那么主要责任在该省领导身上；如果在全党乃至在全国大行不讲真话风气，那么主要责任就不在地方领导身上，而在中央领导身上，尤其在那位中央最高领导

身上。在中共高层里，陈云是一个讲话历来不多但每讲都很用心的人。

陈云十分了解他的那位上司在头脑发热时，非但听不来自基层的真话，而且听不来自高层的真话。他也十分清楚彭德怀在庐山所说的都是真话，其中有许多话本来就是他陈云想说而未说出来的。

据有关文献记述，（《彭德怀传》，页 589；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24-125。）在 1959 年 4 月上海会议期间，彭德怀与陈云同住在瑞金二路五号，同席进餐，一起散步，交谈过许多问题，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等问题有较一致的看法。3 个月后，彭上庐山便急冲冲地说出他想说的话，话中自是包括他先前与陈交换过的看法。

人们在读到彭信全文时可能会问：这位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统管数百万军队的猛将军，何以能够写出这种事关经济却头头是道且一针见血的东西来？这除了他本人拥有一颗体恤民情民苦的热心和掌握一些调查材料外，是否还有高人指点？

今天回过头去看，这高人至少有两位：一是在庐山与将军常常见面的张闻天，二是在上海与将军频频交谈的陈云。前者属中共党内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顶尖高手，后者属中共党内从事经济实际工作的顶尖高手。并且，两者都熟知党的历史，都熟知毛的为人。因此可以说彭的意见书，就其提出方式而言，完全属彭个人行为；但就其所写内容而言，不全属彭个人私见，其中许多看法属党中同仁共识。

张上了山则与彭同难，陈未上山故与彭案牵涉不多。不过，后者即便上山，也未必会说彭所说出的那些话，至少不会说得像彭所说得那样坦露无遗。陈多少还有些忌惮老人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就此罢休，会对彭代己进言而受过这件事完全缄默不语。

当 1962 年毛泽东作经济退却时，他陈云在「七千人大会」后，跑到陕西来京干部会上大谈党内民主问题，大批不讲真话风气。

又当 1978 年毛泽东作古两年后，他陈云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预备会上，第一个站起来为已蒙冤十九年的彭德怀鸣冤叫屈，呼吁为其平反昭雪，终获成功。当年年底，中共中央为彭将军补开追悼会以恢复名誉。

## 32

对于毛泽东容不得批评这一领导作风，陈云不仅能从他人的遭遇上观察到，更是能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受到。前述他对此公的那番间接批评，实是出自他对后者的直接了解。

在中共高层大员中，陈云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他能看出许多问题，也想说出这些问题，虽不能像彭大将军那样无所顾忌地说话，但总在寻找机会或等待机会说话，并尽量使说话不过于尖锐以致刺痛那位主席大人。这就使得他与毛关系十分微妙：

一方面，毛承认陈能够看出许多问题的症结，并能开出相应的药方，称之为「良将」、「贤妻」，以致心头一热便委以重任，让其挑担子。

另一方面，毛又不能容忍陈真的要来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故常反悔说气话，致使后者心有余悸，检讨不迭，最后也就撂挑子，打道回府养病去了。

薄一波曾指出：「每当经济建设遇到挫折的关键时刻，总要请他出来，组成中央财经小组，由他主持来解决问题。当时，一些同志把毛主席和中央的这种做法喻之为『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然而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谨慎细致的工作方法，同当时『左』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是不合拍的，这就形成了财经小组完成了解决问题的任务后，又不被重视，中止工作，问题来了又恢复，这样几起几落的情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053-1054。）

正如薄所言，陈对毛搞经济建设所犯的每一个重大错误，都有所发现，并都试图以某种方式予以指正，也都因此受到毛的斥责。不过，陈云与彭德怀不同：彭往往揪着毛的错误不放，非要论出个是非来不

可，即便被整治了也不服气，一有机会就写申诉材料，以反驳种种强加于他的罪名，结与越发不容于毛；陈只要毛一批评就主动走人，以脱离接触，故而使他与毛的矛盾从未激化到毛要致他于绝境的地步。

1955年，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右倾保守思想」，从生产关系变革上一直批到经济建设速度上，结果引发了一个「冒进」狂潮。

1956年初，周恩来与陈云等人联袂「反冒进」，又是发社论，又是砍计划，一度遏制住经济过速增长的势头。陈云在此期间强调：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555-556。）

1957年秋，毛泽东开始「反反冒进」，大会小会批右倾。甚至在会摇着柯庆施文章指名道姓地讥讽周恩来，到会下又说他那样做实际上是针对陈云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639。）在此情势下，周与陈等只得低头挨骂，连连检讨，一直检讨到八大二次会议上才告一段落。

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1957年实际产钢535万吨基础上，计划1958年产钢1,070万吨、1959年产钢2,700-3,000万吨。计划增长幅度均在3位数以上，大大超过实际可能，致使毛自己都怀疑起来。当年11月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遂把1959年产钢指标由2,700-3,000万吨降到2,141万吨（仍是1958年指标的200%），随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又把这一指标降为1,800-2,000万吨。

据薄一波记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828。）1959年初，毛泽东找陈云等人谈经济工作。陈列出诸多困难，认为1959年度计划难以完成。有人不赞同陈的意见，认为是右倾。毛倾向于陈的意见，有心降低指标，故要他向下面讲话。可是，陈云没有理解毛的意思，以为毛又要他作检讨，于是在2月1日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先讲自己真实想法，后作自我批评，认认真真检讨了一番。

另据李锐记述，（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80-81。）陈云此番举

动又把毛泽东弄糊涂了。毛说他本是赞同陈的，但不知陈后来为什么要检讨自己。

笔者在读到这些当事人记述时，也很纳闷：不知是陈把毛弄糊涂了，还是毛把陈弄糊涂了。不知陈云是不是在想：你老毛一贯正确，又总爱让不赞成你意见的人做检查，我这不刚刚才因反您的冒进而做了检查；你如今让我来谈你已允准的事，我又很想谈一些不同意见，故很可能要再做检查；与其迟做，不如早做，或许能主动些。

后来澄清误会，毛正式授权陈云去实事求是地审订 1959 年钢产指标，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后者在做了调查研究后，手起刀落，一下砍去数百万吨，把指标由 1,800-2,000 万吨砍为 1,300 万吨。

不过，就陈云不摸底便检讨这件事来看，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一是说明此时中共高层间关系已十分不平等、不正常了；二是说明陈云对毛泽东批他「反冒进」心有余悸，对毛存有一种畏之如虎、随时准备向其低头认错的心态，以致无所适从、不得要领。

平心而论，陈云在中共高层里属于爱说实话的人，此次也正因为想说实话而难为了自己：既想说实话，又怕毛责怪；权衡再三，只好先说实话，后作检查。结果毛却说这检查多此一举，让他好不明白，同时也让他好不难看。

不知毛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他理应清楚在其殿前行走的诸大员中，除彭德怀将军外，大都很惧怕他，大都唯其马首是瞻，他对了说他对，他错了也说他对。

人们很难理解像陈云这种素来爱说实话的老党人，到了毛的面前竟表现得如此不讲原则；或很难理解像陈云这样一向头脑清楚的明白人，到了毛的面前竟把话说得如此前颠后倒。连陈云都如此，至于其它大员就可想而知了。从这里可看出，毛在自己身边已很难听到他不爱听到的真话，相反倒很容易召集起一支围攻彭德怀的队伍。

陈云曾以自己还没有考虑好为由而拒绝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成为「七大常委」中唯一没有在此会上讲话的人。但在笔者看来，陈云很可能是这七人中考虑最成熟的人。他十分了解国家经济实况，也十分了解毛泽东为人，很想说真话，又不想得罪老人家，于是采取了大会上不说大会后再说的策略。

陈云除了在大会后举行的陕西干部会上大谈党风问题外，又在此后举行的「红楼会议」（3月21日-23日）上，分析了严峻的经济形势，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深获刘少奇等人的赞赏；接着又在国务院扩大会议（3月26日）上，作同一主题报告，赢得国务院各部委领导成员长时间热烈掌声。许多与会者说，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实事求是的报告了。

由于众望所归，陈云于「红楼会议」后再次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领衔总管全国经济工作。

这是他第三次出任此项工作。1957年1月10日，他出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为时不长，便悄然去职。1958年6月10日，他又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因当时毛亲自跑到前台抓经济而被晾在一旁，其中有一段时间被毛起用来落实钢铁指标，随后又因庐山会议开展「反右倾」斗争而再受冷落，直至整个中央财经小组被撤销。他此次被起用已是「三起」，不久又要「三落」了。

从1962年春起，中央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如下调工业生产指标、减少城镇人口、抑制通货膨胀、搞好市场供应以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尽一切可能来促进农业增产，从而迅速改变了局面，使得已经趋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出现转机，转而趋于恢复。这些措施用薄一波的话说，「基本上就是陈云同志在西楼会议和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的那些。」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58-1066。

然而，陈云所作的这些努力，到头来不仅没有获得毛泽东赞赏，反而受其批评，被其指责为刮「黑暗风」、「单干风」。

其一，在形势判断上的分歧。

1961年9月，毛谈了当时形势：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到了当年年底，他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73。）

随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附和毛的看法，作出断言：「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页359。）

可是，陈云不同意毛的看法。但是，也没在「七千人大会」上把问题挑明，只是到了「红楼会议」上才大谈形势的严重性。他指出，（陈云，〈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91-206，207-215。）全国人民还在饿肚子，吃穿用都不够；可是国家基建规模仍是过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灾荒时候负担不了，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赤字严重，通货膨胀，市场萎缩。他得出结论：现在已谈不上发展了，只能谈恢复，这种恢复需要二至五年，其中粮食生产用五年时间都不一定能恢复到以往最高水平。他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话中透出一种似是到了最后关头的危机感。

陈云这些看法无疑影响了其它中央大员。刘少奇在陈云讲话后谈到刚刚结束的由他作主报告的「七千人大会」，说此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51-1052。）为此，他修改了自己在那次会议上所作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的结论，承认「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并指出

「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他在谈到 1962 年经济调整计划时，不无感慨地说：「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刘少奇，〈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刘少奇选集》，下卷，页 444-449。）

周恩来也承认，在这两年来的调整中，「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但现在看来，要争取快，准备慢，如陈云说的那样。至于有多慢，周比陈说得更明确：「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其中粮食生产恢复，需要三至五年时间，至于农业全面恢复（包括农、林、牧、副、渔、），则要超过五年。（周恩来，〈认清形势，掌握主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 403-441。）

毛泽东不同意陈云等人的看法，但当时未表明自己的态度，照发、照转诸大员提请批覆的各有关报告，只是到了数月后才开始和这些大贝们过不去，三番五次地指责他们大刮「黑暗风」：（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074-1077。）

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

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先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了，怎么办？

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今后五年不只是恢复，一定要有所发展。

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

本来诸大员帮助毛收拾烂摊子，是为国家考虑，为百姓考虑，也

是为他这个主要责任者考虑。结果毛不说感谢的话，反说这些人存心两他，并一压就是好几年。言辞之间个人意气凸显，听不得反面意见且好记仇的老毛病又犯了。

诚然，说执政党犯了严重错误自然含有压执政党主席之意，但问题是：这个主席领着全国人民搞「三面红旗」运动，搞得祸国殃民；结果他只在「七千人大会」上稍稍低了一下头，而在会前会后竟觉着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像人们说的那样「黑暗」，又把头翘得很高；因此，于情于理都应该压他一下。

并且，诸大员对毛的批评或曰「压」，一般都是躲躲闪闪的，生怕硬碰硬地冲撞他，故已是相当客气了（也不敢不客气）。换作彭德怀将军，假如他还有许多知晓权和许多发言权的话，那么，他就很可能为老百姓而和毛过不去，让毛下不了「七千人大会」的台。

据薄一波记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069。）当时也有人陈云「西楼会议讲话」不以为然，认为陈这种会上推辞不讲会后「大讲一通」的做法是「不正常」的。薄说，他与少奇、恩来、小平都不同意这种看法。

不过，后人也会对薄公等人的看法不以为然：当时党内最清醒的人居然不在当时党的最重大的会议上说话，能说正常吗？一个曾经谆谆教导干部要坚持原则勇说实话的老组织部长如今也在那里待机而言，能说正常吗？

问题关键不在于这是否「不正常」，而在于这「不正常」是因何而起的。答案不难作出：这种讲话方式上的不正常主要是由执政党风气上的不正常造成的。

可以设想，如果陈云真的在会上「大讲一通」的话，后果将不难预测：毛重则要狠狠地整治他，即席剥夺他的发言权，就像对待彭德怀那样，轻则要牢牢地记恨他，过些日子再来收拾他，就像对待刘少奇那样。不过，陈云既不是彭德怀，也不是刘少奇；不仅熟知国家的

经济形势，而且深知毛公的执政作风；故而暂避风头，会上不讲，会后再讲。

其二，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分歧。

当时，陈云并不是搞「包产到户」的主角（此主角从基层方面说是千百万中国农民，从高层方面说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但无疑是支持这一搞法的级别最高的中央大员，是能够直接向毛泽东主席据实禀报和据理进言的人，故不可避免要与后者发生矛盾。

毛泽东执政后热衷搞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搞「穷过渡」，仅用几年时间就领着仍是十分贫困的中国农民上了几个大台阶；由互助组到合作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可是，这种生产关系变革不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切实好处，反而使他们蒙受巨大损失，流失了数以千亿计的财富，丧失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

因此，许多中国农民实在是不想走这一集体化道路，而总想自家种自家的地，自家搞自家的勤劳致富。他们一遇有机会就分田单干，接二连三地搞出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

1957年，高级社成立不久，许多农民就反其道而搞起「包产到户」，但很快就被执政党通过发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而给制止住，来的快，去的也快。

1959年夏，「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起来不到一年时间，又有许多农民搞起「包产到户」，并得到执政党内一些领导干部支持。如河南省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和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都赞成包工包产、责任到人到户。不久，「庐山会议」掀起「反右倾」斗争，也把农民这一搞法给反掉了，指责它是农村中「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册，页159。）

1961年春，「三面红旗」运动已把中国农村经济搞得奄奄一息、搞得饿殍遍地。中国农民情急之下又搞起「包产到户」或「责任田」。与前两次相比，此次搞的时间较长，历时两年左右；搞得规模也较大，涉及各个地区，估计当时全国约20%的社队（安徽省约80%的社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78。）搞出的执政党反响也更强烈，从地县到省市到中央，都有许多领导干部站出来替农民说话。

1961年中，毛泽东对农试为自救而搞起的「包产到户」未予明确否定，同意试验一下。这是他鉴于当时农村经济形势极为恶化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让步。

到了年底，他开始变卦了，召来自己曾当面向其许诺可试搞「责任田」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农村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变过来。后者提出，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转年年初，他就在「七千人大会」上断然否定这一搞法，把它上升到错误线高度，并为此撤掉曾希圣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曾书记当属他那个年代里的黑色幽默人物，执政安徽期间，先是跟着毛大刮「共产风」，饿死数百万人，后又逆着毛大搞「责任田」，拔了全国的头筹，却丢了自己封疆大吏的顶戴。人称：「左」也数他，「右」也数他，结果左右都不容他。

不过，事情并不因毛发话而就此结束。当时不论在基层还是在高层，都有许多持相反意见者。

基层中的农民，尤其是「刚刚尝到甜头」的安徽农民，强烈要求不要再改「责任田」了，至少三年不改。

高层里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以及毛自己的秘书田家英等一批要人，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与老人家不同的结论，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搞「包产到户」或「责任田」，不仅没有大错，反而很是合理。

他们将自已的调查材料和研究结论上报中央，从实际出发，改弦更张。

据薄一波记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83-1086。〕当时正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议论一下，同在北京的邓小平也表示赞成，并引用刘伯承将军常爱说的一句四川老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远在南方的陈云也读广有关材料，认为此举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并准备向毛泽东进言，向这位不经其点头就办不成此事的党老大讨个恩准。

陈云回到北京，就与几位在京常委交换看法，取得基本一致意见，便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求见信：「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毛泽东似也看重这位他曾呼之「良将」、「贤妻」的党中要人，回到北京当夜就召之谈话。不过，两人谈话结果不好。在陈说时，毛不置可否；当陈走后，毛怒气冲冲地批示道：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另外，李志绥大夫还记述了毛批文中对陈的另一段评价：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1994年），页378。〕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厌恶之情，不止憎恨，更有轻蔑，竟把党中央干部还以商场小伙计的面目，实为泼骂。

陈云闻讯后，沉默不语，随即向中央请了一个没有截止期的病假，从此就不在毛身旁走动了，故也就不在毛继续导演下去的一出出剧目中担任重要角色了。在此后十几年里，陈淡出了中国政治，中国政治似也忘记了他，即使「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把他大张旗鼓地「控」出来。

不过，陈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脱离与毛接触，主要不是因为他请了病假得到「红十字」性照顾，而是因为他留下了话：

7月24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86。）

陈的这句话换个方式说就是：「我完全同意中央作出的关于巩固人民公社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中央对我关于分田单干主张的完全否定。可见，陈是在向毛表了无条件认错态度后而向其请假的；毛也是因陈这么快就挂起免战牌——不像彭德怀那样冥顽不化——而让其走人的。」

1965年6月18日，陈云又上书毛泽东，再次检讨自己：

1962年7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方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会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丛进先生引述这一材料后评论道：「陈云的自我批评，交了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一笔『账』，免除了一场可能降临的灾难。」（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580-581。）

纵观建国后陈云与毛泽东关系：陈屡屡说实话，从而屡屡受毛冷遇，但也从未被毛彻底打倒过；陈最终活到毛之后，故能纠正毛生前犯下的许多错误，但也从未将毛彻底否定过。

### 33

「七千人大会」开后不久，毛泽东便遭遇了一系列事情：

陈云在大讲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并带着其它大员一起讲，讲农业凋蔽、工业萎缩、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邓子恢在大讲包产到户的优越性，一直讲到中央常委圈中，讲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还不如农民的「小私有小自由」好。

邓小平在大抓甄别平反工作，一下子平反了数百万人案，致使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的成果所剩无几。

那位倔脾气的彭德怀又不甘受辱，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有理有据，把自庐山会议以来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都否定了。

这些事情，桩桩都不合毛意，都似是冲着他来的，都使他感到在「压我」。老人家有些坐不住了，有些心堵气闷了。执政党也将因此而要风云骤起了。

一般说来，毛若想排遣心中怨气，就要开会，开那种由自己坐于高台之上教诲张三训斥李四的中央会议。

毛是一个很爱开会的人，甚至可说是一个「会迷」。他开起会来用嘴巴更甚于用耳朵，因为他有着政务长官和精神导师的双重身分，有着完全不受限制的发言权，既可以就事论事地评说下属的工作得失，又可以上纲上线地断说下属的思想是非。他开会发言还不同于唱独角戏，还总有一帮子抬轿子吹喇叭的角儿环侍身旁，故总能够赢得一片喝采声，可以说，他几乎每次开会都能开出个意气风发的境界，只是开「七千人大会」有点例外，竟开出一些蒙混过关的味道。

此次毛想排遣胸中自「七千人大会」以来不断郁结的政治怨气，也要开会，结果一连开了三个会，历时两个多月：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15日-8月24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8月26日-9月23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会议（9月24日-9月27日）。

在这些会议中，毛泽东做的主要事情，就是狠批「三风」，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就是讲政治，讲阶级斗争，并提出一套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批「黑暗风」的重点是批陈云。

毛指责陈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使人丧失前途（参见本书第 32 节）；另外，还严辞批评陈所分管的财经工作：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8.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36。）

毛这一批评，与他数年前指责「反冒进」者对他搞「封锁」、不让他参与经济工作「设计」那一批评（参见本书第 16 节），是很相似的，即又指责陈云等人犯了做臣子的大忌。

陈云屡屡为毛分忧，担当大任，却又屡屡为毛猜忌，落荒退场。他的这一进退表明他的那位上司已不能知人善任了，用中国老话来说已缺乏做「人主」的才具了，其身旁已呈君子凋零而小人蜂起状。

批「单干风」的重点是批邓子恢。

邓子恢是中共农村工作元老。第一次国共战争时期，他从事过中央苏区的农村工作，提出过「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属于毛泽东的「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一派。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他主持过中共五大野战军中的三大野战军的后方工作，先是三野，继是二野，后是四野；经略过黄河以南和潼关以东的广大地区的农村工作，搞土改，抓支前，筹集粮食，调派民工。建国后，他又长期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具体指导全国的土改运动、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经济恢复工作。

虽然毛泽东与邓子恢同为中共农村工作元老，甚至前者比后者更

老些；但前者由于位居高位且又爱想入非非，故而不如后者更了解农村实情、更能拿出具体办法。

毛泽东搞人民公社不讲章法，搞得「五风」肆虐，搞得农村经济一片混乱。就在他一愁莫展之际，邓子恢通过调查研究拟出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用以规范公社经济行为。这个条例也就是后来颁行全国的〈农村工作六十条〉的原版本。当时毛也承认：邓子恢同志去年到山西、石家庄、苏南做了一次调查，做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这几年农村工作的错误，没有他的分。他的很多意见是正确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912-913。）

邓子恢没有满足于这一表扬，没有停留在这种修修补补工作上，而是通过进一步调查研究，提出更为质实也是更为尖锐的看法。1962年7月11日，他在中央高级党校谈出这样一些观点：（邓子恢，〈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106-114。）

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是相当普遍的；可以说大部分干部不与群众联系，有的干部工分多，大吃大喝，贪污浪费，过去老百姓养一个保长，现在养许多保长，过去十户养一个「鞑子」，现在两户、五户养一个「鞑子」；这是因为，在所有制上变来变去不固定，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在生产管理上没有建立责任制度；我们有些同志过分强调了不断革命论，忘掉了革命发展阶段论，怎么能年年革命呢？七革八革把革命性革掉了；因此，要固定所有制，反对平均主义，允许农民搞些小自由、小私有，尤其是要建立生产责任制；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因此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农民的私有性是突出的，凡是包产到户的，自留地和大田一样，没有区别。没有包产到户的自留地搞得特别好。因为包产到户了超产是他的，责任心强，肥料也多。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

邓子恢这些说法是相当大胆的，尤其后面一段话公然为「包产到

户」评功摆好，公然冲击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都不曾后退的防线，显然已超过了毛所能容忍的限度。

在中共高层内，邓子恢也是一个少有的不大轻易向毛泽东让步的大员。他对毛敢于直言，甚至敢于顶撞。在1955年合作化运动中，他就数度与毛面对面争执，气得后者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345。）

此次在毛已表明不赞成「包产到户」态度后，邓又是争辩不已，气得毛事后耿耿于怀：邓子恢同志曾当面和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88-1089。）

不过，训毛泽东是要犯「错误」的。

1955年，邓子恢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被嘲讽为「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1962年，邓子恢又因此犯了「刮单干风」的错误，并被新账老账一起算。「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主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会主义集农业经济的错误。」

批「翻案风」的重点是批彭德怀。

关于彭德怀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谁是谁非问题，事实已作出结论。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点，否则他就不会在私下里向彭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刘少奇心里更明白这一点，否则他也不会「七千人大会」上向全党中高级干部承认彭信中说过的话「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

然而，毛刘等人不愿公开承认这个结论，也不愿公正对待彭德怀。

这里既有出于维护执政党领袖的崇高威信考虑，也有出于忌惮彭德怀将军的刚烈品性考虑。他们很清楚像彭这样的人，只要有机会说话，就回把他看到的不实之事或听到的不实之说说穿开来，而在这几年中又有哪位中央大员没干过不实之事，没讲过不实之词？

这就有了矛盾：一方面，毛刘等人要维持庐山会议所作出的结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无视客观事实已作出的结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他们采取这样一个办法，就是尽量不在那些能够很快加以验证的问题上做文章，而在那些较难迅速查验清楚的问题甚至是故意弄不清楚的问题上做文章，于是拖出了那种很难找到旁证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拖出了那极鲜有文字记录的所谓「秘密集团」问题。这些问题虽调查起来困难，但用来定性足可捋人整倒并搞臭。

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在众位老战友劝说下，从维护团结愿望出发，作了违心检查，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什么给什么」。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做到「要什么给什么」，至少没有给出两样东西，即承认上述两大罪名。因为他强烈地意识到：这不仅在毁灭自己，而且要「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彭德怀自述》，页 279。）

如今连庐山会议都没有定下的这两大罪名，竟在全党五级干部大会上被正式开列出来：刘主席既在书面报告里将它们写出来，又在口头讲话中将它们提出来；毛主席则坐在一旁不断插话以将它们点出来。这就不难理解彭何以在获悉后心胆俱裂、怒吼不止，何以在一年中三次上书、反复申辩。

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和党中央。全文长达 82,000 字，后被称为「八万言书」。

如果说他 1959 年上书是仓促写成的，那么他此次上书就不同了，虽直接起因于「七千人大会」关于「唯彭德怀案不能翻」的结论，但酝酿过程已有数年之久。这期间，不仅彭本人有了许多独处深思的时间，而且事实发展也为他提供许多可资运用的材料。因此，他的「八

万言书」写得充充实实，几乎把所有强加于他的罪名都给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既平了 1959 年老账，又平了 1962 年新账。

1959 年「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曾把彭德怀意见书定性为反党纲领。此次彭德怀上书，则紧紧抓住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那段话，即「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藉此作出推论：「这就是说，那封就不是什么『反党纲领』了。」（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497。）这一论证是很有力的，它着眼的是结论性的问题，采用的是揭对方自相矛盾的方法。对此，毛刘等人是很难从道理上予以回应的。

1962 年「七千人大会」正式给彭德怀开列出来的那两大罪名，是「八万言书」所要中辩的重点问题。彭深知这些罪名的严重性，也深知那些开列罪名者的心虚处。于是，他详谈了自己过去与黄克诚、高岗等人的来往关系，详谈了自己在 1936 年至 1958 年期间与外国人九次接触的具体情况；并反问开列罪名者：你们说的如是真话就不难拿出证据来，你们能拿出来吗？

关于「里通外国」罪名，彭是这样写的：（《彭德怀传》，页 682。）

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识外国文字的人，这就给查对事实的工作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有翻译同志跟随着。总之，是有充分条件来查我是否「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据，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彭将军说这些话，是在向整人者叫板：你能拿出证据，我就奉出脑袋。字里行间又流露出一些硬气来，又要让老人家不高兴了。

8 月 22 日，彭德怀在「八万言书」递呈两月未见回音后，再次上书，仍是既作请求又讲硬话：（《彭德怀传》，页 683-684。）

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那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

临近信尾，他又丢下这样一句话：「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它同志了。」言下之意，如仍不予认真审查，恕我老彭还会再三上书。

就毛泽东来说，也不能不作答复了。一是彭德怀「紧逼盯人」太甚，没完没了。二是所有政治局委员已人手一份「八万言书」，大家读完了都抬着脑袋看他。三是在与人相斗中来而无往不合他一贯性情，既有人前来叫板，就得将他打回去。

实际上，在彭第二次上书之前，毛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彭第一次上书，说彭德怀要翻案，说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但未将这个问题作为该会正式议题。

只是到了十中全会（包括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上，也就是彭第二次上书后，毛才正式回应彭。全会第一个星期主要批「单干风」，此后就集中批「翻案风」，批其代表人物彭德怀。

据当事人薄一波记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92-1094。）「9月3日毛主席曾召集小范围会议，布置要把彭的两封信拿到全会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充满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指责彭的上书，在国际上配合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反华活动，在国内利用国家暂时困难向党进攻；并翻揭彭的历史，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既同高饶结盟过，又同王明勾结过；甚至把他说成是现代的张邦昌、石敬瑭……

毛泽东如此答复，反倒使彭德怀清醒起来。前次七千人大会对他的诬陷，曾使他暴跳如雷：此次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加倍诬陷，却未使他再次大怒。彭已不指望这位党主席会讲公道了，更不指望那个奉毛如神明的党中央会主持公道了。

当年年底，他又第三次书，再度反驳各种强加于他的不实之辞。只是他此次上书已不抱平反希望，仅为表态而已，即表明他老彭仍是不服：上次开会栽赃，我起而反驳；此次开会栽赃，我再起而反驳；你们只要造谣中伤，我就有话要说。

毛的中央此次没有回应彭的上书，彭也就不再去写他的申辩信了，而努力去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在那座由中央指定居住的据传曾是明末吴三桂私宅的吴家花圈中，彭安然度日，孤灯读书，只身耕种。

读书使他把自己不再比做「张飞」，而是比做「于谦」，即不仅以「勇」而且加之以「冤」来自注人生，同时也暗以无道的「明英宗」来讽喻紫禁城里的那位新主子。

耕种使他重操祖业，使他再次认识到最适合自己干的事，除了做将军外，就是当老农了。

八届十中全会批「翻案风」，除批彭德怀外，还批小说《刘志丹》，斥之为高岗翻案，并以此为发端批出了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亦称「西北反党集团」）。

习仲勋与刘志丹、高岗等，同为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陕北苏区的领导人。他们都曾在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尤其刘志丹家喻户晓，以致有「只知刘志丹不识毛泽东」的说法。1936年刘志丹意外死亡，曾在陕北人民中引起震动与悲恸，老百姓自发送葬队伍绵延数里。

这些陕北老同志也是北上三大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余部的收容者。没有他们创建的根据地，就很难有毛泽东等疲奔两万五千里路后的落脚点，很难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很难有「枣园窑洞」的灯光。

到了1962年后，这些创建陕北苏区的老同志们，除了死于战争者外，大都被他们自己的党整倒了，一部分随「高岗集团」被整下去，一部分随「习仲勋集团」被整下去。

毛泽东批「翻案风」，也批到邓小平身上，指责他在主持甄别平反工作时大刮平反之风：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9.2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41。）

毛此时虽未把邓小平当作政敌来批判，但已对他表示小满。毛邓反目初见端倪。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既对日前他所受到的挑战作出严厉反击，狠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又对日后面要做的事情做出重要部署，提出一条政治路线，要求执政党大抓阶级斗争。老人家又处在亢奋中了。

### 34

1962 年，执政者毛泽东在其一低头与其一昂首间，完成了他由主要搞经济建设向主要搞政治斗争的转折、由据以守势地位向据以攻势地位的转折。

其低头，显示了他从经济战线上被迫退却的态势。他此后除了喊像「抓革命、促生产」这类大而化之的口号外，再也没有于这方面做出什么实质性工作来。

其昂首，显示了他在政治战线上主动进击的态势。他很快就搞起一场场政治运动，以清洗一批批政敌。

这同时，预示着他身上原有的政治职业病将迅速恶化的趋势。他的「政治被迫害妄想症」将继续加重，将使他把由自己直接领衔的中共决策圈中的许多人都怀疑为蓄谋反对自己的人，并把他们都至少整治了一遍。

他的「政治多动症」将继续恶化，将使他治理起国家来就像顽童摆弄玩具一样，拆了再装，装了再拆，一直摆弄到拆了再也装不起来

为止。他搞了一场又一场运动，搞到「文化大革命」时就搞得收不了场了，就搞得其党其国面目全非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作出这种由「低头」到「昂首」的转折？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执政趋向从搞经济建设上转移到搞政治斗争上？

前文已就此问题作过一些回答。（参见本书第 13 节）

其一，他之所以要从经济上退却，一是缘于客观情势所迫，即老人家闯的祸太大而自知难卸其责；二是出自主观心理需求，即老人家需要一个自我心理调整时期。

其二，他之所以要在政治上进击，一从性格上看，毛是一个极有表现欲的政治家，总想另搞一套来抢别人的「戏」；二从策略上看，毛又是一个擅长于游击战的政治家，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经济优势，我打我的政治优势。

显然，这些回答对于毛何以作出 1962 年「转折」这一重大问题来说不够的。为此，本篇还将从毛的执政方式特点和毛的继续革命理论内涵这两个角度进一步回答上述问题。

毛泽东的执政方式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总以非专业化的方式来实行业领导；其二，总以非规范化的方式来从事政治斗争。

1962 年前后，毛执政方式上的这两个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执政党内出现的「条例化」施政倾向的规避中。

1961 年-1962 年间，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条例年」。当时，几乎所有行业都在制定「条例」。

农业方面，制定了〈农村六十条〉。1960 年底，邓子恢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修改稿）〉，共 66 条。1961 年 3 月，毛泽东以上述条例为基础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 60 条，始称〈农村六十条〉。同年 6 月，毛主持修改〈草案〉，拟出

〈修正草案〉。1962年6、7月间和8、9月间，毛又两度主持修改〈修正草案〉，并提交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

工业方面，制定了〈工业七十条〉。1961年5月20日，邓小平在听取薄一波汇报时，表示要搞一个涉及工业各项政策的文件。6月12日，毛泽东在谈到〈农村六十条〉同时，指出「城市也要搞几十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953。）6月17日，中央书记处正式提出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的任务，并指定薄一波主持起草工作。8月11日-14日，中央书记处修改并通过条例稿，共70条。9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手工业方面，制定了〈手工业三十五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于1961年6月19日颁发。

商业方面，制定了〈商业四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于1961年6月19日颁发。

科学研究方面，制定了〈科研十四条〉。1961年6月，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共同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草案）〉。6月20日，聂荣臻将此〈草案〉报送中央书记处，同时呈递由他署名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7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两个文件，并指出「文件的精神，对于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国防大学编，〈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1961.7.19）〉，《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册，页499-5300。）

教育方面，制定了〈高教六十条〉。1961年上半年，教育部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并报中央书记处。8月，陆定一主持修改这一条例草案，定稿为10章60条。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该条例在教育部直属院校讨论试行。此后，中共中央还批发〈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文学艺术方面，制定了〈文艺八条〉，196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起草了文艺工作条例草案，共10条。8月1日，中宣部将草案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后由陆定一主持修改草案，压缩为八条。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

其它行业方面，也制定了诸如〈林业十八条〉、〈电影业三十二条〉等工作条例。

执政党之所以这样大张旗鼓地制定「条例」，直接起因于当时国内形势。1958年后，毛泽东跑到前台来指挥一切，插手各行各业工作。可是，此公做起这些事来，不讲章法却好大干一气：动不动就「大办」，这里「大办钢铁」，那里「大办水利」……；动不动就「刮风」，今天刮「共产风」，明日刮「浮夸风」……。结果将各行各业搞得混乱不堪。执政党若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为这些行业制定出一系列具有硬性约束力的规定和条例，以使其行业行为有序。

这种有序有两方面功用：一是体现在人与物关系上，能够带来效率，不去做或少去做无用的功；二是体现在人与人关系上，能够带来公平，不认可或少认可例外的人。

这种有序也有两个特点：一是专业化，即要求分工更为细致，技能专精；二是规范化，即要求规则更为明晰，运作更有章法。

然而，行业条例所具有的这两个特点直接与毛执政方式的那两个特点相冲突：专业化与非专业化相冲突，规范化与非规范化相冲突。因此，这些条例很难容于毛的治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些条例多被斥之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多被说成是对广大革命群众的「管卡压」。尽管毛本人曾亲自批准过这些条例，甚至曾亲自参与制定过其中一些条例。

在科技和教育等条例中，都十分突出地提到所谓「红与专」关系问题，即无产阶级政治方向与具体部门专业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都

明确反对用「红」来压制「专」乃至代替「专」，反对搞「空头政治」，都要求把政治工作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使之不多影响专业工作。

显然，这种提法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当时那些本是缺乏特定专业技能却硬要向特定专业部门指手划脚的大小政治家的——其间最有代表性这莫过于毛泽东主席了。

老人家虽然读了许多方面的书籍，但未必是这许多方面的专家，如他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所承认的那样，不大懂工业，不大懂商业，只是懂一些农业，但也懂得不多。他说的是谦词，也是实话。在社会分工已很发达的今天，他毛泽东可以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比如是搞「阶级斗争」的专家、是整治人的专家，但不可能是所有方面的专家，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有专业化建树。然而，老人家总想领导一切；总想对各行各业发号施令，或指导它们应该这样做，或指责它们不该那样做。

这是个矛盾：不是所有行业的专家，却又想在所有行业中享有充分的发言权。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毛泽东扬长避短：不去大讲专业化的东西，这是其知之不多的地方；而去大讲「政治」，这是其肯能说上许多话的方面。于是，在其治下有了所谓「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说法，有了所谓「批白专道路」、「拔白旗」的行径。

这种「扬长避短」，可以说是一种「抢戏」行为，即政治家抢专门家的戏，政治领导抢行业领导的戏。

前文提到的中共中央曾于 1962 年夏秋间接连召开的那三个会议，原本是想开成工作会议，主要解决农业、商业、工业、计划等方面的工作问题。因此安排各行各业领导作主题报告，谈他们本职工作。不过，毛泽东在会议开后不久，便频频发言，「讲政治」，讲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结果硬是把行业工作会议开成了政治动员会议，开成了政治家毛泽东唱主角的会议。

如当事人薄一波所言：「实际上，由于毛主席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从8月6日起，会上大部分时间是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三风」，只用了很少时间研究和讨论工作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72。）

尽管毛本人仍然在口头上强调：不要让阶级斗争影响我们的工作。（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9.2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41-42。）

### 35

作为一个总爱抢别人「戏」的政治家，毛泽东不希望人们向专业化方面发展，而要求他们向政治化方面发展，即向自己易于伸展手脚的方面发展。那么，毛在这一方面是如何伸展手脚的呢？

一般说来，人们搞政治有两种搞法：其一，讲究规范的搞法，可称之为博弈式搞法；其二，不讲规范的搞法，可称之为谋略式搞法。

按吴稼祥先生的说法，（吴稼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第1章，（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在博弈相争中，参与各方都必须按一定规则角逐；在谋略相争中，参与各方则不必按一定规则角逐。

博弈是一种有前定契约关系的竞争。其间的契约关系具有明晰性和强制性。其间的竞争各方都能清楚地知道契约内容，并都得严格地依照契约行事，否则，被判违约而遭受处罚。

在谋略相争中，没有前定契约关系，没有已获各方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竞争各方除了「维护自己、击败敌手」这一条外，很难再找到大家都认可的东西了。竞争各方都按照只有自己清楚且只合自己意愿的方式进行角逐，谋略相争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既缺乏透明度又缺乏制约力的角逐，其极端者可以说是一种不择手段的角逐。

一般说来，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角逐是博弈的。角逐各方都须依法行事，而这个法是公之于天下的，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施行的。

另外，角逐各方还须接受社会舆论监督，致使政治家们成为生活在「玻璃房子」中的人，其言行举止多在众目睽睽之下。

尼克松可以公开地且声情并茂地攻击对手，但不可以背地里去窃听对手，尤其不可以在事情败露后继续欺骗公众。他虽贵为总统，但只要违反了游戏规则，拂逆了民众意愿，就得下台他去，成了博弈中因犯规而被罚出局的人。

尼克松也可以说是记者把他搞下台的，是记者把他从黑幕里一下子拖到「玻璃房子」中，以让国人饱览他那身黑衣黑裤走夜路的行装以及他那副鬼鬼祟祟做夜活的神情。记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在于现代民主制度赋予他们能够公开报道公共事务的权利。

也可以说，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改革的应有之义，就是要把它的谋略政治转变为博弈政治，即把大幕覆盖之下的政治运作方式转变为众目睽睽之下的政治运作方式。戈尔巴乔夫在其「公开化」运动中正是作了这样一种努力。他的这一努力，对于俄罗斯民主制度的建立所起的作用，尚可讨论；但对于前苏联黑幕政治的瓦解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决定性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角逐，有博弈的，有谋略的。

在封建王朝昌明时期，法规较严明，君主也较贤达，这就为当时出现的政治角逐，既提供较好的规则，又提供较好的裁判，故而使之具有较多的博弈性质。

到了封建王朝没落时期，法纪趋于松弛，君权也趋于昏弱，故使得各个政治集团难以按照博弈方式进行角逐。他们大都不是依循各方都应遵守的规则来行事，而是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行事。他们已不指望有一个公正的权威来仲裁彼此间的纷争，只求助实力来决定一切。因此，他们间的角逐是十分狡诈的，也是十分残酷的。例如，东汉末年宦官、外戚、官僚三大集团间的争斗，以及唐朝后期南司与北司两大集团间的争斗，均具有这种黑幕性质和这种血腥性质。

若从总体上看，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中，谋略性角逐要多于博弈性角逐。这除了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明君甚少而庸君昏君比比皆是外，还因为中国封建王朝中的党争往往具有无限责任的性质。

「无限责任」说法是反借「有限责任」这一经济法术语的。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某一有限责任公司一旦破产，其产权所有者损失掉的东西仅限于他已投入到该公司里的资产，而不殃及在其它方面的资产。这好比在一场赌局中，输家输掉的东西仅是桌面上的注资，或仅是口袋里的现钱。

然而，在中国旧时党争中，输家输掉的往往不只是已经拿出来的东西或口袋里装着的東西，还有自己整个人，甚至还连带上许多亲友，一损俱损。他们或被贬谪，或被砍脑袋，或被株连九族殃及门生故旧。

为了避免承受这种难以承受的失败，中国旧时党争的参与者们就有可能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即不受任何规则约束，不行博弈之道。

传统政治角逐的这种非规范性质或谋略性质，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它的特殊形态——战争上。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这种手段「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商务印当馆1978年中译本），页26，43。）

中国老子也曾有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57章。）老子所说的「奇」，也可看作一种非规范的谋略方式，一种能使敌方感到变环莫测故而无所适从的谋略方式。昌明的政治最讲法正刑典，成功的战略则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孙子则说得更明晰：「兵者，诡道也」；「故兵以诈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孙子》，第1，5，6，7篇。）

不过，战争并不全是非规范的，而是有奇有正的。就对敌用兵来

讲讲出奇制胜，但就对内治军来讲军规森严，以至可以说在所有行业中就数军事行业的条例最多、最严格。若有违反军规者，轻则受罚，重则丢脑袋。

鉴于以上对两种政治搞法所作的分析性界说，本文倾向于将毛泽东的施政方式归入非规范类型或谋略性类型。事实上，毛本人也曾以自嘲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他形象地把自己的施政方式比作「和尚打伞」一无发（法）无天。

就毛个人生涯来看，他没有系统地受过现代民主政治教育，却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系统地受过现代军事知识教育，却坐上了军委主席位子；没有系统地受过现代经济理论教育，却敢于鼓动各条经济战线搞「大跃进」；没有系统地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却能够决定全国所有大学是办还是不办，是这样办还是那样办……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是通过自学而成为执政者的，走出了一条非常个别化的成材道路。在他的这一「自学成材」的道路上，既没有多少已定的规矩可供他依循，也没有多少铁定的章法能使他就范。

再就毛进行政治角逐的方式来看，更能看出其间的非规范性质，看出他主要不是按博弈方式而是按谋略方式来整治对手的。

建国前，毛泽东主要同党外政敌角逐，辅之以同党内异己角逐。前者搞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自是采取那种不择手段以致敌于死地的方式或是某略方式。后者争的是按你的主张办还是按我的主张办，属革命党内的决策之争、权力之争，从道理上说应采取按规则行事的方式或说是博弈方式，但实际情况不全然如此，而要视毛的权威达到何种程度而定。

当由别人来制定规则时，毛大致能做到进退有节。他好提意见、好揽权，但在其意见被多数人否决时，在其职权被组织上削减时，基本上能服从组织决定，甚至能服组织上做的错误决定。

当由自己来制定规则时，毛就逐渐显露出以我画线、任人为亲的施政作风来。他主政江西苏区时就有过这方面的记录，如重用像李韶九那种顺从自己但品质恶劣的人，以致酿成「富田事变」〔李锐，（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我认识的黄克诚），《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增订本），页347。〕。他主持延安整风运动时又有这方面的记录，又重用那种顺从自己但品质不良的人，以致造成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

许多中共文献都把「延安整风运动」说成是解决党内矛盾方式的典范，说它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讲按党的组织原则行事。实际上，这一运动是有重大缺陷的，从中，既可看出十余年前「打AB团」的一些遗风，也可看出十余年后「反右倾」的一征兆。

在运动中，一些从事审干工作的人采用逼、供、信手段，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竟在一年内清出「特务」一万五千多人，致使有些单位的「特务」数占其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中，整人最为积极者，也是毛泽东很为信任者，当数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他创意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在半俩月内就挖出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78、280。）

虽然大多数蒙冤者后来得到甄别平反，毛泽东本人也三临中央党校（1944.5、1944.10、1945.2）向同志们道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78、280。），但这个运动毕竟伤害了許多人，并留下了许多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显严重。

如今一些文献谈到延安整风中的过火问题时，多将责任归于康生。可是，康生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是为毛十分信赖的。并且，这种过火问题就发生在毛的身边，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虽然康生直接抓的「抢救运动」只搞了十几天，但审干过程中的「左倾做法」持续了一整年。又大又猛的火烧的时间很短，可不大不小的火烧的时间很长。显然，毛是充分知晓并欣然允准烧这后一种火的。

延安审干最终搞成了「捉放曹」：康某捉，毛公放；康某惩前毖后，毛公治病救人。如此先夺后予，受之者自是记恨前者，感恩后者。许多年后，一些中共老人谈起延安整风便骂康生阴毒，并感叹主席宽大为怀。可是他们的主席并不记恨康生，并对之重用有加数十年，使之成了中共大员中几乎是唯一能够安然老死于毛身旁的人。

另外，康生之所以能够如此大张旗鼓地整人，除了与深获毛的信任有关外，也与得到其它中共大员的协助分不开。甚至在一些场合，康也仅仅是协助其它中共大员行事而已。

当时，康生在中共高层中既非数一数二人物、也非激三数四数五人物、其权力作为应是很有限的。如今，由于此人已被他的党彻底否定了，于是中共党史上的许多坏事，当初或全是他干的或不全是他干的、或是以他为主干的或不是以他为主干的，现在都被说成或全是他干的或是以他为主干的。

建国后，毛泽东做了十年国家主席，曾一度大抓国家经济建设，但最终「大跃进」失败告终。他到处奔波，显得比所有人都忙，结果却未能使他的人民看到繁荣富强的景象，相反倒使他们感到饥肠辘辘的煎熬。

问题还没有结束。毛泽东搞「大跃进」的失败，是政治家搞经济的失败，故其后果不仅涉及经济，还会反馈政治，还将影响这位政治家的政治处境与政治抉择：

其一，他的政治权威将受到挑战。

当「大跃进」刚显败像时，毛就受到彭德怀将军的挑战。例如，彭在庐山说过一句很重的话：老毛搞经济不像搞政治「那样得心应手」。即是说，此公搞政治还行搞经济就不成了。此前召开的中共「八大」已做出决议：执政党今后的工作重心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经济。若将彭的话与「八大」决议联系起来看，即暗示毛已不能胜任工作重心转移后的执政党的领导角色了。

又当「大跃进」完全失败后，毛则受到来自更多方面的制衡。比如，他这位「和尚打伞」式的政治家，已不得不开始面对许许多多「条例」了。

其二，为响应上述挑战，他将再次搞起他的政治斗争，再次发挥他的政治专长。

不过，此次搞的政治斗争与以往搞的政治斗争有很大的不同：以往主要是同党外阶级敌人角逐，双方都杀红了眼；此次主要是同党内不同意见者发生分歧，双方都是老战友、都曾生死与共过。

按常理说，前者是敌我冲突，属你死我活之争，故而斗起来就不择手段了；后者为党内分歧，属我长你短之争，故而吵起来应按规矩行事，即使争吵过火了，也应不出太大的格。

可是，毛泽东没有作出这种区别。对于这位好斗的政治家来说，任何自觉或不自觉阻碍他的人，尤其是那些敢于站出来向他挑战的人，都是他必欲打倒的人，都是他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予以处置的人。

当他发现自己在 1959 年和 1962 年所受到的制约都来自执政党内时，便宣布这个党里面也有阶级斗争，也有许多反动阶级代表人物，并强调这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比那些党外的阶级敌人更狡猾、更凶恶、更有危害性。

又当他把党内不同意见者宣布为阶级敌人时，便意味着他在与这些人冲突中，可以采取任何斗争方式，其中包括许多非规范的斗争方式。因为，在所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是很难讲什么博弈规则的，何况，挑起这场搏斗的人本来就是一个好于谋略的政治家，一个熟读二十四史长于诡诈之道的政治家。

这不禁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中的那句最为恐怖的话，即宣布某某人或某某党不受法律保护。当时，在作了这种宣布后，人们就可以对这某某人或这某某党采取任何极端措施，或实行囚禁、或动以酷刑，

或送上高高的断头台，甚至不允许他们为自己辩护。最初，革命者宣布叛乱的僧侣和贵族不受法律保护。不久，革命者内部又自相残杀起来：先是孔多塞等吉伦特党的领袖们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继而是丹东等山岳党的领袖们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最后则是罗伯斯比尔等雅各布宾俱乐部的领袖们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像丹东和罗伯斯比尔这样的雄辩家，曾经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最为感人的论证，最终却不能为自己做出任何方式的辩护。因为，革命的法庭不允许革命的敌人享有这一权利。丹东被以不尊重法律的名义剥夺了辩护权，罗伯斯比尔则被以更富有戏剧性的形式剥夺了辩护权。

1794年热月9日，罗伯斯比尔出席国民公会，但被与会者屡屡用「打倒暴政者」的口号声剥夺了发言权。在绝望中，他向议长喊道：「杀人凶手的议长，你能不能最后让我发一次言？」在被拒绝后，他又向听众，道：「纯洁的人们，有道德的人们，我就靠你们了，杀人凶手们不准我发言，你们准许我发言吧。」在被又一次拒绝后，他口吐白沫，颓然坐下，欲言又止地听任大会做出逮捕他和其同党的决定。当晚，巴黎发生暴乱，随即被平息。第二天黄昏，革命法庭将雅各宾派的领袖们送上了断头台。当罗伯斯比尔人头落下时，人们为之鼓掌达数分钟之久。（米涅，《法国革命史》，第9章（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译本），页230-254。）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前不久，罗伯斯比尔的同党库东提出一项法案，其中有这样一条：「法律决不准许阴谋分子有辩护人。」（米涅，《法国革命史》，第9章（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译本），页236。）时隔数月，该项法案的提议者本人以及附议者罗伯斯比尔，就是按这条法律被判刑的。剥夺者也被剥夺。

类似事情也发生在中国。1967年夏中南海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拉上批斗会，被强按着头作弯腰状达数小时，其间不断遭到谩骂、扭打，蒙受种种羞辱。会后，他于愤怒中一手扶着桌子站立，一手拿着宪法抗议：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严厉制裁的。」〔刘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华夏出版社，1986年），页30。）

可是他不明白，他已被这个国家的「伟大领袖」以及「革命群众」认定是最大的「走资派」，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故而是可以用一切手段予以打击的人，即已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此时却要去寻求法律保护，无异是缘木求鱼，至于他还以这带罪之身去捍卫这个法律，就更是不得要领了。

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头来竟弄不清楚曾由其本人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究竟有何种权威，弄不清楚在它的条文形式与它的实际行使之间究竟有多大距离。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共和国的悲剧。

鉴于「大跃进」无序且无效的教训，执政党在1961年至1962年间制定出一系列行业条例，以使各项工作走上专业化和规范化的道路、并使本党主席所实行的那种非专业化和非规范化的执政方式受到相应的制约。毛泽东若要继续抓国家常务性工作、抓经济建设，就必须面对这些条例、就应该按其要求行事。

显然，这种条例化倾向不合毛的意，不能为他所容。可是，他也不能直接否定这些条例，因为它们或曾是由他亲自主持制定的、或曾是由他亲笔签署生效的。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实际上是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老人家已另辟蹊径了。

1962年，毛泽东完成了他的施政重心的转移：将他的主要精力不是用于抓经济建设、抓已订有各种条例的具体行业工作，而是用于抓

政治、抓阶级斗争；并通过抓这种领导一切的政治工作以抵制那种行业工作中的专业化倾向，通过抓这种不择手段的阶级斗争以抵制那种政务工作中的规范化倾向。

老人家是很看好《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孙行者的。他自己何尝不也是一个孙行者式的政治家，何尝不也是在那儿一会儿翻筋斗，一会儿变身法，闹个不停，直闹得他那些盟兄弟们不胜其烦。于是，大家齐心协力在他正翻腾蹦跃的山上打了许多桩，围了许多栏，好让他进出有规，举止有矩。可到末了，这位孙行者一个筋斗，便从这座四处是桩是栏的经济建设之山上，翻跃到了那座难以打桩围栏——即使打了围了也能轻易地拔了扯了——的阶级斗争之山上，并转过身来把那些想羁绊他的盟兄弟们收拾一番。

老人家曾有些看不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后者的缺陷不仅在它后来变成了修正主义，而且在于它本身搞出了教条主义、搞出了许多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死板僵硬，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故而是中国人在搞自己的社会主义时应予以防止的东西，1950年代后期，虽然中苏关系还没有公开破裂，但毛的党已在军事教育中大批「教条主义」，已在「大跃进」中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里所要批的「教条主义」以及所要破的「迷信」，大多指「苏联老大哥」搞的那一套繁琐程序。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有它的问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有它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斯大林搞出的是一个条条框框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搞出的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主义。

前者虽也有过肃反扩大化等问题，但总体上是有秩序的，有时也是有效率的，以致达到过世界第二强国的位置。后者虽也有过日新月异的发展时期，但总体上是缺乏秩序的，同时也是缺乏效率的，以致濒临过崩溃的边缘。

不过，坏事与好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由于它

自成体系已久，有高度的自我约束性，有着许多难以舍弃的贵重物品，故而改革起来阻力较多。它是浑身负重而趑趄前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则由于它本来就没有多少十分严整的规章制度，没有多少值得牵挂的上好东西，故而改革起来容易得多。它是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而跑步上路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人曾把毛泽东的那一套搞法戏称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并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好，反而认为它比其它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或来自大城市里的马克思主义，或来自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或来自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或二者兼而有之的马克思主义如王明的马克思主义——要高明得多。

平心而论，这种「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有长处也有短处。

其长处在于它能走十分难走的路，甚至先前没有路的路，有时还能手脚并用地爬上那高高的悬崖峭壁。

其短处在于它要到了一马平川处却不知如何走是好，真要上了现代公路后却不懂交通规则，也不想学习交通规则，并厌恶乃至拒绝遵守交通规则。

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总想开社会主义快车，并且总想不看红绿灯地开社会主义快车，结果只能将他的这辆快车变成一堆废铁扔在半道上。

总而言之，毛泽东这位「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成就于山间小路，却不能凯歌于平川大道；能够在无序中谋略克敌，却不能规范中博弈取胜。

## 36

毛泽东无疑是一位很有理论嗜好的政治家，不论做大事还是做小事，总要为自己找出几分理来；并且，不论讲大道理还是讲小道理，也总能使一些听众听起来像是有那么回事。1962年，他在做出由主要

搞经济转为主要搞政治这一重大决策时，也讲出了他的一番道理来。这番道理集中体现在由他亲自审定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一段话里：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很激烈的。

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1962.9.27.），《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166。）

这段话后来被确认为「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被认作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不过，这个「重大发展」，最终把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整个国家都发展到一

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

关于这一理论，人们已作了种种批判，就连执政党自己也在「文革」后予以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 17 节，《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页 755-766。）对于这些批判，笔者有的赞成，有的不尽赞成。

与「彻底否定」论不同，在这个非常错误的理论中，也包含着某些真实的东两：或反映了新中国史上的某些真实的情况，或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某些合乎逻辑的思想过程，毛毕竟是个有一定观察力的人，不可能完全看不到客观事实；同时，他又是一个有一定判断力的人，不可能将自己看到的某些事实以完全颠倒的方式连接起来。借用毛的俄国老师列宁批判唯心主义的话说：他所创制的这个理论不是「纯粹的胡说」，而是抓住了事物发展过程中某些「真实的片断」，只是将其夸大了而已。（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 年），页 411-412。）

比如，老人家在一理论中告诫他的老百姓：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始终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共产党国家转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

他这种讲法不能说毫无道理，甚至可以说讲得不够。当时毛讲的还只是可能性，如今这种可能性已变成现实性。如果可以从经济上把「资本主义」定义为「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走上或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又如，毛告诫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小生产者有着「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他的这种讲法也是讲得不够。当时他估算这种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如今看来则要反过来说，即这种人以外的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在现实中国大陆上，农村中的庄稼汉大都在种自家的田地，城镇中的个体户则大都在摆自家的摊子，至于国家单位里许多人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占着公家的位子，谋着自家的好处。

再如，毛特别指出，党外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他的这种讲法更是讲得不够。就搞「资本主义」而言，当时他说，党外影响党内；如今则是，不仅党外影响党内，而且党内积极引导党外。

在所谓「发家致富」（发自己家致个人富）上，许多共产党干部已经走到了群众的前面，带头干起了他们的毛主席曾千方百计不让他们干的事，并最终当成了他们的毛主席曾千方百计不许他们当的「走资派」。

只是其中一部分人，走得太快，干得太火，以致于干到了另一个极端上。过去，他们打地主，斗资本家，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竟比当年的一百个地主还要富，竟比当年的五十个资本家还要阔。

有这样一些家族：祖辈原是乡间小地主，父辈则为党内老干部，成了国中大富豪。其父辈出身富家，即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后来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最后做了「高干」。其子女承蒙荫庇，化公为私，遂成富豪。于是乎，这些家族走出了一条「曲线发家致富」的道路。

历史跟这些家族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也跟那些曾冒着生命危险、承受巨大牺牲支持中共革命的百姓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只是后者笑不出声来。

因此，毛泽东在 1962 年开会时的担心，不能完全说是杞人忧天。他当初所忧虑的那个天，如今真的塌下来，或正要塌下来。

同理，老人家在 1976 年临走时的担心，也不能完全说是庸人自扰。他当初最担心的那个人，也是他在历史上曾像炕烧饼一样翻过来复过去地加以关照的那个人，后来真的把他曾精心炮制的「阶级斗争理论」

给修正」，乃至否定了，并真的把他曾苦心经营的「无产阶级红色江山」给改变颜色了，改变成红（政权）、黄（金钱）、黑（权钱交易）多彩颜色了。

### 37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抓住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作出了一些并非完全虚妄的预期，但总体上是错误的。就这个理论自身内容来看，其不真实的东西比其真实的东西，要更为基本些，更具有全局性些。

毛泽东将其执政时代定性为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定性是不真实的，这个「过渡时期」的起始点和归宿点都有很大问题：

此起始点被定性为「资本主义」，是不确实的；此归宿点被定性为「共产主义」，也是不确定的，至少在毛本人那里是不确定的。

毛的新中国，用毛自己的话说是从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转变过来的，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发展而来的。所谓「半殖民地」，指的是旧中国的外部关系性质；所谓「半封建」，指的是旧中国的内部关系性质。依此说法，旧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属封建主义范畴。

旧中国也有过资本主义的东西，有过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有过资本主义的证券市场，甚至有过帝国主义的「十里洋场」。当时上海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已相当高，已在许多方面位居亚洲前列。不过，就当时整个国家状况来看，资本主义还不占主导地位，还处在封建主义包围中。

毛自己就曾对旧中国的基本经济状况作过一个分析：（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第6部分，《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1431-1435。）

「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 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

「第二，中国还有大约 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 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上土地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不仅旧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的，是封建主义的，而且旧中国的政治尤其是党派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带有封建性成分。

首先，就党员的阶级出身来看，两党的许多成员都属于旧时代的人，都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国民党中曾有许多封建地主。他们自是竭力反对「平均地权」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从而使其自身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由于这些人大量存在，使得国民党不能将其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迅速完成，与此相应，也就不能将其资产政党的性质迅速明朗化。

国民党这一历史任务一直被推迟到它败退台湾后才得以完成。此时台湾，掌权者多是无地的外省人，有地者则多是无权的本地人，故而搞起分田的事来就容易得多了。许多从大陆逃难来的国民党官吏，已从有地者变为无地者，已与「平均地权」没有利害冲突。更何况平均本地人的地权，还能给外省人带来或多或少的好处。这就使得他们把自己曾竭力反对过的事情变成了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必须指出，他们的平均地权是以和平购买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

完成的，故少有血腥味。似乎可以说，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并将其驱逐到台湾，反倒成全了国民党，促使它在此宝岛上励精图治，终得完成其「先总理」孙中山的许多革命遗愿。

与国民党相对应，共产党绝大多数成员来自农民。旧中国农民大多挣扎在社会底层，生活困苦，处境艰难，故很容易受到政治鼓动而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并付诸实践，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成为由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

然而，这些农民与那些地主，虽处在不同社会层面上，但都同处于封建关系中，同属于将要被现代社会发展所扬弃的旧时代阶级。他们身上仍保留着愚昧、狭隘、保守等旧时代印记，并使他们所打下的江山也带上了这些旧时代印记。

其次，就领袖的权力地位来看，两党的第一执政，无论是蒋总裁还是毛主席，在许多方面都很相像于旧时封建宗法团体中的「龙头大哥」或「掌门人」。

两人在各自党内，都享有绝对权威。他们可以任意支配全党，全党则不能有效制衡他们。他们都是金口玉言，说一不二。这边是「最高指示」，那边十「总裁训谕」。任何想违逆他们意旨的人，都要受到极为严厉的家法惩处。

两人都享有终身权力。1974年，蒋公在台北荣民总院第六病室里谢世时，身上仍挂着国民党总裁的职务。两年后，毛公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病房中故去时，身上也挂着共产党主席的职务。

两人都坐着铁打交椅，无论对党有功还是对党有过，都不影响他们在党内的权力地位。蒋公1931年丢掉了东北，仍能做他的委员长；1949年丢掉了整个大陆，又仍能做他的党总裁。毛公1960年饿死了几千万人，继续做他的党主席；1966年后搞乱了全党、全军、全国，又继续做他的伟大领袖。

两人都在党内搞个人迷信。那边的人见到蒋总裁，便是立正，便是满脸谦恭相。这边的人见了毛主席，或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或是兴奋得只会喊「万岁」。平心而论，毛这方面的作为比起蒋来要成功得多。蒋在其党内只赢得部分派系对他忠心，毛在其党内则赢得五湖四海者对他的崇拜，尽管毛把他们中许多人整得苦不堪言。

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荒诞现象：在现代中国党派政治史上，毛泽东可以说最爱整自家党人，直接地或间接地整了数以百万计的自家党人；但又可以说最受自家党人尊崇，生前执政廿七年间「万岁」声不绝于耳，死后冥诞一百周年时歌功颂德声甚嚣尘上。

曾有许多中共党人，即使被毛发动的政治运动整得死去活来，也不改对毛本人的赤胆忠心。他们蒙冤受屈，不仅不抱怨毛，反而替他开脱，说自己挨整，是党内坏人干的，与主席无关，主席仍伟大的。例如，在邓拓身上就表现出这种崇毛情结。邓是中共一位很有才气且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型干部，1930年代加入中共，曾任《晋察冀日报》社长、《人民日报》社长，北京市委副书记。他1966年在「三家村」案中被揪出来，受到狂轰滥炸式的批判，以致深感绝望而自尽。他临终前还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629-630）

毛之所以能被其党人迷信到如此程度，究其原因，不能不提「延安整风运动」。

在中共党史上，1940年代「整风运动」是一件大事，既清算了党历次的错误路线，也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前者意义比较清晰，也比较积极，其后果直接体现在40年代后期那场摧枯拉朽般的战争中。后者意义就比较复杂了，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概略的说，

有利于中共打江山，不利于中共坐江山。

中共打江山时拉起来的是一支来自三山五岳的队伍，其间山头众多、派系林立，故需要有一个能够超乎这一切之上的领袖，既能从组织形式上领銜全党全军，也能从指挥才驾驭全党全军，又能从精神信仰上鼓舞全党全军。

当时最具有可能性的人选便是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则把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整风」，一方面整服了一个个山大王——90%者都老老赏实做了检查，甚至做了违心检查；另一方面整出了一个鹤立鸡群的绝对权威者——毛泽东主席，其思想被写进了《党章》里，其耳边也响起了「万岁」声。于是，〈东方红〉唱起来了，唱遍了陕北，唱红了中国。

这是一个讽刺。这个名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最初唱的是一曲〈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其后又加唱一曲〈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星……」。

对于这种前后颠倒、自相矛盾的唱法，人们已作过种种批评。本文谨指出一点，指出它也有一些合理处，即合乎中国的国情，至少合乎中共的党情、军情。

毛泽东常告诫其党人，务必「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 801。）上述两首歌的二重唱，恰好体现了这种「结合」。正像两首歌的歌名所表明的那样：前都唱的是「国际」的事，可看作「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后都唱的是「东方红」的事，可看作「中国革命的为体实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共党人光唱前一个歌不行，光讲马列主义大道理是要被砍脑袋的。他们最初高唱的「国际歌」，几乎成了「就义歌」——中共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先烈被绑赴刑场时必唱之歌。

中共党人除了唱〈国际歌〉外，还要唱一个歌，一个能反映中国革命实情的歌——〈东方红〉。因为，唱着它，首先能够打动中共各个山头的人的心，他们早就希望有一个能够使他们心悦诚服进而把他们统领起来的大家长；其次能够打动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心，他们早就需要有一个能够代替旧时皇上的人，需要有一颗能够照得他们心里暖融融的红太阳。许多年前，中共老祖宗马克思就对农民这一心理特点作过分析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中文版），页117-227。）事实上，也正是中国农民首先唱出了这首歌。（〈东方红〉曲调属陕北信天游，歌词为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友源创作（1942年冬）。）

不管怎么说，中共自打唱起〈东方红〉后，就在其打江山过程中没有吃过什么大亏。与早先〈国际歌〉成了「就义歌」不同，〈东方红〉成了「喜庆歌」，成了喜庆新中国太阳升起的歌。

关于「延安整风」树毛绝对权威的不利方面，主要是在中共坐江山后表现出来的。

打江山搞暴力斗争，需要有独断权威。如拿破仑所说，他宁愿将一团人马交给一个傻瓜独自统领，也不愿将这团人马交给几个聪明人协商指挥。可是，坐江山搞和平建设，尤其是在20世纪世界民主大潮背景下搞和平建设，就不能再搞这种军事首长制，不能再要这种个人绝对权威。

实际上，中共一些高层领导人也意识到，并做了一定努力。他们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淡化毛泽东个人色彩，并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从「七大」修改的《党章》中抹掉，试图收回这个党曾过度奉默给毛的一部分权威。

这谈何容易。他们一旦把绝对权威赋予象毛这样极富权欲的人，就不要再指望能把它从后者那里收回来。此后，毛的绝对权威始终没有受到有效限制，尽管这个党里的一些人士仍作了限制它的努力。颇

为讽刺。毛正是凭借这个党曾经赋予他的绝对权威，来反对这个党如今又要限制他的绝对权威。在这冲突中，前者总是胜方。

尤其到了「文革」时，毛的绝对权威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再度扩张。他在被尊称「伟大领袖」外，又被加上「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头衔。

〈东方红〉不仅在地面上唱，而且到太空中唱。（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被发射上天，并在遨游太空之际不断播送〈东方红〉乐曲；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这一乐曲旋律，至今仍能隐约回响在作者的耳旁。）唱了〈东方红〉还不够，还要加唱一曲《大纛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笔者曾请几个中年人背这首歌词。他们都是先一愣，后一哼，便一字不漏地给哼出来了。）结果，这个「伟大舵手」把他「亲手缔造」的党、把他「雨露滋润」的国家，驾驶到那一片看不见任何航标的茫茫大海中。

再次，在权力的传承方式上，两党也都搞出了一些封建性东西。

蒋先生直接搞了党国权力「嫡长子继承制」，搞出「父子总裁」、「父子总统」。

尽管经国先生颇为争气，在其任上逐步开放党禁，开放言论，做了其父做不了的事，但子承父承父位这件事，无论怎样洗刷，也洗刷不净上面的污痕。这也是如今已换新貌的国民党身上的一块老疤，一块已愈合但仍是一眼就能瞧着的老疤。

毛先生虽没有搞蒋先生那一套，没有把最高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也难以传给自己的那个脑部受过伤的儿子，但搞了另一套，搞了「个指定接班人」一套。

他先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定自己的权力「接班人」，后又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废掉他，一会儿选，一会儿废，搞得他自己出尔反尔，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

最初，他指定刘少奇为其「接班人」，后觉得此人不合其意，便予除掉。接着，他又指定林彪为其「接班人」，后又觉得此人不合其意，并欲废去（正当他要废掉此人时，此人已记取前任教训，立即远走高飞，但忙中出乱，飞了上去却又掉了下来，跑了出去却未活了下来）。最后，他又指定华国锋为其「接班人」，并在病榻上给后者写下了「你办事我放心」、「按过去方针办」等类似古时「遗诏」的纸条。这一次他没有再换人，也没有时间再换人了。他所选定的这个第三任「接班人」，当年就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并将他的陵墓修到了京城的正中央，使之成了千古奇观。

另外，在权力的传承方式上，还有一个附属现象，即双方都有高干亲属横行于世现象。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有孔二小姐、龙三少爷、扬子公司、以及相应的「打老虎运动」。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也有一个「三太扰国」问题。所谓「三太」，即「太子」——某些高干子女、「太太」——某些高干夫人、「太监」——某些高干秘书。这些高干亲属亲随，凭借其依附性特权而采用各种方式鲸吞国有资产，成了共和国国库里的一拨大仓鼠。

笔者有一熟人，曾在海外生活多年，读过书，做过生意，受了不少「资产阶级影响」，回国后到南方谋事，先后与一些太子辈人物打过交道。事后感叹：「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的后代」与「资产阶级老板的子女」，就是不一样。后者以靠父母为耻。前者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到处打着父辈旗号，拉关系，走门子，搞得不亦乐乎。换作过去的话说，后者搞的是「个人主义」，搞的是「个人奋斗」；前者则搞的是「封建家族主义」，搞的是「裙带骄横，衙内肆虐」。

毛泽东打江山时，口口声声说自己面对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

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文。)坐江山时,尤其是在搞经济建设失败后,则口口声声地说他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是「资本主义」,很少再谈他的新中国原本是从封建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他之所以改了口径,说到底是想搞阶级斗争。他深患政治多动症,久处和平时期,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就会感到技痒。他总要反对什么人,总要反对什么主义;并总想反出点道理来,至少不要和自己曾经标榜过的道理发生冲突。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如果一个社会处在封建主义阶段上,那么,它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便是资本主义;又如果一个社会处在资本主义阶段上,那么,它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便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

按照这一理论,如果毛泽东坚持他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封建社会转变过来的,那么,他的国家就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就不应加以消灭,而应予以发展,至少应予以存在。

按照同一理论,如果毛泽东强调他的国家是由资本主义「过渡」而来的,或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中,那么,他的国家就不能再搞「资本主义」了,而应同它作斗争,以防止它「复辟」。换句话说,他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整资产阶级尤其要整党内「走资派」,就很有必要了。

可见,关于「过渡时期」起始点定位问题非常重要。按前一种定位,毛泽东就不能大搞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什么象样的资产阶级。按后一种定位,也是毛实际定位,他老人家就可以大叫大喊「狼来了」,即「资本主义」这条「狼」来了,结果吵得大家都睡不着,都爬起来和他一起去四处寻打这条烦人的「狼」。

有趣的是,老人家在世时,本来没有狼,他却三番五次地大喊「狼

来了」，喊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夕数惊，紧张得不得了；可到了老人家过世后，「资本主义」这条「狼」——党内种、党外种、日本种、美国种——真的来了，大家已是见怪不怪了，来就来吧。

人们或许可以辩解，毛所说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不是 1949 年，而是 1956 年。

因为，在这两个年度之间还穿插一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无产阶级政权」对现存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把它们都改造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因此，1949 年只标志着毛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它开始脱离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1956 年则标志着毛的社会主义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它开始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后者才是毛所说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

但笔者以为，讨论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究竟是不是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来说，上述时间区别坏大。

因为，偌大中国不可能在七年左右时间里一下子从封建性程度很大的社会阶段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更何况在由毛当家的这七年里，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得到很大发展，反而受到极大限制。1949 年的中国没有一个象样的资本主义，1956 年的中国也没有一个象样的资本主义。

因此，毛泽东把他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说成是「资本主义」，不论是在 1949 年意义上的，还是在 1956 年意义上的，都不能成立。

尽管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来都没有发展得像模象样，但毛泽东仍像模像样地描述它，把它设定为「过渡时期」的起始点，并像模像样地同它作殊死斗争，以防止它「复辟」。毛泽东这样做，就把自己放到一个类似堂·吉柯德所处的位置上。西班牙的堂·吉柯德自以为是在同

强敌作斗争，而实际上是在和那个大风车过不去。中国的毛主席自以为是在同可怕的资本主义争，而实际上是在和自己的百姓、同志乃至曾生死与共的战友过不去。

### 38

关于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我们已指出作为它的「起始点」的资本主义是可疑的，那么，作为它的「归宿点」的共产主义又如何呢？

对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对于他曾热情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以及「公共食堂」，中年以上的大陆中国人都不会太陌生，都能记起一些事来。

他的这种「共产主义」，说到底是一种「乌托邦」，并且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乌托邦」。在其入口处挂着的，当是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但走进进去后看到的，多是中国古色古香的东西。

毛泽东前政治秘书李锐先牛对此有过一段论述：（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0-13。）

毛对于他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十分「驳杂」的。其中，有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有欧美日本新村思想的影响，也有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后者。不论是封建士大夫的大同理想，还是封建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都在他的未来设想中占有相当大的位置。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学养院，老则入养老院……等等。

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

中国空想主义传统，除了影响毛的思想外，还直接影向他的执政实践。

据李锐记述，〔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0-13。〕当年筹办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曾把康有为的《大同书》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让他们参照学习，以体悟这中西合璧的意蕴。随后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亲自给《张鲁传》作注，印发与会者，让所有中央要员都来分享咱们祖上早已有了的社会大同理想，对照实践，古为今用。

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可以说再现了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张鲁仅在汉中一隅行「五斗米道」，毛泽东则在国中处处办「人民公社」。张的「五斗米道」仅置「义舍」、「义米」、「义肉」，住房吃饭不要钱；毛树的样板徐水县人民公社则搞起了「十五包」，包吃、包穿、包看病、包送葬……还包发每人两元钱。

不过，好事不长在，「五斗米道」的「义米肉」置不了多久，「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也开不了多久，甚至为时更短。徐水县人民公社的人均 2 元钱只发了 2 个月就发光了该公社的财政款，全国性「公共食堂」也只办了 1 年多就「大锅」变「小锅」了。

人们常常说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总喜欢画图画，画无比美好的未来图画。可是，人们若要仔细审视他画出来的那些东西，就会发现画中的许多景致，已被前人画过了。他的「理想主义」，与其说是未来主义的，毋宁说是怀旧主义的。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与老人家的知识结构有很大关系。在其知识储备中，关于未来的部分最为匮乏，关于现在的部分有很大片面性，关于过去的部分最为丰厚。

毛泽东关于「过去」的知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二十五史」知识，大都取之于他那儿屋子的「线装书」中；二是「中国近

代革命史」知识，集中体现在他的「毛选」中。他对这两方面知识的掌握，是大多数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

毛泽东关于「现在」的知识，不能说是匮乏，因为他毕竟还坐在执政党主席位子上，还要「日理万机」，还要处理许许多多正在发生的事情，故能获得大量信息；但也不能说是丰富，因为他又在执政者任上，做了许多违反常识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小孩子」一样。（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819。）因此，毛这方曲知识存在着结构不平衡问题。

例如，他对种庄稼、打粮食的农业知之不少，但对开机器、办工厂的工业知之不多。否则不会搞出几十万座劳民伤财的「小高炉」。即便是农业。他也只是对扶犁耕田、担水浇地的事知之不少，而对诸如土壤成分分析，光和作用研究等科学种田的事知之不多。否则不至于对亩产几万斤的「卫星田」将疑将信。

又如，他对政治斗争策略知之甚多，但对经济运行方式知之甚少；整倒了一个个政敌，却搞砸了一处处经济。在前一个方面，用彭德怀的话说，他是「得心应手」；在后一个方面，用毛自己的话说，他是「冒失鬼」。（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813。）

即便是政治，他也只是对自己所搞的中国政治知之甚多，而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知之甚少。这可以从他与尼克松的女婿和女儿谈话中看出。他坦率地承认，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那两小盒磁带竟能把一位美国大总统整下台。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仍能就他所不懂的这件事说出一大堆话来。（贾思楠编，《毛泽东人际交往赏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 365-367。）

由于毛泽东关于「现在」知识失之平衡而关于「过去」知识十分丰厚，故使他在设想未来时，常常不能正确地使用现代知识，却能熟练地潜运其历史知识。因此，在他所描绘出的未来图景中，现代气息不多而老式色调甚浓。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说起来是世界无产阶

级的伟大理想，实际上倒很像是中国老农民的一种夙愿。

毛泽东坐了江山后，尤其到了晚年后，长时间埋下头去翻读一本本线装书，间或着抬起头眼睛盯着前面说上一些带有预言性质的话，可话中常常流露出他刚刚读过某本老书的心得。人们常以为，甚至毛自己也以为，他老人家总能够在大家的前面发现许多新生事物。可是，这种「发现」常常只是把人们身后的东西挪到了人们的前面。

总之，毛泽东所谓的「过渡时期」来龙不清且去脉不明，作为其起始点的「资本主义」是虚设的，作为其归宿点的「共产主义」是驳杂的。

### 39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除了有其理论自身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其实践结果方面的问题。就这实践结果方面来看，它所坚持的东西比它所反对的东西，更不如人意些，更有危害性些。

在毛自己看来，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他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他反对的只是他自以为是的「资本主义」，他坚持的也只是他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编织起来的，后者作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他折腾出来的，是深深打上「毛记」烙印的。

就这两个概念原有涵义而言，毛反对的是他并不清楚的，坚持的也是他并不清楚的。他对「资本主义」不甚了解，对「社会主义」也不甚了解。毛泽东曾被其党人推崇为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又一位世界级「无产阶级伟大领袖」。

何谓「无产阶级」？按马克思观点，这个阶级最初生长于本主义制度，深受制度的迫害，了解这个制度的弊病，并最终要埋葬这个制度，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赋予这个阶级特殊的职业称号：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页284。）

显然，这个「掘墓人」所要埋葬的对象，不是什么陌生人，而是一个他很熟悉的人，准确地说，是那个曾经生育过他并又虐待过他的恶母亲。

我们中国的这位「无产阶级伟大领袖」，也立志要做一个「掘墓人」，要去埋葬「资本主义」。但问题是：这位出自东方的「掘墓人」所要埋葬的对象，是一个他不熟悉的人，是一个与他没有多少血缘关系的人。这正是他与那些出自西方的「掘墓人」大为不同的地方。

马克思一生都生活在资本主义此界里，其本人就是一位中产阶级成员的长子，并继承他的一部分遗产，另外还长期接受恩格斯的资助，而后者兼有无产阶级领袖和资产阶级老板的双重身分。

毛泽东执政前，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农村，先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儿子，继是一位农民革命的领袖；执政后，虽住进了城，但很快就将城里原本就没有长大成熟的资本主义给连根铲除了。可以说，毛很少接触资本主义，很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马克思主要是一个学者，常常坐在窗明几净的大英博物馆里博览群书。在他读过的一本又一本书中，大多是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学术专著，以及资本主义政府所作的国情报告。可以说，他掌握了他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给他的有关资本主义的大量知识。

毛泽东也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除了推不掉的公务活动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挂着厚窗帘的书房里度过的。不过，与马克思不同，他读的大多是中国的书尤其是中国的老书，大多是记述我们民族过去事情的书。诚然，他也读其它方面的书，也读资本主义的书，甚至在他那个摆满线装书的客厅里接见过许多来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和专家学者，并能与他们谈得海阔天空、兴致盎然；但是，他再谈也谈不出一个活生生的资本主义来，再谈也谈不清他要埋葬的那个社会制度的真实面貌。

毛不仅谈不清资本主义，也谈不清社会主义。通观他在执政 20 多

年中对这后者所做的诠释，是很不确定的，一会儿说是这样，一会儿说是那样。听者听得不明白，说者怕也是心里没有多少底。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即「过渡时期」的长度问题。1955年10月，毛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宣称这一时期需要五十年到七十年时间。不出三年即1958年5月，毛亲自主持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放出风来说只需要十年左右时间。再过四年即1962年9月，毛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竟又说还需要一百年到两百年时间。这时间上的伸缩性大得也太离谱了。

又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问题。毛先是同意以搞经济建设为主，后又主张以搞阶级斗争为主。他先是向自然宣战，掀起「大跃进」狂潮，后又向人开战，搞起各种政治运动。即便是搞政治运动，他也没有十分确定的目标，今天运动到这里，整这一批人；明天又运动到那里，整那一批人。

毛对自己坚持要走的路，也看得不大清楚，也是走到哪算到哪，也是在那里「摸着石头过河」。

从思想方法上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处，前者颇得后者真传。事实上，邓也是毛曾垂爱最多提拔最快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林彪）。当然，邓与毛也有区别，一个不爱说话，一个总爱说话。邓对自己不太清楚的事说不上几句话，例如对十几亿中国人到本世纪末将会如何这样一个大问题，邓也只说说诸如「人均收入1,000美金」（后又改为「800美金」）之类的话。毛对自己不太清楚的事却说得上许多话，慷慨激昂，绘声绘色。

必须说明，本文质疑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等于主张「资本主义」是不能批评的。事实上，「资本主义」也有许多毛病，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对它的许多批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例如，作为「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许多深

刻批评。

他曾在自己著作中，记述了工人阶级的恶劣工作条件和贫困生活状况，进而揭示了雇佣劳动所具有的「异化」(alienation)性质。他指出，雇佣工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最终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一种反过来强制雇佣工人自己的力量。(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页43-181。)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这一批评中，显示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即怀有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心，怀有为社会弱势群体鸣不平的正义感。人们可以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不能无视他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超越自我而趋向社会公正的终极关怀。

另外，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述中，还分析了当时像「打摆子」[样间歇性发作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通过研究得出：这种「经济危机」通常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而这种「生产过剩」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具有的「无政府性」。结论做到这里，不能不说有一定道理，不能不说抓住了资本主义确实存在过的一些问题，故有一定的真知灼见性。

不过，当这位批判者循着上述结论继续向前推演时，就有些操之过急了。他接着指出，这种「生产的无政府性」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避免的，因而与此相连带的「生产过剩」以及「经济危机」也是无法避免的，于是，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了。显然，他的这些结论下得过早了点。

20世纪凯恩斯学说的一个核心部分，是所谓「国家干预理论」，即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可通过其「财政政策」和其「货币政策」，来干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以减少它们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比如，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弥补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以避免出现「生产过剩」

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经济危机」。

凯恩斯这一理论后来被运用于「罗斯福新政」，获得巨大成功。尽管凯恩斯理论也有自身局限性，也为其它经济学流派所诘难，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否认：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已有半个多世纪没有出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了。

面对当代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已很难再笼而统之地说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性」的了。马克思的学说毕竟是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阶段的产物。人们不能过分地苛求于它，更不能过分地拘泥于它——正像中国大陆上的那些自以为是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

又如，作为「资本主义相对发达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作了许多深刻批判。一方面，他们继续作马克思曾经作的一些批判，如继续批判盛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并且用词更趋激烈，以致认为商品已失去了它的全部经济特征，而只具有拜物教特征。弗洛姆指出：「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译本），页174。）

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了马克思不曾作的些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库塞提出了一种颇为新颖的「单面人」理论。这个理论告诉人们，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当代发达国家正经历着一个「社会一体化」过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例如，科技进步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造成社会财富急剧增加。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因此成了福利国家，其社会成员大都能享有优裕生活，大都能拥有汽车、电话、高蛋白食品等。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在经济生活上逐步同化起来。又如，科技进步迅速提高了大众传媒效能，进而造成公共信息泛滥。电视机、收音机、报纸、杂志等媒体无孔不入地侵入并占有人们的闲暇时间和私人空间。这又使得整个社会在文化生活上逐步同化起来。另外，这个社会的其它一些领域如思

想领域、政治领域等，也都经历着类似的「一体化」过程。

马库塞接着指出，这种「社会一体化」过程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逐步消解了社会成员所应有的个性，尤其是消解了人性中所应有的「否定性」方面。这里的「否定性」，指的是人性中不满足现实进而要求「批判」现实或「超越」现实的方面。消解了人性中的「否定性」方面，也就使人成了只有「肯定性」维度的人，即成了只是完全认同现代工业社会强加于他的现存生活方式的「单面人」。

对于这个有着许多毛病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生活于其中的新老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它，而且生活于其中的其它人也批评它，形形色色的人都在那里指指点点地说着它。在其大众传媒上，除了有总统、推销员、麦当娜等发出的诱惑声外，还有各种牢骚满腹者发出的抱怨声、责难声、怒骂声。

资本主义确有许多毛病，但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允许你公开地骂它，甚至会资助你骂它，让你在酒足饭饱之后调侃它、责骂它，不过，你得要骂出名堂来、骂出学术味来。上面提到的马库塞在创设他那个怒气冲冲的理论时，就曾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作为响应，这个批评者也将自己对此赞助者的感激之情，赫然写在他的《单面人》（*One Dimensional Man*）的扉页上。

这个「洛克菲勒」，可以说是现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成功的资本家之一，以致可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格化代表。如今，这个最负盛名的资本家基金会，竟去「惠助」那个同样是最负盛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个骂资本主义骂得最凶的人。对此，一些自诩「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会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假民主」，是其虚伪性的表现。不过，话得要说明回来，马库塞先生拿到手里的可不是什么「假钞票」，说出口来的也不是什么「假大空」。

有两种批评：一种只是用言辞批评对方，只是诉说对方如何不好；另一种除了用言辞批评对方外，还用行为来驳斥对方，不仅诉说对方

如何不好，而乱通过做出自己业绩来反衬对方是如何不好的。

这好比走在「T」型台上的模特要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台下，即坐在那里的看客要对她评头论足，并有可能甩出几声「真臭美」的话；另一是来自台上，即那些已站在台面上的其它模特对她的挑战——不只是在脸上显出你不行我行的神情来，还真能在「T」型台上走出自己的趟子来。

与此相似，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也有两种，一是坐在台下的批评，即马克思和马庠塞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只是诉说着它有多么不好；另一是站在台上的批评，即已执政了的毛泽东、斯大林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能只是在说资本主义的不好，还要做出社会主义的真好，不能只是在「破」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还要「立」出社会主义的新兴事物来。显然，这后一面评要更难些。

平心而论，相对于马克思等人来说，毛泽东所做的事情要更难些。因为，人们不仅能听到后者是如何指责别人的，而且能看到后者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不仅能听其言，而且能观其行。这就使得后者要承受更大的压力，要冒更多的风险。

正如那位骄傲的模特，不能只是站在那里瞧不起别人，还应下到场里走出自己的趟子来。乐曲响起，灯光闪烁，众目睽睽之下，老人家走出来了，走出自己的社会主义步子来了。

#### 40

毛泽东指责资本主义不好，那么他搞出来的社会主义又如何呢？

从外部关系看，毛的社会主义做到了「独立自主」。毛及其党人为新中国锻造了一层坚硬外壳，或披上了一层钢甲，谁都敢碰，谁都敢顶，既碰了资本主义头号强国，又顶了社会主义老大哥，既动嘴巴，又动手脚，与前者打了一场跨国战争，与后者爆发多次边境冲突。

但就内部关系看，就那个坚硬外壳里的内瓢看，毛的社会主义未

必做到了「自力更生」。毛及其党人在建国初搞战后恢复工作，颇有些新气象，但后来搞社会主义，就不如人意了，尤其是毛亲向抓的两件大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件件失败，样样祸国殃民。

不过，在毛做这两件大事之间，还有一个相对缓和时期（1962-1966）。这正像一辆向前急驰的车在作拐弯时不得不减速一样。在此时期，毛从经济建设上退却下来，不再主持国家经济工作了。与之相应，中国经济形势也渐趋好转。在这同时，毛并非偃旗息鼓，又在政治战线上积聚力量，不时搞出一些新奇动作来，并且，其动作频率渐趋加快，其动作幅度渐趋增大。与之相应，中国政治形势又渐趋紧张。几十年来，凡老人家煞费苦心去插手做的事，准会出乱子，经济乱子刚平，政治乱子又起。

在大多数时间里，毛的社会主义都处于紧状况。就国家来说，经济紧张，政治紧张，思想文化紧张；就个人来说，吃饭紧张，穿衣紧张，搞身边阶级斗争更紧张。

二十年经营，二十年折腾，或紧或缓或又紧。毛泽东究竟搞出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主义呢？

从经济上看，它是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从政治上看，它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主义；从思想文化上看，它又是一个愚昧的社会主义。

就农业来说，几乎每一年毛泽东的报纸都报道大丰收，可是二十年后，中国大陆人均农产品产量几乎没有变化，甚至为负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计划司提供如下资料：1956年，中国大陆人均占有粮620斤，棉4.7斤，油料16.4斤，肥猪0.10头，水产品8.6斤。1976年，人均占有粮615斤，棉4.4斤，油料8.6斤，肥猪0.18头，水产品9.6斤。

二十年比较，除水产品项与肥猪项略有增长外，粮、棉、油料各项不仅没有增长，反而略有下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农业经济资料》(1949-1983), 页 109。)

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也有类似情况: 1956 年, 全国农业劳动力共有 1.8545 亿人, 共生产粮食 3,855 亿斤, 人均产粮 2,078.7 斤。

1976 年, 全国农业劳动力共有 2.9448 亿人, 共生产粮食 5,726 亿斤, 人均 1.9444 斤。

二十年比较, 人均产粮减少 134.3 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农业经济资料》(1949-1983), 页 46、142-143。)

虽然 1976 年人均农产量与 1956 年人均农产量大体持平, 但 1976 年时的农民比起 1956 年时的农民来, 要多养一大堆臃肿庞杂的人民公社机构, 多养一大帮吃吃喝喝的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 因此, 二十年间中国农民实际生活水平, 不是持平而是下降了。

毛泽东领导数万万中国农民走了二十年社会主义道路, 结果一如既往, 甚至不如以往。笔者亲耳所闻, 农民自己就说, 在老毛当家那会儿, 最好过的日子要数 1950 年代初分田单干时, 自打搞起合作化运动后就没有舒坦过, 不仅让你吃喝不好, 而且让你坐卧不宁, 尽来些七股八杂的事折腾你。

毛泽东执政农业二十余年, 声势造得很大, 结果劳而无功。执政之初, 敲锣打鼓声中把土地分给农民单干, 允许他们发家致富。执政之中, 他又于鞭炮口号声中把土地从农民家中收回来搞合作化, 许诺他们很快就能过上共产主义好日子。可是, 到了老人家去世之际, 中国农民生活状况依然如旧, 多数人仍是吃不饱穿不暖, 以致买不起一台私家收音机来仔细倾听那年 9 月 9 日奏起的那曲带走许多东西的哀乐。

继而, 到了老人家去世之后, 中国农民又把地给分了, 最初是偷偷地分, 生怕惊动那个死而不僵的亡灵; 后来因得到中共开明官吏允准而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不过, 吃够苦头的农民并没有忘乎所以。

他们实际搞的是分田单干，但嘴里不说是分田单干，而冠以诸如「联产责任制」之类的名称，既能继续挂着那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帜，又能很好保住那些中共开明官吏在执政党内的面子。

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方式由 1970 年代末回到 1950 年代初，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人亡政息，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则是白走了二十余年路。毛泽东执政农业，自己与自己比，已显尴尬；若再与前人比、与邻居比、与宿敌比，就更显寒碜了。

说来渐愧，在人均年粮方面，现代中国人比起两千年前老祖宗来，似乎没有什么长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慧研究员估算，西汉时人均年粮约为 36 汉小石，〔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 年，页 68。）每汉小石若按小米量称约合今 32 市斤，若按粟量称约合今 27 市斤。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 年，页 43。）依此量算，36 汉小石的小米约为 1,152 市斤，或 36 汉小石的粟约为 972 市斤。不论按小米算还是按粟算，西汉人均年粮都高于毛泽东治下人均年粮，不论是 1956 年的 620 市斤还是 1976 年的 615 市斤。

可见，西汉王朝的臣民们山呼其皇上「万岁」还有些道理，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高呼其主席「万岁」就显得过于热情了。就在中国大陆农业停步不前时，世界其它地区正进行着一场「绿色众命」。这场「革命」以开发利用农业生物系列技术为主要内容，即通过采用良种以及合理运用化肥与灌溉来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革命」发生在 1960 年代前后，最初以墨西哥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与菲律宾国际稻米研究所为原点，继而向许多发展中国家辐射，结果显著改善了它们的农业面貌，提高了它们的人均年粮水平。

根据联合国的粮食和农业组织报告，在 1955 至 1975 年的二十年间，除中国等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外，所有发展中国家人均年粮平均提高 14.28%，其中远东地区发展中国家（均为我国近邻）人均年粮平均提高 15.44%。（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生产年鉴》（罗马，1971 年、

1980年、1981年；转引自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页645。）同一时期我国人均年粮提高2.8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9-1983）》，页109。）（1955年为604斤，1975年为621市斤）。若按1956至1976年的二十年统计，我国人均年粮提高一0.81%。（1956年为620斤，1976年为615斤）。

最令毛及其党人感到面上无光的，就是与自己宿敌相比，与海峡对岸的执政党在农业方面的成就相比。就在毛泽东大搞合作化大办人民公社的同时，台湾岛上的农民们在由政府推行的赎买性土地改革完成后，经过努力经营，很快就发家致富了。

就笔者所掌握的有限资料看：大陆人均产值，在1956年为261元人民币（按当年价格算，下同），在1976年为580元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9-1983）》，中国大陆1956年社会总产值为1,639亿元人民币（页48），当年总人口为62,828万人（页34），故人均产值为260.87元人民币；1976年社会总产值为5,433亿元人民币（页48），当年总人口为93,717万人（页34），故人均产值为579.72元人民币。）台湾人均产值，在1956年为141元美金，在1976年为1,122元美金。（高希均、李诚主编，《台湾经济发展》，附表I（A）（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页274。）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二十年间，大陆人平均产值提高幅度不足1倍，台湾人平均产值提高幅度则在5倍左右。

如今两岸人民的收入差距更大。到1992年，台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10,000元美金，（*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3, Funk & Wagnalls Corporation, 1994.*）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043元人民币（马洪、孙尚清主编，《经济白皮书1992-1993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附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中国大陆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3,938亿元人民币（页342），当年年底人口总数为117,171万人（页359），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043元人民币。）

——按当年人民币与美金汇率 5.72: 1 换算约为 357 元美金。

尽管按人均 GNP 算法与按人均 GDP 算法不同，并且按国际汇率计算收入与按实际购买力计算收入也有很大差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两岸人民的收入差距已不能以道里计了，已不是相差一两个层次问题了。

今天中国大陆到处都有殷富的台商在办厂开店；据知情人说，来者多为台湾中小企业家，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曾是农民。如今这些台湾的老农民比起他们大陆的老同行来要神气得多啰，竟以阔老板身分廉价地雇佣后者替他们打工，其中少数不良分子还雇佣后者的女儿给他们做露水夫妻。

这种情形，对于曾以农民为主力军而进行长期战争的中国革命来说，对于曾向农民猛拍胸脯而作出了种种许诺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一种令后者无地自容的讽刺。

尽管毛泽东淫威执政党二十余年，但其党里至今仍有一批还保持着正直品性的老共产党人。可是，他们的正直品性将给他们自己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将使他们在面对上述情形时汗颜无地，既愧对那些曾经舍命支持过自己的中国农民，又羞对那些曾经惨败于本党的政治宿敌。

这后者则会于此情此景中唱出幸灾乐祸的调子：

国共决战，岂止战场，最终还须市场见分晓；先败于战场，后兴于市场，仍为不败。这正合乎你们自己所尊奉的经济决定论。过去，我们的水陆坦克车开不上大陆；如今，我们的山地自行车骑上了大陆。军事反攻大陆，前途渺茫；经济反攻大陆，捷报频传。

不过，就已超越政治怨恨的后代人来说，海峡两边的人大都是同根生者，那边的人日子过得好些，这边的人理应为之祝福。不过，这边布衣草帽的穷亲戚在与那边穿金戴银的富亲戚打照面时，还是会心

有所动的，会埋怨自家家长太不会过日子了，使得全家大小面黄肌瘦、缺吃少穿，出门碰到熟人常有脸上无光之感。

这一家子人苦的程度不全一样。最苦者要数那些耕种家里大片田亩的人。他们与大家长毛泽东在血缘上最近。

毛一生有多重身分。有人称之为政治家、思想家，有人称之为权术家、阴谋家，有人称之为老人家、润之兄……笔者则以为在其所有身分中最重要者有两个：

1949年前，他是民起义领袖，发于山野，兴于乡间；1949年后，舰一位穿着中山装的新皇帝，治下臣民多为农民。

无论打江山还是坐江山，毛泽东都与农民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起先是，一方信誓旦旦、不断许诺，另一方则忠心耿耿、不断紧跟；结果是，一方来回折腾、不断食言，另一方则疲于奔命、不断失望。

土地革命时，毛委员对农民兄弟说，跟着我闹革命，就能翻身得解放；后者听之信之，并为之流血牺牲、在所不辞，以致「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掩埋的大多是农民的白骨。

社会主义革命时，毛主席又对农民兄弟说，跟着我继续干，就能过上好日子；后者又是听之信之，并为之流汗受穷、任劳任怨，甚至为之饿肚子送命，一死数千万。

可以说，毛泽东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数曾生他养他并支持他的中国老农民了。

与上述农业情况相比，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尤其是军火工业发展较为迅速，在不到一代人时间里就形成了一个从手表到核潜艇都能制造的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这应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

然而，这种发展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它是以剥夺农民为前提的，即通过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方式，把农民创造的许多财富无偿地转移到工业上去。

其次，它是以商品短缺为特征的，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企业生产常常是一方面造成工业资源大量浪费，另一方面又导致工业产品严重不足，致使许多商品限量供应，买布要票证，买肥皂要票证，买自行车也要票证。

再次，它是纵比有余而横比不足，与其过去比有长足进步，但与其它一些国家比就不太乐观了。在亚洲「四小龙」中，我们不好与香港和新加坡比，因为它们属完全城市化地区，但可与台湾和韩国比。后两者在 1950 年代初曾与我们水平相当，到了 1970 年代末就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就世界范围看，这几十年中发生了多次新技术革命、多次产业结构调整，但都与我们失之交臂。新中国屡失良机。

再次，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恰恰是以毛泽东本人不断对之干扰为背景的。如毛鼓动的「大跃进」，名为「多快好省」，实为少慢差费，赔进大笔资金。用彭德怀话说，如用这些资金买日用品，可以堆得像庐山那么高。（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28。）又如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实为停工停产，以至于把整个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

最后，它是以人民贫困为代价的。城市劳动者虽比农民收入高些，但总还没有摆脱那个「穷」字。他们干个十年、二十年也就提个一级两级工资、长个 10 块、8 块钱，活了几十年也就吃了几十年饭、养了几个孩子，此外引无所剩。

就政治统治方式来看，毛泽东执政二十余年，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清除异己、不断集权于己的过程，即由多党联盟到一党专政，再到一人专政的过程。

起先，毛与其党人，通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战后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清除了中国大陆上的敌对党派，从而使自身成了没有政敌的执政党，实现了以我为主的单一同盟专政，即所谓「人

民民主专政」。

在此「人民民主专政」内，有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也有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虽然前者实为说一不二的哥老大，后者仅为侧立一旁的小老弟，但这个专政仍有多党联盟的形式，仍有七嘴八舌的声音。

其后，毛又与其党人，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政治批判运动，尤其是「反右」运动，基本清除了「人民民主专政」内的爱提不同意见的民主人士，进而使自身成了这样一个执政党，既没有敢与之作对的政敌，又没有敢与之争论的诤友，实现了单一政党专政，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在此一党专政内，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能听到批评党主席的声音。毛每做一件大事，总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采取不同措施。

再后，毛又与其追随者，通过制造党内路线斗争，尤其是制造「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清除了执政党内的不同意见者，将一大批开国元勋打落台下。致使自己身边不存在任何能够分庭抗礼的人，最终实现了单一个人专政。

就思想统治方式来看，毛泽东执政二十余年，可以说是一个大搞愚昧主义，大行愚民政策的过程，即不断在人民中制造傻瓜、在官吏中培养骗子的过程。

所有专制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都有一个最根本要求，就是「服从」，就是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然而，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服从行为是受人的服从思想支配的。人的服从思想大体说来有两种类型：一是出于恐惧、二是出于信服。

对统治者来说，前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被迫性意识，它所支配的服从行为是低质量的或低效能的；后者则是一种心悦诚服的主动性意

识，它所支配的服从行为则是高质量的或高效能的。因此，任何雄心勃勃的统治者都希望能够获得后一种服从。

同时，这些统治者也清楚地知道，要想获得后一种服从，就不能只是训练被统治者的行为，还要驯化他们的思想，为此，就要对其大搞愚昧主义：

尽可能地贬损其个人作用，以增强其依附感，使其不想表达独立见识——无此主观愿望；

尽可能地限制其获得真实信息，以增加其盲目性，使其不能表达独立见识——无此客观条件。

当服从者一旦失去自己的独立见识，也就成了一种工具性动物。当统治者将其治下臣民塑造成这种工具性动物，也就把本应是劳心伤神的治国之道变成了陶然自得的牧民之道，只要吹吹牧笛，甩甩响鞭，就能把自己所拥存的大队畜群驱赶到任何地方，包括没有草的地方。

由于愚昧主义政策是以大多数人为对象的，因而实行起来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就需要有一支相应的干部队伍来做「群众工作」。

这支干部队伍能够帮助广大群众明确「适合于」他们身分的社会角色意识：在伟大领袖面前，在社会整体之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伟大领袖，为了社会整体，个人的一切包括生命、财产和自由都可以抛弃。

这支干部队伍还能够帮助广大群众筛选「适合于」他们口味的社会政治信息：有的可告之，有的不可告之；有的虽可告之，但需作一番加工处理，或增之，或减之，或改之。

长此以往，这支干部队伍便逐渐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以及讲假话的技巧。做假已成为他们性格中的一部分。他们常常能够摆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架式，把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说得信誓旦旦，他们还常

常能够作出一种心中有数样子，把他们自己并不清楚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

在人民中制造傻瓜和在官吏中培养骗子，是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也是任何愚昧主义施政方式所共同具有的两个基本方面。老人家在思想文化方面搞专制统治也不例外，一方面塑造出千百万可当枪使、当炮用的「革命群众」，另一方面又培养了一批批会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的「政治思想工作者」。

执政之初，毛泽东或许没有这种意识、没有这种十分阴暗的动机；执政末了，老人家确已造成这种事实、造成这种极为丑陋的后果。

#### 41

毛泽东及其党人常常不无得意地告诉世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得天下，靠的是「两个杆子」：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言辞之间，透出一股子绿林秀才之豪气：老了既能玩枪弄炮，又能舞文弄墨，还夺不了这天下？

就毛个人来说，打天下如此，坐天下也是如此。他执政二十余年，一方面抓着军队不放手，至死都在掌着他的「军委主席」大权；另一方面抓着意识形态不放手，至死都在宣讲他的「革命理论」，都在力图影响治下人民的思想。

人民是分层次的，至少可分两个层次：一是所谓「雅文化」层次，以知识分户为主体；二是所谓「俗文化」层次，以社会基层劳动者为主体。

与此相应，专制统治者搞愚昧主义也分两个层次：对于前者，主要搞学术禁锢，搞文字狱；对于后者，主要搞歪曲报道，搞愚弄宣传。

在学术领域，尤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领域，毛属下的思想检察官们为学术研究做了种种限定：一是划定学术讨论范围——什么问题可以讨论或不可以讨论；二是规定学术思想方法——什么方法可

以采用或不可以采用；三是预定学术研结论——什么结论可以得出或不以得出。

这里仅以历史研究——也是毛平生最感兴趣的学术领域——为例。

其一，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过于强调其革命性，进步性的一面，淡化乃至不谈其破坏性、反文明性的一面，尤其不谈农民起义常常具有暴民政治性质。

这种「暴民政治」至少有这几个特点：

一是对社会精英文化的敌视。

其参与者大都长期受到精英文化的歧视，常被嘲笑为「白丁」、「睁眼瞎」，故对后者隐有一种疏离乃至逆反的情绪。他们一旦兴兵造反，就很有可能要对那种曾慢待他们的文化做出过度的反应，以至于干出滥杀秀才、焚烧典籍的事情来。

二是对一切既有秩序的践踏。

其参与者大都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什么人都可以斥责他们，什么规矩都可以束缚他们，故很容易在他们一些人心中产生一种反社会反秩序的情绪。他们一旦汹涌澎湃地涌上政治舞台后，就很有可能把自己的这种情绪骤然释放出来，就会打破一切秩序，无视一切规矩，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有爱护老百姓的农民起义军，如进京前的李自成军；也有残害老百姓的农民起义军，如入川时的张献忠军。

三是易于推出新的独裁者。

由于愚昧，暴民们很容易被某些心怀叵测的政治家所利用，很容易轻信乃至迷信那些有着非凡政治煽动才能的人。又由于社会无序性持续下去，暴民们不仅继续攻击他们曾要攻击的对象，而且开始相互

冲突起来，于是，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强人出头来替大家摆平一切。这个人开始只是大家心悦诚服的大头领，往后就有可能演变为大家俯首称臣的独裁者。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不仅能够打倒老皇帝，而且能推出新皇帝。亚里斯多德在研究古希腊政治时也揭示过类似情况，即一些对城邦实行独裁统治的僭主，本身就是平民领袖，就是城邦下层公民在激烈的政治冲突中推举出来的群众首领。（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5卷，第5章、第10章。）

有鉴于此，中共1949年后之所以轻慢知识，除了与该党领袖毛泽东实行独裁统治有关外，还可能与该党的中高级干部多为工农出身有关。前者是决策者，是蓄意拍板者，后者是执行者，是积极附和者。所以，这个账似不能都算到毛泽东头上。

其二，在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国民党表现时，过于强调它曾消极抗战的一面，而淡化乃至不谈它曾浴血抗战的另一面。

这种研究框子被套用在许多大陆出版物尤其是历史教科书中，造成相当不良的社会影响。

在大陆学牛中，没有人不知道林彪的八路军115师打出的「平型关大捷」，却没多少人知道杜聿明的第5军打出的「昆仑关大捷」。两场恶仗的对手都是在日军中享有「钢军」称号的第五师团。前一仗仅重创其一个辎重联队，后仗则重创其一个野战旅团。在昆仑关前，日军步兵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被击毙，其辖下第21联队（三木联队）大部被歼，其它作战部队也均遭围追堵截，致使整个第五师团陷于被动挨打困境。

此第5师团乃由日军大本营直接掌握的战略机动部队，自1937年后，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几乎打遍了中国所有战场：在华北方面，参加了南口之战、忻口之战。在华中方面，参加了松沪之战、南京之战。在山东方面，参加了沂州之战、台儿庄之战。在华南方面，参加了广州之战、南宁—昆仑关—宾阳之战。在此期间，还一度被调至关外齐

哈尔，准备参加「诺门坎事件」后可能爆发的日苏战争（后因双方妥协而未大打起来）。

在述诸战中，该师团大多处于进攻态势，只在台儿庄与昆仑关两地处于被围攻境地。在这两者中，又以后者形势最为严峻：台儿庄前，只是它的一个旅团陷入困境；昆裔关前，则是它的整个师团陷入困境，不得不拼命固守待援，直至日第 18 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赶到后才脱离险境。

大陆许多人都知道，苏北有个「刘老庄战斗」——新四军第 3 师一个连队 82 人在拼掉日军 170 余人后全部壮烈殉国，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湘南有个「衡阳保卫战」——中央军第十军一个整军在重创日军数个师团后全军覆没（该军参战 17,000 余人，伤亡 15,000 余人）。

由日防卫厅战史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编，第 8 章第 4 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 290-314；杨正华，〈血战衡阳四十七天〉，《纵横》，1991 年第 6 期，页 25-32。）日军在攻陷衡阳之战中，先后投入 3 个师团（第 116、68、58 师团）之全部以及 2 个师团（第 13、40 师团）之一部，另外配以第 11 军（兵团建制）直属重炮部队和第五航空军大批战机。结果，中方战死 4,100 人，被俘 13,300 人（内中绝人多数为伤员，该军残部正因既无法带走又不能扔下这么多伤员而放弃突围努力，并因弹尽粮绝而放弃抵抗）；日方共伤亡 19,380 人，内含军官 910 人。在中日战争史上，这是一次很少有的双方伤亡率很接近的大战役。

在这场攻防战中有一突出情况，即日军军官——不论高级军官还是下级军官——伤亡率非常高。如在日第 68 师团（主攻师团之一）的 3 名将级军官中，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在第一总攻中就身负重伤，第 57 旅团长志摩原吉少将在第三次总攻中被炮火击毙，第 58 旅团长太田少将仅以幸免。又如在日第 116 师团（主攻师团之一）所辖第 133 联队（黑濑联队）第 2 大队中，自大队长至小队长数十名官佐或死或

伤，无一幸免。由此可见衡阳血战之激烈程度，可见中国陆军第十军将士对日作战之顽强程度。

在大陆学生中，没有人不知道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央军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后者在当时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改变了许多外人关于中国军队不能作战的成见。大陆许多人都知道，「八路军」中有个左权将军战死在太行山上，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两百个将军战死在抗日第一线上。这两百人与左将军一样，都是民族英烈。

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的抗战，是国共两党两军的抗战。人们既不应否认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也不应否认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在相当长时间里，后者所起作用要更大些。

侵华日军所发动的最大攻击战，前期为武汉会战（1938.8-11），后期为豫湘桂会战，即日本所说的中国派遣军「1号作战」或「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1944.4-1945.1），都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军队的，两次会战，日方都投入数十万兵力，并都付出伤亡数万人代价。尤其后一次会战，日军参战兵力达40余万人，为日本侵华战争史之最；其伤亡也十分惨重，如参加湘桂第一期作战的各师团均「遭受3-4成的损失」。〔《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编，页182，334。〕

中国军队所发动的最大反击战，为1939年「冬季攻势」，主要是蒋系军队所为。此役，蒋方投入54万兵力，反击侵占武汉及周围地区的日第11军。该军为侵华日军中最大野战兵团，常辖有7、8个师团兵力，此时司令官为日「陆军三杰」之一冈村宁次中将。日方评论此战：

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在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显决战状态，当以此时为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编，页519-520。〕

冈村宁次在其上交报告中，阐述了这样一种看法：

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 4 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 200 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编，页 519。）

这种看法似有片面性，其中一些提法不能为四亿中国老百姓所同意，更不能为中共方面所同意，但内中提供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当时由黄埔系少壮军官所掌握的中央军是坚决抗日的。因为，提出上述看法者，不是诸如日本外交官之类的人，而是日本前线指挥官，即他不是从言辞中，而是从实战——属下部队不断受创或属下官兵不断流血中，得出这个结论。

换句话说，面对冈村中将，蒋委员长用以表达自己抗日意志的方式，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中央军打出的枪弹和炮火，以及付出的鲜血和生命。因此，笼而统之地说国民党「消极抗战」（中共抗战史教科书常用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依据同样方式，我们也可以替中共抗战业绩作出论证。1940 年 11 月，侵华日军在向东京方面作总体回报时，对各占领区治安情况作出评估，将最差分打给了中共抗日势力极为活跃的华北地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编，页 412。）

这也是从作战对手的角度提供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八路军」确确实实地给侵略军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困扰。什么游击队、民先队、什么伏击战、破袭战，闹得华北「鬼子」坐卧不宁，以致「中国派遣军」总部不得不从华中战场调来它的最为干练的将军冈村宁次，以对付八路军中最有胆识的将军彭德怀。因此，笼而统之地说中共军队「游而不击」、「只打友军不打敌军」，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实际上，无论中共军队还是蒋系军队，都是既「打敌军」也「打

友军」，既搞抗日也搞内斗。抗战八年，两者时而相互激励，你给我一个嘉奖令，我给你一个祝捷电，不亦热乎；时时又相互诋毁，你说我「游而不击」，我说你「消极抗战」，不亦冷乎。大敌当前之下，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既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又相互摩擦、内争不止，一只手狠打着面前的民族公敌，另一只手则死揪着身旁的同族异党，于是构成了一幅很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民族抗战图景。

时至今日，海峡两岸政府仍是内争不止，并都想打「日本牌」，都试图借助日本力量来挤压同族异党，结果都只能让他人左右渔利。

平心而论，国共两党都是坚决抗战的，并都为此而付出巨大的牺牲（就中共方面来说也获得更大发展）。然而，两党相互间评价均大打折扣，都把对方的抗战业绩往小处上说，甚至往坏处上说。这或许符合两党私利，但不符合民族大义，上有辱先烈，下蒙蔽子孙。

就毛泽东治下的抗战史研究来说，淡化非属中共系统的其它中国军队的抗战业绩，实是把我們全民族抗战的巨大画面涂抹掉一大块，或涂黑、或抹去，或干脆撕掉。后人望之不胜叹曰：

**当年日寇铁蹄曾践踏我半壁大好河山，  
如今御用曲笔又涂毁我半幅抗战画面。**

如此作史动机姑且不论，其效果无疑是在贬损我们这个民族，是在亵渎那些抗日英烈，并最终殃及歪曲历史者本人。

关于上述「衡阳之战」，大陆有一部历史教科书只写了一句话：「国民党守军第 10 军军长方先觉投降，衡阳于八月七日（应为八月八日——笔者注）失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年），页 207。）

还有一部历史大辞典在「豫湘桂战役」词条中谈到此战时，仅用了四个字：「不战而降」。（尚海等主编，《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年），页 440。）

这不禁使人愤然相问：这叫什么历史书？这叫什么历史学？说出此话的中国人如何对得起殉难此役的中国人？

试想，如果时间退回五十余年，那么，什么人会说出这种话？国民党自不会说出这话，不会平白无故地往自己身上抹黑。共产党也不会说出这种话，《新华日报》曾于当年城破之日（1944.8.8）发表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社论——〈向衡阳守军致敬〉。日本人也不会说这种话，否则侵华日军无法向东京大本营说清楚那一万余名日军是因何而伤亡的。只剩一种人会说出这种话，这就是南京汪伪政权的政治宣传工作者。

其三，在研究中共党史上的毛泽东作为时，过于强调他曾有过的「过五关斩六将」业绩，而完全不谈他也曾有过的「走麦城」经历。

以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为例。似乎许多人知道，1948年秋锦州之战，林彪不想打而毛主席强要打，结果大胜。那些史家们说这充分证明了毛主席革命军事路线的无比正确性。可是很少人知道，1946年春四平之战，林彪不想死守而那个主席要死守，结果大败，并导致大溃退，一退数百里，一直退过松花江才站住脚。那些史家们对此缄口不语。

再以朝鲜战争为例。许多官方史家都在谈毛主席运筹帷幄，坐在北京指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一连打了五次战役，次次大胜。可是实际上，除前两次战役外，后三次战役打得不理想。究其原因，老人家是要负很大责任的。自志愿军取得二次战役大胜后，他就有些头昏脑胀了，频频发电催促前线司令员彭德怀去接二连三地发动新战役，打过三八线，打过汉江，占领汉城，……，彭司令屡屡想修整再战，但又屡屡被催得连续作战，最后被催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掉头返国，赶回北京，闯毛寝宫，掀其被褥，当面直陈前方军情艰难。

至于毛泽东搞经济建设饿死几千万人，搞政治运动株连上亿人那类超级历史事件，就更不许史家秉笔直书了。在老人家亲自关照下的

史学领域里，凡与他本人牵扯较多的地方，就会有一些学术愚昧的东西夹杂其间：或在描述这个党的重大成就时，过于夸大他个人的功绩，而淡化乃至抹煞其它同志也曾做出的贡献；或在分析这个党的重大失误时，过于夸大其政治对手的责任，而淡化甚至完全抹煞他也曾负有的责任。

通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思想史，不能不形成这样一个看法：近百年来思想文化最为活跃时期，不是毛泽东执政时期，也不是蒋介石当家时期，而是北洋政府时期以及由北洋政府向国民政府过渡时期。

可能许多人不愿接受这个看法，但他们很难驳倒这个看法。因为，这个看法与其说是推论出来的，勿宁说是直陈出来的，即仅仅是记录了一些确已发生的事实。例如，记录了下面一些事实：

在思想信仰上，这是近百年来主义牌号最多的时期；在社会组织上，这是近百年来政团种类最多的时期；在人文学术上，这是近百年来大师级人物出得最多的时期；在政治纷争上，这是近百年来不同政见获得公开表达机会最多的时期；永彪史册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在这一时期；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当时马克思主义一入国门，就能公开地载于学刊、讲于学堂、宣传于热血青年。这与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一旦执政就不让其它主义说话的局面，形成强烈反差。

再反过来说，近百年来思想文化最为禁锢时期，不是北洋政府时期，不是南京政府期，而是毛泽东主政时期。

蒋介石曾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口号，但未能实现它；毛泽来没提出这种口号，却一个不少地实现了它。

不容否认，蒋介石主政时，其党其国已开始走向专制主义道路，在正治军事领域大力围剿异己力晕，既杀方志敏，又杀邓演达；在思

想文化领域竭力压制不同主张，既坚决反对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又不大容忍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即便如此，「国统区」里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其中，有鲁迅先生的冷嘲热讽声，有李达教授的宣讲马列声，还有民主同盟的据理力争声，……。

到了毛泽东执政时期，不仅体制外的叽叽喳喳声没有了——此为 1957 年「反右派」的杰作；而且体制内的「操娘」声也没有了——此为 1959 年「反右倾」的成果；最后只剩下了一种声音——「毛主席语录」声。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就和 1960 年「公共食堂」大饭锅里的情形一样：清汤寡水。

几十年来，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人文学科领域基本上没有培养出大师级学者，相反倒培养出不少擅长打棍子、扣帽子、甚至出卖师长的学品不端者。

事情还有更严重的一面。按理说，新中国既然培养不出新的学术大师，那就应该更加珍重老的学术大师，以充分发挥他们已有的学识才智——这是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些学术大师们在这几十年里，几乎没有人没被整肃过，几乎没有人没被要求去写那些使他们蒙受耻辱的自我批判材料或揭发别人材料。这些大师们过去个个熠熠闪光，此时大都黯然失色，大都出现学术退化情况，很少再写出传世佳作来。

其中，最典型者要数老舍先生了。这位已具有问鼎诺贝尔奖实力的中国文豪，创作最鼎盛期在 1930 年代，人生最黑暗期在 1960 年代——并投河自尽于这一时期。据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曾投了他荣获桂冠的票，可他所在的国家却投了他应该死去的票。

## 42

当我们再把目光从雅文化层面转向俗文化层面时，便看到老人在普通老百姓中搞思想愚昧主义要更简单些也更有效些。正是在此处，「大造革命舆论」的简洁性与明快性都得到了突出表现。

毛泽东直接关照下的各级宣传部门，能够十分有效地控制且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如广播、报纸、红头文件、以及大小政工干部的嘴巴。通过这些媒体，中南海的声音尤其是老人家的声音，能够迅速且毫无遗漏地传遍「神州大地」上的村村寨寨、家家户户。

在这些传播媒体中，时空效应最大者，当数广播了（当时电视还未普及）。它传得快，播得广。不仅城里处处闻其声，而且乡间村村有喇叭。喇叭里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有沙奶奶阿庆嫂的「西皮流水」。

笔者曾见过一些生产队，饭都吃不饱，广播可听得不少，这边肚子咕咕响，那边喇叭哇哇叫。这种情景很类似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谈到的一件事：当年穷国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向苏联请求援助时，首先索要的不是粮食，不是武器，而是一个运动场，一个他能够向成千上万群众发表演说的宏大场所。

对此，苏联总理大为迷惑，尼克松则能理解。后者认为，苏加诺就其本性来说，需要不断演说，需要不断煽起群众的激情，因为，「群众的激情就是他赖以生存的支柱」（尼克松，《领袖们》（知识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页365。）。同样，对于毛泽东的宣传部门来说，群众可以吃不到肚子，但不能听不到毛主席声音，不能听不到「两报一刊社论」，不能保不住「革命的激情」。这「革命的激情」也正是这些政治煽动者们「赖以生存的支柱」。

比较说来，再煽动群众激情方面，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领袖远不如中国人民的领袖。与前者相比，后者闹得更红火些，也更壮观些。后者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使用率也最高的群众集会场所——天安门广场。老人家深患慢性支气管炎，却老爱登那座高高的城楼，在呼呼的北国凉风中一站数小时，为的是要向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欣喜若狂的革命群众「频频挥手」。据说，每登一次城楼他都要生一次病。可是，二十年来他总是乐此不疲这登楼挥手之事，直到其亲密战友林彪「自我爆炸」而使他再无颜面登高亮相时为止。

后者还拥有世界上听众最多、政治控制最严密的广播网。他只要一声号令，便能于顷刻间响彻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并激动数万万颗向着他老人家的「红心」。在当年贫穷的中国大陆上，发展速度最快、普及率最广的现代工业产品，就数广播器材了。正是通过广播，千百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边缘部分的下层人民，如今一下子同国家政治中心联结起来了。这对他们来说，似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看到了其祖辈不曾看到的许多东西；似又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被卷入了其祖辈不曾被卷入的许多政治漩涡中，并被迅速塑造成执政者能够随心所欲的加以使用的政治工具。

在毛所拥有的各种传媒中，灵活度最大者，要数政治宣传干部们那些翻来覆去的嘴皮子了。他们此一时这样说，彼一时又那样说，对张三说是一个样子，对李四说是另一个样子。例如，在宣讲林彪事件时，他们因人而异，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对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说得复杂些，从「鼓吹天才论」案到「设国家主席」案，一并娓娓道来；对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说得生动些，什么林彪一身「怪毛病」，怕光、怕风、怕洗澡；什么林立果「选妃子」，张三女子，李四姑娘。

朋友相告，有位乡干部在给社员群众宣讲此事时，声色俱厉道：那个「林秃子」真不知足，当了副主席，每天都能吃一只鸡，竟还要反对毛主席，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话虽不雅，但对那些大字不识乱又饥肠辘辘的听众来说，还是颇有些感染力。

对于林彪出逃身亡这一突发事件，当时不要说广大群众，就连许多中共高官都不能理解。他们想不通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竟会反对毛主席，想不通毛主席那么英明伟大到头来竟干出这档子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来。因此，给人们转思想弯子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自然落到那些搞宣传的人身上，并由他们较好地完成了。

又如，在宣讲邓小平这个人物时，他们又因时而异，到什么时节说什么话。昨天刚领着大家学文件，说邓小平是排也刘少奇之后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今天又带着大家领会毛主席新指示，说邓小平「人

才难得」、「棉里藏针」、「柔中有刚」；明天又领着大家学文件，说邓小平「死不悔改」，大刮「右倾翻案风」，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天再改口，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这些宣传者说的话变来变去，但变中也有不变的东西，即宣传执政党不变，尤其是宣传毛泽东个人不变。不过，在这不变中又有变的东西，即宣传干部的官位是变化的，有的因宣传不力而遭贬黜，有的因宣传有功而获升迁，由科而处，由处而局，由局而部、而中央委员，而中央政治局委员。

民间曾传有这样一种说法：「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文件，文件抄张玉凤话。」张是毛晚年身边最亲近的侍者，也是老人家口齿不清时唯一能听懂他呀呀话语的人。

张氏所为，很像是明朝大内司礼监秉笔黄门所做之事。后者随侍皇帝左右，随录圣上谕旨，继而传出宫外，达于内阁，行之天下。国家大政方针系于一君主侍者。

毛晚年施政程序也大致如此，近侍者向下面传其旨意的。在他的这类近侍者中，除有张氏外，还有其侄儿毛远新。后者有正式职务，叫毛主席的「政治联络员」，专门负责把毛的「最高指示」传达给政治局（一种直接听命于毛泽东的机构，类似明王朝的内阁），再由后者将之正式发出，传达全党，号令全国。

正像国家的经济运行讲计划一样，它的大众传媒也讲计划，讲所谓「舆论导向」。

什么可以对老百姓讲，什么不可以对老百姓讲；可以对老百姓讲的，是在这个时候讲，还是在那个时候讲；可以讲时，是讲多，还是讲少。一切都严格地按照上级指示或「舆论导向」来办理。

这就像现代化饲养场喂养家禽家畜一样：什么可以喂，什么不可以喂；可以喂的，是每天喂三顿，还是每天喂五顿；每顿喂时，是喂

多，还是喂少。一切都严格地按照科学配方和科学管理来行事。

当然，两者也有不同：一是喂物质饲料，一是喂「精神食粮」；一是在「填鸭」，一是在「灌输革命思想」。

几十年如此灌输思想，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扼杀了我们民族在许多方面的生机，由于让人们只看两种色调，要么洁白无瑕，要么漆黑一团。长此以往，便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辨别色彩的能力，不知在黑与白之外还有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持续单调的视觉训练，造成了民族性色盲症。

又由于让人们只听两种声音，要般咬牙切齿声，要么是歌功颂德声。长此以往，又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倾听平常音的能力，不知在两种声音之外还有一个娓娓道来的世界。持续高分贝的鼓噪声，又造成了民族性重听症。

又由于让人们只在对立两极中进行思维和做出抉择：或者要么完全正确，要么完全错误，就像小孩子在电影中只看出两种人，即好人与坏人；或者要么十分驯服地听命于人，要么十分凶狠地扑咬于人，就像看家犬在院门口只认出两类人，即熟人与生人。长此以往，又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正常思维的能力，不知在「一分为二」之外还有个三推六问，不知在听到上级指示之后还应问个为什么。持续愚昧化的思想教育，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族性大脑萎缩症。

毛泽东治下这一思想愚昧过程，在 1960 年代后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一方面，打人、骂人、抄家、砸东西；另一方面，又搞「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整个国家成了疯人院。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革」中风行一时的两组口号。前者为：

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

后者为：

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

「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中风行全国的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向毛主席表忠心仪式。许多人家在屋里开辟出一块净地，供上毛主席画像或塑像（时称「宝像台」）。每天早晚两次，全家人手持《毛主席语录》（时称「红宝书」），站在毛主席像前，口中念念有词。早上者叫「请示」，即向他老人家请示今天我该干什么；晚上者叫「汇报」，即向他老人家汇报这一天我干得怎么样。

「语录歌」是一种以毛主席语录为词的歌曲，「忠字舞」则是一种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舞蹈。当时一些狂热的群众觉着用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自己无限崇敬老人家的心情，故再配以手舞足蹈。一时间，五、六岁孩子跳之，六十、七十老人跳之，在自家里跳，在单位中跳，在大街上跳。

我们这个民族在感情表达上向来含蓄，可如今一下子变得热情奔放起来，大喊大叫，载歌载舞，几成西班牙人。这使人不能不承认，老人家在驾奴群众感情方面确有过人之处。他的所谓「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

数十年前，陈独秀先生倡导了「新文化运动」，其宗旨是广开「民智」；数十年后，毛泽东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后果则禁锢「民智」。陈先生曾是毛的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也曾是包括毛式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许多新主义的发祥地。毛如今成了陈先生的思想逆子，「文化大革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异化形态。

由此可看出，现代中国人所走过的思想历程有多曲折。同时可看出，现代中国人把自己的所有思想、所有希望都托付给一个主义、一

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实际后果有多荒唐。

### 43

毛泽东搞思想愚昧主义，除以群众为对象外，还以官吏为手段。

不过，毛属下官吏是有很大区别的，有愿意讲假话的人，有拒绝讲假话的人，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人。

毛的执政党外有讲真话者，毛的执政党内也有讲真话者，两相比较，后者要更多些、更硬些、也更起作用些。

1950年代，执政党先后发动过两大反「右」运动，先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以整党外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为主；后是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以整党内敢讲真话的党政干部为主。

前者整出了几十万「右派」，挨整的人多在知识分子较集中的单位；后者整出了几百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挨整的人遍布全国各地区各行业。

前者的斗争仅用数月，1957年一个夏季的热风就将那些叽叽喳喳的「右派」们吹了个干干净净。后者的较量旷日持久，1959年「庐山会议」冲突只是序幕，此后起起伏伏，其间经过1962年「七千人大会」，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前者打倒的人几十年无声无息，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后者打倒的人如彭德怀等，总是不服，不断申诉；与此同时，执政党内一些末被打倒者如彭真等，转而同情被打倒者，并逐渐敬而远之那位老爱打人者。这些被打倒者与其同情者的举动，又使得毛泽东很不痛快乃至恼羞成怒，下了置犯上者于绝境的决心并付诸实践，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头来却获得置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于绝境的结局。

故可以说，1957年党外「右派」，只对毛起了蚊叮虫咬的作用；1959年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使毛伤筋动骨，并染上绝症。

即便 1957 年「反右」，说是整党外知识分子，实也整了不少党内知识分子，’整了不少所谓「红色专家」。

一位老教授告诉笔者，当年高校里的「反右派」运动，除了整党外敢讲话者，就是整「地下党」了。

这里的「地下党」，不是指中共执政时的地下反对组织，而是指国民党执政时的地下中共组织。1949 年后，其成员由地下转到地上，成了执政党干部，其中一些人做了高校官员。由于这种特殊的出身，使得他们在「反右」中也相应地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

首先，他们对知识分子十分了解。他们长期生活在后者中，很了解后者，很清楚那些提意见者，从动机上说大都希望执政党向好的方面发展，纵使说了几句恶狠狠的话，也只是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去做出来；从人格上看也大都是一些真诚直率敢讲心里话的人，并大都是一些很有才华的人。

教授感慨道，无论 1949 年前还是 1949 年后，大学校园里凡热心关注国事、敢于针砭时弊者，大都是一些很聪明、优秀的学生。因此，当有人说这些提意见者出言不逊、恃才傲物时，前「地下党」员们是会相信的；当有人说这些提意见者从骨子里就反党、反人民时，前「地下党」员们就难以接受。

其次，他们对知识分子也有感情。他们与后者不但相知颇久，而且相交颇深。他们当年做地下工作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曾经得到过后者的支持乃至舍命掩护，可以说是欠了后者的情分。

共产党人也要讲良心，讲以德报德。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如今落难了，你不能装着看不见，不能去做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事，而应该站出来替人家说话。这是做朋友也是做人的起码要求。

再次，他们本人就是知识分子，就是红色专家。这些人不仅有曾为「地下党」的红色背景，而且学有专长，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

他们一直没有离开过高校，一直是既做党的工作又搞专业研究。

这就把他们与高校中那些扭着秧歌进城的「解放区干部」分别开来。后者既然是被派来接管大学的，故都有些文化，甚至有些才气。然而，他们大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没有学术专业。他们可以作出精彩动人的政治报告，也能写出热情洋溢的宣传文章，但很难写出合乎专业规范的学术论著。其中一些人即便后来也学了一些专业知识，但由于不是科班出身，总有些先天不足。另外，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也常显出过于强烈的政治情结。这一情结搁在其它地方都有问题，搁在高等学府就更有问题了。他们作大报告可以赢得普通群众的热烈鼓掌，但未必能博得学术专家的衷心佩服。后者可以把他们当作校务领导来尊敬，但不会当作学科精英来效范。

老教授说，当时大学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在与上述两类红色官员打交道时，常常有些厚此薄彼，与「地下党」出身的干部相处得随和些，与「解放区」来的干部相处得隔膜些，甚至有些敬而远之。这就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些嫌隙。

可是，高校里真正握有实权的，不是「地下党」干部，而是「解放区」干部。当「反右派」运动到来时，后者主持大局，遂将一些爱说话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不忘旧情而替他们说话的「地下党」，一并打成了「右派」。

中共本由热血知识分子创建。这些创建者以及许多随后加入者，大都抱有追求真理和救国救民的理想，并为此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穿行于枪林弹雨之间、奔波在白色恐怖之下。

当新中国终于到来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牺牲了，只有少部分人幸存下来。这些幸存者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新国家的新官吏。

不久，这些新官吏们发生了分化：相当一部分人成了新贵族，成了与他们曾经打倒的那些老贵族一样的人，甚至成了比老贵族更专横、更骄奢淫佚的人——这倒不是因他们的本性更坏，而是因他们所受到

的权力制衡更少；另有一部分人继续保持革命精神，关心民众疾苦，敢为他们说真话、担担子。因此，这两类新国家的新官吏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

这两种人由于都是从刀口上滚过来的强悍之人，都有着一股子狠劲，因此，一旦冲突起来，就会十分激烈，甚至十分惨烈。失败者往往被从高高的台面上狠狠地打落下去，或被贬官，或被流放，或坐大牢，身心倍受折磨，甚至性命都会丢掉。

有那么一些老共产党人，一生蹲过各种各样的牢狱：蹲过敌人的牢狱，或是北洋政府的号子，或是日本人的大牢，或是国民党的集中营；蹲过自家人的牢狱，或是所在单位的隔离审查室，或是群众专政的「牛棚」，或是人民政府的正式监狱。

这不能不说是中共党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奇观。

有人为此调侃这些老共产党人是蹲监狱的「专业户」，说他们一辈子都在自找苦吃，并常常吃得不明不白，开始蹲敌人的监狱还说得清楚，后来蹲自家人的监狱就说不清楚了。仿佛这些苦主们毕生干的是一桩颠二倒四的事业，一桩致使个人命运发生扭曲倒错的事业。

但事实上，这些共产党人的曲折的经历恰恰反映出他们的不曲折的品格。中国自皇帝被废除到毛泽东执政这许多年来，几乎所有统治者都给他们的老百姓带来灾难，也几乎所有统治者都对那些敢为老百姓讲话的人予以摧残。于是，那些决意要为民请命的人注定会过不上好日子，注定会自讨苦吃，蹲了张三牢房，再坐李四监狱。虽然监狱不同，一个属敌人，一个属自家人；但两者有共同点，即都隶属统治者，既都关押不听话的老百姓，也都关押敢说话的直谏者。

因此，我们不应嘲笑这些人，也没有资格嘲笑这些人。他们自讨苦吃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中国老百姓。他们所受到的冤屈不是他们一己的私事，而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个人的苦难史浓缩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史。

尤其是，他们完全对以不讨这些苦吃，完全可以像他们的许多老战友一样成为新国家的新贵族，尽享他们俯拾即来的荣华富贵；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选择了一条殉难者的路，不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去替人民背负沉重的十字架，颤颤巍巍地走向个人灾难的深渊。因此，他们今日坐自家监狱比昔日坐敌人监狱，更能显示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来。

诚然，对他们所坚信的东西，人们可以提出质疑，可认为他们坚信的东西，未必就是十分正确的东西，或未必就是可以实现的东西；但是，对于他们在坚持自己信念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人们不能不予以敬重。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忍受了别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彭德怀将军在被打折了左边肋骨后，仍要站起来；在又被打折了右边肋骨后，仍还要站起来，今天写一封自讨苦吃的信，明天又写一封自讨苦吃的信，直到临死时，还要求和毛泽东见一次面，把问题谈清楚。这里显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种堪称民族脊梁的精神。对此，人们岂能加以嘲笑？

真正应予嘲笑的，是这同一个体制内的另一类官吏。这类官吏与前类官吏正好相反，有着不大曲折的为官经历，却有着非常曲折的做人品格。他们的仕途平平坦坦，稳稳当当，从不吃亏，总讨便宜：

57年讨了便宜，59年又讨了便宜；文革中讨了便宜，文革后又讨了便宜；89年前讨了便宜，89年后又讨了便宜。

尽管我们的民族在大起大落地折腾，可是他们的官位在平平稳稳的向上浮动。他们的人格扭扭曲曲、齷齪齷齪、半明半暗、半人半鬼。他们会讲假话，会整人：

57年，见他们打棍子、扣帽子；58年，见他们说大话、放空炮；59年，又见他们提着棍子、拿着帽子频频出场；「文化大革命」中，见他们高喊「伟大领袖」万岁；「改革开放」时，又见他们歌颂「总设计师」英明；80年代初。见他们屡屡出席解放思想座谈会，并踊跃发

言；80年代末，又见他们频频出席批判自由化思想座谈会，作声色俱厉状。

他们是一群伪官，翻脸就像翻书一样，做人就像做戏一般。对于这些伪官’人们不仅应予嘲笑，而且应予唾弃。

毛泽东搞愚昧主义的第二个方面，即向普通群众讲假话方面，正是通过他们来具体实施的。他们也因此而显示出自己在这方面的才干来。

像六十年前后饿死数千万人这件大事，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那些宣传干部们在向老百姓作解释时，硬是把刘的话掉了个，把「七分人祸」说成「七分天灾」，硬是把毛泽东的责任推到了老天爷的身上，把「冤假错案」从地上搞到了天上。由此可看出这些无神论者胆子有多大。

不过，他们所做的这种文过饰非的宣传还是很有成效的，竟使许多老百姓真的相信「自然灾害」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并相信「苏修逼债」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至于他们的伟大领袖是不是也应对此事负些责任，大多数人都不想，也不敢想。

直至今日，许多当年饿过肚子的人在谈到那个年代时，仍然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仍然改不了口。笔者有时也是如此。这使人不禁想起戈培尔名言：「谎言重复百遍就是真理」。

过来人都知道，1967年是「文革」中最乱的年分。在这一年里，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出现了无政府状况，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商店停业，交通停运。尤为严重的是，许多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斗，先是棍棒，后是枪炮，最后连坦克车也开了出来，一时间几乎无处不开枪，无处不杀人。广西南宁附近，死亡枕籍，尸塞邕江，

过来人也都记得，老人家对这种形势有他自己的说法：（国防大学编，〈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指示

(1967.10.7,)《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589-591)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这显然是「指鹿为马」之辞，却被各种传媒当作「最高指示」广告全国。一时间，「形势大好」论甚嚣尘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唱破了天。结果使深受「文革」祸害的老百姓反而不敢怀疑「文革」的正确性，即使怀也是敢怒不敢言。

1992年夏，笔者一位老同学由外省来京旅游，借宿我处，一次聊天他突然问道，北京「六四」是不是真的打死了许多老百姓？

此话问得我莫名其妙，反而问出我的问题：你难道不知道政府自己都承认打死了三百多人？你没有看电视？没有听别人讲？

他说，当时自己也觉着政府打死了许多老百姓，社会上有这类传闻，「美国之音」也是这么的。后来单位里的书记和那些搞宣传的人三天两头把大家集中到一块，先读文件，后做报告，讲中央决策如何如何英明，讲社会传闻如何如何不实，讲这个是谣言、那个是谣言，把不合中央精神、不合他们口味的一切说法都说成是假的。

他提到这样一件事，政府原先说要宣布「六四」死者名单，但后来没有宣布。他说，大家都觉着有点不对劲，好像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东西；可那些耍嘴皮子的人倒把事情说得很轻巧：你们瞧瞧，要是真的打死许多老百姓，政府还能不说？不说，就是没有什么大事。人民政府是不会欺编人民的。同学感慨道：你不得不佩服他们的那些张嘴，你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有什么说法，横竖难不倒。

他接着说，讲老实话，我们也不大相信他们。这些年来，我们听够了他们那套东西，一会儿翻过来说，一会儿倒过去说，没个准头。

可话又说回来，真要是讲多了，还真能起些作用，不能把问题讲清，却事情搅浑，不能说服你的心的，却能搞昏你的头。要说没打死许多老百姓，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可要说打死了许多老百姓，我们也有些将信将疑，这不就来问你了吗？

从同学一席话中不难看出，这种宣传体制在粉饰太平方面有什么样的功用，这帮耍嘴皮者在向老百姓说假话方面有什么样的才干，而这些都属「伟大领袖」留给「总设计师」的政治遗产。

当然，对于上述耍嘴皮者不能一概而论。在这所由毛泽东当校长的假话学校——其校训词为「实事求是」——中，有学业成绩佼佼者，即那些在做假上能够主动发挥、积极创新的官吏们；也有学业成绩平平者，即那些只是跟着说、照着故的官吏们；还有学业成绩不合格而被淘汰者，即前面谈到的那些敢说真话的官吏们。

一般学校里的学生成绩都按「钟形曲线」分布，两头低矮，中间高大。毛的假话学校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前面一类与后面一类都是少数，中间一类则为多数。因此，本文在谈官吏欺骗时，无意将前面那类人与中间这类人混为一谈，无意将这千百万人都说成是极为可恶的骗子。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个国度里搞愚昧主义也是如此，也一件很有自我杀伤力的事。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经历过各种政治场面的民族，或说是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民族。无论其官吏阶层还是其民众阶层，无论其雅文化阶层还是其俗文化阶层，对于政治世道上的事情都有着较高的领悟力，他们对于执政者精心炮制的任何东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体会之后，不仅有了识别的能力，而且有了应付的能力，甚至有了模仿的能力，即一种取之于你又还之于你的能力，一种对于执政者来说十分可怕的能力。

老是要向人民讲假话，人民也学会了向你讲假话；老是要官吏向人

民讲假话，官吏也学会了在向人民讲假话同时也向你讲假话。

例如，刮「浮夸风」时，你今天暗示我要报好成绩，我明天就给你放个大「卫星」。我放一个，他放一个，大家都来放，放到最后就搞不清楚究竟谁骗谁了。老百姓被骗，毛主席也被骗。前者愚，后者蠢，大家都在冒傻气。不同的是，前者先愚后智，后者先智后愚，前者之愚不及后者之愚。

搞「个人迷信运动」时，毛泽东默许林彪不实事求是地抬高他，林也要求毛不实事求是地拔高他。毛默许林行骗他人，林在行骗他人之后又回过头来行骗毛本人，并差一点将毛骗得回不了家。

因此，在我们这个颇有阅历且老于世故的民族里搞愚昧主义是一件很难玩得开玩得久的事。执政者可以在民众中造成一时的愚昧，但无法在民众中维持长久的愚昧。讲假话者到头来要被假话所害，骗人者终究要被人所骗。

尤其是在信总交流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若再搞愚昧主义，就更是自取其害了。前些年中国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着两句顺口溜：

村哄乡来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

在这个「哄」与被「哄」的链条上，一端是村民、村长，另一端则是总理、部长。你「哄」我来我「哄」你，「哄」到最后也搞不清楚究竟谁哄谁了，搞不清楚究竟我比你蠢还是你比我蠢。

#### 44

上述可见，毛泽东搞出的「社会主义」，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是很成问题的。从中，人们看不出它比资本主义有多少优越性，相反倒看出它比资本主义更不如人意些。

在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准资本主义国家之中，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像毛的国家这样贫穷、这样专制、这样愚昧。

它们的经济水平持续稳定地提高，从未发生重大「人祸」；不像我们这里的经济建设一波三折，「人祸」频仍。它们的劳动者收入在几十年里增长了许多倍，以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惊呼：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由于生活富裕而丧失了革命斗志；不像我们这里的工人工资额和社员工分值在二十年间没有什么变化。

它们的政治舞台群星灿烂，并不断推陈出新；不像我们这里只准演独角戏，只有一个大明星，即使他老态已显、嗓音已哑，也硬是要从头唱到尾，还不许别人喝倒彩。

它们的大众传媒五光十色，不像我们这里的报纸广播清汤寡水。前一传媒要掏老百姓的腰包，故而老百姓愿意接受什么，他们就传播什么，使得老百姓接受传媒信息如同下馆子，自己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后一传媒要看其上级的眼色，故而其上级想要宣传什么，他们就传播什么，使得老百姓读报听广播如同进了公社食堂，大师傅烧什么就吃什么，最终不免要吃倒了胃口，吃坏了肚子。

笔者曾听《人民日报》一位老报人谈办报体会：当老百姓每每爱看我打报纸的时候，就是上级批评我们最多的时候；而当上级屡屡表扬我们报纸的时候，也就是老百姓对我们怨言最多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常常还没有读我们报纸就拿它来擦桌子的时候。即使到了今天，这张中国最大的报纸仍然是中国老百姓私费订阅最少的报纸。

就中国自身情况看，毛所要搞的「社会主义」，也不如他所反对的「资本主义」。这一比较在农业方面有突出表现。

按毛的说法，农民搞合作化或集体化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分田单干或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前者比后者有巨大优越性。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关于毛泽东坚持要走的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实际后果，每个过来的中国人都已看到，前文也已指出：「二十年的路白走了」。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来说，在生产力上，它经过了二十年努力却未能创造更

多的物质财富；在生产关系上，它经过了二十年变革却又变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大田重新分为小田。

关于搞分田单干的资本主义道路，虽为毛泽东竭力反对，但仍有积极表现机会。这种机会大体说来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 1950 年代初。当时，大规模的内战刚刚结束，百废待举。新中国农民从「土改」中分得土地，采取自耕自种方式，很快就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改善了农村经济状况，进而加速了战后国民经济恢复过程，巩固了中共新政权。

第二次发生在 1960 年代初。当时，大规模的饥荒仍在蔓延，饿死人现象随处可见。安徽省农民为了活下去而搞起了「责任田」、「包产到户」，并引起其它地区农民效仿，结果也迅速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原先饥荒最重的农村地区，由于搞起「责任田」，反而最先从饥荒中摆脱出来。当年安徽民间就有这样一种说法：城里人一月关饷不抵乡下人一担青蒜。不管怎么说，事后被毛泽东斥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责任田」，此次确实缓解了全国性饥荒，救下了许多人的命，对于被毛搞砸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

第三次发生在 1970 年代末。当时，老人家去世不久，大规模政治动乱也结束不久，整个政治经济形势仍未完全脱离「崩溃的边缘」，大多数老百姓仍生活在贫困中。安徽省农民再次率先搞起「联产责任制」，又将他们十多年前已经做过的事情重新做了一遍，结果仍是「一包就灵」，迅速改善了农村中的经济面貌，同时促进了城市里的经济改革。于是乎，「资本主义的分田单干」竟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立了首功。这是已故老人家始料不及的。

毛泽东曾告诫他的人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中国」。可是，当社会主义有了困难时，又见资本主义出来拉它一把。在上述三次重大转折时期，都是毛竭力反对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救了社会主义的农

业，救了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了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

鉴于这些史实，人们或许可以对上面句话作些补充：社会主义救中国，资本主义则救社会主义，救那个被毛泽东折腾得死去活来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不只是资本主义拉了社会主义一把，而且社会主义也促了资本主义一下。当然，这种促进不是从正面实施的，而是从反面作出的，即社会主义以自身的失败来反衬出资本主义的成功。

很有讽刺意义，为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提供最充分论证的人，不是那些热情歌颂资本主义的人，而是那些竭力反对资本主义并致力实践社会主义的人。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搞砸了，搞得无路可走了，故而把它的反面——资本主义给凸显出来了，显得只剩下这一条路可走了，尽管这条路未必就是最美好的。

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发展得过头了，不是衰老得百病缠身了，而是发展得很不足，因而在许多方面仍有着新生事物的气息，仍有着十分旺盛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已在当前中国改革过程中表现出来。从企业经济效益上看，除了那些国家垄断性行业外，国营的（即社会主义性质的）赶不上集体的（即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而集体的又赶不上私营的（即资本主义性质的）。老百姓也有一个类似说法：国营单位是属猪的，等着喂食；集体单位是属鸡的，走着找食；私营单位则是属鸟的，飞着找食。目前，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有 3/4 亏损，社会主义的国家工商税收有半数以上来自私营企业与集体企业。

如果就此断定，毛泽东及其党人从来就不清楚资本主义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从来就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不公平的。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曾指出：「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一

定要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作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 1061。)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又重申:「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 1432-1433。)

建国以后,刘少奇郑重表示,执政党目前任务就是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刘少奇,《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刘少奇文选》,下卷,页 62。)

可是,毛泽东一坐稳江山,就改变主意,大食其言,大加限制乃至竭力消除资本主义,同时迫不急待地搞起社会主义,结果只用了二、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要用十几年时间来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终于把他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多毛病的社会主义国家。

老人家性子也太急了,第一次坐进驾驶室,就开起快车来,结果把车开翻了,开进路边深沟里。不过,事情还未结束。前面大个子司机毛泽东心急火燎地开翻了社会主义新跑车,后面不远处小个子司机邓小平摇摇儿晃地开来了资本主义大吊车,想去把那辆掉到沟里的车拉上来。至于这位小个子能不能做成这件大事情已属后话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爱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爱讲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早先也爱讲这些大道理,但坐了江山后就转而爱讲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爱讲什么话都是他说的对,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

然而，有些事情，像整个人之类的事，可由他说了算；还有些事情，像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样的事，就由不得他说了算。前者只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具体运作问题，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后者则涉及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问题，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只是站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断裂带上，却硬要去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许多事情；他从没有到达过资本主义，却硬要去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去做的许多事情；并且，他做得非常坚决、非常固执，碰得头破血流也要继续做下去，既把自己害苦了，更把人民害苦了。

毛泽东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立志要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可是，他所要埋葬的资本主义是他并不了解的生命体，这不能不说是在瞎埋；并且，他所要埋葬的资本主义比他要搞的社会主义更有生命力，这又不能不说是在活埋。

这被埋下去的活东两，终究是要破土而出的。不过，这重又长出来的新东西，由于已受过埋压而很可能长得歪七扭八。

## 第四篇 四清运动反帝反修文艺批判

### 引言

1962年，毛泽东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转折，由主要搞经济建设转为主要搞阶级斗争，又回到了他能够发挥自身专长的老本行上。

不过，他此次搞的是一种新的阶级斗争，斗的是一批新的阶级敌人。是一批老熟人、一批熟得不能再熟的老熟人。他本是农民的儿子，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故对农民最熟悉；他又是念过师范的读书人，是满腹经纶的文化人，故又对知识分子最熟悉；他又是职业政治家，是执政党主席，故又对该党干部尤其高级干部最熟悉。

结果，毛泽东在其执政期间，非但不去好好地安顿这些老熟人，反而使劲地折腾他们，致使他们成了新中国里最不幸的人。

1962年前，毛虽以搞经济建设为主，似也没少折腾他们。「合作化」运动，剥夺了农民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并使他们中的几千万人饿死；「反右派」运动，剥夺了知识分子发表不同政见的权利，并将他们中的数十万人打成「右派」；「反右倾」运动，剥夺了执政党干部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并给他们中的数百万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

1962年后，毛转而大搞政治运动，更是频频光顾老熟人。

「四清」运动，重点整农村基层干部，而这些人过去大都是紧跟执政党闹土改搞合作化的农民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连动，既使90%以上的专家学者被揪斗、被侮称为「牛鬼蛇神」，又使90%以上的执政党高干被冲击、被指责为「走资派」。

用民间俗话说，老人家是一个「克熟」的人，一个总想着法子来整治熟人的人，并且人头越熟整治得越起劲，甚至宁愿宽大那些曾与他不共戴天的「战犯」，也不肯放过那些曾和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并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囚死在自家狱中。此公无疑把中国人的「窝里斗」精神发扬到极致。

或许他在「山沟沟里」搞马克思主义搞久了，也养成「山沟沟里」心态：总愿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活动，想找最熟悉的人群打交道，只是打交道的手法太辣了点。

## 45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给执政党出了「要抓阶级斗争」的题目。会后，毛急于知道他的党是怎样来做这个题目的。

1962年冬至1963年初，老人家风尘仆仆地巡视了11个省。结果只有湖南河北两省的书记与他「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讲阶级斗争问题，而大多数省的领导都不提此事，都表现出与毛的要求迥然不同的施政倾向。（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66。）

大多数执政党干部还不像他，能够把阶级斗争看得那么重要、那么迫切：既没有他那样的警觉性，能够发现那么多的阶级敌人；也没有他那样的灵活性，能够说转弯子就转弯子。大家实在跟不上他的步子，所以只好会上恭听教诲，会下另行其事。

大多数执政党干部也不像他那样，能够身居「二线」坐着专列到处跑，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们都在现职上，都忙于日常政务，就当时来说都忙于恢复经济，忙于收拾「大跃进」留下来的烂摊子，其中最迫切的就是忙于度荒，忙于让老百姓有饭吃而不至于被饿死。

毛在人民还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硬要他们大抓阶级斗争，实是向

人民强行推销他们此时还支付不起的奢侈品。他一向以人民领袖自居，但常把自己关心的事看得重于人民关心的事，并强求人民也像他那样想问题，做事情。

所谓「毛泽东退居二线」是一种很令人困惑的现象：你说他在「二线」的话，可他常常跑到「一线」的前面甚至前面很远的地方，致使那些「一线」大员们跑得气喘吁吁还跟不上；你说他在「一线」的话，可他又常常游离国家政治中心之外，或半年多不回北京，或整天里翻看一本本线装书。

换作中国老话：你说他是「太上皇」吧，可他常常撇开小皇帝跑上大殿吆收三喝四，直接使唤文武朝臣；你说他是「垂帘听政」吧，可小皇帝背后的帘子里常常空无一人，不知他老人家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把国家中枢权力分成「一线」和「二线」，可说是毛在政治体制构建上的一项创举，其宗旨就在于保证他自己既能够执掌权力又不必过于分心，既能够享有许多权利又不必承担相应义务。

这一制度创设，使得创设者本人处于进退自如境地：要想管事了抓起来就能管上，不想管事了丢下来就能走人，想进就进，想退就退，甚至以进为退，以退为进。1963年他年届七旬，正如孔夫子所言：「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在国家日常政务之内，他是一个较闲的人。常有这样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在北京手忙脚乱，难得片刻安歇，同时还得留意身后有人不时投来灼人的目光；老人家则在南方花团锦簇的别墅中读书看报，间或着和身旁服务员说说笑话，讲讲故事，或做做其它事情。

在国家日常政务之外，他又是一个很忙的人。老人家原本就不是一个安于闲适的人，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就会有所举动有所作为。如他自己说的，他之所以退居「二线」，就为的是要腾出空来想一些大事情、一些国家日常政务之外的大事情。

例如，在 1965 年下半年至 1966 年上半年期间，这位党主席比任何人都忙，先是背着党中央在那里忙于组织文章，以批判《海瑞罢官》；后又背着党中央在那里忙于「调兵遣将」，以防止「反革命政变」。林彪事后披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5.18）〉，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5 册，页 17。〕

这一制度创设，还使得创设者本人能够拥有双重身分：只要愿意，就能以在位者身分号令一切；只要不满，就能以在野者身分品评一切，甚至能像反对党骂执政党那样来痛斥「一线」大员，痛斥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毛泽东这一做法后来为邓小平继承。邓虽在对待经济建设问题上很不同于毛，并因而给治下人民带来许多实惠；但在运作政治权力问题上又相似于毛，并因而给中国政治带来许多弊端，例如，他也搞出了这样一种局面：

他虽不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却能掌握党和国家的最后决定权。他虽主要靠集体智慧搞改革开放，却能听任属下把这集体智慧归在他自己名下。无论是昔日的「毛泽东思想」，还是今天的「邓小平理论」，都是把个人名字写在集体智慧成果上。

〔当然，在这些集体智慧成果里，也有属于毛泽东个人和邓小平个人的份额，并且，他们个人的份额很可能要大于其它个人的份额；但是，他们个人的份额无论再大，也远小于其它个人的份额之总和。〕

例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意义最会大的思想交锋，即真理问题讨论，是胡耀邦等人发起的；意义最重大的制度创新，即土地联产责任承包制，是中国老农民搞出的（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什么人都想占农民的便宜）；色彩最多样的新生事物，即经济特区，是任仲夷等人最先提议建立的；……

今天一谈起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有人绘声绘色地说：有一位老人在南中国海边画了「几个圈圈」，……可是，很少有人会接着谈到这个

老人是怎么想起来要画那「几个圈圈」的，很少有人会接着强调任仲夷等人的倡议权。如此宣传个人，表面上是宣传者在为被宣传者歌功颂德，实质上是宣传者在陷被宣传者于不义的境地，即致使被宣传者有着个人独享大家荣誉的嫌疑。人们也正因此而可以说，宣传者是在有意无意地谋害被宣传者（仅就历史维度而言）。

人们可以稍稍思索一下，毛的党在毛死后宣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成果」这一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不难想出，这一说法至少意味着两点：

其一，毛泽东生前把集体东西据为己有，可谓「侵吞」；

其二，毛的党把毛曾经据为己有的集体东西归还集体所有，可谓「清退」。

再打个比方：

毛活着时，大家总往他的口袋里塞东西，总说这里面都是属于您老人家的东西；毛死了后，大家又从他的口袋里掏东西，又说这里面还有属于我们大家的东西。在这里，毛不光彩，大家也不光彩：一是言毛，二是势利，三是送人东西出而反而。

在宣传个人方面，我们已有过一次沉重教训，一次令宣传者和被宣传者以及整个中国大陆民众都极为难看故而堪称国耻的教训，如今还这么干，不能不让世人嘲笑我们这个民族太健忘了、太没有记性了。

卢梭说，文明人优越于野蛮人的地方就在于拥有记忆力；有人说，21 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笔者说，21 世纪将是文明人的世纪，中国人若要拥有 21 世纪，就应该拥有记忆力，尤其应该拥有对自己在 20 世纪所作所为的记忆力。）

他虽被称作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却能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失误不承担责任，不下「罪己诏」。权力是自己的，过失是别人的。他虽定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人选，将他当时还看得顺眼的一

些人推上台去，但后来又屡屡撤他们的职。毛泽东曾换过 3 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华国锋。邓小平也换了 3 个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

无论是毛还是邓，在权力运作上都是向我中心主义者，都力图使自己在党和国家的权力架构中处于一种最佳的位置：能够拥有最大的权力，却不需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不需要亲临实际工作，不需要作出深刻反省，甚至不需要口齿清楚地说出一些话、一些让别人能听得很明白的话。

数年前，笔者曾听一位中共老人说了这样句话：「在邓的身上有多毛的阴影。」说话者德高望重，所谈者入木三分。

不过，人们仍怀有希望：虽然邓小平摆脱不了毛泽东的政治阴影，但未来中国将会摆脱邓小平的政治阴影，将会根除这种任由最高统治者或为「一线」或为「二线」、或换马张三或换马李四、十分怪异的权力运作体制。

## 46

1963 年初，毛泽东在巡视了 11 省后回到北京。

巡视结果使他颇感失望，因为大部分一线工作都没有按照他这位二线人物的要求去做，没有去抓阶级斗争。或者说，大部分场上队员都没有按照他这位场外教练的意图去踢球，没有去踢别人膝盖。

这对于他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他把自己置于二线位置，并不真要扮演二线角色，而只是要摆脱一线的日常事务，以便更好地把握一线的大政方针。他如今发现「一线」工作偏离了既定的目标，有悖于他的意图，于是决定出面干预。或者说，场外教练观球观到上火时忍不住也要下场踢它一通。这就有了二月中央工作会议（1963.2.11-18）的召开。

在此会上，毛一再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并介绍

了湖南河北两省搞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湖南经验讲的是如何纠正「单干风」、如何打击「牛鬼蛇神」（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河北经验讲的是如何开展「四清工作」（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

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在农村开始「四清」运动试点工作。

无论城市里的「五反」，还是农村中的「四清」，最初都从经济问题入手，前者主要反经济犯罪，后者主要清财务问题；最后都落实到政治问题上，「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71-83。）从这里可看出，毛是如何在经济与政治之间搭桥的。

二月会议对城市里的「社教」运动作了明确规定，发了内容详尽的〈五反指示〉；但对农村里的「社教」运动只谈了一些原则性问题，而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没有形成有关如何开展此项工作的政策性文件。

毛泽东本是对农村问题的了解比对城市问题的了解要多得多，理应能够较快地拿出具体办法来，结果相反，处理前者比处理后者要迟缓得多。

这表明毛此时在如何开展农村社教问题是较为慎重的。他或许是考虑到当时农村经济还未恢复，尤其二月过后正赶上农业青黄不接季节，故不宜搞较大的政治运动；或许是已将广大农村地区预设为搞社教运动的主战场，故还应做更多的调查研究。

这也预示毛将向农村社教运动投入更多的精力。他还要在中央开更多的会议，并作出更多的决定；还要对「一线」大员作更多的训示，并因此而发生更多的冲突。

二月会议后，毛着重研究农村「社教」问题，读了大量材料，做了许多批示，并主持召开由各大区书记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杭州会议（5月2-12日），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又称〈前十条〉。这是有关农村社教运动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在此期间，毛继续强调社教运动的必要性。他非常严肃地告诉其党人，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去做，就将会出现这样一种灾难性后果：

「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国防大学编，〈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212。）

不过，在如何将有关农村社教决定付诸实施这一问题上，毛仍主张要慢慢来。

关于实施步骤问题，毛一再强调要经过试点阶段，要分期、分批、分地区地逐步推开。

「要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后年。土改不是搞了三、四年吗？有的人不信，不要去责备他。你一围攻，他一着急，就乱来。要慢慢地说服。着什么急？我们革命胜利比苏联还不是晚卅多年？」（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68-71。）

关于处理人问题，毛也反复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人，「没有蚂蚁的地方不要硬找蚂蚁」，不要伤人过多。

对于多数群众，「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

对于犯错误者，只要他们悔改，就给以机会，洗手洗澡，主要洗「温水澡」，批评要用事实材料，退赔要合情合理，「惩办要控制在 1%」。〔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71-83。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68-71。〕

据薄一波记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109。〕杭州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仍放心不下，一夜未睡，凌晨时将各大区书记召来，再三叮嘱，不要伤人过多。

从毛的这番谨慎中，既可看出他的问题来，即对自己信誓旦旦要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也可看出他的经验来，即在一场前景未明的角逐中，首先设法保住自己不至于发生溃败的底线，即把尽可能多的人拉到自己这一边来。

正如毛担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进入试点阶段，就出现「阶级斗争」过火情况，许多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打人、捆人、甚至整死人的事件。当年九月，中共中央又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农村「社教」运动搞得过火问题，制定应对政策，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又称〈后十条〉。

与〈前十条〉相比，〈后十条〉有两个特点：

其一，它不是由毛本人主持制定的，而是先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讨论、继由田家英执笔、后由刘少奇主持通过的。毛后来嘲讽道：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10条，为什么刚过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十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604。）尽管他当时也同意将此件向所有人宣读，包括向地、富、反、坏、右分子宣读。（国防大学编，〈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1963.11.1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4 册，页 341。）

其二，〈后十条〉更强调要团结 95% 以上的群众和 95% 以上的干部，要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要对落后群众和地富子女予以教育，不能按阶级敌人来对待，要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予以帮助，不能搞取而代，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相对于〈前刊条〉来说，〈后十条〉更趋于缓和、更注意反「左」。

可是，〈后十条〉一经实施，不但没有使运动过火情况有所缓和，反而使之愈演愈烈。反「左」的结果，越反越「左」。「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 2,000 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一地在 25 天内就死了 74 人。广东在这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 602 起，死亡 503 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114-1115。〕这个搞阶级斗争起家的党，不斗则已，一斗则火。

就运动决策层面看，一些领导人作出许多强化阶级斗争的判断与部署。

刘少奇为「一线」首席大员，统一领导全国「四清」运动。他认为，农村干部的实际状况比原先估计要严重得多，因此〈后十条〉关于团结 95% 以上干部的规定不妥当，要修改。他提出，对于农村干部，可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依靠的就不依靠，不必受限于那个百分比；即使是可依靠的，开始也不能依靠，等问题摸清后才能依靠。

刘还认为，犯错误的基层干部，在上面大都有根子、大都有一些领导干部给他们撑腰；因此，「四清」运动在清查下面的同时，还要追查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537。）

另外，他还主张扩大「四清」范围，不只是清经济，还要清政治、

清思想、清组织、清所有遇到的问题。他还提出所谓「打歼灭战」方式，即一次派出数千乃至上万人的工作队，集中去搞一个县的「四清」运动，以便能搞得深、搞得透。

对于刘的这些判断与搞法，毛当时是赞成的，是同意将阶级斗争形势看得十分严峻的。他本人就多次谈到，我们这个国家有 1/3 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掌握作敌人手里。他对刘建议的「打歼灭战」方式，也「觉得很好、完全赞成」，尽管他半年后又反过来说这是搞「人海战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119，1132。）

就运动实施层面看，一些地方以及一些工作队，也不断提供许多大讲阶级斗争的「典型」材料。其中，最「典型」者要数这三个材料：

一是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提供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报告称，工作队通过调查发现：「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已篡夺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大权，将这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变成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其间，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领导生活腐化，社会风尚败坏，反革命活动猖獗。报告又称，工作队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群众，进行夺权斗争，处分原党委书记等人，终使公司领导权又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中共中央肯定了这个报告，并将它批转全国各地各部门。中央批转通知称：这个事件「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在我们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硬是忘记和忽视了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与此相应，这个事件最重要的经验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必须组织好阶级队伍，建立阶级档案；彻底清除坏人，挖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决不可放任自流，半途而废」。（国防大学编，〈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6.23）〉，《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4 册，页 434-435。）

二是天津市委提供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报告称，「四清」运动前，小站地区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我们的，这里的政权已被三个反革命集团所操纵，这些反革命集团有上面的根子，得到南郊区委以及本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

报告还提供了一条为中央完全肯定的经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入手，似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面的政治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

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个报告时，强调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国防大学编，〈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1964.10.2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508。）

三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提供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又称「桃园经验」。刘亲自抓的一个「典型」，较完整地体现了他搞「四清」运动的意图。他就此向毛作了报告，获其肯定；并代中央起草了向全国转发这个报告的批示，称该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典型经验总结。」（国防大学编，〈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9.1）〉，《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471-472。）

按王光美说法，〔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7.5）〉，《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她最初是带着少奇同志给的两个思想方法下去的：一是「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二是「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王说，当时觉着他讲得很原则，但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越琢磨越觉得这几句话重要」。

王所在的四清工作队进村不久，便避开桃园大队干部而搞起「扎根串连」，私下里找「根子」谈话，背地里开「根子」会议，会间还派人放哨，以防有人偷听。通过这种秘密发动工作，终于在工作队周围组织起一支属于自己的「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王还以此证明，「社教」运动初期所强调的「一切经过基层组织」的规定是错误的。

通过清理经济问题和开展阶级斗争，王的工作队终于发现，中共桃园大队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是一个「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着国民党的事」的「国民党分子」。他所把持的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的，他所把持的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可是，直到工作队走时，「还没查出他和国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不过，「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工作队还发现，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大都不仅有下面的「根子」即地、富、反、坏、右分子，而且有上面的「根子」即他们在公社里、区里、县里的「靠山」。

在报告末尾，王谈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焦点在哪里」这一问题。她认为，「焦点」就在「和平演变」上，即一些阶级敌人「钻进革命队伍，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潜移默化，使我们的一些干部，舒舒服服地演变过去了，代表了敌人的利益。」她还带着感情说道，无产阶级在掌握了政权后如何不被「和平演变」这一问题，在世界上还没有解决，但我们党决心通过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来予以解决，这个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不久之后，这位王女士就真的看到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一场「史无前例」地把她自己以及她丈夫深卷进去的革命。

#### 47

1964年，是「四清」运动全面铺开且不断加温的一年，也是中央高层出现矛盾且频频开会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中央开了三次工作会议，次次都议论「四清」运动，并且都作出重要决定。

5月中旬至6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已明显「左」转，提出许多与〈后十条〉精神不一致的激进主张，从而促使中央书记处作出修改〈后十条〉的决定。

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1964.9.10），并于9月18日印发全国「四清」工作队，授权它们全面领导运动，即可以撇开所在地方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来搞运动，结果使得运动更加「左倾」化，使得许多农村基层干部遭受更为激烈的冲击，被斗、被打、被强令退赔。有的县自杀了数十人，有的干部退赔掉全部家当，只剩下身上一条裤、床上一片席。

12月15日至来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开始调整「四清」方向，一方面批评运动搞法「左倾」化，另一方面又强调阶级斗争严峻性。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指责他在运动中犯了「形左实右」错误。会议讨论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1.14）〉，又称〈二十三条〉。

在上述三次会议中，第三次最重要。它是毛泽东执政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有着多重意义的转折点：

一、「四清」运动本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即由主要清理「四不清干部」到主要整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转折点；

二、是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关系演变中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可与重托到决意除去的转折点；

三、毛泽东执政角色变换中的一个转折点，即由退居「二线」到重返「一线」的转折点。

据薄一波记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128-1136。〕毛对刘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关于运动性质问题，二是关于运动搞法问题。

关于第一点。刘认为，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事物的性质按毛的说法是由其主要矛盾决定的——是「四清」与「四不清」矛盾，并且是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相交织、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交织。

毛不同意刘的这一说法，认为它没有说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特有性质。因为，从字面上看，所谓「四清」与「四不清」说法，什么样的社会都可以用；所谓党内外矛盾相交叉说法，什么样的党派都可以用；所谓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交叉说法，什么样的历史时期都可以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毛看来，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这一判断符合本党自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一贯说法。他反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还将他与刘的这一份歧写进〈二十三条〉中。（国防大学编，〈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3.1.1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558-565。）这是以中央文件形式给刘挂了一笔账，留待日后清算。

关于第二点。毛泽东无论在会议即席讲话中，还是在他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中，都对刘少奇如何搞运动的方式提出尖锐批评：

针对后者所赞成的「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的主张，前者指出，要「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针对后者所认可的「扎根串连」的搞法，前者指出，「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针对后者所作出的「打歼灭战」的部署，前者提出，不要搞「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针对后者所领导的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的情况，前者提出，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是 20%，那 7 亿人就是 1 亿 4，那恐怕会发生一个『左』的潮流」。此次毛对刘的批评是很意气用事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乃至戏剧性色彩。

12 月 28 日，老人家拿着《宪法》和《党章》走进会场，满腹怨愤地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事情起因：在会议召开前，邓小平曾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到会；在会议进行中，刘少奇又说，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于是，毛泽东气得说，一个不叫我参加会议，一个不叫我讲话。

当老人家向别人出示《宪法》和《党章》时，不知他可想到别人也可以向他出示《宪法》和《党章》，要求他能够依法循彰也行使权力。这里的「别人」，不仅包括「地富反坏右」，而且包括普通老百姓，以及像彭德怀、刘少奇那样的执政党高干。

一个向来都在《宪法》和《党章》之上说话和行事的人，此次竟也在那里寻求《宪法》和《党章》的保护。不知当时在场者是怎样想的，但就后人看来是不伦不类的，其喊冤叫屈无异于胡搅蛮缠，还有些滑稽。

一个向来喜欢打赤膊、光脊梁的人，突然穿起了西服、系上了领带；可是，西服里面没穿衬衣，领带系在光脖子上。

## 48

上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两方面批评，后来又在那张「大字报」中被提出来，被十分简约地概括为五个字：「形『左』而实右」。（毛泽

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70。）其「形『左』」，指刘在运动的搞法上犯了扩大化错误；其「实右」，指刘在对运动基本性质的判定上犯了立场性错误。

我们在此主要兴趣，不是想判定刘是不是像毛所批评的那样犯了这些或为「左」或为「右」的错误，而是想知道刘为什么会有这些或被称为「左」或被称为「右」的表现，以及毛为什么会作出那些或为严辞厉语或为冷嘲热讽的批评。

刘少奇所领导的运动之所以整出那么多的「四不清」干部，有许多方面原因，其中主要原因出在体制方面。

其一，从这个权力体制的内在结构上看，毛的国家属于一党专政的国家，其间各级权力机构都实行所谓一元化领导，每一权力机构除了受上级权力机构的领导外，几乎不受其它任何方面的制约。

这种垂直性领导方式，难以保证上级权力机构对下属权力机构实行有效监督。一是因为，它与下属机构处于种一对多的关系，故存在照应不全的情况。二是因为，它对下属机构的了解多是依据下属机构自己提共的信息，故难获得较为客观的资讯。

与此相应，它的下属权力机构就很可能无所顾忌而放任自流起来。其中，农村基层组织情况尤为严重。

由于处在这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阶梯的最低层面上，中共农村基层所受到的制约也最少，也最容易规避。不仅上级对他们的有效监控手段不足，而且他们本身的自我约束能力也较差，同时治下群众的主动参政意识也很弱。

这些因素使得他们中许多人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很容易独断行事，既不好好遵循上级指示，也不好尊重下面民情，长此以往，没有不滥用手权力的，小到多吃多占，大到打人骂人。其中极端者，几乎不受任何权力制约，为官一地，称霸一方。毋庸置疑，在新中国广大农村

中，有着许多形形色色的土皇帝，有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毛泽东。

这种情况对于中共高层来说，不整不知道，一整吓一跳，似乎到处都是「四不清」的人和事。用毛泽东的话说，走起路来看不到蚂蚁，弯下腰来则看到很多蚂蚁。（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80。）

因此，不是刘少奇个人想整出那么多的「四不清」干部，而是这个体制出那么多的「四不清」干部。

其二，从这个权力体制的运作方式上看，不论刘少奇在前台或毛泽东在前台，若要想有效整肃吏治，就不得不搞「群众运动」。

任何政权中的高层领导人，都不希望下属官吏过于贪污腐化、过于鱼肉百姓；纵使他们自己爱搞腐败，也不希望下属跟着他们做这同样事情。道理很简单，如果下属官吏过于腐败，那么，他们就会：一是占有大量资源，从而过多地截取原是流向国库或流向高层官吏的利益；二是激起民怨民愤，从而不利于自家政权的稳定。

这种整治吏治的要求，在中共政权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一是因其执政党当初就是打着铲除贪官污吏的旗号来夺取政权的，故很想获有为政清廉的名分，以显示其「不忘本」。二是因其政权所受到的外部制约力与内部制约力都有限，并不断弱化，故使得治下腐败现象很容易滋生，并愈演愈烈。因此，中共领导人不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真心想整治吏治清除腐败的。

可是，中共领导人只要着手整肃吏治，就会遭遇体制性困境。

他们若想有效整肃吏治，就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要十分清楚地了解吏治实况，了解下属官吏究竟怎样搞腐败的事实；二是要有所触痛地教训犯误者，以使他们中的多数人不敢重覆辙。

可是，中共权力体制本身，不能为做到这两点而提供有效途径。这个权力运作体制，如就行业领导系统看，大多是双重的，即部门与

地区、「条」与「块」相交叉；如就政治领导系统即人们常说的党委领导系统看，又都是一元化的。比较而言，后者更为根本些，因为这个国家说到底是一个「党国」，是一个一党专政或以党代政的国家。

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权力机构，对上，接受一元化领导，接受单一主管党委垂直领导；对下，实行一元化领导，垄断属下一切事权乃至人权；而在其左右，不存在其它真正能与之相互平行并对之进行制约的权力机构。

于是，在这上下级权力机构之间，形成一种单一渠道的全依全靠的关系，不仅下级机构在受权方面只能完全依靠它的单一上级主管党委，而且上级机构在施权方面也只能完全依靠它的各个下属分支机构，而不能通过其它途径对它们进行监督。

在一般情况下，上级机构只能通过下级机构自己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它们的政绩。这可以说是上级机构了解下情的正常途径。然而，这种正常途径只能提供下级机构自己愿意提供的东西，其间难免或作扩大、或作缩小、或无中生有、或隐而不报。

显然，当上级机构想要了解下属机构的实情时，即不仅要了解下级比较愿意让上级了解的那些东西、而且要了解下级存心不想让上级了解的那些东西时，就不能只依靠这种正常途径，而必须再寻找一些非正常途径。

这非正常途径通常有两条：一是鼓励下面人越过其上级机构而直接向其领导的领导打小报告，署名匿名都行；二是派出工作队越过其下级机构而直接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上司情况，好话坏话都听。

两相比较，后一途径更有效些，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客观些，但其成本——无论是经济政治成本——也都更高些，因为这已是在搞「运动」了。

在工作队刚下到基层时，多数群众是有所疑虑的。因为，工作队

要他们揭发的对象，过去是一直管着他们的人、一直对他们大耍威风的人，并且，将来很可能是继续管着他们的人、继续对他们颐指气使的人。老百姓的心中不仅有来自以往的后怕，而且有对于日后的顾忌。

这后一方面的担心尤显沉重。因为工作队总是要走的，总是要回到城里去的。如果此时那些被群众揭发过而又未被打倒的干部回过头来搞报复，那么，群众怎么办？再去找工作队？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了。

为了解决基层群众对工作队的认同问题，后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有两项：

一是避开本地干部搞发动群众，也就是搞所谓「扎根串连」。先是背地里寻找出些比较敢说话的人——任何地方都有一些相对来说胆子较大的人——作为「根子」；继而把他们组织起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而后让他们再去带动其他群众一起来诉说那些干部们的种种不是。

二是为了进一步打消群众顾虑而设法贬损本地干部权威，或有意冷落他们，或公开批评他们。这就使得群众觉着这些干部没有什么人能够保他们了，甚至使群众觉着他们中一些人肯定会在运动中被赶下台，故而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结果什么样的话都敢说了，无论是这些干部的确做错的事，还是自己心中一直记恨的事，都一股脑地说出来了。其中一些胆大好斗者仗着有工作队给撑腰，竟对那些挨整干部又打又骂起来了。于时，整个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打击幅度过宽以及处理方式过严的势头。

因此，并不是刘少奇、王光美他们个人想当然地要搞「扎根串连」、要搞过火斗争，而是他们若要在这个权力体制内整肃吏治就必须采取这些严厉措施。正如在鞋匠铺里做活就必须用锥子、锤子、钳子和刀子。

运动到此，还未结束，还有一个如何收场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共搞自身整肃运动向来都是：前期刮台风，后期毛毛雨，先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搞甄别平反，重新起用。运动一来，打倒一片；运动临近结束时，党组织又出来扶起满地趴着的人，说声「委曲了」，接着宣布被整者中的多数人没有多大问题或根本没有问题，并希望他们不计前嫌、放下包袱，继续为党工作。

不计前嫌，说是容易，做就难了。这些被整治的干部，尤其是被过分整治的干部，大都满腹怨恨，一旦官复原职就会寻机报复那些整人者，让他们8寸的脚穿上7寸的鞋。另一方面，那些后来果然被穿上小鞋者，也会耿耿于怀，若无运动则罢，若有运动恐怕又要摩拳擦掌了。

如此搞运动，并是接二连三地如此搞运动（用毛的话说，「七八年又来一次」），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破坏了我们民族的亲和力，并影响深远。

另外，在那些被重新起用的干部中，有一些人过去挨整确属冤案，但也有一些人过去挨整不能说是冤案。后者确实有严重错误，甚至有很大民愤，本应被清除出领导岗位，似在运动后期落实政策大潮中又被请了回来，继续做他那个不称职的官。这后一种人的官复原职，实为吏治中的「废物再用」，后果可想而知。

这种「废物再用」已成为这个国家里的一种常见现象，搞运动时有，不搞运动时也有，此一行业中有，彼一行业中也有。

比如，掌管国有财物的人却贪污盗窃，负责选拔干部的人却任人唯亲，从事道德教育的人却说归说做归做，经管大众媒体的人却热衷于做「假大空」节目，当第一把手的人却言而无信、朝令夕改……

这些人所犯错误，不是一般错误，而是那种完全有悖自己的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的错误，即类似那种执法者犯法的错误，是对他们所应承担的社会角色的根本否定。因此，这类人理应被他们所在行业宣布为永不录用的人，宣布为本行业决意剔除的人才废品。即使社会还

想对他们有所使用的话，那也应是在他们被调离出该行业之后的事。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执政党在处理这些犯错误干部时，常常采取原行业原岗位消化的方式。例如，贪污犯在被教育了一番后，继续做他的经济工作；假道学者在交上了什么我的反思或我的反省之类的检查后，继续做他的思想导师工作；搞糟了甲地工作的某某书记在与上级领导谈过话后又调到乙地工作，继续发号施令、为害他方；……。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体制上，出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上。

这个体制常常使执政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难以有效监督体制内的官吏，从而导致贪官污吏丛生；另一方面，难以充分吸纳体制外的健康力量——根本不允许其生存发展——以替代体制内的那些本该被淘汰出局的劣质官员；结果只能在体制内搞「废物再用」，即不断地使用劣质官员，包括使用已查出有腐败行迹的劣质官员。

这好比是，在得不到净水补充的情况下，只能搞废水循环使用，结果越用越脏，越脏越用，甚至越往要害处用，用到了今天，竟用出了贪污犯当上反贪局局长这等怪事。

概言之，搞「四清」运动这一方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前述执政党整肃吏治所要满足的两项要求，即了解基层实情和严整基层组织；但其本身毕竟是一种非正常的途径、即以非体制手段来整治体制本身的途径，并且是一种成本高昂的途径，即留下许多后遗症的途径。这如同为了治病而服用过量抗生素一样，虽能获得一些疗效，但也抑制身内白血球生长、并使身内病原体获得一定抗药性，结果更难治好病。

「四清」运动的这些特点后来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显现出来，以致于我们有理由说：这场社会主义教育的最大意义，不过是为接踵而来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作了某种预演或示范。

最明显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并不都是原创的，

而在很大程度上取自于刘王氏的「桃园经验」，并在更大范围上运用了这一经验。

王光美和她的工作队一进驻桃园大队，就绕开基层组织，直接到群众中去找「根子」，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以带动广大社员去斗争那些「四不清」干部，再顺藤摸瓜找出他们在公社里、区里和县里的「黑后台」。

毛泽东也是按「扎根串连」这一模式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他先是绕开北京到上海搞，找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做「根子」，支持他们写文章，以掀起文化领域里的批判运动；继又背着中央在全国搞，找了许多「红卫兵」小将做「根子」，鼓励他们大鸣、大放、大串连，以发动亿万群众去揪斗各行各业里的「走资派」，再一级一级往上揪，一直揪到中央里，揪出「正睡在」他身边的那位「中国式的赫鲁晓夫」。老人家竟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桃园大队」，并使他自己做了一回「工作队队长」。

在中共历史上，刘少奇最早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可此次，毛泽东也反过来学习刘少奇的思想，包括学习他夫人的思想，很是谦虚。据王光美回忆，她每次从桃园大队回京，毛都要找她广解情况；她的「桃园经验」报告出来后，毛看了很欣赏，并推荐给江青看，还多次表扬她，还鼓励她到各地去讲一讲。（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537，541。）

毛此次之所以学习或模仿刘及其夫人的经验，不是因为他不及后者高明，而是因为他与后者都受困于相同的权力体制。不论刘少奇还是毛泽东，若想有效整肃这种一元化权力体制下的官吏，若想切实了解他们为政的详情、打下他们做官的威风，都必须采取这种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

刘少奇由于身居「一线」，具体领导「四清」运动，故先遭遇这一体制性困境、并因此而先采取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故为后来者做了先

导性示范。毛泽东后来重返「一线」，决意发动「文化大革命」，也遭遇这一体制性困境。他很想整治那些已经不大听话的下属官吏，尤其想整治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主席；可是，后者正掌握着或正参与掌握着中共权力体制；因此，要扳倒他，就不得不使用由此人自己摸索出来的那个方法来反对此人，就不得不「请君入瓮」。

从这里可看出体制对于人的力量。体制虽由人创设，但一经创设出来便具有能够左右人的力量。不论是老百姓，还是执政者，都不能轻易地规避它。

从这里，还可看出这种一元化权力体制若不作出重大改革便不能摆脱它的两难处境：要么不可遏制地腐败下去，直至完全烂透而亡；要么三番五次地搞群众运动，直至过度折腾而亡。

#### 49

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二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严辞责难刘少奇，之所以愤然推翻由后者主持制定并已下发各地的〈十七条〉（所谓〈十七条〉，即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前期的一个讨论纪要，曾于1964年12月28日下发各地；后因毛泽东不满而于12月31日被停发，并由各地自行销毁。）而由自己另起炉灶搞出〈二十三条〉；按前述薄一波观点，这主要是因为老人家一是不能容忍刘关于「四清」运动主要矛盾说法，二是不能容忍刘引导「四清」运动严整基层的搞法，认为刘「形『左』而实右」。

若进一步追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能容忍刘少奇的这种说法和这种搞法？薄一波则语焉不详。

当毛说「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刘则把它说成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两种说去确有本质区别：按照前者，「四清」是一场有着特定内涵的阶级斗争运动；按照后者，「四清」是一场仅有一般性质的廉政建设运动，即以清官标准（「四清」）来整肃非清官（「四不清」）运动。

这里的非清官，并不特指一定历史时期才会有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可泛指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的贪官污吏。至于那种由上面派工作队直下基层整治四不清干部的做法，很像是中国老戏里常演的那种朝廷钦差大臣直下州县缉拿贪赃枉法者的剧情。

所以，陈伯达说：「所谓清不清，历代都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133。）

薄一波后来抱怨陈伯达在毛刘冲突中起了不良作用，说了不该说的话。

不过，就陈话本身来看，还是说得相当准确的。它确实抓住了刘上述说法的关节点，即用一般所指来替代毛的特殊所指，用那种任何社会都会有的吏治问题，来替代毛所说的那种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会有的阶级斗争问题。

这对于毛来说，显然是另搞一套，至少是淡化他早在 1962 年就为执政党制定好的那条「继续革命路线」。

陈伯达为党中秀才，虽非忠厚，但有观察力，不仅能观察一些大人物的脸色，而且能观察一些大问题的事理。与此相应，他的老上司毛泽东也是不仅欣赏他的俯首之态，而且欣赏他的理论才干，欣赏他能够根据需要找出种种论据来。此次毛就十分欣赏他的上述说法，并将之写进《二十三条》中的第二条里。

又当毛泽东大谈党内阶级斗争时，刘少奇却说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603-404。）刘这些话惹得毛大怒，说刘存心不让他说话，接下来便上演了那幕拿着《宪法》和《党章》走进会场的闹剧。

人们会问，刘这些似是平常的话何以能激怒毛，气得他如此失态。这里面有毛自身的因素——已经养成了一触即跳的性格；也有刘说话

分量重的因素——的确触到了毛的痛处。

所谓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这是刘仍在坚持他关于「四清」运动主要矛盾的说法。因为，只有在「四清」与「四不清」之间，才会既有敌我矛盾又有非敌我不盾——人们很难将那些多吃一点多占一点的人都说成是敌对分子；而在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就只有敌我矛盾可言了。

所谓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一切从实际从发，这原本是毛一贯自我轮的思想路线，如今却被刘用来反驳毛本人，自是令他不快。更要害的是，刘的这些话暗示着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只具有演绎性质：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实际中有什么反映什么；而是从概念出发，从某种假设出发，预先制定一个理论框子，然后拿去套用现实。

实际上，毛所搞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带有这种演绎性质。如前文所述，他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一个假设出来的资本主义，他的社会主义的归宿点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两者都属想当然的东西（参见本书第 37、38 节）。

毛的后继者邓小平就承认，执政党干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却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即是说，毛及其党人几十年来搞的是一个假设上的社会主义、一个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一个实际所是的社会主义。可问题是，毛为了这个假设上的社会主义而动用了现实中的不计其数的社会资源，从而造成了我们这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民族在人力与物力上的巨大浪费，以致不堪承受。

一些文献在谈到毛与刘这一冲突时，多说是毛先发难的。这只是看到表面，只是看到在此冲突中，脾气数毛发得大，话也数他说得多。若从事理上看，应说是刘先挑战的。因为，早先毛已经为执政党确立了大政方针，如今刘却在那里另说一套，并说得含骨带刺。毛若想坚持其政治路线，若想维护其政治权威，就必须起而反驳刘。

一向自谦为毛泽东学生的刘少奇，此次在其先生面前，大发脾气

的事没有，直接顶撞的话不多，但言必有中。毛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一会儿就说出了一大篇，米少水多。刘想半天说一句，说出来的话句句说在点子上，水少米多。

另外，在「四清」运动的具体搞法上，毛对刘的不满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在「四清」运动的打击方式上存在着过于严厉的情况，二是认为在「四清」运动的打击对象上存在着重点不明确的问题。

若对这两点进行比较，可以说毛更看重后者。因为，前者只是方式方法问题，后者则涉及运动方向问题。再就毛本人的历史来看，他搞起内部整肃运动来也是相当严厉的，或是很「左」的，甚至比刘有过之而无不及，前有打「AB团」之例，后有搞「文化大革命」之例。所以，毛更为关心的，不是什么样的方式整人，而是整了什么样的人。

刘强调，此次运动既要整台上的「四不清」干部，也要整幕后的地富反坏分子；既要整党内的坏干部，也要整党外的阶级敌人。至于这两者孰重孰轻，他未作进一步分别，只笼统地说这是一种党内外矛盾相交现象。

毛则认为，地富反坏分子现在没有当权，过去又被斗争过，被搞臭过，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四小清」干部则不同，过去没有搞臭过，现在又是当权派，能给自己多记工分，上面的人听他们的，下面的人又怕他们；因此，要发动群众先整我们的党，整这些当权派，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129；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602-603。）

仅就整当权派而言，毛与刘也有很大分歧。

刘的目光主要盯着下面，盯着那些犯有「四不清」错误的社队干部，间或也游移到上面，提出要追上面的根子，但只是点到为止。

毛不反对整执政党基层中的坏干部，但史想整执政党高层中的当权派。后者可以说是他多年来施政重心所在。

1962年前，他已整过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冒进」诸大员，整过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将后者逐出中央领导圈。

1962年中，他又整出习仲勋领衔的「西北反党集团」；又撤销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同时既批判邓子恢本人又敲打支持他的陈云，致使两人多年不在中央说话。

1962年后，他身居「二线」，但对「一线」大员日益不满：

他多次批评所谓「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政党），批评所谓「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前者主要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后者主要批邓子恢和陈云。本来毛已批得邓与陈不说话了，但他仍抓住不放，批评不止，并以此来警戒其它大员，尤其警戒那几位曾支持他们的中央常委。

他还批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同资产阶级打交道时不讲阶级斗争，竟提出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主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页875-888；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576。）

他还指责由邓小平领衔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和由李富春领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北京的「两个独立王国」，指责他们已搞到与党主席分庭礼的地步上。前一机构统管全党务工作，后一机构统管全国经济工作。毛的批评矛头已深戳到执政党核心圈中。

到了制定〈二十三条〉时，毛又当着众多中央委员的面严辞训斥那位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副主席，并在心中生出要搞掉此人的念头。（斯诺，〈1970年12月18日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纪要〉，《漫长的革命》（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页263。）

此时，在执政党核心圈中，只剩下林彪和周恩来两人没被老人家

点名批评了。不过，林长期处于半修养状况，已把军中大部分常务性工作交由他人代理，故大多数时间不在一线上。周虽未被直接批评，但已被旁敲侧击多次。

周过问较多的国家计委、统战部和文化部，均被毛屡屡责难，他自己身边的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也被毛横加指责，甚至被毛强令撤换。老人家频频举起的手，虽未直接打在周公的脸上，但可说是擦着周公的身子而落下的。毛不满意周，又要用周，于是采取了这种在其身边飞舞巴掌的策略，不让他疼，但叫他怕。毛周关系扑朔迷离。

此时在毛眼里，中央「一线」已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诸大员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他的「继续革命」，不仅要整执政党基层干部，更是要整执政党高层领导；不仅要先搞豺狼后清狐狸，更是要先搞虎豹后清豺狼。进而不难理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让所有中央一线大员的名字都上了造反派的大字报，并将其中许多人都打成走资派。

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不失理论趣味，给他所要整的执政党干部起了一个学名，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并将其定性为「党内资产阶级」。

不过，在对阶级一词理解上，毛泽东与其思想导师马克思列宁有很大不同。在先生那里，所谓阶级主要属于经济范畴，主要反映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其中最重要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1。）

在学生这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不属于经济范畴——因为它所指称的那些人并不拥有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而属于政治范畴——因为它所指称的那些人大都掌握一定级别的党务权力或行政权力，并通过这些权力非法占有公众利益，以使自己作威作福。纵然这种治权力也与一定经济利益相联系，但这种联系多是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经

济决定政治。学生说的与先生说的，消极地看，是南辕北辙；积极地看，属后浪推前浪。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更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概念。

总之，在这场关于重点整「走资派」的争论中，毛泽东从理论上说，并不清楚他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所要反对的资本主义是什么；但在政治上，十分清楚他所要坚持的就是他曾说过的话、所要反对的就是不听他话的人。因此，他所要搞的阶级斗争，并不是真正的阶级斗争，而只是以我划线地排除异己；他所要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而只是那些不敢公然反对他却也不想完全听从他的党内领导干部。

## 50

毛泽东之所以要整「走资派」，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接受了「苏联变修」的教训。他的「国内防修」政策与他的「国际反修」政策互为表里。

在他看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改变颜色，已经变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一个甚至比一般资产阶级国家还要坏的国家。「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时的一些插话（1964.5.1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171。〕

他的这一判断，在由其写作班子起草的一篇文章中得到较为系统的阐述。这篇文章名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刊登在《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和《红旗》杂志1964年第13期）上，可视为当时国内一系列「反修文章」的一个代表作。

文章描绘了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

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构成苏联社会中的一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而后者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

文章历数了赫鲁晓夫施政路线的种种错误：

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纵观毛泽东在其执政二十余年中所使用过的那些最显忌恨的字眼，就国内而言，大多不是被用在他的老对手蒋介石身上——尽管此公仍在那里不断说要反攻大陆、不断指责毛为暴政者，而是被用在他的老同事彭德怀和刘少奇等人身上；就国外而言，也大多不是被用在

老对头「美帝国主义者」身上——尽管新中国曾与他们血战三年、并被他们封锁二十年，而是被用在「苏联老大哥」身上。若老人家再世，不知还有没有人——无论是黄皮肤者还是高鼻梁者——敢做他的老朋或老战友。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忌恨「苏联老大哥」，有多方面原因。就意识形态来说，毛至少有两点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

其一，毛十分崇尚阶级斗争观念，以致于把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都归结为阶级斗争理论（参见本书第 22 节）。赫鲁晓夫则倾向于淡化阶级斗争观念，在国内讲「全民党」、「全民国家」，在国际讲「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尽量避免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发生对抗，同时劝告那些在野的共产党尽量避免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尽可能采取合法斗争方式，如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其二，毛一直怀有乌托邦意识（参见本书第 38 节），并于 1958 年付诸实践，大力兴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则于当年年底在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交谈嘲笑了毛的这举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中文本），页 188。）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交谈的一方代表当时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老大哥」，另一方则来自当年毛泽东时时提防着的头号敌国。

第二年年年初，赫鲁晓夫又在苏共二十一大会上影射了中国大跃进运动：「我一个文件里对当时正在中国发生的情况，给予了相当有力的分析，并乱我相信是正确的，虽然我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讲清楚，我们对大跃进的态度是否定的。」（《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 年中文本），页 282。）

1959 年 7 月，也是中共庐山会议召开期间，赫鲁晓夫又在波兰发表了影射人民公社的讲话，「声称 1920 年代也俄国追求这种想法的人『对做什么共产主义的理解少得可怜，也不知道怎样去建立共产主义』。很明显，这种谴责也同样适用于针对 1950 年代的中国。」（罗德里克·麦

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本），页310。）

就党际关系来说，莫斯科与北京都是：既各有所恃，也各有所求；并且是：此方所恃多是彼方所求，彼方所恃也多是此方所求。例如，莫斯科方面实力较强而威望不够，北京方面威望较高而实力不足。（艾伦·S·惠廷，〈中苏分裂〉，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5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本），页560。）

前者接连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1957.8.26）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7.10.4）。后者则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赢得革命胜利，并在朝鲜半岛与西方头号军事强国打成平手。

然而，两者也都有弱点。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做了关于斯大林问题报告，报告既揭露了本党前领导人的独裁者面目，也暴露了苏联社会制度的专制化性质；既使世界为之震惊，也使苏共自己陷入窘境。

于是，在西方国家中涌起反苏浪潮，许多人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前者在某些方面已超过后者，例如，希特勒主要屠杀自家营垒外的人，斯大林则主要屠杀自家营垒中的人——其中一些人还曾与列宁共过事、还曾与斯大林一起度过艰难岁月。在东方阵营里，出现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反叛。即使在共产党威望很高的新中国里，也出现许多不满「中苏友好关系」的「右派言论」。在苏共中央内部，也出现严重分裂，致使赫鲁晓夫差点被赶下台。因此，苏联需要支持，尤其需要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支持。

中共方面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度里搞社会主义，既缺乏设备与资金，又缺乏技术与经验，因此，中共也需要支持，尤其需要「老大哥」的支持。

然而，赫鲁晓夫所求与毛泽东所恃，或毛泽东所求与赫鲁晓夫所

恃，总是不能很好地协调起来。赫鲁晓夫不能很好地从新中国那里得到声望上的支持，最终招致后者的严辞批判、被说成是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也不能很好地从「老大哥」那里得到实力上的资助，最终遭遇后者的断然毁约，被中止了所有援助项目。

在中苏诸多分歧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意气用事，即不是出于双方对各自长远利益的深入思考，而是起于他们对某些双边问题的过激反应。

如有这样一种情况，两者都对对方预期过高，都要求对方像对待亲兄弟那样对待自己，而当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产生十分强烈的心理反差，由殷切希望骤转为满腹怨愤。在这十分的期待与这十分的忌恨之间也就有了二十分的距离。这就不难理解，中苏间的怨恨往往超过中美间的怨恨或苏美间的怨愤。

在 1958 年至 1959 年间，苏方多次提出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和拥有一个海军基地，以使他们在太平洋活动的潜艇能改善通讯条件，能就近加油、维修和作短期停泊。

在苏方看来，他们的要求理应得到满足，因为，他们已与中国建立军事友好合作关系，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苏联的安全，也是为了中国的安全，何况他们已向中国提供了制造潜艇的图纸，并派遣了有关专家，因此，中国应该有所回报。

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毛泽东的拒绝：「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的拒绝又引起赫鲁晓夫的抱怨：「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 年中文本），页 671。）

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两者都需要对方支持，但都不怎么尊重对方，

又都很在乎对方是否尊重自己，并准备随时还以颜色。你不敬我，我不敬你，既有你这一次，就有我下次，遂成恶性循环。

新中国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之初，除了缺乏物质基础外，还缺乏技术经验，在许多方面毫无所知，故需要老大哥给予人才上的支持。苏联作出积极响应，先后向新中国派遣了上万名苏联籍专家，同时为新中国培养了比这数量更多的中国籍专家。

这些专家遍布新中国各行各业，承担其间技术总管工作，为建立中国经济体系做了许多奠基性工作。纵观毛执政廿七年，国家经济发展状况最好——既快又稳且上规模——时期，当数 1954 年至 1958 年春这段时期。在此期间，苏联专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自己也承认，（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页 168-169。）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等方面，我们由于「完全没有经验」，而不得不抄搬苏联东西，不得不听从苏联专家。（不过，他又抱怨这一时期教条主义盛行，埋怨中国人过于尊重苏联人。问题是，他独立自主干的成绩远不如人家援助他干的成绩。作为同一国人，笔者都感到有些难堪）。

许多年后，一些国人把由日本引进设备的上海宝钢项目与由苏联引进设备的许多工业项目进行比较，感叹道：「小鬼子」还是不如「老毛子」，你看人家 1950 年代在咱们国家搞的那些项目，虽不是很先进的，甚至有点傻大笨粗，但都是很实在的，至少没有坑蒙拐骗。

苏联专家与中国人友好合作关系，到了 1958 年发生逆转。其责任是双方面的。就中国方面说，主要起因于毛泽东在这一年里大讲破除迷信，大讲反对教条主义；这「迷信」主要指中国人对苏联专家的迷信，这「教条」主要指苏联专家为中国人制定的规章制度。

当然，毛这样做不是毫无来由的。从苏联老师方面来说，确有高傲自大、过于刻板的问题。从中国学生方面来说，也确有死搬硬套、盲目服从的问题——老人家曾经气得说道：「中国人人当奴隶当惯了，

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页 168-169。）

问题是，他为此而掀起一场遍及全国并波及国外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就做得过分了。因为，他号召中国人不要再像以往那样迷信苏联人，而要看到他们也有许许多多缺点；这就难免会刺激苏联人，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反差感，感到中国人已不打算再像过去那样与他们交往了。

不久，苏联方面作出反应——也可以说是一个过分反应：撤回所有在华专家，停止所有援华项目。

自此，中苏关系进入冰河期。

赫鲁晓夫曾就苏联撤回援华专家事作过一个解释：（《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页 270。）

在中国，我们顾问的处境已到了简直不能容忍的地步。成群结队的喝醉了酒的中国人谩骂他们。他们叫我们「管卡压」。当他们一天工作完毕回到所住的公寓和旅馆时，发现手提皮箱翻过来了，房间遭到了搜查。这些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经常发生的。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我们最优秀的专家……以自己的援助换来折磨。最后，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从中国召回我们的顾问。

就事实而言，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不恭敬，主要表现在思想宣传上，而没有发展到「成群结队」去「谩骂」他们或「经常」去「搜查」他们房间的地步。赫鲁晓夫所说的这类事，即使有也不是普遍存在的。此公夸大其辞。

麦克法夸尔认为，这一事件有多方面因素，而不是像苏联政府所声明的那样，即主要是由于中国方面不能善待苏联专家而引起的。他

援引一个苏联援华专家的话，说明苏联政府所表达的不满并「没有引起大多数苏联顾问或苏联国内科学家的共鸣。」（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本），页389-393。）

中共方面也对这一事件作过解释，多是强调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乘人之危」，「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从而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心……（国防大学编，〈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401-409；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364-365。）

这种解释只谈对方责任不谈己方责任，也有失公允。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开始公开或半公开地批判苏联教条主义，并嘲讽那些认真学习「老大哥」的人，故不能不使苏联人感到中国人在挑斗他们，是在伤他们的心。

就当时中苏两国实际利益来看，有许多互补性，本不该闹得如此意气用事。这补性可从这样两件事中得到佐证：

一是，1960年中国政府在苏联方面决定撤回所有援华专家时，「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希望苏共领导重新考虑和改变自己的决定」；（国防大学编，〈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401-409；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364-365。）

二是，1962年苏顾导人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曾数次向中国驻苏大使表示友好，并表示苏联在当时中印冲突中支持中方：「如果有人进攻中国，我们说我们中立，那就是叛徒行为。」（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583-584；《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页552。）

中苏冲突之所以出现上述意气用事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处理两党关系时都拥有过大的权力，而这两个人又都有着过强的个性。他们都很机智、很富有攻

击性，一旦吵来都是伶牙俐齿、得理不饶人。他们都还不大讲礼仪、不大讲涵养，一个竟能脱下皮鞋猛敲联合国的讲台，一个竟能穿着泳裤会见盟国的贵宾。显然，由这两个人物来全权处理两党关系，自是针尖对麦芒，非吵得一塌糊涂不可。

毛泽东在作国内政治斗争时，爱给对手扣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顶帽子，给彭德怀扣过，给刘少奇扣过。然而，就施政风格来说，他比他的这些对手更适合戴这顶帽子。

不过，作这种比方颇有些委屈前苏共第一书记，因为就给本国人民带来灾难而言，苏联的那位赫鲁晓夫远远赶不上中国的这位「赫鲁晓夫」。更何况苏联的那位赫鲁晓夫，还是打开苏联坚冰的第一人，并因而成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运动的先驱者。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废黜。中共为此振奋，并萌生恢复两党关系的希望，于是主动作出许多表示友好的举措：中共中央电贺苏共新领导人就职，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国庆招待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团赶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并会晤克里姆林宫新主人。

对此，苏共作出戏剧性回应，即通过一席「酒话」来表明他们的态度。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提议：「不要让任何毛泽东、赫鲁晓夫们来妨碍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597。）

马帅所言立刻招致中国代表国强烈沉议。苏方解释这是「酒后失言」，中方则认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

应该说，中方的指责是有道理的，马帅的确「酒后吐真言」。不过，这里的「真言」，不仅反映的是苏联官员的一个真实想法，而且反映的是中苏冲突的一个真实情况，即中苏冲突之所以激化到如此程度，赫

鲁晓夫和毛泽东都要负相当大的个人责任。

事实上，中共自己也部分地肯定了这一「真言」。中共一看赫鲁晓夫下台就忙与苏共拉关系这件事本身就表明，该党已在很人程度上把中苏关系恶化归因于赫鲁晓夫个人。

苏联方面则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苏关系的障碍人物，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苏联方面是赫鲁晓夫，中国方面是毛泽东；如今，苏方障碍已经排除，中方障碍依然存在，因而恢复两党关系仍旧无从谈起，于是，宣称苏联对华政策不作任何改变。

周恩来总理空手返国，毛泽东主席亲到机场迎接。

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赫鲁晓夫可算作老大家的第二代人物，属于被提拔起来的一辈，毛泽东可算作老二家的第一代人，属于自己打出来的一辈。两者间可说是一种叔侄关系，一种较难相处的大侄小叔关系：那一个仗着自己承继正统并颇有家底，这一个仗着自己独立创业且位高一辈，若彼此都随和些则能凑合着过，若彼此都气盛些就家无宁日了。

如果在巴金的《家》中，不仅叔叔辈好生事端，而且大侄子觉新也变得刁钻古怪起来，那么，此《家》中将会有另一番景象。这也就是1950、1960年代之交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所呈现的那一番景象。

## 51

对苏关系问题，既是毛泽东国内政策的一个延续——同搞国内阶级斗争、整党内走资派相联系；也是毛泽东外交活动的一个中心——先以其为原点、后以其为焦点而展开其战略部署。由于受到个人视野和历史机遇等方面的限制，毛的国际作为比不上他的国内作为。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曾统治世界 1/4 人口达数十年之久这一事实，而非取决于他是否领导世界发展潮流、是否增进人类根本利益。

不过，毛的外交举措还是有一些可说之处的，既有一些杰作，也有一些败笔。

他常能在国际政治角逐中打出一些好牌，却不能就世界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对国际中间势力的争取，是新中国外交搞得较成功的一个方面。在国际舞台上，新中国常常受到美苏两大国挤压而自身实力又不够强大，故比较注意做争取盟友的工作，并常常将工作的重心落在所谓「中间地带」——介于中美之间、中苏之间以及美苏之间的地带——上。因为，位于这一地带的国家对于新中国来说具有很大的可变性，既有可能变为一种支持它的力量，也有可能变为一种反对它的力量。因此，新中国必须做出努力，争取前者，防止后者。

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相对峙时，新中国努力结交许多徘徊于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国家，如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1954）和万隆会议（1955），并使自己成为这两次会议上的明星国家，从而赢得许多亚非国家的理解与尊重。在与美国相对抗时，新中国积极发展与其它西方国家的关系，如与英国达成妥协，同意维持香港现状，默许这颗南华明珠成了我们地球上最后废除外族统治的几块殖民地之一，尽管北京一向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作为回报，英国也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使自己成了西方世界中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几个国家之一，尽管伦敦一向被视作华盛顿的头号盟友。

新中国又不断为戴高乐将军喝采，高度评价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向美国闹独立性的举动；并使自己能于1964年1月向世界宣布，将与这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欧洲大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与苏联打交道时，新中国也注意发展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不仅在与苏对抗时，努力发展与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关系；而且在与苏结盟时，也试图发展与东欧多事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的关系。

1956年10月，波匈两国发生反苏事变。刘少奇率团抵达莫斯科，一方面承诺继续支持苏联做社会主义阵营首领，另一方面又批评苏联

在国家关系上搞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这位大家长作出让步，以使东欧国家能够获得它们应有的一些自主权。

1957年1月，周恩来率团接连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3国，既做和事佬又说公道话。他在莫斯科说，苏联人要批评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波兰人也要批评自己的反苏情绪。（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336。）在布达佩斯说，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匈牙利人民对过去领导者的不满，并认为匈牙利关于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发展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要求是正当的。（〈周恩来总理在布达佩斯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57.1.6）〉，《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关于匈牙利事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页122。）如此调停，自是引起苏联人不快——赫鲁晓夫抱怨周恩来给他们「上大课」；但也博得许多东欧人好感——一些匈牙利共产党员听了周恩来讲话后不禁热泪盈眶。

另外，毛泽东还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把美国和苏联划在第一世界，把西欧、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画在第二世界，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不发达国家画为第三世界。（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会谈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当年4月10日，邓小平正式向世界阐述毛的这一思想；陈明显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页184。）

老人家似是把他搞土改划阶级成分的方法搬到外交事务上，似是把他「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策略用于国际政治斗争中。他这样做显然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即能强化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因为，穷人总爱找穷人说话，并且说的多是关于富人的坏话。

然而，毛泽东能够机智地划分世界，却不能富有远见地展望世界。在国际事务上，老人家作为一个预言家的记录远不如他作为一个谋略家的记录。他对于世界发展趋势的看法，较集中地体现在一篇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中。该文由他的理论班子起草，以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为名义，刊登在《红旗》杂志1960年第8期上。

文章坚持认为，现时代仍然是列宁主义的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文章以此为出发点着重阐述了两大问题：帝国主义战争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文章指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存在就会有战争：或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或为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战争，或为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战争，或为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二十余年过去了，上述第一类战争和第二类战争几乎没有，第二类战争与第四类战争则有一些，而那类与「帝国主义」无关的战争倒是此起彼伏，其间包括中印战争、中越战争、以及中苏边境冲突。

文章还对核战争抱着一种相当乐观的态度：帝国主义者发动核战争的「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之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是什么人类的毁灭」；相反，「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早在 1957 年，毛泽东就在莫斯科谈了类似看法。他对各国共产党代表说，核战争没有什么了不起，充其量只能使全世界 27 亿人口损失一半，但能换来这样的结果：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 27 亿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中文本），页 13。）显然，这种看法已不止是相当乐观了，而是乐观得令人毛骨悚然了。

当时，老人家是在谈笑风生中讲这些话的。他的老对头赫鲁晓夫在许多年后回忆道，虽然大家在毛泽东讲完话后也跟着他笑了，「但他讲的话丝毫没有好笑之处」，「没有一个人对这种讲话有思想准备」。（《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译本），页 259-260。）

毛泽东之所以能如此轻松且大而化之地谈论亿万人生死问题，似与他有某种「幸存者心理」有关。

新中国领导人大多是幸存者。在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上，倒下去的人要远远多于活下来的人。他们大都有多次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经历，并因而有了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心理，姑且叫「幸存者心理」。由于各人的素质不同，他们的幸存者心理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有的表现为一种坚守承诺的心理：我和我的战友们有过共同的承诺，要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如今，战友们大都牺牲了，大都实现了他们的承诺，而我还活着，还没有最后实现自己的承诺，因此，还应继续保持革命本色，继续努力为人民服务。

有的表现为一种歉疚不安的心理：我的战友们为革命已付出自己的一切，却未能享有革命的成果；我为革命还未付出自己的一切，至少还未付出自己的生命，却能够享有革命的成果；我不比他们优秀，却比他们幸运，不仅活了下来，还做了高官，我还有什么不满？只有好好地为大家办事才能对得起那些先我而去的战友们。

这两种心理都是拿自己同牺牲者比，而不是同其它人比，尤其不是同那些官运亨通的人比。这两种心理都可以从《彭德怀自述》中读到，更可以从这位将军的所作所为中评品出来。

还有的表现为一种侥幸苟活的心理：老子好不容易活下来了，就得好吃、好喝、好玩，搞一点腐败也无妨；老子搞、儿子搞、妻子搞，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如此作为就如同老话所说的「打下城池，纵兵三日」。

毛泽东执政后曾对身边人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1994年中译本），页366。）上述那些因侥幸活下来而热衷搞腐败的中共高干，大概就属于他们的主席所说的「行尸走肉」。

再有的表现为一种漠视生命的心理：看到生命被毁灭的情景太多太经常，以致变得对这类事麻木了；尤其是在遭遇自己最亲近者相继死去这一系列残酷事实打击后，也就变得没有什么残烈的事不能忍受

了。其中一些人还会产生一种姑且叫做破罐破摔的心理：自己既已失去最宝贵的东西——至爱亲朋，也就不在乎失去其它什么东西——如非亲非故者。

于是，这些人谈起要死人的事来就像谈平常的事一样。毛泽东正是以这种心态在莫斯科畅谈核战争后果的，只是说出来的死人数目太大了些，致使听者心惊肉跳。

不过，老人家还是很在乎自己生命的。他弥留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问大夫他还有救吗？当获得肯定答复后，他脸露红晕，显出欢娱之情。（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1994年中译本），页3-9。）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强调，革命「就是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战争」。文章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识文章不否认有资本主义和平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提出要有暴力革命与和平发展两手准备；但又引证列宁的话说：「那种和平发展或和平过渡的机会，即使有，也是『非常罕见的』。」文章明确表示，列宁这一观点没有过时，仍有现实意义。

三十余年过去了，不仅无产阶级革命的和平发展样式是「非常罕见的」，就连无产阶级革命都是「非常罕见的」，似乎可以说，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发生过「无产阶级革命」。

不过，在那些非帝国主义国家中倒是发生了许多革命，但其中能使共产党夺得政权的革命也是「非常罕见的」，仅有一例，即由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革命。

波尔布特及其党人就是打着毛泽东旗帜而搞武装斗争的。他们发

誓要读毛泽东的书，要听毛泽东的话，当然也要拿毛泽东的资助。可是，他们一夺得政权就大规模地杀人，杀了柬埔寨 1/6 人口。在他们所杀的人中，有很多是华侨，是他们的毛先生的同族人。

## 52

其二、重视与大国的外交，但缺乏对大国国情的了解。

二战后，美国与苏联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一个主导西方世界，一个领衔东方阵营。

新中国一登上国际舞台，就面对这两个庞然大国，就不得不与它们打交道，或予联手，或予对抗：先是实行「一边倒」，合纵苏联以反「美帝」；后又搞起「乒乓外交」，连横美国以防「苏修」。另外，在这「合纵」与「连横」之间，还有一段孤军奋斗时期，既抗「美帝」也反「苏修」，与前者在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上公开较劲，与后者在党际关系和边界划分上吵得不可开交乃至大打出手。

毛泽东作为执政党主席一向抓大事，在外交上则抓对苏关系和对美关系这类大事，并使他所抓的这些大事都带上他个人的许多色彩。他无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热切希望中国能够跻身世界大国之列，能够在国际重大事务上独立自主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仅仅跟在某一大国后面作一帮腔者。显然，他的这一要求不会容于那些已是世界大国的国家。因为，他这是要与那些大国分享已为他们拥有的大国权威：或是匀走他们的一部分国际影响力，或是抵销他们的一部分国际影响力。因此，与新中国崛起相伴随着的，是它与其它大国——或为这一大国或为那一大国——关系的持续紧张化。

他也无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深知国际角逐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同时也深知他所执掌的国家除了人口数量外，其它方面都很难与苏美等国相抗衡。使他在扮演国家首脑角色时十分注意发展同大国的关系，以避免发生自己独自不堪承负的国际冲突。

由于是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处于对立状态，各自都以对方为最大敌国，同时也都以一种非此即彼的眼光来审视它们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因此，政治色彩鲜明的国家，或一个自称最讲原则的国家，不大可能同时发展与这两大对立国家的友好关系，而只能在两者间作出抉择。

毛或为主动或为被动地顺应了这一形势，在与大国交往中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势，并因此而能够藉助一方以反对另一方。并且他所藉助者和他所反对者都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可以互换的：或此一时打得火热彼一时又恩断义绝；或此一时势不两立彼一时又相见恨晚。与此相应，新中国也就有了毛执政初期的中苏友好关系史和毛执政后期的中美友好关系史，也就有了两个相对安全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新中国基本上免除了遭受某一大国直接进攻的可能性。

1950年代初，新中国虽与美国在朝鲜半岛发生武装对抗，但由于已同莫斯科结盟而使得华盛顿不敢轻易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蜿蜒如带的鸭绿江和图门江，成为美国轰炸机就此返航的地形标志，尽管江那边正源源不断地向江这边输送痛打美国佬的武器弹药。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三番五次请求华盛顿批准轰炸中国境内军事目标，以有效破坏志愿军补给线，但遭美国总统杜鲁门拒绝。后者认为：「如果我们决定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我们就必须防备敌人的报复。北平和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在条约上，都是同盟者。一旦我们进攻共产中国，那么我们就必须预防俄国出面干涉。」（《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中文本），页448。）

1969年3月，中国与苏联发生领土纠纷，两国数千公里边境在线不时炮声隆隆。中国此时处境十分艰难：国内「文化大革命」已成为长期动乱，国外扩大邦交工作已处于停滞状态，并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处于敌对状态，与美国宿怨未消，与苏联新仇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虽然苏联政府未必真想与中国全面开战，但中国领导人在制定其

国家战略时必须作出这一设想。遇事要考虑到最坏方面，是对一个负有重大责任者的起码要求。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中苏间一旦暴发大规模战争，苏联虽不能征服中国，但定能重创中国，它无论在常规武器方面还是在核武器方面都比中国强大得多。

当时在英国，一个叫维克多·路易斯的苏联间谍假借新闻记者身分「透露」一个消息，即苏联将对中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将有可能动用核武器袭击中国罗布泊核基地。（托马斯·鲁宾逊，〈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中文本），页 280。）其可能出现的结果用美国人的话说，苏联人「可以在 30 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尼克松，《领袖们》，页 316。）

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当务之急就是要谋求一种战略平衡，就是要寻求一种国际力量或能直接援手中国或能从旁牵制苏联。为此，老人家将他那蒙眬的眼睛转向西方，转向唯一具有这种实力的国家——美国。

美国方面也乐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美中之间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利害冲突，并乐于在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打上楔子——美国不惧怕单个苏联或单个中国，但惧怕两者之和。

到了 1970 年代初，北京与华盛顿便由私下偷情发展到公开相爱，度过了一段蜜月时光，并随之建立了一种战略呼应关系。据当事人基辛格回忆：（《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第 4 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中文本）页 16-18，51。）

中国方面明确表示：「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不会威胁日本和南朝鲜，不会出兵印度支那——「这个保证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恶梦」；

美国方面则充分认识到：「不管中国的长期政策如何，我们的中期

利益在于同它合作，并支持它的安全和顶住外来压力。」

尽管基辛格在谈美国的义务时，带有美国人常有的那种直率且不怎么谦虚的口气；但就毛泽东来说，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可见，毛之所以重视与大国的外交，主要出于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考虑。新中国对美苏两大国的亲疏态度，主要取决于后两者对于前者的安全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正面价值则亲，负面价值则疏。诚然毛最初之所以喊苏联「老大哥」，除有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外，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他后来转而与美国拉关系，就完全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了。正如基辛格所承认的，北京和华盛顿由于实用主义而结合在一起。（《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第4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中文本）页16-18，51。）

与此相联系的一个后果，是毛泽东对这些大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考虑得较多，而对它们本身的基本国情缺乏应有的了解。

1957年，苏联接连发射了世界上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显示了它在某些空间技术领域已超过美国。

毛泽东为此感到鼓舞，很快就向世界宣布他的一个结论：「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11.6）〉，《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页101。）

后来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也宣布：「苏联在经济上技术上的飞跃，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且在技术上也把美国抛到后面去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占了优势」。

显然，是不符合苏联实际情况的。后者虽在某些技术方面领先美国，但在整体实力上尤其在远洋作战能力上还没有超过美国，充其量仅达到与后者相匹敌的地步。这可以从后来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

中看出，即看出双方都惧怕与对方全面开战，并都主动向对方作了让步：（《赫鲁晓夫回忆录》，页 690-711。）

美国方面，公开作出承诺，不再入侵古巴，并从意大利和土耳其撤走针对苏联的导弹；

苏联方面，则穿着衣服进古巴光着身子出古巴，先是秘密运进核导弹，后又公开撤出核导弹，即在撤出过程中拉开装运核导弹船只上的覆盖物，任凭美国战机在其上空穿行拍照。

显然，苏联在军事实力上并不像毛泽东替它宣布的那样强大。否则，它就不会在波涛起伏的加勒比海上挑起这种不太雅观的「脱衣舞」来，就不会因此而蒙受耻辱。

诚然，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情况，未必是缺点，比如，我们不能埋怨毛泽东对乌干达或乌拉圭知之甚少；但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本国的安全同另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时而又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实情，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了。

当然，他不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所有实情，比如，毛不需要了解莫斯科国家芭蕾舞剧院正上演什么节目；但问题是，他应该了解这个国家的基本实情，尤其是它在军事方面的基本实情。人们也能够理解他很难准确地把握这个国家的军事情实，因为他所要把握的东西是人家最为机密的东西，是不到最后一刻不会翻开的底牌；但问题是，他应该出言谨慎，而不该说连人家自己都不敢说的那种大话，更不该将这种大话说给全世界人听。

民主人士张奚若曾批评执政党「好大喜功」。就实际情况来看，他还可加上一句「夸夸其谈」。1957年，苏联人发了人造地球卫星，毛泽东高兴得不得了，随即宣布苏联已经超过美国。一年后，中国也发了「卫星」，发了诸万斤粮之类的「卫星」，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又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开始谈论如何「五年赶上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等振奋人心的事了。

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时，也正是中印边界冲突紧张时。苏联政府表达坚决支持中国的立场，中国政府也表达了坚决支持苏联的立场。两国政府皆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双方各自所面临的紧张局面都平息下来后，苏联又说中国欺侮了印度；中国人也随即指责苏联在向古巴运进导弹时犯「冒险主义」错误——没有摸清情况便贸然行事，在从古巴运出导弹时又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不敢与美帝国主义硬抗到底。（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583-585；《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 年 11 月 19 日，《红旗》杂志，1963 年第 22 期。）

苏方的说法，让世人觉着其领导人太实用主义了；中方的说法，则让世人觉着其执政者既好为人师又唯恐天下不乱。

1976 年 1 月，毛泽东在与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会谈时，表示不能理解「水门事件」，不能理解仅凭几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位大总统搞下台、就能把他的「老朋友」搞得如此狼狈。当然这并不妨碍他能就此问题作出十分肯定的结论来。

当来访者告诉毛这事关西方政治时，老人家立刻打断他的话，不屑一顾地说，什么西方政治？那是假的。又当来访者告诉毛现在美国有许多人反对尼克松甚至有一些人要求审判他时，老人家再次打断他的话，斗气地说，我邀请他马上访问中国，消息可以登报。对话者当面没有反驳他，但心中很不以为然，认为此人既不了解西方政治的实情，也不尊重美国人民的感情，还固执得很。（刘亚洲，〈「中国人爱好和平」〉，载于俊道等编，《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 年），页 454-456；参见 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中文本），页 491-508。）

毛泽东在此谈话中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不是美国万花筒中的一个普通景色，不是像好莱坞又推出什么新影片之类的事情，而是美国的一个基本国情，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即

国家权力是分割开来且又相互制约的。

毛泽东对「水门事件」的隔膜，反映出他的知识结构存在着某种缺陷，某种不符合他身份的缺陷：

一、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一方面期望与美国建立战略策应关系，并重视与美国总统建立个人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大了解美国的基本国情、不大了解美国总统的个人权限。

二、作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一方面说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页679。〕而且「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红旗》杂志编辑部，《列宁主义万岁》，1960年第8期。〕另一方面又不大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究竟是怎样建构的。

事实上，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至少现在没有一天天烂下去。反之，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老人家生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就开始一天天烂下去了；并在老人家身后的「改革开放」中一天天分化开来，经济体制一天天市场化，行政权力一天天腐败化。

## 53

其三，能够维护主权，却难以深交朋友。

关于毛泽东治下中国，人们可以说出种种不是，但找不出丧权辱国这一条。在这块土地上，统治者任意折腾老百姓的事情时有发生，但统治者不是异族人，而是本族人。兴之由中国人自决自取，衰之亦由中国人自决自取。

新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没有订立过什么城下之盟，在与世界大国的交往中没有丧失过什么民族尊严。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或许有人指责它曾允诺港澳地区继续维持殖民地状况和承认外蒙古独立。人们可以为之辩解：它的这些举措只是沿袭旧政府的做法，而非出于它自己的创意，当然其中也有出于它自身权宜的考虑。

或许还有人指责它与大国交往或冷或热，或向苏联「一边倒」或与美国太亲近，缺乏自身应有的沉稳感和庄重感。人们也可以为之辩解：它的如此做法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出于如何在大国压力下为新中国谋求最佳战略地位的考虑。

对于毛泽东来说，如何处理中苏关系曾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一方面，新中国应同苏联搞好关系。

在党际关系史上，中共曾得到苏共许多帮助。就连中共自身的创建活动都是在苏共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曾端坐过金发碧眼且崇论阔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56-60。）中共虽曾受过苏共或共产国际瞎指挥之苦，但毕竟得过人家许多好处，故在夺得政权后不能不与人家建立友好关系。

1990年代，国内媒体屡屡把西方国家对中共异见人士的支持说成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若历史地看，这种说法不免带有一种自我否定的意味，明着在说人家现在的不是，暗地承认自己过去的不是。因为，按这种说法，执政党就很难说清楚自己是如何创建的，很难说清楚苏俄人为什么可以跑到另一个国家中去直接支持一个图谋推翻本国现存社会制度的政党，而后者竟也欣然接受了这一「来自境外的敌对势力」的支持。

在意识形态上，中共一直奉列宁为思想导师，承认「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苏联的今天看作是中国的明天，真诚地以苏联为楷模。

在现实利益上，新中国也急需这位走在前面的「老大哥」能够照

应一下后来者，一是能够在经济建设上给予援助以利恢复战后的经济，二是能够在国家安全上给予支持以利于抗衡美国的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对俄国人抱有戒心。

在国家关系史上，俄、日同为中国的近邻大患。在众多欺侮过中国的列强中，抢走最多银子的要数日本，抢走最多土地的则要数沙俄。后者抢走的土地数量相等于毛主席家乡湖南省面积的 7、8 倍，或相当于蒋委员长家乡浙江省面积的 15、16 倍。银子可以再攒，土地则不能再生。所以，就对中国国家资源的掠夺来说，俄国人是拔了头筹的。这就使得现代中苏关系发展始终伴有一种较为阴暗且又涂抹不掉的背景画面。

就国民心态看，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许多非中共系统出身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始终存有对俄国人的疑虑；在中国北方一些地区的老百姓的口中，「老毛子」（指俄国人）是与「小鬼子」（指日本人）并称的。

在现实交往中，苏联领导人也做出过一些气量狭小的举动。斯大林曾怀疑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会成为另一个铁托，故在莫斯科似热似冷地接待了这位中国同志的拜访，使得后者兴冲冲而来悻悻而去。后继者赫鲁晓夫在与中国同志打交道时也不大讲涵养，做起事来冒冒失失，吵起架来口无遮拦。当然此公也不乏有坦诚直率之处。

无论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是虽有世界大国领导人的身分，却无世界大国领导人应有的气度。

斯大林执政前，主要搞地下活动，生活在白色恐怖中；执政后，很爱用秘密警察，制造出红色恐怖来，竟将苏共第 17 届中央委员会中的 60% 以上成员或捕或杀。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很不健康的，既有恐惧心理，也有对恐惧心理过度反弹的残忍心理，还有「病态猜疑心」。（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本，页 776。）他曾将此猜疑心用到那位来自新中国的客人身上，致使

此人久久不能释怀。（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10）〉《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0）》，页 171；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9.2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39。）

赫鲁晓夫则从乌克兰顿巴斯矿区一步步爬上苏共第一书记位子。在这种一党专政体制（中国也实行这种体制）内，能从基层爬到高位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此爬升者（不论是苏联的爬升者还是中国的爬升者）的人格是受过多次扭曲的，其品性其教养都是大有问题的。

证一，在这一爬升过程中，他们必须经过许多次政治斗争——他们所在的体制就是一个内斗不止的体制；

证二，在这许多政治斗争中，他们总是站在最有势力的一方——他们作此选择不仅能获得胜利者的赞赏，而且能获得失败者留下的空缺，从而使自己更上一层楼；

证三，他们所投靠的最有势力的一方，很可能是最错误的一方——最有势力者最难以受制约，故而最容易犯错误；

证四，他们在内心中即使不能在事前也能在事后知面们跟着最有势力者做了错事——他们大都很聪明，至少能明辨常识；

证五，他们在表面上都会装出一副从未做过错事的样子——最有势力者最不愿意认错（正像毛泽东不愿意否定「文革」、邓小平不愿意平反「六四」一样），若想继续依附最有势力者就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就不能够认错；

结论一：长此以往，就会使他们养成一种很为势利并很缺乏羞耻感的政治品格；

结论二：在一党专政体制（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下，选拔官吏的过程往往成了择劣的过程：提取糟粕——趋炎附势者、寡廉鲜耻者，剔除精华——刚正不阿者、襟怀坦白者。

另外，他们在长期爬升过程中，总是小心谨慎地夹着尾巴做人，总在专心致志地观察并迎合上司的一言一行。

他们一旦成了大人物后，就会做出强烈反弹，就会将自己一直受到挤压的个性猛然膨胀开来，尽一切可能地扩张自己，表现自己，四处伸手，到处炫耀。

束缚久了的尾巴骤然释放开来，就会一个劲地向上高扬起来并左右摇摆不止。这正如中国老话所言：「小人得志便猖狂」。

毛的新中国正是在上述正负意义参半的背景下同苏联「老大哥」打起交道来的，既希望友好，又心存疑虑，生怕做出有损民族尊严的事来。这种友好心态非常敏感且非常不稳定。他们脸上笑容可掬，内心却十分紧张，随时准备对苏方有可能提出的无礼要求，作出十分迅速且又十分强硬的反应，致使对方先是茫茫然后则愤愤然。

据赫鲁晓夫记述，有一次，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便让下属给中国同志拍电，希望后者拿出一块土地让苏联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中国同志很快回电，说我们很乐意接受你们的建议，但最好由你们提供贷款，由我们建设工厂，日后再用该厂产品偿还贷款。斯大林获悉后，便「在那里咒骂和发火」。（《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本，页 662。）

数年后，赫鲁晓夫自己也向中国同志提议，希望后者能够允许苏联在他们国土上设立长波电台和潜艇码头。毛泽东很快回话，说这已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这一回就轮到赫鲁晓夫在那里不高兴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本，页 671-672。）

新中国不仅在对苏关系上，而且在对美关系上以及对其他国家关系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权意民族尊严意识。新中国领导者们大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尽管他们声称自己终身的政治信仰是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最初的精神恋人并不是来自域外的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而是发自本土的民族主义。他们大都是从民族主义者演变为马

克思主义者的，即使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仍深依恋故土的情感。

尼克松曾谈道：「一位新闻记者曾经问过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国人。』当然，周恩来的同事都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尼克松《领袖们》中文本，页 309。〕

事实上，周恩来大部分同事也和他一样，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

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曾经从事的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但他们最初投入革命的动因，不是为使中国资产阶级获得更多发展的权利，而是为使中华民族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有三大任务：民族，民权，民生。其中第一条，就是要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辛亥革命前，中国同盟会的民族主义口号为：「驱除键虏」、「恢复中华」；〔孙中山，〈同盟会宣言（1905.8）〉，《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页 68-69。〕辛亥革命后，中国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主张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1.23）〉，《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 85。〕

由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两大任务：反帝，反封建。其中第一条，也是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者大多是在遭遇民族危机或民族耻辱时起而抗争的。这种抗争包括对外与对内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现状，使他们不能不反击外强；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所孕育的智慧，使他们不能不明白一个简单道理：若自己要不倒则别人打不倒，要御侮就必须自强，要自强就必须变革，要变革就必须改制，要改制就必须首先改本国政治专制

体制——其运作者占有社会资源最多，故而对社会变革最敌视。

W·罗斯托在其现代化研究中，描述了一种他称之为「反应性民族主义」的现象——大的外部压力往往激使弱势民族走上变革自强的道路：（W·W·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3章（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文本），页24-43。）

罗马教会的压迫、西班牙的威胁、荷兰的竞争、以及法国的挑战，促发了英国的17世纪革命；在拿破仑战争中所蒙受的耻辱，以及在战后英、法、澳、俄诸国所给予的压力，促发了德国的1848年革命；受其它欧洲国家歧视的境遇，促发了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运动；被美国海军强行打开国门的遭遇，促发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罗斯托还谈到中国，指出这个国家的革命也是起于她所蒙受的百年屈辱。用我们自己的话说，由御侮而兴变法，由救亡而兴革命。

近年来，中国大陆媒体也在某种「舆论导向」下，鼓动起一种「中国人可以说不是」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期间有鼓动者方面的情况，也有被鼓动者方面的情况。

在此，笔者只谈前者，只谈鼓动者这样做出于何种考虑：

其一，在国家内部，想藉以重建价值体系，恢复民族凝聚力。

当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价值失范社会。

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民族传统文化，已被数十年次起彼落的革命大潮冲击得七零八落。如今不乏见到这样的国人：在如何精打细算上，还能够看到一些成熟文明的影子，在如何待人接物上，则能够看到那种刚刚把一条腿跨入文明社会门坎的半野蛮人的风貌。

本世纪由欧洲引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被毛泽东不断掀起的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折腾得让许多人不敢相信了。如今那些满口马列主义大道理的人，往往不是被人看作骗子就是被人看作傻子。

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新老传统均已失范的国度里，要想在精神上和情感上把不同背景的人聚拢在一起，除了皈依宗教外，就只有高扬民族主义这条路了。因为，大家好歹都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都不能不既共同分享她的荣耀又共同分担她的耻辱。

其二，在对外关系上，想藉以拒斥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压制不同政见者做法的批评，并响应一些国际势力因见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而生出的戒心和敌意。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人看好，但中国的政治形象不为国际社会称道：一是在人权问题上，一个所谓「泱泱大国」，竟容不下几个不同政见者；二是在吏治问题上，一个所谓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国家，竟被一些与其打过交道的国际工商人士排在世界上官员最腐败的国家之列。

中国这些不如人意方面尤其前一方面，虽不能说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批评——相反还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但可以说受到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批评——尽管批评的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

就中国人内心来说，是很看重发达国家的意见，很看重它们的批评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将要或想要从贫民区搬到上流社会住宅区的人，比较在乎的不是那些老街坊们如何议论自己，而是那些未来邻居们怎样看待自己。

可是，中国政府在外表上又很强硬，常常摆出一副我自个儿的事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谁也甭想管的架势。不幸的是，作其强硬的外表上竟有两个柔软的部位、两个很容易让人触痛的部位：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这是两个能使中国政府一触即跳的问题。

西方国家无疑看准了这两点，并在上面大做文章，以响应中国政府在人权等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你不是什么都不在乎吗？那好，咱们就来做做这方面的游戏吧。于是，这些国家纷纷向中国打出台湾牌或西藏牌。

一方面，它们以各种名义（官方或非官方）邀请台湾政府人士和西藏流亡人士访问该国，激得中国政府怒吼不止。

另一方面，它们又利用向身在民主制度和分权体制上的长处，很轻易地推卸政府方面责任：或者说，本国政府是民选政府，并且本届政府首脑还想在下一一次大选中竞选连任，因而要考虑选民方面意愿，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故请中国政府能予体谅，多多关照；或者更简单地说，那是国会干的事，与政府无关。

这好比是，把打了你的左手背到身后，把没打你的右手放在身前，并急匆匆地告诉你，那是左手捣的鬼，右手可老实着呢，故请看在右手面子上，继续与我们友好相处吧。

它们显然是在打「擦边球」，既能触到中国政府的真正痛处，又不致使中国政府作出诸如断绝外交关系之类的激烈反应。

这里不难看出，西方国家上述外交策略是颇为老道的，同时不难看出，现时中国在一些外交问题上处于十分被动甚至被人耍弄的境地。可是，中国的文明史比它们的文明史要悠久得多。当中国的先秦人已在搞合纵连横外交时，这些国家的祖先们或许正在中欧森林里为一只猎获到的熊究竟属于谁而打得不可开交。这种现实与历史的反差，使得许多国人不时有揪心之痛。

近来中国政府似乎也用上西方国家所用的一些策略，默认乃至赞许一些民间人士掀起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当外国记者质询此事时，政府发言人颇为得意且不无戏谑地答道：这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干的事，与政府行为无关：他们所言所行只要不超出法律许可范围，政府就不予以干预。

可问题是，当不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而是广大知识分子真要起来搞真正的民族主义，即不仅要拒斥外国的轻蔑、而且要变革本国的现状自强自尊时，就不知政府还坚持不坚持此事与政府无关的说法，会不会呈「叶公好龙」状。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矛头所指往往是两重的：一是指向外部那些任意掠夺中国财富或不愿看到中国强大的他国政治势力，二是指向内部那些有碍民族肌体健康发展的本国社会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本国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

换句话说，被激励起来的民族主义是要扎回马枪的，即由最初扎向外部强敌转而扎向内部苛政、扎向腐败政治、扎向贪官污吏。

因此，对于执政者来说，鼓动民族主义就如同在驱使一只能够在空中画出折返弧线的老虎。这只老虎既可以朝着前方猛扑驱使者要它捕食的对象，也可以回过头来撕咬驱使者本人。

## 54

毛泽东的新中国，在捍卫国家主权方面基本上做到了它想要做到的事，但在交朋友方面有成功有失败而不尽如人意。简略地说，它能做到广交朋友，从非洲的塞拉西皇帝到美国的黑豹党都能拉上关系；却难做到深交朋友，凡开始与它好得就像是亲兄弟似的朋友，到头来几乎都要与它吵翻脸，并吵得就像是不共戴天似的仇人。

在与苏联关系上，先是把人家尊为「老大哥」，与之休戚与共；后又把人家视作「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与之兵戎相见。

在与越南关系上，先是「同志加兄弟」，人家要什么东西给什么东西；后又与人家大打出手，打得谅山老山尸骨如山。

在与阿尔巴尼亚关系上，先是把人家比作「一盏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并大发感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后又与人家反目成仇，互揭老底，互诉老朋友的种种不是。

在与朝鲜关系上，先有数十万志愿军官兵血洒鸭绿江东，继有不计其数的中国物资源源输向这个兄弟国家；末了两国虽未公开决裂，但已面和心不和。北京申办公元 2000 年奥运会竟得不到朝鲜同志的一票，气得中国老百姓既责怪平壤当局不讲交情，又抱怨自家政府怎么

尽交这样一些不三不四的国家。

另外，在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相处时也有类似情况。新中国曾一度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相处得很好，周恩来总理曾是新德里最受尊敬的贵宾（1954年），刘少奇主席也曾是雅加达最受欢迎的国宾（1964年）。可到后来，这两个国家都把中国看作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前者同中国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边界战争，后者在国内搞了一场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同中国没有外交往来。

这似乎成了毛的新中国交要好朋友的一种模式：先以好得不得了开场，继以坏得不得了收场；先是欢度蜜月，后是发生婚变。这种不断搞对象又不断打离婚的模式，让世人尤其让后人觉得老人家办外交就像小孩子办过家家酒似的，说相好就相好，说翻脸就翻脸。

诚然，有些翻脸的事，如中越边境战争，是在老人家去世后发生的，但这些事之所以发生的最初原因可追溯到他生前的一些举措中，如对越共或亲或疏，如对柬共尽心尽力。

另外，老人家不善交朋友不等于其下属也不善交朋友。事实上，像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王稼祥这些中共大员都很有外交才干，至少很有外交眼光。这里仅以王稼祥为例。

1960年代初，王稼祥在国内外形势都很严峻的情况下，主张适度调整国家对外政策，变过于强硬为比较温和，变过于理想为比较务实，从而为正处于困境中的新中国争取到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他建议，在国际交往中，应适当缓和同西方国家、同东欧国家、同其它一些国家的关系，避免与它们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国际援助上，应量力而行，不要把国内挖得太苦，不要做自己力不从心的事。（王稼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3.31）〉、〈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1962.6.29）〉，《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444-460。）他的这一建议后来被概括为「三和一少」。

王的主张无疑是对症下药的。然而，给人下药的前提就是断定此

人已染疾病，对毛的外交政策欲下调整的潜台词也就是断定这一政策已有不当之处。显然，这是在摸老虎屁股了。很快，毛就将王的主张斥为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并将王本人逐出中共外交决策圈。

历史已证明，王的主张是实事求是的，是有生命力的，虽未在毛生前得到认可，却能在毛身后获得实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就坚持了这个「三和一少」（所谓「邓小平的外交路线」包含了前人的思想成果）。

全面缓和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一会儿骂这个是帝国主义一会儿骂那个是修正主义；

全面紧缩对外援助项目，不再像过去那样打肿脸充胖子，不再把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大大方方地施舍出去（到头来还不落个好，人家一升米做个恩人，自己一斗米养个仇人）。

毛泽东很难深交国际盟友，表明他的外交战略及其实施方式存在严重缺陷。

毛在外交上有多重目标：

其一，在国家利益上，他要做中华民族福祉的维护者，要为新中国谋求最佳国际战略地位；

其二，在意识形态上，他要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其三，在国际义务上，他要求新中国能够显出大国风范，能够在国家交往中抑强扶弱并慷慨解囊于人。

不过，他的这些目标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冲突的：

如果新中国要为自己谋求最佳的国际战略地位，那么，它就会得罪自己的意识形态盟友。

1970年代初，中国出于自身国家安全考虑而积极发展与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结果导致一些马列主义政党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阿尔巴利亚、越南、朝鲜、古巴等）对中阚党以及中国政府产生猜疑乃至敌视。

如果新中国要做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去支持一些国家的革命，那么，它就会激怒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促使这些国家与其它国家结成同盟来防范它或反对它，从而不利于它争取最佳国际战略地位。

1960年代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关系，最终促使印度尼西亚军政府与中国政府决裂，并向当时中国的最大敌国美国靠拢，同时积极参与筹组具有反北京倾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

如果新中国在自身没有大国实力的情况下硬要显示大国慷慨风貌，那么，它就会狠挖自己的家底，大伤自己的元气；并有可能使受援国对它产生一种类似药物依赖的心理，即只有提供援助才能维持友好关系，甚至只有不断增加援助才能保持友好关系。这就如同人们吸食某种药物成瘾后的情况一样，即只有不断加大剂量才能保持最初吸食快感。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不断发生一些第三世界小国同中国关系由热变冷的情况。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中国拿走了它们的东西，而是因为中国没有给它们东西；甚至不是因为中国没有给它们东西，而是因为中国没有按它们越来越大的胃口给它们东西。

固然，一个国家的外交战可以有多重目标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关系是多方面的，故有多向度的利益追求。可问题是，应该在哪些不同目标间排列出先后次序来，使主要的优先于次要的，使次要的服从于主要的。

从常理上说，一个国家在不违反国际通行准则的情况下，应该将国家利益方面的欲求列于首要目标，而将其它方面的欲求列为次要目标。就实践来看，凡外交事务办得比较成熟亦比较成功的国家大都采

用这种目标序列。

如美国近年来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就遇到多重目标问题，按其人权主张，就应制裁中国，如取消中国对美贸易最惠国待遇。按其国家利益，不仅不应制裁中国，相反还应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因为，就经济发展前景看，人口众多的中国可以为美国企业提供十分广阔的市场；就地缘政治战略看，身形巨大的中国恰好站在美国的两个潜在竞争对手日本和俄罗斯的背后（反过来看，美国对于中国来说也具有相似的地缘战略意义）；就联合国权力运作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对于由美国倡导的大规模国际行动，可以采取否决的态度，如否决联合国军轰炸南斯拉夫，也可以采取默认态度，如默认联合国军轰炸伊拉克。

两相比较，美国的人权主张最终还是要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国会中的制裁声浪无论怎样汹涌激拜，就是冲不破白宫里的否决权堤坝。

新中国外交也有这方面的成功例证。在中国与各国关系中：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较为特别。两国关系虽从未达到像中苏关系、中越关系、中阿关系所曾达到的那种热烈程度，但比它们稳定得多、持久得多。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双方政府在建构这一关系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两国意识形态的异同或两国领导人的好恶，而是两国共同具有的长远战略利益。这就使得两国关系既不会因国际阵营的分化而出现裂痕，也不会因两国政府的变更而受到影响，更不会因其它国家的鼓动而发生反目。

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在处理中国多重外交目标时，不能始终坚守一个较为确定的目标序列，有以国家利益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也有以意识形态或其它价值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情况，并在具体实现过程中时有情绪化的表现。

1970年代初，中国发展与美国关系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甚至

可以说，新中国只是到了此时才开始实施自己的最佳地缘政治战略。不过，毛在具体处理这一关系过程中，有时很情绪化地将中美间的国家关系渲染为他与尼克松间的个人关系。

就在尼克松因「水门案」被迫辞职而在美国成了过街之鼠时，毛泽东发出邀请，欢迎下台总统访华。这显然有向美国国会乃至美国人民叫板的意味：你们美国人不喜欢此人，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毛泽东很喜欢此人；你们赶他下台，我们请他做客。

据代为接受这一邀请的尼克松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威尔回忆，他听到毛泽东说这些话时，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美国公民，而不是作为前总统女婿，被伤害了；并认为这不是说给他一个人听的，而是说给两亿美国人听的，那是「两亿座火山」。（参见本书第 52 节）

显然，毛的这一邀请，虽是尽了他个人对尼克松的情分，却有损中国政府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故有损中国国家利益。1957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宣称：

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毛泽东，〈对莫斯科中国留学生实习生的讲话（1951.11.19）〉，《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页 108。）

实际情况是：就在毛说话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比如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在核战争问题上、以及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双方主张都不相同；在此之前，赫鲁晓夫 1954 年第一次访华后就预感：「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避免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本，页 665。）在此之后，最起劲地反对这两个「头」的人，正是宣称要有这两个「头」的人。

显然，毛关于两个「头」说法的出发点，不是国家利益而是意识形态，具有政治宣传色彩，并十分情绪化。

可见，毛泽东在处理新中国外交关系时拥有多重目标，似未能理顺其间的序列关系，一会儿以此为首要目标，一会儿又以彼为首要目标。如此做法，时间较短显不出什么，时间一长就会显出其外交举措是前后不一的，甚至是前后冲突的，就会使他的国际盟友生出种种疑问：

你过去说要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重，如今怎么又讲要以中国国家利益为重呢？

你过去说要对兄弟国家倾力相助，如今怎么又讲要对援外项目量力而行呢？

……

显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很难为自己在友邦中建立信任关系，尤其很难为自己在友邦中建立为持久的信任关系，即很难深交朋友。

这好比去赴一个要吃许多道菜的宴会，绝大多数人都是这道菜吃多些那道菜吃少些，唯有毛泽东竟把每一道菜都吃到极致处，都吃个大饱，结果只能是边吃边作间歇性呕吐，吃饱这一道菜后，就去倒空它，接着再吃饱下一道菜……

毛泽东所督办的中国对苏联外交、对阿尔巴利亚外交、对越南外交，都可以说是一种呕吐性外交，先是食欲大开，猛吃社会主义同盟风味大菜；接着大倒胃口，剧烈呕吐起来，把猛吃进去的东西甚至把自己胃里的胆液都狂吐出来；接下去又开始吞食中国国家利益风味大菜……，如此吃法是要吃坏自己身子骨的，如此吃相是要吓坏同席进餐者的，使之望而生畏、不敢再与这位吃吃吐吐者共享佳肴了。

毛泽东在国际难以深交朋友，在国内更是如此。他的国际行为方式实是他的国内行为方式的延续，即他在国内党内惯于「克熟」的行为方式的延续。曾与他共过事的人不计其数，能和他共始终的人寥寥无几。当此公弥留时，垂泪在旁的老友仅叶剑英一人，而叶某还算不

上他的一等战友，仅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中的末帅。就是这位老友也被他整肃过，并对他怀有不满，一等他过世就大动斧锯将他晚年倾力搭起的文革戏台拆去半边。

## 55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国内搞起了两方面阶级斗争：一是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二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封资修」，即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精神产品。

后一方面还可分出两个层次：一是在文化艺术领域（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文学作品等）开展批判运动，二是在思想学术领域（哲学、历史、经济、文艺理论等）开展批判运动。相对说来，毛泽东对前一层次过问较多，对后一层次过问较少。

文化艺术产品雅俗共赏，似乎什么人都可以根据自身感受予以诉说。思想学术产品则为阳春白雪，只有少数人才能够依据一定学养予以评析。这学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关知识，二是研读心性。晚年毛泽东似是不缺前者，很缺后者。

他已「耳不顺」多年了，听不得不同意见，也看得不合自己口味的文章。其阅读生活已成信马由缰之势，多是由着性子想读什么就读什么，不想读什么就不读什么。另外，他已不动笔写大块文章了，也就不感到有认真辨析各方说法的需要了。他已超越了学术论战，故也失去了参与学术论战的能力。

自1962年底起，毛泽东就开始谈文化艺术方面的阶级斗争，并一发而不可收地谈下去。越谈话越多，越谈火药味越重，以致浓烟滚滚，最后轰然起火为「文化大革命」。

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华东省市委书记时对戏剧界作了一番评论：（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548。）

「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泊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不过，旧戏中的《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

毛此时批评戏剧界，还留有一些余地，虽指出好戏不多，但承认坏戏也不多；虽不满意旧戏泛滥，但补充说其中不失有好剧目；并表示要进行分析，要以理服人。

1963年，毛泽东更经常地谈到戏剧问题，语气也更趋激烈：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1963.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94。）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毛泽东，〈对《戏剧报》的两次重要指示（1963.1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95。）。

在毛对文艺工作所作的诸多批评中，语气最重影响最大者，要数他分别于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所作的〈两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

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1963.12.1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374。）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1964.6.27）〉，《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441。）

前一个批示批的是各种艺术部门特别是戏剧，后一个批示批的是各个艺术协会及其专业刊物，但都已接近全盘否定了。不过，这还主要说事，说有关部门和有关机构的事。接下来，老人家就要谈人，谈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64年9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老挝客人时谈道：

「胜利了，搞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十五年，我们文化界比不上你们。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界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也有不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界唱戏的、画画的、唱歌的都有，新闻界好一些，电影界也有。现在他们受不了了。现在又整风，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毛泽东，〈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副团长和主要演员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309。）

文艺界闻风而动，在毛作了上述第一个批示后便进行了第一次整风，整了1个月；在毛作了上述第二个批示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整风，整了10个月。这一下文艺界真的睡不着觉了，老人家该高兴了。

在两次整风前后时间里，一批文艺作品及其作者受到批判。

戏剧方面受到批判的有：昆曲《李慧娘》（孟超编剧，该剧作为「鬼戏」最先被抛出来接受批判，成为八届十中全会后文艺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京剧《谢瑶环》（田汉编剧），等等。

电影方面受到批判的有《北国江南》（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早春二月》（谢铁骊编剧、导演）、《革命家庭》（夏衍、水华编剧，水华导演）、《林家铺子》（夏衍编剧，水华导演）、《红日》（瞿白音编剧，汤晓丹导演），等等。

与此相关，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等因领导失误而被免职，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也因强调「写中间人物」而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中间力量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

作为执政党主席，毛泽东无论做什么事总会有响应者，此次搞文艺领域里的大批判也不例外。不过，与以往相比、甚至与同时进行的「四清运动」相比，他此次做此事的响应者、尤其是有资望的响应者要少得多。

毛以下的中央常委，除半病修的林彪外，其它人都不持积极态度，至少没有表现出他们在「反右派」、「大跃进」时曾表现出的那种亢奋状态来。这或是因他们曾跟着毛整知识分子整得心有愧疚，或是因他们正忙于收拾毛退居「二线」后留下的烂摊子而无暇他顾。

中央常委以下的那些分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如彭真、陆定一、周扬、齐燕铭、邵荃麟、邓拓等，也都持审慎态度。一方面，他们作欢迎状，因为，党主席临幸文艺界，当是他们诚惶诚恐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忧心忡忡，因为，老人家此番到他们负责守望的园地来，不是为了踏青观花，而是想要操刀弄戈。若他只是去赶杀那些外部闯入者，或拒斥西方的「资产阶级文艺」，或拒斥苏联的「修正主义文艺」，他们或许还能跟在后面摇旗呐喊。若他反过身追究他们这些守望者的责任，责怪他们护园不力，竟容忍各种「封资修」毒草到处滋生，他们就将无言可辩乃至无地容身。

最初，在还没有大规模整人时，他们对于这种批判是支持的。如周扬在 1963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强调「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树立批判的旗帜」，批判各种新老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新老修正主义思想。

继而，当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被打上黑色标记时，他们开始犹豫了，并试图将一些由「左派」文人挑起的思想冲突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尽量不伤及作者本人。

最后，到了自身也被打入黑帮中时，他们彻底失望了，其中责任重大且品性高洁的邓拓自杀身亡，决意不再与这场运动发生任何关系了。

鉴于许多中央大员对开展文化领域批判运动持不积极态度，毛泽东只得将目光压低，投向执政党内较灰暗的层面，从中寻觅能够为他充当文化打手的人。

在中央里，他对康生多有依仗。此公长期负责中共情报工作，既搞党外敌人的情报，又搞党内同志的情报，是一个在制造冤假错案方面有特殊才能和重大业绩的人。

八届十中全会后，他积极协助毛搞文化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出面点了许多文艺作品及其作家的名，将他们打入另册，还组织「左派」笔杆子，对杨献珍（哲学）、孙冶方（经济学）、翦伯赞（历史学）等学者进行理论围剿，致使中国学界噤若寒蝉。

在地方上，他对柯庆施多有青睐。此公多年主持中共华东局，一向亦步亦趋于毛，用薄公的话说，已把毛主席的心思琢磨透了（参见本书第 20 节），并因此深得后者信任。他所管辖的上海市，成了毛泽东位居「二线」时最爱滞留的地方之一，也是北京「一线」为请示「二线」而频频南下的目的地之一，最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

另外，他还为毛泽东搞文化专制主义提供了一批像张春桥、姚文

元这类以笔为刀的文化酷吏。他们既是此时的文化批判运动的参与者，也是稍后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官，是从主帅毛泽东麾下最先杀出来的一彪人马。

八届十中全会后，柯庆施较早听到毛泽东谈旧戏改革问题，并迅速作出反应，提出「写十三年」（即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三年）的口号，甚至说不演十三年的戏就不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226，1229。）在批判「鬼戏」《李慧娘》及其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期间，用江青的话说，「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就是由柯庆施组织人起草的。（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页 38。）

毛泽东四下寻觅文化打手的眼光，也落到自家屋檐下，看上了夫人江青。当然，这里面也有后者积极请战的因素。

早在 1930 年代末，中共中央曾因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关系断得不甚明白以及江青个人生活经历不甚清楚而作出限制后者公开露面的决定，致使此人被政治尘封二十余年。她长期以来坐着中国第一夫人的实位，既有表现自己的渴望，又有表现自己的演技，却因受禁令而不能公开展示自己。可以想象，这个女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毛启用此妇人，一方面，表明他如今不再遵守那个中央决定了，不再「金屋藏娇」了；另一方面，表明他如今搞文化批判运动已是「蜀中无大将，廖化打先锋」了，竟让一个三流演员来对整个文化界指手划脚，或说是予以羞辱。

江青最先做的是文化监察工作，勿宁说是文化特务工作，用其本人话说，「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盯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页 29。）如今国中，有人仍在从事这种「审读」工作，仍在从事这种「文化特务」职业，江青余孽犹在，文革遗风犹存。

1964年6月，江青公开出席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并在其间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戏剧领域阶级斗争严重性：

「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 2,800 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江青，〈谈京剧革命〉，《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

与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所作的上述批示相比，江青对戏剧界现状作的分析要具体得多，其间还作了数字分析。几天后，毛读到这个讲话，欣然批语：「讲得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230。）

## 56

1960年代，毛泽东对新中国文艺工作抱否定态度。十几年后，共产党人对其否定也抱否定态度。1980年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不符合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页422。）

然而，后者对前者的否定也有不妥之处，把毛的指责概括为「不符合实际情况」这一说法本身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例如，毛所指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问题，就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有一些根据的。其夫人还为此作过数量分析，虽谈不上精确，但谈出了大致实情。薄一波在许多年后也承认，当时文艺界「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新剧目」，「与舞台上大量演出的

基本原封不动的旧戏相比，还是显得太少。」〔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222-1223。〕因此，毛泽东当初之所以能把文艺界批评得无话可说，其间既有后者畏惧前者的因素，也有前者确实说到后者痛处的因素。

显然，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很难用一两句话予以断评，必须从不同层面予以阐释。

在评价层面上，毛的批评是过于严厉的，如斥责整个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并已跌到修正主义边缘的说法，打击面过宽，打击力过重。——这一斥责已为中共中央所否定。

在描述层面上，毛的批评是有些根据的，如揭示戏曲舞台上演的多为「古人」、「洋人」和「死人」，就不能说是捏造，就不能说是老人家在造谣。——这一揭示已为薄一波所确认。

在解释层面上，毛的批评则是相当苍白，如偏重于指责文艺舞台上多为旧戏而鲜有新戏，却很少去说明文艺舞台上为什么会出现这般景象。——对此，无论中共中央还是薄一波均语焉不祥。

如果说毛对此有过解释的话，那么，他的解释也只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即新中国不得不接受国民党留下来的各种文化人才，并让他们继续操持旧业，而这些人大多属于难以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这一解释既大而化之又乱扣帽子，不足以回答新中国文艺界为何难出新品尤其不出精品这一恼人问题。

欧阳修曾说，诗人往往因处境穷困而作出好诗，「殆穷者而后工也」；并且处境越穷则诗艺越精，「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

司马迁也说，大凡古之名篇如《周易》、《春秋》、《国语》、《诗经》、《离骚》等，都是古之圣贤作于困境中的，传世之作亦是发愤之作。太史公的《史记》也是如此，也是他作刑辱之下的。〔《报任安书》〕

两夫子说的是一个道理：苦难的经历有助于成就伟大的作品。那

么，他们的这一文论能否适用于他们的那些后人呢？20世纪无疑是中国人民苦难丛生的世纪：

上半个世纪，中国人打了一场又一场战争，既同外国人打，又同本国人打，直打得血雨腥风；下半个世纪，中国人搞了一场又一场运动，既搞经济运动，又搞政治运动，竟搞得民不聊生。

若再将时间跨度缩小些看：

上半个世纪后20几年，中共党人承受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苦难，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掉了成千上万颗脑袋；下半个世纪前20几年，中共党人制造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苦难，搞出中国史上的最大饥馑，酿成人类史上的最大文祸。

前一时期，最苦难者要数敢于反抗旧政权的人，尤其是那些拿起枪杆子的人；后一时期，最苦难者要数敢于批评新政权的人，尤其是那些仍旧保持革命精神的中共党人和那些保持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

依「穷而后工」说，这一世纪的深重苦难，应该有助于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历史、认识人生，进而有助于他们的文化人创制出相应的文化精品来，即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然而，就实际情况看，这个世纪的中国人虽承受了巨大的世间苦难，却未获得相应的文化回报，或者说「国家不幸诗家也不幸」，「穷」而后却不「工」也。

人们仅在1920、1930年代前后时间里，还多少能看到一些斑斓的文化色彩；1949年以后，就几乎看不到任何绚丽的文化景象，相反倒能看到许多极为丑陋的文化现象。尤其是那些1920、1930年代的文化明星们，一到毛泽东治下就黯然失色了，就不再有什么佳作问世了，致使他们的创作生涯呈虎头蛇尾状。

从中共党人方面来说，至少应该创制出许多能反映他们历尽艰险打天下的佳作来。连一些外国作家都对此深信不疑，甚至跃跃欲试。

埃德加·斯诺就曾对红军长征发出感叹：「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97年），页181。）实际上他自己就很想把它写出来。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记住了斯诺的感叹，并打算由自己来做这件斯诺想做而未能做成的事。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寻找这一写作机会，并抱着极大的耐心去等待这一写作机会，一直等到七十六岁高龄时，才获准亲临红军长征的路线，并据此写出一部美国版的长征史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关于此书写作情况，见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版自序，（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鲁迅先生也曾为陈赓将军向他描述的红军业迹感动不已，并萌发创作冲动，想写一个类似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那样的小说，但最终未能成稿。据知情者冯雪峰解释，这主要是「由于他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使他造成创作所需要的真实感。」（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页84。）

鲁迅先生在此写作上的进与退，似是表明这样一种见解：若想真实感人地写出中共党人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就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情趣，而且要有亲身的革命经历。换句话说，此事最好由中共党内的那些既会舞文弄墨又有革命资历的知识分子来做。

可是，在中共后来的人员构成中，这类知识分子最为匮乏。

这个党原本就是由知识分子创立的，其后在1920年代的大革命高潮中以及在1930年代的抗日民族主义高潮中，又吸收过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很不幸，这个党在其革命过程中损失最大的部分就是它的知识分子群体。这其中，既有被国民党惨杀的——如方志敏、恽代英、瞿秋白、以及柔石、胡也频，都被作为「共匪」处决了；也有被自己人冤杀得——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党员、以及中央苏区和陕北苏区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

都被当作「AB团」清洗了（参见本书第25节）。

当革命成功时，这个党里仍还活着的老资格知识分子党员寥若晨星，并都成了职业官吏或职业政治家，主要从事那种十分功利且十分忙碌的工作，不大可能去搞那种身心均需处于自由状态的创作活动。

他们所用言辞讲求实用性，讲求直截了当，以使平常百姓一听就能明白。一部《邓小平文选》的词汇量，大体上不超过一本普通中学文化水平读物的词汇量。这种表达方式属于普通的应用文体，很难归为高雅的美文文体。

他们能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十分匮乏，故很难从容地进行创作活动，很难长久地盯着一个作品，琢磨它的方方面面。诗人元帅陈毅曾很想写一个反映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剧本，但一直苦于没有时间，后来当众向其上司周恩来抱怨此事。后者则当众批准他一个「创作假」，一个只是说说而已的「创作假」。（洗济华，〈周总理给陈毅创作假〉，《中国演员报》，第52期。）说完话，陈还得要去忙他的副总理诸多事务，而只能在工作之余偶发一下文墨之情，作一两首诗词，得一二言佳句。

作诗填词，可说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的一道风景线。该群落中凡有才情者大都爱做此事。究其原因，无非两条：一是诗言志方式多样，既可畅快淋漓，也可吞吞吐吐，故比较适合中共高干在党内外斗争中时而豪放时而隐忍的心态；二是作诗无需大块时间，车上马背，饭后茶余，即可哼哼然而成篇章，故比较适合这些忙忙碌碌者不时想偷出点空来宣泄一下文思才情的需要。

有点例外的是，曾由毛泽东大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三大常委都很少做诗，至少在他们坐上高位后鲜见有诗。这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与他们都非常讲究实际有关。前者说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话，中者说过「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话，后者则说过「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人过于实际，就与作诗无缘了。

至于那些资历较浅但也经历一段艰苦创业时期的知识分子党员，

大都在 1940 年代的「整风运动」中被整肃过思想，后又在 1949 年后的历次运动中被触及过灵魂。其中那些专职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几乎都被严加批判过，有的还被关进监狱里。出自军旅的解放军作家是如此，出自城市的地下党作家也是如此，前者如《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后者如鲁迅先生的许多弟子们。

毛泽东曾说，他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49 年前，前者不时向人们谈起自己对先生的仰慕之意。1949 年后，后者的诸多门人，从胡风到萧军等——均是先生在思想文化领域留下的嫡亲骨肉——个个挨整，以致于他们在 1949 年后的处境还不如他们在 1949 年前的处境。虽不能说他们蒙冤受屈都是出于毛本人的筹划，但可断定他们为人处事都不适合毛当政的时代。

大陆知识界传有一句戏言：鲁迅姓如果活得长久些，准是个大腕级「右派」。从此言中可看出人们对毛自我表白的那句话是很怀疑的：「要么你的心后来变得不与鲁迅的心相通，要么你的心本来就不与鲁迅的心相通。」对于鲁迅以及像鲁迅这种类型的人，毛泽东可以做到远而敬之，但不能做到近而听之。他一坐上执政者位子就容不得那种嫉恶如仇且不平则鸣的知识分子。

冯雪峰是一个有特殊身分的中共文人。他是鲁迅的学生，也是鲁迅晚年最为亲近最为信赖的挚友之一，另外还是鲁迅与毛泽东之间的思想联系人。

毛泽东曾通过冯雪峰了解鲁迅先生。1933 年底，冯雪峰从上海潜入江西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屡屡找他谈论鲁迅，有一次见面就说：「今夜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 年），页 157。）

鲁迅先生也通过冯雪峰知晓毛泽东。1936 年 4 月，冯雪峰又从陕北苏区潜回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他很快找到鲁迅，向先生「谈长

征情况，谈毛泽东做的党内斗争和毛泽东的坚强性格。他说，『周先生的韧性战门精神，面有人了……』』（《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页56。）

就在冯雪峰穿行于上海与苏区间这段时期里，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屡受排斥打击，鲁迅则在思想文化界屡遭明枪暗剑；冯本人，在苏区属「毛派」的人，在上海为周氏知己。从这里，一可看出，此时毛的处境与周的处境颇为相近；二可看出，冯在处世为人上绝非趋炎附势之辈，其晚年遭遇更能说明这一点。

冯雪峰属于中共内最为匮乏的那种既有卓越文才又有革命资历的知识分子党员。他既是诗人、作家、文学批评家，又是亲身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故属于那种能将红军长征业绩写成史诗般作品的最佳人选，很可能是唯一人选。

冯自己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他曾以缺乏真实感为理由来替鲁迅放弃写红军小说进行辩护，但此次就无法以同样理由来为自己推卸责任了。于是，他拿起笔开始了这一创作过程、这一漫长曲折且终无结果的创作过程。

1937年底，他请长假回义乌老家写作，乡居三年，数易其稿，写成五十万字文稿，定名《卢代之死》。1942年2月，他突然被捕入狱，遂将此稿失落。

新中国成立后，他重写此稿，但在写的同时接连遭遇厄运，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问题被解除《文艺报》主编职务，1955年因「胡风事件」被迫检查，1957年又因「右派问题」被开除出党，最后不得不将第二次写出的几十万字文稿锁入箱中。

1961年，他被摘去「右派帽子」，于是翻出旧稿，准备写完此书，以了却心愿。很快，他就被告知，像他这样的「摘帽右派」不适宜写作像两万五千里长征这样的重大革命题材。这一次，「不再把这部稿子锁回箱子，而把它投入熊熊炉火之中。二十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

焚烧的不仅是文稿，也是他的心。」「他的头发从两鬓花白到满头皆白，仿佛在顷刻之间。」（吴长华，《冯雪峰评传》，第 10，20-21 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 年）。）

人们还可补充说：这把火烧掉的，不只是他个人的心血，还有中国工农红军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象；这种独特的艺术形象，由于这个独特的艺术家的故去，而永久地失去了。如今，人们只见老红军萧峰留下的长征日记，不见老红军雪峰本应留下而终未留下的长征史诗；只见外国作家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不见中国作家写的「长征——记忆犹新的故事」——《卢代之死》。

执政党如此处置冯雪峰及其作品，实属精神自戕行为，即自己毁灭自己通过遭受苦难而积聚起来的文化资源，使自己在千辛万苦后而不能获得相应的文化回报、不能创制相应的文化精品。当然，这不等于说该党毫无文化精品可言。事实上，这个党也产生过一些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佳作，比如产生过像《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和《毛泽东诗词》（37 首）这样的佳作。

就《毛选》来说，虽有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仍不失为一部文史哲兼达的名著。它是中国百年来一部最有政治实用价值的论说文文集，从中可清晰地看出中共由井冈山到南海的发展轨迹。另外，它还是「五四运动」以来非常优秀的白话文文集，通俗易懂，清晰生动，比起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的文章来，更有可读性，更容易打动中国老百姓的心。

至于《毛诗》，鲁迅先生曾称其间有「山大王」气，（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 年），页 157。）即有霸气，有草莽气，或说是有一种怪异的雄浑之气。此诗主不仅做了山里的「大王」，而目做了国中的「大王」。其诗文自是杂呈绿林、秀才、王者诸般气象，确为中国诗坛之尤物。

然而，毛泽东（包括为其文字润色的人）的文化成就，在其党内

属特殊现象，用曹孟德《短歌行》里的话说，属「月明星稀」现象：月儿太明亮了，致使周围许多星星显得模糊起来，其中一些星星完全看不见了。在中共思想文化的夜空中，人们常常只见皓月当空，不见群星灿烂，只知有《毛选》、《毛诗》，不知有其他锦绣文章。

不过，这当空皓月，只是一轮孤寂的月亮，一轮带着寒意的月亮，不能与星辰同辉，不能让知识界感到温暖。

## 57

新中国文化艺术界，除有中共知识分子外，还有所谓「党外知识分子」（毛泽东在 1960 年代常常带着情绪谈起他们，称之为旧社会留下来而新政权不得不接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者鲜有文化精品，后者能否予以补偿呢？人们指望后者能做什么？

若指望后者能很好地用艺术形式去反映中共党人所承受过的苦难，似是难为了他们。这是要他们去做他们做不了的事，去做连鲁迅先生也望而却步的事。沈从文写得了湘西风情，写不了江西军情；艾芜写得了南行记，写不了长征记；老舍先生写得了正红旗下，写不了太行山上。

若指望后者能很好地用艺术形式去反映中共党人所制造出的苦难——也是他们中许多人所亲身承受过的苦难，似也难为了他们。因为，他们既有作此创作的有利条件，也有作此创作的不利条件，两相比较，后者更为重要些。

这些知识子无疑拥有许多可资创作的素材，拥有许多对苦难的直接体验。

在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关照下，他们大都有过十分坎坷的经历，不是在此次运动中出问题，就是在下次运动中出问题，躲过了「反右」，躲不了「文革」。纵观这些人走过的一生路程，就数在中南海红太阳照耀下走过的这段路程最显曲折，拐了许多个弯，每个拐弯处都有过一

个揪心的故事。

有一个为笔者所熟识的艺术家，出身上海富家，早年同情革命，曾为中共地下党秘密运送过红色宣传品；进入新社会后，欢天喜地，只觉得眼前一片阳光，无论做什么事都有用不完的劲；到了 1957 年，晴空打雷，因出于好意给党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继而被扔进社会最底层，过了二十余年暗无天日的生活；1960 年在劳改农场中几乎饿死，饿得他这位昔日上海各大饭店的常客竟成了老鼠和蛇的天敌，在地里干活时只要抓住这些小动物就立刻活剥生吃；后来逃到新疆，与小偷乞丐为伍，破衣烂衫地流浪了十余年。如今，艺术家已过上舒适的生活，但心中仍不能完全摆脱往日的阴影，白天欢声笑语，晚上常做恶梦，尤其是冬夜被子盖得不严时准做恶梦，梦中情节多是劳改队里的事，多是「队长」又朝他吼了什么事。

除拥有可资创作的素材外，这些知识分子还拥有进行创作的技能。这是他们的强项。与来自「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相比，出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受过更多的学术训练，拥有更高的专业素质。胡乔木与季羨林为清华大学同级生，前者很早参加革命，后者一直经营学业。一个成了中共笔杆子，一个成了清华名教授。前者长于起草政治文件、整理首长文稿，后者长于钩沉文化典籍，撰写学术专论。

文学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像老舍、沈从文那样的大手笔，在延安作家群中是看不见的。诚然，后者中也有一些文学禀赋较高的作家，但他们大都结局不好，如才子王实味被砍了脑袋，才女丁玲被打成「右派」。有了感人的创作素材，有了精湛的创作技巧，还未必能创作出好作品来。作家们还需要有其它条件，就客观方面说，还需要有一个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就主观方面说，还需要有一种较为从容的创作心态。然而，就新中国文化界实际情况来说，这两者都无从谈起。

就创作环境而言，新中国的作家们大都缺乏能够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评论的空间。他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接受执政党领导，只能在后者严格划定的圈子里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只能搞一种「鸟笼文学」

或「鸟笼艺术」。

作家们，常常被要求去写这一题材或那一题材——这些题材对于他们来说，很可能既不熟悉也不喜爱。例如，常常被要求去写那种歌功颂德的文章，去歌颂说一不二的执政党是如何英明正确的、以及高高在上的毛主席是如何亲切温暖的——这对于那些原本有些傲骨的作家来说，是很难下笔的。又如，常常被要求去写那种阶级斗争的故事，去编织这一拨人如何要置另一拨人于死地，以及另一拨人又如何反过来要置这一拨人于死地的情节——这对于那些生性温文尔雅的作家来说，是很不适应的。又如，常常被要求去写那种非常表面化的题材，去描写那种红旗飞舞、群情激昂、豪言壮语不绝于耳的场面——这对于那些笔触细腻、擅长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家来说，是很感别扭的。……

稿子即便写出来，也未必能够出版，还须有关部门审查。这种审查主要不是依据艺术标准或学术标准，而是依据政治标准。一部书稿，不管有多高的艺术性或学术性，只要不能达到执政党的政治要求，就不会获准出版。

这种政治标准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尤其对于许多造诣很高的老作家来说，是很难达到的，甚至是不想达到的。于是，他们很少动笔了，即使动笔也很难写出佳作了，并因而造成一种令执政党十分尴尬的局面：新中国文化艺术成就在许多方面还赶不上旧文化艺术成就。

并且，这种政治标准就其自身来说，是非常不确定的，是随着执政党内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小说《保卫延安》，因涉及彭德怀将军指挥西北野战军的事迹，在庐山会议前被认为是好作品，在庐山会议后被定为「黑小说」，遂遭查封。

电影《燎原》，则因涉及刘少奇参与领导安源煤矿大罢工的事迹，在1966年前被认为是好作品，在1966年后被打成「黑影片」，遂遭禁

演。

由此可见，这一政治标准从其骨子里说，不过是一种极为庸俗的政治实用主义的代名词而已，是随着官场权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像是旧时官宦人家看门人脸上的那双不时作仰上俯下翻动的势利眼。

作品即便问世了，也未必能够获得公正评论。因为，文艺评论所依循的批评标准也要政治挂帅，也要以党内斗争的需要为转移，甚至要以某些权势人物的臆想为转移。康生没看过小说《刘志丹》，却能凭猜测而断定它是反党的，并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也没看过此书，竟能够带着肯定的口气念了康生写的条子（这句话后来成了他名下的一条语录），并就此发了一通议论：「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个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府，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9.2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42。）

从事创作活动需要有一个好的心境，既要有冲动的激情来奋笔疾书，又要有从容的心态来感悟评品。然而，这种心境对于新中国里的许多作家来说，仅是一种奢望，至少在1957年后仅是一种奢望。或许在新中国红旗的掩映下，他们的脸上常显笑意，陪着对自己不大放心的执政党笑，陪着识字不多的群众笑，有时也为自己笑一笑——此次运动我总算过关；但其内心是十分酸苦的，是欲哭无泪的，隐有愁痛，隐存羞愧。

接连不断的整人运动，使得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有所顾虑，甚至有所恐惧。昨日张作家犯错误了，今日李作家也犯错误了，明日或许就要轮到自已犯错误了，所以，从现在起要格外小心，尽量不去碰那些有可能引起争议而祸及自身的问题。

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发表后，受到许多好评。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它搬上银幕，并请作者本人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就在此时，

有人指责小说宣扬「人性论」，宣扬「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这些说法在当时都是文艺工作者深感恐惧的「大帽子」。迫于压力，作者在改编时不得不「把那些有可能涉及到『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地方删的删，改的改」。后来一些文艺工作者如赵丹等将电影与小说进行对照，深感失望，「认为电影不如小说，把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给删去了……」，比如，影片拍到父亲终于找到失散多年且无时不在想念的女儿时，竟没有流出热泪的镜头。（周哲，〈周恩来和赵丹谈文艺需要民主〉，《炎黄春秋》，1996年第10期。）

许多作家在伏案创作中，不时停下笔来抬起头，四下打量，看看那些拿着「帽子」提着「棍子」正盯着自己的好事者；随后伏下身来抓起笔，涂涂改改，一直改到自以为人家抓不到话柄为止。作家如此创作，一是不可能集中精力，二是不可能坚持己见，故而很难创作出那种有着一以贯之的气概和个性的佳作来。

在作家们内心中，除有受别人羞辱之苦外，还有受自我谴责之苦。他们中许多人都曾迫于压力写过所谓「触及灵魂」的思想检查，既痛骂自己，又揭发同仁，故使自己成了一个屈服于政治淫威的精神自首者或思想告密者。这些事对于那些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有损他们的名节，最能使他们的内心隐隐作痛。

此外，一些有影响的名作家，还有担负社会工作过多的烦恼。一位知识界朋友曾告诉笔者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老舍先生去看望因被打成「右派」而避居京郊的王莹。闲聊中，老舍先生竟羡慕起这位落难者来，说她多少还有一个清静的地方，还有一个外界少有打扰的地方，不像自己担任许多社会职务，将大量时间耗费在很不合自己性情的官场应酬上。老舍先生所说的官场应酬，无非这样一些事情：或是上传下达，说上一些套话；或是迎来送往，陪上一些笑脸；或是让一个很含蓄的人频频张口，高呼充满革命激情的口号；或是让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屡屡举手，赞成自己并不清楚的事情。不过，执政党让老舍先生出来做这些事情，并非恶意，其间虽有为己所用之意，但也有厚

待客卿之意。

对于大多执政党干部来说，在官场中担任一定级别的职务，既是自己获得上级信任程度的标志，也是自己获得个人待遇水平的尺度，因而都比较看重职务、看重级别，品评人物少不了要谈吓该同志在这方面的情况。即便在日常交谈中，他们一说到自己有什么样的级别和享受什么样的待遇、以及他人有什么样的级别和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时，刻兴致勃勃起来，眼睛也显得更亮些。

不仅如此，他们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以为别人也像他们那样考虑问题，于是给他们较看重的一些社会贤达也安个什么职务，或为某某委员或为某某长，以示垂爱。他们此举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谓大恩大德，感激都来不及；但对于像老舍这种以写作为生命的人来说，则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政府还信得过自己，忧的是自己将很难静下心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就舍公本心而言，最想做的事不会是当官，而是写作，不会是要以官位显于世，而是要以文名传于世。事实也是如此，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老舍先生当过什么官，但也并没有多少人不知道老舍先生写过《骆驼祥子》。

这种由执政者向清纯学人授以官职的做法，有些类似猫儿想送兔儿可口食物，结果送了小鱼儿。显然，猫儿是出于好意的，是想与兔儿共享好事的，可问题是兔儿接受不了猫儿这番好意。小鱼儿在这一方是美味佳肴，在那一方则难以下咽。

诚然，也有兔儿渐渐爱上了猫食毋宁说兔儿渐渐变成了猫儿的情况。有那么一些步入官场的学者文人，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坐稳了官位，尝到了甜头，并且乐此不疲，一坐就坐到了一大把年纪还不想下来，还美其名曰：亦学亦官，亦雅亦俗。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亦此亦彼的人，再也做不了一流的学问，再也写不出一流的佳作。

老舍先生善解人意，拉不下脸来拒绝执政者的好意，故而做了人家的应酬官；可老舍先生酷爱写作，打心底里不喜欢官场上的事情，

于是有了他在王莹面前发的那一通牢骚话。

总之，中共党人以其自身在建国前所承受的苦难和在建国后所制造的苦难，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界提供了最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中共党人及其治下百姓，未能看到最上乘的文化产品。

这对于那些牺牲于苦难的人——无论是长眠于雪山草地的红军战士，还是长眠于劳改农场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遗憾的。对于那些活过了苦难的人——无论是革命战争中的幸存者，还是政治运动中的幸存者——来说，是非常尴尬的。不过，最尴尬者，不是别人，而是最高执政者本人。因为，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文化艺术界，既创制不出反映前一苦难的文化精品，也创制不出反映后一苦难的文化精品。前者是他本应该做成却没有做成的事，后者是他既不想做也无法做成的事。

毛泽东尤为尴尬的是，他自以为提出了一条十分正确的文艺路线，他也清楚在这条十分正确的文艺路线下却未能产生十分辉煌的文化成就。

可是，毛泽东并没有因尴尬而自责、而自惭形秽，反倒是由尴尬而恼怒、而迁怒他人，愤愤然抱怨文化艺术界拿不出新作品来，总在那里炒剩饭、「推陈出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国死人，外国死人」。

问题在于，他除了抱怨失败外，还应该抱怨失败的原因，抱怨造成这一局面的真正责任者。抱怨者最应该被抱怨。

## 第五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上）

### 引言

毛泽东在 1960 年代前半期，一方面搞四清运动，以整基层干部；另一方面搞文艺批判运动，以整知识分子。

可是，就在这被整的基层干部的上面，还坐着许多高级干部；就在这被整的知识分子的后面，还站着许多党中要人。此上面者曾庇护过其下面者，此后面者曾怂恿过其前面者。

因此，四清运动和文艺批判运动只要继续向前推进，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这些坐在上面的人和这些站在后面的人，触及到许多执政党高层人士、许多中央大员。

这些中央大员多是位居「一线」的当权派，直接掌管着国家权力机关，直接统领着执政党干部队伍。

显然，「二线」上的毛泽东要扳到「一线」上的当权派，就不能采用常规的方法，不能依靠现成的权力体制和干部队伍，而只能采用非常规的方法，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 58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

此序幕在一阵阵紧锣密鼓声中，展现了一幅浓墨重笔的文字讨伐场景、勿宁说是文字「北伐」场景：一位出自上海的评论家倾其严辞厉语，以抨击一位身居北京的剧作家、准确说是「客串」剧作家，即本为历史学家和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先生。

此抨击者与被抨击者，都有不寻常背景：一个身后站着毛泽东，另一个身后则排列着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等人。前者为中央主席，虽于这一时期总爱在南方徘徊，不愿回京城日日早朝，但仍贵为天子；后者均为中央大员，常驻北京，总揽日常党务国务，掌有朝中诸多实权。

发表姚文元文章，可说是「二线」毛泽东决心要讨伐「一线」中央的前哨战，或者说是前者在向后者发起政治总攻前所作的一番火力侦察，以试探北京方面将对此作出何种反应：是否会抵抗？若抵抗会抵抗到何种程度？

序幕本身场面不大，仅为一场笔墨官司；但就其已触及到以及将触及到的人和事来看，紧接其后的正剧将是大戏连台、高潮迭起，「好戏还在后头」。

不过，在进入正剧前，应追溯一下此序幕何以发生的一些缘由。这戏外的事也是很有「戏」的。

令人有些诧异，不仅批判《海瑞罢官》的人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而且创作《海瑞罢官》的人也受到过毛泽东的鼓动，尽管这种鼓动是间接的。无论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都能从老人家那里找到自己之所以要那样行事的依据。

1958年，毛泽东挂帅搞「大跃进」，搞出了假话大泛滥、牛皮吹上天的局面。后来，毛自己也觉察出问题来，于是号召人们讲真话，并也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抬出明朝海瑞作榜样，要求党员干部们像海大人那样讲真话。就最终结果看，毛此次号召党员干部讲真话，与他此前号召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如出一辙，又要了一回「阴谋」：先是满脸谦恭地劝人讲话，后又陡然变色以言治罪。

1957年，有人听信他而说了真话，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1959年，又有人听信他而说了真话，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深受 1959 年「阳谋」之害的人中，最突出者要数彭德怀与吴晗两个人了。前为武将，后为文人；武将直言快语，文人编剧本讲故事；直言者落难于当年内召开的「庐山会议」，编剧本者落难于数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了「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的话后，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后者将此书长时间放于案前，「批阅文电之余，便拿起仔细阅读」。他上庐山进言时，「脑子里是否想到了海瑞，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从毛泽东号召讲真话，学海瑞中受到了鼓励，则是可以肯定的。」（王焰等编，《彭德怀传》，页 58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031。）

八届七中全会之后，胡乔木将毛泽东关于学海瑞号召告知吴晗，并鼓励他写这方面文章。很快，吴晗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刊登在 1959 年 6 月 26 日《人民日报》上。不久，他又写出〈论海瑞〉一文，刊登在 9 月 17 日《人民日报》。后一篇文章由于发表在「庐山会议」后，故被加上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以示将海瑞骂皇帝与彭德怀骂毛泽东区别开来。后来应京剧表演家马连良之请，历史学家吴晗客串戏剧创作，七易其稿，终将海瑞故事编成一个剧本，并接受友人蔡希陶建议将剧名定为《海瑞罢官》。1961 初，该剧由北京京剧团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礼堂正式上演。（于伶、子真，〈吴晗和《海瑞罢官》〉，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 年纪实》，第 2 卷（华夏出版社，1986 年），页 2-5。）

《海瑞罢官》上演数年后，毛夫人江青开始找人写文章批判此剧。1965 年初，她因在北京遭拒绝而向上海求助，获积极响应。在柯庆施支持下，她与张春桥、姚文元筹划此文，由姚执笔，十易其稿，写成这一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名篇。

此时江青，既没有很高的职位，仅为行政九级；也没有显赫的声名，已沉寂幕后二十余年；却可以到上海滩呼风唤雨，并返转直扑北京城。事后她在谈到自己之所以能如此行事时说：「因为主席允许，我

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页 38-39。）毛也承认这一点：「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毛泽东，〈和卡博、巴卢库同志谈话（1967.2.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492-493。）他在另一处又说：「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1967.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497。）

毛这两处讲法有些不同：一是事先被他人告之，一是事先由自己建议；但其间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文章写出前他点了头，二是文章写出后他审阅过，并认为「基本可以」。这篇为毛认可的文章，洋洋万言，从历史到现实，从艺术到政治，说了《海》剧许多不是。其间说得最重的话，要数对剧中的「退田」情节与「平冤狱」情节的批判。姚将它们与 1960 年代初的「单干风」和「翻案风」直接画等号：

戏里的「退田」，就是指现实中的「单干」，就是「要求恢复个体经济」，「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戏里的「平冤狱」，就是指现实中的「翻案」，就是要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抱不平」，「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与「平冤狱」，就是现实中「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后来，康生又作了一个重要补充，即「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232。）

康这一观点立刻获毛肯定：「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12.2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393。）

1965年12月21日，毛说了上述的话；可在此前9月23日，他曾当着彭德怀面说过这样的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毛主席与彭德怀的谈话摘录（1965.9.23）〉，《彭德怀自述·附录二》，页288-289。）

当时，中央分配彭德怀去西南地区抓国家战略后方「大三线」建设。彭对此任命有顾虑，说自己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王焰等编，《彭德怀传》，页696。）

对于彭的担心，毛「斩钉截铁」地表示：「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王焰等编，《彭德怀传》，页698。）

就在老人家表示这一「衷心诚意」同时，有两样工作正抓紧进行：

其一、中共中央彭德怀项目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工作，仍准备「审查反革命，审查他们的反党、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王焰等编，《彭德怀传》，页700。）

其二、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炮制过程，正处于紧张运作阶段。

关于姚文对《海瑞罢官》的责难，人们已作过许多反驳，其中一个反驳认为姚文元对《海》剧的责难，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漏洞」，就是为了混淆事实而颠倒了时间过程：（于伶、子真，〈吴晗和《海瑞罢官》〉，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第2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页2-6。）

吴晗创作《海》剧是在1961年前，而所谓有人刮「单干风」、「翻案风」则是在1961年后。吴晗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是在1959年6月16日，而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则在7月14日。吴晗发表〈论海瑞〉一文虽是在庐山会议后9月17日，但已加写批判文字，以「与彭德怀

同志『假冒』海瑞问题画清界限」。

不过，就实际情况看，姚文元对《海》剧的责难，虽有许多强拉硬扯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

因为，一个剧本，不仅有它的文本意义，姑且把这看成是作者在创作时原本设想出的意义，而且有它的解读意义，姑且把这看作是读者在阅读时以自身理解方式领悟出的意义。

用接受美学的话说，这后一方面意义，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品进行再创作而获得的意义，既包括作者在进行一度创作时所设想出的某些意义，也包括读者在进行二度创作时所联想出的许许多多意义。

同理，在《海》剧创作时，吴晗先生或许没有想到太多问题，至少没有想到后来才发生的那些问题，如刮「单干风」、「翻案风」等；但在《海》剧发表和上演后，读者和观众就会由此而联想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吴先生始料不及的问题。

特别是那些对「大跃进」实际后果有了一定认识的人，在看到《海瑞罢官》这出戏时，很难不将它与现实联系起来。因为，戏中的一些情节与现实中的某些情况确有相似之处：

1958年，毛泽东发烧成了「昏君」，是无疑的；

1959年，毛泽东遇到海瑞式的直言大臣，是无疑的；

其后，他拒纳忠言且又「廷杖」忠臣，也是无疑的；

结果，他一意孤行，搞得民生凋敝、国力衰微，更是无疑的；

1961年至1962年，毛泽东又遇上了一批大臣进言，要求他改弦更张：一是分田承包，二是平反冤案，也都是无疑的；

1962年及其以后，毛泽东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还倒打一耙：狠批「单干风」、「翻案风」，又都是无疑的。

对于毛泽东这些倒行逆施，广大老百姓不太清楚，但有两种人是心中有些数的。这两种人分别为一部分中共高干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前者了解实情，后者眼光敏锐。当这两种人在看到《海瑞罢官》中的那些与现实颇为相似的情节时，不免会作出些古今联想，不免会生出许多怨气。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人物，要数吴晗同事也是「三家村」村长邓拓先生了。此公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文教工作书记，既是中共高干又是知识分子，既了解实情又擅长分析，并且既敢于讲话又善于讲话。他在1960年代初，也就是在《海瑞罢官》剧目上演前后时间里，写出了许多杂文，以讽喻手法针砭时政，甚至针砭老人家本人。（在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期间，邓拓先后为《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写了150余篇杂文，为《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写了18篇杂文。这些杂文大都从现实问题入手，旁征博引，评品人物，讽喻时政。）

如在杂文〈专治「健忘症」〉中，他对臆「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的人作了十分辛辣的嘲讽。那么常时谁是国中最不讲信义者呢？深知「阳谋」厉害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问题是不难作出回答的。邓本人正是在「反右」运动中不为毛看好而被撤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的。

如在杂文〈伟大的空话〉中，他又奉劝那种爱说诸如「东风」、「西风」之类大话的人尽早去「休息」。在当时该休息却未休息且又大话连天的人中，最突出者恐怕也要数那位说是退居「二线」却总在干预「一线」的老人家了。

像邓拓这种很爱做借古讽今文章的人，在看《海瑞罢官》时，很难想象他不会观古代的事上联想到今日的事上，尤其当这两者很相似时，就更难想象他不会在为古人喝彩时拖着长长的尾音。

即便就吴晗本人来说，也很难做到在其创作中只想剧中情节而不想剧外诸事。他写作《海瑞罢官》时，正值1960年大饥荒，农村中有大批人饿死，城市里也有许多人因营养严重不良而全身浮肿，作者自

己也不会吃得很饱。当时中央首长都限量吃饭，他这位省市级干部就更是如此了。

面对此景此况，熟知明史的吴先生，很可能会想起海瑞时的那句民怨：嘉靖嘉靖，家家净也；很可能会将这句古话同眼前现实联系起来：时下的中国，岂不也是「家家净也」吗？就乡村而言，过去除有贫农外，还有一些中农和富农，如今就只剩下清一色贫农了。同样道理，毛泽东作为读者或观众，也会按自身理解方式来领悟这出古装剧，也会由此而作古今联想。

事实上，他也更容易作这种联想。因为他本人就是当今国家的最高执政者，就是这些年来许多重大事件的直接当事人或直接责任者，因此他对于这借古讽今事，自会比别人更敏感、更容易生出疑心。

他本来就以为，「单干风」和「翻案风」是冲着他来的，如今又发现，《海》剧中既有「退田」情节又有「平冤狱」情节，故很容易警觉起来：这出戏究竟要干什么？

即使他本人没有觉察出什么来，但只要有人从旁稍作点拨或稍发谗言，他就会十二分认真地去揣测它乃至信以为真。康生对他说《海》剧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他听后即信之，并当作自己的看法说给手下的那些笔杆子听，于是乎有了戚本禹文章的发表。戚文说：「《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1966.1.15），《人民日报》1966年4月2日。）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专制统治者都有许多相似处，比如，大都刚愎自用、文过饰非且又坑害忠良。与此相应，凡是抨击专制统治者的作品或凡是歌颂其反面骨鲠忠臣的作品，也都有着较多的象征意义或较宽的打击幅度。比如某一作品中的某些骂皇帝的话，既可用在李皇帝身上，也可用在赵皇帝身上；既用来直讽已死去的皇帝，也可用来影射正活着的皇帝。

因此，这类作品的解读意义十分宽泛，可被不同的人解读出不同的意义。老百姓方面，在观此类作品时，很可能是会心会意的：如果当朝者是贤君，那么这作品与他无干系；如果当朝者是个昏君，那么这作品骂的就是他。统治者方面，特别是那些实行苛政的统治者们，在观此类作品时，则可能是疑神疑鬼的：总觉着作品中那些骂人话是对着自己说的，总喜欢在那里搞「对号入座」。

毛泽东就常常爱搞「对号入座」，常常自比秦始皇，并因此而很不喜欢那些痛骂这个暴君的作品，到了晚年还掀起一场「评法批儒」运动，其间翻出郭沫若早年著作《十批判书》，指责它「尊孔反法」、「大骂秦始皇」，并写诗作评，讥之「不是好文章」。

简言之，上演后的《海瑞罢官》所具有的意义，不限于作者在创作时所设想的意义，还包括观众在审视时所领悟的意义；而在这后者中，无论是赞成它的人所要肯定的东西，还是反对它的人所要否定的东西，都不全是作者原本想提供的东西，都有可能是观众自以为是的的东西，并都有可能对应着现实中某些真实的东两。因此，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意义所作的许多非难性发掘，若都被安在作者头上，都被说成是吴意表达的，则是十分冤枉的；但若都被当作无稽之谈，都被说成是没有事实背景的，则是十分片面的。

「文革」后一些为吴晗作鸣冤的文章，为了证明吴晗的无辜以及姚文元的无理，往往将前者的古装剧作说成与现实政治没有多少关系，以显得吴晗是非常意外地被卷入到一场政治漩涡中去的；同时将后者对前者的许多指责都说成是凭空捏造的。

显然，这种辩护又走上另一个极端，也是言过其实的。较老道的政治家在实施重大举、很少去硬造形势，而多是想借助某种已有形势，多是想做一做借题发挥的文章，并为此而努力寻找那种确实能借以发挥的话题，那种说起来能让人觉着很像是回事的话题。

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从批判《海瑞罢官》入手，应该

说是找到了那种确实能借以发挥的话题。在这个话题中，无疑有一些虚构的东西，但也有一些非虚构的东西、一些与当时中国政治实情很相似的东西。这就如同他后来发动群众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样，其间固然有蛊惑人心的一面，但也有确实抓住当时群众心中业已存在的反官僚主义情绪的一面。晚年毛泽东的政治运作能力虽已严重退化，但还没有退化到颠三倒四、胡言乱语的地步。

不过，毛泽东从《海瑞罢官》中所抓住的那些非虚构的东西，并不都是作者原本设想出来的东西，而有相当一部分是包括毛在内的诸多读者后来解读出来的东西，故不应该让吴晗为自己作品的解读意义负完全责任，至少不应该让他为此负刑法责任。

然而，毛泽东的专政机关就让吴晗此负了这样的责任，将他捕入狱中，摧残致死；并株连亲属，将其妻其女也捕入狱中，致使母女俩人也像其夫其父一样都未能活着走出牢门。

## 59

吴晗的《海瑞罢官》，作为一个被用作借题发挥的话题，不只是一个说起来很像是有那么回事的话题，即有一定事实背景；而且是一个由此引发其它许多话题的话题，即有较大语义拓展空间。

在对它的批判中，毛泽东真正看重的，不是吴晗这个人这个剧本，而是由此人此剧所能引发出来的那些东西，其中最突出者，要数「一线」中央对他的节节抵制，以及他对这些抵制的逐次摧毁。

最初的抵制：北京方面对姚文的发表不予理睬。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中央暨北京市各大报刊均不作转载不加评论达 18 天之久。当时，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国防大学编，《5·16 通知》附件〈1965 年 9 月到 1966 年 5 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5 册，页 5。）

在此期间，毛泽东见北京湖南两地报刊拒载姚文，便指示上海方面将此文印成小册子发行全国，但「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北京新华书店奉命对「征购通知」不予答复。（国防大学编，《5·16 通知》附件〈1965 年 9 月到 1966 年 5 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5 册，页 5；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967.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498。）

继而的抵制：「一线」中央对姚文掀起的批判运动进行限制。

在毛泽东持续压力下，「一线」中央不得不作退却，同意首都各大报刊转载姚文。《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于 11 月 29 日转载，《人民日报》于 11 月 30 日转载，《光明日报》于 12 月 2 日转载。不过，这些大员们虽已后撤，但未一撤到底，仍在后撤过程中不断筑起防线，以作逐次抵抗。他们虽同意刊载批判《海》剧文章，但不同意将这一批判提升为政治讨伐，竭力想把它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

《人民日报》在转载姚文时，特意置于《学术研究》栏内，并加上一段经周恩来和彭真审定的「编者按」，阐述「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方针」，既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什么，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什么，只是表明一种如有问题尽管讨论的态度、一种各方主张都予宽容的态度。

《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于 12 月 12 日发表，邓拓一篇署名为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到道德继承论〉，侧重从学术研究角度来批评吴晗剧本，试图把许多针对它的指责从政治批判上拉回到学术讨论中。邓拓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过问下撰写的，是经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的。

再次的抵制：彭真等人对所谓「要害是罢官」的说法予以辩驳。

12月22日，毛泽东在同彭真、康生等人谈话时，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庐山会议」翻案。彭真当即做出说明：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次日，彭真在单独求见毛泽东时，又就上述问题作出说明。彭一再申辩使毛不得不缓词：吴晗问题两个月后再做政治结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235；国防大学编，《5·16通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6。）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文章〈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12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吴晗在作自我批评同时，详尽叙述了《海瑞罢官》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试图说明此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作者还特意点出此剧是在〈论海瑞〉一文基础上写成的，而此文已曰月确写有批判「庐山会议」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了。

1966年1月中旬，戚本禹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和关锋林杰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均经中宣部。这些文章都坚持毛的观点，即《海》剧的实质在于为一小撮被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在于「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中宣部以给吴晗政治结论尚早为由，将这些文章扣住不发，直到毛亲自出面干涉为止。前后长达两个半月之久。

最后的抵制：「一线」大员拟定「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以作为政策性文件来规范日渐失控的文化批判运动。

1964夏，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组员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小组」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中央一线」。

姚文元文章一发表就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引起思想混乱。人们

很难理解一个普通评论家竟能够直接点名批判一位首都副市长，或一篇戏剧评论竟能够上纲上线地谈出那么多重大事件来。人们搞不清楚这场运动究竟要干什么，不知它还会整出什么样的人，还会生出什么样的的是非。知识分子尤其那些既有见识也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忧心忡忡且又思绪纷纷。

鉴于这种情况，北京大员们试图订出一些规矩来，以使人们在作出言谈举止时有所依循，进而消除已弥漫在许多人心中的不确定感。这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任何权力体制都要求维持一定秩序，以能够为权力拥有者带来安全和为权力运作者带来效率；作为中共权力体制「一线」领导，自然负有维持治下秩序的职责，至少此时还负有这种的职责。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着手为如何开展这场运动制定具体规定，以将它纳入「一线」中央所能控制的范围内。

彭真在会上指出，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政治问题；此次运动要坚持「放」的方针，要让大家说话；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康生在会上持相反意见，认为应该谈《海瑞罢官》要害，谈吴晗政治问题，并指责有人搜集左派材料。（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236；国防大学编，《5·16通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8。）

2月4日，根据彭真指示，列席会议者许立群和姚溱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强调此次运动，要「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放出来」；「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

领导机构批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1966.2.7）〉，《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页611-613。〕

2月5日，许姚起草经彭真修改后提交中常会讨论，获得通过，但还不算最后通过，还须报请那位滞留南方不归的老人家认可。

2月8日，彭真率陆定一、许立群等人专程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在汇报过程，毛没有表明反对态度，但说了一些带有倾向性的话。当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汇报者反映左派文人关锋也写过有问题杂文时，毛答道：「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另外，毛两次问道：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总的说来，老人家没有否决《提纲》。（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237；国防大学编，《5·16适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8-9。）

2月12日，〈汇报提纲〉由彭真授意加写批语，经邓小平签发，作为中央文件下达，以指导各地运动。可见，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一线」大员，彭真与陆定一等人曾经拥有相当分量的合法权力，并能运用这种权力对毛进行相当有力的合法抵制。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一段时间里，他们能够控制中央报刊以迟滞这场文化批判运动的势头，能够召集中央会议以谈出不同于毛泽东想法的东西，能够批发中央文件以下达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指令，甚至能够打着中央旗号以贬斥毛泽东直接支持的人和事。

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曾请示北京，《提纲》谈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责成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代以回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国防大学编，《5·16通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9-10；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623-624。）

彭真如此回话，已近乎锋芒毕露，以至于张春桥在被告知当时即作出判断：「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624。）

尤其彭后一句话，表面上是对上海市委的批评，骨子里是发毛泽东的牢骚。彭真等人不会不明白，没有极其强硬的后台，无论如何姚文元也不敢撰写公然挑斗北京方面的文章，上海市委也不敢批准发表这样的文章。他们刚开始时或许不太清楚姚文的背景，但稍候时日就一定清楚此文后面的来头究竟有多大。从他们很不赞成此文又不得不同意转载此文这件事本身就可看出，他们受到了一个比他们所有人都更有权力的人的压力。

这些大员心里很清楚，这种非党性举动的根子出在谁身上，但又不能直接说穿，至少不能直接斥责。只好拿名义上仍属中央「一线」管辖的上海市委作话头旁敲侧击，明里指责上海市委不讲党性，暗里抱怨老人家身为党的主席却不按党的规矩行事。

## 60

以往人们在谈论「文革」初始阶段时，大都对毛泽东如何发动攻势这一方面谈得较多，而对中央「一线」如何作出抵制这另一方面谈得较少，尤其对这些抵制所具有的意义未能给予应有的阐释，致使后者显得十分消极被动，似是懵懵懂懂地挨了整、受了冤枉。

这种谈法仅突出了这个阶段一头一尾的情况，即谁挑起冲突和谁赢得冲突的情况，而淡化了这一头与这一尾之间的情况，即你来挑战我作响应这一冲突本身的情况。事实上，中央「一线」大员尤其那些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大员，对于毛发起的批判运动，并非消极被动，而是作了相当有力的抵制，至少作了能够大大激怒老人家的抵制。

毛泽东发动文化批判，并非自批《海瑞罢官》始，但因发动文化批判而遭遇中央「一线」强烈反弹，确是自这一批判始。这期间，不

仅有前者为什么要选择《海瑞罢官》来大加批判的问题，而且有后者为什么也相应地要抓住这一批判予以强烈反弹的问题。

概略地说，这一批判迅速地激化了中共高层原本就隐有的许多重大分歧和许多非毛化情绪，并使它们浮上台面。

例如，对吴晗大加批判，自然涉及执政党究竟怎样对待知识分子、怎样评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问题；又如，把《海瑞罢官》说成是彭德怀翻案，自然涉及中共高层在事隔数年后究竟怎样看待庐山会议、怎样评价「大跃进」等问题。

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共高层人士并非完全赞成毛的做法，其中一些人士还想纠正毛的做法。

老人家对知识分子向来评价不高，尤其对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一直抱着不认同态度，以致说出这样的话：「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毛泽东，〈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1964.10.1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331-332。）另一些中共领导人如周恩来、陈毅等，则对知识分子持基本肯定态度，常常替他们说一些公道话。

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过一个主题报告，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作了一个基本估计：积极拥护共产党的进步分子约占 40%左右，一般拥护共产党的中间分子约占 40%左右，缺乏政治觉悟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各种反动分子约占百分之几。即是说，绝大多数中国知识是拥护执政党的，理应为执政党所信任。（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1.1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 163。）

1961年6月，周恩来又就知识分子问题发表讲话，承认「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民主作风不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搞「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先给人人家定个框子，然后根据框子去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

政治上去戴帽子，从组织上去打棍子，从历史上去挖根子。（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6.19）〉，《周恩来选集》下卷，页 323-328。）

周这些话显然是在为知识分子这些年来遭遇鸣不平。自他 1956 年作那次报告到他当下作此次讲话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反右派」运动和「反右倾」运动。这些运动有一共同点，就是以言治罪，就是先让人们发表意见后让他们饱受「五子登科」之苦。

1962 年，周又频频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既向他们表示敬意，又向他们表示歉意。3 月 2 日，周在广州向出席全国科学工作会议者和出席全国戏剧创作会议者作报告，开口便是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几年来，大家生活工作都很苦，甚至精神上也不愉快，但仍做出显著成绩。我特别要向你们致敬。（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3.2）〉，《周恩来选集》下卷，页 353。）

他这个敬辞带着苦味，有些感人，尤其对于那些饿过肚子挨过整仍努力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当属很体己的话了。

周还特别谈了如何善待知识分子的六个问题：一是要信任他们，二是要帮助他们，三是要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四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五是要承认我们有错误，六是要改正我们的错误。这第六条，只要毛还在台上便不可能做到，但是，这第五条若就周个人来说便已当场做到：「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党内我已道过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3.2）〉，《周恩来选集》下卷，页 366-367。）

周这些讲话对知识分子有理解、有肯定，后面讲话还有同情、有歉意。不过，执政党总理身分又难为了他，使他在讲话时不得不搞一点「左」与「右」的平衡，既为知识分子说了一些公道话，也不忘为「反右」斗争说上几句捧场话：「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进攻，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的面也许缩小了，

但有时斗争还会很尖锐。」(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6.19)〉,《周恩来选集》,下卷,页332;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3.2)〉,《周恩来选集》,下卷'页363。)

周恩来的副手陈毅则要爽快得多。1962年3月,陈毅在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讲话中,不提一句「反右斗争」,却发了一通「右派言论」。(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3.3)〉,《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页3-26。)

此公开口便道:「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有气,今天要来出出气。」这位挂着元帅衔的副总理,性格豪爽且才华横溢,一旦想出气就能出它个酣畅淋漓且声情并茂:

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抱不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

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如果说经过十二年改造,他们还全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等于说我们共产党十二年来的领导是不行的,等于自己宣布自己破产——共产党你有什么本事呀!

我们把人家的住房、吃饭、穿衣都包下来。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吗?还不如资产阶级高明。有一个网,我可以漏网求生,没有个网,到处都是网,你哪里能够生呐!(笑声)是呀,无网之网,大网也,网死人啦,网哉!网哉!(大笑)这个不好,今天我是出这个气。

陈还对知识分子整体状况作了一个基本判断:绝大多数者是拥护执政党的,是热爱祖国的;绝大多数者是有一定水平的,是可以为我们服务的;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脑力劳动者」、国家「主人翁」。

他特别谈到,文学艺术方面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起就基本上

站在人民一边了，在建国后就更是如此了；可有些人还将他们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符合实际，伤人太甚嘛！」他接着指出，「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形势已很严重，「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比如，他们明明知道你修的水库不科学，过两年就要报废，就要动员人去挖掉它、炸掉它，但不敢讲话；明明知道你亩产万斤水稻违反科学常识，但不敢讲话；因为，「一讲就说我们保守，就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好不讲」。

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责任在谁身上呢？

陈认为，不能对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各打五十大板」，而应「劝所有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要进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评。」陈进而指出，就党自身来说，主要责任不在下边而在上边，因为这些运动是由中央发动的，故「首先要中央负责，不能首先责怪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陈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主办外交事务，兼管科学文教工作，故能就执政党知识分子政策说上一些话。如在1956年1月，他直接参与讨论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草案。如在此次会议上，他既以知情者身分披露：中央从来就没有做过决定要审查文艺作品；又以领导者身份表态：「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以后不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当然，这个表态只反映他陈副总理想法，至于执政党以后搞不搞运动则要由那位党主席说了算。

有趣的是，陈毅兼管知识分子问题，却没有直接参加1950年代那两场反「右」斗争，因而比较干净。1957年，他因患有心血系统疾病而离职修养。1959年，他又奉命看守国务院而未上庐山。

然而，这并不减轻这位副总理的内心自责感。他在此会上十分动情地说，应该给广大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脱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说着就站起身来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

陈毅这番讲话因十分诚恳、十分生动，获六十余次掌声和笑声。

不过，陈很清楚，他的这些言谈虽能赢得知识分子喝采，却不合乎某一些人口味，故而自嘲为「右派言论」。事后，也确有人发指示，不许传达这个讲话；也确有人说怪话：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分子」讲话呢！（《陈毅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534。）

陈还想明确告诉人们，他的这些「右派言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而是郑重作出的，故在畅言之后申明两点：

一、我今天讲这些话，是经过考虑的，是比较有把握的，不是完全有把握；

二、这是中央的方针，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我才敢讲。

陈上述申明将其讲话的个性和党性都作了交待：话是我考虑好说的，也是合乎中央方针或七千人大会精神的；其间既表明我陈毅个人态度，也反映中央多数人意愿。

显然，陈毅讲话不完全属于他个人行为。他告诉与会者，他曾把「讲话的大体意思」预先向总理讲过，并获得总理赞成。陈毅讲话可以说是反映了许多中共高层人物的一种共识，即执政党要记取教训，不要再像以往那样整知识分子了，而应信任他们、善待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

仅隔数年，毛泽东又来支持姚文元发文章，点名批判一位明史专家，并欲将这一批判推及整个知识界，故不能不触发中共高层内原本就隐有的积怨。正像陈毅1962年讲话一样，彭真等人采取抵制姚文元文章和保护吴晗的举动，也不完全属于他们个人行为，也可以说是反映了许多中央一线大员的一种共识，一种在如何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共识。

彭真等人此次对这一共识的表露或说对这场运动的抵制是有一些

特点的：一是力图按组织程序办事，尽可能地发挥自己占据「一线」的优势，运用手中合法权力，监控官方传媒，颁发中央文件，以将此次批判运动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二是试图借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来警诫此次运动。〈二月提纲〉在谈到此次运动方针时，第一句话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 1957 年 3 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在此之前，彭真已多次谈到「放」的问题，由他授意写出的《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编者按」就以此为话题。

在毛的那篇讲话中，所谓「放」的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是发展科学艺术的好方法，而且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

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方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12）〉，《毛泽东选集》，第 5 卷，页 414-418。）

1957 年 3 月 12 日，毛讲了关于「放」的话；到了 6 月 8 日，他又为执政党中央起草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此公话音落下不足三月就开始大食其言了，对知识分子说是「放」实是「收」，说是「说服」实是「压服」、甚至「一棍子打死」，最后打出了数十万被彻底剥夺发言权的「右派分子」。

毛这篇讲话，若仅就字面看，单纯得很，明亮得很，似在显示一种雍容大度的气概，似在表明他毛泽东也想附庸风雅一下，学一学史上贤君，搞一搞「兼听则明」；若再将此言与此人稍后实际所为参照起

来看，就复杂得多了，也阴暗得多了，使人觉着此公气量狭小却又故作大度，害得治下臣民不知如何进退是好，先是遵旨进言，后又因言获罪。

可见，毛这篇讲话有两重意义：一是就其字面来说的直陈意义，二是对那些亲眼看过这由其言到其行过程的人来说的解读意义。前者好比是一篇发表在商品上市前的广告词所产生的效应，后者好比是人们在看到假冒伪劣商品后再来评品那篇广告词时所生出的感受。前者仅触及人的耳目，后者则发自内心的内心。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彭真等为什么要跳过毛泽东在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并又跳过此人在 1957 年夏季所写的关于反击右派的文献，而单单挑出他在 1957 年春所作的这篇讲话，更准确地说单单挑出这篇讲话中的「第七点」，来作为〈二月提纲〉立论的主要依据，作为中央一线藉以限制此次运动的一种权威性说法。其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篇讲话所具有的解读意义至少可以警诫两方面人：

一是警诫毛泽东，不要再做尔反尔的事了；二是警诫知识分子，不要再上那种「引蛇出洞」的当了。

就实际效果看，前一警诫未能够奏效，未能够阻止毛泽东继续搞他的政治运动，后一警诫倒起了作用，致使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亲身经历过 1957 年「反右」运动的知识分子，真以为「文革」初期批判运动又是一次「鸣放」，又是一次「阳谋」，故纷纷采取保守立场，甚至还当了一回「保皇派」。

不过，他们此次还是站错了队，还是站到了毛主席正对面的那个队伍里。说是「保皇」，实是保中央「一线」，保毛决意要搞掉的那些中央大员。他们 1957 年因进言而犯错误，1966 年又因退守而再犯错误，进也不得要领，退也不得要领，当好老人家的子民实在不容易。

此外，彭真等人之所以挑出毛这篇讲话作为〈二月提纲〉依据，

还有一层「拨乱反正」用意。1949年后，执政党知识分子政策前后不一致，「反右」运动前相对宽松（尽管已发生「批胡风」等运动），「反右」运动后过于苛刻。彭真等人此次重新提出并大加肯定毛在1957年3月所讲的那次话，而把他在此之后所说的许多话晾于一边，从而显示他们赞成前期政策而不认同后期政策，并试图从后者这里回到前者那里。

关于如何看待「大跃进」和「庐山会议」问题，早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有许多中共大员持保留乃至批评态度（参见本书第29-32节）。

刘少奇谈到「大跃进」错误时，一方面说不是路线性质的，一方面又说要过五年或十年才能做结论；在谈到庐山会议时，一方面明显加重对彭德怀个人的批判，一方面又暗暗降低「庐山会议」本身的意义。他还特别提到，这几年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人祸」方面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一些负责同志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民主作风。

朱德在会上讲：「这几年『左』的歪风起来了，党内民主不够充分，党内斗争过于扩大，致使人们不敢讲话。」

陈云会上不讲会后大讲：「一是大讲这几年来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突出表现为不讲真话，尤其不讲反面意见；二是大讲当前形势不像毛所说的那样正在好转起来，而是十分严重，需要经过许多年努力才能恢复过来；三是大讲『包产到户』必要性，一直讲到毛面前，致使龙颜大怒。」

据《彭德怀传》记述，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搬出中南海，落户京西挂甲屯吴家花园。不久，彭真与杨尚昆奉命前来安排彭学习事宜。公事之余，彭真不无感慨地谈起庐山会议，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了一些。」（《彭德怀传》，页652。）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在处理彭德怀问题上，中共高层最初就存有异议，朱德陈云自不必说，就连出身刘少奇华北局系统的彭真也有

不平之音。至于过了数年后，即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大都为事实验证后，这种异议就更多也更明确了。

彭真在 1959 年时还只是私下向彭德怀表示同情，到了 1965 年底前后就运用手中权力公然阻止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牵扯起来。

1965 年 9 月，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强调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在一次会议上，彭听到有人汇报吴晗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而紧张地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了半月，他又把吴晗找去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国防大学编，〈5·16 通知附件〉，《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5 册，页 4-13。）

中宣部长陆定一则多次谈起斯大林晚年犯错误话题，（国防大学编，〈5·16 通知附件〉，《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5 册，页 4-13。）谈起这个对于毛泽东来说很敏感很有刺激性的话题。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周小舟、李锐、周惠等人，私下议论毛泽东。他们说道：「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当这些话被捅出来后，「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做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78-179，320-326。）

这一问题之所以具有如此敏感性和如此爆炸性，就在于斯大林因其生前恶行被揭露而成了一个声名狼籍的人——虽然中国老百姓还不明真相，但中共高层人士已知许多实情；而在中共党内也只有毛泽东一人能与此公相提并论——有着相似的政治身分，也是党老大，有着相似的执政方式，也爱搞个人专断；因此，在这个党里尤其在这个党的高层里大谈斯大林的错误，也就大有影射毛泽东的嫌疑。

1964 年底，刘少奇为说明「四清」运动的性质，曾提出一个「矛盾交叉说」：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相互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

相互交叉。(参见本书第7节)刘这一说法本身是否正确,尚可讨论;但若用来状说批判《海瑞罢官》运动的性质,倒很适合。后一运动所引发出各种矛盾也是相互「交叉」的。

就所要批判的吴晗这个人来说,既是知识分子、明史专家,又是执政党高干、北京市副市长(与中央「一线」有较多联系)。因此,大张旗鼓地批判此人,就会同时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执政党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知识子的思想言论问题,故容易使人想起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并激起一些中央大员对此所存有的不满;二是执政党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党内同志尤其党内高层同志的不同意见问题,故又容易使人想起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并触发一些中央大员对此所积有的怨气。

就所要批判的由吴晗写出的那个剧本来,其间既有所谓「退田」问题,又有所谓「平冤狱」问题。姚文元则把它们与现实中的「单干风」和「平反风」联系起来横加指责,故又触及到中共高层在「包产到户」和「甄别平反」等一系列问题上所隐有的分歧。

因此,大肆批判吴晗及其剧本,就会同时激化中共高层本已隐有的许多矛盾,就会产生一种「共振」效应。无论是毛泽东发出的冲击力,还是中央「一线」作出的反弹力,都是相当剧烈的。

## 61

由毛泽东创意设立的中央「一二线」体制是一怪异的权力运作体制:一方面,赋予「一线」可以监管全党的权力;另一方面,又赋予「二线」既可以监控「一线」也可以绕开「一线」直接过问下层事务的权力。

依据前一方面,彭真等人可以批评上海市委,可以指责它遇事为什么不请示、不汇报。依据后一方面,毛泽东也可以批评彭真等人,既可自上而下地去训斥他们,又可自下而上地去拆他们的台。依据前后两方面关系,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可以在其间投机行事,

或充当「二线」窥探「一线」的眼线，或充当「二线」整治「一线」的打手。

这种权力体制，既给这个党的中枢权力运作带来政出多门、权责不一等弊病，也以此为代价而给这个党的主席进行高层权力角逐预留下很大的回旋空间。

当中央「一线」依据他们的道理指责上海市委不讲党性背着北京方面发表姚文元文章时，「二线」毛泽东也有他的道理可说：「上海市委虽未向北京方面打过招呼，但已向本主席打过招呼；北京方面虽是『一线』，但遇重大事情还应请示我这个『二线』；你们在事发当初，不明事情原委而作出抵制举动，还情有可原，但时过数月，已明知我是此事后台却仍要追究此事责任，抓着上海市委不放，指桑骂槐，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老人家很快就凭借着这个体制所赋予他的特殊权力，以及凭借着他个人所拥有的巨大权威，对「一线」的一系列抵制活动作出一连串激烈反应。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抱怨：「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手里掌握」，「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些地方的文化批判运动还没有真正搞起来。他还点了受到北京市委庇护的「三家村」的名，并警告中宣部不要步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因犯错误而被撤销的后尘。（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407-4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239-1240。）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两次找康生谈话，另又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对北京方面作出更为严厉的批评：「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偏

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还发出警告：「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要彭真就回话杨永直事向上海市委道歉。（毛泽东，〈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1966.3.28-3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405-406。）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康生向会议传达毛近期多次讲话精神。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许多与会者也依照毛讲话精神批评彭真。会议作出两个决定：一、起草一个撤销并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5·16通知〉）；二、成立一个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4月22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强调：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地方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出，主要是党、军。他还针对〈二月提纲〉关于「有破有立」提法，说出一段后来被「革命造反派」屡屡诵读的名言：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要彻底地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241-1242。）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谈到彭真问题：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情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彭的本质已隐藏了卅多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1242；毛泽东，〈与康生同志谈话纪要（1966.3.28-3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406。）

至此，彭真的倒台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中央一线的崩溃，已成定局之势。

就在批判彭真等人的同时，军队里也掀起「阶级斗争」的波澜：一是整出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案，二是推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麋出任国防部长，同时提名罗瑞卿接替黄克诚出任总参谋长。昔日延安抗大正副校长此时又走到了一起，开始了新一轮合作关系，一轮最终未有善果的合作关系。

林彪虽为军队统帅，但长期处于半休养状况，是个病号。罗瑞卿因此而获有较多实权，不仅能够管总参谋长分内的所有事务，而且能够管国防部长该管而未能管起来的许多事务。于是，在中共军队高层内，也形成一种类似中共政治局常委会里的「一二线」关系：罗为「一线」，林为「二线」。然而，这种「一二线」关系对于那些权力意识很强的人来说，是很难处理好的。

就「一线」者来说，我既然在前面办实事，就应该拥有实权；并且，我既然还能够办更多的实事，就还应该拥有更多的实权。

就「二线」者来说，一方面放权于人，另一方面又不放心于人；一方面鼓励人好生使用权力，另一方面又不时窥视人是否僭越权力。

林罗二人都属权力意识很强的人：一个精力旺盛，什么事情都想抓起来管起来；另一个则疑心重重，总担心自己地位受到别人威胁。因此，他们不可能长期合作下去，虽于1959年秋手拉手地坐上中共军队中最显赫的两个位子，但到1961年后就开始磕磕碰碰起来了。

其间比较重要的冲突有这样两个：

一是所谓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1964年，罗在林彪过问不多的情况下，大抓了军事训练工作，抓得轰轰烈烈，抓得全军上下兴起一股大练兵大比武热潮。为此，罗获得许多中央领导的好评，但也遭到自己顶头上司的不快。林彪指责说，军事训练搞得太多，冲击了政治。罗难以接受这种指责，用词颇为尖锐地辩解道，搞政治工作应落

实到包括军事训练在内的各项具体工作中，而不能搞「空头政治」。于是，林给罗扣上了反对「突出政治」的大帽子。

二是所谓罗瑞卿想要林彪「让贤」。1964年，毛泽东发出要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指示。罗在向林汇报军队为贯彻这一指示而采取哪些措施时，讲了有些老干部应该「让贤」的话，致使后者发生猜疑。1965年12月初，林向毛告发，罗曾托已故空军司令刘亚楼向叶群捎话，希望她劝林彪好好保养身体，不要多管军队事情，而让罗去主持一切。这一告发虽在一些人看来属于「死无对证」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页268-270；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618-623。）但在毛泽东那里获得迅速反应。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林彪等人对罗瑞卿进行所谓「背靠背」揭发批判，随后削去其兵权。

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中央有关方面在北京开会，继续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前期会议对罗进行所谓「面对面」斗争，致使他不堪屈辱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未遂。后期会议对罗进行缺席批判。最后会议作出〈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将罗的问题定性为「篡军反党」。

1966年2月2日至20日，也是彭真在北京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制定〈二月提纲〉前后时间，毛夫人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做了一个会议〈纪要〉。两个会议时间相近而主旨不同：一个强调「有破有立」，对现实多有肯定；一个强调「不破不立」，对现实多有否定甚至完全否定。

〈纪要〉宣称：自建国以来，文艺界就「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19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

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

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毛泽东读至此处，感到言犹未尽，于是提笔批语：「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同志讲话选编》，页 4-5；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618-623。）

就此座谈会的形式看，很不正常。江青不是军人，却能够主持军队会议。会议也不是中央会议，却能够评判中央路线，并且一评就评出它十几年功过是非，其〈纪要〉也被当作中央文件于当年 4 月 10 日批发全党。

就此座谈会的背景看，有许多合法性依据。军队统帅林彪热情提供会议场所，党主席毛泽东也热衷担当场外指导。他们两人继整罗瑞卿后再度作出的连手进击。

前者明令总政治部，「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后者亲审〈纪要〉，看了好几遍样稿，作了十余处改动，使之成为一份直接反映他本人意图的文件、一份直接鼓动「文化大革命」的文件。

## 62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此时仍滞留南方，但事先对会议作出许多安排，并最终从会上获得他最初想获得的许多东西。

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5.16）〉，即是人们习惯上说的〈5·16 通知〉。此件在会前就已由陈伯达起草并经毛泽东反复修改而成定稿了，在会上主要是供人们

学习领会，并履行组织通过手续。

〈通知〉有三方面内容：

其一，宣布两条决定：是撤销 1966 年 2 月 12 日彭真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是「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后一决定为毛泽东亲笔所加。

其二，对〈二月提纲〉作了 10 个方面批判，指责「这个提纲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底的修正主义」。其中有 5 个方面、6 段话（最长者 480 余字）为毛亲笔改写。

其三，向全党全国发出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这一号召用语全部出自毛本人手笔，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第一段话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要搞文化批判，批判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二是要搞政治「清洗」，清洗那些「混进」党、政、军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两相比较，后者更根本些，是前者得以进行下去的必要条件。

第二段话又对第一段话中的第二层意思作进一步阐述，定性更高，用词更趋激烈。那些「混进」者们被直接说成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要来夺取我们的政权的；尤为严重的是，他们中一些人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正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成了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末了一句话后被解释为特指国家主席刘少奇。

可见，毛泽东心目中的「文化革命」，具有较多的政治清洗色彩或较多的高层权力斗争色彩。思想文化问题只是它的切入口，而政治领导权问题才是它的核心所在。

执政者毛泽东真正看重的，不是舞台上演了什么戏剧或报刊上登了什么文章，而是党政军大权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他发动意识形态领域革命，鼓励批判《海瑞罢官》，说到底是要向中央「一线」权力集团挑战，是要借文化艺术舞台上演政治夺权剧目。

当此剧第一幕结束时，老人家已一举夺下中共北京市委大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大权、中共中央宣传部大权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权，整出一个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决定，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市长职务，撤销罗瑞卿总参谋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长职务，撤销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加予彭、陆的主要罪名，是坚持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以抵制毛主席发动的文化革命；加予罗的主要罪名，是「篡军反党」；加予杨的主要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国防大学编，〈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66.5.23）〉、〈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5.24）〉、〈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

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5.16），《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24，24-25，13。）

关于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革命来解决高层权力斗争问题的真实用意，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看得最清楚，也表露得最清楚。就在〈5·16通知〉获得通过后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就此通知精神作了一个解释性讲话。他讲话没有稿子，故讲得结构松散、逻辑有些零乱，但要讲的问题都讲到了，并都讲得很有个性，很能抓住人。（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5.18）〉，《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16-23。）

他首先大讲政权的重要性：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因此，无论碰到什么千头万绪的事情，都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他接着从横与纵两个维度——世界现状与中国历史——来大讲政权斗争的严峻性。

「世界政变成风」：1960年以来，据不完整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有类似情况：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为此，林引用了许多材料，包括引用了诸如赵光义「烛影斧声」、康熙「传位十四子」等传说性东西。由于渲染过分，以致危言耸听，两千年中国史在他口中几乎成了一部政变史，一部透着血腥气与诡诈气的宫闱秘史。

林彪谈世界政变成风，谈中国历史黑幕，目的还是为了谈中国现实，谈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现况。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个文章。这是没有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搞政变要抓两个东西：一是「抓笔杆子」，造舆论；二是「抓枪杆子」，搞军队。「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正是抓了这两个东西：「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

林这些话很是惊心动魄，尤其后一段话，绘声绘色且又故弄玄虚，有意识地营造了一种神秘、紧张乃至恐怖的气氛，从而烘托出执政党

高层权力斗争的严峻性。

数年后，林彪这些讲法随着他本人受批判而被否定了，即因人而废言了。用来指责这些讲法之所以有问题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这封信据说写成于 1966 年 7 月 8 日，即林作上述讲话五十余天后；公布于 1972 年 5 月下旬，是「批林整风汇报会议」（1972.5.21-6.23）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文件。（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443。）

毛在信中评论了林的〈5·18 讲话〉，谈出了他的两点不满：一是大讲政变问题，二是大吹他毛泽东著作。

关于前者，毛是这样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这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7.8）〉，《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5 册，页 55-56。）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毛不大赞成林关于政变的说法，但难以看出毛坚决反对林这些讲法，更难以看出毛之所以反对林这些讲法的充足理由是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毛提出了什么反对理由的话，那也只是认为林这些讲法与众不同，太特别了。

就内容来看，林的讲话应该说已经摸到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意，即要解决中共高层内的领导权问题，要搞掉中央「一线」上的刘少奇等人。林的讲话应该说抓住了〈5·16 通知〉——特别是它的第三部分——的精神实质。

就形式来看，林的讲话又太有他个人的特点，总是爱用他「自己的习惯语言」来谈领导权问题，谈得过于直露、过于渲染，以致将执政党高层权力斗争谈得赤裸裸且惊心动魄，谈得连毛泽东这位事主都感到诧异、都感到不自在。

林彪之所以采取如此讲法，似与他的军人出身有关。无庸讳言，林曾

是一位优秀将领，拥有许多军事天赋，如善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迅速且准确选定主攻方向，并坚决地予以突击。例如，在林创制的诸多战略战术中，最为林本人看重的，要数「一点两面」。（林彪，〈在军事干部会议上的结论（1947.2）〉、〈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1947.4.19）〉、〈战役指挥问题（1947.9.30）〉，《林彪文选》，上册，页 131-163，167-177。）该战术大意为：在一攻势作战中，应集中己方最强劲的力量向着敌方最薄弱的「一点」实施突然攻击，同时部署己方的所有助攻力量在敌方的「两面」或多面朝该点作求心攻击，以最终歼灭该敌。

在「一点两面」战术内，又最为林本人看重的，要数「一点」。其间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要正确地选出这「一点」，二是要断然地突击这「一点」，对之「猛打、猛冲、猛追」（即「三猛战术」），敢于「刺刀见红」。

当这种军事行为方式被运用于政治斗争时，若仅从策略上看有长处有短处：长处在于十分讲求打击目标的明晰性，尽可能迅速且准确地弄清自己所要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谁，所要突破的关键点在哪里；短处则在于不大顾及打击方式的掩饰性，以致在意图的表达上和在手段的选择上都近乎是赤裸裸的。这长短处在林彪〈5·18 讲话〉中都表现得很充分。其话语十分明快，能够准确地抓住问题的实质，抓住毛心底里的意图：但也过于直露，竟将一向被大幕覆盖着的执政党高层内的「很多鬼事、鬼现象」都给抖搂出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官方传媒上被宣传说具有反修防修永葆革命本色的崇高目的；在林彪讲话里则被还原为这样一件事——不过是中南海宫廷斗争向外并向下的一种延伸而已。

政治与战争虽有联系，但确有不同。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虽是政治的继续，但只是政治的一种特殊样态的继续。（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 1 卷（中译本），页 43-44。）战争直接诉诸力量，要求以最断然的方式解决问题。政治尤其是那种很注意向老百姓作宣传的政治，除了要凭一定实力外，还要务许多「虚」事，或铺陈造势，或遮遮掩

掩。

林彪在其 5 月 18 讲讲话中，还嘲笑了一种人：「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甚么是中心，甚么是主次。」这一嘲笑可以看作是某些军事家对某些政治家的嘲笑，嘲笑他们过多地注意了次要方面而忽略主要方面。

军事家开起战来可以不顾及那些坛坛罐罐的东西，一个劲地向对方要害处狂砸猛打。政治家做起事来则常要顾忌许多枝枝节节的事情，有时还要人为地制造一些枝枝节节的事情。这如同读书，由于处处在意，就不免圈圈点点，甚至在已经抓住文章中心大意后还要再画一些条条杠杠。

林彪说到底是将军而非政客。他要么不做事，要做就做到极致上；要么不说话，要说就说到要害上，说到执政党最高权力究竟由谁来执掌这一核心问题上。

## 63

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意图，是要解决本党高层中的领导权问题，是要搞掉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当权派。

那么，毛泽东为实现这一意图而采取什么方法呢？

基本方法就是搞群众运动，发动群众起来整他们的领导以及他们的领导的领导。所谓「搞群众运动」，有两个基本环节：

一是自上而下地「运动群众」。一些执政党领导人运用各种方式，包括合乎组织程序的正常方式与不合乎组织程序的非正常方式，将群众鼓动起来，使他们充满激情，跃跃欲试，随时准备去做鼓动者要他们去做的任何事情。二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受到鼓动的群众纷纷起而「犯上」，冲击那些一直管束他们的领导干部，冲击那总在约束他们的规章制度。

不过，被鼓动起来的群众，既有按上面的要求来行事的一面，也有按自己的理解来行事的一面。与此相应，这一群众运动既有按预定部署进行的可能，也有以失控形式或近乎失控形式进行的可能，不仅会冲击鼓动者要求他们去冲击的人和事，而且会冲击鼓动者没让他们去冲击的人和事，甚至会冲击鼓动者本人。

在整党内「走资派」问题上，毛泽东之所以采取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事方面的原因。

前文在分析「四清」运动的体制性原因时曾指出，执政党实行一种姑且称为「一元化领导」的权力运作体制，其内部只存在单一渠道的纵向监控关系，而缺乏分权性的横向制约机制。当其上级权力机构——不论是「四清」时由刘少奇领衔的「一线中央」，还是「文革」时由毛泽东挂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想要有效地整肃下级权力机构时，就会因遭遇体制性困境而另辟途径（参见本书第 48 节）：

当上级想要了解下级的实情时，尤其是想要了解下级不听上级话而「犯错误」的实情时，就不能只是采用这个体制本身所提供的常规方式——由下级自己提供有关自己情况的方式，而应加以采用某些体制外的非常规方式，如由上级派人越过下级而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去搞「扎根串联」，动员群众大胆揭发他们的领导，有什么说什么。

当真的揭发出许多问题来时，还要动员群众起而斗争他们的领导，写大字报，开批判会，甚至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这已是在搞运动了。

此次运动所要整治的主要对象是十分特殊的，是以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军高层人物。

这些人物既拥有很高的声望又掌有很大的实权。他们大都经历过出生入死的革命，做出过不同凡响的业绩，并被大众传媒广为宣传。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当权派，其中一些人还是「中央一线」大员，并构成了中共高层中的多数派，占据着中央机构里的大部分关键性岗位。

显然，要整治这些特殊人物——准确说是特殊人物群体，也必须采取某种相应的特殊方法，某种能够对症下药的特殊方法。为此，毛泽东选择了群众运动方法。

群众运动无疑具有这样的功能，即能有效地消解这些特殊人物所拥有的上述两大优势：声望与实权。因为，群众运动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打着某种「民意」的旗号，即有着某种天然的权威，某种高于其它权威的权威，从而使其鼓动者可以借此来否定政敌的权威，或是贬损他们在老百姓心中已享有的权威——声望，或是侵夺他们在现任要职上已拥有的权威——实权。

最明显不过的道理就是，用群众运动方式尤其是用全国性群众运动方式来整治某些人，也就是将这些人置于一种「千夫所指」的地步、一种「国人皆可骂」的地步，故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搞臭他们，进而清除他们所曾拥有的政治影响力。

另外，群众运动常常情绪化，常常带有报复性色彩。在一个非民主化社会中，所谓「群众」大都生活在社会的下层，长期苦熬于受压抑的境地。当他们一旦能够起来批判别人时，尤其能够起来批判那些曾严厉管束过他们的人时，就很可能要向那些人宣泄他们以往的积怨，很可指着那些人的鼻子说：你小子怎么也有今天这熊样？！

其中，一些过激分子还会将他们怨愤的情绪化为过火的行动，不择手段地羞辱乃至摧残他们的批判对象，既搞政治批判，又搞人身攻击——漫画其生理特征，公诸其个人隐私；既搞文斗，又搞武斗——殴打、捆绑、「坐喷气式」。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尤为突出。许多曾经是很了不起的大人物，至少曾经看起来像是很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旦上了「革命群众」的批斗会，个个蓬头垢面，威风尽失。

群众运动作为一种权威资源，还可被其鼓动者用来进行高层权力斗争。

当时在执政党中央里，由于大多数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持消极态度，持不理解不紧跟态度，致使毛泽东还不能稳居优势的地位，还存在权威资源匮乏的问题。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老人家除了继续在高层内做说服工作以争取更多人支持外，还转而在高层外去开发新的权威资源，去发动他的群众运动，打起「广大群众要求」即「民意」的旗号，藉以强化自己在高层中的地位，同时向那些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人发出警告：若不改弦更张就会被戴上「与人民群众为敌」的帽子。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的主张受到许多中央委员的冷遇，用他自己的话说：「通过争论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利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1967.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498。）面对这一形势，毛只好到高层外去寻求支持、去搬兵，以弥补他在高层内已显匮乏的权威资源。

结果让兵搬来了「红卫兵」，搬来了「革命造反派」。

8月1日，即全会正式开幕的第一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当日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并附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分大字报；8月7日，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称〈十六条〉）获得通过的前一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此前写出的那张大字报；8月10日，即〈十六条〉公开发表后的第二天，老人家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对在场群众讲了一段传遍全国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另外，会议还请来了包括聂元梓在内的首都高校「革命师生」代表，让这些虎视眈眈的「革命小将」坐那些惶惶不安的中央大员身

旁，列席会议全过程。

老人家通过这些举动向中央表明，搞「文化大革命」，不是他毛泽东的个人行为，而是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一，革命群众是支持搞这场革命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两张大字报标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另一是「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明确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要「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聂元梓等，〈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1966.5.25）〉，《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

其二，他毛泽东也是支持革命群众的，是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他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作出表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8.1）〉，《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62。）他还自己的那张大字报里发出盛赞：北大的那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

正是借助群众运动所具有的那种天然权威，毛泽东在得不到许多中央大员积极支持的情况下，不仅没有作出政治退却，反而强化了他个人在中央里的权力地位，使他能够在此次会议上由「二线」重返「一线」。「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150。〉）

7月29日，正值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进行期间，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李雪峰在会上宣布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均与会

讲话，承认「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承认自己已有些跟不上形势了。毛泽东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没有公开露面，只是隐身坐于幕后。当最后一个发言人话音落下时，大幕豁然敞开：老人家闪身出现在台前，向革命小将频频挥手：全场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声经久不息。

这是戏剧性的一幕，但上演了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并蕴涵着一个很确切喻义：毛泽东作为一个很富有表演才能的政治家，在人民大会堂里由幕后走上前台，隐喻着他本人在执政党高层中从「二线」重返「一线」，再度统揽中央大权。

不过，话说回来，毛泽东最初划分一线与二线时，就没有将这两条线划得很开、分得很清；而只是在其间拉上一层帷幕，不掀开它便有一线与二线之分，掀开它二线也就变成一线、后台也是前台。

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种由掌权者自己为自己设计权力运作体制的做法有很大弊病，是许多恶政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做法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要制约掌权者的统治，而是为了要方便掌权者的统治，使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毛泽东创设所谓「一二线体制」，就为了使自己能够在执政党高层权力格局中处于进退自如境地，能够在自己所划分的一线与二线之间很方便地进进出出，进可抵于一线，退可守于二线。

毛泽东在世时，按自己的需要创设了一套权力运作体制。邓小平复出后，也按自己的需要创设了一套权力运作体制，以保证自己虽不具有第一执政的名分却能掌有第一执政的实权。邓小平逝世后，其继任者是否也想按自己的需要创设一套权力运作体制？是否也想在中央机构里拆拆建建以使自己统治起来更方便些？

但愿执政党中央的权力运作体制，在其政治强人纷纷谢世后，不要再像裁缝铺里的那些布料一样，只是根据不同执政者的高矮胖瘦来裁剪拼接；而应像公民守则一样，不论张三李四都要依此行事。

执政党中央权力机构的创制权，不应归执政者个人或少数政治寡

头所拥有，而应归公议机关——或公民代表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所拥有。当然，这里所说的公议机关，不是那种橡皮图章、那种只会为执政举手的表决机器；而是这样一种机关：不仅是能给执政者划定运作范围的权力机关，而且是能对执政者进行质询盘诘——就像老师讯问有过作弊记录的学生一样——的督察机关。

需要说明，毛泽东在作一二线进退时，并不是赤裸裸的，还讲了一点行事的名义，还设法为自己何以要退又何以要进找出一些理由。他当初退了下来的名义是：「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想让其它一些同志「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5 册，页 150。〉）他后来转而又进的名义是：中央一线同志已无法领导正迅猛发展着的文化大革命了，故需要本主席亲自出来驾驭这场群众运动。

1958 年，老人家推开周恩来陈云等人而跑上前台，亲自挂帅搞「大跃进」；时隔八年，他又推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而再度跑上前台，亲自挂帅搞「文化大革命」。两次挂帅，搞的内容很不相同，一是经济建设，一是政治斗争；但搞的形式很是相似，都打着群众运动的旗号，都借着群众运动所具有的那种近乎天然的权威性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地位。

在执政党中央里，老人家一旦身旁冷落、帅旗下人马无多时，就会跑到中央外去招募新勇、扩编队伍以增自家军威。他此次招募新勇，招来了一群青年学生、一批儿童团、一帮成熟不足而活力有余的躁动者。靠这些人来打开局面，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声势是能够造起来的，至少在初始阶段造起一派蓬蓬勃勃的气象来。

## 64

〈5·16 通知〉发表，掀起了第一波「红卫兵」运动，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大中城市里的部分大中学校。〈十六条〉发表，又掀起了第二

波也是更大的一波「红卫兵」运动，其影响已波及全国各地各行业。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为躁动也最显真情的一幕。

1966年5月25日，即〈5·16通知〉公开发表后的第九天，亦即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

当时，宋硕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佩云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和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列数他们的种种「错误言论」，指责他们对抗毛主席的路线，打着「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的旗号，「制造种种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致使北大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

深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意图的康生，是这张大字报的幕后主事者。（林浩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么出笼的〉，《北京日报》，1981年1月9日。）事前，他派夫人曹轶欧率调查组进入北大，名义上代表中央理论组下来了解情况，实际上搞「扎根串连」：避开北大校方，先找出一些像聂元梓这类敢做出头鸟的「根子」，并把他们串连起来，再鼓动他们站出来，公开反对北大党委以及北京市委。事后，他避开中央一线，将大字报底稿密报正在杭州的老人家。

6月1日，即聂元梓等贴出大字报后的第八天，毛泽东读到了它的底稿，立刻责成北京方面予以广播和刊载。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登载这张大字报，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在「欢呼」之余，还发出这样的号召：「凡是反对毛主席的人，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把他们打倒。」这已是半明半暗地将群众运动这把火烧向执政党高层。

北大大字报广播后，全国震动，许多大中学校纷纷响应，一时间「大字报满天飞（毛泽东语）」。（毛泽东，〈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2.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493。）西安交通大学 6 月 2 日一天就贴出一万余张大字报。大字报锋芒所指，主要集中在两类人身上：一是学校领导，即所谓「形形色色的陆平和彭佩云」；二是专家学者，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有点类似「四清运动」所要整治的两类对象：一是党内「四不清干部」，二是党外「四类分子」。

在要不要打倒前者问题上，出现很大分歧，并因此而形成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是主张予以打倒的「造反派」，一是反对予以打倒的「保守派」。

至于要不要整治后者，则没有多少分歧。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在批斗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学者、名教授、名作家的问题上，都是不遗余力的。即使在那些后来也被打倒的举校领导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积极领导过或参与过对后者的整治，有意无意地把这场突如其来大火从自己身边引开，引向那些既无任何党派庇护又无自我保护能力的知识分子身上。

毛泽东在〈5·16 通知〉中亲笔写上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话，发出要整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号召，致使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他们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几乎所有「学术权威」都受到严厉批判，其中一些人还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被罚站、被罚跪，任人打骂、任人羞辱。

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来羞辱知识分子，尤其可以来羞辱大知识分子。心术不正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目不识丁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愚蠢」的口号，甚至知识分子自己也整起自己来：变节型知识分子整执着型知识分子，流氓型知识分子整君子型知识分子，贫学习型知识分子整富学习型知识分子……正如「大右派」罗隆基说的，

小知识分子整大知识分子。

如此整治「学术权威」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一大批像傅雷、老舍这类既有造诣又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因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1966年夏秋期间，北京什刹海四周常常围拢起一圈又一圈的人群，围观着一具又一具从湖水里打捞上来的自尽者尸体。

北京一所大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笔者，在整「反动学术权威」最厉害的那段时间里，就有好几位教授先生从正对着他家的一幢高楼上跳下来。他亲眼目睹这些学术名流尸横水泥地面的惨状和尸体旁的标语：

「XXX 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有一位文化人在其文章中谈到，较诸东洋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古代中国文人自杀的事，除了前有屈原投江、尾有王国维沉湖、中间冒出个李贽自裁外，还鲜有其例。（李洁非，〈自杀与被杀〉，《中华读书报》，1996年10月16日。）不知这位作者后来有没有把文章接着做下去，谈一谈现代中国文人自杀的事。若是谈的话，似应得出与他先前说法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这几十年中，中国文人尤其中国精英文人自杀的事，就不是什么「实例的匮乏」了，而是实例狂涌，数不胜数。

学友间相谈过，若将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自杀情况作一认真统计，其运作无疑是工程浩大的，其结论也无疑是骇人听闻的。若再将这种非战争状况下的知识分子自杀情况作一纵横比较，其结果也一定是令人震惊的：纵比，肯定冠盖中国历史；横比，也很可能冠盖东洋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老人家在此问题上又放了一颗「卫星」。

以往中国文人在遭遇劫难时，尚有些去处可躲避，借用那位文化人所引述的话说：「入而儒，隐而道，逃而佛」，即可躲于山林，避于庙观。当蒙古铁骑纵横中原时，那些不从「鞑子」的读书人，只要穿道袍，多半可安下身来。又当满清八旗入主北京后，那些誓不降清的士大夫只要遁入佛门，也多半可消灾避祸。

可到了「文革」时，那些不合时宜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往哪里躲呢？哪里都有「造反派」，哪里都有「公检法」。不要说外面的尘世之人想往庙里观里躲，就连庙里观里的脱俗之人也要被拖出来羞辱一番。有一幅照片拍下了当年一幕真实景象：许多满脸愁容的和尚被排列在哈尔滨「极乐寺」庙门前「示众」，其中几人还拉着大标语，上面写有八个大字：「什么佛经，尽放狗屁」。（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插页）

不过，在毛所要搞的这场革命中，批「反动学术权威」、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只是前奏曲，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才是重头戏。正如毛在指导「四清」运动时所说的，「先搞豺狼，后搞狐狸」，重在整「当权派」。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重在整学校里的当权派。继北京大学整出陆平校长后，南京大学整出匡亚明校长，上海音乐学院整出贺绿汀院长……

冲击学校当权派造成两方面后果：

其一、学校秩序持续恶化。学校中的主要领导人被贴上许许多多大字报，被从各个方面加以批判乃至丑化。这就使得他们在群众眼里成了一些很可疑、很不值得尊敬的人；同时使得他们所掌管的那些曾能有效监控校园的职能部门发生瘫痪。于是，整个学校开始出现各种无政府主义现象。

其二、批判矛头继续上指。在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内，学校里的当权派只是执政党既定政策的执行者。当对学校领导的批判一旦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时，一旦追究起他们之所以要如此行事的根子来，就会将矛头进一步指向这些学校领导的领导，指向高教部、书记处、中央一线。

面对如此形势，中央一线迅速作出向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决定，同时还作出「八条规定」，即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不要在校外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

代》，页 34。）

关于中央一线为何要派出工作组、为何要制定各种限制性规定这一问题，以往人们多是从消极方面去理解，即认为主要是为了避免混乱、为了维护校园秩序，也就是为了应对上述种后果。（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34。）

这种说法虽有助于渲染中央一线的善意以及因此而受到的委曲，但也低估了中央一线的作为。事实上，人们还可以从积极方面来理解，即中央一线之所以如此行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想主动且有效地控制乃至遏制这场运动，以防止它搞过了头、搞到它不该搞到的地方——中央一线。这种努力可以看作是对上述第二种后果的一种反弹、一种非常积极的反弹。

正是出于这一积极方面考虑，就不难理解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不是仅做「维持会」工作，而是积极干预运动，甚至想扭转运动方向；就不难理解工作组本想阻止整人可结果自己也整起人来，并且整得有些过分，以致整出一些人命来。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造反派乱斗干部教师事件。工作组立即予以制止，并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予以谴责，随后将处理此事过程写进《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6月20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批准转发这一简报。中央批语称：「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1966.6.20）》，《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49。）

6月21日，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掌握在工作组手里的学校大权，如果代表我们则要拥护，如果不代表我们则要夺过来。当日，工作组成员王光美尖锐指出：蒯大富要夺权。6月24日，工作组组长叶林郑重宣布：蒯大富向工作组夺权是一种反革命行为。6月26日，许多师生员工在校园举行游行示威，支

持工作组。在此前后时间里，刘少奇和薄一波都向工作组发出反击指令。于是，清华园里掀起了「反蒯斗争」，掀起了围剿造反派运动，致使蒯本人被开除团籍并被关押 18 天，致使另一人因不堪批斗而自杀身亡。

外省高校也出现类似情况。6 月 6 日，西安交通大学一部分学生试图赶走工作组，并贴出大字报批评陕西省委。当天，工作组在中共西北局支持下作出反击决定。7 日、8 日、9 日接连三天，全校各系频频召开批斗会，批斗所谓「闹事的尖子」，并将其代表人物李世英戴高帽子游校，致使他于 9 日中午愤而自杀，未遂。

经过工作组一番「反击」，造反派势头被遏制住了。约在 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这段时间里，学校秩序有所恢复，重大事端鲜有发生，中央一线基本上控制了局势。

必须承认，刘少奇是一个很有党性且很为干练的党务工作者，在处理那些他认为是犯了错误的人时，是很坚决的，也是很有办法的。不过，他的处理方式大都偏于严厉，用彭德怀将军曾评论他的话说，有些「左」。他以往在「延安整风」、「解放区土改」、「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运动中都有过这方面表现，都有过「扩大化」问题。

然而，此次与以往有很大相同：以往他所要整的人，多是他的上司毛泽东授权他去整的人，即使整得过激了些、超出了授权者预期，也至多被批评一下；此次他所要整的人，竟是他的上司毛泽东唆使着来反对他的人。他不经意而撞到了正搜寻着自己的枪口上，打了几十年猎物，打到末了打得自己竟也成了被打的猎物。

## 65

对于中央一线的反击，毛泽东很快予以反击，即对反击的反击。

7 月 18 日，老人家从武汉回到了北京。他在听取各方面汇报后发

了一番感慨：「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只有北洋军阀！」他接着批评道：「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给群众运动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纳入邪轨』。」（毛泽东，〈对中央首长的讲话（1966.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438-440；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46。）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再次批评刘少奇等人，作出从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知。

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每年中共中央至少召开两次全会。可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三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没有召开一次全会。

一般说来，中央全会上所要讨论的许多议题，理应是多数中央委员所已从事的主要工作。就这几年而言，多数中央委员即中央一线已从事的主要工作，正是在想方设法地恢复被毛领导的「大跃进」搞垮了的国民经济，对之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显然，召开这种由一线唱主角并唱出那番台词的会议，对于那位已退居二线却很好抢戏并死不认错的老人家来说，不会是一件很惬意的事。

老人家不在一线就不愿召开中央全会，回到一线就急着要召开中央全会，急着要藉此会议改变党的工作重心，清算此前的中央一线工作，确认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任务。

7月24日发开会通知，7月27日开预备会议，8月1日开正式会议。8月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批评中央一线：（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2-53。）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说的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

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

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北大聂元梓等 7 人的大字报，是 1960 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当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 月 5 日，毛泽东写出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再次严厉批评中央一线：「可是在 50 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8.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420-421。）

从这些批评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领导的中央一线是很为不满的，甚至是深为憎恶的，竟将他们与满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均是中共政治教科书中的大奸大恶者——相提并论，指责他们「镇压学生运动」、「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既揭了他们在「五十多天里」所犯的错误，也揭了他们在「1962 年」和「1964 年」所犯的错误；并将这些错误定性为「路线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假马克思主义的，甚至将他们本人侮称为「牛鬼蛇神」。

这张大字报是他晚年难得写出的几篇政论文章之一。在此文中，

已没有诸如「因为……，所以……」之类的分析性陈述，或「假如……，那么……」；之类的推理性陈述。只有许多不容讨论的断言，左扣一个大帽子，右扣一个大帽子，最后还来了一句「又何其毒也！」红卫兵大批判言辞跃然纸上。正像该文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整个文章的水准也就止于一张「大字报」——一种用政治术语泼骂大街的文体——的水准。

若从行文伤看，人们很难相信写这张大字报的人曾写过像「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那样的佳作。毛泽东老了，已在文思才情方面严重退化了，可是，他还不服老，还要再文化思想领域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不过，老人家有一点很好，就是在写不写文章上是有气度的，也是很骄傲的。自己写不来，就不写或不多写，也并不让别人代写——很可能不相信自己身边那些人有代自己捉刀的能力，而宁愿发那种三言两语但确由自己亲口说出的「语录」，以作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相形之下，另一些领导人就显得气度不够了。当他们已很难亲笔写文章而又很想发文章时，便采用了这样一种写作程序：其一，由自己出个题目，大大咧咧讲上一番话；其二，让自己秘书班子找一僻静处去细细琢磨，先是整理首长思想，将那东一句话西一句话归拢起来，接着谋篇布局，最后码字成文；其三，将文章署上自己名字，或发于中央报刊，或收入自家文选。结果造成了中共文献史上的一种有趣景观：该党头号文章高手不到七十岁就很少发表文章了，而文才远逊于他的后来者过了七、八十岁还在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大作。

这种官场文风也影响了学界文风。如今一些所谓「学术名流」也照此办法行事，先让弟子代笔成文，后把自己名字签在一连串名字最前面，以科研项目负责人自居，甚至把自己名字签成唯一作者，仅在后记中表示感谢某某学生为本文提供过某些参考资料。学界似也成了先生为首长弟子是秘书的官场。略有不同，这种文风在官场仅为不甚高雅，在学界则属腐败现象。

八届十一中全会破有立：（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 435-438。）

破，主要是中央一线工作受责难并致使中央一二线制度被取消；

立，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获通过。

关于运动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十六条〉将其概括为：「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后来人们将此任务简称为：「一斗二批三改」。而运动所要依靠的主要力量，〈十六条〉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运动所要采取的主要方法，〈十六条〉指出：「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十六条〉还特别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在复述〈二十三条〉已说过的话。不过，先前主要整的是执政党基层中的当权派，此次主要整的是执政党高层中的当权派，主要整的是先前整人的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破与立，还体现在中央领导层人事变动上。在中央常委会内，刘少奇由排名第二降至第八，林彪由排名第六升为第二即坐上了「副统帅」位子，周恩来排名第三未动，邓小平由排名第

七进至第六，朱德由排名第四退至第九，陈云由排名第五降至第十一即倒数第一；另外新增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分别排名第四、第五、第七、第十。在新增者中，陈伯达、康生主要从事理论宣传工作，较早参与毛泽东策划「文革」活动，属老人家圈内的人；陶铸来自中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上，属较有影响的地方长官；李富春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属周恩来系统的人。在中央政治局层面上补进六名成员，除上面提到的陶铸、陈伯达、康生外，还有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后三人均为军方要人，在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分别名列第八、第九、第十。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闭幕会，文化大革命正副统帅都讲话。毛提出要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九大」，并谈到此次会议所作决定还有待「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贯彻执行。他还谈到：「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66.8.1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421-423。）

林彪总结道：「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今天，又在会议上同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林彪，〈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66.8.1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82。）

事实发展印证了林彪这一评价。正是通过毛泽东主持召开此次会议，文化大革命又获转机，由近乎停顿到再度进击——红卫兵狂潮，一波刚落，一波又起，一波比一波，起得更为高涨，起得更为汹涌。

8月18日，即八届一中全会闭幕后第六天，亦即为贯彻全会精神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8月13-23日）进行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由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会议参加者多达百万，会议主角只有两个：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像生龙活虎一样，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城楼两侧东西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维持秩序。

大会上的这两个主角通过一个戏剧性情节而溶为一体：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踮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新华社1966年8月18日讯，〈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此时此地，毛泽东穿戴这身红与绿装束颇具政治象征意义：

「红袖章」，象征着他在这场运动中所使用的突击力量，即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的造反派；「绿军装」，象征着他在这场运动中所凭恃的依托力量，即由其「亲密战友」林彪直接指挥的解放军。前者多为体制外力量，为他冲锋陷阵；后者则属体制内力量，为他压住阵脚。

最初，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把文化大革命这把烈火烧了起来，烧得全国红通通，就是靠这两大力量齐心协力。后来，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将文化大革命蓬勃势头维持下去，不能阻止这场运动陷入持久内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所依靠的这两支力量各自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以及这两支力量相互之间发生剧烈冲突。末了，老人家既不穿「绿军装」也不戴「红袖章」，只着一身色调灰灰的「毛式制服」。

此外，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还借助了一支后勤保障力量，即由周恩来总理领衔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周恩来任劳任怨地替他照着政府部门诸多日常事务，维持着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至少不让它完全停下来；另外还不时为前方正开展着的「文化大革命」输送各种给养，「文革」初期为许多来京串连者送粮、送药、送车票。在广场上，红卫兵们还只是用言辞表示他们「什么也不怕」：走出广场，他们就立刻用行动表明他们什么都敢做。

自8月20日起，首都红卫兵们纷纷涌上街头，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他们到处更改名称，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更名为「红卫兵战校」，将「长安街」更名为「东方红大路」，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更名为「反修路」，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的「协和医院」更名为「反帝医院」，将「全聚德烤鸭店」更名为「北京烤鸭店」——因为，「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新华社1966年8月22日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其它城市也效仿北京行事。上海将《新民晚报》改为《上海晚报》，天津将「劝业场」改为「人民商场」，成都将「陈麻婆豆腐」改为「麻辣豆腐」，无锡则将「东林小学」改为「红卫兵小学」——因为原校名「是以明代东林党人聚集讲学的东林书院所在地而得名的，全校革命师生认为决不能再让这些反动文人沾污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新华社1966年8月26日讯，〈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7日。)

红卫兵还将人们穿着打扮从头到脚地管起来：不许理「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不许穿「牛仔裤」、「牛仔衫」和各种港式衣裙，不许穿「火箭鞋」和各种高跟鞋皮鞋……如有违抗禁令者，就会受到「革命小将」惩处，就会被当街或理去头发、或拔掉鞋跟、或剪破衣服。当然其间也不乏有一些建设性提议：「火箭鞋」可以削去鞋头改为凉鞋，高跟鞋可以改为平底鞋，「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部分可做补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52。)

红卫兵管人们的穿着还管到了警察的身上。北京女十五中学红卫兵指责现行警察服装是学习苏联的，要求予以更换。由谢富治主事的警方迅速作出肯定性反应，并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发出消息：中国人民警察服装改革事宜，已经国务院批准，数月后在全国开始执行。(新华社1966年8月27日讯，〈中国人民警察服装实行改革〉，《人民日报》，1966年8月28日。)红卫兵「锐利的眼睛」(《人民日报》社论语)，还盯到了孙中山先生遗孀宋庆龄的长发上，向她发出必须予以剪短的书信警告。这位女子可不像警察那样好说话，说让换装就忙不迭地换装，而是拒绝这一要求，表示她要遵守其母临终时要求她不剪短发的遗训。(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65。)

各民主党派，本来就被认作资产阶级政党，此次自是被排入「四旧」之列，免不了又要像他们在1957年那样成为运动的对象。他们此次尽管未能像执政党里的「走资派」那样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但处境要比以往恶劣得多。他们如今不只是遭遇以往曾遭遇过的那种口诛笔伐式的批判，还遭遇以往未曾遭遇过的那种极为羞辱人格的「批斗」。他们被强拉到大庭广众之处，低头弯腰，脖子上挂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有他们名字，名字上还打了红叉叉。所有在场群众都可以骂他们，打他们，向他们吐唾沫。

尤为严峻的是，各民主党派能不能存在都成了问题。一些红卫兵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七十二小时内予以解散并登报声明。结果还未到七十二小时，各民主党派就都惶恐不安地贴出内容相近的「通告」，表示接受红卫兵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并报请中共中央处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70-71。）

各种宗教，本来就被执政党教科书宣布为「麻醉人民的鸦片」，此次就更是在劫难逃了。佛教寺院均被红卫兵扫了「四旧」，菩萨被推倒，僧侣被揪斗，许多和尚尼姑还被强行还俗。一时间，偌大中国竟找不到一处可以公开焚香拜佛的庙堂。在该教中国化后千余年历史中，恐怕只有公元 844 年「唐武宗毁佛」事件才能够与此次劫难相比。天主教教堂和基督教教堂也都受到红卫兵查抄。这两个教中的许多神父、牧师以及修女，被指控为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派到中国从事文化侵略活动的阴谋分子，若是洋人则被递解出境，若是国人则被监管起来。教堂各种设施均遭破坏，圣坛被捣毁，条椅被砸烂，基督受难雕像也被焚烧，致使这位西域圣人在遭受罗马总督的十字架刑后，受中国红卫兵的火刑。伊斯兰教也难逃劫运。即使在该教势力十分强大的新疆地区，红卫兵也敢于并能够闯进清真寺，围斗阿訇，焚烧古兰经。历来富有战斗精神的穆斯林们此时也只能垂手立于一旁，至多暗地里咬牙切齿。因此可以说，红卫兵运动的狂热超过一切宗教的狂热，尽管其持续时间很短。

公民的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是每部现代法律所要保护的最重要目标，但在「破四旧」中都成了可随意侵犯的对象。「抄家风」和「打人风」，是红卫兵运动中最具有反文明性质的两股恶风。

在这一运动中，仅北京市就有 33,695 户被抄家，被抄走黄金 10,313 两，白银 345,212 两，现金 55,459,919 元，文物 613,618 件；全国被抄走黄金 119.8 万两，白银 1,200 万两，银元 979 万块，美元 356 万元，其它外币 374 万元，金银器 1,719 万件，文物 1 亿件，书籍 525 万册。（陈明显、罗正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中国青年社，1994 年），

页 135-136。)红卫兵除了抄走贵重物品外，还抄走日常生活用品，包括家具、被褥、衣服、鞋袜、毛巾，甚至抄走房屋，致使被抄人家无以生计，苦不堪言。

这实质上是又一场全国性的剥夺运动，一场经最高当局默许而由青年学生实施、劫富不济贫的剥夺运动。剥夺的重点，是那些从旧中国保留下来的尚有些家底的有产阶级（民族资本家）和知识阶级（资深专家学者）。通过这次剥夺，大陆中国人在财富上又进一步平均化了。除了中南海里那位至少拥有数十万元稿费的老人家外，大家都没有多少积蓄了，都成为无产阶级了。

红卫兵在向旧世界宣战中，不仅口诛笔伐，而且拳脚相加，显示出强烈的暴力倾向。他们打了许多人，其中有「反动学术权威」、「四类分子」、「走资派」，以及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红卫兵。他们打人方式很激烈，除了公开在批斗会上挥舞皮带暴打那些挂黑牌子的人外，还私设牢房，用酷刑折磨那些他们认为是有问题的人。

北京第六中学一些红卫兵曾私设一个所谓「劳改所」，用以关押所谓「黑七类」、「狗崽子」、「混蛋」，并对他们施以「跪煤渣」、「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剃屁股」、「开水洗澡」等酷刑，还用被拷打者鲜血在「审讯室」墙壁上写出一幅红通通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每一个字均有拳头大小。他们在这个「劳改所」里先后打残数十人，打死数人。（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 74-77。）

北京地区在「破四旧」运动前后时间里，有 1,600 余人被打死，其中大兴县在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六天时间里，有 325 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打死，其中年纪最大者 80 岁，年纪最小者 38 天，全家被杀绝者 22 户。（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69-70。）

诚然，并不是每个红卫兵都参与过抄家打人的事，故不应让所有红卫兵为此承担责任，甚至不应让他们中的那些确实参与过这些事的

人为此承担主要责任；但这些过激行为毕竟属于红卫兵运动的一个部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部分。

在红卫兵狂潮中，「破四旧」是一大波澜，「大串连」是另一大波澜，另一将红卫兵潮水激得四下飞溅的大波澜。

在伟大领袖赞许下，千百万青年学生坐车不要票，吃饭不要钱，既可到首都北京去瞻仰他们的红司令尊容，又可到其它省市去援手他们的红卫兵战友，同时还可一路观光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各地的风物名胜。

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一些学生，特别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或家庭出身不好、或生性不喜政治——而处于运动边缘的学生，将革命串连与旅行观光弄了个本末倒置，对爬山逛大城市的兴趣比对喊口号写大字报的兴趣大多了。他们十分珍惜伟大领袖向他们提供的这一免费旅游机会，北上南下，东来西去，风尘仆仆地跑了半个中国。在他们随身携带的地图上，一条不断标出的旅行线路将许许多多地名「串连」起来了。狂热躁动的红卫兵运动竟也夹杂一些悠然闲适的情调。

毛泽东之所以要支持红卫兵「大串连」，也与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所遭遇的体制性困境有关。

由于中共实行一党专政体制，已将社会中一切异己力量或消除——完全予以取缔、或消化——完全为我控制；因而当毛泽东决意要整治自家执政党时，就不可能从这个体制外找到某些可资利用的政治力量，而只能够从这个体制内策反出一些不安于现状且又敢于做「出头鸟」的人——大多是一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但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鼓动他们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反对他们所在的这个体制。

这些被策动起来造反的人，最初处境都很困难，一是处于较分散状态，二是处于少数派地位。

他们若要改变这种处境，就必须相互串连，一来可以抱团结社，

拉起队伍，成立各种形式的红卫兵组织；二来可以使不同学校的造反派相互援手，从而改变这些学校中所存在着的十分不利于造反派的力量对比状况。

在运动初始阶段，各校保守派学生接受本校党委约束而固守本校，各校造反派学生则受中央文革小组鼓动而频频穿行在各校之间。

就在这一静一动之间，各校的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力量对比状况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变化。在每个学校里，人们所看到的保守派学生，基本上都是本校学生；人们所看到的造反派学生，除了有本校学生外，还有许多来自其它学校的学生。后者正是通过这种串连、这种在不同学校之间的流动，而使自己的力量得到再三再四的使用，并产生成倍放大的效应。

这好比一个城市里的出租车，在该城汽车存有总量中仅占 1/20，但在该城汽车流动总量中能占 1/2。之所以出现这种比例放大效应，就在于出租车比其它车更具有流动性。它们总是在跑，总是在运营中。

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不仅鼓励造反学生在不同学校间进行串连，而且鼓励造反学生在不同地区间进行串连。并最终鼓励出一个「大串连」的狂澜来。

于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放大效应，又在更大空间里显现出来。人们就会在一个本地只有一万名造反学生的城市里，先后看到二万、三万乃至五万名造反学生。并且，这些新增造反学生不只是进驻本地的某些学校，还十分招摇地走过本地的大街小巷，一面挥舞旗帜，一面高呼口号，从而将声势造得更加轰轰烈烈。

另外，参加串连活动本身也能激起许多学生的政治热情，改变他们原先趋于保守的政治态度。有一些外地学生来京前是保守派，离京后便成了造反派。还有一些北京学生在本校并不是造反派，但一出北京城就以首都红卫兵自居，就为首都红卫兵荣誉鼓舞，转而支持或策动其它城市的学生起来造反，造该地领导的反。

在红卫兵四处串连中，有两个基本流向：

一是以北京为原点作辐射性流动，即首都红卫兵纷纷走出去，将文化大革命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

二是以北京为目标作向心性流动，即各地红卫兵一批批被请进来，学习首都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并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毛泽东在 101 天的时间里（8 月 18 日-11 月 26 日）先后 8 次（8 月 18 日、8 月 31 日、9 月 15 日、10 月 1 日、10 月 18 日、11 月 3 日、11 月 11 日、11 月 25 至 26 日），总共接见了 1,100 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见者微笑、挥手、作俯临大地状；被接见者欢呼、跳跃、「一端尺把高」。

这种领袖临幸群众的接见方式，十分类似那种具有精神暗示性的宗教仪式，如活佛给信徒摸顶，神父给入教者作洗礼。通过这种方式或仪式，能够再施与者与被施与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精神关系，一种姑且叫做神人相通的精神关系。施与者自以为将身上所具有的某种神圣东西赋予了后者，被施与者也自以为从前者那里获得了某种神秘启示、某种精神力量。

历史曾留下这样的镜头：一位女红卫兵在与伟大领袖握过手后，又是蹦，又是跳，高举着手不断喊着：「我同毛主席握过手啦！我同毛主席握过手啦！」于是，许多只手都伸过来了，都要握一握这位幸运者的手，都要与她分享某种难以言喻但确实存在的体验。

红卫兵「大串连」，无疑给文化大革命增添了许多声势，但也给交通运输业带来了极度混乱。几乎所有客运车船都严重超载。定员一百人的火车车箱挤进三百人，连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许多人。几乎所有交通枢纽都人满为患。有些车站（如安徽蚌埠火车站）还发生因拥挤而踩死人事件。几乎所有交通运行计划都朝令夕改。火车站里已没有不晚点的车了。就在人员急剧流动同时，大量生产急需物资和大量生活急需物资长时间积压在各个车站码头上。整个国家交通运输系

统处于半瘫痪状态。国务院叫苦不迭。中共中央决定解决一问题。

10月29日、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紧急通知：北京学生暂缓外出串连和外地学生暂缓来京串连。

11月16日、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连续发出通知：暂停一切乘车串连和一切乘船串连。不过，这些通知还留下了两个尾巴：一是允许步行串连，二是许诺明年春暖季节再准予大串连。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停止步行串连。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仅有数行字的通知：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大串连」尽管有种种不是，但对于许许多多置身其间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他们大为兴奋的事，既满足了其中爱搞运动者的表现欲，也满足了其中爱好观光者的好奇心，并令他们久久不能忘怀。

那一年，笔者还是小举生，不够串连资格，但也随着人流来到了北京，并赶上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活动。在京盘桓期间，正值秋冬交替之际，满地枯黄的树叶，满街鲜红的袖章，北风呼呼，红旗猎猎。

## 67

1966年12月17日，《解放军报》刊载林彪署名文章《〈毛泽东语录〉再版前言（1966.12.16）》。（1961年5月，《解放军报》根据林彪指示开始刊登毛主席语录。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军报所登语录进行补充整理，出版《毛主席语录》一书，大量发行于军内。「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等人又将《毛主席语录》冠以由林署名的再版前言」，大量发行于全国各行各业，以至人手一本。就数量来说，《毛主席语录》印了几十亿册，可与《圣经》和《可兰经》相比，堪称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三本书之一。但就生命力来说，前者就无法与后两

者相比了。如今，那两大经书仍频频展读在其千百万信徒手中，而那本「红宝书」只偶尔出现在街头旧书摊上，开价很低。不过，它已溶入到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已作为一种负面的东西存留在许多国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韦梅雅《〈毛主席语录〉编发全程寻踪》，《炎黄春秋》，1993年第8期，页10-24。）

该文开篇即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基于这种评价，林彪提出执政党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关于如何读毛主席的书，林彪提出一个「三十字方针」：「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

早在1959年庐山批判会议上，林彪就声色俱厉地对正挨整的彭德怀说（也是当毛泽东面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27，252。）

在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林彪就开始大张旗鼓地言传这个「大英雄」。在此宣传中，林最爱使用的字莫过于「最」字了，常用它打头以引导一组组最高级颂词，例如：（《林彪文选》，下卷，页22-23，161，178，187，191。）

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灵活的斗争艺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我们军队干部，如果再出现反对毛主席的，就是最大耻辱。

关于毛主席著作，林彪作了这样的评价：

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最高水平的著作，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著作；什么李达、康斯坦丁洛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那么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林彪文选》，下卷，页187，204。）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快捷方式，是一本万利的事。（《林彪文选》，上卷，页276-277。）

对于毛泽东本人，林彪又作了这样的歌颂：

在我们党内，他比所有人都强。大家一起搞斗争，有的年龄比他老，有的年龄比他小，但对于辩证法的核心，我们没有懂，但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才方面，哪一方面他都比我们强；不要不服气，不行就是不行。（《林彪文选》，下卷，页179，229。）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主席那样亲

临前线指挥那样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的，那样复杂的，那样激烈的，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 10 倍，比俄国多 3 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林彪文选》，下卷，页 205，178。）

不能不承认天才，19 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 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林彪文选》，下卷，页 178-179，206。）

因此，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文选》，下卷，页 182。）

必领承认，林彪的语言是很有个性的，其特出之处就是非常明快，三言两语就把说到极致处，说到无以复加或无以复减处，直截了当，一竿子捅到底。这或许与他久当司令而擅长写「手令」有关，即讲起话来就像是下达作战命令似的，一语破的、干脆利落而不模棱两可、拖泥带水。

不过，林彪上述评价毛泽东的话，虽形式十分明快，但内容大为不实。

比如他说，毛主席活到九十、一百岁，我们都不能反对他。结果，毛主席还没活到八十岁，林彪自己就密谋反对他，并差一点干掉他。比如他说，毛主席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出一个，中国几千年出一个。林彪作为一个精于算计的军事谋略家，喜欢用数字来谈问题，并常常谈得不错，但此次谈得就不怎么样了。

其一，毛主席说过许多前后矛盾的话，若句句是真理，且一句顶

一万句的话，那么，就会在他说过的话中发生真理与真理的混战，并且是大规模的混战。

其二，毛主席既为他的党建立了巨大功业，也为他的党以及他的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并且后者更甚于前者；因此，当林彪说像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时，人们就不应该为此类人出得少而觉着这种人是十分精贵的，而应该为此类人出得少而觉着这种少是值得庆幸的。

不过，我们的兴趣主要不是想指出林彪所说的话有多么错误，而是想揭示林彪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林彪无疑是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事实上，他比中共党内绝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了解毛这个人，既了解此人有许多长处，也了解此人有许多短处（可从其属下后来拟定的「571 工程纪要」中得到左证）。可是，他此时公开给与毛的评价，不是一分为二的评价，而是一切皆好、一切皆「最」好的评价。显然，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尽说一些立论十分片面的话，自有其话外的用意。

以往人们多是腿用意解释为，林彪想博得毛泽东对他的好感和信任。这种说法过于一般化了，因为，毛泽东周围的许多人，既有像林彪这样的中央大员，也有端茶倒水的男女服务员，都程度不一地怀有试图取悦于老人家的想法；至于他们如何取悦老人家，就不尽相同了，就要依据他们不尽相同的身分而去行事了。

作为毛泽东倚为臂膀的重臣，林彪发表上述言论不是想仅仅让老人家听觉愉快，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帮他一把。他这些言论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给毛泽东树立绝对权威，而这正是后者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为需要的东两。

「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如全国第一支红卫兵在其大字报中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场「造反」运动，（关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相关资料可参阅，〈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6.24）〉、〈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

造反精神万岁（1966.7.4）、〈三论无是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7.27）〉，《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63-65。）一是要造以执政党中央一线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体制的反，二是要造以「四旧」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反，简言之，就是要造各种既有权威系统的反。

而要使造反具有合理性，就必须使造反本身也具有权威性，并使这一权威性高于造反对象所具有的权威性，即前者比后者更权威些。

因此，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感迫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这场运动具有极大的权威性。

若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从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一是设法大树这场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即毛本人的权威，鼓吹个人崇拜；二是设法大树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即广大群众的权威，强调群众运动合理性。

这两个方面还可以相互溶合：既可以宣传说，毛主席与广大革命群众「心连心」，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也可以宣传说，广大革命群众与毛主席「心连心」，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捍卫毛主席、捍卫他老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林彪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突出贡献。

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尽管其中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但其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他还与陈伯达相呼应，将当时中央高层在如何对待群众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提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文选》，下卷，页230，页229-230；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1966.6.16）〉，《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133-141。）

比较而言，林彪在大树毛泽东个人权威方面的贡献更突出些。他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字眼以及最简洁的表达式，来歌颂这位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并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条件地听从此人的指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文选》，下卷，页 198。）

这实际上是在树一种绝对的权威，一种不必思考只须服从的权威。道显然是在倡导盲从、倡导迷信，是在塑造一种很像旧时菩萨神的偶像。这种情况使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带有十分矛盾的性质：一方面作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作造神运动；一方面要「向旧世界宣战」，另一方面又到这个旧世界里翻找用以向它宣战的武器。

然而，在我们这个仍保有封建迷信传统的国度里，在中共这个仍保有个人专断传统的党里，林彪搞起这一套愚昧主义东西既适合国情又适合党情。毋庸置疑，它的确获得了巨大实效，至少在一段时间里的确造出了一个凌驾人民之上的现代神。

毛泽东被冠以四个伟大称号：「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被颂扬为各族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每个人都怀揣着「红宝书」，一会儿捧读它，一会儿高举它。每个家庭都供奉着「宝像台」，早上请示，晚上汇报。红卫兵们谈起毛主席就露出无限崇敬的神情，看到毛主席则流出无限幸福的眼泪，就连声名显赫、举止庄重的周恩来总理，也一度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手上紧握毛主席语录、嘴里跟着红卫兵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频频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并不忘道一声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 68

不过，若把这造神的成就完全归功于林彪，则过于拔高了他；换一种说法，若把这种造神的祸害完全归罪于林彪，则过于冤枉了他。发生在中国 1960 年代下半期的造神运动是一复杂现象，有多方面原

因。

就被造神者方面来说，毛泽东也确实拥有一些可被用来造神的资才。尽管其「德」很有问题，但其「才」出类拔萃。在搞政治搞战争上，此人可谓世上枭雄，虽不能说百战百胜，但其间胜算多于败绩，被他搞掉的各方强人不计其数。另外，在吟诗填词写文章上，此公也是一把好手，虽不能说篇篇瑰宝，但其中不乏上乘佳作，足显绿林秀才之风采。

再者，毛身为党魁，在与党中同志分享党的荣誉时，自是能分得最大份额，有时甚至能分得所有份额，即党的所有成就都被划归在他的名下，都被说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另外，毛本人亦好名好权，喜欢别人为他歌功颂德，为他大树权威。这可从他 1940 年代提拔刘少奇为副手和 1960 年代提彪为接班人的用人倾向上看出。

因此，这个党若不造神，则罢；若要造神，非毛不可。毛本人所具有的那些条件使他成为当然人选或唯一人选。

就造神者方面来说，这是一项有许多人参与的事业，一项由延安整风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事业。

在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向全党宣布：「毛泽东同志，是我党的『伟大领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科学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页 314-370。）

以此为发端，这个党开始了神化毛泽东的运动，开始将他比作党的化身，比作人民的大救星。

1947 年秋，陕北佳县老百姓终于向毛泽东喊出了往日只能向皇上喊的「万岁」声。（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页 61-62。）1949 年后，这一「万岁」声由民间口号上升为

官方口号而响彻新中国每一个角落。1956年间，这一造神运动因斯大林问题被揭露出来而短暂地收敛了一下。

是年2月，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苏共二十大会议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正式揭开斯大林问题。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搞个人崇拜能够将一个革命领袖变得极为专断和极为卑劣，并能够给他所领导的党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和巨大耻辱。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两次谈到要借鉴苏联教训：（《邓小平文选》，第1卷，页229，235。）

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它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此前七月，周恩来在上海党代表会上作报告〈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也谈到要离苏联教训。

我们的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他还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周恩来选集》，下卷，页207-208。）

这位中共大员心里一定很清楚，不要说西方议会允许唱「对台戏」，就连在他曾屡屡出使的国民党统治区也允许唱一些对台戏；至少王芸生先生的《大公报》可以讥讽包括蒋夫人宋美龄在内的国中显要；至少傅斯年先生在国民参政会上可以大骂「皇亲国戚」，并居然能够接连将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人从财政部长位子上骂下去。（沈非（包遵信）〈思想启蒙·学术积累·社会关怀——关于傅斯年〉，《东方杂志》，1996年第3期，页82-85。）

1956年，中共无疑赶了一回世界潮流，诸大员纷纷表示也要在本党中反对个人崇拜以及与此相伴生的个人专断现象，但结果只是作了一番姿态，并很快退回到他们原先的立场上。1957年，毛泽东和他的许多同事，包括邓小平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反右派」运动。在他们所反对的那些「右派言论」中，就有许多话是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权的。此次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党外民主人士向执政党唱「对台戏」的可能性。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明确地为个人崇拜问题翻案，指责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并抱怨自家党里也有那么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或对此「有共鸣」。

毛还说，不应完全否定个人崇拜，因为其间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页169-170。）显然，老人家又在捣浆糊。本来1957年所反对的个人崇拜，就是那种「不加分析、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如今毛硬是在它之上加塞一个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并将它与真理崇拜这另一个问题搅和在一起。这是抽掉了问题的特定背景来谈问题，东拉西扯，节外生枝。

在此次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出了他的那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

度。」〔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373。〕老人家就在讲这些话前后时间里，还做了两件与此有关的实事：

其一，凭借其个人权威，责成执政党中央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决定：推翻执政党中央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已作出的决定，发动全党批判「反冒进」，责成曾参与其事的周恩来等人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违心检讨；

其二，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毛主席万岁」声中，视察了华北、华中、华东等地，为「人民公社」叫好，为「大办钢铁」喝采。于是，个人崇拜的热浪与大跃进的热浪交相迭涌，一浪高过一浪。

1959年夏，毛泽东又一次行使其个人权威，裹胁着执政党中央，发动了「反右倾」运动，整倒了敢于直接批评他搞糟了大跃进的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等人。从此以后，这个党里就再没有人敢站起来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了。

在庐山会议后期，刘少奇讲了这样一段话：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395-360。〕

李锐先生现场记录讲话，于数十年后评论道：「刘少奇的这篇讲话，

自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因此，也可以说，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作出了一次新的贡献。刘少奇后来的遭遇，使我不禁想起两句杜牧的文章：「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360。）

由于毛泽东一意孤行以及执政党中央对他曲意迎合，致使「大跃进」运动以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和老百姓饿死几千万告终。

面对这一惨况，许多详知实情——既详知形势有多么严峻，又详知恶果旧因何而生——的执政党大员，终于冷静下来，开始对毛的执政方式发生怀疑乃至怀有不满，并以委婉的方式将他们这一心态表达出来（参见本书第 29-32 节）。

也正是从此时起，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执政党中央一线在如何宣传毛泽东问题上，开始变得审慎起来，虽不能说是改弦更张，但不再为之增温加热，甚至默许像邓拓这类骨鲠之士不断发文章，对其弊政旁敲侧击、含沙射影。

必须承认，像刘少奇这类中共高干，尽管他们搞政治常常不够磊落，但他们内心深处仍不乏有同情老百姓的良知。他们毕竟出身革命者，既有过救民于水火的意愿也有过与民共甘苦的经历。三年困难时期，这位刘主席就曾屡屡为挨饿群众流泪，说执政党对不起他们了。

就在刘少奇迟疑不前时，林彪脱颖而出，成了中共造神事业新一任领导者。他先是在由自己统领的几百万军队中大力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并发誓要把整个解放军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对于此举，毛泽东大为欣赏，并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

他接着又将自己所搞的这套东西由全军推广全党全国，要求所有人都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对于此举，毛泽东更是欣赏，并决定让他接替刘少奇而做了执政党第二号人物。

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崇拜运动犹如一锅沸腾的开水。这锅水自延安整风运动起就开始烧了，就已经有许多人忙于锅前锅后了，先是由刘少奇领着一拨人烧，继是由林彪领着一拨人烧。前者把冷水烧成热水乃至烫水，后者又把烫水烧成开水乃至蒸气。因此，若把烧开那锅水的责任都推到林彪身上，既不真实也不公平。当然，也不能低估林彪在烧开那锅水的过程中的作用。他毕竟烧了最后一把火，一把最大的火，大到终于把锅里的水烧得沸腾起来。

前文谈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意图」，是要解决执政党高层领导权问题；他为实现这一意图而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搞大规模群众运动。（参见本书第 63 节）

林彪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例如，他所作的〈5·18 讲话〉，就把前一个问题阐述得极为明晰，以致明晰到赤裸裸地步；他所搞的那些个人迷信东西，就非常有效地煽起广大群众的「革命激情」，激发他们满怀地投身这场「革命运动」。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林彪是凭着他为毛泽东做出实际业绩而坐上「接班人」位子的。

大陆出版物在解释毛泽东为何重用林彪江青这类人问题时，多是采用「受骗说」，即认为主要原因是前者受了后者的欺骗，或说后者通过欺骗而获得前者的重用。

这种说法相当片面，仅说出问题的一个次要方面。问题的基本方面，是林彪等人通过做出实际成绩而获得毛泽东信任的，或者说他们因做了毛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而获得毛给以重任的回报。因此，他们与其说是欺骗了毛泽东，勿宁说是迎合了毛泽东。

就毛自身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容易上别人当的人。此公一生都在研究人揣摩人，故也擅长识别人使用人。尽管他对他所干的事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有时并不清楚，但他对他所用的人究竟能不能为他办事大都心中有数。他基本上是量才用人的，你对我有多大用处，我就给你

多大职权。

人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受骗说」，显然是想解脱他，想把他与林彪等人的关系描述成好人上坏人当的关系。

然而，这种解脱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带来负面效果，即在把毛解脱于一种尴尬境地的同时又把他置身于另一种尴尬境地。

如果说毛是在头脑十分清楚的情况下领着林彪等人做了许多恶事的话，那么，对于毛本人，人们就有理由指责他是祸首；对于林等人，人们既可以指责他们，说他们有意助纣为虐，也可以开脱他们，说他们是受别人鼓动而作恶的。就后一方面说，他们即便本来就已邪恶，也会被这种鼓动变得更加邪恶；换言之，他们若不受毛的怂恿，就不会邪恶到这种程度。

如果要避免人们对毛作上述指责，就只能说他在头脑不清楚的情况下允许林彪等人去做恶事的。然而，这种说法又引出另一结论，即毛十分无能、十分愚蠢，竟不能识别这样邪恶的坏人、这样明显的坏事。人们不免要问：他的那些天才到哪里去了？他的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盯什么东西去了？这种说法显然有损老人家的那种好争强斗胜的自尊心。

可见，上述「受骗说」，虽掩饰了毛的邪恶，却凸显了他的愚蠢。捉了襟，见了肘。邪恶的评价固然不好，愚蠢的评价也不好。尤其对于那些以心智见长的人来说，后一种评价似是更难容忍。

曾有一本杂志载有这样的话：最令男人羞辱的称号是骗子。哲学家康德则认为这一称号不是骗子而是蠢人。政治家毛泽东似也持后一种观点。

1975年8月某日，老人家与几个女服务员一同观看一部香港电影。影片演的是两男子与一女子故事。甲男忠厚，乙男奸滑。两人同救一位落井女子。甲男缒井下，乙男留井上。甲男将昏迷女子放入筐中，乙

男将筐拉出地面。甲男尚在井中，乙男就封井口并藉恩人名分娶了女子。看罢电影后，女服务员们叽叽喳喳都说乙男不好，老人家独说甲男不好，说他太愚蠢了，将他好一顿奚落。（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页 162-165；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译本），页 64。）

## 69

对于林彪搞的这些个人崇拜东西，毛泽东本人是如何看待的呢？

就当时公开表明态度来看，他是支持林的。这既可从他他对林的提拔中看出，也可从他对他其他一些中央大员的惩处中看出：

「这几年来，陆定一——有机会就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这纯粹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污蔑口吻。他还到处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戏。」（〈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5.2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5 册，页 24-25。）

不过，就数年后公布的 1966 年 7 月 8 日他江青的信来看，他又似顾虑林搞的那一套东西：（〈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7.8）〉，《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5 册，页 55-56。）「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指林彪——引者）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

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藉助钟馗。我就在 1960 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根据一些文献披露，毛将此信写成后，曾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周经毛同意将信转告林彪。林因信中有对自己的批评而感到不安并有悔改表示。毛遂将原件销毁。人们现在看到的这封信是经毛本人校阅过的抄件。（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7。）这一所谓「抄件」说法，很有一些「故事」味，同时也不免使人生出一些疑虑来。

既已允诺销毁却又留下抄件并在日后将它公布出来这一出尔反尔作法，实在是小家子气。这就很难让人相信，自视很高的毛泽东竟也如此行事，或执意要维护毛泽东形象的执政党竟也允准披露如此材料。不清楚周恩来是何时将此信转告林彪而使他感到不安的。若在毛信写成许久后转告，尚可理解；若在毛信写成不久后转告，就难以解释两个月后林彪仍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将毛「吹得神乎其神」，仍在那里「藉助钟馗」。

正是在此次讲话中，林讲出了这样一些极而言之话：「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洋人古人哪里有毛泽东思想呢？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呢？」……可以说，在林讲话中，就数此次捧得最高。

据所披露材料，毛泽东是将信给周恩来和王任重两人看的，王是中南地区主要负责人，毛正是在王的治地武汉写这封信的，故可推测，毛在此地写成此信不久后便给王和周看了。至于周何时转告林，根据「文革」初期毛、林、周三密密切协作关系推测，应是周看到此信不久后的事。不过，这就很难解释林为什么还会在两个月后作那番信口开河且一泻千里的讲话。

在此信中，毛说他是「违心地同意别人」搞他的个人崇拜的，「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可是，在数年后与埃德加·斯诺谈话中，毛又说他本人当时就感到需要搞一点个人崇拜：〔〈1970年12月18日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纪要〉，本文引自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文本），页264-266。〕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斯诺谈到：「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领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斗争的终止。」

毛答到：「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

在毛与斯诺谈话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已经开过。

在此次会议上，毛龙颜大怒地斥责了陈伯达，并间接地批评了陈的支持者林彪。毛指责他们鼓吹所谓「天才论」，指责他们别有用心地把毛说成是「天才」，名曰树毛，实是树他们自己。

可是，毛又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这被批判的人以及这被批判的理论，都曾经为文革初期个人崇拜运动的兴起，也可以说都曾经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毛对此必须作出解释，必须给出一个能够前后照应起来的说法，于是：

一方面说，当时他所面临的形势——自己在大权旁落的情况下去反对握有重权的刘少奇——使他不得不搞一点个人崇拜；

一方面则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说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 (伟大导师、伟人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它的一概辞去。]（〈1970年12月18日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纪要〉，本文引自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文本），页264-266。）

他的这一说法，就自身来看，似是能前后照应起来；但与他的另一说法即前述「迫上梁山」说法联系起来看，就很难前后照应起来。

两相比较，还是毛给斯诺的说法即「需要说」更真实些，更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合乎此公的政治脾性。

尽管毛泽东向白，他非常「讨嫌」「四个伟大」的称号；但事实表明，他既要当伟大的政治领袖又要当伟大的精神领袖，既要享有最高的政治权威又要享有最高的精神权威。他不仅是这么想的，而且是这么做的。几十年来，他总是在领导人民，总是在教育人民，总是在试图把数万万人的手脚与脑袋都管起来，既要指导人民怎么去做又要教导人民怎么去想。

〔毛泽东既要当人民的政治领袖又要当人民的精神领袖这一做法远风后人。其继任者也是既要掌有最高政治权力又要享有最高思想权威，既要当党老大又要当总设计师，要对人民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进行一揽子设计。〕

之所以出现这种权力传承模式，其原因就在于毛所建立的权威系统已成为国家制度。他的继任者只要不改变国家制度，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维系这种权威系统，就会同时肩负这两种权威的重任。

不过，与前任者相比，继任者在具体运作这一权威系统时遭遇了更大的困难。

一是因其治下社会格局已比过去散了许多，至少民众心理已出现离心化倾向。

二是因其自身人格实力也比前任差了许多，很难藉此造出足够的个人魅力来。继任者尤其在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方面很难与前任者相比，故更难担当起那种连前任者都很难担当起的思想权威的重任。

他若执急担当此任，就必须借助他人力量：

一是借助秘书班子的力量，让他们将自己断断续续说出的一些很原则很散落的话，加以充实整理，形成若干文章；并由此创造出一种很独特的文体，一种介于讲平常话与作大报告之间的白话文文体，一种结论性东西多于论证性东西的论说文文体。

二是借助官方学人的力量，鼓励他们就首长的三言两语做出一篇篇研究论文，继而再将之汇成一本本研究专著。

于是，这位继任者，不仅拥有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由个人署名的论著体系，而且拥有了一个规模更大的以前者为对象的阐释体系。)

不可否认，毛的这些想法和做法，曾经搞得有声有色，搞得全国人民都自觉地按照他的教导去努力行事，去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同样不可否认，毛的这些想法和做法，1950年代搞得有声有色则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代搞得有声有色则迎来了「十年浩劫时期」，国家遭遇政治动乱，民族陷入精神危机。

## 70

既要当人民的领导又要当人民的先生，对于许多政治家尤其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是一个犹如既要得到熊掌又要得到鱼翅的两难问题。

搞政治尤其搞毛泽东所搞的那种政治的人，大都很现实很功利，有时能功利到不择手段的地步。这固然与他们自身的素质有关，但更是与他们从事的职业有关。

因为，搞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追求权力的事业；而所

谓权力，按马克斯韦伯说法，指的是一种可能性，即在与他人相处中权力拥有者能够强制性贯彻自己的意志。（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英文版），页53。）或按R·A·达尔说法，指的是一种影响力，即在一个只有A与B的系统中权力拥有者A有影响B改变自己的行为 and 倾向的能力。（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页36。）因此，搞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为了获有对于他人的强制性影响力。搞政治所要强制性影响的对象不是被动的，而是常有反强制性影响的倾向和行为；因此，若要搞政治就会面临人与人冲突问题。这种情况在毛泽东那里尤为突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搞的政治就是一种「与人斗」的事业。

参与政治冲突的人至少有两个特点：

一是有报复倾向，即自己一旦遭受对方打击便设法使得对方也遭受自己的打击，使自己的创伤能够用对方的创伤来予以补偿；

二是有推断能力，即能够依据一些征兆来推断自己将可能受到何种方式攻击，并据此作出预防性反应。

前一个特点，使得某些政治家在其政治角逐中，不仅要一时击败对手，而且要彻底击败对手，不仅要将其打倒在地，而且要将其打到再也站不起来时为止。换句话说，受打击者不仅要为他此时已经作出的行为而承受处罚，而且要为他此时并未作出但将来有可能作出的报复行为而承受处罚。正如彭德怀将军不仅为他在庐山会议上说了几句话而受斥责，而且为他日后有可能翻案而被整倒、「被搞臭」。因此，这种类型的政治斗争是奉行过度打击原则的，故而是残酷的。

后一个特点，使得许多从事政治斗争的人，不仅要考虑出己方如何攻击对方的方式方法，而且要考虑对方有可能通过一些迹象而大致准确地推断出这些方式方法，并因而会相应地采取一些十分不利于攻击方的防御措施。这就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己方准备攻

击的同时能够有效地干扰对方作出准确的推断。为此，他们便制造假象，便采取许多不合常规的方法，其极端者甚至能够不受限制地使用任何手段，包括使用许多十分卑劣的手段。因此，这种类型的政治斗争是奉行谋略致胜原则的，故而是诡诈的。

政治斗争，尤其是那些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斗争，正由于具有这一残酷性质和这一诡诈性质，而使得许多参与其事的政治家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并使得他们特别讲究实际、讲究眼前利害得失，有时为了成功而不惜做出许多有悖常理的事情。

然而，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精神权威者，就不能太讲究实际、太讲究功利和权变了，相反倒应超脱些、倒应多关注些理想层面或理念层面上的东西。

这里所说的精神权威者，有两种基本类型：即道德权威者与思想权威者。前者能够为人们提供如何处世为人的行为示范，后者能够为人们提供如何把握事理的认识范式。另外，还有一种复合类型：集思想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者。

其一，一般说来，在一个十分世俗的社会中，若要做一个十分高尚的人，就需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比如：

在一个多数人都忙于追逐自身利益的社会中，若要身体力行地去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就意味着自己将多做奉献而少有回报甚至没有回报。在一个各种谋术大行其道的社会，若要身体力行地去倡导光明磊落的风范，就意味着自己会屡遭暗算而难获成功。在一个权势风标不断变化的社会，若要身体力行地去推崇忠贞不渝的气节，就意味着自己要常常坚守在失败者一方。

可以说，那些真正能够感动苍生、彪炳青史的道德观者，大都有一个苦难的人生甚至殉难的人生。无论是西方的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还是中国的东林党人和早期共产党人，都莫不如此。

其二，要想从整体上把握一个事物，就不能只是沉浸其间，还必须从中超脱出来，从其之外的某个角度、某个能将其整体构架尽收眼底的角度来审视它。换句话说，要想观察一个事物的全貌，就必须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故能从其上下左右各个方面来打量它、测度它。正如古语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因此，作为思想家所应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应拥有一种不拘泥于现实事物的眼光，一种能对现实事物作超越性审视的眼光。

要想深入地研究一个问题，就必须有着专注精神，能够将自己注意力持久地集中在所研究的问题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为自己营造一种较为单纯的研究氛围，一种能够坐下来盯着一件事不放而将其它诸事统统置于脑后的研究氛围。为此，可从两方面作出努力：一是从环境方面做起，尽量排除外物的干扰；二是从自身方面做起，尽量减少内心的欲望。而这样做就意味着，要使自己同纷繁忙乱的、有着种种诱惑的世俗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定距离。

因此，作为思想家所应具备的条件，除了有前述能够超越研究对象那一条外，还有能够超越世俗生活这一条。

另外，思想家们所做的研究多是前瞻性的，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是人们从未遇到过的，属于完全未知的领域。思想家们在研究之初，并不了解它们是有益于人的还是无益于人的，更不了解对它们作研究是有益于研究者本人还是无益于研究者本人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执意要作这种研究。即是，他们不是为了谋求某种明显的好处而开始研究的，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的。

因此，在思想家所应具备的条件中，还须加上能够超越功利目的这一条。可以说，精神的超越性和非功利性，在思想家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那种清远空灵、无声无色的理念世界，是这些精神守望者常常栖居的地方。

前文曾说，道德权威者通常有一个苦难的人生。这里则说，思想权威者通常有个淡泊的人生。无论在先秦的老子和庄子那里，还是在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里，人们都可以看到，超越静观或超然沉思，已成为他们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至少在他们生命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已成为他们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

其三，还有一类哲学家，如中国的孔子、墨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不仅以其哲学思想启迪世人，而且以其道德实践示范天下，集思想权威和道德权威于一身。正由于拥有这双重权威，而使得这些精神传道者在人类历史上享有特殊地位。孔学和墨学，成了先秦时期信徒众多、声势浩大的两个门派。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在西方哲学史上留下著述不多，不属于最为博大的哲学家，却成了最受尊敬的哲学家。

若仅就思想建树来看，中国先秦时期并不只有孔墨两夫子在那里滔滔不绝、开宗立派，而是有着许多宗师、许多门派都在那里言之成理地阐发自家主张，故成诸子并立、百家争鸣之势。像老庄、荀韩所提出的那些学说，无论在立意的深刻性上，还是在论证的精巧性上，都不逊于孔墨所立之说。

若再将思想建树与道德实践结合起来看，整个这一时期恐怕只有孔墨两家可以傲视天下，其它各家则无法与之相比。两家的开山夫子，都是既以其学理来说服人又以其行为来感召人。孔子既提出仁学主张，又身体力行地去推行它，开坛讲学，亲传弟子三千人，游说各国，颠沛流离十四年。墨子也是既提出兼爱学说，又身体力行地去实行它，广收门徒，四处奔波，劳累得「摩顶放踵」，浑身上下尽是伤痛处。

另外，就两家学说内容看，都有相当大一部分关乎人们日常伦理行为，本身就讲道德实践，并适用许多人。孔子讲仁爱，有教无类，教了方方面面的人。墨子讲兼爱，不以贵贱取人，即便贩夫走卒也纳门下。墨子死后属下弟子分成八大支系，墨门声势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老庄之说、荀韩之说，就不像孔墨两家那样具有十分突出的道德实践意义。它们不是大众哲学，不具有很广泛且很现实的行为示范效应。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了解它们，能够读之、品之。并且，在这很少的人中，又只有极少的入能体察它们，能够行之、悟之。

例如，像庄子应有意识地远避尘世生活，就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即使有人能够做到，也很难以他那样的心态和感触来领略人生。

又如，像韩非子学说中的许多东西，就只是对少数统治者说的；而在这少数统治者中，又只有极少数称孤道寡者能够依此行事。

集思想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者已不多见，集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于一身者就更不多见了。

阿拉伯的穆罕穆德可说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并且是这极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一书作者，就将其排名世界第一，称之为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在非宗教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都取得了无比辉煌成就的人。（迈克尔·H·哈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页1-5。）

欧洲也曾有过一段政教合一时期。教皇一度既拥有宗教领域的最高权威，也拥有关于世俗生活的最后发言权。不过，享有的精神权威，主要是从耶稣和他的使徒那里承继下来的，而不是由他们本人创立的；他们对于世俗生活的发言权，也仅是其宗教权威的一种引申而已，并非是一种十分成熟的世俗权威。另外，就整个西方文明史来看，这一时期是不甚昌明的。

在中国历史上，大禹和周文王或许能算做这种集治权威和精神权威于一身者。两人均有王者身分，亦是得道之人。前者克己奉公，一心为天下苍生治水，堪称道德楷模。后者陷逆境而愤发，推八卦而演《周易》，成了当时最有智慧的人。不过，史书上关于这两人业绩的记载有许多传说的成分。并且，文王当时还只是姬姓的部落王，还没有像他儿子武王那样成为统领四方的天下王，故还未能享有最高政治权

威。

在这两人之后，就很难再从中国史上找到这种集王者和圣人于一身的绝对权威者。所谓「外王内圣」，不过是一种理想，就像柏拉图所推重的「哲学王」仅仅存在于他的「理想国」里一样。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前文所说的政治权威者通常具有的素质与精神权威者通常具有的素质是不兼容的，极而言之，就如同秦始皇身上的品性与孔夫子身上的品性是不兼容的一样。

对于这一层道理，中国史上那些明君圣哲们似很清楚。在由他们建构的国家制度中，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虽有许多联系，但在根本上是迥然有别的。两者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域，并形成各自不同的传统，即所谓「政统」与「道统」。前者的最高代表当是本朝皇上，后者的最高代表则为千古圣贤。

这种关系在那些读书做官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两栖于社会政治领域和社会精神领域，在朝廷拜皇上，到文庙拜孔子，认前者为政治领袖，奉后者为精神导师。他们不会把皇上喊成「伟大导师」，也不会把孔子喊成「伟大领袖」。

如果皇上也是一个读过圣贤书的人，那么，他与这些士大夫们的关系就是双重的：在政治上是上下级关系，在精神上为帅兄弟关系。他在金銮殿上可以乱拍惊堂木，竭尽王者威风；但进了孔庙也得三叩九拜，恭行弟子大礼。他可以砍士大夫的脑袋，但不能「洗」士大夫的脑袋。他有权力随意惩处高官大吏，但没资格强去「改造知识分子世界观」。

宋朝，虽屡遭外敌侵扰，但其社会制度发育得相当成熟。它的政治方面无疑是相当专制的，是能够将其官府系统管理得严严实实的。它的学术思想领域也无疑是相当繁荣的，大师辈出，学派林立。尤为称道的是，一些享誉千年的书院正是在此朝度过了它们的鼎盛期。这政治方面的发展与这思想方面的发展，基本上是各行其道的。

在赵家皇帝中，很少有人像 20 世纪新中国的一些领导人那样频频干涉学界诸事。比如，既不向那些书院提出必须服务于朝廷的政治任务，也不向那些书院派出完全受命于朝廷的政工干部，更不会自以为是地去充当学界导师，向莘莘学子大谈什么「世界观方法论」问题。

与此相对应，在各个书院里，也很少有人像 20 世纪新中国的许多读书人那样热衷于歌颂政治权势人物。比如，不会去大谈什么赵匡胤的哲学思想如何如何伟大、赵匡胤的政治思想如何如何英明、赵匡胤的外交思想又是如何如何有谋略……，不会去出版什么第一代赵皇帝领导艺术研究丛书、第二代赵皇帝领导艺术研究丛书……。

上观两千年中国史，很少见有哪位封建君主敢大言不惭地说：老子既是天下最有权力的，又是天下最有思想的，既能在政治上统领整个国家，又能在精神上教导全体人民。反观 20 世纪新中国，倒可看到一个叫毛泽东的人就是这样自以为是的，并真的被许许多多人奉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数千年历史，就数他老人家冒了尖。

不过，历史最终能不能就这样认可他，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夺取政权前，他虽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都颇有建树，但其影响仅限于他的党以及他的党所控制的地区，而未能成为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威者以及整个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精神权威者。入主北京后，他的最高政治权威者的地位毋庸置疑，但他的最高精神权威者的地位大为可疑。

就思想层面而言，他先是提出一套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继又提出一套如何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结果：1962 年后，他自己就遗弃了他的前一个理论；1978 年后，其党人又否定了他的后一个理论。

古人有言：「人亡政息」。毛泽东人亡，不仅「政息」，且思想遭到冷遇、甚至遭到批判。由此可见，他的思想权威是附属于他的政治权

威的，而不同于史上圣贤所享有的那种独立不倚且经久不衰的思想权威。再就精神权威概念所涵盖的道德层面来看，老人家就更显尴尬了，无论如何也做不了他所执政的这个国家的道德楷模，甚至做不了他所领导的这个党的道德楷模。

1980年秋，中共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召开了一次超大型会议。出席者达四千余人，均为党内各方要人。许多与会者认为，毛的个人质量有严重问题。其中一些人在诉说毛的这一问题时，还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来。为此，邓小平不得不为他的老首长说话：「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质量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质量是解释不了的」；「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298-302，308-309。）

如果说指责毛泽东个人质量不好的那些人只是说了其一，那么强调个人为制度所决定的邓小平也只是说了其二。除此之外，还有个其三，就是制度能够决定人但其本身也是由人制定的或由人选择的（马克思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提出过类似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5。）至于人为什么要制定或选择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制度，除有客观情势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人自身方面的原因，即制定制度者或选择制度者很适合或很喜好这种制度。

据黄克诚记述，毛泽东早在主政中央苏区时，就「过于使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例如，过于使用像李韶九这种很会顺从自己但质量很坏的人，过于纵容他为所欲为地搞「肃反」、打「AB团」，以致激起「富田事变」、造成红军分裂。（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47。）另外，邓小平在为毛泽东作上述辩护的同时，也承认后者的问题：「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298-302、308-309。)

在一个党里,有个顺我者昌、逆我者「整」的党老大,又有了这样一个「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的制度,自呈相辅相成之势。人们既可以说后者影响了前者,为前者提供了制度性保证;也可以说前者影响了后者,为后者提供了创设性动力——前者毕竟拥有能为本党制定或选择某种制度的权力。两者互为因果,很难说谁就绝对地影响谁,或谁就绝对地被谁所决定。

诚然,这位党老大有时也会作出一些谦让姿态,比如提议不准以个人名字命名城市或街道、不准向个人祝寿或送礼。他的这些姿态,孤立地看很悦目,很让那些仰着脸看他的人感动不已;但与他实际做出来的那些事联系起来看就很表面化了,就很不足以称道了。

在他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大运动时,都有一些人站出来劝阻他,十分认真地指明其间种种弊端,但他拒绝劝阻,并严惩劝阻者,甚至置其中一些人于死地。当他搞的这些运动已完全失败并造成惨重后果时,又有一些人站出来纠正他,十分善意地提出许多补救措施,但他又拒绝纠正,并又严惩纠正者,末了还不许人追究他的任何责任。他的这种宁可我负天下而不可天下负我的执政方式,实属无道之君所为。

总之,毛泽东在其执政生涯中,既要做全国人民的政治领袖又要做全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就如同既要当秦始皇又要当孔夫子一样,无疑是困难的,是不伦不类的。

(如今,达赖喇嘛也面临同样问题。他的因袭身分要求他既要做藏人的精神领袖,又要做藏人的政治领袖。前者要求他必须讲心正意诚,必须为人坦坦荡荡、有话直说;后者要求他必须讲斗争策略,必须学会躲躲闪闪、含糊其辞。可是,他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很难将这两者统一起来。

一方面,他的信徒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坚决主张西藏独立。他若要

想继续做这些信徒的领袖，就应该针对他们的主张给出一个能使他们感到满意的说法。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大多希望以较为缓和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即大多支持西藏高度自治，而不赞成西藏独立。国际社会十分明白，他们如果明确支持西藏独立，就会冒两方面的风险：一是要与中国政府直接对抗——这是他们不愿由自己来冒的风险，二是会促使许多西藏人因此而流血（因为中国政府会为反对西藏独立而不惜动用武力）——这是他们也不愿看到的由别人来冒的风险。基于这些考虑，他们倾向于促使达赖喇嘛能够与中国政府对话，寻求一种双方均有妥协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达赖也十分明白，他既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就应该尊重国际社会的急见，就应该针对他们的主张也给出一个能使他们感到满意的说法。

显然，达赖喇嘛针对这两方面主张所给出的两种说法，是很难一致起来的。这种不一致，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是很正常的，是很适合他的职业的——相机行事可以说是政治家的日常功课；但对于一个精神领袖尤其是一个宗教领袖来说，就不正常了，就不合乎他的身分了——一个受人敬仰的活佛，应该像赤子一样单纯，而不能老于世故、适权达变，或者说，应该像水晶一样透明，而不能一面清晰、一面朦胧。

当然，达赖喇嘛也有自己的话可说：我们搞的「政教合一」不好，即在把政治「合」入宗教的同时，也把前者讲求功利、讲究权谋的行为方式带入后者中；然而，你们搞的「教政合一」也不好，即在把宗教「合」入政治的同时，也把后者讲求功利、讲究权谋的行为方式强加于前者。）

## 71

老人家曾对斯诺说，在人们称呼他的「四个伟大」中，他只想保留「导师」称号而不要其它称号。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其它称号倒是可以给他，因为它们大多指的是政治权威者，故与毛的实际身分相差不远；唯独「伟大导师」称号最个适合于他，无论就这一称号的思想

层面看，还是就这一称号的道德层面看，都不适合于他。

接下来的问题是，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长于克敌致胜的政治领袖，却硬要做一个志在教化人民的精神领袖，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只能是把他在政治上搞的那一套东西强加到人民的精神上，使之完全政治化，准确地说完全毛氏政治化。在新中国上层建筑中已不存在任何能够独立于毛式政治的精神领域，在新中国民间社会中也不存在任何能够独立于毛式政治的精神生活。

其政治清明，则清风远播；其政治黑暗，则乌云遮天，不论其政治方面还是其精神方面都不见天日。就毛泽东执政总体情况来看，政治清明时少而政治黑暗时多，并致使社会其它方面也趋于恶化，与各种政治运动此落彼起相伴随着的是民族精神素质持续下降。

近几十年来，我们民族精神素质虽在识字率上提高了许多，可以说与世界发展趋势相一致；但在另外两个重要维度上下降了许多：

其一，在知识精英层面上，人格涵养水平大幅度下降，那种道德文章皆佳的学术大师在新中国学界已成濒危物种；

其二，在普通民众层面上，人伦道德水平大幅度下降，那种温厚侠义并重的淳朴民风在新中国民间已是昨日气象。

与毛泽东党天下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至少有一长处，就是社会精神权威系统与社会政治权威系统处于相对分离状况。

美国经济学家托宾（Tobin）曾告诉世人，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就在于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中国传统社会的建构者们虽未说出这句话，但有意无意实践了这句话，即没有把思想权威、道德权威这些个「鸡蛋」都统统放到政治权威这个「篮子」里，从而能够减少一个社会在发生权威危机时所应承担的风险，至少能够避免出现因政治权威系统崩溃而连带其它权威

系统一并崩溃的局面。

政治权威尤其那种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权威，是依附于某些集团或某胜个人的，而这些集团或这些个人均处在变化过程中，或作强弱变化，或作存亡变换，强则其政兴，弱则其政衰，存则其政举，亡则其政息。换句话说，政治权威这只篮子不是什么耐用品，而是一种易损品，一种隔不长时间就要加以更换的易损品。

自秦以降两千余年里，中国的政坛上不知该换了多少朝代，而附属于这些朝代的政治权威系统也随之来去匆匆，此时确立，彼时崩溃。

在这大约相同时期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所依循的精神权威系统，诚然也有许多变化，但这种变化远没有达到那种在确立与崩溃间不断周而复始的程度。

特别是近千余年来，这种精神权威系统就几乎从未出现过彻底崩溃的情况。读书人一直是拜儒为主，兼拜佛老。老百姓也一直是拜天地，拜祖宗，遇有难事拜菩萨。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紫禁城头上的大王旗朝朝变换，老百姓心中的敬畏物代代相传。

即便在强大外族入主中原、汉家天下为之变色时，这种精神权威系统也没有被彻底摧毁。曲阜孔庙里耸立着许多巨大的用蒙文、满文书写的御碑，就是很好的证明。

那些起于塞外莽原、惯于纵马挥刀的胡人皇帝大都明白：他们可以统治汉族人，但不能非礼孔夫子，不能褻渎被征服者心目中的这一精神偶像；他们必须入乡随俗，必须尊重汉民所尊重的一些道德楷模，尤其是那些教人温和厚重的道德楷模。于是，他们沐浴更衣，恭恭敬敬地拜了这位不通胡语的「大成至圣先师」。

就某个朝代来说，尽管政治很腐败，很不成体统，但道统还在，学统还在，至少道统的威仪还在，学统的规矩还在，孔夫子的牌位还立在那里，做学问的章法也摆在那里。谈到圣贤时你就得作毕恭毕敬

状，写起文章来你就按规矩起承转合。

一些两栖知识分子，在官场见风使舵，百般钻营；回书斋正襟危坐，规规矩矩读书习字，故都有些学问、有些文才。对于他们来说，政统不在，道统还在；道统不在，学统还在，文章还在。明朝张居正大概就属于这类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页76-107。）

不论是既有道统又有学统的士大夫，还是没有道统仅有学统的士人夫，都传承相似的东西。左光斗为史可法业师时讲圣贤之道，张居正为万历帝业师时也讲圣贤之道。尽管先生不同，弟子不同，讲的方法也不同，但讲的内容相近，多为圣贤书上的东西。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精英教育体制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就其外部关系而言，是相对独立的，即相对独立于皇权系统；

就其内部关系而言，是相对统一的，即相对统一于圣贤衣钵；

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是催人上进的，即激励读书人动心忍性，行大道于天下；

就其实现方式而言，是因人而异的，有人说归说、做归做，有人躬行践履、义无反顾。

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史上有一种突出现象：即便在政治最黑暗时期，也不乏有仁人志士愤而挺身过问世事，甚至世道越为黑暗，成仁取义之士越发汹涌，不论是明末清初还是清末民初，都有一批批士林中人前扑后继、慷慨赴难。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实行政教分离制度，从而有可能在政治黑暗的世道中为教育保留一块相对纯净的天地、一块以孔圣人为尊的天地（或者说没有把精英教育这只「好鸡蛋」放进官场政治那只「破篮子」里），故使读书人虽生活在政治黑暗的社会里，却受教于大讲君子操守的学堂中，被鼓励做对国家对社会有担载的人。当然，他们由学堂进入社会后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有人会屈从政治压

力，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有人会坚守圣贤之道，求仁求义，在所不辞。

中共自身发生发展史就提供了这方面例证。它的第一批党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大都是出身各类学堂的读书人。他们一方面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他们很少有人能读到或能读懂马列主义大部头著作），另一方面也读了许多讲忠孝讲仁义的圣贤书。他们大多是从前者那里获得革命的理想，从后者那里获得做人的品性——做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党人所应具备的品性。

前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晚年常谈到，早期中共领导人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等，既给了他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给了他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恽代英曾说：「我对于孔子的道德学问，向来便很佩服」。这句话令匡先生久久不能忘怀，成了他晚年之所以要写《孔子评传》的一个早年情结。（李慎之，〈「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匡亚明先生印象〉，《炎黄春秋》1997年第6期，页52-54。）

尽管旧中国的政治状况相当恶劣，但旧中国的各式学堂曾向中共革命组织输送了一批批热血知识分子，一批批为求民族大义而不惜赴汤蹈火的分子，如李大钊、夏明翰、恽代英等。人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政见，但不能不敬佩他们的人格，即沐浴过圣贤之风的人格。

与此同时，旧中国的贫瘠乡村也向中共武装力量输送了一批批敦厚坚忍的青年农民。他们很快就成为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中最勇敢、最守纪律的革命战士。

与旧时学堂教育类似，旧时乡村生活也是相对单纯的。一是因其本身处于自然经济状况，故很少受其它生活方式的影响。二是因旧时官府只要能收上粮赋、征得徭役，一般不多干预乡村生活、尤其不多干预乡村人民精神生活，不大操心老百姓是信神还是信鬼、是拜祖宗还是拜菩萨，故使得乡村生活又很少受官场政治流弊的影响。

尤其是边远地区，天高皇帝远，受官场政治影响更少，故而民风

更为敦厚。另外，这类地区还常常在不同村落、不同祠堂、不同民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武装械斗，故而民风又较强悍。

这类地区通常杂居着不同族类，如中共元帅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一带居民就分属「军、民、客、土、苗」五个族类。（《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页1。）由于不同族类差别较大，故其间纠纷较多，也较尖锐；又由于当地官府力量相对弱化，故民间纠纷较难获得权威性仲裁；因此，不同族类在解决彼此纠纷时，较容易走上极端，较容易斥诸武力，直接用刀枪棍棒来判定是非曲直，常常能将两户间的争执，如争一垄地一渠水，演变为两大宗族间的武装对抗，即有千百人参与的流血械斗。长期生存于此地的乡民们，自是尚武尚勇，并好抱团好讲义气。

中共武装力量最初兴起的地区，几乎都是这类官府力量较为弱化而民间风尚较为敦厚强悍的边远地区，几乎都是数省交界的几不管地区，如湘赣边区，湘鄂赣边区，闽粤赣边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西边区，陕甘宁边区等。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区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分析了红色武装割据之所以可能的条件：1、白色政权的持续的分裂和战争，即所谓军阀混战；2、有受过大革命影响的工农群众和国民革命军的存在；3、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4、相当力量的正规红军的存在；5、党的组织有力量和党的政策不失误。（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50-52。）

就实际情况看，还应加上一条，即所在地区民风敦厚强悍。这里的许多乡民或山民均有拿过刀枪的经历，或参与过宗族械斗，或打过野猪山鸡，甚至当过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初上井冈山时，就得到过王佐和袁文才的帮助，并收编了他们的土匪队伍，使之成为草创红军中的一支生力军。

另外，在中央红军发展地区内，自闽粤边界起，沿粤赣边界、湘赣边界，直至鄂南，是客家人与土著民杂居地区，也是宗族冲突和武装械斗高发地区。这种地理人文情况对于红军发展来说，既有其弊端：浓厚的宗族意识不利于确立鲜明的阶级意识，不利于讲革命团结、讲共产主义大同理想；也有其益处：生活在这里的人民有较强的战争承受力，出生于此地的战士也多能抱团、多有尚武精神。（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共中央报告（〈井冈山的斗争（1928.11.25）〉）中，将中共武装割据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概括为：1、有持续的军阀混战；2、有很好的群众（主要指受过大革命影响的群众）；3、有很好的党；4、有相当力量的红军；5、有便于作战的地势；6、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 59-86。）

毋庸置疑，毛泽东的党曾从传统文化中获取大量的精神资源，用以成就他们的夺权事业。人们既可以从其知识分子出身的党人身上看到那种未有恒产而有恒心的传统士风，也可以从其工农大众出身的党人身上看到那种刚勇的古朴民风。正是在这种士风和这种民风的吹拂下，新中国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然而，毛泽东的党执政后未能很好地反哺曾哺育过他们的传统文化，不是去发扬光大它，而是去伤害它、羞辱它，并致使自己治下社会风气日下。

在其治下的高等学府里，既很难培养出许多像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大师型学者，也很难培养出许多像夏明翰、恽代英那样的热血知识分子；相反倒很容易造就一批腐败文人，一批惯于看风使舵的政客型教授、一批擅长搞大批判的高学历者、一批酷爱打小报告的读书人。士风已堕落到多少代以来的最低点。

在其治下的社会基层单位里，大锅饭式的劳动制度养懒了许多工人农民，使他们得过且过，能少干活就少干活；假大空式的政治宣传又教傻了许多老百姓，使他们竟能对一些莫须有的东西信以为真。

毛泽东的专政机关又通过对民间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对一切民间独立声音和一切民间独立团体的坚决取缔，对一切敢于拍案而起者和一切敢于直言不讳者的彻底清理，而将这个曾出过陈胜吴广李贽海瑞的民族整治得没有脾气了，致使老百姓们即便挨饿挨整也不敢有怨言，更不敢有义举。

长此以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勤劳、智能、勇敢等质量，都被打了许多折扣。

邓小平也看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认为社会风气在「文革」前是好的，到了「文革」中才开始恶化的，「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02-303。）

事实上，社会风气在「文革」前就已开始恶化了，在「文革」中只是变本加厉而已。其中士风的恶化可追溯到1950年代那几场整知识分子运动。邓公自己就积极参与其事。

我们的社会风气所以全面恶化，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国家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这种国家体制把包括思想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所有权威都置于某种政治权威下，准确地说都置于某种很容易出乱子的政治权威下。或者说，这种国家体制在权威资源配置上，把所有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一个很容易破损篮子里。

这种覆盖一切领域的政治权威，无事则罢，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波及整个社会，就会造成全面危机，可谓：「覆巢之下无完卵？」

十分不幸，作为这种政治权威的主要担当者毛泽东，偏偏是一个患有政治多动症的人，一个总爱折腾出事来的人，总爱将手里正拎着的那只装满鸡蛋的大篮子悠来悠去，直至悠脱了手，砸在硬邦邦的地面上。

## 第六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下）

72

1967 年元旦，《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经毛泽东审定，传出一个信息：新的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向党内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深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用一句话即社论题目的话来说：这一年，将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年。

当年 4 月，周恩来又传出毛泽东的话：「今年 2、3、4 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更长一点时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22。）

在此之前的 1966 年 10 月，毛泽东还说过：「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5 册，页 151。）

总之，在毛泽东原设想中，1967 年应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至少应是其形势能够明朗或其局面能够得到控制的一年。

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1967 年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形势最不明朗、局面最为混乱的一年。这一年，派仗打得最凶，人员死伤无数。后来形势发展更为严峻。老人家不仅在 1967 年结束不了这场革命，而且在他此后整个有生之年也结束不了这场革命。整个事态已成毛公不亡则文革不息之势。

毛泽东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却难以驾驭它、更无法结束它这一情形，对于他本人来说是非常尴尬的，但就事理而言实属必然。因为，老人家所发动的这场革命本身就不存在任何成功的可能性，无论在此革命的对象上，还是在此革命的方式上，以及在这两者的关系上，都是问题丛生且难以解决。

〈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身就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概念，故而也是一个能将这场革命的对象问题搅得混乱不清的概念。

就字面意义来看，这一概念不可能具有它应有的确切涵义。一个明显事实，就是这个概念的炮制者本人，对于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这类问题，是不甚了了的。

毛泽东无疑拥有相当丰富的中国乡村生活经验和中共革命斗争经验，但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的情况，既缺乏亲身感受（他从未去过西方国家），又未做专门研究（其本人读《二十四史》的兴趣更甚于读《国富论》和《资本论》的兴趣），因而不大可能在这方面形成较为实际且较为系统的看法。

他的执政实践也表明，他既不大懂资本主义的经济，例如，不伦不类地将只有新中国才有的所谓「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现象，直接与「资本主义」画等号；也不大懂资本主义的政治，例如，在与外宾谈话中承认自己不能理解「水门事件」，不能理解几小卷磁带就能把一位大总统搞下台这一合乎西方政治运作程序的事实。当然，这种不理解丝毫不妨碍他仍能就此问题说上一大通自以为是的话。

就这些概念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所谓「走资派」，主要指执政党内那些未能很好地听毛主席话故而为他所不满的干部。问题是，毛主席话本身就不确定。他常常先是说一个人的好话，继又说这个人的坏话；

今天举荐一个人，明天又打倒这个人。这几乎成了他如何使用干部尤其是如可使用高层干部的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先是整倒刘少奇，继又整倒林彪，后又整倒邓小平；可这三人原先均是由老人家自己委以重任的，尤其后两人最后获他重用的时间均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这后两人情况恰好表明，不要说普通群众不大清楚这场运动究竟要打倒哪些人，就连毛泽东本人最初也不大清楚他发动这场运动究竟会打倒哪些人。

毛泽东为整「走资派」而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一群众运动有一显著特点，用〈十六条〉的话说，就是「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也就是说，这一运动尽管是由执政党主席发动的，但其进行过程既不受执政党组织控制，也不受政府部门领导，而是靠群众自己来运作的。

然而，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又不予以控制，对于任何一个原本有序的社会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因为，在一个有序的社会尤其是一个因集权统治而高度有序的社会中，大多数群众都受到较为严厉的约束和控制，过着十分拘谨的生活；故在他们心底，对于那些长期管束他们的社会监控系统，一直存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抵触情绪；而当他们一旦被解除各种约束并拥有可以冲击一切的权力时，就回自然地将他们的矛头指向他们心中长期感到不快的东西，指向各种制度，指向各级官吏，其后果只能是全社会无序化。

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正是如此。昔日的群众一旦成了「造反派」，就首先大造社会监控系统的反，人造体制和官吏的反，逢规章制度就当「管卡压」来破除，逢领导干部就当「走资派」来打倒。他们造遍了旧体制和旧官吏的反后，接着又造其它造反派的反，与他们大打派仗。于是，这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运动，成了一个「打倒一切」的运动、一个「全面内战」的运动。

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群众运动，也对参与其间的人进行选择，选择那些特别适应于它的人、那些特别适应于在乱世中大展手脚的人，并把他们送上运动的潮头，任其兴风作浪。这就使得本来已很混乱的运动，再添一层混乱。

例如，那些或有着强烈的叛逆性倾向的人、或有着强烈的冒险性倾向的人，就特别适应于这所谓的「造反运动」，故而比较容易在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其间的领袖人物。这便印证了那句老话：「乱世英雄起四方」。

另外，某些有着强烈的投机性倾向的人，也比较适应这场造反运动，比较容易从中脱颖而出。这场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由最高执政者本人发动的。运动初期京沪两地的一些造反人物，就是在毛本人直接或间接授意（即所谓「打招呼」）下而采取「革命行动」的。换句话说，这些造反者是在拿到了「尚方宝剑」后而去行事的，或说是在看到了「底牌」后而去押宝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参与这种「造反」，就不是什么要冒很大风险的事，而是一件大有机会可趁的事。

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不确定的，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也是无秩序的；若再两方面联系起来看，此次革命所具有的那种荒诞性质就更是显露无遗了，同时，老人家能够发动这场革命却无法结束它的那种尴尬境况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在这场革命之初，毛泽东的主要意图是要解决执政党高层中的领导权问题，是要整一整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整一整那些已不太听话的中央大员们。显然，他这时想整倒的人不会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当运动即将全面铺开之时，老人家还通过〈十六条〉再次强调，在执政党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大多数」，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这是在告诉人们：此次运动的打击面不要太宽了。

然而，当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并不予控制时，其锋芒所指就不会完全限定在发动者原先所设想的范围内。他们既会去冲击发动者曾让他们去冲击的对象，也会去冲击发动者未叫他们去冲击而他们自己去冲击的对象。

结果，他们冲击了几乎所有的当权派，所有曾经管过他们的这个「长」或那个「长」，给他们贴大字报，挂黑牌子，开斗争会。除此之外，他们还冲击了其它各式各样的人，其中包括与他们同属一类的人。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既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发动群众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扩大打击面乃至打倒一切的过程。

最初，姚文元文章发表后，运动的范围主要限于思想文化领域，打击面也主要限于某些知名学者，以及某些兼有知名学者身分的执政党干部——多是负责文教宣传工作的干部。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发表〈5·16通知〉后，运动的范围则进一步扩大到大中城市里的大中学校，打击面也相应地扩大到学校中的部分教职工、部分校领导、以及那些由上级单位派下来领导运动的工作组。

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并发表〈十六条〉后，运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全国所有的文教单位和党政机关以及街道里弄，打击面也扩大到凡是「红卫兵」看不顺眼的一切人和物，其中有知识分子、党政干部、以及早先已被打倒过一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另外还有各种文物、各处古迹。

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发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后，运动的范围再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工矿企业、农村社队以及军事机关，打击面向上扩大到刘少奇、邓小平，向下扩大到几乎每一个工厂厂长和每一个公社书记。

转过年来，搞「一月革命」，反「二月逆流」，又打倒一大批省市

领导干部、国务院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整个执政党干部队伍似已到了「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地步。这正应了林彪的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的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66.12.3）〉，《林彪文选》，下册，页 241。）

就在整当权派的同时，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他们或因政治观点不同或因派别利益不同而相互打起派仗来了，先是文斗，继是武斗，其激烈程度已近乎历史上的国共战争。于是，这场革命的对象又扩大到造反派自身中来了，即造反派们不仅是革命的主体，而且自身也成了其它造反派欲予革命的对象。

运动发展到这个地步，无论是被迫卷入进去的当权派，还是主动参与其间的造反派，都获得了一种平等性，即都有了自己的政敌，都面临着被他人打倒的危险。

前文已谈到，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基本设想中，整「走资派」是目的，搞「群众运动」是手段。然而，这两者间关系并非固定不变，到了一定时候，手段便上升为目的，群众运动本身也成了高于一切的东西。

由毛本人主持召开的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任务。关于这一提法，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作了一个权威性解释：「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1966.10.16.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5 册，页 134。）

林彪在此会上，也说了类似话，也认为执政党中央内存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林彪文选》，下册，页 229-230。）

毛本人也主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为此与周恩来发生分歧。（高文谦，〈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本文引自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 1 卷，页 67-68.）并且，他也赞成陈伯达等人就此问题所作的解释，批示要将陈伯达讲话稿，「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105.）

于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迅即在全国展开。各地的造反派纷纷起来揭露各地的「走资派」是如何不准他们起来革命的，其中一些人还将矛头指向中央，指责刘少奇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资产阶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运动，故要求打倒他们。

如此批判，虽能将眼下的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同时也将毛最初发动这场革命的基本设想弄了个本末倒置：

本来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人，而去发动群众；眼下是，为了坚持毛主席群众路线或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而去打倒刘少奇等人。

原先，毛泽东为这场革命所设想的目的是整走资派，所拟定的手段是搞群众运动。如今，手段获得剧烈的扩张、膨胀乃至吞噬了目的，并使自身上升为目的，至少使自身显得比目的更重要些、更崇高些。

这个运动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声势，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惊心动魄，硬是将数万万万人激动得兴奋不已，如醉如痴。并且，这个运动还产生了超出其发动者所预料的巨大效能，不仅可以整「走资派」，而且可以扫「四旧」、斗「地富反坏右分子」，可以「让群众自

己教育自己」、促进「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

运动所具有的这种波澜壮阔的声势和这种横扫一切的效能，不只是震慑了毛泽东所欲打倒的那些人，还震撼了毛泽东本人，使他对这个由他自己发动起来的运动产生了一种敬畏感乃至一种信仰——真诚地相信，这场运动是伟大的，是神圣的，代表了民意，代表了真理。

老人家被感动了，被他自己造出来的东西感动了，并将之奉若神明，只是一味地去顺应它，而不约束它，更不准其它人去质疑它、阻止它。毛泽东为自己造了一个他必须依其行事的神。

正像费尔巴哈所说的神是人的「异化」一样，这场运动对于其发动者来说也是一种异化。毛泽东发动了这场运动，而这场运动又反过来左右着他。毛泽东鼓动着群众运动一个劲地搞下去，而群众运动也反过来裹挟着他一个劲地走下去，使他欲罢不能、愈陷愈深。

这种「异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毛泽东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与方法发生逆转，方法上升为目的，或者说，目的已不太重要，过程就是一切。这就好比某人原想摸着石头过河，可下到河里后，就总是在那里摸着石头，总是过不了河，因为，他已喜欢上了这样不停地摸着石头，而搞不清楚了摸着石头究竟要干什么。

其二，老人家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与方法发生冲突，目的是要打倒某些政敌，方法则在制造出更多的政敌，而要再打倒这些新增加的政敌，就还得再使用那个能制造出更多的政敌的方法。这就好比大师傅揉面，面多了掺水，水多了掺面，面又多了再掺水，水又多了再掺面……结果面团越揉越大，大到揉面者无法收拾的地步。

胡耀邦生前曾向其属下谈了他与毛主席的一次对话。他问主席：什么叫政治？后者答道：政治就是要把自己方面的人搞得越多越好，把敌人方面的人搞得越少越好。

毛泽东的这一说法，无疑是他搞政治的经验之谈，准确地说是他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之谈。他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十分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十分注意做分化敌对营垒的工作，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用吴稼祥先生在其《智慧算术》中的话说，毛此时搞的多是「加法政治」，即多用「加法」（争取盟友），少用「减法」（树立敌人），并最终使「和」数远大于「差」数。（吴稼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第1章（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老人家执政后，反其道而行之，大搞阶级斗争，到处寻找乃至人为制造阶级敌人，今天打击这一批人，明日打击那一批人，结果与他对胡耀邦说过的话正好相反：将自己营垒中的人搞得越来越少，将「阶级敌人」或「阶级异己分子」搞得越来越多。再用吴先生的话说，他此时搞的多是「减法政治」，并且是一减再减。

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尤为突出。就像当年国民党剿「匪」越剿越多一样，此时毛泽东斗「阶级敌人」也是越斗越多，不仅斗了绝大部分「当权派」，而且斗了绝大部分「造反派」，最后斗得身边寂寞，斗得举国抱怨。

就在他行将就木的1976年春，病榻前，只有「四人帮」一干人在谈阶级斗争新动向；深宫外，竟有成千上万人聚啸天安门广场，指桑骂槐文化大革命维护者。老人家愤然起身，抱病做了他平生最后一次减法，又抓了许多「反革命」、许多「四·五分子」。

数月后，大自然规律则对这位屡屡爱用减法的政治老人的生命，也做了一次减法。庆父退场，鲁难落幕。

### 73

如前所述，在文革前期高层权力斗争格局中，毛所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务系统诸大员；他所启用的突击力量，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他们直接操纵各种官方传媒和各种造反组织，既通过体制性方式，又通过非体制

性方式——也是更有效的方式，去打击毛授意他们去打击的对象）；他所凭藉的依托力量，是以林彪和叶剑英为代表的军队系统诸大员；他所藉助的后勤保障力量，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国务院系统诸大员。

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时，上述格局基本未变。这可以从此次会议人事安排上看出：

将国家主席刘少奇从中央常委排名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补进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名列第五位、第七位；将军队元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人补进中央政治局，占新补者总数一半。另外在此前数月（1966年1月），毛还同意将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四元帅提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补进中央常委会，名列第十。

另外，还将地方大员、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补进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紧排在毛、林、周之后，名列第四。

在这些人事安排中有两点得注意：

一、军队高级将领在文革前期有降有升。降者如罗瑞卿大将和贺龙元帅，升者如上述陈、刘、徐、聂、叶五位元帅，其中叶剑英在数月内连获四分要职，即中央军委副主席（1966.1.8）、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5.23）、中央军委秘书长（1966.5.23）、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8.12）。

从总体上看，升的面要大于降的面，基本上照顾到全军的各个方面，以及历史上形成的除「一野」外的各个山头，而不只是照顾到林彪的「四野」山头。由此可以看出，老人家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非常注意做军队方面的工作，以争取行伍中人的支持。

二、周恩来总理在文革期间获得更大职权。相对于其它中央一线大员来说，周受冲击最少，其权力范围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因接管许多「靠边站」大员的工作而得以扩展。

虽然周多受极左势力困扰（也曾为他们拥戴），但他也常使这一势力受挫。事实上他是这一势力屡屡想予撼动却又最难撼动的实权人物。

虽然周仍在党内招路第三，但此时二号人物林彪在抓权方面不如先前二号人物刘少奇，故而给他留下较多的权力空间。林毕竟军人出身，对诸多政务之事既缺乏兴趣、也缺乏经验，再加上身体多病、性格孤僻、常年深居简出，故不得不在许多方面让权他人。

由这两点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很注意争取盟友，甚至能够为此做出妥协。例如，毛曾经严厉批评过由周恩来副手李富春经管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斥之为北京的两个「独立王国」之一（另一「独立王国」是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但此时又同意将李补入执政党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常委会。这表明他为了孤立和打击刘少倚的党务系统，而不惜向周恩来的国务院系统作出让步。

毛所作出的这些努力是得到回报的。他之所以能将文化大革命的开场搞得那样轰轰烈烈，固然与他发挥了他的个人魅力有关，但也与他得到了他的许多下属——主要是军委领导人和国务院领导人——大力协助有关。

可是，到了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上述高层权力斗争格局便被逐步打破。由于会议将刘少奇等人力图控制群众运动的一系列做法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故而在两个向度上为造反派开了可以「打倒一切」的绿灯：

一是向后，可以清算一切。因为，在中共政治术语中，所谓「路线性错误」也就是全局性错误，因此，若要「彻底批判」某一错误路线，就必须触动与它有关的一切人和一切事。

二是向前，可以冲击一切。因为，凡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是应予「彻底批判」的。这实际上是给群众运动解除了一切约束，使其不可避免地朝着「打倒一切」的方向发展。上述高层权力格局的各个方面都将受到它的冲击，无一能幸免。

1966年10月18日，即中央工作会议正在举行之际，北京街头响起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清华大学校园里也贴出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

12月25日，清华大学蒯大富组织5,000人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并将他们誓言打倒刘邓的大标语贴到了天安门城墙上。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此后，刘与邓便被淹没在举国一片「打倒」声中了。就在党务系统中的当权派横遭冲击时，国务院系统中的当权派也陷入厄境。

这两个系统的关系本来就十分密切。其间的界线是相对而言的，甚至是相当模糊的，有许多相互交叉处。例如，薄一波若从历史渊源关系上看，与彭真、安子文等同属刘少奇的北方局系统，若从现任工作关系上看，又与李富春、陈毅等同属周恩来的国务院系统。又如，邓小平在历史上与刘少奇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现任书记处总书记的工作则他与后者捆绑在一起，同进同出，最后同遭贬黜。再如，文革初期工作组的工作主要由党务系统具体负责，但工作组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国务院各部委。

起先，国务院系统中的一些当权派因参加工作组而受到造反派追究。例如，北京地质学院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四进地质部，揪斗该部副部长邹家尤，控诉他在任地院工作组组长期间镇压学生运动。又如，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也以相似理由屡屡揪斗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

不久，国务院系统中的多数当权派因本部门工作而受到造反派冲击，一是批判他们多年来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二是批判他们在当前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之际妄图用抓生产来压革命。国务院的所有副总理和各部部长都被贴上了大字报，都受到了冲击。

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军队开始受到冲击。10月下旬，一些军事院校造反学生冲进国防科委大楼，从底层冲到顶层。11月上旬，又有军校学生冲进国防部大院，冲上总参谋部大楼。北京已无军事禁区了。

11月13日、11月29日，陈毅、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两次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学生，并作了旨在稳定军队的讲话。随即，造反派便将批判陈、叶的大字报、大标语贴到了大街上。此后，这些共和国元帅们的名字便频频与「打倒」、「炮轰」、「声讨」等字眼连在一起了。陈毅还获得一个「老右」称号。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其〈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中，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口号。于是，全国各地掀起「揪军内一小撮」运动。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等一批高级将领先后遭到揪斗。

1966年12月，主张一切都可以冲击的中央文革小组自身也受到冲击。

北京林学院学生贴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等大字报，后又又在天安门前两侧观礼台上贴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大标语。清华大学校园内也出现「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等大字报。北京大学署名「虎山行」的大字报宣称：「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由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校的一批老红卫兵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也在西直门城楼上刷下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他们撒传单、贴标

语、说「江青太狂了」，说「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这后面半句话的矛头显然已不仅仅是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是指向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了，指向老人家本人以及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158-162。）

面对群众运动的冲击，上述高层权力结构四个方面都作出自己的回应。

中央文革小组方面作出回应最快也最严厉。他们迅即将针对他们的冲击行动定性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十二月黑风」，并责成公安机关逮捕那些公开反对他们的人。

党务系统方面的领导人，大都被冲击得焦头烂额，已很难作出回应，只有刚从地方大员升任中央大员的陶铸最初还能够替这一系统的人和事说一些话。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同时兼任中宣部部长，以替代彭真和陆定一。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又一补进中央常委会，排名第四，位居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前，成为党务系统方面的最高职务者。

最初，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抱积极态度。但随着运动打击面不断扩大，尤其扩大到像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时，他就持保留态度了。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会前江青做陶铸工作，要他打头阵，向刘邓发难，但被他婉拒。在几次生活会议上，都只有陶铸和周恩来「从头到尾没有发言」。（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郑笑枫等，《陶铸传》（中国青年社，1992年），页358。）他在被打倒前数日，即1966年12月28日，还在中宣部说了这样的话：「刘、邓还是中央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147。）

陶是性情中人。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与中央文革小组联席会议上，

有人批评他不该保他的老同事王任重时，这位写过《松树的风格》一书而被誉为青年导师的人被激怒了：「这个样子，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郑笑枫等，《陶铸传》，（中国青年社，1992年），页350。）

陶铸不愿「落井下石」的结果，是自己也落到了井里，并承受了雨点般的石头。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时宣布：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随即，「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口号声，响彻北京，传遍全国。

1月8日，毛泽东亲作批判陶铸指示：「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上的照片和电视里都有邓小平的镜头，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在中南局宣传傅毛泽东思想都是假的，没有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毛泽东，〈对批判陶铸的指示（1967.1.8）〉，《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484。）

毛泽东一言九鼎。陶铸被正式打倒，一夜之间，由红线人物排名第四突变为黑帮排名第三。用其遗孀曾志的话来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妇孺老幼，几乎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6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郑笑枫等，《陶铸传》（中国青年社，1992年），页359-360。）

面对由群众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国务院系统领导人和军委系统

领导人都作出回应。由于他们的处境相对说来要比党务系统领导人的处境好些，故而他们的回应更有力些，并且是一次不成再来一次，直至将毛本人激怒而把他们重重打压下去为止。

国务院系统分管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在1966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召开的工交企业座谈会上，全盘否定由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反对在工交企业中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他们还拟出一个与中央文革小组意见正相反对的文件，即〈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亦称〈十五条〉）。新文件要求工交企业应结合原四清运动部署来搞文化大革命，应分批分期进行，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八小时生产。

中央军委系统的多数领导人，都反对在军队中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反对乱冲军事机关、乱揪军队干部。他们还敢于直接表明自己这一态度，并为此不惜冲撞为毛泽东所宠爱的中央文革小组，以致于这一小组组长陈伯达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就头疼。」（范硕等，《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

1967年1月20日，在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就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抄家一事，先是徐向前元帅猛拍桌子，继是叶剑英元帅猛拍桌子，前者拍砸了茶杯盖，后者拍折了手掌骨。老将军们如此狂怒，竟将当时不可一世的江青、陈伯达等人震慑住了，使他们哑然失语。会后陈伯达传给叶剑英一个电话留言，说自己安眠药吃多了，并申明将自己说过的「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那句话收回来。（范硕等，《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

1月24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元帅，在数次求见林彪而不获答复的情况下，坐车直闯林彪住地，当面向后者提出要搞几条规定以稳定军队。林彪虽自文革爆发以来一直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但此次连连点头，同意这位不速之客的意见。据徐向前事后分析，「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盘算，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账，对他不利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

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29。）

林彪当即口述命令，经书记记录整理成文，再经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小组联席讨论，定为七条，又经在京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增加一条，最后报请毛泽东批准，遂成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全军。此命令对军队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限制性规定，用了许多「不」字，如不允许乱抓人、乱抄家，不允许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得擅离职守，不要外出串联等等。（〈中央军委命令（1967.1.28）〉，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26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27-831；范硕等，《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5-586。）

国务院系统领导人制定了旨在稳定工交企业的〈十五条〉，由周恩来、陶铸、谷牧面呈毛泽东，当即为后者否定（1966.11.22）。时隔两个月，军委系统领导人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八条命令〉，由林彪、徐向前面呈毛泽东，则当场获后者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1967.1.28）林彪也当场致辞答谢：「主席，您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29。）

尽管国务院系统领导人进言和军委系统领导人进言在毛那里获得不同反响——由此可见后者对这两方面人的倚重和顾忌是有所不同的，但两大系统领导人都面临相同形势——各种矛盾正在激化，尤其是以1967年1月「上海风暴」为发端的夺权运动正在使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并且，他们大多还未被正式打倒，故都还负有维系国家秩序的责任，还拥有能为此事说话的机会。于是，他们联起手来作出他们理应作出的回应。

这就有了所谓「二月逆流」一幕。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这是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1966.7.8）中的一句话，后成为一句名言。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反复诵读它，用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文化大革命后的研究者也频频引述它，用以探寻这位老人家何以要发动这场革命的思想脉络。（王年一先生曾把载有这句话的据说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比作「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之一；王着，《大动乱的年代》第1篇，第1章。）

就字面看，这句话大而化之，有点类似「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样的话，无论是什么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拿来说一说。就内里看，这句话特有所指：说话者所要「大乱」的天下，指的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大员掌有许多实权的天下；说话者所要「大治」的天下，指的是他本人能够再度统揽大权以及能够实施他的诸多共产主义空想的天下。

因此，毛设想中的这个由「大乱」到「大治」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更替权力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实际发展过程也显示了这一点：先是1966年秋冬如火如荼的造反运动，继是1967年1月狂风骤起的夺权运动。

从当时形势来看，毛泽东之所以支持这一夺权运动，除要解决领导权归属问题外，还有一层用意，就是试图恢复社会秩序，即不仅要许多权力从执行刘少奇路线的人手里夺回到忠于他本人路线的人手里，而且要运用这夺回来的权力大治他的天下。

老人家毕竟是党、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下最终还是由他个人说了算。因此，他鼓励造反是有一定限度的，即只能去反那些不听他话的人，而不能反到他自己头上来，只能去乱政敌的部署，而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脚。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上演的仍是那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老戏。

当群众运动不仅打倒了毛本人想打倒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当权派、而且打倒了毛未曾想打倒的许多当权派时，当这一运动不仅搞乱了毛的政敌的部署、而且搞乱了毛自己的天下时，他就不会再放任这种局势没完没了地发展下去，而要设法控制它，赋予它一定秩序。

若要做到这一点，毛就必须重建权力系统。这种重建权力系统的过程，也就是所谓「夺权」的过程。

那么，要让哪些人来夺权呢？

用毛的话说：一是「革命干部的代表」，代表着能够对刘邓路线反戈一击的党政系统干部；二是「军队的代表」，代表着能够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军队系统干部；三是「革命群众的代表」，代表着造反派组织以及从背后操纵他们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三方面的人，构成一种被称作是「三结合」的权力系统，以替代原有的权力系统。（《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报》的社论，〈革命委员会好〉（1968年3月30日）。）

那么，要夺哪些人的权力呢？

在高层内要夺什么人的权力，毛心里很清楚，即要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务系统诸大员的权力、以及与他们联系密切的一部分政务大员（如薄一波）和一部分军方大员（如贺龙、罗瑞卿）的权力。这一任务到1967年初就已大体上完成了。

可是，在高层以下要夺什么人的权，他就不清楚了，也不可能很清楚，只是十分笼统地说要夺各地各部门的「走资派」的权。

至于他心目中所设想的「走资派」，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就过去而言，指的是那些与刘邓路线关系密切的领导干部；二是就当下而言，指的是那些敢于抗拒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干部。

至于在各地各部门中，哪些领导干部与刘邓路线关系密切，哪些领导干部敢于抗拒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就不可能搞得一一清楚了，

而只能藉助手下人——当时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与各地各部门的造反派——来进行确认并予以打倒。

然而，毛所使用的这些手下人，大多是靠造反起家的，大多是靠批斗领导干部而使自己获得显赫地位的。因此，他们的切身利益就在于打倒领导干部，并尽可能多地打倒领导干部。结果，他们把毛本要打倒的与刘邓路线关系密切的当权派，扩大为所有执行过刘邓路线的当权派；把毛本要打倒的敢于抗拒文化大革命的当权派，扩大为所有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当权派。

这实际上是要打倒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原因十分简单：其一，刘少奇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多年，与此相应，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大都听命过他，或说大都执行过他的路线；其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既显现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景象，又生出了许多背情悖理的事端，使得大多数人理解，至于那些首当其冲的各级领导干部就更感困惑了。

因此，与「夺权运动」相伴随着的，便是「打倒一切」。各地区各部门乃至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被造反派打落了乌纱帽。在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除了黑龙江省的潘复生外，其余者不是被打倒，就是被勒令「靠边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还被认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此会议结束数月后，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当作「走资派」来批斗，其中许多人被戴上了高帽子游街，被罚跪广庭大众面前，挨打，挨骂，蒙受各种羞辱。

与「打倒一切」相伴随着的，便是「天下大乱」。在大多数地方，旧的权力机构已被冲跨，新的权力系统还很难建立起来，从而出现了权力真空状况，或说是无政府状况。当时，全国所有省一级党政机关都先后发生夺权运动，但只有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五省市的夺权运动得到中央的迅速认可，（上海市 1 月 6 日夺权，《人民日报》，1 月 9 日转载夺权者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写了由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以示认可；山西省 1 月 14 日夺权，《人民日报》，1 月 25 日发表认可性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贵州省 1 月 25 日夺权，《人民日报》2 月 1 日发表认可性社论〈西南的春雷〉；黑龙江省 1 月 31 日夺权，《人民日报》2 月 2 日发表认可性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山东省 2 月 3 日夺权，3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认可性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另外 20 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夺权运动全都处于难产状况，其权力系统大部瘫痪，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各地夺权运动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也给执政党中央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并因此而激化了其间业已存在的许多矛盾。

前文已指出，毛泽东在执政党高层内，主要夺党务系统诸大员的权力，而对于政务系统和军队系统的许多领导人不仅不予夺权，反而多有倚重。

权力与责任一致。既然这两个系统的许多领导人仍拥有相当大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仍负有相应的责任：政务系统大员仍负有行使政府基本职能的责任，军队系统大员仍负有完成国防战备任务的责任。因此，他们对于眼前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的形势不能无动于衷。

另外，这些大员们除了负有职权上的责任外，还负有为许多已被打成「走资派」的人鸣不平的道义——勿宁说是一种情义。

这些尚在台上的人与那些已落台下的人，多有密切关系，或是在长期工作中建立的业务合作关系，或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袍泽故旧关系。

国务院分管财政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与各省市主管经济事务的负责人，就有过许多「条条」上的业务关系。他们每年都要数度见面，或核查本年度工作完成情况，或商讨下年度计划安排问题；平时还保持经常性电话联系、作请示，或予指示。长期如此合作，自然会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理解且相互照应的关系。

「文革」爆发不久，大多数省里的干部或被「揪出来」，或被「靠

边站」，而身居中央的李先念虽处境也不太好，但还能够说上一些话。这种情形对于后者不免有一种道义上的压力：本来大家一起做事；如今其它人因做了大家一起做的事而受到打击，我能够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吗？

在后来的怀仁堂会议上，李先念虽不是主角，但也站起来说话了，抱怨造反派整老干部太过，并坦言自己曾为此数度落泪。

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以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与华东地区一些省市负责人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不显、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等，曾长期在一起打江山，同属一个「山头」：第一次国共战争时，同属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南方游击队；抗日战争时，同属新四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同属华东军区或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他们之间的关系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可以说是一种患难之交、生死之交。

如今，老部下们纷纷落难台下，有的竟被造反派强行揪走，生死不明；而老首长陈毅、谭震林还能频频出席中央会议，还有一些发言权。这对后者来说有一个紧迫的选择：若要明付保身，只需闭上嘴巴；若要念及袍泽之情，就得开口说话。

陈与谭本来就属那种既重感情又爱说话的人，为党中两门「大炮」，此次也不例外，只是结果有些特别了：

前者口角生风，大会讲，小会讲，滔滔不绝且愤愤不平，以致留下话把，让造反派变出一个《陈毅黑话集》；

后者口无遮拦，为老部下陈丕显被造反派扣留事而虎啸怀仁堂，成了「二月逆流黑干将」。

## 75

1967年2月，在几次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上，几位国务院副总理与几位中央军委副主席——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

徐向前、聂荣臻等，联袂发难中央文革小组，指责后者鼓动造反派乱党、乱政、乱军。

随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人，将此事定性为「二月逆流」；再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将此事称之为「二月抗争」。

据当事人之一聂荣臻回忆，双方分歧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 一、要不要党的领导；
- 二、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
- 三、要不要稳定革队。

这些分歧自文革开始就已出现，到怀仁堂会议时达到高潮。（《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页 669。）

当时，执政党中央面临两方面难题：

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步履艰难，但必须要进行下去，老人家意志一向是不可违逆的；一方面，国家基本生活秩序屡遭破坏，但还得要维持下去，至少还得要管一管生产，这个天下毕竟是属于自己的。

并且，这两方面问题很难兼容，强调前者就要破坏后者，强调后者则会触犯前者。于是，如何处理两者关系又成为一个难题，一个更为棘手且更为迫切的难题。

于是，中央政治局自 2 月 8 日起，每两三天便召开一次碰头会，以协商处理上述难题。碰头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有两方面人参加，一方是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几位中央军委副主席，一方是负责文化大革命具体事务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可是，这两个方面人或因政治倾向不同或因情感倾向不同而更难相容。碰头会一开就是对抗会，就是吵架会。两相比较，还是副总理们和老将军们这一方脾气发得大些，桌子也拍得响些。

在 2 月 14 日会议上，叶剑英将军质问对方：「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他还质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年），页 587-588；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 2 卷（华夏出版社，1986 年），页 64-65。）

叶剑英后一段话颇有反驳力。按正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说法，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建立政权的一个重要经验，就在于它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巴黎公社之所以最后陷于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就在于它缺少一个较为成熟的政党；因此，无产阶级政权要依靠政党，要依靠军队。如今，陈伯达等人一方面支持造反、支持夺权，乱党、乱军；另一方面又大谈「巴黎公社原则」，甚至把上海造反派所夺取的权力机构命名为「上海公社」。叶话无疑是在嘲讽陈伯达：你身为党中大秀才，怎么连巴黎公社常识都弄不清楚？

后者似是感到此话分量，窘然作答：

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08。）

14 日会议上，徐向前将军也拍案相问：「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而且他还质问：「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页 832；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 2 卷，页 65。）

在2月16日会议上，双方又发生冲突，仍是一方气盛一方势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方面的人，怒气冲冲，吼声如雷，「大闹怀仁堂」。中央文革小组方面的人，基本处于守势，辩解要多于发难，低头记录要多于抬头发话。值此，「二月逆流」或「二月正流」达到了它的高潮。

谭震林副总理与陈毅副总理是此次会议主角，前者发了最大的火，后者讲了最重的话。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就向张春桥提出，要保陈丕显。张说，这要同群众商量。谭当即打断他的话，火气冲冲地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其它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说着便站起来，收起文件，拿着衣服，就要离开会场，同时留下话：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劝他不要走。陈毅也劝他不要走，「要在这里边斗争！」谭停住脚步转身道：「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李先念说：「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面泪！」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三次。」（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页65-69；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08-211。）

会后，谭震林仍觉话未说完，又上书毛泽东和林彪，继续倾吐心中不快：「这是我第三次反击。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

江青还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

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也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

……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布日，〈谭震林写信痛斥江青一伙〉，《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页28；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407-408。）

这些话今天读来，仍能使人强烈感受到说话者那种捶胸跺脚、指天骂地的狂怒来。

在中共党内生活中，谭震林有两大特点：

一是敢担当、敢讲话，素有「谭老板」称号。此次，他发的就是他的那个「老板」脾气，竟说要造当时直接隶属于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反，甚至将当时不可一世的江青比做「武则天」。

二是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属毛的老班底。谭在怀仁堂上说：「我从并岗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对毛主席！」他说的是实话。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是「毛派」，并因此而受到当时左倾中央的歧视。后来，他也一直是毛的铁杆拥护者，以致谁与毛的意见不同，他就和谁急。1959年庐山会议，他为维护毛以及毛所发动的「大跃进」，不惜与他多年交好的黄克诚拍案大吵，甚至不惜将他一向敬重的彭老总比做是后脑有反骨的「魏延」。（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82-183。）

然而，这场文化大革命伤透了他的心，并因此而伤害了他与毛的关系。他虽未直接责怪毛，但已将毛全力支持的群众造反运动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说得一无是处，并说着就要拿衣服走人，还嚷着「我不干了，不跟了！」其怨愤情绪已波及到他那位老上级了。尤其他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等于在说这一次党又犯了路线错误，并且是最严重的路线错误。如此说法显然已将毛泽东主席置于难卸其责境地，同时也为说话者本人自掘陷阱。

当出席会议者向毛汇报到谭拿衣服要走人那段情景时，老人家冷冷地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随即，谭老板就被抛出来了，写有「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的大标语贴遍全国各地。

陈毅就在劝说谭震林不要走留下来作斗争时，也说了一段话，一段不太长但能深深触痛毛泽东的话。话的大意如下：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

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了修正主义吗？（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10；《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年），页 609；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 2 卷，页 67。）

就笔者所见，国内有关「二月逆流」文献在谈到陈毅这段讲话时多是语焉不详：或只提到陈讲了话，但回避陈讲了哪些话；或虽列数陈讲了哪些话，但回避陈话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也是最能触痛毛泽东的涵义。

陈毅这段话几乎是直接了当地说，毛泽东总爱重用那些拥护自己「最起劲」的人，可那些人到头来竟变成了或将变成反对他的人。

他先是用过去完成时态叙述，即「历史不是证明了」：谁反对毛主席——这里明指刘少奇等人（刘等此时已被公开打倒）；继是用将来进行时态叙述，即「将来还要看」：谁反对毛主席——这里暗指林彪（数月前陈毅曾在家宴上向他的几个老部下谈道：「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陈毅传》，页 600-601。）。）

再是用斯大林生前重用赫鲁晓夫身后却为赫鲁晓夫否定这一教训，进一步影射毛泽东用人路线。可是，许多文献在评述陈毅这一讲话时，对于非常清晰的近乎白描的第一点反倒避而不谈；对于不那么直截了当的具有影射性质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却谈得很清楚，还加括号注明这是「指林彪」的。

这或许是为尊者讳，不愿谈一个受尊敬的「老革命家」在讽谏本党主席的同时也殃及了另一些「老革命家」。然而，这里避讳的是「二月逆流」的一个关节点，一个最终把毛泽东激怒起来进而改变整个事态进程的关节点。

陈毅在中共高层里属于有胸襟气度者。他说上述那些话，主要不是针对此时已经落难的刘少奇等人，而是藉此，一来表示他对毛泽东用人路线的不满，二来倾吐他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怨。这两点均触到毛心中最敏感处。

毛泽东在用人方面，特别是在用人搞内部整肃方面，总爱重用那些非常顺从自己且又非常严待他人的人。在江西打「AB团」时，他重用李韶九，结果搞了扩大化，冤杀红军将士无数。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他又重用康生以及刘少奇等人，结果也搞了扩大化，整出「特务」一万五千人。

李韶九和康生属坏人，已有定论。刘少奇不能说是坏人，但其工作方式方法有许多问题，尤其在处理人问题上偏于严厉，或说偏「左」。刘这一问题在他后来参与领导「土改」、「反右」、「四清」等运动时都有所表现，甚至在他刚被卷入「文革」时也有所表现。延安整风扩大化错误固然与康生有很大关系，似也与刘少奇等人有很大关系，更与重用他们的毛泽东有很大关系。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毛三赴中共中央党校道歉，承认自己应对此事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75-281。）

在延安整风中还有一个不大为研究者重视的现象：就当时中共高层来说，参与整人的人，相对说来战功不大，甚至战功全无；而被整治的人，除留苏派外，大多战功卓著。

陈毅在述话中提到的那几个在延安「最起劲」拥护毛的人，除邓小平外，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出身，准确地说是曾由刘少奇领导的中共北方局系统出身，故都不属军中元勋。另外，陈毅此时不便提到的正坐在台前的康生也不属军中元勋。

就刘少奇个人来说，虽革命资历很老，但军事生涯不长。他参加过长征，但职务仅为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属军团长彭德怀和军团政

委杨尚昆的下级，任期只有数月；此后还任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属下的地方工作部部长，任期也是数月。还任过新四军政委，但真正在职期也只是一年多一点时间。他参加过新四军的皖东根据地和苏北根据地的创建活动，但一般不直接插手军事指挥工作，而主要是过问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如批评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过于屈从国民政府，而主张新四军不受蒋介石节制，放开手脚壮大自身力量，尽可能多地夺取蒋军韩德勤部地盘，以建本党根据地。（叶飞，〈少奇同志与新四军〉，《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05-113。）

他后被调回延安总部工作，1943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位居朱德之后、周恩来之前（周由第一副主席降为第三副主席），1944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名列毛泽东之后、朱德之前。

邓小平军事生涯要比刘少奇等人丰富些。他曾参与红七军创建活动，曾担任八路军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政委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政委等要职。不过，他主要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故在战功上不能与刘伯承等老帅相提并论。

在被整者中，既有当时代为行使八路军总指挥实权的彭德怀，也有当时代理新四军军长职务的陈毅。即是说，当时中共两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军事长官均属挨整对象。

刘少奇本人，既参与组织华北座谈会，整了彭将军的风；又支持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搞出「黄花岗事件」，整了陈将军的风。（《陈毅传》，页283-288、491-496。）不过，此饶氏后来反戈一击，又与高岗联手整他的前上司刘少奇。

中共声言「枪杆子出政权」，故而对其军人多有依时。中共又强调「党指挥枪」，故而又对其军人多有约束，尤其是对那些能征惯战的悍将型军人多有约束。

因为，这些军人有英勇无畏之气概，又多有桀骜不驯之脾性，既不畏惧外部的强敌，也不畏惧自家的领导特别是那些长于耍笔杆子的

领导，甚至不畏惧那个当政委出身的毛主席。因此，为了保证党保证毛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需要在适当时整肃一下这些军人。延安整风则提供了这一机会。

那么，起用什么样的人来从事这种整肃活动呢？

若起用军人来做此事，将会遭遇袍泽之情这一难以逾越的障碍。若让陈赓去向彭老总放放炮，或让叶飞去向陈老总提提意见，问题都不大；但若让陈叶二人分别组织一帮人去斗各自老首长，似不大可能。

毛泽东将目光落到了这样一些人身上，他们多是出自中共地下党组织，或说出自中共北方局系统，故与军队没有多少历史瓜葛；他们本身也具有某些适合于做此项工作的素质，他们曾长期在「白色恐怖」中作地下斗争，其中一些人还坐过大牢，经受严刑拷打而不改革命意志，故在其性格中也有较硬朗的一面，并不十分怯于那些剽勇强悍的军人；他们曾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故在对人的揣摩和对事的筹划上都颇为老道，甚至能够为了某种需要而搞出一些深文周纳、强加于人的东西，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为了维护毛泽东，竟能板起面孔硬说彭德怀将军「里通外国」、「搞非法组织活动」。

毛泽东起用这些人还能获得其它方面益处：

一是可以在自己与那些资深军人（如彭德怀、朱德等）和那些有军人背景的资深党人（如任弼时、周恩来等）之间，建起一个缓冲层，从而使自己在与这些实力派人物打交道时，能有一个较大的回旋余地。

二是可以充分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因为，把这些战功不多的人提拔到那些战功卓著的人之上或安排到能够有效监控后者的岗位上。

既使他们能深深感到党主席对自己的重用，故十分效忠后者，如陈毅嘲讽的，这些人先前根本没见过主席，可到了延安后「最起劲」拥护主席。

又使他们能深深感到周围人对自己的压力，感到那些身经百战者

正用一种审视且不服的眼光注视着自己一言一行、故而做起事来十分谨慎，十分勤勉，并很注意搞好同一部分军人关系。刘少奇在担纲「中央一线」时，谨言慎行，一日工作常达十六小时，并很尊重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以及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罗瑞卿大将。

然而，党毕竟崛起于暴力革命，是靠枪杆子安身立命并打出一片天地的，故其军人功劳最大。按情理说，贡献应与权利一致；但实际上，许多战功赫赫的人竟要屈尊于一些战功平平的人之下，并事无巨细地接受他们的领导。显然，前者心里不会感到十分平衡，其中一些人还会将他们心中不平以某种方式表露出来。

建国初期，曾有高岗和饶漱石联手反对刘少奇事件。在高饶提出的许多条反对理由中，有一条是所谓「军党论」，即认为这个党本来是军队创造的，其大部分骨干是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如今却让非军队系统出身的刘少奇等人占去过多权力，「红区」党有被「白区」党取代之势。

高饶的人品均有问题，并且他们所搞的「倒刘」活动也有可议之处，比如人们可以把他们这种私下串连以反对其它同志的做法说成是阴谋活动。当然，他们也可以为自己作出辩护，比如可以援引长征初期毛泽东私下串连王稼祥、张闻天以反对当时执掌大权的博古、李德的做法来模拟自己的做法。

高饶的反刘举动确有问题，但其间反映出来的情绪有一定代表性。在建国初期六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不仅东北的高岗和华东的饶漱石不服刘少奇，而且西北的彭德怀和中南的林彪（此二人在中共战功榜上为数一数二人物）也都不怎么高看刘少奇等人。所以，当彭德怀被打倒时，毛泽东翻出旧账：「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高饶联盟实际上是「高彭联盟」或「彭高联盟」；（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17，328。）当林彪被批判后，邓小平也翻出旧账：高岗「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

平文选》，第2卷，页293。）

中共高层里的人特别是那些挨过整的人，大都心里清楚，延安整风扩大化错误固然与刘少奇、康生等人有关，但根子不出在这些人身，而出在那个对他们大加重用的人身上。

陈毅在怀仁堂翻老账时，虽字面上是在奚落刘少奇等人，但骨子里是在警诫老人家：你过去搞延安整风用错了人，如今搞文化大革命又用错了人，用了那些先是拥护你继是反对你的人，即十分类似赫鲁晓夫的人。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冲着毛泽东大吼：你在延安操了我40天的娘（指1945年华北座谈会整彭约40天），我在庐山就不能操你20天的娘（指庐山会议前期反「左」约20天）？彭的话粗了点，但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想法：我在延安挨整就是你主的事。

另外，彭的骂娘话还透出他的这样一些心态：

一是对那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党老大存有不服之心，即这个党不能只许你来整治别人而不许别人来批评你，你能整别人，别人也能整你。这是以讲粗话的形式坦露了彭德怀要与毛泽东平等相待的心迹。这是一个无所畏惧的革命党人所应具有的心理素质，也是中共党内许多从不讲粗话的人如周恩来、刘少奇等最为匮乏的心理素质——挑战毛泽东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

二是对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整人现象存有怨愤之心，以致将它称为「操娘」，置于国骂肆虐之下。

延安整风运动，无论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还是对于中共党组织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把毛泽东确立为中共的绝对领导者，使他在党内拥有几乎可以支配一切的权力，故而既可将他的许多长处尽其可能地表现出来，施惠他所领导的党，也可将他的许多弱点无以复加地表现出来，贻害他所统治的国家。

就当时来看，延安整风运动过于突出毛泽东个人不能说全无意义。此举至少适应了当时中共在全面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时的需要，即需要有一面人格化旗帜来统一党内各个山头、各种主张，真正做到「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从而有效集结自己的所有力量用以打击自己的主要敌人。

就长远来看，这种做法隐有相当大的负面意义：

其一，混淆了革命党的性质，而将它染上浓厚的封建宗法团体色彩。一个凌驾于全党同志之上的党主席，俨然如旧式会党中的党老大或掌门人：他可以监控所有党人，而自身不受任何监督；他可以对所有犯错党人施以严厉家法，而自己不论犯小错误还是犯大错误都不受任何制裁。这就使得中共组织具有许多不光明性质。

其二，混淆了事非上的标准，而将它定位在党主席个人身上。自延安整风运动始，中共党内逐渐形成一种看法，认为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毛主席的欲求就是本党最大利益所在。显然，这种看法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把毛确认为一个绝对客观且绝对公正的人。可是，这个前提很难成立，因为，一个乐于做一个唯我独尊的人，无疑有人格方面的缺陷；而一个旨在维护一个唯我独尊的人的体制，则能把他在人格方面的缺陷腐蚀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相对说来，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影响显现较早，很快显现在那面于1949年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上。延安整风运动的消极影响并非一开始就十分突出，而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凸显出来，最终极度凸显在这场乱党乱军乱国的文化大革命中。

不管后人怎么看，毛泽东本人无疑将延安整风运动视为他平生一大杰作，并对之呵护有加，只准其党人称好，不准其党人说坏。延安整风运动的负面意义遂成中共党内禁忌。

可如今，陈毅在怀仁堂上将它提出来，揭了短还不够，还要挖苦一下。这不只摸了老虎屁股，还摸了老虎胡须。

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与会者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

据常事人王力回忆：「我注意到，汇报前面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405-406。）

18日夜，毛泽东紧急召集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等开会，说了许多怒气冲冲的话：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一二三，97%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

毛泽东最后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此事，并说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退场。（趟峻防、纪希晨，〈「二月逆流」——中国：1967年纪事〉（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页223-224；《陈毅传》，页283-288，页491-496，页610-611；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409-410。）

说是提议，实已不容商量了。

政治局奉命行事，自2月25日至3月18日，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严厉整肃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指责他们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违心检讨，痛责自己种种不是。

3月18日凌晨，最后一次「政治生活会」结束。陈毅对身边秘书感慨道：真是巧合，四十一年前今天，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时隔四十一年后，我又挨批判。（《陈毅传》，页611。）

不过，这两个3月18日对于陈毅来说，还是有些不同，前者只有失败，后者不仅有失败，而且有屈辱。这种屈辱不仅在于君子蒙受小人的百般奚落，而且在于君子良知遭遇君子嘴巴的公然背叛。这怎能不让陈老将军黯然神伤。

## 77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3。）

这是《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篇文章中的第一句话，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尊奉的一个政治信条。他无论在党外打老蒋，打日本人，还是在党内斗王明、斗张国焘，都能够把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搞得清清楚楚。

不过，他晚年搞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另一番景象：

在文革前期，他还能将他要打击的对象是谁和所要依靠的力量又是谁这些问题搞得大致清楚；当打倒了「刘、邓、陶」后，他开始将「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问题搞不清楚了；又当反击了「二月逆流」后，他又开始将「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问题搞不清楚了。

老人家先斗自家营垒外的人，斗得举目无敌，又转过身来整自家营垒内的人，整得举目无亲：先是整陈毅、谭震林这些中共元老；继又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秀；再又整林彪、陈伯达这些老

部下、老亲信；再后仍是，此时打压一下这拨人，彼时打压一下那拨人，既批「四人帮」，又批「右倾翻案风」。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反「二月逆流」是一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毛还可勉强地说，运动正按照其预定部署向前发展着；在此之后，他完全就是摸着石头下河了，他已不能预料自己将会摸到什么东西、将会摸向什么地方。

1968年10月，林彪在中共十二中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主席原定在1967年的3、4月分要见到文化大革命的眉目，但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致使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聂荣臻回忆录》，下册，页858。）

林这段话无疑有许多可议之处。比如，他可以说那些掀起「二月逆流」的人应对文化大革命陷入困境负责，别人也可以说那些反击「二月逆流」的人应对此事负责。不过，林话倒也说出一个事实：自「二月逆流」事件——既包括那些「发难」事件，也包括那些「反击」事件——后，文化大革命前景已变得十分不明朗了，已不可能获得令发动者本人感到满意的结局了。

毛泽东为发动文革而组建的政治营垒包括三个集团：

其一，中央文革小组。这主要是一个秀才集团，其间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以陈伯达为代表的北京帮，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二是以江青为代表的上海帮，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等人。

其二，林彪集团。这主要是一个军人集团，其主要成员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林彪办公室主任亦是林彪夫人叶群。这些军人均出身于曾由林彪统领的「四野」即「东北野战军」。

其三，周恩来集团。这主要是一个元老集团，在周恩来以下有所谓「三老」、「四帅」。前者包括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皆为国务院

副总理。后者包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皆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前者中的李富春被周恩来指定为副总理小组组长，负责协调各方面工作，后来，因此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后者中的陈毅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外交工作，是一个常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之间走动的人，后来因此被冠名为「二月逆流」的「联络员」。（《聂荣臻回忆录》，下册，页 859-860。）

就这三个集团相互关系看，他们一方面因毛泽东召集而坐于一张桌子前来，另一方面又因不同背景和不同欲求而各成系统，时而相互援手，时而相互争斗。例如，中央文革小组与林彪集团既为整周恩来集团而结成同盟，又因向毛泽东争宠而相持不下。又如，周恩来集团与林彪集团，在是否要制止造反派搞乱军队这一问题上共有共同点，并协力制定出「军委八条」；但在由谁控制以及怎样控制军队这些问题上又存在严重分歧，以致林彪声言要批「带枪的刘邓路线」，要揪「带枪走资派」。

就这三个集团与毛泽东关系看，他们既有听从老人家指挥的一面，也有试图按照自身欲求行事的一面。他们的欲求与毛的意图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在如何对待老干部问题上，周集团与毛有分歧；在是否要打倒一切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与毛的本意也不尽相同。

毛泽东在处理自己与这些集团关系时，也相应采取两方面举措：一方面予以重用，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予以控制，以防止他们尾大不掉。

就毛对这些集团的控制来说，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对他们耳提面命，直接予以督导；二是使他们相互制衡，间接予以操纵。

相对说来，后一种控制方式更有效些。好比在一架天平上，若把所有重物都置于一边的话，那么，为了获得平衡，就需用等量砝码置于另一边；反之，若把许多重物分置于两边的话，那么，为了保持平

衡，只需用少许砝码或置于这一边或置于那一边。

这种分而治之方式，是史上许多专制君主常常采用的或不得不采用的统治术。他实行独裁统治时常常遭遇一个人应对许多人的局面，故不堪其重、不堪其烦。他们若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得设法将这些人分离开来，并使他们相互抵牾而处于僵持不下状态，从而使得自己或超然其外以静观其变，或插手其间以力促其变，并且所用之力向左向右都收决胜之效，是大是小均在随意之间。

这种统治方式尤为适合毛泽东需要。此公执政，既要总揽党、政、军大权，又要过着优哉优哉生活——随心所欲地博览群书且随心所欲地饮食男女，常常穿着睡袍治理天下——至穿着睡袍出席陈毅元帅的隆重葬礼。对于他这种类型的执政者来说，最适意的执政方式自是那种无须事必躬亲却能事半功倍的分而治之方式。

在毛所组建的文革营垒中，中央文革集团和林彪集团主要做鼓动群众起来造反的事，属不稳定力量；周恩来集团则主要做维系社会基本秩序的事，属稳定性力量。

在这个营垒中，有两个集团激进，有一个集团稳健，有两个集团四处动乱，有一个集团四下安抚。前两个集团由于受到最高执政者较多关照，故势头强劲，后一个集团由于老成持重并握有许多实权，故能对前两个集团予以制约，故能使整个营垒保持一定平衡。

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打破了这种平衡，周恩来集团遭到沉重打击，中央文革集团和林彪集团则获得迅速扩张，致使毛的政治营垒发生极度倾斜，其稳定性方面急剧坍塌，其不稳定方面极度摇摆，并危及毛自身安全。

周恩来集团大部成员因受批判而靠边站，以致许多政府工作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中央文革集团则到处鼓动打、砸、抢，以致将「文化大革命」弄到天怒人怨的地步。林彪集团则乘势抢占军中实地，排除异己，安插亲信，真心想把解放军变成一支如他们所说的「由毛

主席亲手缔造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军队，并几乎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军队已有相当大一部分不姓「毛」而姓「林」了。这一集团遂成老人家执政数十年所遇到的对其权力乃至生命最具有威胁性的政治力量。

于是，毛又转过身来打压这两个集团，先是揪出中央文革集团中的「王关戚」，抓了许多「5·16分子」，继又连锅端掉林彪集团。好在他此前打压周恩来集团时留有余地，只是严厉批判「三老四帅」，而未彻底打倒他们，仍将他们留在营垒中，当然只是将他们留在营垒中的边角处，罚他们站在那里，听任其他集团的人朝之讪笑，做鬼脸，吐口水。

毛一方面发起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另一方面邀请这一逆流主要当事人于当年4月30日到家中开所谓「团结会」，还允准他们公开出席「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来还允准他们中除谭震林以外的所有人出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第九届代表大会，并让这些人作为「右派代表」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毛这样做似是出于这样一些考虑：

其一，周恩来集团主要成员在怀仁堂上举动并无大错。毛本人在作中共十二中全会闭幕讲话时也承认了这一点：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人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聂荣臻回忆录》，下册，页859。）

当然，毛做出这种怀柔的姿态是有前提的，即那些当事人必须先做出臣服的姿态，认错检查。事实上，也正是这个中共十二中全会整「二月逆流」整得最凶。据当事人聂荣臻回忆：会议组织者将他们

这些人精心安排在几个大组中进行围斗，「大搞逼供信」。林彪还在他的大会讲话中将「二月逆流」定性为：

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它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聂荣臻回忆录》，下册，页 856-859。）

在此情势下，「二月逆流」当事人在事发一年八个月后又痛做了一次检查。作为回应，毛泽东则以不知实情且超然事外的口气将他们犯错误的事轻描淡写一番。他的「恩威并重」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周恩来集团自身分量很重。他们是元老派，是中共历史上形成的许多重要「山头」的代表人物，也是实权派，是仍在台上的党政军负责人。若要打倒他们，就会在他们的一大批老部下中激起不满情绪，在他们的主管领域里造成失控局面。

这些人可以说是毛泽东多年整人整剩下来的最后一拨中共元老。若再将他们整倒的话，就会使中共党组织应了「洪洞县里无好人」这句戏言，不仅这个党的革命历史说不清楚，而且毛自己的革命生涯也说不清楚！似是带着一帮子「坏人」浴血奋战数十年。

其三，这一集团仍可被毛用来搞政治平衡，用来钳制另外两个集团，遏制他们过于扩张的势头。后来事实发展也显示了这一点：该集团先是助毛打压中央文革集团中的「北京帮」，继又助毛平息「林彪事件」，收拾残破的局面。

## 78

中央文革小组及其追随者，是一个新兴的权力集团、一个靠造反起家的权力集团。不过，他们所造的这个反隐有一个矛盾：造反的始作俑者，是执政党主席毛泽东；造反的主要对象，就体制来说，属于

执政党自家的权力系统，就人事来说，多为毛泽东本人的老部下。就毛泽东方面说，本是想改变既有权力体制中的某些部分，而不想触动其中的根本点，本是想清洗既有干部队伍中的一小撮人，而不想打倒其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后者可以教训一下，但不要一棍子打死，可以「烧一烧」，但不要「烧焦」。

就反派方面说，则很难把握好这个度：若不积极造反，若不豁出去造反，就不能取悦于毛，就不能获得他的重用；但若将这个反造得忘乎所以，造得有失分寸，就会获罪于毛，就会在自己好不容易爬到一定高度后又被他反手一巴掌打落下去。事实上，绝大多数造反派都把握不好这个度，都是造反造过了头，都是开场轰轰烈烈收场凄凄惨惨。一直能从 1966 年火红到 1976 年的造反英雄是十分罕见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绞杀中，老干部的幸免率很低，造反派的幸免率也很低甚至更低。老干部还有所谓「重新解放」的可能，即在被打入「牛棚」后还会复出的可能。造反派就没有这样的可能，一旦失势就很难再起于东山。

造反派们之所以把握不好这两个限度，有两方面原因：

就主观方面说，或是因他们多有野心，希望得到的东西要多于毛打算给他们的东西；或是因他们过于单纯，搞不清楚哪些东西是毛要他们反的，哪些东西是毛不要他们反的，哪些东西是毛撒开手来的，哪些东西是毛紧握不放的。

就客观方面说，他们的身边有一种狂热的氛围，促使他们争做革命派，争用最激烈的言论和行动来攀比谁最革命；他们的面前也确有一片诱人的空间（刘少奇集团面临崩溃而将留下一整块权力空间，周恩来集团面临重创而将让出一部分权力空间），诱使他们去为此而大展手脚。

然而，一定权力体制内的空间既是有限的也是有序的，因此，当某一集团过度扩张自身的空间时，就不仅会因侵蚀其它权力集团的空

间而激起他们的强烈反弹；而且会因破坏整个权力系统的秩序而激起这个秩序的最高监控者的强烈反弹。

毛泽东毕竟是这个党这个国家的最高执政者，故须对其治下的许多人和许多事作出统筹安排，酌情让一定的人办一定的事，酌情给一定的人以一定的权，而不会允准手下人去无限制地扩张自己的事权。他可以让中央文革小组去抓文化大革命的事权，但不会让他们去抓国务院的事权、去抓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外交要务，至少眼下不会让他们去这样做。他心里清楚，这些人是做不了这些事的。

周恩来深知毛的想法故而敢向毛曾支持的造反派发出警告：中央的党权、政权、军权不能夺，政权中的外交、财政、公安的权不能夺。你们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不能把党政发号施令的大权都夺过去，要有界限。（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11-215。）

毛泽东所支持的造反和夺权是有限度的。反可以反别人，但不能反到他自己头上来，不能反到正由他直接监控着的国家中枢权力。造反派可以夺各省市的权力，但不能未经毛的允准而夺中央的权力。中央大权的举废予夺必须由他本人来拍板决定。他只准夺由刘少奇领衔的党务系统大权，不准夺军委系统的大权和国务院系统的大权。

他虽支持中央文革小组及其追随者去夺刘的党务系统大权，但又对这个新兴的还未成熟的权力集团不大放心，故授权周恩来从旁或予协助或予钳制。这就使得后者既总理政府各部门工作，又襄理中央文革小组所管诸多事务，频频出席各种「文革」会议，领衔接见或参与接见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既给以鼓励，又给以告诫。周公成了「文革」中最为忙累的人，同时也成了除毛公外最有实权的人。

毛不仅要亲自圈定夺权的对象，而且要亲自过问夺权的步骤。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夺下刘少奇亲信彭真等人的权力，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夺下刘少奇党内第二把手的权力，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又把刘少奇邓小平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都是严格按照他

的部署进行的。

然而，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在打倒陶铸问题上，未能很好地尊重毛的这一权威。当天陈伯达和江青在接见中南地区造反派时，径自点名批判当时还在台上工作的陶铸。结果，「打倒中国最大保皇派陶铸」的口号，迅即响遍全国，毛主席司令部第四号人物，一夜之间变成刘邓路线第三号人物。诚然，在此之前，毛本人已经对陶怀有不满，已想将他逐出中央（参见本书第73节）；换句话说，若没有摸到毛本人的真实意图，陈、江等人再有胆子也不敢做出这等大事来。可问题是，在毛本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具体安排时，陈、江等人就将此谢捅出来了，并代为办理了。这显然是对毛的权威的冒犯，属越轨行为，故要受到惩罚。

2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此事，发了火，讲了一些很重的话：（叶永烈，《陈伯达传》，页376-377，396。）「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老人家还抱怨道：「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从毛这一抱怨中可以看出，他非常看重自己对执政党中央的监控权，十分在意其间重大问题是否向他本人报告。任何人，不论是过去的刘少奇还是此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都不能无视他的这一权力；若有越权者，不论是重臣还是宠臣，都要受到他的严厉惩处。

他除了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狠批陈江二人外，还责成中央文革小组再开专门会议批评二人。此会于2月14日举行。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批评，使周恩来集团成员受到鼓舞，使他们半是趁着主席的气头半是顺着自己的性子，也起而痛说这些人倒行逆施，并越说越上

火，以致说成「大闹怀仁堂」之势。因此可以说，毛泽东 2 月 10 日的讲话以及中央文革小组 2 月 14 日的批评会，是「三老四帅」2 月 14 日和 2 月 16 日发难政治局碰头会的一个重要诱因。

不过，这个诱因是误导性的，即误导这些人也跟在毛的后面去敲打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可他们刚一这样做就遭到毛反身一记重击，随即又遭到他们曾敲打过的那些人反身肆意敲打，竟被打得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些人没有搞清楚——或在思想上搞清楚但在行动上把持不住——这样一个问题：

在毛泽东的党里，毛本人及其宠臣的错误，只能由毛自己来批评、来纠正，而其它人批不得、纠不得。毛很难容忍有人显得比他更正确、更高明。

此前在庐山会议上，也是他先批「左」的，可当彭德怀等人也来批「左」时，他就不能容忍了，一怒之下打出一个「反党军事俱乐部」。此后在 1975 年中，也是他先批「四人帮」的，先使用「四人帮」这个说法的，可当邓小平等人也来批这些人时，他也不能容忍了，痛斥后者肆刮「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打压中央文革小组半途而废，致使这一集团及其追随者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最终搞成「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局面。他们以往按毛泽东旨意造反，如今除了按主席旨意造反外，还按自己意愿造反。他们主要事业就是造反，就是不停顿地造反，不停顿地揪斗各种权威人物，不停顿地冲击各种权力机关，并在此过程中无限制地使用任何手段。

1967 年 7 月 18 日，中南海造反派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抄家和批斗。他们强迫刘在一片声讨声中「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同时在另处批斗了王光美，事后还将他们夫妇俩隔离监管起来。8 月 5 日，造反派再次批斗刘少奇夫妇，「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

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将刘打得鼻青眼肿、腰不能伸直。最不近人情的是，造反派还让他们的孩子（均未成年）到场观看。无论对于台上正受着各种凌辱的父母来说，还是对于台下正睁着惊恐眼睛的儿女来说，都是精神酷刑。（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卷，页27-31。）就在这同一天同一个中南海里，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也都受到羞辱性批斗。陶铸因其不屈服而被打得头部血肿。

而7月19日，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开始批斗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将军，将他打倒地下七次，打断肋骨两根，打得不省人事。仅隔一周时间，自7月26日起，北京造反派先后六次将彭德怀将军拉到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七次将他游街示众。在此过程中，「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低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此时他还有两根肋骨处于骨折状态。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游斗」中几度昏迷。（《彭德怀传》，页720-726。）

周恩来集团中的「三老四帅」均遭「炮轰」，有的还被抄家。尤其是爱说话的陈毅屡屡被造反派勒令检查，却总是过不了关，总是处在造反派围追堵截中，常常需要周恩来亲自保驾才能脱身。周恩来本人也未能幸免「炮轰」，先是被怀疑在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即曾在上海报纸上登过「反共启事」；（〈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1967.5.19，1968.1.16）〉、〈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的真相〉、〈「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468-480。）继又遭到「首都5·16兵团」点名批判，被指控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毛泽东的可耻叛徒」，等等。批周的传单撒到了北京的大街上。

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成了造反派所要冲击的首选目标，即使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也不能幸免。1967年夏，数十万红卫兵围攻中南海这一国家脏腑之地，要求交出「窝藏」在里面的刘少奇，不达目的就在红墙下安营扎寨数十天，天天都用高音喇叭向里面播送他们的「严

正声明」和「最后通牒」，其间不时冲击大门，致使门卫频频告急。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与林彪集团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常权派」的口号。于是，全国各地的军事单位又成为造反派的冲击目标。凡为造反派不满的军事首长，都被扣上「陈再道式人物」（陈因「7·20事件」而被解除武汉军区司令员职务）的帽子，营房被闯入，武器被抢劫，人员亦受伤害。

冲了内政机关，又冲外交机关。第一外国语学院造反派和第二外国语学院造反派，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请自来的常客，或静坐门前示威，或径直闯入办公大楼试图捉拿该部部长予以批斗。不久，北京造反学生又将冲击范围扩大到外国驻华机构，竟于1967年8月22日一把火烧掉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造反派们在冲击各种权威人物和各种权力机关同时，又相互打起派仗来。先是文斗，开辩论会，贴大字报，口诛笔伐。继是武斗，除原子弹和飞机外，各种武器都施展开来，一时间，枪声大作，炮声隆隆。四川省武斗已打到万人规模，广西省武斗则打出野外运动战、城市攻坚战、以及抢劫援越军列的铁路战等各种战例。整个国家处于失控中。

文化大革命搞到这个地步，毛泽东也坐不住了，也感到「天下大乱了」、感到有必要采取措施以恢复秩序。他毕竟坐拥这个天下，他鼓动造反派所反的东西，说到底是一个仍由他本人最后说了算的权力体制。因此，他支持造反派是有限度的，是会在后者超过限度时转而打压他们的。

为了平息武斗，他动用野战军来对付各地武装起来的造反派。野战军本是国家武装力量中一支随时准备打仗的部队，是解放军的精华。毛此前不准该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使之成了整个军队乃至整个国家中唯一一支还未被这场运动搞乱的有组织力量，成了他此时最后一支还可动用的预备力量。

几十个番号的野战军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迅速从各战备营房开至各武斗场所，首先隔离冲突双方，随后收缴各派武器，很快就平息了大部分地区的武斗，并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各造反的仲裁者乃至领导者的角色，接着又将后者挤到所在地区的权力边缘位置。各个地方政府一时间都成了军政府。草绿色最夺目。

为了追究天下大乱责任，毛又向中央文革小组开刀，先是切出王力、关锋，后又切出戚本禹，打出一个「王关戚反党渠团」。毛非常不满这些秀才以文乱军，不满他们在《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1967.8.1）〉，《红旗》，1967年第12期。〕一字千钧地批道：「还我长城」。他还非常不满王力发表支持外交部造反派夺本部部长大权的讲话，怒不可遏地斥之为「大大大毒草」。随后，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北京帮」除陈伯达外的所有人，都被打倒，都被送至秦城监狱收押。至于陈本人也仅是侥幸过关，并不再为老人家重用了。（叶永烈，《陈伯达传》，页428-449。）

毛还允准大抓所谓「5·16分子」，并同意将他们与「王关戚」联系起来，都归在「极左思潮」名下。1967年6月14日，「首都红卫兵5·16兵团」正式成立，其规模不大，仅在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商学院等高校中有少数成员，但其口号引人注目，竟高呼「打倒周恩来」。他们是造反派中的造反派，激进派中的激进派。他们此时所要打倒的周恩来，已是中共高层中唯一未受冲击的稳健派人物，故代表着这个高层中最后一点稳定性力量，或代表着这个国家中最后一点残存秩序。因此，若再打倒周公，「天下大乱」将乱上加乱，整个局面将不堪收拾。

显然，这一局面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他很快作出反应，拿激进派开刀，在上层拿「王关戚」开刀，在下层则拿这个小组开刀，并要由此开出一个大口子来。自当年8月起，北京方面开始打击这一组织，打击的力度越打越重，由批判到逮捕，由责令检查到刑讯逼供；

打击的范围也越打越大，由该组织成员扩大到其它造反团体成员，由北京一个地区扩大到全国各个地区；打击的时间也越打越长，一直打到毛泽东逝世后才不了了之。有趣的是，在抓「5·16分子」这一问题上，不同的政治集团却表现出相似的政治态度来，都表示要坚决予以打击。

本来，这个激进派就与中央文革集团以及林彪集团有密切联系：他们的上层代表人物就属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口号也曾是林彪亲口喊过的。如今，他们却遭到这两个集团大张旗鼓的讨伐：江青向人们说，为了清查「5·16」，她三天没有睡觉了；林彪告诫人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页 292-293。）林、江等人之所以如此绝情，说到底是想以攻为守，是想通过对先盟友的背弃与打击来洗刷自己和解脱自己。

对于这个激进派，周恩来集团尤其是周恩来本人于公于私都是深恶痛绝的，故都是要予以打击的。至于这位老成持重者是怎样实施打击的，尚须作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那些曾搅得他心神不宁的造反尖子大都在反「5·16」运动中被整治下去，或被送进监狱，或被送去办「学习班」，痛作检查，饱受批判。

为了彻底解决大中学生大打派仗问题，毛泽东向学校派出「工宣队」和「军宣队」，想用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力量来整肃这些已令他大为失望且十分厌倦的「革命小将」。

1968年7月28日，他亲自出面召见并训斥「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

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

一是实行军管；二是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是斗批走；四是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纵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1968.7.28）〉，《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153-154。）至此，大中学生造反活动已接近尾声，其政治影响力已无足轻重。不久，他们连学校也呆不下去了。大学生先被下放农场劳动，后被分遣各企事业单位做基层工作。中学生则被下放农村劳动，由文革骄子变成文革弃儿。老人家对他们已是眼不见心不烦，在后来许多年里，除了偶而过问一下如复李庆霖信外，就再也不提起这些当年曾誓死保卫他的「红卫兵」了。

后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三届」，即应于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城镇初高中生。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群体，即所谓「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的成长期与毛泽东的执政期大体重合，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因此而多受后者影响。他们读书不多，经历不少，曲曲折折。童年和少年时，他们经历了大饥荒，饿过肚子，学过雷锋。少年和青年时，他们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先是在毛主席发出的「你们要

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下，积极投身红卫兵运动；后又在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半是自愿半是无奈地从城市来到农村，来到中国社会发展最落后地方接受再教育。

这些来自城里的孩子，过去曾被告知，世界上还有 2/3 的劳动人民在受苦受难，他们大都生活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今亲眼看到，就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竟还有这么一大批衣衫滥褛的劳动者以及这么低矮的茅屋和这么昏暗的油灯，而自己正生活在这一切之中。如此再教育，使他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并使他们拥有了一段曲折的人生，使他们日后能不时地撩起衣裳让人们看看「蹉跎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伤痕」。

## 79

在文革左派联盟中，继中央文革集团之后，林彪集团也因过度扩张而招致毛泽东打压。相对说来，老人家打压前者要容易些，打压后者则难得多。

前者是一个秀才集团，并且是一个角色错位的秀才集团。他们本是些舞文弄墨的人，却做了横冲直闯的事，做了毛所说的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事。他们除了会说写写造一些声势外，别无所长。因此，老人家用起他们来没有什么顾忌，打发他们走也不觉有什么后怕。

后者是一个军人集团，其中不乏身经百战者。他们出身背景相近：资深军人大多出自「四野」——第二次国共战争中中共武装力量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军队；少壮军人大多属于空军——新中国国防力量中在现代化程度上与外军相对差距最小的一个军种。他们不轻易服输，被逼得太急就会铤而走险；他们多属同一山头，很容易形成有组织的反叛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直接掌握武器，拥有实实在在的杀伤力。因此，毛泽东为打压他们必须用相当大的力气，并要冒相当大的风险。

林彪集团扩张过程有两个阶段：是谋求对整个军队的实际控制权，以中共第九届代表大会为其成功标志；二是谋求国家主席权力，以中

共第九届二中全会为其失败标志。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顶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但在很长时间内里，因自己处于半修养状况而不得不让其它人掌有较多实权。当时中共军队较有实权者为罗瑞卿大将与贺龙元帅。前者一身兼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后者主持军委常务工作。

文革爆发前后，林彪与毛泽东联袂整倒了罗瑞卿与贺龙。林也因此增强了他在军中的地位，成了全军乃至全党全国的「副统帅」。不过，林彪此时所掌军权仍然有限，既有毛泽东君临其上，又有诸将帅钳制身旁。

此时在中共高层军界，一方面，林彪获得提升；另一方面，其它诸帅，除了被打倒者（彭德怀和贺龙）和靠边站者（朱德）外，也都获得提升：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四帅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兼任颇具实权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徐以及聂荣臻进入中央政治局。另外，军委属下最重要军职即总参谋长职，也由聂荣臻老部下杨成武上将代理。这后一方面将帅大都属于周恩来集团，与林彪分享着中共高层军权，并因此而对后者有相当大的制衡力。

显然，这种权力格局是由毛泽东安排的，是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如前文所述，毛搞这场革命是以军队为依托力量的，而这个军队是由不同「山头」组成的。因此，他要依靠这个军队，就应尽可能广泛地照顾到它的各个山头的利益，尤其要安排好它的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在发动文革时所需要的支持力量，至少是象征性的支持力量。

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红军的主要山头有四个：红一、二、四方面军，以及陕北红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解放军的主要山头有五个：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以及华北野战军（后一部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一部划入第二野战军建制）。

到了文革初期，除了「一野」的司令员彭德怀以及「一野」前身

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贺龙外，其它四个野战军的司令员，即「一野」的刘伯承、「二野」的陈毅、「四野」的林彪、华北的聂荣臻，以及「二野」前身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均获晋级性安排。

毛泽东通过此举安抚了军中大部分山头，并藉此向国人显示军队大多数将领是与他站在一起的。另外，他把军权交与林彪集团与周恩来集团分享，也有利于他对军界上层实行分而治之，使他们能够相互钳制。

可是，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打破了上述权力格局。陈、叶、徐、聂四帅均遭批判，另外朱德、刘伯承早已不管军队（一个赋闲多时，一个重病在床），于是乎整个中共上层军界就只剩下一颗帅星在那里闪闪发光。林彪身边已无与他旗鼓相当或相差不远的军中元戎了。

林彪在助毛整肃了那些与他分庭抗礼的帅级人物后，又寻机整肃了许多不怎么听他话的将级人物，并以此来警诫全军。

1967年夏，林藉「7·20事件」之机积极参与整肃地方军区大员，整倒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人。陈曾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以及后来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1968年3月，林彪又积极参与整肃北京军界大员，整倒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第一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杨、傅均来自华北野战军即所谓「晋察冀山头」，为聂荣臻元帅老部下。余立金出身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后一直在新四军以及主要是由新四军发展而成的第三野战军中负责军事教育工作，属陈毅元帅老部下。

杨成武也曾是林彪老部下。第一次国共战争时期，杨先后任过红一军团的二师四团政委和一师师长，林彪任该军团的军团长，故两人过从甚密。杨在许多年后写了〈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一文，追忆了他与林这一段交往。抗战爆发不久后，杨就不再归林指挥，而长期跟随聂荣臻转战晋察冀。文革爆发后，杨与「四帅」较接近，而与林彪保持一定距离，用后者话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荣

臻回忆录》，页 850。）遂被林视为异己。

「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并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进入军委办事组，也都成了中共军队领导层核心成员，就连刚参军的林彪之子林立果也获得可在空军里调动一切的权力。至此，在北京最高军事权力机构中，除军委主席一职外，其它较有实权的岗位大都归林彪集团所有，解放军几成「林家军」。

不过，林彪在用人问题上有严重缺陷，他是一个握有重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身体多病的人，不能亲自过问许多事务，故需要有一批能够代他行使权力的人；他又是一个猜忌心重的人，不大相信外人，故能够代他行使权力的人仅限十分熟悉且十分信任的人；他还是一个性格孤傲的人，不喜四下走动，不爱拉拉扯扯，故他十分熟悉且十分信任的人只能是跟随他征战多年的老部下。

可是，他在战争年代仅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不像彭德怀那样指挥过中共所有山头的部队，而只指挥过中共众多山头中的一个山头的部队，只掌握过中共武装总体力量中的一个分支力量，如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红一方面军中的第一军团、抗日战争时八路军中的第 115 师，以及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解放军中的第四野战军，故跟随他征战多年的老部下仅为中共众多将领中的一小部分人；就在这一小部分人中，又有一些较杰出者，如黄克诚（曾为四野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后为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华（曾为四野第七纵队司令、第 15 兵团司令，后为志愿军第一副司令以及沈阳军区司令），洪学智（曾为四野第 6 纵队司令，第 15 兵团副司令，后为志愿军副司令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长）等四野名将，早在 1950 年代末就因彭德怀案而遭贬谪，故不能为林所倚重。

由于上述一系列原因，林晚年在使用人问题上，既很难募得贤人、难诚服众人。林在文革中最为倚重的四个老部下，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虽都有些资历和战功，但都算不上全军的拔尖者。

四人中，衔上将者仅黄一人，余皆中将，而全军仅衔上将者就有五十七人。他们甚至算不上「四野」的拔尖者。若论资历，他们中无人能比上黄克诚与谭政；若论战功，他们中也无人能比上邓华与洪学智。

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主力兵团——解放军第 13 兵团——曾有临阵换将一幕，即中共中央军委在该部出征前把由邓华领衔的解放军第 15 兵团部与由黄永胜领衔的解放军第 13 兵团部进行对调。换将理由很简单，就是邓比黄更有指挥作战能力。邓后来果不负其命，成了这个世纪少数几个能将美军打得没脾气的统帅级或准统帅级人物之一。

邓华与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建立了十分亲密的袍泽情谊，后也因此于 1959 年庐山会议后受到株连，被整得声泪俱下。十分巧合，此次具体负责整治邓华的人，正是当初临阵换将换下来的黄永胜。军中荣耀已从战场换到会场，以迎合政治领导取人。中共军队一些将领越来越变得像政客了，并形成风气，影响深远。

林彪把军中许多大权交与他的老部下，致使「四野」风头太劲，同时激起其它「诸野」心中不平。「四野」有骁将，「一、二、三野」也有悍将。如陈锡联（曾为「二野」的主力纵队「二纵」的司令，后为解放军炮步司令）和许世友（曾为「三野」的主力纵队「九纵」的司令以及山东兵团司令，后为南京军区司令）等，都是名震全军的猛将军，自是不服黄永胜一干人。

他们不服也为毛泽东所用。毛后来正是藉助其它「诸野」的力量来打击林彪集团的，其中尤为藉重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曾任「二野」6 纵 17 旅旅长）、张才干（曾任「二野」中原独立旅旅长）等将领的力量。有趣的是，这几位将领在历史上都属于出自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都不是毛的嫡系。

毛的老部队为出自井冈山的红一方面军。该方面军中最为善战的将领，也可以说是中共全军中最为善战的将领，当数红二军团长彭德怀和红一军团长林彪。建国后，先是前者被毛打倒，继是后者因被毛

猜忌而出逃遇难，另外他们许多老部下如黄克诚、谭政、黄永胜等也被连带整倒。毛到晚年时已将井冈山的人整得差不多了，故转而依重其它山头的人，其中许多人出自大别山，做过毛的老对头张国焘的老部下。

上述林彪用人情况在中共非军队系统中也能见到。一个地方长官一旦升任全国长官，就大肆提拔自己先前主政过的那个地方的干部，从而造成一种很不协调的局面：权力是全国性的，用人却是地方化的，或是有严重地方化倾向的。其结果既难以广揽人才，又难以诚服众人，往往使用一个人就会得罪一批人，就会被大家指责为搞帮派。

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林彪被以《党章》形式确立为毛主席接班人；在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叶群均被安排进中央政治局。军人集团遂成政客集团，军权遂加党权。

若从人数上看，这个集团加上正日益接近他们的陈伯达，刚好占21人制政治局的三分之一，超过中央文革集团，而与元老集团相当。

若从政治运作上看，这一集团比前一集团更有实权——握着「枪杆子」，比后一集团更具声势——有着「左派」形象，至少当时在许多人的看来他们是反「二月逆流」的，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

值此，林彪集团进入了全盛期。然而，这一集团并不满足这些成果，还想获得更多东西。

其一，他们已在形式上获得许多军事指挥权，但还想在实际中运作这些权力，藉用聂荣臻的话说，还需要「预演」一下，看看「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聂荣臻回忆录》，页862。）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其主要内容为：抓紧反坦克武器生产，组织战时指挥部并进入临战状态，要求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严密注视中苏边境形势。18日，黄

永胜等人将此号令下达全军，致使整个国家武装力量闻风而动，迅即进入指定状况。19日，林彪以电话记录并急件传阅方式将此号令报告毛泽东。林这是打着「副统帅」的牌子来行使三军统帅的权力，并对毛先斩后奏。

其二，这一集团已经通过《党章》的形式获得「毛主席接班人」的名分，但还想通过《宪法》的形式获取「国家主席」的职务，并为此不惜与毛大唱反调。

1970年3月至8月间，毛泽东多次指示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并表示自己不宜再当国家主席。林彪集团则多次要求写上此节，并建议毛任此职。不仅吴法宪、陈伯达一再提出这一主张，而且林彪本人也数度出面阐释这一主张，认为「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页21。）

其间还发生一场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在由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前这句话曾被写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毛审阅时未提异议。此后这句话又被写入「九大」政治报告讨论稿和新党章草案，毛审阅时则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划去。此次讨论《宪法》草案时，林彪集团坚持要将这三个副词写进去，张春桥等予以反对，于是前者指责后者「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在林彪集团关于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此职的提议中，前半句话是实话，是他们决意予以实现的；后半句话则有很大弹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幌子。若不设国家则罢，若设国家主席无非两种可能，如毛想任此职，则此职非毛莫属；如毛不想任此职，则此职非其接班人莫属。

就以往经验看，前一种可能似乎不存在。十八年前，毛就厌倦了当国家主席所必须做的那些繁文缛节的事情；文革以来，他更是天马行空，更是不愿接受任何约束；另外，他年事已高，不堪过多政务劳累，故若要他再做此事就是要他早死的话。

林彪明知道老人家不想做此事，却硬要设此职，显然是想让毛以外的某人去当此国家主席。其夫人叶群在与吴法宪私下交谈时谈出了这个某人：「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394；《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幕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年），页 25-26。）

林竭力以毛的名义去订一份毛不想吃而他自己很想吃的饭菜，并希望毛在这分饭菜被端上来后因毫无食欲而顺手推给坐在旁边的他这个定饭者，任其享用。许多人不解，林彪已被定为毛的接班人，成了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为什么还要冒与毛作对的风险去谋求那个很不确定的国家主席职务呢？

就当时情况看，林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此时虽有第二号人物的名义，却无相应的实权。在党、政、军三权中，他虽已掌握较多的军权——最高军权不在其内，但只享有很少的党权和政权。因为，在执政党的党权方面，仍是大权独揽于毛本人，小权分散于诸多集团与诸多个人；在共和国的政权方面，仍是事无巨细地由周恩来经营着。

执政党高层三大集团中，周恩来集团树大根深，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像军队老师请假这样的事，也是直接报周恩来批准，而无须由林彪点头；（《聂荣臻回忆录》，页 863。）中央文革集团虽根基较浅，但直接依附老人家，也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林彪集团与其它两个集团仅呈三足鼎立之势，前者对于后两者来说并不具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如果林彪在获得毛主席接班人名分后又获得国家主席职务，那么，他的上述境况就会大为改观。他既可以按法统直接号令周恩来集团所

控制的政务系统，也可以按法统直接插手中央文革集团所控制的文化教育系统。当时中共高层已在议论文化大革命结束问题。如果这场革命一旦结束，那么，中央文革集团所掌握的许多权力就应该按法统归还给政府方面，或者说归还到国家主席名下。

这就使得林彪集团，一方面在与中央文革集团关系上，一步加强它在实权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在与周恩来集团关系上，又能进一步加强它在声势方面和法统方面的优势。

林彪不是不知道他执意要设国家主席的风险有多大，但也估算过这个风险有可能带来的回报有多大。

## 80

林彪集团在上述军权方面和政权方面的扩张，不仅侵夺了其它集团的权力空间，而且触犯了毛泽东个人的权力禁忌：号令全军，是他到陕北后就从未放手过的权力；国家主席职务，是他在数年前一度放手别人而给他带来很大不便的权位。

老人家立即作出反弹。

据汪东兴回忆：毛在看了「林副统帅指示第一个号令」传阅件后，「一脸不高兴」地对汪说：「烧掉。」未等后者反应过来，他就自己划着火柴，烧了这个号令。接着，他还要烧装此文件的信封。汪急劝道：「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毛这才作罢。（《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幕命集团的斗争》，页 14-15。）

毛在此未作任何批示，仅有划火柴举动，无言却再明白不过地告诉属下：他所拥有的这一军权不容他人染指，林彪号令作废。

1970年3月初，在京常委向在武汉的毛泽东请示：要不要在宪法修改草案中保留设国家主席一节。毛随即派汪东兴飞回北京传达其指示：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本人也不愿再当国家主席。

3月中旬，林彪让他的秘书给毛的秘书打电话，建议毛当国家主席。毛王顾左右而言他，要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林彪又通过秘书向政治局传达其意见，建议由毛兼任国家主席，并附言他本人不宜任国家副主席。次日，毛不再回避而直接批复：「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下旬，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并借古喻今：「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这已在暗示：那些要他当国家主席的人，用心可疑。

7月中旬，毛又作指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幕命集团的斗争》，页18-26。）

8月23日，中共旭二中全会碰山召开。

林彪集团在会上置毛的反对于不顾，继续坚持他们的主张，并率先发言，试图改变会议进程。林彪在大会上讲，陈伯达、吴宪法、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在小组会上讲，上下呼应且声色俱厉。他们还使除毛和林以外的所有与会者听了两遍林彪大会讲话录音，并抢发了反映他们意图的会议简报。

由此可看出这个军人集团很有些韧劲，很有些主动进击精神。不过，军人进击多为冒险，多为孤注一掷地企求成功，要么势如破竹，要么一败涂地。林彪此番举动也是在冒险，在向毛这个强人硬是讨要他不愿给的东西，已迈出了无法后撤的一步。

8月25日，毛在确认林彪集团意图后，决心予以反击，当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诸如收回会议简报、暂停分组讨论等一系列决定，给已滑出预定轨道的会议来了个急刹车。

他在会上甚为恼怒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

转过脸对林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幕命集团的斗争》，页 28。）

这就把有关国家主席问题一下子讲到底了：

要我当这个主席，我不接受，并视之为害我；要林当，我不准。

8 月 31 日，毛在经过数日深思后写出〈我的一点意见〉，并印发全体与会者。这是一篇七百余字的文章，似是他文字生涯中最后一篇较完整的政论性文章。文章的文体仍属大字报体，其间的语义结构和标点符号都有些问题。文章的立意则是十分鲜明：揪出陈伯达，藉以打压整个林彪集团。

文章的话头是谈陈伯达的理论问题，指责他鼓吹天才论，「欺骗了不少同志」，并将这位中共大秀才，归类到「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中。

文章的重心是谈陈伯达的政治问题，从其历史谈到其现在：「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卅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6 册，页 476。）毛这些话定性很重，已在政治上将陈一棍子打死。老人家整人，要么不整，要整就整到底。

1971 年 3 月 24 日，毛又就陈的问题写了一段话，又给陈扣了几顶大帽子：

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后，又在 1931 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

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702。）

毛这些话有实亦有虚。陈在历史重大问题上，既有与毛配合不好的记录，也有与毛配合很好的表现。别的不论，仅拿他在文革前期表现来说，就是配合很好，并好得不能再好，以至于劳苦功高。

毛主持起草〈5·16通知〉——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权威性的文件，后被确定为这场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他领衔组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化大革命中最具权威性的机构，直接取代中央书记处，并一度取代中央政治局；他亲自掌管《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权威性的喉舌，发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陈伯达在中共党内，一无显赫战功，二无显著政绩，仅凭跟在毛后面做秘书、耍笔杆子而当上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执政党第四号人物——仅次于毛、林、周。这一简历本身就说明，他与毛在历史上配合很好的情况要远远多于配合不好的情况。他似是一双被毛穿了许多年直至穿坏了的鞋子。老人家在丢弃它时，嘴里只字不提它曾长年累月地为他踩污泥、蹉浑水，而只念叨着它曾在某个时候将他的脚磨出过几个泡泡来。

至于责怪陈伯达在庐山上「煽风点火」，倒能说得上，因为他的确煽动起许多与会者，其中包括毛最为亲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44-45。）不过，指控这个秀才造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又责之过严：一是造出的势确有些大，但不像毛说的那样大；二是造势的人也不只是陈伯达，还有其它一些人。

毛也十分明了这后一点，并作了相应安排：先收拾陈秀才，再问

罪诸将帅，「先搞狐狸，后搞豺狼」。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仍对庐山上发生的事「抓住不放」，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100。）

所谓「打石头」，即批发一系列文件。「头一块石头」，是毛于 1970 年 11 月 16 日批发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以及他本人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和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毛于 12 月 16 日批发 38 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并责成北京军区召开批陈会议即「华北会议」（1970.12.22-1971.1.26）。「第三块石头」，是毛于 1971 年 1 月 8 日批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要求军队开展整风运动，进行「自我教育」。

另外，他还作了其它一些批示，例如，批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批 1971 年 1 月 9 日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批卷入陈案的刘子厚「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所谓「挖墙脚」，即改组北京军区。1971 年 1 月 24 日，正是华北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免去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李雪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职务（郑和李皆卷入陈案），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所谓「掺沙子」，即渗透军委办事组。1971 年 4 月 7 日，毛派非林彪班底的纪登奎、张才干进入由黄永胜等人控制的这一军事要害机构，以增加它的透气性。

1971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12 日期间，毛泽东乘专列巡视南方，依次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会见沿途地区负责人，向他们打招呼：「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不只是陈伯达有问题，其它人

也有问题，「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老人家越来越直露且越来越频繁地谈到了林彪，谈到了「庐山这件事」的真正事主。庐山云雾正在散开。

他谈到那些人在庐山上，「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未瞒着的两个人，一是陈伯达，一是林彪。未瞒者自是参与其事者。

他还谈到那些人发难庐山的「纲领」，就是鼓吹「天才论」和要求「设国家主席」。关于前者，他报怨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关于后者，他一针见血地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显然指他的那位「接班人」。

毛泽东还将「庐山这件事」，定性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并上纲为「路线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党已有五十年历史了，经历过「十次分裂活动」或「十次路线斗争」，此次再庐山上发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对『九大』路线」的活动，就是第十次分裂活动，与之斗争则为第十次路线斗争，只是眼下未做结论。

另外，老人家的谈锋还触及到林彪的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关于前者，他多次谈到，「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并讥之为「夫人专政」。关于后者，他说，将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害了他。（〈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554-557；《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85-176。）

老人家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这个年青人也在揣摩着老人家，并最终作出要将他干掉的决定。这个决定本身就似乎是一个「超天才」的决定，一个在数万万人中唯有此人才作得出的决定。不过，从这个决定实施情况看，倒提印证了那位老人家对这个年轻人所作的断言，即

实际上害了他。

## 81

毛泽东在庐山上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整倒了陈伯达；下山后又砍出「程咬金的三板斧」，重在打压林彪手下几员干将；接着「游说」南方，话锋直指这一集团主帅本人。他从山上追到山下，由于将问及主帅，已作出步步紧逼态势。

不过，老人家此次是在追逼一个军人集团，一个不轻易放弃抵抗的集团、一个被迫急了就会掉头反扑的集团。其元老军人对于毛要他们公开低头认错一事，采取软磨态度。其少壮军人走得更远，竟密谋以非常规方式将毛除去。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要林彪集团一些成员作检讨，后者予以敷衍，既未在大会上作检讨，也未在小会上作检讨。林彪私下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这个检讨。」

吴法宪在拖延一个月后方于9月29日向毛交上他的检讨书。叶群随后于10月12日向毛交上她的检讨书。

毛于10月14日在吴法宪检讨书上批道：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它宣讲员的意见。毛话意思是催要总参谋长黄永胜、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等人的检讨书。这几位将军仍是一拖再拖，一直拖到转年三月才交出他们的检讨书。

林彪逃亡后，毛泽东曾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留出10天时间，以观察他们能否主动揭发林彪并检讨自己。结果，四将军沉默以待，直至被拘押。（《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217-218。）

在黄永胜等三月检讨后，这一集团仅剩主帅林彪一人未作悔过表示。不久，周恩来专程去北戴河林彪处传达毛泽东意见，希望后者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1971.4.15-29），并在会上作认错性表态。林子

以拒绝。在建国后的中共高层里，林彪是唯一与毛泽东发生冲突而未作检讨的人。

197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焰火晚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照例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林彪此次一反常态，不像以往那样总要比毛早到一会，而是让毛等了他很久才闷闷不乐地走进场来，不向毛打招呼，甚至不看毛一眼，默然落在一旁。

林立果等少壮派认为：黄、吴、李、邱「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段话是林立果等人一次密谈要点，为林亲笔所记：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06。）

那么，他们自己又如何呢？若就结果来说，少壮派不比老总们好，也以失败告终；若从气魄上看，少壮派则比老总们大得多，竟想以取事政变方式将那位已红透了天的「伟人领袖」干掉。

他们这一策划活动有两个高峰期：一是在1971年3月下旬，二是在当年9月8日至12日期间。

在前一个高峰期，他们开了两个会议，拟了一个纪要。

旬初，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与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司令部秘书处副处长）等人密谋此事。

旬末，林立果又与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治委员）、王维国（空四军政治委员、驻地上海）、陈励耘（空五军政治委员，驻地杭州）、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驻地南京）等人密谋此事。此次密谋亦称「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驻防沪、杭、宁三地的王、陈、周三人；「四方」，即前述「三国」再加上他们的老首长江腾蛟。

在这两次会议之间，林立果等还拟出一份〈「571工程」纪要〉（「571」

即「武装起义」谐音)。这分纪要属一揽子计划，涉及九个方面的问题：1. 可能性、2. 必要性、3. 基本条件、4. 时机、5. 力量、6. 口号和纲领、7. 实施要点、8. 政策和策略、9. 保密和纪律。(《「571工程」纪要》，由林立果等人于1971年3月22日至24日间拟出，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附件)》，于1972年1月14日下发全国。)

这九个部分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实情，二是拟定对策。前者包括对国家整体局势、本集团现实处境以及毛泽东个人执政方式的分析。后者包括对军事政变的时机，步骤和手段的拟定。相对而言，后者谈得较空，该集团不久便全军覆没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证明：前者谈得较实，谈出了这样一些实情：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为此，《纪要》提出口号：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

这些话当时是作为「反面材料」向下传达的，却在许多听传达者那里引起了共鸣。如那个「变相劳改」说法就为许多「知青」接受。《纪要》中给听传达者留下最深印象的部分，要数《纪要》作者对于「B-52」（指毛泽东）的评论：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他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

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成了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对过去 B-52 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这些对毛的评论可说是入木三分。其中有许多话显然不是这些少壮军人自己能说出来的，而是他们将某些与毛相处较久并对毛了解颇深的人——很可能就是林彪——的话复述出来的。

据传，林彪生前曾向爱女豆豆坦露过他这方面的心迹。又据传，周恩来在林彪事发后曾对这位林家遗女特意关照：「小孩子家不要乱说！」

当然，大多数国人都不会希望这位林女士「乱说」，倒是十分真心希望她「实话实说」。这既是对历史对国家负责、也是对她林家负责——如果她能有机会的话。

后一个高峰期，林立果等作了许多谋划，但都未来得及实行。

9月5日夜，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通过电话将毛南巡讲话内容告知北京于新野。次日，周宇驰乘直升机将于新野电话记录材料

送至北戴河林家父子处。

9月6日晨，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当面将毛南巡讲话内容，透露给正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在武汉访问的李作鹏。后者当即形成三点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页114-116。）

- 一、感觉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
- 二、感觉「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
- 三、感觉是对着林彪的。

当天，李作鹏在陪同外宾返回北京后便将刘丰所言告知黄永胜和邱会作。即晚，黄永胜又通过电话将李作鹏所言转告北戴河叶群。这一夜，无疑是林家的一个不眠之夜。

9月8日，林彪下达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9月8日晚，林立果将林彪手令出示于江腾蛟等人。江随即表态：「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当夜，他们议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用火焰喷射器或四〇火箭筒袭击毛的专列，二是用一〇〇高射炮平射毛的专列，三是让王维国趁毛接见时用手枪刺杀，但都议而未决。

9月9日，林立果等人继续策划。周宇驰提出在毛专列经过硕放铁路桥时予以爆炸方案。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提出在毛本人出席会议时予以劫持方案。

9月11日，林立果等人再度策划：第一步，由江腾蛟在上海组织谋杀活动，或用手枪、或用四〇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第二步，若江举不成，则由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在硕放组织炸桥活动，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第三步，若鲁举还不成，则由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派出强击机轰炸毛的专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页

124-129。)

当晚十点多钟，就在他们继续密谋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告毛泽东已离沪北上。

据汪东兴记述，毛的专列于当天午后 13 点 12 分启程，急速行驶，风驰电掣般地扑向北京。当王维国打电话时，列车已驶过了安徽蚌埠市，驶在了淮北平原上。（《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195-196。）

此处离林立果等人所议论的第一谋杀处上海市已有六百公里之遥，离第二谋杀处硕放桥也有五百公里之远。可是，前一行行动方案指挥者江腾蛟，后一行行动方案指挥者鲁珉，都还在北京坐而论道。林彪集团已失去除掉毛泽东的机会，已失去自己的大势。

林立果在获知国电话内容后，当即跳了起来，下令进入一级战备；并向在场人员痛哭道：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其父林彪）交给的任务，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用什么向首长交代。

9 月 12 日傍晚，周宇驰向有关人员宣布南撤计划：林彪等人于次日凌晨 8 时，由山海关机场乘机直飞广州；北京同党于次日晨 7 时至 8 时，由西郊机场乘机直飞广州；另派机先飞上海接载该地同党，再飞广州。周还通告后续行动计划：林彪抵达广州后，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实行武装割据，与北京政府形成南北朝局面；同时争取苏联等国援助，对北京方面构成南北夹击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页 138-148。）

9 月 12 日晚 7 时左右，林立果乘坐 256 号专机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20 时 15 分，飞机落地。21 时左右，林立果抵达北戴河中央疗养院林彪处。林家随即进入异常紧张状态。

13 日零时过后不久，林立果与其父其母以及随行人员仓促登机，

强行起飞，轰然冲入茫茫夜空中。

按汪东兴说法，当晚 11 点半，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寒暄之间特意询问 256 号专机情况，并提出要亲自来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的电话引起林家的警觉与恐慌。林彪随即做出提前动身并改变原定航向的决定。（《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205-206。）

256 号专机升空后，先是向西飞行，在张家口地区上空转而向北飞行，很快飞出内蒙境外，最后因不明原因而坠毁在外蒙境内温都尔汗地区。机上 8 男 1 女全部遇难。

## 82

1949 年后，中共党内最遭非议的政治集团，无疑要数林彪这一拨人了。左派不喜欢他们，右派也不喜欢他们。「文革」刚过半程，他们就被定性为「林陈反党集团」；「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又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而受到法律起诉，其残余骨干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从十六年到十八年不等。于是，这一集团一身而享有两大「殊荣」：

既是在毛生前被打倒而在毛身后未获平反的仅有的两大集团之一，另一为高岗饶漱石集团。又是被自家政权按法律程序起诉的仅有的两大集团之一，另一为江青张春桥集团。

中国有句老话：「成者王侯败者寇」。

此话用在林彪身上最恰当不过：当他跃居党内第二号人物时，便被誉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和最亲密的战友，并受到千百万人一日数次祝福，祝一个老病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当他亡命温都尔汗后，顿时成了本党大奸大恶者，被说得一无是处。党中央下文件（中发【1972 年】4 号），指责他「叛党叛国，身败名裂，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许多老百姓在震惊之后，也痛诉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背后下毒手」，是一个十足的阴谋家、野心家。

中共中央还召开老干部座谈会，请一些党内元老也是林彪老同事来谈论林彪历史，以证明此人原本就不是一个好人。

于是，这些老同志们步履蹒跚地走进会场，同时也走进自己心中那些已尘封多年的角落里，做起翻箱倒柜的事来，结果也真翻出许多尚可拿出来用一用的东西。例如揭发此人：曾在某个时期里思想动摇（如南昌起义失败后一度自动离队），曾在某次作战中指挥有误（如1947年6月率部攻坚四平失败），曾对其他同志关心不够（如在井冈山时期不能善待同级党代表何挺颖），曾对友邻部队援手不力（如1936年春东征山西时不愿拨兵拨款给15军团），还曾怀揣一个小本本专记自己打了什么样的胜仗，……。

如此行事，似又在重复当年整彭德怀的一些做法。虽整的对象不同，一是为民请命者，一是为己争权者；但整的方式相似，即为了打倒并搞臭一个人，就不仅要把他宣布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且要把他描绘成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至少是一个历史可疑分子。无论是整彭德怀运动还是批林彪运动，都找了许多知根知底者（多为元勋级老干部）来揭他们的老底，来找他们的历史污点。

必领承认，这样做的成效很显著、很能损害一个人的名誉。

同时也应承认，这样做的格调很低：

其一，若存心找一个人的缺点，并且是找他一生的缺点，自是能找到许许多多来；同理，若存心找一个人的优点，尤其是找一个曾有过一系列重大建树的人的优点，也是能找到许许多多来；如今人们只谈及林的前一个方面，而不提他的后一个方面。

其二，在所找出来的缺点中，有一些较为严重，但也有许多纯属陈芝麻烂谷子，陈旧且琐碎，很难摆到台面上。比如说林用小本本记自己战功这件事，就很难说有什么大错，相反，倒可以说林彪颇具有军人荣誉感的一种表现。世上有哪一个军人不看重自己打胜仗的荣誉？又有哪一个军人不因铭记这种荣誉而获得激励以争取更大荣誉？

空军英雄王海击落击伤敌机九架战绩，除了他所在部队记得清清楚楚外，他本人也会记得清清楚楚，至于他用不用小本本记，则无关紧要。

其三，如此大揭林彪老底，正如中国老话说的「墙倒众人推」。揭老底者大多是林彪的老战友、老同事，所揭老底也大都是早已有的陈年事。林彪尚在台上时，大家都不提这些事，闷在心里；林彪跌落台下后，大家则纷纷谈起些事，并作积怨已深且一吐为快状。

后人即使不怀疑这些老同志所揭之事的真实性，也会觉着这件事——一些七、八十岁的白发苍苍者群起而愤愤数落往日尘烟中的一位二、三十岁的涉世不深者——本身显得气度不够。

当然，后人也能理解这些老者何以要这样做：一是林彪在过去尤其在文革期间整人太甚，致使许多受害者对他恨之入骨；二是毛泽东主席希望并要求他们这样做，希望并要求他们能够彻底划清与此人的界线，并能够将这条界线从现实里划到历史中，以表明他们不仅现在反对此人，而且过去一直记恨此人。

这种揭老底的做法，可以说是老人家搞党内斗争的一种模式，一种效用显著而品位不高的模式，整彭德怀如此，整刘少奇如此，整林彪仍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感到自己将要成为下一个被打倒者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人要抛他的历史材料，以将他说成是一个有严重历史问题即有「自首分子」嫌疑的人。为此，他在最后一次接受开刀治疗时，迟迟不进手术室，长时间地待在卫生间里，又一次细细审读他写给中央用以证明自己历史清白的申辩材料，以防那种整人老戏在自己身上重演。（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页352-354；周恩来，〈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468-480。）

这种「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评价方式，使得中共学界关于林彪问题研究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多是列数罪状而较少剖析成因。

例如，对于林彪集团试图谋杀毛泽东主席这件事，几乎所有为中共官方认可的相关文献都以谴责为主，或抨击他们大逆不道，或嘲讽他们自不量力。可是，对于他们为什么要铤而走险这一问题，那些文献多是语焉不详，常用诸如「抢班夺权」之类的话打发了事。

林彪并不属那种轻举妄动之辈，而是一个酷爱用脑的人，在执政党高层中可排入城府较深者之列。他之所以授意或同意部下去策划谋杀党主席之事，一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也一定能通过这种思考为自己这样做找出许多理由来。

至于他究竟怎么思考，究竟找出哪些理由，我们不可能知道得很详尽。不过，他在思考中所面临的基本事实，我们能大体知道；并且，他在分析这些基本事实时所遵循的常规思路，我们也能大体推论出来。

他所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毛泽东已把他自己与林彪集团的冲突定性为「路线斗争」，即有党以来「第十次路线斗争」。

这一定性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林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他不难考虑清楚的问题。他只须作一个最简单的归纳推理，就能大致推出这一问题的答案来。

经验个案一：毛执政后所搞的第一次路线斗争，亦即有党以来第七次路线斗争，是斗争「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斗争的结果是：高岗一次自杀未遂，二次自杀身亡；饶漱石在艇布开瞧籍后，随即因「发现」有「包庇反革命」问题而于1955年4月1日被逮捕审查，在被拘押十年后于1965年9月23日获假释，1967年被重新收监。林彪谋事时他仍被囚于狱中，后于1975年病死。

经验个案二：毛执政后所搞的第二次路线斗争，亦即有党以来第八次路线斗争，是斗争「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结果是：彭德怀1959年被打倒，1966年被造反派公开批斗，不久被正式收监审查，前后被审讯两百余次，常常被审上半夜乃至十几个小时，多次被审得精神恍惚。林彪谋事时他仍在狱中度日如年，已不可能活着走出来了，

除非毛死在他的前面。

经验个案三：毛执政后所搞的第三次路线斗争，亦即有党以来第九次路线斗争，是斗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结果是：刘少奇 1966 年被解除实权，1967 年被隔离审查，1968 年被中共中央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罪名而受到唾弃，1969 年 11 月 12 日病死开封囚禁地。

这些经验个案都是林亲眼所见的，有些还是他亲身参与制造的。据此，林不难得出结论：

自毛执政以来，所有被认为是错误路线头子的人均被置于死地，绝无例外。如今，林自己已被毛认作是建国以后第四次错误路线或有党以来第十次错误路线的头子，其本人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已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实际上，这一集团成员已把这一前景以非常清晰的方式描述出来了。〈「571 工程」纪要〉明确指出：「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这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

诚然，毛在南巡中也说过一些要保林的话，后者也多半能获知前者说过这些话，但是，林不会很看重毛这些话，他不会不记起这样一些事：

其一，1959 年 8 月 1 日，毛再庐山中央常委会上说，还让彭德怀「干」国防部长，可到了 8 月 16 日，他主持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将彭德怀「调离」国防工作岗位。也正是在通过此决议后而于第二天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被任命为新国防部长。（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255，355-358。）

其二，1966 年 9 月 14 日，毛在刘少奇检查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1966 年 10 月 25 日，他又在中央工

作会上说：错误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转年1月13日，他深夜召见刘少奇，没有批评，很客气，送其出门时还叮嘱道：「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卷，页7-15。）后来事实表明，此次召见意义，仅仅在于老人家要向他的这位老同事作最后道别。

另外，林还多半能获知，毛在南巡中除了讲要保他林彪时话外，还讲了与此相反的话：「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接着，他历数了自陈独秀以来所有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说他们都未能改正错误。他还对后来向李作鹏通风报信的刘丰说：「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554-557；《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93，104。）

林彪等人不仅清楚地知道毛最终要对他们做出什么事来，即要把他们打成机会主义路线分子；而且清楚地知道毛眼下要对他们做出什么事来，即要剥夺他们正执掌着的军权。

在南巡过程中，毛多次说到他在建国后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将军队事情交由别人管：先是让聂荣臻管；继是让彭德怀管，因为人家在朝鲜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行吗；后是让林彪管，但由于他身体不好而多是让贺龙、罗瑞卿管；再后是杨成武管；再后是黄永胜管，黄既是总参谋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他和军委办事组里的那几个人都参与了庐山那件事，到现在还不好好交代，「一字不提林彪」。

于是老人家作出决定：现在我要管军队事情了，我不相军队会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简言之，他要从黄永胜那里收回军权了。（《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93-94，102，121，155-156，159。）

前文曾谈到，林彪虽名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党中央的第二号人物，但实际掌握的权力仅限于军权；并且虽名为国防部长，但通常不直接行使军权，而由黄永胜等人代为行使军权。

因此，毛要夺黄的军权，就是要夺林的军权；而一旦失去军权，林彪及其同党就将在中共高层权力角逐中因一无所凭而任人践踏。

这个集团以往在爬升过程中，曾踩了许许多多的人，并踩得很重，以致积怨很深。因此，当他们一旦失去权力依托时，就会遭遇人人喊打的局面，甚至遭遇那些曾被他们践踏过的人的践踏。

林彪等人还不仅知道老人家要夺他们的军权，而且知道老人家将在什么时间夺他们的军权。这个时间就是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举行期间。这个会议已预定在毛由南方返回北京后立即召开。

毛此次南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召开这个会议而去做打招呼工作的。他一路上不断向沿途各省市负责人（大多是中央委员）表示，他已十分恼火林彪和黄永胜那些人，已不能容忍他们再像以往那样执掌大权了。他想通过「游说」而使这些地方大员对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有所思想准备，不至于对会上将发生的某些事感到太突然，不致于再像九届二中全会前期那样胡里糊涂跟在陈伯达后面乱跑。

林彪集团在获悉毛南巡讲话内容后，立刻就明白了老人家的意图，即他想在此会上收网了，想对他们这些人作组织处理了。林立果向同党宣布：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指四届人大），人大会议前要开三中全会，全会一开，林彪就不占优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页 129，141。）

于是，林彪集团面临两种抉择：

其一，消极地等待一系列事情发生：被剥夺军权，被公开批判，被抓起来一些人接受审讯。鉴于毛的专政机关在审讯政敌方面的高效

性，可以肯定，这一集团曾密谋杀害毛的活动将很快被逼供出来。仅此一项就能定许多人死罪。

其二，积极地做出一些事来：与其坐以待毙，不若孤注一掷，抢先一步干掉那位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的老人家，或许还能杀出一条生路来。不过，这要冒很大风险，稍有不慎，就会一败涂地。

林彪作了后一选择，作得相当果断。

他在9月6日这一天内，接连从两个不同渠道（广州顾同舟电话于新野和武汉刘丰面告李作鹏）获悉毛南巡讲话内容，仅隔一天，便于9月8日向林立果、周宇驰下达手令。林、周随即由北戴河飞赴北京，向同党宣布：林彪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搞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页129。）

应该说，林彪是一个把毛泽东看透的人，并且是一个有着军人脾性的人，一个情急便拔刀相向的人。可是，此次拔刀的结果，是断送了自己以及妻儿的性命，并留下了「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骂名。

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林彪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并因此而成了一个凡党人皆痛骂的贼寇式人物。这就使得他曾经作出的许多重人举动，特别是他最后作出的破釜沉舟举动，得不到较客观的评价。

值此文末，笔者再就他这最后举动说几句话：

若从法统上说，当属犯上作乱，有些类似古时臣子「弑君」之举。毛的地位是经党章国法确定的，毛已成为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人格化代表。不要说谋杀他，就是反对他，也属不可饶恕的叛逆性行为。

若从情理上说，则属迫不得已，即出于自保、出于对毛泽东的恐惧。只是军人的恐惧常常以铤而走险的方式表现出来，困兽犹斗。

若从道义上说，在这谋杀者与这被谋杀者之间分不出绝对的优劣。

这个谋杀者确有图谋不轨的问题，这个被谋杀者也有滥杀无辜、滥施苛政的问题。党让林彪坐上接班人的位子它是它的一大失误，而让毛泽东坐在党老大的位子坐了那么久也是它的一大失误，或说是它的更大失误乃至最大失误。因此，人们可以较公允地说：

毛公曾合法地整死许多不应该整死的人，

林某则不合法地谋杀一个早该下台的人。

### 83

在这场林彪与毛泽东的角逐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前者无疑输得很惨，后者也没有因此而赢了什么。若就此角逐的最后几天看，毛是一个胜利者、一个颇有些走运的胜利者；单就此角逐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看，毛也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做了诸如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类蠢事的失败者。正是毛自己，先是积极地提拔林，使之坐大而拥有日后反叛的力量，后又急切地威逼林，陷之窘迫而萌发即刻反叛的念头。

在林彪事件中，毛泽东所遭遇的不是一般的失败，而是损失惨重且影响深远的失败。这一失败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状况，加速了他的生命衰老过程。这一失败也大量损耗了他的政治资源，降低了人们对个人崇拜的热度、以及对文化大革命支持的热度，从而迫使他不得不调整自己在这场运动中的攻守态势。

老人家在经历林彪事件后大病一场，虽未一病不起，但已每况愈下，像「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这类曾专门用来描摹伟大领袖风采的亮词，已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有关他的报道中。

据知情者回忆，老人家次病重期间曾一度拒绝治疗。他肺部遭致严重感染，并引起心脏衰竭和全身浮肿。在经初步治疗未见好转情况下，此公突然宣布：「所有药都停了，谁要是再谈药的事，就给我滚。」他就这样硬挺了十天，直至生命垂危才接受治疗。〔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译本，页 519-539：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页 244-248。李为毛的专任保健医生，张为周的专任保健医生。两人都从各自角度记述了这件事。不过，前者记为 1972 年 1 月下旬前后发生的事，后者记为 1971 年 11 月中旬前后发生的事。)

老人家这样做，或多或少可以看做一种自弃行为，其间透出些许心灰意懒的情绪，甚至是沮丧厌世的情绪，尽管持续时间不太长。

毛泽东在从林彪事件中挣扎起来后，主要忙两件事：一是试图恢复国家正常生活秩序，二是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声誉。

这两件事从政治进退上看均属守势运作，前者是依着大家的想法来行事，后者则捂着自己的伤疤不让揭。

毛后来将这种守势运作一直保持到其逝世时。尽管他在此期间也有过一些攻势举动，如「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但他的这些举动毕竟是以攻为守，即主要是为了惩罚那些已经碰了他的伤口的人，并以此警戒其它还没有碰但准备碰他的伤口的人。毋庸置疑，遭遇林彪事件是毛在政治进退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攻势如潮；在此之后，他就抱残守缺了。

毛所要做的这两件事，虽都为守势运作，但在性质上完全不兼容：要想有效恢复国家生活秩序，就必须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要想坚持文化大革命方向，就无法改善国家政治经济形势。

这种对立性质，不仅存在于毛所要做的这些事之间，而且存在于他为此而所要用的那些人之间。他在恢复国家秩序方面，主要靠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集团；在维护文化大革命路线方面，主要靠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集团。前一集团中的人大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大都直接挨过后一集团的整治。后一集团中的人全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曾当面冲撞过前一集团中的许多人，甚至羞辱过他们。两大集团互有怨恨，势同水火。

因此，让前一集团来恢复国家生活秩序，他们无论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都会想方设法地纠正后一集团的许多偏激做法；而让后一集团来看护文化大革命成果，他们自然会把防守的重点放在那些「老家伙」的身上。

毛泽东在做上述事和用上述人时所遭遇的困境，从根本上说缘于他自身的问题，缘于他一人而兼有两个相互对立身分的问题：

一方面，他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故有责任维护这个国家的基本秩序；一方面，他又是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而这场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地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秩序。

毛泽东只要继续想做这个国家的执政者，就不可能完全放任国家生活的无序化，不可能完全消除政治上的稳健派，而常常会在国家形势乱到一定程度时急忙从幕后走出来，强调纪律，强调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重要性，常常会在执政党高层中有意识地保留一些趋于保守的人，保留一些能够在乱时替他看守政府或在治时替他恢复秩序的人。

然而，毛泽东只要继续坚持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就不可能彻底扭转这场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不可能彻底剔除那些到处煽风点火的人，而一定会在国家秩序迅速恢复过程中不时发出话来，要人们警惕右倾翻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定会在自己身边有意识地保留一些十分激进的人，保留一些因文化大革命而崛起故视这场革命为身家性命的人。

毛这后一用人倾向突出表现在他对江青的态度上。

据许多曾在毛身边工作过的人记述，老人家晚年相当厌恶他的这位末任妻子，以致不愿看到她。他曾三番五次地当着许多政治局委员面痛斥此妇人，说她「有野心」，「志大才疏」，「积怨甚多」，甚至提出要将她「撵出政治局」；但实际上从未将此妇人逐出中央高层，而一直将她留用（有时重用）到自己逝世时，并眼睁睁地看着她十分招摇地在政治局内充当中央文革集团首领。他也曾言辞激烈地警告江青及其

同伙不要搞小帮派，但总是雷声大雨声小，始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取缔这个小帮派。

毛泽东之所以对江青采取这种压而不弃的态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人为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并因此而被许多人看作是这场革命的一面旗帜。

文革前期，她先是积极参与打倒刘少奇的活动，既在高层会议上指着刘的鼻子严词责问，又在大专院校里鼓动红卫兵去揪「中国的赫鲁晓夫」；后又积极参与反对林彪的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最先向毛泽东揭发陈伯达等人的问题，故被毛认作是立有大功的人。

文革后期，她又为难周恩来、顶撞邓小平。在防备以这两人为代表的老干部集团有可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方面，就数她警惕性高且攻击性强，挑鼻子挑眼，胡搅蛮缠，搅得政治局开不好会议不成事，搅得众大员做起事来畏首畏尾，生怕又被她抓着什么辫子。

对于身为人夫的毛泽东来说，江青缺乏起码的做人教养，自是一件很令他烦恼的事情。可是，对于身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来说，江青敢吵敢闹、敢泼骂中央高层、敢与党内元勋争长论短，未尝不是一个可以被她大加利用的优点，即可以被她颇为有效地用于制衡党中显要，尤其用于制衡那种温文尔雅的党中显要，以肆无忌惮欺彬彬有礼，遂使后者陷于一种类似「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样的窘境。

事实上，他对周恩来就采取了这种以刁蛮克儒雅的制约方式，即把那位连他作为丈夫都不愿多见几面的难缠女人置于这位谦谦君子的近旁，任其隔三差五地向此公吵吵嚷嚷，有时还要泼放赖；长此以往，既会有损他那端庄方正的形象，也会磨砺他那忍辱负重的耐性。诚然，周有时也会出现被磨砺得失去耐性的情况，虽未直接向江本人发作，但迁怒于自己手下人，向他们发一通无名之火。（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页 249-256，257-261。）

不管怎么说，江青事实上已成了周恩来以及其它许多中央大员的

克星，成了他们一想到她就头疼的人物，并因此而成了毛泽东的一块不可多得且难以舍弃的有用之材。

毛一人而兼有上述两种互不兼容的政治身分，却又无意放弃这两种身分中的任何一种，结果只能使其工作重心不断发生摇摆：一会儿落在试图恢复国家生活秩序的努力上，一会儿又落在设法维护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努力上。与此相应，其用人倾向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会儿倚重老干部集团而打压中央文革集团，一会儿又倚重中央文革集团而打压老干部集团。

这种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的摇摆，在从林彪事件爆发到毛泽东逝世这段时间里，大致经历了两个周期：

其一，先是倚重由周恩来领衔的老干部集团，来收拾林彪逃亡后留下的烂摊子；继又藉重中央文革集团，来批判周的「右倾回潮」。

其二，复又倚重由邓小平领衔的老干部集团，来「整顿」各行各业，以求「安定团结」，并「将国民经济搞上去」；再又藉重中央文革集团，来反击邓的「右倾翻案风」。

老人家如此施政，恰似小顽童搭积木，搭搭拆拆，复又搭搭拆拆。他总是忙个不停，并总是劳而无功。1976年9月，他终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可是，他所执政的这个国家的秩序仍是混乱不堪，他所发动的这场革命的前景更是凶多吉少。

## 84

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平息了林彪事件之后，就在后者的允准下抓起恢复国家秩序的工作。所抓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其中较突出者有两项：一是恢复生产秩序，二是落实干部政策。前者涉及全国人民吃饭穿衣问题，后者涉及一大批下台老干部能否重新工作问题，都是他这个当总理的必须要为之操心的事。

1971年12月16日至1972年2月12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

计划会议。会议要求进一步批判林彪一伙人破坏经济建设的罪行，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会议提出重在整顿企业管理秩序的任务，要求各级企迅速恢复和健全一系列规章制度，如岗位责任制、质量检验制、经济核算制，等等。

1973年1月7日至3月30日，国务院又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继续批判林彪一伙人，批判他们破坏国家经济政策、反对抓生产、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会议提出重在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任务，决定大力加强农业，大幅度增加对农业投入；决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非生产性开支，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以及货币发行量。

1972年至1973年间，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数次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提出报告，要求进口国外成套设备，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均获批准。总共计划进口成套设备26套，所需资金43亿美元。就单项说，最大者为武钢1米7轧机。就总量说，最多者为化学工业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厂。

进口这些成套设备有两方面意义，一是能够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尤其能够改善农产品短缺状况，如通过扩大化肥生产来增加农业产量，通过引进化纤工业以弥补棉花供应不足。二是利于破除闭关自守思想，进口外国先进设备本身就是承认自己在此方面落后于人，同时也表明自己愿意取人之长。

这后一方面意义，从今天角度看很一般，但就当时情况看已显得十分突出了。当时有一个医学代表团出国考察归来，准备做报告，但受到军代表警告：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结果他们不敢做这个可能会惹来麻烦的报告。同时还有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出国考察归来，不仅不敢做报告，而且不敢写报告，不敢谈人家的长处，更不敢谈自己的短处。周恩来对此批评道：这种「老大」的风气、这种「随便给人家戴高帽子」的风气不好。他明确表示，要「学外国长处」。（周恩来，〈要学外国的长处〉，《周恩来选集》下卷，页474。）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社论根据周恩来指示起草,并经他本人审阅定稿。社论意图很清楚,就是向全国表明中央有意让许多受冲击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为此,社论强调「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肯定那些「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不过,社论也坚守一些在当时不得逾越的界线,如坚持「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坚持认为这些老干部在文革前或文革中确实犯了错误,因而正告他们只有在「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的前提下,才能重新被使用。这实际上是对他们采取保留态度,只恢复工作,不恢复名誉,至少不完全恢复名誉。

显然,观种涉及许多权力人物进退的大事情,不可能由周恩来做主,而必须经毛泽东点头。事实上,也正是后者最先发出这一信号的。早在1971年11月,他就对一些人讲,不要再讲叶剑英他们搞「二月逆流」这件事了。翌年1月,他又出人意料地亲临陈毅追悼会,并当着许多人面评说亡者,称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

另外,毛还直接过问一些重要人物如邓小平的复出事宜。1972年8月3日,邓小平从流放地江西上书他的这位老首长,先是愤怒地谴责林彪的罪行,继之深刻地检讨自身的错误,并郑重地作出「永不翻案」的保证,最后表示自己身体还好,还能对党工作,希望主席能够予以考虑。(邓小平这封信,不久便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材料广发全国,但到了邓执政后因信中多有自尊之词而被禁止刊行,以致许多大陆出版物一触及此事就作讳莫如深状。)8月14日,毛读到此信,并写下批语,对此人作了一个总体性评价: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按: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

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泽东对邓小平 8 月 3 日信的批语（1972.8.1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6 册，页 707-708。）

1973 年 3 月 10 日，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同年 8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同年 12 月，经毛泽东提议，邓又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另外，在教育和科学等领域，周恩来也作了许多旨在恢复秩序的努力。毛泽东曾于 1968 年 7 月 21 日发表指示，责成理工大学「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68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为刊发〈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所作的「编者按」。）这一办学方针由于过分强调从实践中来，从而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如基础科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不受重视，高校学生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等。

1972 年 7 月，周恩来在与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谈话中指出「要把综合性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周恩来，〈对周培源来信的批语暨注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6 册，页 706-707；周培源，〈「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人民日报》，1977 年 1 月 13 日。）同年 9 月，他又给中国科学院的张文裕、朱光亚的信中再次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将理论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周恩来，〈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1972.9.11）〉，《周恩来选集》，下卷，页 473。）同年 10 月，他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博士时表示「中学毕业生可

以直接上大学」。(周恩来,〈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1972.10.14)〉,《周恩来选集》下卷,页473-474。)

随着恢复国家秩序工作逐步深入下去,周恩来开始谈起反「左」问题来了,开始由表入里地谈起文化大革命的症结来了,同时也意味着他快要走到他所能走到的极限处了。

1972年8、9月间,周责成《人民日报》社&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11月,他又在中联部和外交部关于外事工作要批判「极左思潮」报告上批语:「拟同意」。

不久,周的批「左」努力获得毛的否定性回应。

就《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写信表示赞成周总理批「极左」一事,老人家于12月17日表明自己态度。他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51。)毛这一批右不批左精神迅速被传达全党全国。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一回应,就在于周恩来批「极左」批到了他的痛处:

其一,在中共政治术语里,所谓「左」或所谓「右」,指某种错误倾向,常发展成为错误路线;而路线错误非同一般错误,常常导致全局溃败。周恩来此次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做法都当作「极左」东西来批判,已是在有意无意地暗示着:这场由老人家搞起来的政治运动可能犯了左倾路线错误。

其二,在中共政治运作中,像决定是批「左」还是批「右」这种涉及基本施政方向的大事,就只能由党主席来拍板,而不能由其它人来自作主张。周此次在未经毛允准情况下由自己来提出批「左」任务,当属越权行为,至少有着越权行事的嫌疑。

另外，周此次责成批左的《人民日报》，属于中央文革集团直接控制的单位，他在这一年里过问颇多的教育部门也是中央文革集团插手较多的领域。因此，周这些举措，可以看作是他所代表的老干部集团对中央文革集团的挤压。

这种情况是毛不愿看到的，至少是他不愿继续看下去的。

因为，前一集团本来就在实力上大大超过后一集团，如今又趁着恢复国家秩序机会进一步削弱后者，故对它形成压倒性优势。后一集团以往还可借助林彪集团与前一集团抗衡，如今已无盟友援手，已呈独木难支势。如果任此局面发展下去，那么，强者更强而弱者更弱，强者会因其过强而能够直接威胁他们的上司，弱者会因其过弱而难以承担守护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任务，

因此，无论出于搞分而治之权术的需要，还是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老人家都要制止这一局势的发展。

于是，毛的施政重心开始发生转移，由十分关注国家秩序能否得以恢复转向特别在意文化大革命是否受到贬损，由积极支持老干部集团转向大力扶持处于弱势的中央文革集团。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国务院计划工作批示：

- 一、项目多了，计划工作至今没有走上正轨；
- 二、搞计划要以地方省、市、自治区为主；
- 三、要把协作搞起来，一旦有事好办；
- 四、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

（陈明显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页176。）

这四条批示均有批评性质，尤其最后一条批示属画龙点睛之笔，即明确指出国务院方面已犯了只抓生产不问政治的路线性错误。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很快又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出来。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向王洪文和张春桥谈起郭沫若及其《十批判书》，表示赞成郭的历史分期说，即把中国奴隶制社会与中国封建制社会分界期定在春秋与战国间；但反对郭书的尊孔反法观，批评郭书不该标榜孔子人本主义而大骂秦始皇，并指出国民党、林彪都尊孔反法。

8月5日，毛泽东又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69-470。）

毛泽东作这些谈话的对象，都是中央文革集团的成员。他们迅即打出「批林批孔」旗帜，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报刊竞相登载评法批儒文章，形形色色的人物——识字多的，识字不多的，甚至不识字的——都来批判孔夫子。

这些庞庞杂杂的批判言论概括起来不过寥寥数语。

法家主张变革，故而是进步的，儒家反对变革，故而是保守的乃至反动的；这种儒法斗争延续了两千余年，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中；当前斗争焦点，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如何对待这场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许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对此，抱支持态度的人，就是革命派；反之，就是保守派，就是「现代儒家」，就应予以批判乃至打倒。

这一运动借用历史来比附现实，借批古人来暗讽今人，说是批判孔夫子，实为影射周恩来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仍在台上但不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老干部集团。

相对其他行业，以教育部门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搞得声势最大。第

一篇重头评法批儒文章——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就是由大学教授杨荣国署名的。第一个大型评法批儒活动——1973年9月8日至11日召开的全国教育战线批判孔子座谈会，则是打起了整个教育界旗号的。此后，也是数学校中人写批判文章最多、开批判会最勤。

教育界批林批孔落到实处，就是批「右倾回潮」，就是把周恩来在1972年前后为恢复学校秩序所作的许多努力，说成是搞到退，说成是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以恢复旧教育制度。

中央文革集团还为此搞出一系列「事件」来。

1973年4月，国务院发出通告，本年度高校录取学生要进行文化课考试。6月底，辽宁省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在考试中，答不出许多题，却写了一封信，一封充满怨气的信。

在此信中，他抱怨这种考试让那群「不务正业」的「大学迷」给垄断了，抱怨这种考试对于他这位「负全面责任」的生产队长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整天忙于集体生产而无暇钻进自己小屋里去复习迎考。

中央文革集团立即抓住这件事做典型，大加渲染，藉以指责此次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

1972年12月12日、28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刊发〈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都加上「编者按」。小学生叫黄帅，是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她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先由其亲属授撰写，后经刊发者刻意加工编排。

「日记」记述了这位小学生在学校里的一段经历：一次次地向一位很有问题的班主任老师提意见，又一次次地遭到后者打击报复。

「来信」将她与那位班主任老师之间的冲突，上升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与「旧教育制度的『师道尊严』」之间的斗争。

「编者按」十分严肃地指出：这个小學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流毒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很顽固，因此，要继续搞教育革命，「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毛泽东此次整治周恩来是内外有别的，在公开场合，搞指桑骂槐，即通过搞「批林批孔」来影射「周公」；在高层内部，就不大讲情面了，一是毛本人直接批评周主管的工作，二是发动政治局委员当面提周的意见。

1973年7月4日，毛在向王洪文和张春桥谈批林批孔问题时，还批评了由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也修正。」同年12月，毛在一次谈话中，又批评了由周恩来主持常务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以及由叶剑英主持常务工作的中央军委：「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69-471。）

1973年11月，毛又以周恩来工作失误为由，责成政治局开会对他进行「帮助」，要大家向他提意见，找缺点错误，作诛心之论，最后还免不了要被「帮助」者作出检讨，痛责自己一番。于是，政治局关起门来一连开了许多天会。

会上的详情，不得而知。会下的反应，倒可以从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中看出一些来。

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迎面相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吧？！

不仅事主遭冷遇，而且连事主的随员也遭冷遇。

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互相目光接触而觉得尴尬。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

至于周本人，成天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独自呆在办公室里，吃饭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

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使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页 310-314。）

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但一直关注会议进展，最后还对会议作了总体评价：「这次会开得好，很好」；江青两个说法不对，一说这事「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说周恩来「迫不及待」。（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471。）

从这一评价中，可以看出毛既要整周又要用周的态度，同时也可以看出会议中的批判调子已高到什么样的程度。

1974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献词〉，号召继续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并提出警告：「大事不讨论，埋头干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这几乎是在复述毛泽东批评外交部亦是批评周恩来的那段话。

1 月 18 日，经毛泽东允准，中共中央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选编）作为本年 1 号文件批发全国。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京举行。会议主要发言者为迟群、谢静宜、江青。他（她）们拿着中共中央 1 号文件，大谈批林批孔运动的必要性，并数度以隐去姓名方式复述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的那些话。此次大会主持者为周恩来。

## 85

「批林批孔」的直接后果，就是全国性动乱再起。

许多学生再度以写大字报、搞大批判为主课。他们为张铁生、黄帅的「反潮流」精神所鼓舞，也起而批判「智育第一」、批判「师道尊严」，批得文化课上不了，批得老师们灰溜溜。本来已渐趋稳定的教育秩序，如今又陷入一片混乱中。

许多工人也再度擅离工作岗位，重建造反组织，又打起派仗来。

其中一些人还走出厂门，搞跨行业跨地区串联，又像文革初期那样在社会上横冲直闯。还有一些工人已厌倦了这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不积极批林批孔，也不上班不工作。「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既成了那些「革命派」搞运动的理由，也成了这些「逍遥派」不劳动的借口。许多工厂停工停产。

国家经济状况急剧恶化。1974年上半年，批林批孔运动进入了高潮期，工业生产水平则跌落到最低点。例如，煤炭生产比计划欠产 835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6.2%；钢铁生产比计划欠产 188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9.4%；化肥生产比计划欠产 185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3.7%；铁路货运量比计划欠产 2,100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2.5%。另外，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5 亿元，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 2.5 亿元。

由于上半年欠账太多，致使整个 1974 年度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仅达到 1.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为 0.3%。在此之前，1973 年度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为 9.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为 9.5%。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完成国民经济指标情况而言，除了大打派仗的 1967 年和 1968 年外，就数批林批孔的 1974 年差。

国家生活秩序再度趋于紊乱，不仅对老百姓不利，而且与毛本人作为国家执政者的角色义务相冲突，也使他不得安宁。于是，毛再度转移施政重心，又开始强调秩序，强调要抓经济生产，要搞安定团结；与此同时，又开始频频打压中央文革集团，并转而倚重老干部集团。

1974 年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运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告诫参加运动者不要成立战斗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串联，不要打派仗，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告诫人们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 95% 的干部和 95% 的群众。通知还特别

指出，在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时，要限定范围，不要搞扩大化。

7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强调恢复生产、恢复秩序，并措辞严厉地批驳「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等过激提法，责令所有擅离职守者——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其它人——都必须返回原工作岗位，否则停发工资，按旷工处理。

7月17日，毛泽东本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话了：「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他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他还由江说到江的党羽：「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03。）

毛这个批评很重。他指责江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可他自己这一次就给江戴了三顶大帽子：「帽子工厂」、「钢铁工厂」和「上海帮」。不过，毛这个批评总体看来就像是一位长者训斥不争气晚辈一样，内里有恼怒，有失望，甚至有厌恶，但没有真要将她踢出去的意思。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190。）

毛的这一指示成了四届人大的指导思想。从中可以看出，毛本人也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生出许多倦意来，也想搞安定团结了。在会议筹备期间，他对周恩来集团多有重托。当周恩来集团与江青集团发生争执时，他也是对前者多有支持而对后者多有批评。

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发生争执。江青挑起事端，并盛气凌人地逼邓小平表态。后者予以拒绝，拂袖而去。当晚，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议论此事，宣泄不满。

次日，王洪文密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告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对新生事物不支持，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另有意见。他还反映，周恩来生病住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常常谈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去得较多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他还形容此时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对于王这番话，毛未作肯定性答复，反而规劝告状者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页92-100。）

王洪文的告状内容大都属实，后来竟成了执政党检察机关起诉他的罪证材料。这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起诉以及审判他的人来说，都有些讽刺意味。

另外，王所告内容本属毛十分在意的事情，既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有朝中重臣在他离京时交往过密的问题，结果并未使他作出激烈反应。从中可以看出，老人家此时心态是急于恢复国家秩序并很不信赖中央文革集团。

江青并未就此罢休，仍设法影响毛对下届国家权力机关的人事安排。11月12日，她写信向毛推荐一批人。

毛当即批复：「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11月19日，江又写信向毛推荐自己。毛批道：「你的职务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江又托人向毛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大为

光火：「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10。）

中央文革集团所掌握的权力很有限，仅限于操持政治运动。他们在搞运动时可以呼风唤雨，可一到强调秩序时就没有多少发言权了，甚至其本身都成为整肃对象。他们若要改变这一窘况，就必须将自己的权限从搞运动方面扩展到其它方面，至少扩展到行政系统中去；眼下说来，就必须抓住召开人大重组政府之机，积极谋求国务院要职以及人大常委会要职。1974 年江青集团对召开人大的企求与 1970 年林彪集团对召开人大的企求颇为相似。

然而，老人家很怀疑他们拥有从事政府方面工作的能力，并还在生着他们的气。于是有了上述情景：一方举起荐来没完没了，另一方发起火来越发越大。毛泽东责成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管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等问题，事实上是让周主持一切。因为，王无论在资望上还是在才具上都无法与周相抗衡。

毛泽东还提议让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事实上是让邓成为国中最有实权的人。因为，他这个主席向来不管日常工作，而那个总理也不管许多事务了。

周恩来 1972 年 5 月被发现患有膀胱癌，1974 年 6 月住进医院，已无治愈可能。他手上那一大堆工作必须交给一个能够胜任的人。周推荐了邓。毛也选择了邓。

毛泽东在确立四届人大方针时，除了强调要安定团结外，还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承认这个国家还应该有经济方面夙求。

周恩来在向四届人大提出的〈政府报告〉中，再次重申三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任务：「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周恩来话音落下，人民大会堂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

四届人大后，邓小平代行周恩来职权，总理党政军日常工作。他所抓工作的主旨，就是试图恢复各行各业被文化大革命搞乱的秩序，名曰「全面整顿」。「整顿」的核心，是整顿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也是这个国家的各级权力机构，既整作风，即「软、懒、散」的作风；也整人，即在领导班子里搞「派性」的人。这些人多是「造反」起家，虽相互间有冲突，但大都肯定文化大革命，大都属于中央文革集团支持者。

邓小平提出，先是对这些人进行规劝，若规劝不成则坚决将他们清除出领导班子。他还提出，青年干部培养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来，不要一下子由基层提拔到高层。

与此同时，他还抓紧落实干部政策，责成有关部门尽快将那些一直被审查而又审查不出问题来的老干部解放出来，并将其中一些人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作为政治家，邓小平最关注的事情自然是权力问题。他抓领导班子整顿，也就是要对各级权力机构的权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削减造反派分额，加大老干部比重。

整顿经济生产。在四届人大闭幕后半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重点整顿了几个关键性行业，并取得显著成效。

1975年2月1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讨论当时国民经济最薄弱环节即铁路运输问题，并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铁道部在万里领导下，坚决执行这一决定，迅即改变全国铁路面貌，第二个月就将所有堵塞地段疏通，并创下全国日装车数历史最高纪录。

5月8日至29日和7月20日至8月4日，中央先后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和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分别讨论这两个行业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办法。会后经上下努力，很快就改善这两个行业的生产面貌。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数 1975 年春季到秋季这段时间经济形势好。而整顿军队工作在 1975 年 1 月 25 日进行，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并谈了他本人对军队的看法，批评多而肯定少。

6 月 24 日至 7 月 15 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队整顿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军队整顿主要整五个方面问题：一是「肿」，人员超编，开支增大；二是「散」，派性严重，组织纪律性差；三是「骄」，盛气凌人，不尊重群众；四是「奢」，闹享受，闹待遇，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五是「惰」，革命意志衰退，不求进取，得过且过。（邓小平，〈军队要整顿〉、〈军队整顿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 2 卷，页 1-3，15-24。）

调整文艺政策。1975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作了一个书面谈话，抱怨文艺界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批评一些人对待作家，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出神经衰弱症来；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要「逐步扩大文艺节目」。

7 月 25 日，他亲自为电影《创业》解除禁令，并批评禁演者：「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 10 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来信的批语〉，《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7 册，页 280；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19-520。）稍后，他还将有关电影《海霞》争执批给政治局解决，听任邓小平等作出决定准予上映。当年，《诗刊》和《人民文学》均获复刊。

整顿还涉及科技领域和教育领域。胡耀邦主持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主要强调：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加强科研专业队伍建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理论研究，鼓励学术交流和学体争鸣；承认差距，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提纲》在经邓小平认可后，报请毛泽东批复，未获允准。

教育部长周荣鑫频频发表讲话，抱怨这些年来教育革命有严重片面性：一讲教育，就全盘否定；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办学校，不提倡读书；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也不能当技术员或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

教育部属下杂志《教育革命通讯》也频频发表文章，强调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还是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毛泽东的确想搞「整顿」，不仅允许别人去搞，而且亲自过问其中一些事，如亲自过问文艺政策调整问题，甚至过问某些影片审查问题。文艺界本属于文化大革命策源地，并一直由那个除了毛谁都敢骂的江青把持着。毛不亲自发话，其它人是不敢贸然触动这一领域的。

另外，老人家还阻止过中央文革集团打着「反经验主义」旗号来干扰整顿工作，4月23日，他在一个批示中，指责这些人不该只提反经验主义，不提反教条主义；并批评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263。）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他还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

他又补充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45。）

毛泽东支持「整顿」是有前提的，即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

早在 1974 年底，他一方面授权周恩来组阁四届人大，另一方面授权张春桥、姚文元负责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事宜。四届人大召开后，他仍是一方面支持邓小平抓「整顿」，另一方面支持张春桥等人抓「学习」。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毛在 1974 年底的一段谈话；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不同文章中的 33 条语录，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选编，以左证毛那段谈话。（〈毛泽东有关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编者按」发于篇首〉，《人民日报》，1975 年 2 月 22 日，《红旗》杂志，1975 年第 3 期。）

该理论大意如下：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搞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继续革命。

对于毛泽东这一用意，邓小平十分清楚。他在大力整顿国家各方面秩序的同时，不忘举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子，并作举得很高状。他提出全党工作要以毛主席三条指示为纲，第一条就是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它两条分别是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邓小平文选》，第 2 卷，页 12。）

由他授意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也强调：「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在三项重要指示中占首要地位。」（〈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7 册，页

507-518。)

尽管邓小平说，这三条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但实际上，它们是无法统一起来的，第一条是要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第二条和第三条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

邓小平若要切实有效地恢复国家秩序，就不能再搞继续革命，而应尽可能地纠正这场革命；可这样一来，就无法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只会招致提倡学习者对于恢复秩序者的不满和打压。

## 86

1975 年秋，中国政坛风云突变。

毛泽东施政重心又一次发生转移，由支持邓小平搞「整顿」转为指责他搞「翻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其同事，分别于 8 月 13 日和 10 月 13 日向毛泽东写了两封揭发信，揭发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里的种种不良表现，尤其揭发两人因在中共十大上没有当成中央委员和在四届人大上没有当成国务院部长而公开抱怨中央。

迟和谢为中央文革集团在教育界代表，直接掌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刘信经邓小平转呈。

毛对此信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54。）

11 月 3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到清华大学传达毛主席对刘信批示，表示中央支持迟群反对刘冰。随后，迟群倚恃中央支持，发动该校师生员工进行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名为大辩论，实为大

批斗，一是批斗写信者本人，指责他们是「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撤销他们一切职务，并将他们送到校属农场监督劳动；二是追逼写信者后台，矛头直指教育部长周荣鑫和转呈此信的邓小平。

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集党政军领导机关百余名老干部开会，宣读〈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有三：

其一，确认刘信为诬告信；

其二，传达毛对刘信批语，并指出当前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其三，预先向与会者打招呼，通报毛与中央对此事态度，以免大家再犯错误。

稍后，中共中央又将这一讲话要点以通知形式，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委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负责人作了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309-310。）

12月14日，中共中央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转发全国大中小学党支部，供各校参照实行。

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遍告全国老百姓。于是，又一场批判运动，先是在教育界，继是在其它各行业，迅速且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了。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泽东就这场运动作了一系列谈话。从其谈话记录（由其侄儿毛远新整理）看，老人家的思绪有些不连贯了，话与话之间多有跳跃性，但谈话的要旨还是很清楚的，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些不足」，「三七开，七分成就

绩，三分错误」。

毛认为，文化大革命错误有两个：一为「打倒一切」、二为「全面内战」；但这两个错误不全是消极的：虽然打错了许多老同志，但「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二、批评邓小平以及许多老干部，指责他们错误对待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他批评道：「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他还分析许多老干部犯错误原因：其一，他们「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其二，「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要厉害。」（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59-561；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页 473-475。）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成了这场运动的指导方针，即指明这场运动要坚守什么和反对什么：坚守文化大革命、坚守阶级斗争，反对翻文化大革命案、反对邓小平。这场运动也因此而被命名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命名不够简洁却能将此次运动所要反对的人和事一并凸显出来。

从毛上述谈话中，可看出他对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集团相当失望，并欲以打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又要回过头来倚重中央文革集团？又要重演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何用那一幕？

答案似是介于肯定与否定之间。他会再次启用这一集团，启用他

们去搞大批判，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重用这一集团。他对后者也已相当失望。他将这一集团不无戏谑地称之为「上海帮」或「四人帮」，言辞之中既有恼怒之情，又有鄙薄之意。

毛泽东在对邓小平集团和江青集团均感失望后，开始重用一种介乎于前两者之间的政治力量。这第三种力量以华国锋为代表，主要人物有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汪东兴等。

这些人物与前两个集团，既有些联系也都有些区别，故而派别色彩不大鲜明。他们都有老干部背景，在文革前就担任较高职务，经营一方；在文革中也多是负责事务性工作，忙于维系被造反派屡屡破坏的社会秩序。因此，他们对老干部群体有亲身了解，与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同时他们也有一定行政工作能力，而不是像中央文革集团成员那样空喊口号、不做实事、还尽找麻烦，并因此而对后者心存戒律、羞与为伍。

他们都持拥护文化大革命态度。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受冲击的程度较轻，而获提拔的速度很快，或由地方官员一跃而为中央大员，或由部门负责人一跃而为国家领导人，都先后达到他们一生仕途的最高点。就个人情感来说，他们深受毛泽东的重用，故对毛感激涕零，并因此而对毛坚持要搞的这场革命抱着欣然认可的态度。

另外，这些人，无论在待人接物上，还是在政治权欲上，都显得比较低调。他们大都给人以「老好人」形象，性情随和，目光凝重，举止迟缓，公开露面时多是与其它政治局委员同进同出，一起登台亮相，又一起出场谢幕，而不像江青那样喜欢一个人跑到前台上手划脚，并要求将所有灯光都打在自己身上。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城府很深，善于韬光养晦；而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比较实在，做事认真，不大会处心积虑地踩着别人往上爬，对同事和和气气，对领袖忠心耿耿，只是忠得有些愚信愚从。

这些人总体说来政治棱角不突出，待人接物不咄咄逼人，虽不能

为两边的强硬派所喜欢，但能为居中的多数人所接受；更重要的是，他们既有行政工作经验又拥护文化大革命，故能为那位兼有国家执政者与文革发动者双重身分的老人家所信赖，正如他后来给华国锋写了的那句带有政治遗嘱性质的话：你办事，我放心。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毛主席提议，并经政治局通过，在周恩来逝世后，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一通知表明毛已将政务系统实权和军队系统实权一并交给了第三种政治力量。对于毛这一人事安排，另外两大政治力量都心有酸楚。上述两大职权，在邓小平集团看来，本就属于他们，此前不久还掌握在他们手里；在江青集团看来，应该交给他们，因为他们批邓最积极，反击右倾翻案风功劳最大。

不过，两者心态不完全一样：

邓集团此时正横遭批判，并且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横遭批判，故对自己被夺权解职事已有心理准备，不会太想不开，相反倒会在不幸中暗自庆幸，庆幸这些至关重要的权力没有落到自己的政治死敌「四人帮」的手中。

江集团此时正处在批判者位置上，正口诛笔伐老对手邓小平，一时间意气风发，大有主中国政局非其莫属之声势。可结果是，毛把从邓处夺下的权力，没有交给他们，而是交给批邓表现很一般的华国锋等人，故使他们深感不平，心怀妒意。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接管大权者同邓集团多有联系，对江集团多有反感乃至隐有敌意，故使他们越发不满，并心存忧虑。

2月3日，张春桥写了一篇「有感」，其怨愤之情跃然纸上：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

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7 册，页 361。）

所谓去年「一号文件」，指 1975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通知，即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所谓又一个「一号文件」，指上述中共中央关于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通知。

两个「一号文件」，令张春桥感到沮丧，但可以使研究者从中看出毛在此期间思想变化轨迹：从前一个文件里，可看出他试图在邓江两大集团之间搞平衡，分授不同要职，以使相互牵制；从后一个文件里，可看出他又想在邓江两大集团之外启用和强化另一种政治力量，想对中共高层权力框架作重大调整，挤压两端，提拉中部。

对于毛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执政党高层内没有也不敢有反对声，可是，中南海红墙外响起一片喧哗声。

1976 年春，在中国许多城市里都爆发了群众自发性抗议活动。抗议活动主题，是悼念周恩来总理并反对江青等人。在此主题中，还隐有同情邓小平因搞整顿而获罪和抱怨老人家忠奸不分的政治倾向。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病逝，随即引发大规模群众性悼念活动。最感人场景要数北京老百姓为周总理送灵一幕：数十万市民自发列队数十里长街，在隆冬寒风中默默伫立数小时，送遗体去，望骨灰归，黑花灵车驶过时，路边一片粼粼泪眼。

周生前口碑甚好。在当时老百姓心中，此公属执政党好官，清正廉洁，一心为国，不与江青那类人同道；可是好人多难，前者屡遭后者攻击，屡受后者恶气，前年「批林批孔」如此，眼下「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如此。所以，许多群众对周的悼念，既有表达对亡者哀思的一面，又有排遣对现实政治对江青等人不满的一面。

中央文革集团方面，对逝世者早有怨恨，对悼念者心存戒虑。

1月15日前，即规定悼念期内，他们指令宣传媒体尽量淡化此事，不专门组织全国性报道，不发有关群众自发举行悼念活动的消息，压缩刊登国外唁电的版面，不要因发悼念周恩来的消息，而影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报道。

1月14日，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前一天，据姚文元指令，《人民日报》在头条位置上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报道宣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磨不灭的光辉，砍不断的怀念——新华社记者对姚文元破坏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的控诉〕，《人民日报》，1977年1月6日。）

1月15日后，中央文革集团一方面下令立即结束治丧活动报道，另一方面又通过他们直接控制的刊物发出一系列有损于周的报道：

2月6日，内部刊物《参考资料》转载一篇海外文章，谈周恩来在1927年「4·12事件」中有叛变嫌疑。

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关于纪录锋新闻稿时’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4句题词全部删去。

3月25日，《文汇报》刊发一篇新闻稿〈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写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等话，已近乎点名批判周恩来及邓小平了。

中央文革集团这些举动招致民间社会强烈反弹。自2月起，重庆、福州、武汉、贵阳、郑州、西安、太原、合肥、杭州、南京、北京等地先后出现群众性抗议活动，矛头直指中央文革集团。（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篇 第9章。）

4月以前，南京抗议活动最为激烈。许多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高喊口号，张贴标语。其中一条标语赫然写着：「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还有一些抗议者进入车站，用柏油和油漆在过往列车上

涂写大标语，以将他们的愤怒传至远方。

4月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抗议活动，随后发出电话通知，将此事定性为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分裂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责成地方当局迅速平息事态，并彻底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417。）

南京风未平，北京波又起。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自3月底后愈演愈烈，至4月4日清明节达到高潮。在这一天中，先后进入广场者达到两百万人次。前来悼念者，亦悲亦怒，既抬来花圈摆满广场，也带来愤慨倾泄纪念碑前。他们贴出许多大字报、小字报、讽刺诗，以间接或直接抨击那几个中央文革的人。（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集体化名），《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有搞影射的。许多诗文影射江青为「妲己」、「武则天」、「白骨精」，还影射她与张春桥、姚文元为「三人十只眼，阴谋想夺权」（江与张均戴眼镜，一人四只眼）、「清江姚桥命不长」、「青春元凶滔天罪」（取一人一字）。

也有搞指名道姓的。有一篇〈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多次提到江青，说她扭转批林批孔运动大方向，妄图把斗争矛头对准周总理；说她污蔑文化大革命，妄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并披露1975年7月毛泽东曾严厉批评江青。

有些诗文在痛斥江青等人同时，还旁敲侧击老人家。有诗道：「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此处皇妃那拉氏自是指江青，此处皇帝佛朗哥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江的那位夫君。

还有诗道：「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林彪集国曾指责毛泽东为当代秦皇，毛本人也多次自比秦皇，故使得这个古代君王称谓与毛有了较多的象征性联系，指责秦皇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攻击毛。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问题。会议将这一群众性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立即清理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阻止群众继续前来举行悼念活动，向全国揭露敌人阴谋，追查政治谣言，抓反革命。毛泽东随即批准政治局上述决定。

4月5日凌晨，有关部门出动两百辆汽车将广场上大部分花圈运至八宝山销毁，并组织大批民兵、警察和军队封锁纪念碑四周，把守广场进出路口，其间还逮捕数名在场群众。4月5日白天，数十万市民再度进入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四下寻找抗议目标，扭打便衣特务，冲撞警卫战士，涌上人民大会堂台阶，围攻「联合指挥部」（官方负责清理广场部门）所在地，焚烧汽车，点燃建筑物。

这些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情，是毛泽东执政以来从未遇到的事情。他以往所遭遇的挑战，多是来自党内高层人物，如彭德怀、邓子恢、刘少奇、林彪等；而此次所遭遇的挑战，直接来自下层，来自普通群众。诚然，他1957年也遭遇过党外「右派」的挑战，但那时的「右派」主要是知识分子，而此时的「群众」包括各阶层人士，除有知识分子外，还有产业工人、一般干部以及前「红卫兵」等。

以往，老人家搞定了中央，也就搞定了全国；此次，他搞定了中央，却未能搞定南京、北京，未能搞定与自己住所仅隔墙的天安门广场。虽不能说广场上那些慷慨激昂者已明确反对毛本人，但可以说他们已明确反对毛的政治羽翼、反对他的夫人以及他的夫人所领衔的中央文革集团，并明确不满毛的政治举措、不满他所发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对于执政党来说，若要解决高层冲突比较好办，只要关起门来开会就可做到；但要平息大规模群众骚乱就不那么简单了，除开会外，还须采用其它办法。5日傍晚6时25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是由少数坏人蓄意制造的政治事件，其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其目的在于扭转「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方向；号召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立即行动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首都；告诫在场群众迅速离开，不要受坏人蒙蔽。吴德这一讲话实为最后通牒。

9时35分，大批警察、民兵和军队开入广场，挥舞皮带棍棒暴打仍留在广场守护花圈者。遭围殴者约有两、三百人。纪念碑四周地面血迹斑斑，天安门前渐趋平静。

4月6日，毛泽东在获知天安门广场事件被平定消息后，欣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4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继续评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83-584。）

同时，他责成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

一、任命华国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二、鉴于天安门广场事件和邓小平最近表现，撤销邓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两项决议，当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次日在《人民日报》刊载。吴德广播讲话以及《人民日报》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也随同发表。

这一人事调整，可以说是毛一生所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中的最后一个。设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职，是中共建制史上从未有过的，表明老人家已将华国锋正式确认为自己的政治继承人。

## 尾声

在平息天安门广场事件后，毛泽东无论就其事业来说还是就其生命来说，均呈强弩之末状。

尽管各种传媒仍在猛批右倾翻案风，但民间反响不大，至少不显热烈。老百姓们大都被持续不断且颠三倒四的政治运动搞得疲惫不堪且拿不定主意了。他们对于眼下报纸广播所宣传的那些事，既没多大兴趣也不怎么相信，持不积极参与态度。毛泽东所搞起的这场群众性运动正在失去它的「群众性」意义。

大多数老百姓对于毛要他们搞的文化大革命，尽管已有倦意，但还无反心，还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这场革命，更没有用行动来结束这场革命，进而结束毛的政治统治。他们既不满现状，又不打算改变它，也就只好「熬日子」了，只好采取老百姓天然拥有的这一能应对一切或熬掉一切的生存方式。事实上，谁也熬不过老百姓，三皇五帝如此，毛泽东也如此，何况他这时已成枯油残灯，「熬」不了多久了。（关于毛泽东最后日子，李志绥大夫在其《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作了详述，参见该书序，第 88、89、90 节（中译本），页 1-28，583-598。）

5 月 11 日，毛发生第一次心肌梗死，经抢救脱离危险，但病情继续恶化。他的咽喉已麻痹，完全不能吞咽食物和液体。5 月 30 日，毛出现暂时昏厥。6 月 26 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经抢救脱离危险，但此次心肌梗死范围过大，已无恢复可能。他的肺部和肾脏均有严重症状。7 月 28 日凌晨三时，毛躺在病榻上感受到唐山大地震余波。9 月 2 日，毛发生第三次心肌梗死，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心肌梗死。自此，他的全身机能均处于迅速衰竭中。毛本人似也感到大限在即，数度询问大夫：我还有救吗？大夫一再安慰：我们都有信心治好主席的病。9

月 9 日零时过后不久，老人家抓住大夫的手，作了最后一次询问。他曾经想要得到什么就能到什么，此时又得到他想听到的答复，却未得到他想拥有的东西。他在被告知自己还有救后，顿时露出喜悦神情，随即便离开了人世。

毛泽东生前说过一句类似格言的话：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所谓「卑贱者」，即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所谓「高贵者」，则是那些社会地位优越者，其生存状况与前者完全相反。（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5.18），《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0），页 217-218。）

若严格地说，毛这句话有些大而化之。因为，「卑贱者」中有聪明人也有蠢人，「高贵者」中有蠢人也有聪明人，并且前者中的蠢人比例与后者中的聪明人比例都相当高。

毛自己提供了这方面例证。他 1958 年说出此话，本想鼓动全国老百姓搞「大跃进」，并贬斥那些不支持这一运动的人；结果在被他鼓动起来的人中人为多头脑蒙昧者，而在被他贬斥下去的人中不乏有头脑清醒者。

就毛执政多数时间来看，那些被称为「革命群众」并有「革命行动」的人，大都头脑发热，盲信盲从；而那些被打成「右派」或被打入「牛棚」的人，倒是比较冷静，比较有主见。然而，这两类人都是毛泽东治下的「卑贱者」，前者因愚蠢而卑贱，后者因聪明而卑贱。

若不那么严格地说，毛上述话也道出一些人情事理。卑贱者至少有一长处，就是做事比较谨慎。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制，故而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东西，相反倒有许多必须顾忌的地方。高贵者则高高在上，常常无所顾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以致干出许多蠢事来。

另外，在「卑贱者」中，有一些不安于现状者。他们虽生于困苦，但很想改变自身这一境况，即所谓「穷则思变」。他们既积极进取，又因长期在艰难生活中磨练而较能吃苦耐劳，故常有成就。

若从思想史上看，毛这句话很难说有多少原创性。早在一千多年前，高僧惠能就说过类似话：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

（意为最下等的人有最上等的智慧，最上等的人有可能被埋没了智慧。——《坛经·行由第一》）

惠能本人出身寒微。其父籍贯范阳（今北京市附近），因获罪被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一带），在惠能三岁时亡故，留下孤儿寡母。惠能自幼未读书识字，稍长靠卖柴为生，廿四岁时经人指点，投于黄梅东禅寺，欲得道成佛。

五祖弘忍先是对他且讥且疑：「你这岭南「獠獠」（意为野蛮人），怎么能够成佛；继而留他做了八个月寺中杂役，每日劈柴舂米；最后向他密传袈裟，并命他即刻南归。」

惠能一上路就受到许多欲夺袈裟者苦苦追逼，后来长期隐居深山，卅九岁时复出为僧，开坛讲经，凡卅七年，终成禅门大宗师，堪称中国佛教史上最聪明的和尚。

显然，惠高僧的这句话，尤其前半句话，可说是他本人经历的一个写照。那么，毛泽东的那句话，或前半句话或后半句话或整个一句话，是否也可说是他本人经历的一个写照？

答案似为肯定。

执政前的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卑贱者」，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当他在城里求学时，不过是一个刚从乡下来的年青人，长衫布鞋

湘潭话；但他比那些城里人更了解中国农村，更了解中国最大人口群体的基本生存状况。

当他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时，不过是一个刚从外省专科学校毕业的小职员，在前来借书的人中，他认识的教授比认识他的教授要多得多；但他比那些或着西装革履或着长袍马褂的名流学者们更相信学以致用道理，更相信大学堂之外还有一片更大的天地。当他在与党内那些或留过苏或留过法的领导人一起讨论中国革命时，只能谈出一些「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间或讲一点《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水浒传》里的典故；但他比那些吃过黑面包者或喝过洋墨水者更熟知中国国情，更善于持枪纵横九州大地。

尤为「卑贱」的是，他本人和他所归属的革命组织，被国民政府宣布为「匪首」和「匪党」，他的脑袋也多次被明码标价予以悬赏；他和他的党人在廿八年革命中，有廿六年处于劣势，常常被强敌围着打、追着跑，有一次竟被追着跑了两万五千里。

然而，毛所在的中共组织，特别是毛执掌最高权力时的中共组织，也有自己的许多长处，至少比当时的执政党更易于获取民心，更注意谨慎行事。毛和他的同事们十分关注下层人民，能够与他们同甘共苦，能够为他们仗义直言乃至拔刀相助，故而受他们衷心拥戴。毛和他的同事们由于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屡遭挫折，故而遇事多从困难方面考虑，并能拿出相应办法。

他们不轻谈决战，不指望一口吞下对手，而注重稳扎稳打，点点滴滴地积聚自己力量，并最终转弱为强。他们一旦获得优势地位，就会向对手发起穷追猛打攻势，而不给他们留下任何喘息机会。他们在艰苦创业的廿八年中，除了处于劣势的廿六年外，余下二年，一年与对手持平，再一年便将对手打翻在地，进而将诺大个国家一举拿下。

执政后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高贵者」，其高贵的程度是无与伦比的，其人被颂之为「红太阳」，其话被奉之为「最高指示」。他几无

遗漏地控制着他的臣民，并随心所欲地治理着他的国家，既享有了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所曾享有过的权威，又享有了他们未曾享有过的权威。

但此公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愚蠢的人，一个干出许多荒唐事的人，其荒唐的程度也是无与伦比的。他执政后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出了「大跃进」；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搞出了「文化大革命」。前者的结果，是在无大规模战争、无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饿死数千万人。事后，毛的宣传部门硬是将此「人祸」说成「天灾」，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

后者的结果，使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并富有智慧的民族陷入极度疯狂中。其间，老人家还为之欢呼不已，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诚然，毛不应为这些运动负所有责任。因为，他搞这些运动都曾得到他的许多党人和许多老百姓的支持或认可，后者也应为此负有一部分责任，即负有参与这些坏事和纵容不良领袖的责任。

但是，人们有理由认为毛应该为这些运动负主要责任或决定性责任。最初，这些运动都是他力主发动的；后当这些运动露出败象并有人指出来时，又都是他坚持要搞下去的，并严惩讲实话者；再当这些运动完全失败时，又都是他迟迟不让收场的，并不准说出真相。

毛泽东在其党中在其国中几乎不受任何制约，其个性因此而获得最充分的发展，既能为那些传统人性论提供最有力的经验证据，即一种不受约束的人性究竟会成个什么样子；也能为那些传统环境论提供最有力的经验证据，即一个专断强横的制度究竟能把统治者变坏变蠢到何种程度。

不过，老人家除了有因其「高贵」而非常愚蠢的一面外，还有非常聪明的一面。他虽不能很好地成就他的事业，却能够有效地维系他的权力，能够富有谋略地操纵中共高层、进而控制整个国家。

他不只是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有效地维系他的权力，而且在犯了严重错误并带来巨大恶果的情况下仍能够有效地维系他的权力。「大跃进」惨败后，他竟被说成是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的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他仍能躺在病榻上监控着政治局里的一举一动，并能随其心意地决定着中央大员的升降去留。他哼哼呀呀说出的那些只能由其身边服务员依其口形变化而估猜出来的话，仍被全党全国奉为最高指示。

他甚至能够将自己曾拥有过的许多权威由身前延缓到身后。他的政治继承人宣布，毛主席执政业绩「三七开」，三分过七分功，过不及功，功大于过，毛泽东仍应享有党和人民的尊敬。尽管执政党内也有人认为，毛三分功七分过，功不抵过，但其意见不入主流。

毛泽东执掌这个党有四十年之久，执政这个国家也有廿七年之久。这个党这个国家的高层人士都做过他的部下，其中一些人还因受过他的宠爱而做过他的亲信。他们对他本人多是以敬畏心态来仰视，对他所做事情也尽量从善意方面去理解。并且，他们也深知此人对这个党的影响有多大，深知此人的荣誉关乎着这个党的荣誉，关乎着他的许多老部下的荣誉，故而深恐否定毛泽东也会连带地否定这个党否定他们自己。

1976年毛病重时，他的党人在如何处置其夫人江青问题上，有一种「投鼠忌器」的心态，担心若搞掉江青等人就会伤害他们的主席。

毛逝世后，党人在如何评价其本人功过问题上，也有一种「投鼠忌器」的心态，担心若搞清楚毛泽东问题就会危害他们的党、危害他们一直声言要为之奋斗的事业。

然而，历史是严肃的。

已经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是无法更改的，也是难以长期掩盖下去的。

本该否定的东西，特别是那些破坏人的基本权利的东西，那些侵害人的生命、摧毁人的尊严的东西，也是难以长期维护下去的。

而不该否定的东西，自是否定不了的。

这个党在执政前，出过像李大钊、夏明翰、江竹筠那样的人——他们追求理想、追求民族兴盛和社会公正。

这个党在执政后，出过像彭德怀、张志新、胡耀邦那样的人——他们坚守理想，坚守自己对这个党所作过的承诺以及这个党对人民所作过的承诺。人们可以不赞成他们所追求或所坚守的那些具体目标，但不能不敬重他们在这追求或这坚守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那种执着精神。

写至此处，笔者不禁生出一问：假使这些中共先烈们能够活着看到今日中国的景况，尤其是看到今日海峡两岸当局争执的景况，他们会有何种感受呢？他们的党曾经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推翻了那边的党，而那边的党如今又以民主自由为理由来拒绝他们的党所提出的关于和平统一中国的要求，摆出一副你若不想学好我就不理睬你的架势来。

1940年代，延安政府在与重庆政府谈判中屡屡提出，你方若实现政治民主化，我方就称臣国民政府；你方若实现军队国家化，我方就交出武装力量，……。

1990年代，台北当局在向北京当局陈述他们的和平统一方案时，就几乎是在复述他们的谈判对手于五十年前已说过的那些话，……。

可谓，数十年河东，数十年河西，双方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面对这种角色语言倒置情况，活着的中共党人若有良知，就会羞愧无颜而抬不起头；牺牲的中共党人若有所知，当回泪眼相向而遗恨身后。

不过，这种情况在那些靠着不民主不自由或安坐高位或盗窃国库的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他们很轻松地回应对方：你们要我们放弃什么，我们根本不考虑；你们骂我们如何不是，我们毫不在乎。

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执政党，尤其是这两个执政党的老党魁蒋先生和毛先生，都做过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前者搞专制统治，杀共产党人杀得太多；后者也搞专制统治，整知识分子整自家党人整得也太多。在现代中国诸多党派中，就数中共最为多难、最为悲怆，其优秀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不是让蒋先生给杀掉了，让本党人尤其让毛先生给整倒了。

对此，国共两党内部都有一些人士能够予以反省。其代表人物，那边当推蒋经国，这边当推胡耀邦。蒋胡二人在 1970、1980 年代先后坐上国共两党党魁席位。他们政治信仰不同，权力地位也不尽相同——前者为蒋介石直接继承人，后者为毛泽东间接继承人而仅享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然而，他们执政心态相近，都深怀愧疚感。

他们都为本党以往所作所为而感到愧对治下人民，故将自己执政事业看作是在赎罪，是在还债，还本党积欠老百姓的债。经国先生开放党禁、开放舆论，还人民以应有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耀邦同志倾其心力平反冤假错案，还好人以清白，还天下以公道；又身体力行推动改革开放，还人民以应有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大陆人民这一权利在海峡对岸人民的生活景况的参照下显得尤为突出。胡耀邦此种心迹在其同事万里那里也有所表露。（张广友、韩钢，〈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 年第 3 期，页 1-9。）

然而，在胡与万的党中，还有一些人抱着另外的心态：

其一，拒绝还债，不承认以往的累累欠帐，不支持今天的改革开放。

其二，虽做了一些还债的事，如赞成改革开放，却为此而要人民

感恩于他们、歌功颂德于他们，硬是让自己以债务人的身分坐着债权人的位子，甚至效法前人，作伟大领袖状。

我们民族拥有数千年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文化，因此而拥有十分发达的历史意识。我们的人民拥有很多史趣史识。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知识分子大都爱听爱说史上掌故，并在这听与这说中显示出相当强的解读能力。

我们的历史学科在我们的所有人文学科中最显突出，最有学术水平。我们的历史学家已将过去两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搞得比较清楚，也会给这近几十年被遮遮掩掩的历史还以本来面目。我们民族的历史意识，除有搞清历史事实的欲求外，还有从中获取教益的欲求。以史为鉴已成为我们史学研究中的一种强势传统，尽管其间难免有因价值欲求过强而影响研究结论客观的情况。

就今天而言，我们民族能够从刚刚过去的历史中获得哪些教益呢？这是一个需要许多学者乃至整个民族共同努力才能予以充分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允许人们从不同视角给出不同答案的问题。这里仅指出，在我们民族有可能获得的许许多多教益中，有两点最重要，最能弥补我们民族现今最为匮乏的东西：

其一，通过认真反省这段历史而复甦一个伟大民族所应有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耻辱感。这也正是鲁迅先生曾苦心孤诣地做着的事。

我们应从心底，耻于我们曾做过的那些丑陋的事，更耻于我们还在做以及还会做我们曾做过的那些丑陋的事。我们将会因此而重获我们先人曾有过的这种「知耻者勇」的襟怀，并重现我们史上曾有过的这种最感耻辱亦是最显壮怀激烈的景象。

其二，通过认真反省这段历史，重获伟大民族所应有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荣誉感。

我们将再次发现，我们民族在有过那样一段百般屈辱的历史后仍

保有不屈的精神，在有过那样一段遍体鳞伤的经历后仍拥有敢于裸露疤痕的勇气。我们将再次确信，那些以不择手段方式获取成功的人终究是卑劣的，而那些以光明磊落方式作出业绩的人终究是荣耀的，尤其是那些因其刚正而遭厄运的人终将享有不朽。

## 附录：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

本文将对本书写作理念作出陈述。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一个很摆平又必须摆平的问题，即幸福与德行有可能相背离的问题：

一个有福的人未必是一个有德的人，有可能一生屡作恶事；一个有德的人必是一个有福的人，有可能一生历经苦难。

一个民族若要维护其社会公正，就必须设法在这德与这福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对那些有福而无德的人予以追究，对那些有德而无福的人予以补偿。

反之，若不作这种究和这种补偿，那些有福无德的人就会无所畏惧，那些有德无福的人就会深感失望。于是，这个民族就会出现价值失衡，只重视幸福而轻视德行；这个民族的许多成员就会在价值取向上，只重视个人私欲的满足而轻视社会公益的实现：

只会为了幸福而放弃德行，即不怕作恶——因不受追究；不会为了德行而放弃幸福，即不愿行善——因没有补偿。

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将因失去社会公正而失去道德约束力，将因失去道德约束力而失去社会凝聚力，将因私欲横流而溃为一盘散沙。

（若要实现着种追究和这种补偿，就应有能承受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的承载系统，就应有能裁决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的裁判系统——从略。）

难各个民族如何实现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似是没有统一途径。

有些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教途径来实现的：让那些生前有福而无德的人死后「下地狱」，让那些生前有德而无福的人死后「上天

堂」。这种途径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得到经典性表述。

我们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著史途径来实现的：

让那些生前有福而无德的人死后留下骂名，即所谓「遗臭万年」，犹如家出「三世状元」的秦桧。

让那些生前有德而无福的人死后享有盛名，即所谓「流芳百世」，犹如生前「披麻带孝」的岳飞。

这种著史途径在「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句名言里得到经典性表述。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刘少奇子）、何家栋，〈中共资深新闻工作者〉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第10版。）从这里可看出，刘怕毛也怕史，甚至怕毛不及怕史，怕史更甚于怕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从「人相食」后，刘开始与毛分道扬镳了。

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1976.4.30），自己给自己作「盖棺定论」：「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夺取全国政权，「持异议的人甚少」；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参见本书第13节）

从这谈话的时间和这谈话的内容看，毛是在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可见，毛也是很在乎历史褒贬的，尽管他常爱摆出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架势：「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话中自是含有这样一层意思：

我刘少奇的是非功过不是由某人（比如老毛）说了算，而要由历史由后人来评定。彭德怀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书写申述材料，既是向中央申诉，也是向历史申诉——因为他已对那个奉老毛为神明的中央颇感失望了。他在生命垂危中，听到侄女悄声说他的那包材料被保存下来时，先是一愣，接着欣然地笑了。

显然，他笑在历史将还他以公道。事实也是如此：在现世中，毛把彭押上了批斗台；在历史中，彭则把毛钉上了耻辱柱；并且，这种反差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愈显强烈，一方愈显冤屈，一方愈显卑劣。

从彭与毛的冲突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人物是要过历史关的，他们的较量是要从现世中延续到历史中的，是要在历史中决胜负的。可是，现代中国仍有一些权势人物似乎不明白这一点，自己还在台上时就迫不及待地自吹自擂，或是纵容属下为自己评功摆好。稍有史识者观其「行状」，不禁想吆喝一声：你急什么？

从彭与刘的寄望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学家是负有双重责任的，除了负有澄清史实的学术责任外，还负有辨明是非的道义责任。或者说，中国史学具有双重职能：

一是记录历史事实；二是维系人伦价值，故多有道德评价。

前一职能无疑是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一切史学都必须具有的职能，也是最基本的职能，后一职能则为中国史学所特别强调的职能。

与前一职能相比，后一职能有较多主观性。不过，这种主观性是相对的。比如上述道德评价，就当时来看，可说是一些人的主观判断；但就后世来看，则成了一种确已存在的历史现象，一种不可更改的客观现象，有些类似于波普尔（Karl R. Popper）所说的「世界三」（world 3）。或者说，中国史学「双肩挑」：左边肩膀挑着史实；右边肩膀挑着公正，故多有人物褒贬。这右边肩膀挑着的东西，有些类似其它民族多由宗教挑着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民族的历史所具有的与其它民族的宗教所具有的功能，在内涵上是相互交叉的：有不重合的部分，

即一是记史一是敬神；有相重合的部分，即维系人伦价值。

一个有着道德感的人，自是一个有着内心敬畏感的人。反之，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一个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信仰者，自是一个缺乏道德感的人。至于人们内心具体敬畏什么则因人而异，既有人敬畏宗教性东西，如许多西方人敬畏上帝，也有人敬畏非宗教性东西，如许多中国人敬畏历史。前者的敬畏感由宗教意识维系，后者的敬畏感由历史意识维系。

从这也可以看出，前者的宗教意识与后者的历史意识，虽对象不同，但功能相近。

有一些中国学者（多为中青年学者）在比较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时，既发出叹息，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又发出呼吁：中国人应亲近宗教，应陶冶出宗教感来。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有些偏颇，只看到中国人缺乏诚挚的宗教感，未看到中国人富有醇厚的历史感，即能在某些方面替代宗教感的历史感；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巨大差异，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着一些共性，即都有着内心敬畏感。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并已延续数千年了，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心底酿出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只是这种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在今天变得有些淡薄了。（我们民族通过著史来维系社会公正这一途径，在不同社会层面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主流社会有正史，在民间社会有家谱、墓志、说唱……，——从略。）

根据上述看法，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其它许多看法，至少还可引申出下面一些看法。

其一，传统中国史学兼容并蓄事实判断系统和价值判断系统——传统中国最为丰富的事实判断系统和传统中国最为基本的价值判断系统，因而拥有我们民族最为深厚的精神资源。

正因如此，我们民族拥有一句其他民族不大可能拥有的名言：「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毁损历史亦是毁损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毁史者即祸国者，即国贼。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书指控那些毁损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人做出只有汪伪政权的人才会做出的事（参见本书第 41 节）。同理，那些肆意毁损和封杀「大跃进」史的人，那些肆意毁损和封杀「文革」史的人……也都属于这一类的人。

就学术方面来说，传统中国史学拥有传统中国最有水平的学术成果和最见功底的学术大师，或者说，传统中国最好的学术成果和最好的学术大师多与史学研究有关。

传统中国史学由于既拥有学术龙头地位又具有兼容并包性质，从而导致这样一种现象：传统中国的学术极致处与价值极致处是重迭在一起的，与此相应，国学大师的文章与道德是并称于当世的。

比如「章疯子」太炎先生，不仅做出顶级学问，而且坚守终极价值，即坚守我们民族价值系统中的那些最原则的东西，即那些属于「绝对命令」的东西，故而既是睿智之士，又是耿介之士乃至激愤之士。

反观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人文学科之所以不出大师这一现象，就学者方面来说，既有学养不足的原因，也有人格猥琐的原因，即在为学做人上，似是太实际、太圆滑了，似是太会顺应各种政治形势、人会迎合各种权势人物了。

其二，当代中国社会风尚发生畸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人有意无意地忘却历史。

一些权势人物有意识地掩饰历史，不准谈「大跃进」，不准谈「文革」，不准谈「六四」，不准谈……以致某长官被人们戏称为「某八十」，即此人说了 80 个不准谈。过去许多当皇帝的人都不干涉史官事务，如今一些搞宣传的人却敢歪曲历史、封杀历史。他们嘴巴上整天说着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实际上总是在那里毁损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最

精华的部分——尊重历史。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脸皮也太厚了。

许多普通民众无意识地遗忘历史，患了严重的「历史健忘症」和「被虐待狂症」，对于那些曾无情作践过他们的人和事，或抱着漠然的态度，或抱着感恩的心情。

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意识相对淡薄的民族中，历史感的匮乏直接导致道德感的丧失：许多人只考虑当下的利益，不考虑当下的行为对过去和将来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对过去和将来有什么义务关系；只知现在，不知过去和将来、不知历史和责任。

这种道德感的丧失最突出地表现为信用感的丧失：许多人为了抓住眼前的利益，既能够不履行自己在过去所作的承诺，也能够不实践自己对将来所作的承诺。

信用是在坚守承诺中实现的，坚守承诺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因此，信用是以历史为载体的，是有历史品格的。这就不难理解，传统中国商人之所以很讲信用，就在于他们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故而是多有历史感；同样不难理解，当代中国商界之所以缺乏信用，就在于此间几无文化几无历史。

信贷业不乏有「借钱不还钱」现象，或在应该还钱时不还钱，或在当初借钱时就没打算还钱。一些有着权势背景的企业和个人正是靠着「借钱不还」而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商场上也不乏有「一锤子买卖」和「假冒伪劣品」。前者只要「现在」而不管「过去」和「将来」，后者则连「现在」都具有虚拟性。

与经济领域有许多「借钱不还钱」现象相似，政治领域也有许多「讲话不算话」现象。在共和国宪法中，我们看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在执政者实践中，我们则看到了「阳谋」，看到了对所谓「反革命言论罪」和所谓「反革命组织罪」的严惩，看到了对所谓「颠覆 XX 罪」和所谓「加入 XX 罪」的严惩。

我们民族的发展正面临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形势，并正受到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制约。在与发达国家即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打交道时，我们常常遭遇对方充满狐疑的目光，以致一度在美国民意测验中被美国公众指认为最有敌意的国家。可是，这个美国恰恰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市场和海外人才的最大聚集地。

在发展现代新经济时，我们也遭遇信用不足问题。

现代新经济有两大杠杆，一是风险投资，一是知识创新，都是以高度信用为前提的。很难想象：在一个借钱不还现象屡有发生的国度里，有许多人敢作风险投资、敢作这种风险再加风险的投资；在一个盗版现象泛滥的国度里，还会有许多人愿作知识创新、愿作这种二年努力一日被盗的创新。中国已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

其三，笔者对黄仁宇先生关于中国史书「最大的通病，是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怎样读历史》）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

一是在描述层面上，与黄先生无多分歧，认为中国史书确有一些内容「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

二是在评价层面上，与黄先生有些分歧，认为中国史书拥有这些内容未必是弊病，更谈不上是「最大的通病」；

三是在解释层面上，就黄先生在大陆出版的几本著作来看，认为黄先生未能充分说明中国史书为什么会有这些内容，或中国史官为什么都要这样著述历史。

黄先生认为，作历史研究应「极欲知道」历史现象「何以如是」（《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可是，黄先生在向我们指出中国史书的「最大的通病」时，未能让我们知道这一现象「何以如是」。历史本身是有不同层面的，既有技术层面，也有价值层面以及其它层面。与此相应，历史著述也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既可以从技术角度切

入，如黄先生所强调的那种「大历史观」；也可以从价值角度以及其它角度切入，如《资治通鉴》中的「臣（司马）光曰」所作出的那些评述。

在此，我们不否定黄先生的大历史观，但否定黄先生对传统史观的否定。我们可以把历史设想为一个有着 X 轴、Y 轴、Z 轴的三维空间。将由 X 轴与 Y 轴所形成的面，设定为技术的面，即黄先生所强调的那种技术的面；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条不断延伸的曲线，左端为「不可用数目字管理」，右端为「可以用数目字管理」，总体趋势趋于向上。将由 Y 轴与 Z 轴所形成的面，设定为价值的面，即中国史书所坚守的那种价值的面（或道德评价的面）；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条不断震颤的线段，一会儿左端（有德）低落（无福）而右端（无德）高起（有福），一会儿左端（有德）高起（有福）而右端（无德）低落（无福），总体趋势趋于持平。

此外，我们还可以作其他连接，还可以看到其它层面。黄先生主张史书不应「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对于一般史学来说，属于适宜要求，因为学科分工要求历史学研究方式与伦理学研究方式应有所区别；但对于中国史学来说，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因为这好比是强求一个养母扔下她已照看多年的养子。

两千年来，中国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道德尤其是中国政治道德的监护人，或者说，中国道德尤其是中国政治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史学的被监护人。一旦脱离这个监护人，这个被监护人就可能由养子变成居无定所且行无定规的浪子，如现代中国那些无法无天的政治权势人物们。传统中国史书比较注重采写政治方面史料，既对之作如实记述，又对之作善恶褒贬，从而对那些政治权势人物至少形成两方面压力：一是成就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二是道德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品行卑劣的人，既使自己留下恶名，又使子孙蒙受耻辱。

事实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感较淡薄的民族里，能够让那些权

势人物特别是那些权倾天下的至尊君主感到害怕的东西，也只有史书了。这一点可以从李世民与褚遂良关于史官应对天子「备记善恶」那段著名对话中看出。

在中国历史上，除少数起于乱世的草莽英雄外，大多数中国政治权势人物都曾熟读过史书，至少都曾在弱冠之前熟读过史书，都曾把读史作为自己的一门必修功课，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感到史书的分量。对于他们来说，史书既是从事政务的教科书，故受其教化；又是人物操行的鉴定书，故受其震慑。

比较而言，中国史书对权势人物的制约力要大于对普通百姓的制约力，君主比人民更怕史，贵族比庶民更怕史。这不仅因为前者比后者受过更多的史书教育，而且因为前者中的许多人本身是要上史书的，是要受到历史严厉考核的，其生前拥有权势的打小与其死后受到严厉考核的程度成正比。现代中国一些权势人物，总想着要高升，要进中央委员会，要进政治局……不知是否想过，自己在成为国中权贵的同时，也上了历史考评的名单，即要接受后人非常严厉乃至苛刻的剖析和评断，并将因此而使自己的明亮面与龌龊面都展现在包括自己的子孙在内的世人面前，有可能像个君子，有可能像个小丑。

人和人不一样。有人不在乎这一点，只要活得好，哪管身后事，故而使用起权力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也有人很在乎这一点，很在乎自己身后是否被「掘墓鞭尸」，故而使用起权力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可以说，中国史上凡是有品味有教养的政治家，都很在乎自己身后事，如胡耀邦言：「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近闻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坦言：自己若能被后人称为「清官」就很满意了。）

传统中国史书正是以道德褒贬的笔法，用黄先生话说即「以道德的立场解说历史」的笔法，能够在相当长时间里，将中国政治道德尤其是中国高层政治道德，维持在一个大致说得过去的水平之上，至少维持在毛泽东这一朝的水平之上。史书能在相当长时间里，使中国权

势人物尤其是能上史书的中国权势人物，在掌握较多的社会资源的同时受到较大的道德压力，至少在死后受到清算。史书拥有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这种作用常常是通过一个时间差——褒贬对象的生前与身后的时间差——来实现的。笔者注意到，黄先生在他的几本著作中都谈了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历史在长时间内所表现的合理性」或「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中国史书「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已讲解了两千年，无疑成了一种长期历史现象。按黄先生上述观点，似乎也应有了一种「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何况我们民族向来是很讲求实用的，既然能长时间做一件事，就一定认识到做这件事是有许多好处的。一个很实用的民族，不大可能长时间地并很努力地做着一件很无用的事情。

黄先生是学术前辈，学养丰厚。我读过他的书，受益颇多，本想就上述问题请教他，后知他已仙逝，不禁怅然。

本书书名中的「春秋」一词正是取其传统意义：一是记述历史，二是褒贬人物。这正是本书所信守的一个理念。

# 后记

## 成书过程

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年。我觉得应写点东西，谈点我该谈的话，不过，当时只打算写一短文，只要能谈出我对此人的基本态度就可以了。

这年夏天，我写出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民主观」的文章，内有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前一部分题为〈轻诺延安寡信北京〉，当年即被北大学生拿去登在他们自办刊物《边缘》上，近年又被不相识者粘贴到互联网上。

就在我写作上述文章前后时间里，中国大陆兴起一股「毛泽东热」，并愈演愈烈，至年底达到高潮，处处可闻歌颂「伟大领袖」声，以致「红太阳颂」成了流行曲。

如此为毛大唱赞歌，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民族患有严重的「历史健忘症」——竟忘了自己刚刚经历的苦难以及谁是酿造这一苦难的主使者，或者说患有严重的「被虐待狂症」——竟以感恩的心态和愉悦的心情来怀念那位做贱过无数国人的施虐者。

我觉得还应写点东西，谈点更到位的话。

1993年底至1994年春，我写出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政权暴力背景」的文章，后将其中一部分独立为文，冠以篇名〈暴力与政权——毛泽东与亚里斯多德合论〉，托请友人辗转寄往纽约《知识分子》杂志。承蒙总编梁恒先生厚爱，我这篇稿子能以五万余字篇幅一次性登在该刊1995年冬季号上。

写出这篇文章后，按原计划，我应立即转向其它方面研究，或转向语言哲学与现代汉语分析研究，或转向当代中国民风问题研究；但实际上，我已深陷毛泽东问题而不能自拔了，我已深感这一问题对我有着很大的挑战性，或说有着很大的诱惑性。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人物，无疑是给中国这段历史划出最深痕迹的人物，不仅曾左右过他生前的中国，而且仍影响着身后的中国。与此相应，对于他以及他所做的事，中国大陆 40 岁以上的人，数以亿计的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发言权，都能或多或少地说上话。因此，将这样一个人写进书中予以发表，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也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其意义大小与困难多少成正比。

于是，我怀着冲动并硬着头皮继续研究毛泽东问题，历时几年，经过几个阶段：

自 1993 年底至 1995 年夏，写出本书第 1、2、3 篇，历时一年半；自 1995 年夏至 1996 年初，应同事所请为一〈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撰写〈总论〉，历时半年多；自 1996 年初至 1998 年夏，写出本书第 4、5、6 篇，历时一年半；自 1998 年夏至 1999 年夏，通改全书两遍，删去许多万字，历时一年整。

这本书，最初由只想写一篇短文写起，结果欲罢不能，愈写愈多，并且欲速不达，愈写愈慢，不期然而写成今天这个模样。

## 书成鸣谢

回首此书写作过程，心中除有这不期然而然之感外，还深怀感激之情，深深感那些给我以鼓励和帮助的人。

几年来，我虽是只身行走，但不感到十分孤单，因为一路上常遇扑面的乡音——这是友人给我的鼓励；

几年来，我虽是长途跋涉，但不感到十分困乏，因为一路上常有

歇息的驿站——这是友人给我的帮助。

感谢这乡音，感谢这驿站。

感谢李锐先生对本书的厚爱。

李先生早在 1995 年就披阅过本书前两篇稿子了，此后又陆陆续续（用他的话说「零零碎碎」）收阅余下稿子，其间还数次约见笔者予以指教，最后，尽管对本书一些提法有保留，但仍慨然应允为本书作序。

笔者十分珍视李锐先生所做出的这一切。

在研究毛泽东问题上，李先生无疑是一位前辈学者，并且是一位身分特殊的前辈学者。他做过毛的党人，亲身参与过毛的事业；做过毛的秘书，就近观察过毛的言行；还做过毛的囚徒，刻骨铭心地感受过毛的苟政。他对毛的研究也正因此而可以说，是直接以他的人生经历为脚注的。

记得在 1999 年 1 月《方法》杂志座谈会上，听李先生谈起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要他切记的一个信条：

做人不要趋炎附势！

显然，李先生后来做到了这一点。他在青年时曾为反对国民党专制而站在共产党一边，在中年时曾为反对大跃进蛮干而站在彭德怀一边，在老年时又曾为反对当局调动大军扑城而站在和平请愿学生一边。他在这些紧要关头，都不趋炎附势，都站在民意方面，并且都站在弱势方面。他的人生轨迹，也正因此而多有亮点且多有曲折。

似乎可以说，在李先生那辈人中，政治人格健康者大都程度不一地蒙受过政治运动磨难；换言之，未受过政治运动磨难者大都或多或少地患有着政治人格障碍症。似乎他们只能在这政治运动磨难与这政治人格障碍之间作出选择。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

感谢余英时先生对本书的厚爱。

1980年代，笔者通过读《士与中国文化》而知余先生学贯中西，既理出西方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发展线索，也谈出中国的「士」的源流演变。书中考释「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两种素质：一是知识技能，能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如教育、科学、新闻等；二是社会良心，能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如自由、公正、理性等。这种知识分子，在西方产生于近代，以启蒙学派为发端；在中国产生于先秦，为孔墨诸子所彰显，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

1990年代，笔者又通过读余先生几篇文章而知余先生正是自己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或「士」：不仅精研学术，而且关注现实，「有勇气在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对于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直抒己见，致使自己一些论著在一些地方被列入禁书。

事实上，《士与中国文化》这一学术论著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知识分子」一词对于大陆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词，也是一个被搅得说有多乱就有多乱的话。

毛在世时，「知识分子」被说成是「附着在皮上的毛」，大都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需要改造思想。于是，「知识分子」成了这个国家的「贱民」或「老九」，其中大多数人都程度不一地挨过整，轻者受辱，重者送命或九死一生。

毛去世后，「知识分子」又被说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其「知识技能」方面受到肯定，其「社会良心」方面则是常常遭到冷遇。有关方面对于知识分子以独立立场评说国家大事的举动，大多是抱着斥责有加的态度，至少是抱着疑神疑鬼的态度，斥之为「精神污染」，疑之为「自由化」。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应与「工人阶级」一样，都属于给这个「国家」打工的人，只应该给这个「国家」打工做事，而不能对这个「国家」评头论足。于是，「知识分子」又成为一个角色特征不明的社会群体了，「士」似乎不「以天下为己任」了。

在这一背景下，余先生将《士与中国文化》直接出版于中国大陆，

显然是要给此间已被搅得混乱不堪的「知识分子」概念正本清源，并藉以表明自己在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上的价值取向。

可能有人会说，毛泽东等也强调知识分子应具备两种素质：一曰「红」，二曰「专」。诚然，这「专」类似于上述「知识技能」，但这「红」不同于上述「社会良心」。这「红」是有阶级性和党派性的，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上述「社会良心」则是超越特定经济阶级和特定政治集团的，是要为社会公共利益仗义执言的。

就余先生本人来说，虽严厉斥责毛独裁，却十分推崇马克思，将马克思与伏尔泰并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再就马克思本人来说，虽有中产阶级家庭背景，却为无产阶级大声疾呼，成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感谢苗力田先生对本书的指教。

苗先生为古希腊研究权威陈康先生的学术传人，属于目前大陆已不多见的那类道德文章皆佳的老辈学者。他坚守书斋，曾主持翻译《亚里斯多德全集》，并关怀社会，曾为北京「那一日」守夜，默读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他对后学坦诚以待，慷慨予教，曾就本书写作提出过很有价值的学术意见。

我在思考毛泽东及其党人兴衰史时，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在他们夺权成功与他们执政失败之间似有一种反相关关系，即夺权越成功则执政越容易失败。

我向苗先生谈了这一看法。苗先生当即告诉我在亚里斯多德《政治学》中就有近似思想，并建议我将此书认真读一读。他后来还送给了我一本他收藏多年的英文版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审阅了我根据他建议而写出的那些章节，并根据希腊文版校改了文中所引用的亚里斯多德有关论述。

感谢吴稼祥先生对本书的关心。

在现时中国大陆，以非官方立场研究毛泽东问题不是什么显学、什么显事，很少有人愿做这种很难上媒体的学问、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大家都很忙、很实际。因此，我这些年来与外界少有联系，与许多老友已久未通音讯了。不过，我与稼祥倒是常有来往，常就许多问题交换看法。在写作此书过程中，我几乎每写一篇都要先请他过目，倾听其意见，每每有收益；另外，还常常蹭他的饭局，喝他的老酒，在他的房间里翻找「历史上的花生米」。

除了常与论诸多书中的问题外，稼祥还帮我做了许多书外的事情，例如，书成之前曾一度为我提供写作场所，以帮我克服居室拥挤的困难；书成之后又设法为我联系出版事宜，以使之能尽快问世。

感谢李慎之、王若水、田崇勤、何家栋、邵燕祥、包遵信、朱维民、谢幼田等先生曾就此书给笔者以指正和鼓励。

感谢何频先生和张芸女士为出版本书做了许许多多工作。

特别要感谢许许多多在此不宜提名的前辈与好友向笔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

本书无疑参考了和引证了许多先行著述。笔者已在前文注明对这些著述的借鉴，再于此处表示对这些著述的作者的谢意。在这些著述（包括毛泽东著述）中，有的为笔者赞成，故能从正面充实笔者的思想，有的不为笔者赞成，但能从反面激发笔者的思想。

在此，还感谢我的一位已故多年的老师——安事农先生。

安先生 1920 年代东渡日本，在有三千名中国留学生参加的统考中考进前一百名，获官费生资格，入东京帝国大学修农科，学成回国，先后担任苏北农校校长和南京几所大学教授；1950 年代应聘为安徽省农业生物研究室主任，后替友人章伯钧说话，称批章者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结果被打成「右派」，一度被下放农村当农民，后又调至林场当技工，月薪 40 元。

笔者 1970 年下放到安先生所在林场（安徽省新马桥五七干校林业队）当林工，很快就成了先生家的常客，成了先生家那几年唯一的常客。当时，我很想跟先生读点书，先生也很愿意教我点东西，先是教我农林方面知识，后又教我文史方面知识。如今，先生教的前一类知识我已记忆模糊了，先生教的后一类知识我还记得起一些来，例如：

安先生在领读项羽本纪和刘邦本纪后讲了一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凡起于乱世的帝王都有些不择手段，都能够玩出许多下三滥的东西，如言而无信、过河拆桥；在他们身上，有豪气，也有痞气、流氓气。

安先生在谈到李林甫这个人时讲了一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杜绝言路（不让人说真话）的朝代，不是官场腐败就是政治黑暗；凡是杜绝言路的人，不是昏君暴君就是奸臣佞臣；几无例外。

安先生在谈到魏忠贤这个人时讲了一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大规模且有组织地整治知识分子的事，大都是宦官集团干的事，如后汉、后唐、后明的党争。换作今天话说，这种宦官集团就是那种有强烈窥阴癖倾向的特务集团，寡廉鲜耻，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故而在整人方面颇有手段、颇有效能。也正因为如此，这种特务集团很为那些品位不高的统治者所喜用。这些统治者大都是极端实用主义者，为了达到一定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许多卑劣手段。

.....

坦率地说，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类话，只是感到话很特别，感到话中有话。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越发能理解这些话了，越发能领悟先生在说上述话时的那种凝重神情了。学生今天写出的这书中无疑有先生昨天播撒的种子。

最后，谨向我的父母表示我的愧疚之意和感激之情。在知道儿子写这本书后，老人们就一直放心不下了。他们是过来人，见过风风雨雨，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事。他们不希望我做此事，但又不强阻我做此事，只是默默地站在我身后。

文化叢刊

# 毛澤東執政春秋

2001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單少傑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責任編輯 張怡菁  
校對 陳怡君  
封面設計 在地研究

電話：(02)26418661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321-6 (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mailto:linkingp@ms9.hinet.net)

手搖小紅書，早請示、晚匯報，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澤東可謂廿世紀中國現代史上，重要關鍵性人物之一。他承襲了中國古代君主的典範，「不守常規，不講章法，無巧不取，無所不為」，玩弄中國於股掌之中，當然，他有許多過人之處。中國人民大學學者單少傑先生，多年來從事毛澤東生平研究，

引用許多秘密的中國共產黨黨史資料、書信、與時人對毛澤東的批判等等，分析毛澤東的政權興起與擴張，並讓許多爭議性的歷史事實重見天日。

《毛澤東執政春秋》的內容，採用深入淺出的觀念，來說明毛澤東一生對中國與世界帶來的衝擊。

前毛澤東政治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和美籍史家余英時欣然為本書作序。

李銳先生認為：「單少傑先生在《毛澤東執政春秋》一書中，利用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來分析毛澤東的執政成敗，可謂創舉。

而且單少傑先生在針對毛澤東進行功過批判時，

是將毛澤東放在歷史的天秤上，很少顧忌，暢所欲言，敢言人之所不敢言！」

余英時先生則以中國古籍《春秋》之義，來比擬《毛澤東執政春秋》的內涵，

同時認為單少傑先生有古風，值得欽佩！

本書的顯著特色不僅是想恢復歷史事實而已，更重要的是想恢復中國人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思辨理性與實踐理性，使華人在廿一世紀的世界舞台，更臻上層！

ISBN 957-06-2321-6



00380



9 789570 823219

聯